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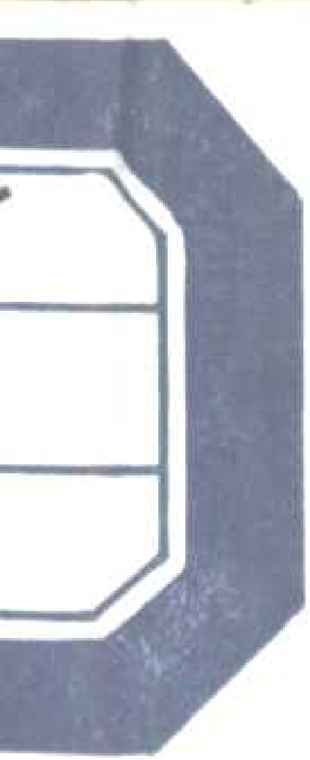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

主编　孙邦

副主编　于海鹰　李少伯

伪满史料丛书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伪满史料丛书

“九·一八”事变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伪满史料丛书
“九·一八”事变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6印张　插页4　620 000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206—01906—4
D·566　定价：平15.20元　精18.80元

序

刘云沼

反映伪满洲国历史的十卷系列丛书，在久久期盼中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项巨大工程，可喜可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序幕。一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伪满洲国的历史，是我们祖国六分之一的领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华儿女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英勇斗争、抗日救亡的历史。回顾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蒙受屈辱的历史，使我们懂得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萎靡难以腾飞，落后必定挨打；不能崛起，必然陷入沉沦。今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反腐败斗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胜利完成四化的宏伟蓝图是何等的重要。

伪满洲国史料丛书是全国第一部有关伪满洲国史料的大型系列丛书，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八五”计划的重点书目，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它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扩大文史资料的社会影响和利用价值，必将推

动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全书共十卷，选用了一千二百多篇文稿，共五百五十多万字。从“九·一八”事变写起，到殖民政权、伪满军事、经济掠夺、日伪暴行、伪满文化、伪满社会、伪满人物、抗日救亡、伪满覆亡等，各卷既是独立成卷，又有内在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如此浩瀚的史料，涉及到东北沦陷后十四年的方方面面，十卷丛书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殖民统治的概貌，又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详尽记述。同时，这又是一部以口碑史料为主，首次披露的史料丛书，与所有有关伪满的学术研究专著、论文及档案资料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作者大多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具体史实为根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充分证明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实质。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整个伪满洲国内幕的实证，既然是史料，又限于作者个人的所见所闻，虽然它是真实的，也难免有疏漏，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文字量过大，在编辑过程中必须有取有舍，有详有略。在取舍详略之间，考虑不周之处，在所难免。至于编辑上的疏漏和差错，也是少不了的。无论如何，构筑如此浩瀚的史料工程，又文出多人，几经易稿，都是费了心血的。如此巨篇，如果没有全国各级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鼎力相助和广大学者、专家、文史工作者的辛劳，特别是我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多年来对伪满洲国史料的锐意搜求，是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在我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的史料工程的。只有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各方面专家的指导和参与，才使这套丛书更加专题化、系列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民政协确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群体，在挖掘整理文史资料上有独特的优势。

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提出，要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十卷伪满洲国历史丛书，就是这样一套回顾历史，启迪当代，教育后人的好教材。我们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有必要研究在我国东北曾出现的最野蛮最残酷的殖民统治。因为今天的中国，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及家乡，在半个多世纪前遭受的那一段苦难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什么国仇家恨统统说不清楚。用这些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激励革命意志，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重温历史，并不仅仅是回顾历史，而是以史为镜，教育后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伟大的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搞这样一套历史丛书，对加强中日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日本仍有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还在念念不忘过去他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一直留恋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甚至为东条英机等战犯涂脂抹粉，企图篡改、歪曲历史的

本来面目，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绝对不答应的。

斗转星移，历史毕竟早已翻开新的一页，耻辱的历史已经过去，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在世界东方，让我们引古鉴今，奋发图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不息。

谨以此书告慰无辜殉难及为国捐躯的千万个英灵。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

编辑说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于1932年又炮制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从此，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十四年之久，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浸透血泪的一页，永远记住它，具有特殊意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战败时，销毁了他们在中国的大部分档案资料，战后，在日本又有别有用心的人不断撰文著书，歪曲历史，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亚洲的罪行。因此，揭开历史迷雾，系统地揭露、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种种罪行，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真相，是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经过多年来搜集、挖掘，征集了大量亲历者口述整理或撰写的有关伪满的稿件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开始编纂工作。编辑过程中坚持领导、学者和编辑人员密切合作，经过多次论证、修正及精选精编，终于完成了《伪满史料丛书》。全书共分十卷，约550万字。收入1200余篇文稿，基本囊括了有关伪满的方方面面。

一、丛书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的文史资料为主，辅以历史学者

的论著及有关的档案资料。

二、丛书按内容类别分卷，各卷内又分若干专题。由于某些文稿内容往往涉及到多种专题，为保持资料完整起见，采取了集中编排。如有关“细菌部队”的文稿，均收入《日伪暴行》卷中，其它卷、专题不再收入。另外，某类稿件稿源丰富，又涉及到多方面，则根据稿件内容，分别收入所侧重反映的专题内。如有关“劳工”类的稿件，主要反映“劳工苦难”的稿件收入《伪满社会》卷中；关于“人力掠夺”收入《经济掠夺》卷中；有关修筑军事工程后劳工被残杀的稿件收入《日伪暴行》卷中。

三、丛书由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各卷均有专人负责编辑。

四、丛书选用部分日本战犯、伪满汉奸及日本历史学者等的供词或文稿，但其中某些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选用时作了适当的删节，保留史实部分，或加编者按、注释予以批驳。故请读者批判地阅读。

五、编辑体例

1. 丛书框架结构视内容而定，各卷分别采取列一层题、二层题，一、二层题并存的三种形式。

2. 对入选文稿或资料，基本保持原文格调。如需对原文改动，主要是采取删节或压缩。

3. 丛书的数字、年代的使用，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不定数使用汉字。

4. 丛书注释分三种形式：作者简历注为*；凡属作

者或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解释性文字，均加（ ）；其它注释一般采用脚注圈码，不用文后集中注释。

5. 凡属繁体字、古体字和异体字，除有特殊含义（如姓名）外，均改为通行简体字。

6. 文稿出处置于该文稿之后，一律注明“摘自”某某刊物或书籍。

六、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为此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指导并做了大量工作；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兄弟省、市、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给以了热情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望读者对丛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和指正。

卷首语

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出笼的经过及真相，中外学者研究已久，资料相对来说较为丰富。出于丛书编辑整体上考虑，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初期的两大战略步骤——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出笼合编成一卷，定名为《“九·一八”事变》卷。共收入124篇稿件，分为十部分，编排上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

第一、二、三部分内容主要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以及策划侵占东北的种种阴谋活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企图由来已久，长期以来在政治、军事、舆论上作了大量而充分的准备工作。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侵略东北的步伐，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终于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第四、五部分为“九·一八”事变经过、真相，其中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时亲历者回忆文稿为主，以及东北全境沦陷的情况。

第六、七、八、九、十部分内容的时限为“九·一八”事变后及伪满洲国出笼前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也面临诸多重大难题，如：当时人心浮动，日

本侵略当局立足未稳；掌握重兵的于芷山、张海鹏、马占山等东北军将领或观望或抵抗，尚未投降。尤其是黑龙江省地邻苏联，日本统治者顾虑引起外交和军事冲突，加上黑龙江省的东北军未受重创，抗日士气高昂。这些都成为日伪当局的心腹大患。因此，他们首先拼凑了所谓“自治”的伪组织，组建东北三省的伪政权，颇费心机地招降了于芷山、张海鹏、马占山等。接着挟持溥仪充当傀儡，炮制了伪满洲国。攻陷热河是日本侵略者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的重要步骤，故单独编列一个章节（第九部分），涉及日伪军进攻热河的军事行动的稿件则收入《伪满军事》卷中。第十部分记述了国联调查团在东北活动的情况。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乞求国联干预，是与“不抵抗主义”一脉相承，其结果是葬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本卷以翔实史料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初期的重大战略步骤逐层次展开，意在揭露其贪婪、虚伪、狰狞的真面目，告诫人们勿忘国耻，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民主、富强的国家。

编　者

目　录

一　“九·一八”事变的预演——皇姑屯事件

二　蓄意发动事变　策划侵占东北

侵吞东北的种种阴谋

乌云笼罩的事变前夕

三　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

恣意挑衅　制造侵略借口

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

四　发动事变　占领沈阳

回忆“九·一八”事变

山河沦丧　国耻难忘

五　东北各地相继沦陷

对营口、安东等城镇的占领

侵占长春、吉林

侵占黑龙江与马占山抗战

占领锦州与哈尔滨沦陷

六　拼凑伪组织　组建三省伪政权

控制县级政权

七 挟持溥仪充当傀儡

八 伪满洲国出笼

九 热河沦陷

十 国联调查团与东北人民的控告

一

“九·一八”事变的预演——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的日本顾问

陶尚铭　关根勤

我们两人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时期担任过对日外交工作，了解一些张氏父子同日本顾问的关系，但是由于职位关系，重要的机密是很难了解的。现在仅就回忆所及，摘要记述下来。

张作霖的顾问町野与菊池

1916年段芝贵去职，张作霖取得了奉天省军政大权。他知道要想在东北保持并发展个人的权势，日本是得罪不得的；同时，他过去同日本人厮混过，也知道对付日本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作霖登台不久，即1916年秋初，东蒙保皇党分子巴布扎布在日本的策动下在辽北闹事。闹事没有成功，日本又挑起郑家屯事件，威胁张作霖就范。张作霖既不甘心把政权让给保皇党，又不敢得罪日本人，就派菊池顾问到郑家屯去调查。说是调查，实际是要菊池作调人，大事化小，把紧张局面缓和下去。菊池如何活动，我们不知其详，只了解他回到沈阳，劝说张作霖同日本和平了结郑家屯的军事冲突，对巴布扎布勿予追究。

郑家屯事件在当时东北民间有许多传说，表现了人民对敢于同挑衅的日本军队对抗的中国驻军的赞扬，这对一般军人也是一种鼓舞。可是张作霖但求保住个人的名位，能敷衍过去就敷衍过去。这种不抵抗主义思想后来几乎蔓延到所有东北军政界上层，日本顾问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总是“献策”给

张作霖和杨宇霆，这个“策”就是同日本“和平”相处，同时他们又表示他们是“爱护”张作霖的。

当时日本对究竟培植、使用满蒙哪一类人，其主张是不一致的，有的力主扶植宗社党，干掉张作霖。1916年，上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町野顾问也应邀出席了。町野是主张扶植张作霖的。据传说（可能是町野自己放出的），町野在当天的会上说：“谁要动张作霖一根毫毛，我头一个不依。”但是不多几天后，张作霖在从南满路沈阳火车站迎接日本贵宾的归途上两次被炸。这无疑是日本人干的，向张作霖示威，或者真的企图把张干掉，扶植清室余孽。可是町野在事前并没有向张告警，事后散布上述那段传说，骗取张作霖对他的信任与亲近。

从此，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各派要人，争取日本把他当作忠实“外藩”，少找他的麻烦，或遇事援之以手。每次，张都给町野交际费3万元。町野回来时，把少数结余缴还。这项费用多系张作霖的五夫人经手，参谋长、秘书长全不知道。

町野连任顾问3期，一共9年，先后花了东北老百姓的血汗60万元。任满后改任张的私人顾问，并以张的资助竞选上了日本众议院议员，一直到张被炸死后才回国。

菊池连任了两期（6年）顾问，同杨宇霆来往较多，具体活动，我们了解的很少。第二期任满的前一年年初，他预支了一年薪金去欧洲旅行。回日本后到参谋本部任职，他袭有男爵，被选为贵族院议员。

本庄、松井、滨面及仪我

菊池离职时，日本参谋本部内定派土肥原贤二中佐来接替。

町野事先得信，对参谋长秦华说："土肥原作事十分跋扈，把这种人置诸左右，实难放心，请把此意转达张作霖。"张相信町野，就对日方提出异议。日方大不满意，问张究竟要谁。张提出铃木美通中佐。那时，铃木另有任务，日方派现役驻广岛某联队队长本庄繁来接替菊池。

本庄繁长于交际，到沈阳不久就遇上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他同町野"热心"地参与了这次战役。他改穿中国粗布军衣，从军粮城到新安镇视察阵地。所有对直军作战计划，多半出自他手。本庄在这期间摸清了奉军的内部情况同人事摩擦，回国后扶摇直上，后来当上了关东军司令官，成为"九·一八"侵略东北的主要策动者。

本庄只任一期，期满后由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松井七夫大佐接替。他是后来驻南京日军总司令侵华战犯松井石根之弟。在任顾问期间，松井同张作霖的关系处得很好。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坐不住凌霄殿，松井把张的五夫人和张的一些年幼子女接到他的满铁附属地家里避难。听说这期间张作霖气急败坏，口头上许给驻奉天满铁公所所长镰田弥助一些权益，松井是否参与其中，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郭事平定后，张作霖赠给松井一笔巨款，松井用以在日本镰仓海滨修了一所大厦。

郭松龄反奉时，日本乘机又向张作霖身边安插坐探。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的参谋长，对俄作战计划权威者滨面又助，通过町野来见张作霖，说是在大帅危急时期帮忙来了。张立表欢迎，聘他作私人顾问，逢年过节，赠款酬劳。滨面还作过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同白俄将军谢米诺夫来往密切。从此在张作霖身边又增加了一名顾问。这期间，町野还介绍一个日本人伊达（作过警官）给张作霖保镖，但留沈不久，就转投张宗昌去了。

拿松井来说，同其他顾问一样，有时也替张作霖排除一些对日交涉的困难，取得张的信赖。郭松龄反奉失败，张作霖再度进关后捉拿李景林。李从天津逃到日船长安丸内，经奉军上船搜查，无所获，日方因而向张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陶尚铭向松井请教怎样应付，松井主张可以置之不理，这事就这样无形结束了。1927 年张作霖自封为大元帅，把松井聘为大元帅府顾问。

在张作霖时期，对日外交感到棘手时，往往就教于日本顾问。顾问在无关宏旨方面出点主意，实际上反倒摸了张的底。

町野期满改充张的私人顾问后，日本派仪我诚也大尉来接替，任期由1923 年到1929 年。仪我毕业于日本陆大，是个肯于钻研的人。他同张作霖很少接触，后来由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团用去了，他的活动我们也就不得而知。1928 年张作霖被炸，他就在这列火车上。

自1913 年到1931 年，19 年间，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18 人。其中军事顾问13 人，私人顾问3 人，普通顾问及警察顾问各1 人。警察顾问为上田续，他的情况，我们不了解。

其他方面的日本顾问

1929 年奉天省长公署还聘任高等警官出身的宫越宪作为普通顾问。宫越作过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警察署长，奉天当局想用他来协助处理有关日侨事务。1931 年夏初，宫越到交涉署见关根勤科长，密报南满铁道沿线日本守备队剑拔弩张，请关转告上级，赶快准备。关问：“日军打算占领沈阳么?”宫越说：“恐怕不止沈阳。”关即报告交涉署长王镜寰。王说：“沈阳为国际交通重要城市，英美侨民不少，日人如果强占，英美亦难容许。”颟顸了事。宫越出于何意前来“忠告”，我们不得而知。当

时日本各派对张家父子态度不尽一致，宫越也许是不主张采用武装占领方式的那一派。

吉林方面，聘用日本顾问始于1921年孟恩远督吉时。曾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的斋藤中佐被聘为首席顾问。当时督署备有顾问办公室，斋藤每天按时来上班。他在职期间，曾奉派与日本交涉取消日本设在延吉的特务机关。结果日方把特务机关改为连络员，实际是换汤不换药；而斋藤却因此事得到孟恩远和吉林军政界上层的信赖。孟离任后，斋藤也随之离吉，回国后不久接任了东京要塞司令。

吉林政权被张作霖弄到手后，由张作霖提名的铃木美通被聘为吉林督署顾问。铃木任期未满，日本派林大八中佐来接替。郭松龄反奉时，林大八亲到新民前线，为奉军布署炮兵阵地，帮助张作霖抵抗郭松龄。林大八任期未满归国。“一·二八”上海事变，他是日军的某方面指挥官，被我国军队击毙。

林大八之后，吉林聘用的日本顾问是大迫通贞中佐。大迫为人异常跋扈，以后成了侵略东北的首恶之一，“八·一五”后以战犯被判处徒刑。

黑龙江方面一直没有聘用过日本顾问。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张作霖被炸死的前后

町野武马

本书编者按：町野武马利用其日本首席顾问的职务，标榜为张作霖的“好朋友”，施展“软硬兼施”的策略，实质还是要

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国策”。

一

我做张作霖的顾问，是1917年他就任奉天省督军的时候，但我跟张作霖初次见面，是1911年，中国发生革命前后的事情。那时，王丙越在北京劝我说：“中国将要起革命，但满洲万万不能有革命。满洲有张作霖、冯麟阁、张景惠等绿林的头目，如果领导这些人，令满洲独立，则可防止革命。你如果有意思，我跟他们有深厚交情，所以要不要跟我一起到满洲。我相信你能办得到。”于是我遂跟王丙越联袂前往满洲，为打击革命军，我在张作霖家住了1个月左右。

这时，川岛浪速和小矶国昭等人正在策划抬出肃亲王，并使以他在满蒙之地恢复清朝。这等于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妨害了他们的工作。因而据说，他们主张要杀我。有一次，我偶然在奉天的附属地旅馆沈阳馆碰到他们。他们说：“你不要妨害咱们的工作。”“我并不是来妨害你们的。”“若是，你能不能帮我们？”“我不干办不到的事情。对不起，我先走一步。”如此这般，我告别了奉天，而他们的工作也归于失败了。

尔后，张作霖当督军，跟我一起做张锡銮顾问的菊池，马上到张作霖那里去了。但我没去。张作霖说：“町野为什么不来，请他一定要来。”我说：“我不想到绿林出身、没有大志的人那里。”我指的是，张作霖虽然赶走了革命军，但却接受了革命军的任务，做它的师长。可是张作霖却仍然要我去，因此我在张作霖面前冷笑他没有出息。张作霖当场表示要干到底。所以就终于答应做他的顾问。

换句话说，我跟张作霖约定要共生死、取天下。从此而后，我俩形影相随，张作霖危险时，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张作霖的最大特点是不怕死，富于决断力，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一做决定，就是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参谋长杨宇霆劝他，他也不听，而只肯听我的话。因此，对于张作霖束手无策时，不管杨宇霆还是张学良，都来找我。我跟张作霖，似有前世之约束。

二

1927年4月，田中内阁成立时，田中请我去并对我说："这次我出来组阁，主要是想解决中国问题，亦即处理满洲的问题。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保持满洲的现状，国内会有许多意见，我无法应付下去。也许将爆发战争，但我不希望有战争。不过不得已时，恐怕只能打了。"我说："要用战争解决满洲问题是轻而易举的。换句话说，要在银座强奸一个芳龄美女是很容易的，但万一那些大哥来干涉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有办法。""我想没什么办法。"

田中答说："如果能够谈成索伦铁路、吉会铁路、长哈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一共五条借款铁路的话，日本方面我可以负责。这样就不会有战争。问题是能不能办得到。""如果办不到，会怎样?""战争。""发生战争，对我也不好。"我说："虽然办不到，但绝不能有战争。""好，那么这五条铁路可以作罢。""就是办不到，也只有试试。""你既然这样说……但要叫谁来办理呢?""请你自己去办。""我是个首相，不能离开东京，山本条太郎怎么样?""可以。""那就请你跟山本好好商量。"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帝国饭店睡觉的时候，山本来看我并说："你为什么推荐我做满铁的总裁?昨天晚上，为了借款铁路事，田中喊我去，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通?""办不通。""办不通，为什么要我去办?""否则将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去试试。"

"办得到吗？""虽然办不到，但唯有去碰。""好，就干罢。"如此这般，山本遂接受了满铁总裁这个位子。

我们以为这是田中、山本和我3个人之间绝对的秘密，不容他言，我就回到北平。可是，日本报纸却随即报导获得陆军省支持的芳泽大使提出五条铁路的要求，但为中国拒绝的消息。我即时打电报给山本说："这样不守秘密，我不干了。"山本回电报说："风声也不过七五天，请等一等。"

同年11月，我电报山本，要他来北京。当时，张作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获悉山本要来北京，大元帅问我："山本来北京干嘛？"我说："不知道，大概是礼貌上的拜访吧。""是吗？若是，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很好，很好。"

追至山本要抵达的前一天晚上，12点多钟时，我前往大元帅打"麻雀"的地方去。这种时候，我都带着江藤，怕话讲不通。这时我也把他带去。我对张作霖说："明天山本要来，是为了五条铁路。"大元帅说："五条铁路怎么样？""要架设借款铁路。""不行！"他气愤愤地，连招呼也没打就想走进房里。我对他大声说："不行？如果不行，咱们明天就再见。"说完，我就回去了。

翌晨9时，我到停车场去接山本，芳泽大使等许多人也赶来了。此时，山本拼命拉我并问："结果如何？""大吉，放心。""那太好了。"他很高兴。约好10点钟见面，因此先到旅馆，然后准时去大元帅宫内，但我自己先到行宫内一步。

10点正，山本来了。但大元帅并没出来。10点半，10点40分，10点50分，仍然没有露面。我想忍耐到11点，如果到11点还没出来，我是准备去把他拉出来的。我说："山本先生，大元帅从昨天晚上开始有点不舒服，所以要晚一些……""是，是。"

11点前几分，从走廊那边，晃呀晃地，大元帅出现了。我

给大元帅介绍“这是山本满铁总裁。”山本说声“啊”，并伸出手来，大元帅无可奈何地也伸出手，但没看山本的脸孔。然后只说声：“请坐。”我对山本说：“把你所要求的文件拿出来。”山本觉得不大对头，但说“啊”，而把文件取出，并说：“张先生，我们对于‘打架’来个结束。”

我要站在旁边的江藤，好好地把这意思翻译给大元帅听。江藤翻译说，中日“打架”告一段落，现在要互相携手，言归于好。大元帅只看着下面。我问他说：“怎么样？”他没看我的脸，就说：“行。”我再问他：“这要叫谁来做？”他小声地说：“杨参谋长。”“好，请杨参谋长……您身体不舒服，请休息。”“啊，啊。”大元帅无精打采地走进去，随即杨宇霆来。本庄繁上将常说：“日本没有像杨宇霆这样富于正义感和能办事的人。”的确，杨宇霆很敢说敢为。

我对他说：“刚才山本总裁提出这个要求，大元帅已经同意，并指定你杨宇霆来办，所以请你照办。”“五条都要办吗？”“是的。”“你同意了？”“不是同意不同意，而是日本要作。”“我不干。山本先生，日本太那个了。到别人地方架设借款铁路，还要18%的利息。不顾我国的赤字，现在又要求建设对我国并不必要的五条铁路，日本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杨宇霆拼命地说。

山本听完了杨宇霆的话以后，大声说：“同感。”杨宇霆吓了一下而问：“什么？同感？为你们的需要铺设铁路，还要拿利息，这是什么道理？”“当然要补偿。”“若是，这是无利息，如果有赤字，要补偿？”“当然，精神上是同感。但满铁没钱；如果向日本银行贷款，也得付5分2厘的利息，而且这些铁路是不会赔钱的，所以这种利息是妥当的。”

杨宇霆又问：“洮南、四郑的两条铁路怎样？”“照样办。”“是吗？”杨宇霆还在想着。我又对杨宇霆说：“这是大元帅交给你办

的。""这实在很不容易。""但以后你会高兴的。大元帅和町野都说可以办。"杨宇霆说:"没办法,好。"而终于答应。

三

陆军得知满蒙这五条铁路将于7月间发表。这些铁路如果造好,以后就没有文章可做。因为这不仅是五条铁路,各铁路还附带有租借地。换句话说,它将把满洲变成日本的属地,日本在满洲的立场,将由此而决定。若是,日本军人将无用武之地。我认为这是日军干掉张作霖的主要原因。亦即他们使用工兵队的年青军官,在奉天、沈阳车站之间,将大元帅乘坐的专车炸毁。使用这种极端暴力,实在太不应该,而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的开端,更是太平洋战争的远因。回想起来,真是可惜。

大元帅撤退北京后,又要回到奉天,是因为南方的蒋介石在广东独立,其势力逐渐迫近中央;而上海、南京又编成北伐军北上而来,使张作霖部在河南与其对峙。此时,日本以"形势对张作霖不利,如果张作霖军战败,退却到满洲,满洲的治安将发生问题,所以当不战而退。"而要求张作霖撤退。

张作霖同意这项劝告,并对其5个军团发出撤退命令。于是右翼的张学良开始撤退,可是左翼的山东省督军张宗昌却把他的军队按下,并到北京问道:"大元帅,为什么要撤出北京?我一个人也要干。"大元帅说:"不行吧。"我也说:"能吗?"张宗昌说:"我干给你们看看。"因而大元帅说:"好,你干看看;町野顾问,跟我走。""走吧。"然后,我跟大元帅坐到奉天去的专车。到天津时,为了准备跟潘复总理等到德州的张宗昌军处,我就跟大元帅告别,在天津下车。所以,我不知道张作霖被炸的事,但我获得爆炸事件消息时,我眼前顿时黑天暗地。

田中首相边流眼泪,边给山本写信说:"一切都完了。"就这

个事件，田中曾对日皇奏请说："张作霖问题的责任，将召开军法会议，彻底肃清军纪。"可是，陆军的中坚干部却绝对反对。政友会也不赞成。但国会、民政党仍不遗余力地追究"某重大事件"的真相和责任。在这样拖延时日时，据说日皇曾对田中说："你没照你以前所说的去做。不要再说了。"为了全其臣节，田中遂提出总辞职。没过多久，田中便去世，据说是完全由于这个事件所导致。

爆炸事件的处置，只停了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职了事。河本曾任北京大使馆武官的助理，回国后出任工兵部队的联队长。河本曾向高利贷借钱，这件事暴露时本来非退役不可，惟因得到某氏之助力才得于过关(这项借据现在还在)。然后以关东军参谋身份来到大连。

据云，河本常开口闭口说："张作霖曾受日本培养，但却竟忘恩负义，接近英美，从事排日运动，真岂有此理。日本满蒙政策的最大眼中钉就是张作霖。"惟我认为，张作霖实在一点也不排日。南方排日，在张作霖势力下，毫无排日的事实。根据我所知道，张作霖讨厌洋人，他的全部财产都存在日本。由此当可窥悉张作霖如何地信赖日本。年青军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别有用意的。

四

我经常对张作霖说："只要你生存一天，我一定卖命做你的顾问一天。"所以有一次，大元帅对我说："你归化中国好了，你归化了，我就给你做督军。"我说："不要。如果你做了皇帝，要把满洲给我，那还差不多……"张作霖的话，好像不是开玩笑。

大元帅被炸死后1个月左右，举行葬礼的时候，张学良对我说："你继续留在这里。我父亲的遗产也要分给你。跟过去一样，银行的钱请你随便用好了。"我对他答说："如果你父亲在世，我要回去日本，他说要送我1 000万元，我敢说要2 000万元。但你

没有权利给我钱，因此我不向你要钱。”

葬礼烧香时，学良当然是第一个，其次应该是他的弟弟学铭，可是，学良烧完了香我就上去，大家吓了一跳。烧完香后我并没回家，而将前一天晚上向山本借的2万元当中的1万元交给内人，我只身回到日本。

一年以后，就前述满蒙五铁路，山本对我说：“请你去跟张学良商量，看看这些铁路到底要不要建设。”因此我又到满洲，并问杨宇霆，杨宇霆说：“要建设。”我对他说：“请你好好给学良说说。”但又加了一句：“你这样说，没关系吗？”他答说：“没关系，一定要建设。”

可是，当天深夜2点半，杨宇霆家人打电话告称：“今天晚上本来说是8点钟回来的，但到现在还没回来。”我觉得很奇怪，所以遂坐车赶往学良宅。门关得紧紧地，有卫兵。我直闯学良的寝室。张学良垂头丧气地出来，在我还没开口之前就说：“町野顾问，请同意我。”“同意什么？”“杨宇霆想取代我的位置。所以我的部下把他打死了。请你能承认。”“不是要你的位置，而是为了铁路的要求？”“决不是。”

被枪杀的是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个人。“带我去看。”“请稍等等。”大概把尸体摆在现场，由于我要看，因此他们赶紧把尸体移到客厅，做个台子，上上香。我恭恭敬敬地行礼之后，对学良说：“我将永远不再和你见面了。”而回去。杨宇霆死得真是可怜。当时，已经信仰三民主义的学良，已经不可能造满蒙五铁路了。惟有张作霖才能压住其部下……。张作霖的死，对日本的确可惜。

（摘自《我杀死了张作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所谓满蒙五路问题

朱希炜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据高纪毅先生的谈话整理而成的。高纪毅先生当时在东北交通委员会任职，并兼北宁铁路局局长，曾与日本、荷兰等国代表谈判满蒙五路和葫芦岛筑港问题。满蒙五路是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时期对日交涉的一个大问题。高先生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可供研究这个时期中日关系的参考。

一、满蒙五路问题的由来及其变化

满蒙五路问题是个老问题。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法取得南满铁路、铺设安奉铁路外，为了掠夺东北资源，还对将修未修的铁路从政治上、经济上施加压力，意在攫取经营、借款的特权。那时英国对京奉铁路已有借款关系，但它还想再行扩张，劝诱中国借英款修筑新法铁路（由新民到法库），并延长到齐齐哈尔。在日本看来，这对南满铁路极为不利。因而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这条铁路将与南满铁路成为平行线。后来英国的侵略锋芒向西藏集中，新法铁路计划遂行搁置。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就放心。1909 年，又向清廷提出要求：建设新法铁路须得日本同意。他们贪得无厌，于1913 年10 月，利用机会和袁世凯订立满蒙五路密约，要求五路的建筑权和借款优先权。满蒙五路就是：

1．开海铁路　由开原经西丰达海龙；

2．四洮铁路　由四平经郑家屯达洮南；

3. 长洮铁路　　由长春经怀德达洮南；

4. 吉海铁路　　由吉林经双阳、磐石、朝阳镇达海龙；

5. 洮热铁路　　由洮南经赤峰达承德。

这就等于从南满路伸出几条支线，以便于他们为所欲为地进行压榨、掠夺。按照密约的规定，中国向日本借款3 000万到5 000万元，以这几条铁路担保。议定工程由日本人承担，重要事务由中日两国合办；至于铁路所需的一切材料都要向日本购买；30年中国可以赎回。

1918年9月，北京政府外交部长孙宝琦和日本公使山座园次郎再度谈判，把原有的五路改为四路，路线也加以适当的变更，双方互换了觉书，仍承认日本有借款优先权。四路名称是：

1. 开吉铁路　　由开原经海龙达吉林；

2. 长洮铁路　　由长春经怀德达洮南；

3. 洮热铁路　　由洮南经赤峰达承德；

4. 洮热线上的一地点至海港。

这四条铁路和上面的五条铁路有些不同，它不包括四洮路，而新加入了洮热路之一地点到海港；同时将开海和吉海合而为一。同年12月，北京外交部和日本正金银行订下了四郑铁路借款合同，先由正金银行垫付2 000万元。北京政府的一些官僚政客，昧着良心出卖主权，以维持他们的政治地位。因此，全国人民极端不满，表示强烈的反对，终于在人民的压力下，未能正式签订条约。

这里应该提一下吉长路的问题。这条铁路是南满铁路的培养线，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取得借款权和建筑权。早在1907年，他们就提出以借款的方式来修筑，议定由中日合办，经营日期限为30年。当时吉林人民坚决反对，成立保路会，主张自己筹款建筑，以维护路权。推举代表赴奉天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徐

谓条约已定，不能更改，竟加以拒绝。代表们不得已赴北京请愿，清廷懦弱，屈从敌人意旨，不接受人民意见。结果，1918年10月，签订了中日吉长铁路续约，允许日本动工修建。

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对于满蒙铁路网的建立，片刻不能忘怀。看到东北当局树立了铁路政策，积极建筑由自己经营的铁路，所谓满蒙铁路网将被打乱，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的经济，因此，在1928年，又对东北当局提出所谓新五路要求。这新五路是：

1. 吉会铁路　　由吉林经敦化、延吉达朝鲜的会宁；
2. 长大铁路　　由长春经农安达大赉；
3. 吉五铁路　　由吉林到五常；
4. 延海铁路　　由延吉到海林；
5. 洮索铁路　　由洮南到索伦。

这五条铁路虽然与前面的五条、四条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实质是万变不离其宗。日本帝国主义早拟将吉长线延长到延吉，以开采天宝山之银、烟筒山之铜。吉会铁路不但能完成以上的任务，而且通到朝鲜的会宁，以与罗津港相接，形成横贯满鲜的大铁路；这样，由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经朝鲜的新义州、汉城南达釜山，形成纵贯满鲜的大铁路，这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很大的价值。其次，长大铁路可以吸收黑龙江和东部内蒙古的物资，经吉长线、吉会线，再由罗津港向日本内地输送，较由南满铁路运转缩短了很大的距离。吉五铁路虽不算长，但它贯穿了素有谷仓之称的吉林大平原；延海铁路又向吉林东部支出，不仅对吸收吉林东部资源有便利条件，还将对从延边向北满腹地移住朝鲜人起一定作用。他们认为，这是有独特的政治意义的。至于洮索铁路，他们原想修筑这条铁路为南满铁路培养线，进一步掠夺内蒙古的物资，但提出这个问题时，洮索铁

路已由当时的兴安屯垦公署和东北交通委员会合建，开始动工，使他们无法如愿以偿。

二、东北铁路建筑的热潮

在张作霖当政时代，树立了东北铁路政策，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以贯彻执行。依照这个委员会的计划，于1929年5月，着手铺设洮昂铁路（由洮南至昂昂溪）。这条铁路是借南满铁路公司的款，计1 300万元。次年7月全部竣工。技术工程由满铁负担，经营管理权归中国所有。这条铁路建成以后，东北的筑路热潮随之高涨起来。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奉海铁路（后改为沈海铁路），这条铁路是官商合办的，不借外资，1927年（?）8月开工。奉海铁路本来是旧五路的开海线，变更后，四路的开吉线，由于王永江（奉天省长）和日本方面商谈，要他们放弃这条铁路的建筑权，得到日方同意，改为奉海线，由沈阳经朝阳镇以达海龙。同时，吉林也依照奉海路的办法，官商合资，自己修筑吉海路，由吉林到海龙，和奉海线衔接起来。同年10月，呼海铁路（呼兰至海伦）兴工。另外还有和南满铁路公司签订吉敦铁路（吉林到敦化）的工程契约，加以齐克铁路（由齐齐哈尔到克山）亦着手修筑（1931年1月齐齐哈尔到泰安镇段竣工），如果再向北延长，可以直接吸收小兴安岭一带货物，而且东部的吉五线已开工，可以由五常由北延长，经同宾以达依兰，吸收松花江一带货物。这些铁路连接成为东西两大干线，对南满铁路是个严重的威胁，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有惶惶不安之感。

应该指出，打通铁路和吉会路的问题，乃是中日铁路交涉的焦点。打通路是从京奉路（后改为北宁路，即今之京沈线）沿线的打虎山站到通辽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并不算长，可是它把四洮、洮昂两路和京奉铁路连修起来，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

建筑所需材料、技术和费用统由北宁铁路局一手包办，因而工程进行非常迅速，1930年兴工，同年12月完成。对此，日本帝国主义感到最不舒服。他们认为：这是1907年英美两国提议铺设的锦瑷铁路（由锦州经洮南、齐齐哈尔以达黑龙江畔的瑷珲）的再现，该线与南满铁路平行，损害了日本铁道的“权益”。因而不断向地方当局交涉，成为不决的悬案。早在1928年满铁总裁太田到北京会见张作霖时，就曾提出打通路与南满铁路平行，中国不能违约建筑的问题。张谓这件事可找交通部门去谈。太田去后，张召常荫槐于居仁堂的纯藕斋，告以此事，嘱常与他们周旋，但不能听他们的。常当即表示态度，宁肯牺牲代理部长职位也不答应什么条件。在北京饭店招待太田，并赠送他一些古玩，没有结果而散。①1931年4月间，日本的铁道相内田康哉② 又赴北京和张学良交涉。那时张学良因病住协和医院，内田乃找负有东北交通责任的高纪毅，高以此事太伤脑筋，托病亦住进协和医院，内田只好悻悻而去。但打通路这时已经修成了，他们由本国远道而来找麻烦，还有一个修筑吉会路的野心。

吉会路对日本侵略东北，无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价值。他们在取得吉长路合资经营后，就有修筑这条铁路的野心。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间岛问题，妄图侵占延边一带地方（包括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县），因中国人民坚决反对，遂未得逞。但他们看到清廷懦弱，妄想“收之桑榆”，便于1909年9月，强迫清廷签订图们江中朝边界条约，取得这条铁路的修筑权，遭到东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但他们野

① 此处史实有误，1928年山本条太郎为满铁总裁，在日本的高压下，张作霖答应“满蒙新五路”筑路权交予满铁。
② 此处有误，1931年6月内田康哉就任满铁总裁。

心不死，1928年春，日要驻中国公使芳泽谦吉两次找张作霖谈判。先以日本出3个师团阻止北伐军前进为饵，遭到张作霖的拒绝。后来又拿出中日合资修筑吉会路的合同让张作霖签订，张亦未答应，弄得不欢而散。在中国修建吉敦路的计划确定后，他们又积极要求修筑吉会路。1930年2月，在六道沟朝鲜银行内附设吉会路办事处，东北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强盗修吉会路运动。吉林人民成立保路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也发动群众反对。这样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美梦也未实现。

三、各路联运与南满铁路的关系

从上述中国筑路的情况看来，南满铁路已处于包围之中。吉林方面的货物，由吉长线、吉海线、沈海线，经过北宁铁路向关内各地输出。黑龙江的货物，则由洮昂、郑洮、郑通经打通转北宁铁路向关内各地输出。自1930年8月平齐线通车，建立了五路（北宁、打通、郑通、郑洮、洮昂）联运制度，客车每天往复一次。是年10月实行平吉通车，建立三路（北宁、沈海、吉海）联运制度，直达客车已在前一年9月行驶。中国铁路的运费都比南满铁路的便宜，而且北宁、四洮、洮昂、齐克各铁路向营口方面输送的运值，较1930年6月以前减少三成，通过税减低七成，这样原由齐克、四洮转经南满铁路到大连的五六十万吨货物，都被中国铁路所吸收，吉林省的货物也大部分被吉海、沈海取而代之。此外，中国邮政总局在同年11月通告各地邮局，在吉黑两省的小型邮件，统由中国各铁路转运。盐务署也命令沿海有关机关，将食盐通过中国铁路向吉黑输送。因此南满铁路的营业极为清淡，他们用减低运值的办法，以图和我们竞争。这年南满铁路的收益仅2 000万元，照过去降低四成，

说明南满铁路将陷于失去价值的状态。

四、葫芦岛筑港与大连的关系

和上述诸铁路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葫芦岛的筑港问题。因为只有比较完整的铁路网而没有良好的海港交通运输还是不行的。由于东北的铁路改革，地方当局也有修筑葫芦岛港口之议，而且开始施实。葫芦岛筑港问题酝酿于清朝末年，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1908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认为全东北的货物不集中于哈尔滨即集中于大连，原有之营口已呈现衰颓之势；而且营口位于辽河口，距海尚有10公里，又不能容大型轮船，势必另寻较好的港湾。当时聘英国工程师休斯勘查渤海海湾，在许多海港中选定葫芦岛作港口。1910年8月，命奉天劝业道黄开文为筑港总办，当即正式开工。后来辛亥革命发生，遂将工程停止；仅修成由连山到葫芦岛的一段铁路约30余华里，防海堤400余米，另外有车站、工人宿舍。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20年，张作霖又和北京政府商谈，拟由中央与地方各出500万元再度修筑。意见取得统一，任周肇祥为港务总办。后因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材料、经费等受到影响，又陷于停顿状态。1930年，东北交通委员会为了自己要有个港口，所需经费由北宁铁路盈余项下，月拨50万元。得到国民党政府同意，以北宁铁路局长高纪毅司其事。当时与荷兰筑港公司陶普斯签订合同，全部工费定为640万元，期限为5年半。主要工程是防波堤、码头、护岸堤，其它有灯塔、梯桩、船坞、仓库等。这个计划比原来的有些扩大，建成后将成为吞吐500万吨货物的一个大港。

葫芦岛的筑港，给大连港一个很大威胁。因为大连港在辽东半岛的南端，距离东北和内蒙腹地较远。各地货物向大连输送，

再搭汽船外运，没有葫芦岛便利，而葫芦岛接连平齐、平吉两大干线，几乎东北各地的货物，都可以此为集散地。这样，大连将会失其作用，而成为一个死港。因此，1930年，满铁除以降低运费吸引中国商人货物由南满铁路运输外，日本政府也不断召开经营满蒙新方案会议，研究对策。所谓平行线问题，吉会路修筑问题都提出来了，而且越来越紧。记得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那年的春天，日本组织了一个“对外同志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宣传的内容是满蒙问题，大意是讲述满蒙的现状，也就是日本“在满蒙的危机”，号召国民采取重大决意。其中之一是日本在满蒙的铁道“权利”受到“蹂躏”。今天看来，可以说这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是“九·一八”事变的总动员。也可看出，日本攫取东北铁路的用心良苦。

补充：

(1)关于五路问题同日人的交涉

张作霖将军同他的幕僚们不顾日人的百般阻挠，终于将打通铁路迅速的修建成功了。日本政府在万分气恼之下，不断提出抗议、交涉，要求履行“二十一条”，维护日本权益，甚至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在张学良当政时期，进迫尤甚，成为非常沉重的外交压力。1931年春，日本政府派作过驻奥地利公使的满铁理事木村来见张学良，他是专为解决五路而来的。木村态度强硬，纠缠不已。张学良特地召高纪毅来沈，作为日本人木村的对手，负责周旋折冲。张学良这时突患伤寒症，赴北京协和医院疗养，高纪毅留在沈阳同日本人木村数度折冲，木村软硬兼施，并一再向高纪毅表示说：日本少壮军人气势很盛，希望能说服张学良及早设法求得解决，否则会闹出事来的。木村始终坚持加速解决五路问题以及不利南满铁路的平行线问题，事态越弄越僵，殊感棘

手。最后高纪毅提出由中日双方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合理研究五路问题以及平行线问题，同时提出中国方面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并要求日本方面也提出委员名单来，以便将委员会正式成立起来。木村当时表示，设立委员会问题，他不能作主，需要请示日本政府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决定，同意立刻向他的政府请示，但仍要求先答应日本所提出的交涉条件、交涉时间。高纪毅借必须立刻到天津任北宁铁路局理事为名，一去数月，拖延不返，中间一度进入医院，虽确系治疗疝气，实质亦为避日人之锋。木村在沈阳等的不耐烦了，频繁催促，高纪毅乃从天津拍电报给木村，仍主张速提委员名单，双方共组委员会，研究讨论，以求解决。日人木村闹的一无结果，悻悻而去。随之"九·一八"事件爆发了，以后日人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叫嚷中国违背"二十一条"。不履行义务，大大危害日本权益，并说提出交涉，中国东北官员竟不予置理。国联李顿调查团到北京亦曾邀晤高纪毅谈过这个问题。

(2)关于葫芦岛筑港问题

葫芦岛筑港动机已久，皆以筹款无着作罢。周肇祥任葫芦岛港务督办时期，仅仅建筑了几幢楼房，后来由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无暇及此，经费、材料均无来源，以致陷于停顿。1930年东北交通委员会鉴于自己迫切需要有一个吞吐的港口，特呈请张学良作出决定，继续修筑葫芦岛港口，关于所需经费由北宁铁路在盈余项下每月拨出50万银元，直到修竣为止。这一计划决定之后，一面委派负责东北交通委员会的高纪毅主其事，并由他同荷兰筑港公司陶普斯签订筑港合同，立即兴工，一方面向南京铁道部备案。由于这个港口的兴建，同样引起日人一些干涉麻烦和无理借口。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

周大文

一

1928年6月3日早，我到中南海内福禄居密电处上班，在中南海丰泽园后上房与大元帅府秘书长任毓麟相晤，他匆忙地告诉我："大元帅今天决定回奉，你可以回家作些准备。"我听到以后，即时回家把行李收拾好，随即回到中南海待命出发。是日午后6时，我率领密电处全体人员约20余人到东单车站，并在行前发了一件密电致奉天留守吴俊升，通知他如有要电可拍到京奉沿线专车上。晚上8点多钟张作霖来到车站，随行的人除大元帅府人员和卫队外，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专车共有22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在中间，是前清慈禧太后所坐的花车。包车后边是饭车，前边是两辆兰钢车，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这两辆兰钢车中。在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我们这次随张作霖出关返奉，许多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耽心会发生什么事故。因为前些日子张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有过一场面对面的严重冲突：

5月17日晚上张作霖和梁士诒、李宣威等几位客人打麻将牌的时候，芳泽来访（是预先约定的）。梁、李等人要走，张作霖坚留他们说："我与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

可是，他由纯一斋里间屋出来会见芳泽以后，过了很长一阵时间还没谈完。在里间屋的那几位客人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大家叫李宣威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因为李懂得日语。李听了听，也没听出什么来，只听到张作霖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跟着，不待芳泽辞去，他就先离开了客厅进入里间。当时留在里间的几位客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芳泽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惹起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

事后据张作霖的承启官长赵锡福和当时在场的差官们透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芳泽来见张作霖，向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并且诱惑张作霖说，如果他能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未为所动，正色回答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能上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单来交给张作霖（可能就是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两方的觉书)。接着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回答说他尚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然用恫吓的口吻对他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3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收场了。

张作霖和芳泽既有了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大家

在临行时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惟恐在山海关出事。我在出发时私自备妥一个裹伤包，还有两盒饼干，以防万一。

二

专车由北京开出后，直驶天津，过津时靳云鹏、潘复、杨毓珣和日籍顾问町野等在津站下去（町野系张作霖派往联系阎锡山，他因与阎不熟，准备到天津找一个与阎认识的日军官同去）。专车到山海关时，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看不出紧张的样子。吴俊升已先由奉天赶到山海关站迎接。他还向我说："老弟，给我来的电报看见了，你们都辛苦了。"

专车平安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吴俊升上车同张作霖见了面，彼此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和刘哲、莫德惠、常荫槐等玩了一夜扑克牌，一直快到皇姑屯时才散。车到新民时已经天亮，我看沿线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式，10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地点附近，就没有看到哨兵警戒了。

专车过皇姑屯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齐登车后，专车即向东行驶，开往小西边门外奉天车站。数分钟后穿过南满铁路桥洞时，我正在走廊向外张望，忽见南边有两个着黄色制服的人跑上南满铁路大堤。我进入包房，尚未坐定，即闻轰然一声巨响，刹那间又是一声，比前一声更大，车才煞住，我被震昏倒在地板上。等我恢复知觉，睁眼一看，包房里车窗和窗前小桌不知去向，满地都是玻璃碎片。当时我疑惑已经受伤，可是试试四肢皆能够动，站起来又摸摸身上，也如平常，并无疼痛之处，只发现左手掌流血，可能是被碎玻璃扎破的。我取出药布药棉擦了伤口，没来得及包扎，就赶快跑出包房。在车厢

走廊上看到我们的机枪卫队，列队向南北两方扫射数秒种，经何丰林喝令停止射击，枪声停止。我下车一看，大吃一惊，张作霖那辆包车全部车厢塌下，已不成车形，后边那辆饭车也是一样，还直冒烟，开始起火。再一看南满铁路桥东面桥栏矮铁墙炸的向上竖立起来，洋灰桥墩东面上半截炸去1/3。这时大家忙于抢救受伤的人员。首先我看见吴俊升被数人架上一辆皮棚马车，向市内而去（后闻当时已死，头顶穿入一大铁钉）。又看见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向车头方面跑去。又看见莫德惠被从车上抬下来，送往小西边门外奉天市立医院。刘哲是带着伤自己步行走去的。这时张作霖已经被抬上宪兵司令齐恩铭的一辆破旧汽车，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回转帅府去了。当时我叫勤务兵郭万元到列车上把照相机取来，准备摄影。正在此时，由南方沿着南满路来了一队日本军，持枪向我列车方面跃进。我赶紧跑入市内，因而未能把这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拍成，至今思之，真是遗憾。

我入市内，因为不了解这事是否有内部原因，所以未敢径直回家，先给家中去了一个电话试探一下。接电话的是家中的厨师老褚，我问他听见响声没有，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事，他回答说，听见了响声，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回答的话说得很流畅而自然，估计大致没有什么问题，我这才回家。我一到家，就先给北京张学良打电话，没叫通。恰好奉天电报局局长张志忻来看我，我立刻求他到密电处代发一个急电给张学良报告此事。只说“大元帅受伤较重，但不要紧”。随后又给天津胡若愚和张学良的如夫人谷瑞玉打电话报告。我打完电话后，匆匆忙忙洗脸，换换衣服，吃了点东西就赶紧到帅府。我先到秘书厅见到袁秘书（袁世凯的九弟），他告诉我说，张作霖因出血过多，无法挽救，已于半小时前故去了，他告我严守秘密。

后来张作霖的卢夫人曾经把张作霖临死的情况告诉过我。据她说，那天当差官跑进来报告说：“大元帅被炸受伤，车已到大门口。”大家慌作一团，赶快跑出来迎接。汽车从花园门口开了进来，大家把张作霖从车上抬入小楼楼下屋内。他满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发现已折断一臂，随即派祉仁承启接来杜医官施行紧急治疗。这时张作霖还能说话，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将军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不久，就瞑目长逝，时间是6月4日午前9时30分。

当时军署参谋长臧式毅怕张作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顾虑日本将会乘机有所举动，而且张学良还未回来，因此决定严守秘密，封锁消息。并且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等，以瞒过日本的窥探。日本方面不断有人来慰问求见，皆被婉言谢绝。一直到张学良回到沈阳以后，始宣布张作霖于6月21日因伤逝世的消息。在哀挽录、行状内也是填的6月21日，其实都是假日期。

三

在张作霖回奉前好几日，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的铁桥附近一带，日方即不许行人通过，有日本守备队在该处放步哨。到6月3日午后，南满铁路来往火车全部停止。这事很惹人注意，因为平日南满铁路每5分钟就有一次列车开行。在张作霖决定启程回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有密电到平说，老道口（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加防备。但是张作霖对这个报告未加重视，给吴俊升和奉天省

长刘尚清去电说："齐随本帅多年，素知其本人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云云。

在上述情况发现之前，5月22日夜间在该桥左边还发生了一件日军用上刺刀的枪挑死两名所谓"南方便衣队"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奉总领事馆打电话给奉天交涉署请派员调查，该署派第一科科长关庚泽前往。后据关向我所述调查情况如下：

他来到现场，见地上倒有年约30余岁的男尸两具，身着新灰布制服，足穿黑布面鞋。尸首旁边放着一个破搪瓷面盆，里面有两个上锈的小炸弹。在死尸的旁边，还有印着"救国军总司令部公用笺"字样的一张信笺，上面写着"兹派×××等去东北三省一带工作。"据日方说："这是南方派来的两名便衣队来扰乱东北的，走到我们守备队步哨网内，向他们盘诘，他们不答，我们就照军规把他们扎死了。"但是，据关庚泽说，在调查这个案件以后的二三天，又发生一件事，揭穿了日方所布置的这个"南方便衣队"的阴谋：头几天奉天监狱忽然跑来一名身着灰布制服、黑布面鞋的人请求收容保护。据这个人说："我们数人在南满站作小工，因吸食白面，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先给我剃头洗澡，然后换上我穿着的这身新衣服和新鞋，并且给我们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们几个人叫出来，带到南满路铁桥地方，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走吧。'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知道日本小鬼准没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语未发，用枪刺向先头的几个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飞跑，拼命逃进城来，那几个人死活不知。"等语。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日本总领事馆派内田领事到交涉署

请派员会同调查。该署署长高清和仍派科长关庚泽前往。关来到现场，看见桥帮被炸改形，桥上铁板被炸得飞出去很远，洋灰桥墩东头炸去一部，火车两节已无车厢，光剩底盘。关科长按照现场情形推测，爆炸物显然是由上而下的，其破坏力之大，也非手掷炸弹可及。旋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又令兵工厂派专家前往查勘。据兵工厂两名白俄技师报称，根据爆炸破坏的情况来看，爆炸物须在500磅左右，才能有这样大的爆破力量。爆炸物是装置在南满铁路桥上的，装置这样重的爆炸物，绝非徒手所能办到，而且装置所需要的时间至少须数小时。

关庚泽会同日本内田领事到现场调查的第二天，内田又到交涉署找他，拿出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日文报告，硬说这次爆炸是南方派来的便衣队所为，要他签名盖章，联合汇报，他当即拒绝。内田威胁关说："如果你不签名盖章，日本军人将对你过不去，于你不利。"关回答说："张大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死，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任凭它吧。"内田无法，只好辞去。

在炸车案发生的当天，陶尚铭曾到关东军司令部找斋藤参谋长探问炸车案情形，斋藤也推说："这里得到的情报，此事是南方便衣队所为。"陶以后多方探访，始知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所为。1929年春，日本众议院曾为某重大案件（即指皇姑屯炸车案）向军部提出质问时，始把河本大作大佐免职。1930年河本来奉，住奉天满铁医院时，满铁本社情报课课员野田兰藏是河本密友，向他问炸车事始末，他回答说："这事就算我干的吧，否则牵连过多。"云云。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皇姑屯事件内幕

岛田俊彦*

1928年前后，关东军的战略目的，在于阻挠张作霖折返回东北，并且深怕国民革命军在完成北伐之后，继续进军关外。因此，他们一方面藉口进兵锦州，同时也藉暗杀张作霖来瓦解其武装势力。如今，南京的国民政府虽然对日本政府充满傲慢口气的外交备忘录提出严重抗议，但在附带说明中的不进兵关外一节，等于消除了他们的第二个疑虑。可是，关东军拟借口进军锦州的行动计划，却因东京的田中义一内阁始终拿不定主意，迟迟无法实现。至此，急于铲除张作霖的关东军，只有诉诸最后的唯一手段——炸死张作霖，以阻挠他率军逃回关外。

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似乎于1927年12月初左右就企图杀死张作霖。为了试验，于1928年初，他与川越守二上尉和北满的土匪头子中野策划，相隔仅一个月爆炸了东清铁路的东部和西部线的铁桥（但没有炸毁列车）。他们的主要意图是，想藉它来观察中国、苏俄和日本的反应。果然，爆炸的第二天，这些国家的报纸便竞相报导它，对于东部线的爆炸，它们报导说，是哈尔滨的张作相或者白俄罗斯人为反抗张作霖的酷政而干的；对于西部线的爆炸，有人则认为是齐齐哈尔的吴俊升干的，而没有人怀疑日人和日军。由此，河本等发现许多人反对张作霖，同时认为伪装中国人来杀死张作霖并非不可能。

---

* 作者为日本武藏大学教授。

5日中旬左右，在大石桥卖煤炭和滑石的伊藤谦三郎曾往访关东军的斋藤参谋长，并向他建议此时应以激烈的方法来打开局面。由于斋藤不大积极，因此改访河本参谋，问他对时局的看法，河本答说：“为了国家，我觉悟牺牲。”伊藤向河本坦白说出他计划拥护吴俊升以取代张作霖，并征得河本的赞同。伊藤估计张作霖将于6月14日左右回到奉天，正在设法要杀死张作霖的时候，张作霖却突然提早于6月3日回来，所以赶紧去劝告吴俊升，但吴俊升没理他，因此这个计划终于流产。根据伊藤的说法，他也曾经征得吴俊升和张景惠的谅解，但他的话是不可靠的。

于是伊藤遂向河本建议第二个计划，拟在满铁和京奉两线的交叉地点爆炸张作霖的列车。河本说，对这个计划他虽不能出钱，但如果要爆炸，需要雇用四五个中国人，因此伊藤答应为他介绍。伊藤找曾任吉林军马营长，当时为奉天附属地妓馆区出资匿名公会会员的刘戴明帮忙。刘戴明找来了他以前的部下王某，以及吸吗啡的两个游民一共3个人。这3个人各得150元，于6月3日早晨洗澡和理发，换好衣服后被带到伊藤的地方，这时王某逃亡了。

伊藤等告诉剩下的两个人，他俩的任务是要投掷炸弹以爆炸列车，并交给他们三封信。其中两封信是刘戴明所写假的南军的炸毁命令，另外一封信是使用印有当时国民政府任命的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招抚使，刻在满洲策划此事而为人们注目的凌印清名字的信纸，某人写的密书。根据以后的调查，这个信纸很可能是与日本浪人有来往的王清一偷出来的，但都不是凌印清、刘戴明和王清一的笔迹；它是作者不明的一封信。完成准备以后，这两个游民在沈阳馆被交给河本，河本用汽车把他们送到肇事地。在那里，东宫上尉下令刺死这两个人，并令

他俩抱着准备好的炸弹，其尸体被遗弃在现场，成为关东军谋略的伪装品。

箭已离弦

对张作霖来讲，他当然很不愿意撤回奉天，但眼见战况的现实和日本不二的决心，他自然明白自己不可能再留居北京。6月1日下午，张作霖邀请驻北京各国使节告辞。3日凌晨，以最后之大元帅的威容，在军乐队乐声中，搭乘专车告别了北京。

亲眼看到张作霖离开北京的竹下义晴中佐，即时电告关东军司令部说，张作霖与其第五夫人被送上7辆编成的专车，开车五六小时后，搭上20辆编成的列车，由日人顾问町野武马和仪我诚也少佐陪同，往奉天出发。没多久山海关的石野芳男上尉报告说，第五夫人的列车已经通过了山海关。竹下和石野，都是为负责这个谍报任务而特别被派遣到北京和山海关的。另外，天津军司令部也通知说，张作霖专车过了天津，和町野顾问已在天津下车。毫不知情的张作霖，边念放弃东北的不甘，而迤往爆炸地点走去。

满洲某重大事件的责任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报纸也报导说“奉天的中日形势险恶”，以暗示这个事件是日本的阴谋。尔后，关东军的强辩亦日趋露出其马脚。

譬如当天中国方面对于警备分担的主张是，由中国方面向三谷清宪兵分队长提出要求，希望中国宪兵有时候能到铁桥上联络，对此，三谷虽然也曾经答应，但中国宪兵于3日晚上想这样实行时，却突然以军司令官的命令遭受到拒绝。中国方面又主张说，正因为炸药数量很多，所以更能证明决非中国的便衣

队所能做到。

伪装用的中国游民当中，王某之逃掉，对关东军是件很头痛的事。因为他很可能去充当中国方面的见证人。不特此，游民们去洗澡的澡堂老板，也证实这两个人的确是前一天晚上到他澡堂去洗澡的人。至于死人所带的炸弹，根据正在奉天的在野党民政党议员的调查结果，是奉天的三谷清宪兵分队长在当地的旧道具店买的。

迨至9月，陆军中央特派峰幸松宪兵司令官，前往调查关东军各部队所保管炸药的出纳状况。用于炸死张作霖的炸药，是川越上尉在旅顺工科学堂讲授火药课程时，以实习的名义由关东军兵器部拿出来的，惟由于某种原因停止实习，因此关东军自不欢迎调查。峰被关东军委婉地拒绝调查，而很失望地回到东京，但这使陆军中央对关东军没有好感却也是事实。

奉天林总领事，对于中国游民被刺杀的时日，起初奉天特务机关和领事馆警察说是3日下午11时左右，后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为4日上午3时半；警备责任者东宫上尉，在展望台听到爆炸声音，没有即时到肇事地等等，指出其矛盾。

如此一来，关东军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及至1928年9月22日和10月23日，田中首相下令于外务省召开外务、陆军两省和关东厅的负责人会议，追究这个事件的真相。

与此同时，第三国家对这个事件的非难日趋高涨，日本国会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的题目猛追内阁的责任，天皇因之不信任田中，从而导致田中内阁的倒台。本为张作霖支持者的田中，竟因反其意志而行的炸死张作霖而垮台，真是历史的讽刺。

事件后，于1929年5月14日，河本大作受到退伍处分。即河本一个人负了炸死张作霖的直接责任。但如果从它是关东军

全体所主张，解除奉天军武装和张作霖下野的方案，且得到村冈司令官和斋藤参谋长以下许多幕僚默认这个结论来看的话，炸死张作霖可以说是整个关东军所搞的。反之，以田中首相为首的阁员们，甚至于里头可能有赞成关东军的分子参谋本部，他们虽然都虎视眈眈着侵略中国的机会，但却都不能苟同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行为。

（摘自《我杀死了张作霖》一书）

我杀死了张作霖

河本大作

编者按：河本大作系侵华急先锋，文中鼓吹颠倒黑白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强盗逻辑。但也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及阴谋，可供读者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

一

1926年3月，我从小仓联队中佐队附，接任关东军黑田高级参谋的工作。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是白川义则上将，参谋长系河田明治少将，后为中国通的斋藤少将。

可是，来到好久没来的东北以后，我却不禁大为惊愕。张作霖神气得很，同时因为二十一条问题，整个东北充满着排日的气氛。

对于满铁，他们计划许多铁路，与之竞争，意图压迫。在中日、俄日战争用血换来的满洲，竟面临奉天军阀任意蹂躏。

翌年，即1927年7月，田中义一以总理大臣兼任外务大臣

在朝，主张所谓“东方会议”；外务政务次官是已故森恪。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已由白川上将变成武藤信义中将，武藤是于1926年7月上任的。他是个俄国通，曾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因此对中国也很了解。所谓中国通也有几种，有的只是住在中国，跟中国人来往，买些古董而沾沾自喜，但武藤将军不是这种中国通。

所以，他就任关东军司令以后，对于幕僚们的献策，都能懂得，上下都能够毫无保留地对经营大陆的根本对策交换意见。

随即召开东方会议。武藤司令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我随从他到了东京。

在这个会议上，当然讨论了对满洲的对策，我力主对于奉天军阀所采取包围满铁线的态势，已非外交抗议等所能奏效；这时武藤将军强调用武力来解决。田中首相也谅解了这个主张，于是在大体上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

因此，我建议利用如下的情势。此时崛起华南的蒋介石已经开始北伐(原文说蒋公与国父一起北伐，当然这是错误的——译者)，奉天派的前锋已 进至江浙方面的上海，以张学良、杨宇霆为主将，与之抗衡。

蒋介石以军较训练的精兵，与奉天老军阀的士卒，其实力、纪律自然有天渊之别。尤其是江浙一向是南方派的地盘。张作霖虽然乘势插足上海，但遇到蒋介石的北伐军，奉天军一定非逃回关外不可。

跟螃蟹钻进洞里一样，只要钻进去，便很不容易进攻，张作霖败退回到关外，也就安全。在这里等待，等到天气转好，他便要东山再起。

到北京自称大元帅的张作霖，拥有30万大军，现在关内。这30万军队，如果打败仗逃回关外，很可能乱来。而如果帮助他

们，这些人又没有终生感恩的节义；郭松龄事件已经考验过这班人马。

其次，南北兵戈相见，使山东和华东之地蒙受战祸，无论对具有许多权益的日本和列国，都不能等闲视之。因此必须阻止北伐于华北。

与此同时，败退的30万张作霖部队，应该在山海关解除其武装后，才准许其入关；并乘张作霖手无一兵时，一下子与其解决逐渐失去之上千件的日本权益问题。

二

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起初蒋介石接受了要避免山东、华北卷入战祸的提案，可是醉于胜利的他，竟违约进城，所以于1928年发生济南事件，由之日本遂出兵。在另一方面，如所意料，奉天军打了败仗，成群地往山海关逃。（编按：此段史实错误。）

为了维持治安，关东军即时从朝鲜编组一个混成旅团，集结奉天待命，惟到锦州和山海关，系属于满铁线附属地以外的出兵，非有奉敕命令，不得出动。可是奉敕命令一直没下来，败兵却接踵而至。

当时的首相，又是东方会议的主持者田中，对于东方会议的决议，在山海关应该采取的方针，不知为何却犹豫不前。

这是由于出渊驻美大使的报告，顾虑美国的舆论，而踌躇实行既定方针的结果。

那时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是松井石根中将，加以田中首相的亲信佐藤安之助少将等的影响，田中的想法更由之摇摆不定。

这时，关东军司令官已由武藤将军换为村冈将军，在人格、见识上村冈将军并不逊于武藤将军，并且在经营大陆的意见上，

两人更是完全一致。因此，关东军的态度也就毫无所动。

但最重要的中央，却是这个样子，真是糟糕。不久，在奉天城内，吴俊升由黑龙江省率领5万军队，出来守着。加以从山海关天天要回来一万、五千不等的败兵。所以追至5月下旬，入关的败兵已经达到三四万人。败兵更经由京奉线和古北口而来。

如此这般，一旦有事，关东军势必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奉天还好，弥漫整个东北的排日，一发生事情，势将有如燎原之火；排日军，很可能统统揭竿而起。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今日人们之以为只要由张作霖统治满洲，就可以维持其治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张作霖毕竟是个军阀之流，眼中既没有国家，更没有群众的福利。至于其他诸将，只是头子、喽罗的关系所结合的私党。

正因为他们的结合是这样，所以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便会四分五裂，而在还没有出现第二个张作霖以前，他们是不知所措的。是即张作霖的存在，跟匪贼的头子并没有什么两样。

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村冈将军也终于得出这个结论。但要杀张作霖，并不必动用在满的日军兵力。用谋略应该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这时张作霖还在华北，慢吞吞地在准备逃离。于是有人认为，借华北日军之手，便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他。因而决定派遣竹下（义晴）参谋为密使，前往华北。

得知内情的我，遂对竹下参谋说："不要多此一举，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华北方面有没有敢干这种事的人，实在心存疑虑。万一的时候，不要给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而由一个人去负一切责任，否则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会乘这个求之不得的机

会来胡搞。所以由我来干好了。因此你到华北以后，直往北京，仔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确知他何月何日坐火车逃到关外，随时告诉我。”当时，北京大使馆副武官是建川（美次）少将。

三

没多久，竹下参谋便来了密电。他说，张作霖已经决定要逃往关外，回到奉天，并告诉我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我便派出侦察者到山海关、锦州和新民府等京奉线的要地，令他们确确实实地监视各通过地点，并即时告诉我，火车是否已经通过。

至于在奉天，哪个地点最适当，经过一再研究的结果，认为大河上的铁桥是最好的地点。

于是遂令某工兵中队长，详详细细地侦察其附近的情况，结果发现奉天军的警备严得不得了。而且，最低限度，得在那里等上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样警备森严的状况之下，这是办不到的。尤其是据说张作霖惯用替身者，所以要一次就把他干掉，实在很不容易，需要非常充分的准备。

所以，必须另外选择日军监视比较自由的地点。经过多方研究以后，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皇姑屯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在这里满铁线走其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

下来就是要用什么方法的问题。

袭击火车？还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只有这两种方法。如果用第一个方法，马上知道是日军干的。如果使用第二个方法，或能不留痕迹地达成目的。

因而我们选择了第二个方法。但为预防爆炸失败，我们准备了第二套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的计划。这时，将乘其混

乱，使刺刀队冲上去杀。我们的一切准备都完成了。

根据第一手情报，6月1日不会来，2日、3日也没有动静。迨至4号，来了张作霖确坐上火车的情报。

通过交叉地点将是早晨6点钟左右，我们遂装上第一道和第二道爆炸装置，以便防止爆炸的失败。但要在当场炸死张作霖，则需要很多的炸药，如果炸药量少，很可能达不到目的；如果多，效果当然较大，但会闹得很大，真是头痛。

与此同时，我们又担心在这个时间满铁线的火车开过来。当然最好是事先告诉满铁，但这是属于绝对的机密，所以又不便这样做。因此，为了发生万一的时候，遂装设发电信号，以防止满铁线的危害。

毫不知情的张作霖的专车，终于开到交叉地点来了。在轰隆的炸声同时，黑烟飞扬200米上空。我以为张作霖的骨头也飞上天空了，其黑烟和炸声的厉害，使我惊奇不已。

由之，第二道的出轨计划和刺刀队现在都用不着了。惟万一如果对方知道这个爆炸是日军所计划的，并派兵来的话，我们决定不使用日军，而将由荒木五郎指挥其所组之奉天军中的"模范队"来对付；在另一方面，安定城内，有关东军司令部的主力来警备。

如果奉天军动用兵力的话，张景惠将内应日军，另起独立之奉天军，发动如日后的"九·一八"事变。但因奉天派有聪明的臧式毅，阻止了不能自制的奉天军的行动，使奉天军与日军的冲突防范于未然。

为了镇静人心，没发丧，而只发表张作霖负重伤，没有生命危险，因此奉天城内非常安静。这时候，排日行为停止了一段时间。

四

张作霖被炸死以后，张学良和杨宇霆这班人猜不透在奉天之日军的意向，因而留在锦州方面，不回奉天，在那里观望，所以奉天遂以袁金铠为首长，组织东三省治安维持会，做为临时政权。

而在日本方面，对于今后东三省政权的首脑应该推举谁的问题，有各种意见，奉天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少将一派拥护杨宇霆，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一派则支持张学良，两派互相暗斗。

但秦和松井认为令奉天政局呈现真空状态实在不适宜，因此他俩遂向张学良表示没有他意并怂恿张、杨回奉天，所以张学良才放心，化装成工人回到奉天来。

正在此时，前驻华公使林权助来奉天，与心神还不宁静的张学良会面。

林权助对张学良讲述了日本外史中"关原战役"后，丰臣与德川的关系的一段，暗地里把张学良当做丰臣秀赖，比拟杨宇霆为德川家康，以鼓励张学良。

比照大阪城沦陷后丰臣秀赖的命运，张学良对说不定会变成德川家康的杨宇霆，经常疑神疑鬼。这时，杨宇霆举办了祝寿宴，张学良也列席了这个盛宴，更有从全国各省来的许多要人频送贵重礼物，这使张学良觉得天下的诸侯在丰臣秀吉去世后，已经倾向德川家康了。

至此，张学良对杨宇霆的猜疑愈来愈深，从而怀有要将其杀害之意。于是张作霖被炸死翌年4月间，张学良便把杨宇霆请来奉天督军公署，并令事先安排好卫兵长等人，用手枪当场将杨宇霆打死。

得悉这个消息的秦少将，和身居奉天军的黄慕（荒木五郎），遂抓住这个机会，拥护张学良为东三省的新主人，策划张学良走向亲日。可是，当时在张学良身边的年轻亲信们，却都醉心于欧美，崇奉自由主义，因此张学良的恐日，遂逐渐变成排日，而终于成为侮日。

具体表现，就是满铁线的包围铁路、万宝山事件，和冯庸大学的排日教育。排日和抗日，甚至比张作霖时代更为积极，而且日趋激烈，秦少将等人所意图的张学良怀柔方策，由之完全归于画饼。

如此一来，枭雄张作霖死亡后变成张学良时代，但满洲的对日关系不但没有好转，反倒背道而驰，所以我觉悟：除非再用武力打倒张学良政权，满洲问题将永远不能解决。

反此，日本政界欠缺要解决满蒙问题的诚意，对于张作霖被炸死事件不仅没有妥善处理，并且更有人把它当做倒阁的工具，譬如中野正刚、伊泽修二等就是这类人。

当时的陆相是白川义则上将，他很憨直，对事件不会答辩，因此更予中野、伊泽等以可乘机会，而终于导致田中内阁的垮台。

由于参加这个事件，我受到停职处分，村冈军司令官、斋藤参谋长和水町竹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也分别遭受行政处分。

政争终于误国策。政党政治之弊端，至此达到极点，为日本宪政史上留下最好的例子。

因此我于1929年5月，被谪降为第九师团司令部附，同年8月，因受到停职处分而脱离军职。尔后，依以前伏见联队时代的关系，暂居京都伏见深草愿成，表示禁闭之意。

五

在这禁闭生活之中，我充分把握默思的时间。社会滔滔走向自由主义，他们大肆抨击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有的外交官，甚至主张放弃满洲和蒙古。

年年在增加的日本人口，应该怎么办？粮食的对策呢？现在应该重新检讨由这些问题而产生的经济政策才对。其当然的解决方策，实舍对大陆坚定的方策莫属。而我所采取的武力方法，是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攻击？如果应该反省，我将反省。

我为了自责和自省，以及虚怀若谷地把握时代，我曾努力于研究。我又请教过京都帝大的许多权威学者，而且连日前往京都帝大的图书馆，广览有关政治经济的群书。

结果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将来，实惟赖满蒙问题的解决。我更坚信：日本应该以新的构想，来解决满洲的问题。

我谪居伏见一年以后，又恢复军职，并任第十六师团司令部附，但翌日，则被编入预备役。由于禁闭生活已告一个段落，所以遂移住东京。

（摘自《我杀死了张作霖》一书）

“南方革命军便衣队”之谜

户川猪佐武*

为了暗杀张作霖，河本做了很巧妙的导演。他嘱名叫安达

* 作者为日本政论家。

隆成的大陆浪人去找中国人。安达知道流氓刘戴明以前曾被张作霖免去部队中的职位怀恨在心，因此以两万元为报酬，要他去找三个游民（都是吗啡惯犯）。刘戴明各先给50元，并指示他们说："6月3日，在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换好衣服以后，深夜到满铁线陆桥附近的日军步哨去听候命令。"但其中一个人，却违反约定逃跑了。

无需说，这两个人被装扮成革命军的便衣队，在满铁堤上晃来晃去，而终于被日本军所刺杀。

可是，偶然来看现场的日人澡堂老板却向关东厅的警察机关报告说："这两个中国人，昨天晚上曾经在我们的澡堂洗过澡。"

听到这个消息的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便对警察当局大骂说："把这种事报告到中央，将予军部以莫须有的疑惑。"但秦的这个举动，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军部的怀疑。

在另一方面，河本却拿不出两万元给刘戴明。且中国官警已注意到苦于金钱的刘戴明了。因此，安达遂求救于其亲友工藤铁三郎，工藤是小川铁路大臣派到废帝溥仪处的浪人。得此消息的工藤，慌忙地赶回东京，向小川报告其详情。这是为什么政府很早就知道事件之真相的原因。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暴力行为并非河本个人的行动，而是整个陆军的罪行这个事实。这是伊藤正德的《军阀兴亡史》和绿川史郎的《日本军阀暗斗史》所同样论到的。

因为，河本是本庄繁、松井石根、秦真次、建川美次等的盟弟，是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的盟兄。这些人都是对华北政策的积极的武力派。河本更是跟小矶国昭、桥本欣五郎、冈村、土肥原等，出入于大川周明所主持之大学寮的分子。这些人皆属于与日后的十月事件和三月事件等军事政

变具有不可分割之关系的右翼人物。

所以，河本的思想和行动，可以说是当时陆军的一面镜子。河本从憎恨张作霖，非难田中的政策，到暗杀张作霖，一意准备侵略大陆，无非是当日的陆军希望这样做。

而事实上，发生这个事件以后，陆军的中坚军官竟庆贺河本的暴力行为为壮举。

迨至明白暗杀的凶手为河本，必须商量善后策的时候，田中遂对宇垣一成叹息说："真是混蛋！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摘自《我杀死了张作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女匪头目菊子密押刘戴明

郁筑七郎*

日本浪人投身匪群的事例，屡见不鲜，已如前所述。令人注目的是日本女人在枪林弹雨中，扬鞭策马，成为叱咤风云的匪徒女头目，驰骋于满洲原野的情景。其中如广为流传的西伯利亚阿雪、西伯利亚阿菊和满洲阿菊等即属这些传奇性的代表人物。

日俄战争后，到满洲去冒险的人与日俱增，不仅男性而且女性也逐渐增多，在旅顺、奉天一带，远胜男子一筹，做生意的女人也并不少见。

在这些做生意的女人中，有不少是胡匪女头目，有的是匪首的老婆，其当头目的丈夫死后，则改嫁为其他头目的妻、妾

* 作者为日本著名作家，擅长撰写历史题材、人物传记，对史实述评较为客观。但由于受某些局限，亦有些错误评价和提法。

或与副头目结婚。其中多数继承已故头目的地位，继续统帅部下而成为女头目，其本人均具有相当胆识和才能，也还有以其属下的副头目或干部为“男妾”,俨然以老大姐自居的女当家的。

日俄战争时期,冲祯介以特别任务班第一批队员深入敌后，在哈尔滨郊外被俄军枪杀。1901 年10 月，冲祯介以北京东支学社教师名义来华，翌年6 月，在新设立的文明学堂执教。日俄风云告紧，应日本军部要求乃参加了特别任务班，这位冲祯介的恋人便是被称为“满洲阿菊”的河村菊子。

菊子是长崎县生人，父母早亡。15 岁时，因为其姨母同山东人洪安得结婚，在北京做小生意关系来到中国。第三年春季某日，菊子在景山山坡上遭到两名暴徒欺侮，被路过的冲祯介搭救，由此两人成为情侣。冲祯介是讲道馆二段的高手，他同两名暴徒交锋，不出几个回合即将对方打得头破血流，救出了菊子。两人热恋不出半年，冲祯介即受日军密令前往朴园后转白亚寺。日俄战争将两人拆散，战争结束后，冲和菊子也未能再会。1906 年春，菊子告别怀恋的北京，奔赴其恋人消逝之地哈尔滨。

阿菊在其恋人冲的灵碑前献花祈祷，同时发誓投身匪群。

为寻找匪团，重返奉天，往访姨父的旧知在奉天开杂货铺的高亚昌。对洪掌柜外甥女来访感到高兴又意外的高亚昌问道：“你是为冲先生扫墓而来的，还是要托我办事来的呀?”

“我是想当胡匪而来的，不打算再回北京姨父家去，不知您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最出名的匪首?”

高听过后沉默不语，耸耸肩左右摇头，不打算告诉她什么线索。

说到匪团，即有农民自卫组织发展成“团练”的匪团组织，也有因贫穷走投无路而成为“红胡子”的匪群。并非如菊子所

想象的那样，都是杀富济贫的仁侠正义集团。一心一意想投身匪团的菊子，告别高家后，赶往八道沟。由于不通火车，菊子只好雇一个婢女陪她装扮成中国妇女随同十几个商人上路，有两名向导和几名持枪的卫队随行，以防被土匪抢劫。一行人有骑马的、坐车的，共有马30匹左右，在高粱大豆地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平原上，沿着黄土大道，整整走了3天，经过辽中、大虎山，在刚要到达黑山县城处，遇到了菊子期待已久的马匪。菊子在去北镇回来后，是从黑山将要分头向北、向西岔道的地方，恰好遇到了马匪的。

从远方的丘陵出现断断续续的小黑影，烟尘飞扬飞奔而来的马队显然无疑就是马匪了。

队商一行人中的吴队长毫未惊慌，原来他手里有从匪首崔景山头目买得的“保票”小旗。尽管如此，马队依然喊声震天地直冲了过来。

“啊，押过来了，大家准备好武器！”

吴队长眼看保票小旗不管用，便这样发出命令。卫队杨大新高喊：“到那边的关帝庙里隐藏起来，快！快！”

菊子和女婢两人骑马急忙跑进距200米左右处的关帝庙。有几名商人和带小孩的年轻妇女，一共9个人逃进关帝庙避难，其余的人徒步在草地里奔跑时中弹倒下去了。

夜幕降临，双方射击的枪声，战马嘶叫声，在山丘草原里回荡。

敌方二十多人的马队，在马上一边射击一边高喊：“押！押！”

败退下来的商队警卫队高喊：“把门关起来。赶快！”

杨大新站在房檐头这样命令。匪团在关帝庙四周奔跑进行威胁性射击。但杨大新在高卷的房檐掩护下，不断向墙外射击，接连打死四五名敌人，敌人只抢走货物，落荒而逃。

菊子深为杨大新英姿飒爽的魅力所倾倒，对从房檐跳下来的杨大新赞不绝口，不胜感激之至。把本来想成为俘虏、趁机加入匪群的打算一时也忘掉了。

在大家把杨大新围起来、七嘴八舌地表示感谢时，杨大新注意到菊子似乎满怀心腹事的表情。

“你有什么犯愁的事怎么的？”

“是呀，我是名叫小金凤的女头目。本来率领部下准备攻击城，结果给您这位英雄打得落花流水，不知道如何才能恢复过元气哪。”

菊子地道的北京口音，使身旁的商人感到惊讶。这时杨大新微笑着带有嘲弄的口气说：

“噢，女头目？别开玩笑啦。说实在的，本人就是热河大平房王宗云头目之弟杨大新。这次是为护卫商队而来的。你说是女头目，不知你是哪个绺子的？”

“当然不用说是北镇的啦！”

“啊，北镇是徐亚生头目的地盘，不就在眼皮底下吗，他那里哪有你这位女头目呀？”

当夜在关帝庙里，由于菊子积极主动，两人成为夫妻。两年以后，在开鲁与官军激战中，王宗云战死之后，杨大新继为头目。再过两年之后，他成为热河一带屈指可数的大揽把。夫人菊子报号小金凤，始终与杨大新并肩战斗，手使一把毛瑟枪。杨大新战死后，她继续率领部下，盘踞在热河一带。1913 年春，又重新回到哈尔滨，洗手脱离匪团，专心经营饭馆和妓楼。

1928 年夏，满洲阿菊已是四十几岁年纪，有一位大陆浪人工藤铁三郎（后任满洲国皇帝侍卫官长）和大连新闻社的馆龙一郎来到她哈尔滨石头道街的家里访问。在充满故国情调的日本式房间里，他乡遇故知，分外感到亲切。工藤委托给她一项

非比寻常的重要任务，这便是协助处理6月4日发生的炸死张作霖事件的善后工作。

张作霖将军是被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的爆破阴谋蒙难遇害的。经大石桥的日侨伊藤谦三郎和奉天宪兵队特务安达隆成协助，制造假象，嫁祸于人，说凶手是反对张作霖的中国人。伊藤接受河本大佐的委托，令安达找来3个中国人，安达便通过与过去在特务机关使用过的反对张作霖的刘戴明商讨，以1名1万元的代价雇3名中国人来。刘某人曾任吉林督军孟恩远所部营长。结果，两个大烟鬼浮浪[①]应募，为伪造该两人是爆炸铁路凶手，事先将其加以杀害，然后将尸体运往遗弃有小型炸弹和秘密文书现场。找来两名伪装犯人，伪造文书的人就是刘戴明，可以说他是了解炸死张作霖秘密的唯一中国人。

刘戴明在奉天皇姑屯事件后，得了神经衰弱症，顺口胡言乱语，说什么他自己给找来的两个大烟鬼被当凶手给杀害，他们要来杀死我，我错啦，饶了我吧……。这使安达隆成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担心对张作霖遇难持怀疑态度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派遣的情报人员，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现刘戴明。于是工藤和安达决定把刘送到大连的日本医院软禁起来。为护送这个“重病号”，乃决定将这项重要任务委托给菊子和一郎两人来完成。

“还是加上一名妇女陪送更为安全，这类重大任务恐怕除阿菊您适合以外别无他人了……”

工藤低头求援，满洲阿菊便表示接受说：“愿为国家效劳，责无旁贷。”

河村菊子和馆龙一郎带领被关东军软禁的刘戴明登上了开

---

① 浮浪，指无业游民，流浪汉。

往大连的特快一等车厢。装扮成中国富商夫人的菊子等3人一行，并未受到车中旅客以及混在其中的外国情报人员所注意。了解3人真实身份的只有从奉天跟踪护送而来的几名便衣宪兵。到大连被引渡给日本宪兵的刘戴明，以后下落不明。安达隆成则在满洲事变开始时，同凌印清头目共同组织亲日义勇军活动中被杀。满洲阿菊——河村菊子，在太平洋战争中，于哈尔滨石头道街家里悄然病逝，当时她已是年过60的老太婆了。

（摘自《阴谋与梦想》，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二

蓄意发动事变
策划侵占东北

侵吞东北的种种阴谋

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的一段阴谋

王家桢

一

1928年6月日本军阀用野蛮手段炸死张作霖，原来是想造成混乱局势，混水摸鱼，乘机进占东北，但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它就改变策略，用拉拢的手段来鼓动张学良，阴谋诱使东北集团维持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以实现其分化中国、宰割中国的阴谋。在张作霖被炸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的时候，日本政府特派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沈阳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日本派这样一个人物来作吊唁专使，实际上就是以实现这个阴谋为目的的。

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林久治郎把这个消息通知我们后，我即和他商量招待林权助的日程。当时张学良不愿与日本人多有应酬，所以在我们安排的招待日程中，张学良出席宴会的次数

很少。其中一次是林久治郎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中国方面出席的只张学良和我，日本方面出席的也不过七八个人。宴后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的为林权助、林久治郎、河野领事，还有另一个日本领事（我记不清是什么名字了），由我一个人任翻译。

林权助在这次会谈中正式提出了阻挠东北易帜的问题。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大意是说："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从这开头，双方就各持自己的论点争论起来。争论到了顶点的时候，林久治郎竟然指手划脚，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我也照着林久治郎的语气，大声翻译给张学良说："他以命令式的口吻说，不准你挂旗。"张学良听了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林权助又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

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了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的地位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林权助接着又说：“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来往，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有来往。”张学良这时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这次会谈连同吃饭时间在内，共历4个多小时，夜10时半始散，临散时新闻记者曾摄影数幅（我还保存一份）。后来外边有张学良答应日本在3个月内不挂旗的说法，显系以讹传讹的谣言。

二

张作霖出殡后不久，林久治郎总领事要回国述职，张学良在大帅府设便宴为他饯行。饭后张和林久治郎举行会谈，由陶尚铭任翻译，我在场作陪。林久治郎提出一个新问题，他说：“我们日满关系这样的密切，可是现在还有些人为的障碍阻挠我们的亲善发展，那就是：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权。日本政府为率先表示对张将军的好意起见，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倘若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的话。”张学良听了这些话，没加思索，就连声答应说：“好，好！我们可以这样办。”我急忙从旁插嘴说：“就是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吗？那么租界和附属地、商埠地的呢？”当时林总领事也没答复我的话，张学良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和林总领事说的是日本话。

林总领事走后已经很晚了，我就跟着张学 良到他的卧室，

和他说："你和林总领事刚才说的话，找的麻烦可不小。他想拿一根针来换你的一头牛，你怎么能随便答应他呢？他回国向日本内阁一报告，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张学良说："取消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呀！"我告诉他说："林总领事所说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是在东北内地根本不存在的领事裁判权。因为日本人在东北内地或非商埠地的商租权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绝对租不到房子，所以他们就不能、同时条约也不允许他们在内地居住。没有日本人居住的内地，哪来的领事裁判权呢？倘若你允许他们有内地居住权，他们就可以买地押地，依仗日本政府的势力，那还得了！他若是将租界、附属地、商埠地的领事裁判权取消的话，那自然是可以答应的。"张学良说："那怎么办呢？我答应他的话也说出来了。"我建议请他写封亲笔信，就说今晚谈话很重要，唯恐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摘要告诉他，以免误会。张学良同意这个意见，并叫我立即起草底稿，我就在他的卧室外屋将稿拟好。这时已近午夜，我敲门请他出来亲笔书写，叩门很久，没有应声。我正疑惑间，张夫人于凤至出来说："他疲倦极了，有事明天再说吧。"我说："不行，明早林总领事就走了，今晚非将这信写好不可。"张学良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还是勉强将信写好交给我。我拿信回家，已过午夜。次早我即将信交与林久治郎，并陪他上车站送行。林久治郎和我说："翻译并没有错误，因为我们河野领事听得很清楚。不过这事也至关重要，张学良将军既然有亲笔信，我们只有以信为凭了。"并笑着对我说："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我们对阁下的意见非特别重视不可。"

当天下午，张学良即用火急电话召见我，见面头一句话就问我将他的亲笔信拿回来了没有。我将林总领事的谈话详情报告给他，他还是叫我将他的亲笔信要回。我问他是对信的内容

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是返悔不该写这封信，他说，全不是，就是不愿意将亲笔信留给日本人。我只得打电报到朝鲜汉城车站投交林总领事，请他将信阅毕掷还。林久治郎当即回电说，俟到东京，信用毕后即邮还。我将林的电报拿给张学良看，他一笑就了事了。那个时候，我们全是年青人，因为我逼他午夜写信，他就给我出出难题，叫我出点冷汗，追忆往事，感慨系之。从此以后，他每逢会见重要的外国人，会后常常问我：“我今天说的话，有什么错的地方没有？”我也每次都是忠心耿耿地竭诚以对。

三

在东北尚未正式挂起青天白日旗前，日本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大典，各国都派遣专使前往祝贺，东北政权当然不能例外，所以张学良就派莫德惠和我为正副专使前往祝贺。我们带了贵重礼品，偕同秘书蔡公智、科长安祥逕赴东京，在东京与各方酬应了一个礼拜，然后到京都正式参加典礼，因为典礼是在京都举行的。原来明治迁都东京时，曾亲自允许京都作为陪都，并且规定国家大典必须在京都举行。我们一行在东京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隆重招待，特别是满铁对我们的招待更是无微不至。那时我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和我们虽然有来往，可是日本人对他却甚冷淡，例如大臣们请我们吃饭，从不请汪公使参加。

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日本外务省就和我们约定说，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希望在京都和我们举行一次恳谈。我们到了京都第二天，晚上6时田中义一邀莫德惠和我在他的官邸便餐会谈。会谈只有我们3人，因为莫德惠不懂日本话，并且他要我不必当场翻译，事后告知他即可，所以实际上就是我和田中义一两个人的对谈。我们的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具体的铁路交

涉，谈到日本和东北的政治关系，以及国际局势、张学良将军的地位等等，谈了4个多钟头。详细内容我当然不能全部记忆，但是关于谈话的重点，因为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事隔30余年，还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例如：关于东北的地位与张学良将军的前途问题，田中说了很长一段话企图说服我。他说："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张将军掌握政权以来，也很得到你们这帮人的辅助，政绩日见兴盛，真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了。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将军的雄图壮志怎么样？张将军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政府的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当然赞成张将军能够抒发宏伟大志，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且我可负全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他的这种事业。当然啦，张将军也许会说，我受日本政府支持的事业，我们的老百姓是不会赞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转告张将军请他放心，我们绝不叫他为难，我们绝不向他要求什么新的权利，甚至我们还可将旧的权益拿出一部分来让我们共同享有，作为亲善的表示。"我插一句话问他所指的这些权益是什么，他说："比如说，在南满铁路公司里，我们可以设几个中国理事，"同时他着重说："当然，这是随便举的例子。"接着他又说："王先生，你呢？你是一个年青有识、大有前途的政治家，你不愿意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当一个开国元勋吗？难道你就心安理得地永远做一个地方官的助手吗？"他还说了好些和解的、和两国应该如何亲善的话，但是同时他也作了不少威胁性质的暗示，例如他说："我们大和民族是优秀而有大志的民族，为了日满伟大前途，我衷心希望张学良将军能

当机立断，深谋远虑，为自己前途着想。至于我们日本，不管事态怎样演变，我们的政策是钢铁般的坚定不移的！”

我对他也谈了差不多同等数量和同等分量的话。我当时的心情，是爱国思想占了主宰，对他的诱惑丝毫没有动心，对他的威胁也没感到可怕。只是他所表示的日本愿与东北谋求亲善的话，倘能得到实现，倒是我心向往之的事，因为那样我们才有机会能将自己家里的事弄好。所以我向他说：“感谢阁下的开诚见教，我必将阁下的全部谈话无错误地告知张学良将军。我现在将我个人的意见也毫无隐讳地向阁下陈述，请指教。”我说：“国家与国家交朋友，也和个人与个人交朋友一样，真正的朋友只有互相关怀彼此的利益，才能成为良友，尽管两个朋友各自的贤愚不同，地位不同。否则不管怎样叫嚷亲善，也是事与愿违，不能以心相见的。”接着我将日本人近年来在东北的横行霸道情况，举出许多实例，内中也有影射他们谋杀张作霖的事。痛说一番后又说：“我相信日本有识之士和制定国策的首脑人物，当然不会赞成这种举动的。至于我们这一方面，是双手高举，赞成阁下所号召的真诚亲善关系，因为我们是弱者，在一切方面都比日本落后。只要日本真诚和我们要好，我们哪有不欢迎的道理呢！不过，中国人的爱国思想也和日本人一样，是根深蒂固的，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谁若忽视了这一点，谁就一定碰钉子。”为了扭转日本侵略中国的矛头，接着我对田中义一进行了反对白色人种的煽动。我说：“我们中日两国都是人口稠密、经济不算富裕、身受白种人欺侮的国家，日本虽然比我们强，但是美国移民法案对待日本人还不是和对待中国人一样吗？像澳洲整个一洲，地广人稀，可是被白种人霸占着，不准有色人种插足。南洋那样物产丰富的地方，完全由白种人统治。你们日本人是有色人种的独起之秀，倘若你们振臂高呼，领

导我们向白种人算帐，重新分配世界，谁还能不心悦诚服，唯你们的马首是瞻呢？但是不幸的是，你们岛国的陆军将目光完全注视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国土上（日本陆军大学学生学中国话的占50%以上，学俄语的次之，其余学英、法等国语言的极少，田中本人是学俄语的），所以白人睹此，自然暗中拍手，作会心之笑了。”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田中好像是有点动容。我们谈到10时半左右，双方的话还没有谈透，忽然田中叫人拿葡萄酒来，他大喝一杯，不多时，就打个招呼离席而去。随即由佐藤少将出来陪我们谈了片刻，并问田中离席前的情况。我告诉他说，田中喝了一杯葡萄酒，就匆匆离席。于是佐藤再入内室出来告知我们说："总理大臣感觉不适，总理大臣说，日内再邀谈。”我们也就告辞了。次日果然报载田中总理大臣患窄心病，暂时不能亲理政务。当日日本外务省通知我们说，总理大臣暂时取消一切约会，我们从此再也没见过田中这个人了。

我们参加的日本天皇即位典礼，把我们带到我国唐朝时代的气氛中去了。天皇穿的礼服是中国唐朝的服式，奏的乐是唐乐，跳的舞是唐人舞。国宴也是席地而坐，每人面前用一块白缎子铺地，摆一张小桌子，一切食具全是特制的，带有皇室菊纹徽，餐毕各人可以用白缎子将小桌及一切餐具包好带走。这一切带有皇室菊纹徽的东西，在日本人眼中全是圣物。

我们回到东京，莫德惠先行回国，我又在日本滞留一个时期。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几次当时觉得很得意、现在想来令人出冷汗的集会：一次是工业俱乐部请我吃午饭，叫我即席演说，我作了一次鼓动性的演说，大谈中日联合起来向白种人算帐、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问题。因为当时正是日本人对美国移民法案排斥有色人种特别感到愤慨的时候，所以我的演说很得到与会

者的赞许。日本实业界巨头涩泽子爵当晚请我吃饭，出妻见子，特别表示隆重。另一次是日本财经界主脑人物组成的俱乐部“交询社”（社员主要是庆应大学出身的，会费很贵，资格限制很严）请我吃饭，并介绍我为该社免费社员。主席镰田荣吉是当时的文部大臣，也是以前我在庆应大学读书时候的庆应大学校长。他介绍我为该社社员时说：“我们很荣幸，接受第一个中国名士作为我们社的社员，同时我想王先生也应该很高兴。以大正年代的庆应毕业生的少壮年华，得为本社社员的，王先生还是第一人。”此外我还参加过一次东京帝大新人会的左翼作家小聚会（现在我还保存这张纪念照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是暂时采用拉拢的手法，企图以拉拢的手法把东北变成它的“满洲国”，所以对我这样帮助张学良办对日外交的人，也极尽拉拢的能事，他们的用心可以想见。

我在东北帮助张学良办理对日外交时期，共去日本3次，这是第一次，共滞留1个多月。在这期间，我已知道东北已经易帜了。等我回到沈阳，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已经到处飘扬了。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当局对于日本要求修筑敦图铁路问题的交涉经过

罗靖寰

自从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后，日本即亟谋以武力侵占东三省。但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军事运输路线，海上只有旅大一条，从旅大通往东北腹地也只有南满铁路一线，并

且只能通到长春，长春以北的中东路又掌握在苏联手中，无法利用。因此，日本遂急于修筑由吉林敦化到图们江的敦图路，使它和朝鲜铁道接轨，以与朝鲜的雄基、罗津、清津三港直接连接。这样，不但日本侵占东北的军事运输线路问题可以完全解决，而且因敦图路经过吉林省延吉县，与在中苏国境线上的珲春县相毗连，一旦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珲春、延吉又能成为进攻苏联的重要军事基地。

基于以上原因，日本遂于1929年10月上旬令其驻吉林特务机关长兼吉林督军署顾问林大八中佐及满铁驻吉林公所长粟野，向吉林督军张作相提出由满铁垫款包修敦图铁路及该路修成后与朝鲜铁道接轨的要求。张作相表示，这个问题他不能立刻答复，必得和奉天张学良商量后再说，只答应将粟野带来的文件暂行收下，待研究后再行答复。粟野把文件递交张作相时又郑重表示，希望明春即开始动工，一年内完成，要求早日答复（文件内容有敦图路线勘测图表、修筑计划书、包修合同各项工程的设计书）。

张作相随即召集省长及省署各厅长会议。大家认为这种重大问题吉林省无权许可或不许可，应向张学良请示办法。遂决定派吉林交涉署署长钟毓携带日本所提出的文件到奉天见张学良请示办法。当时我在交涉署任第二科科长，钟毓即派我随行，于10月25日去奉天。待到10月末，张学良又电召张作相到奉天开会研究办法。张学良主张东三省既然宣布拥护南京，关于外交问题也就应当由南京办理，我们地方无权干预，遂决定派钟毓为代表，携带粟野递交的文件赴南京请示办法。

张学良作出如此决定，他的内心是有一番用意的。当时总司令部秘书陈庆云（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曾向我说过如下一段事实：当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曾派公使芳泽向他提

出间岛行政权割让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即日本人可以在东三省自由杂居购买土地的权利）和敦图路修筑问题三项要求，交换条件是日本保护张作霖安全回奉天，并且保证张作霖仍然为东三省最高统治者和保持东三省的独立。当时张作霖满口应允。待到他要回奉天的前一天，芳泽就拿这三项协定出来要他签字。他推说今天太忙，叫芳泽明天下午再来。第二天下午芳泽又来时，张作霖叫陈庆云把芳泽让在对面客厅，他在屋里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专等人家危急的时候，卡着人家的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是不怕死的"云云。他把三个协定书上每个批了一个"阅"字交还了芳泽，也没和芳泽说话就坐汽车上车站去了。芳泽也就随着走了。1941年我任伪满驻意大利公使时，日本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参事官安东某，即是那时芳泽公使的一等秘书官。他和我闲谈时曾提到张作霖。他说："张作霖这个人非常狡猾，用人时什么都应许，等到事情完了就什么也不承认。"他也曾提到芳泽在北京那件事情。他说："芳泽公使当时以为张作霖签了字，可是到公使馆一看，在三个协议书只签了一个'阅'字。芳泽为这件事受了好大的难为。"

因为有上述这段经过，所以张学良认为他父亲都不能许可的问题，他怎能许可呢，何况日本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关于敦图路的问题，他就推往南京，并且可以借此来表示他拥护蒋介石的诚意。

11月中旬，我和钟毓回吉林准备一切，1930年1月19日再到奉天。2月7日见张学良时，张将密电报本一册交给钟毓，作为联络拍电时使用，又交给他日本田中奏议汉文译本一册，命带到南京送给外交部。此外，我们还领到旅费、交际费6 000元。因为去南京必须经过大连，而大连日本海关对于旅客携带的物品均须检查，所以钟毓即将这两个秘密文件交给我，由我缝入

我的西服背心内密藏。

我们于2月24日由奉天到大连，25日由大连乘吉林丸去上海，27日早晨到达，逗留数日，即于3月6日到南京。那时奉天省在南京设有省代表办事处，代表为邢士廉。我们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到代表办事处报到，并请邢士廉代为约见外交部长王正廷。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刚刚迁到南京不久，各国外交使节都住在上海。所以王正廷大部分时间住上海，来南京的时候很少，我们一直等到3月20日方才见到他。钟毓向王正廷说明了敦图路的交涉经过，并将带来的各项文件面交给他。王正廷将亚洲司长周龙光叫来与我们会面，告诉我们以后来部即与周接头。周龙光又给我介绍亚洲司总务科长姜某，叫我有事和他联络。我每星期三都到外交部一次与姜会面，探询消息。他总是答复说："部长还没有什么指示。"

4月3日邢士廉又和钟毓见蒋介石一次。钟毓见蒋回来对我说："蒋介石这个人非常高傲，说话时眼望天花板。我报告了我这次来中央的任务及东三省对日本外交情形，他只用鼻子哼哼，始终，没有问我一句话。等我报告完了，他只说：'好吧，你和部里联络，等王部长给你指示好啦！'"

我同钟毓于4月中旬到苏州、镇江、扬州、杭州、上海各地游览了两个多月。回到南京后，7月上旬王正廷找钟毓到外交部告诉他说："此案第一步办法，先由吉林张作相通知日本方面，说东三省已宣布拥护中央，对外交问题应由中央直接处理，叫他来中央交涉。他来中央更好，倘若不来，吉林省方面就置之不理，看他下一步采取什么态度。吉林省方面再斟酌情形设法再敷衍一个时期，俟中央把对日本的整个外交政策决定后，由中央再行指示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已经由蒋总司令另行拍电与张总司令，你们可以回去吧。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可由

吉林省直接给本部拍电联络。”我们遂于7月15日由南京起程返奉向张学良复命。

钟毓向张学良报告赴南京经过后，张学良说：“蒋总司令的电报我已收到了，关于这个问题你回吉林时对张辅帅说，暂时就照中央的指示答复林顾问和粟野满铁公所长。你们去了许多日子，辛苦啦！在奉天休息几天，就回吉林去报告辅帅吧。”

我们在奉天只住了两天就回到吉林，当晚就到张作相公馆，将详细经过报告了一遍。张非常不满，说：“这算什么办法！他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我当时就向总司令（指张学良）说过，找中央也未必有什么好办法。自己做的梦还得自己圆。这不是白跑一趟吗！多少条铁路都让人家修了，为了这一段铁路得罪日本人，我觉得是不上算的。”

7月24日午前，张作相即找林大八到督军署，粟野也同来。张作相告诉他们说：“钟署长已经由南京回来。关于铁路问题，中央不准地方直接谈判，应由中央外交部统一交涉。请你转达关东军和南满铁路会社，请你们直接到南京与外交部交涉，关于这个问题从今以后吉林省没有权限处理。”林大八说：“日本人并没有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什么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在中国那个地方发生问题，即向那个地方主管的当局交涉，这是惯例，从来如此。吉林的问题只有和阁下谈判，阁下也有权力主张，根本没有找蒋介石商量的必要。在我们看来，蒋介石政府本身也不过是中国地方政权的一个，他有什么力量能叫别省的地方政权非遵从他的命令不可？这个问题如果阁下坚决表示不管时，那么日本关东军可能采取自由行动，以保护南满铁路会社修筑这条铁路为理由，向铁路沿线各地方出兵。到那时阁下将采取什么态度呢？如果亦以武装部队阻止关东军开入时，当时即能惹起两军的冲突。如不阻止关东军的开入，这问题就算

自然解决，但是吉林政府的威信又将置于何地呢？倘若事态扩大，其后果将更不堪设想。阁下是吉林省的主人，一切应当自己作主，不应该放弃权力，让什么中央政府来管吉林省的事情。我是阁下的顾问，关于这种种利害问题，当然不能不向阁下说明。并且如果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也有应负的责任。希望阁下就以上所说的各节，详慎加以考虑，千万不要轻信别人的话，以免将来后悔不及。”张作相说：“你说的很对。等我研究研究再答复你。”

林大八和粟野走后，张作相即打电报报告张学良。张学良接到电报后，找东三省交涉总署长王明宇、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以及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大家都认为这不过是林大八为了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恫吓手段，关东军向吉林出兵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不预防万一。遂拟定一个具体的办法，即：待林大八来催问张作相时，就由张作相答复说已得张总司令的同意，此案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负责办理。待满铁来交通委员会接头时，高纪毅可以代表张总司令口头上答应满铁的要求，但是关于满铁所提出的包修合同和各项工程计划书，必须经过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的审核；如果我们认为有不适宜的地方，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待双方同意后方能实行。如满铁同意我们这种办法，我们就召集各铁路局长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开始审核讨论满铁所提出的各项文件。而我们的审核讨论的时间，可以斟酌情形，自由伸缩，欲长则长，欲短则短，这样至少也可以拖延几个月到半年。这么办，不但可以缓和关东军及满铁的情绪，又可以达到中央的要求。究竟中央是否同意这个办法，现在就派高纪毅去南京和外交部接洽。(这是我到奉天后听高纪毅对钟毓说的。)

我们回到吉林四五天后，奉天又来电话叫钟毓到奉天和高

纪毅接头。钟毓和我当日晚即乘车启程。

我们于7月29日早到奉天，当即往见高纪毅。高向钟说："关于敦图路线交涉问题，张总司令叫我去南京和外交部接头一次。因为您已经去过南京，情形比较熟悉，可以再同我去一趟，罗科长也同去，我就不另带人了。"我们三人遂于8月3日由大连乘黑龙江丸南下，5日到上海，7日到南京。这时奉天驻南京代表邢士廉已调回奉天，由秦华继任。我们到南京后过了约一星期，于8月中旬高纪毅才见到王正廷，又见到铁道部长孙科及蒋介石。高纪毅见铁道部长孙科和蒋介石的时候，我没有同去，不知道谈的什么，只是在他回来时听他对钟毓说："孙科说话很不清楚，我一句也没有听出来他说的什么。见王部长和蒋总司令时，只是把奉天所拟的办法详细报告了一遍，请中央决定是否可行。"

8月17日，王正廷召高、钟二人见面，首先向高纪毅谈："对于东北铁路交涉问题，主要采取拖延政策，就按照张司令拟定办法去做。可以由交通委员会召集东北各铁路局的局长及有关系的人员组织一个委员会，以研究满铁所提出的问题为名，先表示我们对铁路交涉问题已经同意，借以缓和日本方面的情绪。既是研究会，那么，看情形能拖延多久就拖延多久。这样中央就可缓开时间，研究整个东三省对日外交的政策。"高纪毅当即表示一切都按中央的指示办理。钟毓又接着说："自从张大元帅被炸死后，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人和日本奉天在乡军人会的急进派，处处与我们为难，甚至故意寻衅。对于间岛问题、土地商租问题以及铁路交涉问题，均表示强硬态度。甚至叫嚷说，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圆满解决，不惜使用武力云云。这虽是一种恫吓手段，但我们也不能不预防万一，作相当的准备。"王正廷说："关于日本对中国的问题，现在它在国际上已处于孤立的地

位，它也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不敢轻举妄动。况且就中国与日本的全面关系来说，东三省问题仍属地方的问题，或不致影响两国全面的关系。希望回去报告张总司令，命令东三省有关当局严密注视日本方面的行动，随时电报中央，以便采取对策，而免遣误，以防万一”云云。

我们于8月下旬回到奉天后，我和钟毓当即回吉林向张作相复命。张作相说：“既然中央和总司令同意，就那么办吧！”

当我们去南京的时候，吉林省、哈尔滨又发生搜查苏联总领事馆事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苏双方外交代表约定在满洲里会见。苏方代表为卡拉罕，中国方面为李绍庚。钟毓既由南京回来，张又令钟毓立刻去满洲里，我也同去。以后竟演变成中苏两方的武装冲突，因而我们对于铁路交涉问题也就无暇过问了。

我于1930年11月调任吉长铁路局秘书兼稽核科长。局长为郭续润（高纪毅的亲戚，兼任吉敦铁路局长），副局长为齐耀塘。因为吉长铁路系由满铁借款修建，满铁派有代表一人常驻局内，权限与待遇同局长一样。局内对外文交的稿件上凡是由局长盖章签发的，代表也得盖章方能缮发。会计处长亦由满铁派日本人担任，掌握全路局的收支。当时的代表为中川某，会计处长为工藤二郎。所以吉长铁路名虽为中国自办铁路，实在是受满铁支配。局长对于局内一切行政如果装聋作哑，一概不问，那么与代表的关系就好一些；倘若局长不肯放弃权利，那就时常发生磨擦，关系当然不能融洽。自从郭局长到任后，凡是局长权限内的事都要过问，因此与中川代表时常发生矛盾（“九·一八”事变当时，若不是他在北京出差，一定遭到日军的杀害）。

1931年3月上旬，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1]派满铁理事河村上造（曾任日本外务省次官，在日本外交界颇有声望）携带他的亲笔信来见张学良。张接见河村后，就叫他往见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河村走后，张即叫高纪毅来公馆，将内田的来信交给他，叫他斟酌办理。信的内容大致说："关于敦图路修筑问题，早经张作霖大元帅同意，并签有协定书，嗣因种种关系，一拖再拖，直到现在还未实现，并且近年来又连续发生种种令人不能满意的问题，如中国新修的沈海铁路、吉海铁路、打通支线、梅西支线，对南满铁路的并行线问题、南满铁路包围线问题，以及中国各铁路对南满铁路运费抵制问题等等。问题越积越多，纠纷愈演愈烈。现在形势紧迫，倘不及时谋求解决办法，诚恐酿成不良的后果。兹派本社理事河村上造往谒阁下，请阁下当面指示办法，俾以上所提出的各问题，得以早日圆满解决为幸"，云云。第二天，河村即到交通委员会见高纪毅，除了说明他此次来见张学良的任务以外，又将满铁所拟的敦图路修筑计划书、包修合同及施工图表等各种文件当面交给高纪毅（与1929年交吉林张作相的相同）。河村辞出后，高纪毅就电召吉长铁路局长郭续润立刻来奉天。郭接电后，即日晚车同我去奉天，第二日早到后即往见高纪毅。高告以河村所提的问题，问郭怎么办。郭说："近来日本方面对我们的态度非常不好，满铁也在这个时候又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看起来，他们是有决心、有计划的，绝不能一推了事，或置之不理。若是没有一个具体答复，他们是不会满意的。不过，我看满铁向我们提出这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敦图路修筑问题及该路修成后与朝鲜铁道接轨问题。我们可否先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

① 此处时间有误，内田康哉于1931年6月就任满铁总裁。

谈判进行的办法，象委员长以前所说的那样，先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满铁所提出的敦图路修筑计划书及包修合同进行审核研究，作出对案，然后根据我们所提出的对案交换意见，待双方意见一致后再正式签定合同。我想我们这种办法满铁一定不能不同意的。那么开会的时间，我们愿意长就长，愿意短就短，至少也能拖延三四月至半年以上，以后我们再看形势的变化再拟定第二步办法。”高说：“好，我们就这么办。你可以代表我去见河村，把这个办法替我转达给他。如果他同意，你就拟一个委员会的组织简章，我们好立刻召集会议。”

郭续润第二日即往满铁公所去会见河村理事，我也同去。郭将高纪毅的意见转达给河村，并约定嗣后有什么事即与他接洽，不用再找高纪毅。河村当时对这种办法表示非常满意。又隔四五日，河村又来回拜郭续润。他说：“关于铁路交涉问题，高委员长所提的办法，我已经报告内田总裁，内田总裁也表示同意。并且为了双方接洽便利起见，我方也在奉天设一个临时办事处。我将在你们开会期间常住奉天，以便你们在开会中间遇有什么问题时，好随时研究解决。”

郭续润随即将这个组织的简章拟就，交与高纪毅，其主要内容如下：1. 名称定为东北铁路交涉委员会；2. 高纪毅为委员长；3. 委员为吉海铁路局总办李铭书，吉长铁路局长郭续润，四洮铁路局长何瑞章，北宁铁路局副局长劳少勉，洮昂铁路局长万国宾，并以吉长铁路局秘书罗振邦为日文秘书，吉敦铁路局秘书尹寿松为中文秘书；4. 委员长高纪毅因公务繁忙，除有必要时外，不出席常会，由吉海铁路局总办李铭书代理主持会务；5. 每星期开会一次，各委员于每星期六来奉天，星期日开会，星期一各归各局办公；6. 会址暂设在北宁铁路北车站楼上，于1931年4月第一个星期日开成立会，以后每星期一次。

4月12日，河村来见郭续润，正式通知他的办事处亦于4月10日成立，嗣后有紧要的事情由他和郭接头，普通的事务联络由我和他的秘书木村省三接洽。他还说："我们这两个组织对外均保守秘密。我也不请各位委员和高委员长在公共场所宴会了，将来只好送一点纪念品吧。"郭续润即约河村及其他日方人员于星期六晚上宴会，并对河村说："我这里是临时租的一个私人住宅作为吉长铁路局驻奉办事处，佣人都是我由长春带来的，绝不会走漏任何消息。"那天的宴会，参加的除河村外，还有奉天满铁公所所长镰田弥助、奉天满铁地方事务所长铃木一郎、满铁总社参事罔崎三郎、铁道部总工程师柳田国昭及木村秘书等人。过一星期后，河村派木村秘书赠送高纪毅及各铁路局局长每人大理石座钟一个作为纪念，并送给我一件西洋缎桌蒙。

自从4月初开会以后，每隔一星期木村即来办事处和我会面一次，向我探听开会的情形。每隔约三四星期，河村即与郭续润会晤一次，询问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实际上是催促我们。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各委员谁都知道这个会不过是一个拖延时间的工具。每次开会，由我翻译阅读一件满铁的提案文件，然后大家便聊天喝茶，谁也没有认真去审核文件的内容。每星期木村来询问开会情形时，我也就随便找一些材料应付。

7月上旬，有一次木村向我说："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山下晴大尉和日本奉天在乡军人会，因为中国方面对于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以及铁路交涉等问题，一味拖延，毫无解决诚意，群情愤慨，并且主张如果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不惜发动武力自己来解决。倘若我们的铁路交涉问题能够早日解决，至少也可以缓和这种紧张的空气，希望你把这些情形转告郭局长参考。"我将这事报告郭续润后，郭亦曾在会议上报告各委员。但是多数人都认为这不过是催促会议赶快进行的一种恫吓手

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谁也没有重视。

铁路交涉委员会自4月初开始，到7月下旬一共开了20次会，才将"对案"拟定，其内容如下：1. 满铁对敦图路修筑垫款利息不得超过年息3厘（即3‰）。2. 线路的选择应经过中国技术工程人员会同满铁的原勘测人员重新勘测一遍。中国技术人员如认为有改正之必要时，应按照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修改。其他工程的设计亦同。3. 以前向南满铁路会社垫款修筑的吉长、吉敦、四洮、洮昂各铁路的垫款利息，为了收支和运费的统一，亦应一律改为3厘。4. 过去由南满包修的吉敦铁路工程，在保固期内，铁路、站台、票房、工厂、宿舍已有多处损坏坍塌，应由满铁按照原合同全部予以修复。5. 关于敦图路与朝鲜铁道接轨联运问题，须俟该路工程完成1/2以上时，由两路负责人员另行组织委员会进行协商，拟定具体条件。6. 以上所拟的对案，须俟呈请中国南京中央政府批准后施行。

此案作成后，因高纪毅当时正在北京，即由交涉委员会去信向他报告开会情形，并请示第二步办法，但并未得到他的回信。河村几乎每日都来找郭续润询问高纪毅回奉日期。郭只有一天一天往下推，也没有确实的答复。8月10日河村理事又来见郭，进入客厅后，即嘱把门关上，对郭说："我有一件极秘密的事，以私人的资格向郭局长谈谈。"接着说："关东军的板垣中佐及奉天在乡军人会的河本大作大佐认为张学良将军对于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以及铁路交涉等问题，一拖再拖，毫无解决的诚意，他以为日本军人可欺，这是对日本军的侮辱，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武力膺惩张学良，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所进行的铁路交涉问题，如果能在三五日内解决，至多不出一星期，尚可以缓和日本军人的愤懑情绪，不致发生意外的事情，不然就恐怕发生意外事件。

我们进行了四个多月的铁路交涉，若是无结果而终，对我和郭局长说来，都是很可惜的。”河村并且又非常郑重地说：“我这是完全出于好意，以朋友的资格告诉郭局长，现在日本方面决不是什么使用恫吓的手段，以图铁路交涉问题早日达成解决，请郭局长千万不要误会。”

河村辞去后，当日晚郭续润即到奉天省长臧式毅公馆，向臧报告了河村的谈话。臧式毅说：“这是外交问题，应由中央主持，我完全无权处理。副司令去北平后，关于后方的一切事情均委由张辅帅主持。最好你到锦州去一趟，把这件事报告给他，看他怎样指示。”这时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乡下给他父亲办丧事，郭即于11日早去锦州小岭子见了张作相报告经过。张作相以重丧在身，不能亲自到北平指示，要郭去北平面见张学良报告。郭即于13日返奉，携带铁路交涉委员会所拟的敦图包修对案，和我一起于14日去北平，向高纪毅报告。高说：“别听他们那一套，这也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午后3时高即同郭到副总司令部见张学良，候了三四个小时，承启官回说：“副总司令今天太忙，没工夫见客，明天再来吧。”郭续润当晚回到旅馆时已经8点多了。他一连去了3天，都没见着张学良。郭和我感到非常失望，遂将带的文件交给高纪毅，请他找机会向张学良报告并请示办法，我们好回奉天答复河村。我们一直住到9月18日，每隔二三天即到高纪毅处询问消息。高说，他虽见到张学良几次，但是也没有机会说这件事。看样子，我们几时能见张学良是没有把握的，遂将这种情况报告给张作相及铁路交涉委员会。

9月18日晚上，我和郭续润到新明戏院看戏。因为我们去得晚一些，到戏园内一看，张学良也带着赵四小姐和另外两三个女人在右面第三包厢看戏，我们坐在第七个包厢，距离很近。待戏演到11点前后，我就看到张学良的包厢里，一会儿跑上一

个副官在张学良耳边说几句话，张学良一扬手，副官就走了。一会儿又跑来一个，一连三四次。因为张学良的包厢在我们包厢前面，由楼下上来的人都要经过我们的包厢，所以我看得很清楚。等到戏演完了，我抬头一看，张学良的包厢里已空无一人，不知什么时候都走了。我和郭续润说："恐怕出了什么紧要的事情啦，不然张副司令哪能在这个时候走呢？方才我看见他的副官几次由楼下跑上来，向他报告什么事情，情形很紧张，或者奉天出了什么事也未可知，我们也走吧。"待我们走出戏院门外一看，在戏院门外排列的一些大汽车已经一辆也没有了。我和郭续润说："一定是奉天出了什么事情了。"因为我们来北平以前，就听人们传说，日本铁道守备队每天在铁道沿线各地打野外，故意向中国军队挑衅。又听说日本铁道附属地内的日本学校均已停止上课，将校舍空出，准备住军队，形势非常紧张，所以我想恐怕奉天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回到旅馆后，就给邢士廉打电话。邢一接电话就说："伙计，坏啦，奉天炮响啦！"

听说当晚张学良由戏院回公馆后，朱光沐给他来电话，报告日本军已经向北大营进攻。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指示下，他就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让朱光沐转告王以哲，千万不要抵抗，尽量撤退。电话没有说完就断了。事后听高纪毅说，关参谋长于21日由奉天来北平报告说，9月18日晚奉天全市已被占领，他在20日早化装为买菜的逃出奉天，以后的情形就不知道了。高还告诉我们，张学良当时说："让他占领好啦！将来他怎样占领，还得怎样给咱们退出来。"

关于敦图铁路的交涉问题，就这样随着"九·一八"的炮声而告一结束。

（政协河北省暨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

与张学良的几次交涉

林久治郎*

忍气吞声的东北当局

自从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死以后，中国方面的态度是极端消极的。非常恐惧与日本方面发生冲突，一改其昭和2年（1927年）下半年以来的排日姿态。今则相反，中国官民每见日本人就远避走开。后来查明的情况是，张作霖被炸身死后，张学良曾于5日回奉天，召集张的旧部高官商讨善后之策。其时，多数人都说这是日本人阴谋暗害的。有的主张提出抗议，有的主张与南方合作等等，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会中有前吉林省长王树翰，最初沉默不语，当他听到众人持论纷杂，不得一决时，才开口说道："诸位：关于此次事件之是否出于日本人的阴谋一节，我们究竟有无确证？如无确证，即勿庸多论。即使有证据，我们对日本又能奈何？能战固好，如不能战，空喊证据又有何益？况且当前的要务，并不在日本人的策划如何，关键不是对外，而是我们内部的稳固团结。"这番话使大家都默然了。据说后来采纳了王的意见，不再追究事件的真相，等待学良将驻滦州的三、四方面军① 大体整顿完毕后返回奉天，再议后事。

---

* 作者1928年至1931年任奉天总领事，本文摘自辽宁教育出版社《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一书，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① 指奉系军阀军队，自称为安国军第三、四方面军，由张学良指挥。

奉命阻止东北易帜

7月16日下午我往访张学良时，他对我说："自从上月以来我们多次会见已经成为好友了。关于新政府今后的方针政策问题，很想听听朋友的意见。"接着又说："南京政府不断劝告东三省政府实行统一合作，政府内部的意向也大体倾向于此，但我还想听听贵总领事的高见。"我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主张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我国同东三省的关系与中国内陆地区同各国的关系不同，是极为重要而密切的。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同我国对抗。您在上月末曾说，在满洲请求中日两国关系的协调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是，如果同南方合作，上述希望就会完全成为画饼了。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我个人也要奉劝您加以阻止。此事对于我国政府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还要向田中首相请示。况且，此事不仅对日中两国关系影响巨大，同时还将破坏东三省三千万民众赖以发达的保境安民政策的基础，三省的父老也将为此感到遗憾。"会谈大约进行了3个小时。

归来我马上去访村冈司令官，向他表明：事态发展既已如此，仅以口头劝阻恐已无济于事。如果政府能下决心以武力加以阻止固然很好；倘若不然，就不如不予过问为佳。可否按此意思以电报向政府报告请示？司令官同意了我的意见，遂即给政府打了电报。18日晨得到回答的训令，其主旨为：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至于对方不予听取究竟应采取何种措施问题，则无任何指示。得此回训大为高兴的是军部，我则担心执行这一训令的后果，心中颇为不安。然而大势已难扭转，遂

于当天下午再度往访张学良，转达了本国政府的意向，并恳切劝他不能悬挂青天白日旗，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虽然我竭力劝阻，张学良终未应诺，只是回答说可以继续加以考虑。

第二天即20日下午，村冈司令官特在城内满铁公所初次会见了张学良。司令官对张作霖的逝世深表哀悼之忱，并诚恳地表示今后将给予充分的援助。当司令官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指杨宇霆——原注）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时，据说张学良感激得声泪俱下。这是司令官及其列席的武官所透露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各报记者都在日本内地的报纸上发表了。我对此虽然当时有些怀疑，其后经过一年左右，当时担任翻译的王家桢则私下对我说出了当时的实情：当天在满铁公所的会见结束后，王家桢陪张学良同车回去，在车上张问王说："你能理解我今天为什么落了泪吗？"王答说不知。张学良无限感慨地说："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还得俯首致礼；反躬自问，实在太不争气，悲愤之极，不禁泪水奔流了。"听到这番话，我不能不为我同胞之头脑简单而惊惧。这一天的会谈是我前天那次交涉的继续，司令官对张学良当然也提出同样劝告，要他停止南北妥协。

吉林反筑路运动

吉林省城在东三省历来就是学生运动最盛的地方，但是民间有识之士中间也有不少人是亲日的。自8月中旬在延缓南北妥协问题上刘哲出现以来，又有杨策、林鹤皋（省议会议长）等吉林省头面人物前来奉天，同我方接触者已有不少。8月下旬的某一天晚上，满铁在汤冈子温泉招待了刘哲等二十多位中国官民，就是为了缓和吉林方面的气氛，使形势不向对我方不利方

面发展的措施之一。在座者中有位张学良的秘书、东北大学校长刘风竹，系美国留学生，其夫人是东京女高师毕业。他也以吉林人民的身份表面上与日本人开始交往周旋，但其政治地位与其学历相较是尚未受到重用的，特别是同日本留学生王家桢等人的声势相对比，他当时正处在待机而动的时期。到这时，我已觉察到对铁道谈判的前景抱乐观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加以处理。为此，虽然有政府立即开始土地问题交涉的训令到来，但我则一方面禀复政府，说明土地交涉应俟铁道问题告一段落后再行着手，刻下尚非其时等等实情；另一方面我再次往访张学良以探明真相。善于见机行事、明敏机智的张学良则回答说："不幸的是，现在这一谈判已在各地传开，许多社会公团以及学生们提了抗议；特别是当事地区的吉林省已经发生了学生反对运动。为了尽量求得问题的圆满解决，应该等到学生运动缓和以后再作处理，目前只好暂且等待一下。"对此，我就直截了当地向他指明：据说吉林方面的学生运动是由贵总司令左右的人嗾使而引起的，务请加以注意。张学良默然不语，仅报以淡淡的苦笑，表示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我又指使斋藤、江藤两人竭力向张学良施加压力。斋藤素与张学良关系不深，加以性格温厚，同张学良会见的机会也不多；而江藤氏则常常与张学良私下会晤，对他依然信任，仍认为在近期内问题能获得解决。我向他说明了张学良的诚意如何值得全面怀疑以后，他就去向张学良进行诘问，苦劝他要力促其成，但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与张学良激烈辩论

1928 年岁暮，易帜运动渐臻成熟，终于29日傍晚付诸实施。入夜，城关内外商号都根据警察的命令将预先准备好的青

天白日旗一齐悬挂出来了。

东三省当局坚决要实行易帜，这在两三天以前就已经看得清楚了。如前所述，这次我并没有插手，只是在旁窥察动静。30日，一天杳无消息。31日，交涉员送来了关于悬挂青天白日旗给各国领事的同文照会。此次易帜的实行，是在延展期限已满之后，这是中国的自由，但我从个人与张学良之间的长期友谊考虑，总觉得他在这个时候，似乎应该对我有某种礼节性的表示，但他却没有向我打任何招呼。于是，我于31日下午4时去访问了张学良。

开头我说："交涉员送来了照会。在限期以后实行易帜，本是预先可以想到的事情。但鉴于贵我双方的友谊，似乎事先总该打个招呼，本人一直在盼待着，但竟没有任何消息，不免令人失望。"张学良回答说："我已指示交涉员前去往访，向贵总领事致意，他竟未去执行，深属遗憾。"我接着向他提出质问："南京政府标榜革命外交，目的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我帝国政府对于东三省易帜虽然未加反对，但对革命外交波及此地，却不能置诸不顾。我国在东三省权益之如何重大，本是贵总司令所充分了解的。因此，即使实现了妥协，也决不能容许对我国权益发生丝毫的危害。此次贵总司令断然实行易帜，不知在尊重我国权益方面是否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此，张学良回答说："虽已实现南北妥协，但实质上东三省政府的态度依然毫无改变；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仅是名义上的，实际内容与以往并无不同，不会有危害友好国家利益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对于日本在条约上的权益，更要注意予以尊重，贵总领事尽可放心。"于是我又追问："既然如此，那么对于交通部业已核准的吉会、长大（赉）两路工程承包合同，阁下是否有意立即执行？"张学良则回答说："关于这一问题，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存在各种

复杂的相关情况，处理起来殊感困难。”我遂即严词向他诘问：“复杂的事态既能制造出来，处理起来又有何难。如在尊重权益的空言掩饰下，连业经交通部核准的铁路合同都不肯予以实施，其原因端在贵总司令缺乏诚意而已。南北妥协固非我国所欲过问，但若采用‘革命外交’而致危害我国权益，我国政府则断然不能容忍。不知贵总司令是否真已有此决心？”由于我这些话措辞激烈，张学良为之色变，以至粗暴地回答说：“事与南京政府有关，诸如铁道等问题，希即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最后我厉声向其声明：“贵总司令既然企图用易帜来蹂躏我国权益，即请慎加考虑，下定承担后果的决心！”此次会谈，双方辩论激烈，费时约3个小时。归邸后即乘当日最末一班火车，赶赴汤冈子温泉，迎接新年去了。

不能坐视　讲究对策

由于民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愈趋强硬，日后蒙受最大影响的将是拥有利权最多的我们日本。我国在满洲有着特殊的权益和势力并处于今后可能取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的地位。然而中国国民外交运动的影响必将使我们受到阻碍。倘若坐视现在的状况任其发展下去，而不采取某种积极进取的政策。则我国在满洲的现有势力即有逐渐衰退的危险。就一般概况而论，过去20余年间，我国之于满洲，不论官方或民间都没有什么确定的方针。所幸欧洲大战以来出现了持续的繁荣，随着交通的发达和人口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的自然发展，使满洲的对外贸易年年增加，呈现出经济普遍兴旺的景象。二十多年来，我国居留民的增加在数量上极为迟缓，到现在南北满洲加在一起也不超过20万人，而且大部分都在满铁附属地内。除去满铁职员、关东厅吏员和家属以及附随的商人等外，我居留民的数量就没有多少，其

中再除去特殊营业者和相濡以沫的商人外，真心从事贸易或企业的人不过数千人而已，更为严重的是我居留民的积极性日渐衰退，明治年间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向满洲腹地城镇发展，经营各种企业，其后因嫌弃腹地的不便，向往于设施条件较好的附属地的生活，很多人又从已经进入的地方退回到附属地来。比如奉天这样的中心城市，附属地以外的居留民曾超过五六千人，而现在已减少到半数了。

由于商租权问题未得解决，致使我国的进步发展受到很多阻碍。居留民普遍以此归咎于政府，强烈希望政府及早确立对满方针。不论是哪一届政府，都绝不能容许从目前的现状向后倒退，因而在不远的将来，由于中国方面的积极行动而引起的日中两国之在满洲发生冲突，已成为势所难免。认清这种形势，讲究对策，做好准备，这正是当政者的责任。

军方宣传对华强硬主张

为使木村[①]以满铁交涉部长的身份同奉天当局进行铁道谈判，外务省预先准备好了一套基本方针。这个方针大部分是关于铁道业务问题的，而新任的人员又缺乏有关的背景知识，为了加以研究和做好各种程序安排，需要相当的时日，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为与蒋介石会见而到南方去，至第二年1月中旬还没有回来，因此，铁道谈判也就没有开始。对于这次铁道交涉，无论在满洲或在日本内地，一般人都以为由此可以解决已经陷于僵局的所谓满蒙问题，再加上舆论机关的宣传、政府方面也因内政的需要而加以利用和鼓吹，致使人们对这次交涉都抱有极大的希望和期待。

---

① 木村锐市原为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1930年，为进行同张学良的铁路交涉，特将他转任为满铁理事兼满铁交涉部长。此次交涉意在软化和降服张学良。

看到这种政治形势，感到机不可失、跃跃欲试的，是陆军系统内那些激昂气锐的陆军将校们。他们认为大前年的炸张作霖事件是彻底失败了。那时，军部似乎已有一鼓作气以武力积极解决满蒙问题的策划，然而舆论尚未成熟，政府也不赞成，煞费苦心的一番策谋终成泡影，反而产生了损伤军部信誉的后果。由此，他们认识到今后做事必须以舆论为后盾，开始研究起如何唤起舆论的策略，准备用组织手段达到这一目的。换言之，即他们觉察到在最近的思想运动中共党的细胞组织最为有效，因而开始摹仿起来。其做法是：向陆军大学在校的青年军官们，加强灌输对华强硬的思想，以毕业后派到各地兵团的人为个体细胞，由他们与当地联队和区的司令官保持联系。同时还不懈地向在乡军人会① 和青年团灌输军事思想和对华强硬的主张，以备他日之需。在中央，则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内的佐官级的骨干分子为中心，结成了名叫"樱会"的一个团体，互相研究如何加速解决满蒙问题，并紧密地同关东军参谋们一起进行策动。

有关这等动态的情报，原是被盖上"机密"字样的。我则是同前来满洲旅行的军部之少壮将校们的会谈中有所察觉，后来又从长期担任关东军参谋、后为奉天特务机关助理的花谷（正）少佐那里直接听到的。花谷少佐是军部内一个俊才，是敢于进行策划和勇于开展工作的积极分子。他常常前来访问，坦率地交谈国事，可以推心置腹地互相交换意见。因此，我才能从他口中得知军部的这些新动向。而我则常规劝他说：不要轻举妄动，今后的对外发展，如非举国一致，是难以成功的。

同年末，满铁的谈判准备工作方始完成，已经安排就绪，一

① 在乡军人会（1910.11.3—1945.8.31）是日本全国性统一的退伍（役）军人组成之维持军事能力的公立团体。在市、町、村、工场等基层单位普遍设立分会，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于动员参军、组织移民和镇压工农运动等方面起过重要反动作用。二战日本败降后始被解散。

俟张学良回到奉天，即可立即开始谈判了。

昭和6年（1931年）1月中旬，张学良一回到奉天，我就向他通报了赠勋的事。于同月21日在司令部布置好礼堂，文武官员盛装以待，我同各领事及张的顾问武官均着礼服准时莅临，隆重地举行了赠授勋章的仪式。接着茶果款待。礼成之后令旁人退出，我向张学良表述了下列事宜：我国政府有解决在满日中悬案的愿望，首先拟由满铁开始铁道谈判，为此木村理事已经来到奉天，为了两国的友好亲善，希望双方真诚地交换意见，以求悬案的早日解决。张学良表示同意，即于第二天22日，首次接见了木村理事。

木村理事在同张学良会见的第二天即23日，就以书面提出了我方基本上分为四点的会谈议题。一是并行线问题，其它三点是关于联运、降低借款利息以及工程费转为借款等问题。张学良即任命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兼京奉铁路局局长高纪毅为奉天方面的首席代表。木村同高会谈了两三次，东北方面当然不肯把并行线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提出讨论；我方则认为，如果不谈并行线问题就无所谓什么铁道谈判，就等于欺骗公众，使人大失所望。这是问题的焦点，双方距离颇大，意见很难一致。当此时刻，满铁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随着铁道谈判内容的逐渐公开化，有人发出议论，说什么像这类问题完全可由满铁各部通过事务程序加以解决，何须专待交涉部长去进行谈判等等，加以外间对木村理事的宣传和评价也引起某些理事的反感，而且仙石总裁对木村本人也未必真是完全信任，致使满铁内部也产生了歧异。在时间流逝之中，张学良于2月末又到他的新地盘河北去了，3月，高纪毅也追踪前往。至此，所谓的铁道谈判已逐渐漂上浅滩，竟使木村理事也向其亲人透露出请辞之意。

其时，满铁的铁道谈判迟迟不得进展，幸而由大仓男爵出

面的航空问题交涉还算顺利；岂料3月下旬我国国会闭幕时，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宣明了年度收支的赤字。这样一来，由政府筹募资金就成了难题，不得不转而指望满铁能拿出这笔资金；然而满铁亦因收入减少而甚感支绌，能否承此重担，亦无把握。这就是当时令人忧郁的实际情形。那个时期，因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内地的工、农、商各业都是一片萧条，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遂使舆论界日甚一日地起而高呼，要求在满蒙问题上寻找出路，以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满洲事变”策划人之一
——板垣征四郎

稻叶正夫

编者按：本文摘自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会”出版的《板垣征四郎》一书，该书对板垣其人百般美化，竭力歌颂，观点反动。此处只摘录其中史料部分，以助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侵略的内幕及战犯板垣的罪恶活动。

板垣与“一夕会”

冈村宁次大将回想起“一夕会”时开头有如下记述：

“永田和我同是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二期生，从15岁少年时代就是亲密的朋友，尤其在少尉任官之后作为酒友成了知心。

小畑和我在中央幼年学校时同期同中队，志气相投，又同在步兵第四十九团共事，日俄战争时出征担任北朝鲜警备，关

系更加密切。

我们3人从少尉至少将时期即对陆军之积弊感到愤慨，矢志要重新改革。

另外，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怀着到中国大陆去活动的梦想，便和具有同样梦想的土肥原、板垣、矶谷等同期生有着同样的志趣。”

大正10年（1921年）10月27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永田、小畑、冈村三人在酒巴相会谈了许多话，归国之后就以上述同期同学为骨干纠集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各期志向相投者结成团体，订立盟约矢志重新改革陆军。这就是“一夕会”的开端。

其后，一夕会就成了推进陆军近代化的力量，对处理满洲事变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到了昭和7年4月，永田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小畑任第三部长时，两人逐渐发生对立并很快表面化。同年8月，冈村少将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后，方向已见明确，对此冈村手记如下。

“尽管如此，在我离开东京之前，永田和小畑还是出席了一夕会的活动，并进行了欢谈。

我就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为向中央联络报告，每个月都要晋京，到东京之后就要和一夕会的人聚会。这时从一夕会的基层人员中就流露出永田和小畑之间的关系发生险恶变化的传说。果然在昭和9年4月晋京时，一夕会的同仁于23日在赤羽桥青岱寮招待我，到那里去的只有永田、矶谷、板垣、东条、工藤等，另外还有小笠原，小畑和其他人员都已分袂。27日约会小畑谈了3个小时，由于对永田一派反感强烈，始终未能妥协。

我对多年同志出现分裂感到十分悲观，每天晚上都想这件事，弄得我这个平素贪睡的人在京期间也出现了失眠。

23日离京之前我委托处在中立地位的矶谷和板垣做最后努力，希望重新团结起来便归任了。

社会上把以永田为中心的一方叫作统制派，以小畑为中心的称为皇道派，我认为这是群众随意给起的名称，其实只不过是同志之间的分裂而已。”

就这样，一夕会形成分裂，永田将军于昭和10年被人杀害，小畑中将也在“二·二六事件”之后免去现任职务。但是同期中一夕会的盟友还剩下了大陆同志四将军（板垣、冈村、土肥原、矶谷）。以后，四将军并没有失落了对大陆的热情和向大陆扩张的志向。

少壮时代在中国

与冈村、土肥原、矶谷等四出活动

第十六期学员是明治37年（1904年）任少尉的，正是日俄战争时期。因而他们都有过参加战役的经验，都在军人的道路上有所磨练，当中国大陆出现曙光即辛亥革命发生时（明治44年），4个人先后都已进入陆军大学，又都对中国大陆产生了幻想。各自胸怀大志，土肥原于大正元年（1912年），冈村于大正2年，矶谷于大正4年，板垣于大正5年分别由陆大毕业。

辛亥革命发生之后，陆军派出许多人材到中国大陆去驻在。首先是坂西利八郎中佐驻在华北北京，江户川辰三少佐驻在华中汉口。传说江户川少佐在启程之前和陆大在学的冈村、山中（峰太郎）还共同有所研究，而且早一步毕了业的土肥原中尉已在大正2年7月派在坂西机关在中国大陆开始活动了。

板垣大尉踏上中国的第一步正是矶谷驻在上海的同时，大正6年8月驻在昆明。冈村也在这年2月当上了北京青木宣纯顾问的辅佐官。大正7年11月刚从北京归任不久的土肥原又继

任黑龙江省督军顾问到齐齐哈尔去就任。从此一直到满洲事变，前后几次反复活跃在大陆，于是出现了板垣与石原及本庄与板垣为中心等若干叙述。

板垣与石原、本庄与板垣之会晤

板垣大尉于大正8年由昆明驻在调往汉口任华中派遣队司令部附。第二年7月任参谋。在那之前的4月石原莞尔大尉也到那里就任部附，到板垣少佐（大正10年4月晋级）调任参谋本部部员为止（大正11年4月）正好一年，同时同地在大陆任职。石原是板垣在仙台幼年学校五年的后辈，又是邻县山形人，不能不有所理解，作为军人应该说是初次聚首。后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深厚。在北京的本庄少将和板垣的会合也同样是令人铭记难忘的。

板垣中佐于大正13年（1924年）6月就任驻中国使馆武官辅佐官，当时的武官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为处理时局而被提升为军事课长的林弥三吉少将。

本庄繁少将由弘前步兵第四旅旅长接替林少将之后任，是大正14年5月1日发令，到北京赴任是6月9日。《本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

“上午9时由天津启程去北京，板垣中佐7日晚在天津迎接，同车于下午12时半抵北京。代理公使、坂西中将及其他多数侨民来迎接。”

从这时起大约一年半，本庄与板垣密切合作，在多事之华北地方处理时局。当时华北战局正是张郭战争前后，北伐军占领武汉，中国正处于北伐即将成功之动荡紊乱时期。本庄和板垣的配合能够再次出现在满洲事变的关东军，真可谓不可思议的因缘。板垣中佐被任命为参谋本部部员是当年8月6日，据

〈本庄日记〉记述在那之后照样是东奔西走。还记载着8月中旬以后，还断断续续地为板垣夫妇举行了送别宴会。9月15日佐佐木到一中佐到任，9月17日下午7时半起为板垣、佐佐木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欢迎盛会，日华要人145名参加。9月22日上午8时25分板垣中佐偕同家眷启程归任，现在想起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

满洲事变前后——在满蒙施展之手段

酝酿——板垣、石原结成伙伴

昭和4年6月（7月中苏发生中东铁路纠纷）4日，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在长春名古屋旅馆以极大的热情论述战争史大观。听会者有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专修员加藤伶三工兵少佐（旅顺要塞参谋）、高桥茂寿庆大尉（关东军参谋）、管野谦吾大尉（关东军参谋）、堀内一雄及佐久间亮三两位大尉（部附）等。这是前一天自旅顺启程参加北满参谋演习旅行的第二天。

据石原将军很久以后谈起来，在长春旅馆里都已经过半夜，板垣大佐的房间里还点着灯，往里看时还正在埋头写笔记。

“都这么晚啦还不睡呀?”我问时他回答说：

“整理一下笔记，免得把你今天讲的忘掉了。”

石原中佐听到之后很受感动，他在想和这种人干工作必须专心致志的埋头苦干才行。

石原中佐是前一年8月定期变动时由陆大兵学教官调转来的。板垣大佐是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之后，接替河本大作大佐来处理善后的，是这年5月14日才发令的。当时大佐担任奉天驻军步兵第三十三团团长到任并不旷费时日。另外如前所述，既属同忧之士又都是刚从关东军出来不久的同伙。

板垣参谋到任不久，5 月下旬就召开了关东军情报会议。会议得出的结论是“炸死张作霖之后，满洲问题常此平息下去，今后有发生全面军事行动之可能。所以要彻底加以研究。”据说石原参谋所拟定的北满参谋演习旅行计划3 月份已经完成，还没等村冈军司令官批准，板垣大佐就顽强地付诸实施了。

炸死张作霖事件后的人事变动告一段落是在8 月份畑英太郎中将接替村冈长太郎中将（待命）到任之时。新司令官到任一切安排就绪，计划10 月在辽西地方举行参谋演习旅行。这次旅行与上次截然不同，是以完成关东军当前之任务为目的的。

统裁官板垣大佐、辅助官石原中佐，专习员是以驻军第十六师的幕僚为中心，采取对抗演习的方式。演习科目是〈新民渡河进攻〉、〈向锦州追击〉，然后是〈判断进攻锦州附近之地形〉。这时详尽地侦察了锦州兵营等，对日后石原中佐轰炸锦州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在察看了兴城温泉清太宗战死的战迹之后，演习转移到〈进攻山海关西部地区〉。这次进攻，直至后续兵团在敌人之背后秦皇岛登陆，挟击敌人，演习才告结束。

其后，关东军司令部的幕僚到天津、北京参观和华北驻军的幕僚联欢会餐之后在塘沽上船返回大连，全部日程才告结束。

在此之前，关东军和华北驻军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通过这次旅行双方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幕僚首脑人物之间似乎给人一种已经形成某种默契的感觉。

前夜——迎接本庄军司令官

昭和6 年开始，关东军首先研究了佐久间亮三大尉起草的占领地行政之研究即征服满蒙之具体方案。早春3 月，组织了各兵种学校的教官赴满鲜视察。板垣大佐对教官视察团作了题为“从军事上看满蒙”的讲演，竭力启发以武力解决满蒙之主张。

3 月是陆军定期变动之时。尤其针对年来关东军的悬案，成立了关东军调查班并调整阵容等都得到实现，这是值得注目的。4 月成立了名实俱备的调查班，任命竹下义晴中佐为班长，班员都是些杰出的人材，计有：臼田宽三少佐、佐久间亮三少佐、(八月冈部关一大尉)、江崎秀雄大尉、小松已三雄大尉、茂川秀和大尉、佐藤帮助三等主任会计、住谷悌一等会计。根据现有记录证明，板垣、石原两参谋对这些幕僚曾努力做了指导，贯彻强化了一朝有事一致应付的意图和体势。

这时候陆军中央有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在活动，所谓三月事件正在秘密进行，余烬未熄。4 月 14 日若槻内阁成立，南次郎大将接替宇垣大将就任陆相。

4 月上旬，第十六师由满洲返回日本，新派第二师进驻满洲。正值满蒙风云告急之际，第二师官兵士气非凡，大有意气冲天之概（笔者当时身为少尉也来到满洲）。各部队进驻之后，5 月下旬部队长会合一起，团长以上（独立守备队为营长）在金州指导演习之后，5 月 29 日，首先由菱刈军司令官训示，敦促关东军上下下决心做好准备，然后由高级参谋板垣以〈关于满蒙问题〉为题作了长时间演讲。〈石原日记〉里也明确记述了“5 月 29 日部队长会议，板垣大佐大演讲”。关东军内部已经形成文件〈满蒙问题处理方案〉的蓝本。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总第 25 辑）

石原莞尔的世界帝国构想
——“九·一八”事变背景的透视

苏振中

一、引言

“九·一八”事变至今已47周年，在这近半个世纪中，学者对于事变发生的经过及真相致力很勤，但对事变发生之根本原因只有少数学者各站在本国或本身的立场和观点试探过，而关于事变计划的主角，当年关东军的参谋——石原莞尔的思想背景等绝少提到，以致事变发动的日本人的根本构想至今不明；有将事件归因于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亦有人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刺激；或云中日民族思潮的冲突；或云中国民族统一意识被漠视，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事变的借口而已。

在石原的“世界的最终战论”构想中，是以战争为手段来达到征服世界，然后以日本为中心成立一个“和平”的世界帝国，以日本天皇来领导世界，谋求人类的“幸福”。在统一之前，战争是无可避免的，统一的最大障碍为美国与苏俄，为要取得东方的霸主地位，以图最后与西方的代表——美国进行决战，必须先征服苏联，而“满蒙”的占有是在对美苏持久战中重要的一环，盖“满洲”的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是走向世界帝国途中所不可少的。故石原的世界帝国的谋略包括三个重要部分，即满蒙的占有，对美做战以及对苏作战，今就石原的原始资料中耙疏整理，分析如后：

二、石原其人

石原莞尔，1889年（明治32年）1月生于日本山形县。1909年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毕业后再进陆军大学。在陆大毕业时，学校对他的评语是："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办以来最优秀的，"但对其为人却说："粗野且不在乎"。1919年——1921年（大正8年—10年）间随日本"中支派遣队司令部"驻扎于汉口，在此期间，与他旧识板垣征四郎过从甚密，遂建立了二人日后在"九·一八"事变的搭档基础。1922年（大正11年）又调回陆大担任兵学教官，不久赴德国留学，1925年回国，仍任陆大教官，1928年（昭和3年）8月10日晋升为"中佐"（中校），10月10日调关东军参谋，后兼作战主任，驻在旅顺，正是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后的4个月，也是"满洲青年联盟"成立后的1个月。当时，东北方面排日运动正如火如荼，石原身兼作战主任，为了应变，他随时准备对华作战。

士官学校与陆大的教育以及留德期间对于欧洲战史的研究，加上其后对于日莲宗的狂热，构成了石原对于战争史观、国家观及人生观的架构，因而造成了他狂妄的"满洲领有"论调。

石原在关东军中虽只是一名中佐参谋，但他兼任作战主任，又与板垣征四郎（时任高级参谋）为莫逆之交，二人密切搭配。由于石原"优秀"的头脑以及"犀利"的洞察分析力，再加上他对军事的知识和战争史的研究，遂成为关东军乃至后来陆军部中唯一的"计划制造人"，板垣对他依为股肱。板垣是前辈，他对石原的赏识是在1929年（昭和4年）7月，关东军实行"北满参谋旅行"石原在长春旅社中讲演"战争史大观"之时，当时板垣即留有深刻印象，所以后来对石原的计划言听计从，因而有"石原智谋、板垣实行"或"石原理论、板垣实力"的说

法，充分说明石原的构想是借板垣的政治力量，将日本国内的阻碍力量加以消除而得实现，显示了石原在关东军的地位。事实上当时在整个关东军中，对“满蒙”问题能提出具体计划的只有石原一人，所以又有“石原即关东军司令部”之说。

石原是日莲宗的狂热信徒，在他的“世界战争观”一文（1939 年 3 月）的第四章“佛陀的预言及其实现”中曾说，自大正 8 年（1919 年）左右即为日莲圣人的信徒。这对于他的思想影响很大。

三、石原“世界帝国”的思想架构

（一）“八纮一宇”的皇谟思想

在石原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文字很明显地说明日本必须以传统的“八纮一宇”的祖训，实现统一世界的理想。这“八纮一宇”相传是二千六百多年前神武天皇东征大业告成，奠都大和（今奈良）的橿原，并颁诏敕，中有一段说：

“上则以答天祖授予乾天国之德，下则以弘皇孙养正之心。然后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以为宇。”可说是神武天皇开国的宣言和理想。这一理想，历代相承，遂造成近代日本的建国精神，也是战前大部分日本人的人生理想。战前，许多国粹主义或右翼团体，诸如：爱乡塾、爱国学生联盟、亚细亚协会、恢弘会、关东国粹会、菊旗同志会、金鸡学院、兴国同志会、行地社、皇道会、大日本国粹会、国本社、黑龙会、樱会、七生社、神武社、赤化防止团、大正赤心会、日本产业劳动俱乐部、犹存社、老人会、浪人会、满洲青年议会、双华会、木曜会等，他们共同的宗旨都与“八纮一宇”四字有关，其中双华会、木曜会、樱会与满洲青年议会更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动团体。至于后来“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则完全建立在

“八纮一宇”的基础上。

（二）东方盟主、世界霸业的观念

石原莞尔其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帝国，世界之中不许有二君的存在，使普天之下、四海之民皆沐浴于日本皇威恩泽之中。用这种理念来治国，它的宗旨必定是富国强兵、雄飞海外的扩张主义。自丰臣秀吉的“大亚洲主义”，而至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后来果然吞并了朝鲜），竹越与三郎的“南国记”，宇都宫太郎的“东经60度与170度线的临终遗嘱”，以及1927年东方会议中，森恪所提出的东方构想与“满蒙计划”（即是“田中奏折”的内容）等，可说是一脉相承。石原继承了这些文化的遗产，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这种“霸业、盟主”的说法。

可以看出，石原的“霸业”欲望已表现无遗，这种欲望，在明治、大正及昭和初期的政治领导阶层和军阀中表现得特别强烈，他们想以世界总人口的1/30，世界土地总面积的1/350的条件，将其陆军发展为五强之一，海军则欲居三强之一，且更策划“五圈政策”。无一不在作称霸世界的努力。这种心理更影响到一般国民。石原认为，霸业的建立，必须以战争为手段，他说：

自从英国击败西班牙、荷兰而成世界政治的霸主之后，复兴法国拿破仑大战，其世界地位因而确定，此后数十年遂成为英国在国际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德国当法国拿破仑时代，境内四分五裂，其后因民族精神之提倡及统一运动之推行，1866年之役，新兴的普鲁士取代了老大的奥国而得到盟主的地位，至1870年代则俨然欧洲大陆的霸主而开始与英国竞争。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得法国之助，赢得胜利，英国在欧洲大陆有全胜将军之美誉。这是他研究战争史的结论，英、

德之霸业是各国战争而达到的，所以他认为日本欲要完成霸业，亦唯有以战争为手段。

四、石原“满洲占有”计划的政经论调

（一）经济论调

日本人对“满洲”的野心主要在其经济利益。盖自江户末年，日本受西洋炮舰的压迫而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引起了当时日本人的“危机感”，且日本人看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廷，受西洋束缚的痛苦，更加深了图强之心。当时，图强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效法欧美的资本主义做法——开拓殖民地、扩大市场以攫取经济利益，来促进国内的各项建设，故自幕末以来的“有识”人士，莫不主张“满洲利益”。石原在其“满蒙问题私见”一文中提到“满蒙”的经济价值时曾说：

满蒙的农产足以解决我国（日本）的粮食问题。鞍山之铁、抚顺之煤足以确立目前我国的重工业。满蒙的各种企业足以救济我国目前的失业者，并可开拓景气。满蒙的资源足以支持我国作为东方的代表，雄飞世界。

（二）政治论调

以石原为代表的日本政军阶层人物，企图侵占“满洲”的政治因素除了上述称霸的政治心理外，尚可以下列诸点来分析：

其一，他们认为“满蒙”地方非汉民族领土。石原在其“现在及将来ニ於ケル日本ノ国防”一文中曾说：

满蒙非汉民族领土，其关系勿宁说与我国（日本）更为密切。在民族自决立场上言，“满蒙”是满洲及蒙古人的“满蒙”。满洲蒙古人与其说是汉民族不如说是大和民族来得确切。目前此地居民，汉人虽占大部分，但其经济关系若与中国本部相较，与我国较为接近。

其二，“满蒙”为日本国防上的要地，为统治朝鲜、支配中国之根据地。石原认为欧战以来，世界形成五大强国的局面，且有更进一步成为一个体系之势，其统治代表在西洋为美国，她与东方的代表——日本的争霸之战已成定局。故日本应速获得东方代表资格，俾与美国一争。所以当前日本的急务是迅速扩张其势力范围。“满蒙”为日本人口问题解决之理想地，且其丰富资源亦为日本所必需，它是日本在国防上取得良好位置并“雄飞”世界的重要条件。德国今日（指当时）国防地之不安定是由于19世纪英国霸业之兴而获得了有利的国防地位而致之，然而，由于美国海军的发展，英帝国的国防则面临威胁，足见国防地位与霸业关系之密切。日本在北方有俄国虎视眈眈，南方则有英美的威胁，故而“满洲”地方的呼伦贝尔、兴安岭地带，其战略价值特别重要。如果日本能完全控制“北满”，则俄国东进就不容易。如果，日本能免除北方的威胁，则进取中国或南取南洋的意图可得发展。所以，“满蒙”的确是日本国运发展的重要战略据点。

此外，石原又认为“满蒙”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后，则朝鲜的统治可初告安定，日本若以实力在此一地区上，表示解决“满蒙”问题之决心，则可立于指导中国本部之地位，以促其安定统一，且进一步可确保东亚之和平。

其三，由于中国政治之混乱，及对中国立国精神之误解，促使日本军阀对“满蒙”更大欲望。石原在昭和5年（1930年）7月10日在致横山勇的信中曾大胆地怀疑中国人统一国家的能力，他说：

“军阀、学阀、匪徒、政商等一部分人，为了个人的利益，使中国民众连年在战乱中，生灵涂炭，良民遂亦变成匪徒。为拯救4亿人民于水深火热，只有与列强合作，进兵中国，以维持

治安，别无他策。”所以他说为进兵中国去解救4亿中国人是“日本人的天职”（引石原语）而进占“满蒙”则当然是一种正常“正义”行为（引石原语）。此种错误观念之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利令智昏”，另一方面是发自日本武士的“使命感”，还有一方面当然是中国自民国初年以来，的确是军阀官僚、匪党、政客相继用私为乱，使国家陷于长期分裂之中，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央权力亦未完全统一。再证之历史，历代的朝代更换没有一次不发生流血革命，革命成功，大肆烧杀，将前朝的一切（包括好的措施），全加破坏，不为全民着想，只为个人泄恨。这情形看在日本人眼里，自然产生一种“中国人没有统一能力”的感觉，进而发出拯救中国人的“义行”。这些事实，对于中国历史一知半解的日本政客军阀是一种很大的诱惑。石原与板垣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整个关东军甚至是整个日本军政二界对“满蒙”有野心的军人政客的看法。

此外受19世纪西欧殖民思想之影响，以及对中国民族统一意识之漠视等，亦是重要因素之一，此理至明，毋庸赘言。

综上所述，日本军阀政客攫取东北的企图，政治、经济为其重要基本因素之一，梁敬錞氏在其所著《九·一八事变史述》一书，将事变之原因归纳各说为真因三（中国民族统一意识被漠视，中日民族思潮冲突，中国外交政策之刺激），伪因六（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满蒙悬案三百余件，日本经济受压迫，满蒙统治权被迫害，中国非近代国家）；又提出其个人认为真因三（太平洋军事形势之转换，中苏关系之起落，满蒙分离运动之绝望）。而将经济、政治因素及人口等问题贬得毫无价值。此点值得提出重新检讨。笔者认为经济、人口、及政治等因素是事变的主因，日本新闻外交界于1931年至1934年所说之六因（即上述伪因），只是为了发动事变而制造的藉口，当然不足以

形成原因，而日本学者于战后所提之真因也只是表面的原因，如果日本军阀政客不是看中"满洲"的经济价值与政治利益而兴起野心，则中国人固然是一盘散沙，没有统一意识，也不干日本的事。中日民族思潮之冲突亦不构成侵略他国的要件。至于中国外交政策之刺激更不能作为发动事变的主因。梁氏个人所提之三个真因也只是促成事变的近因，进言之，因为日本有了根本上侵占"满蒙"的欲望，所以即令太平洋形势不转换、中苏关系不变，日本仍然要发动事变。

总之，"九·一八"事变之主因乃在于日本早抱着据"满蒙"为已有，将整个中国置于日本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先念，此种先念乃是日本自身之经济利益及称霸世界之政治企图所促成，因而观察时势之转变、制造藉口而发动事变，以达成其目的。

五、石原的满蒙统治方案

"九·一八"事变之前，1929年（昭和4年）7月，石原等在参谋旅行途中于满洲里说明他的"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显示日本必须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计划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为"平定"：先用武力扫除军阀官僚，没收公私财产，以巧妙方法将中国军队解除武装，讨伐逃兵及土匪。平定所需费用由没收所得及税收支应。

第二为"统治"：其方针为在军政下确立治安之维持，"日、鲜、支"（中、日、韩）三民族自由竞争，但以日本人经营大企业及智能事业（必须运用才能来经营的事业），朝鲜人开拓水田，中国人则从事小商业及劳动工作，各发挥其能力，共存共荣，行政上根本方针为尽可能避免急剧变化，维持现存体制。

治安方面以守备队为主体，守备队之活动以铁道线路为优先，其次在各县城配置若干兵力。各地方设置自治警察若干，以监视行动。宪兵直属总督，必要时得受命于道尹。财政方面以间接税为主，成立征税机构，支出预算军事费为6 500万日元（守备队2 500万；驻扎师团4 000万）；另行政费若干。金融产业方面交通、电信事业利用“满铁”会社经营之，大体上采用自由发展方式，但为战争需要，应研究对策加以必要之统制。司法方面采二审制度，道尹所在地设置法院。

第三为“国防”：用四个师团兵力以防备苏俄之侵入，对苏作战中飞机占重要地位，平时在四个师团中可减少若干兵力，增加飞行队若干；在北满呼伦贝尔一带作战，以机械化部队较为有利。以上三方面详细计划由各人分别调查草拟。

这是石原“满蒙占有”的原始计划，但事变发生后的9月22日，他改变了“占有论”，而要成立一个新国家，其原因据石原称乃由于建川美次（当时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只赞成建立一个亲日政权，石原遂不得不于9月22日与三宅光治（关东军参谋长）、土肥原贤二及板垣征四郎大佐、片仓衷上尉等会商，作成“满蒙问题解决策案”。

（摘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六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为制订侵占东北作战计划的“参谋旅行”

刘庭华

关东军参谋的三次旅行与以武力占领东北阴谋计划的形成

关东军以武力占领东北的阴谋计划，是随着关东军参谋三度旅行而形成的。关东军为公开武装侵略我国东北，做好军事侦察方面的准备，从1929年7月到1931年7月的两段时间里，先后组织了三次所谓“参谋旅行”，实为到中国东北各军事要地进行军事侦察，制订作战预案。

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旅行”。由板垣、石原统领，专习员有佐久间亮三大尉等5人。其企图是研究在哈尔滨附近进行攻防作战问题。7月4日，石原到达长春时，以《对现代战争的观察》为题作了讲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的提案，并委托佐久间亮三对此进行研究。因此，石原长春之行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7月5日，石原在由长春至哈尔滨的车中，又提出了日本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在解决满蒙问题案”。

第二次是1929年11月的“南满辽西旅行”。此次旅行的目的是研究在锦州附近进行作战问题。他们在“奉天城攻击要领”及“弓长岭夜袭”研究已有成案后，遂开始进行新民屯渡河、向锦州方向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的研究。

第三次旅行在1931年7月，行程仍是在“北满”，以“对苏作战结局的研究”为目的。7月11日石原、板垣等人从旅顺出发经郑家屯、洮南、昂昂溪、伊力克得、海拉尔到满洲里，归途哈尔滨，20日返回旅顺。

这期间，板垣和石原委托佐久间搞的《对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草案，也于1930年9月完成，并在12月通过关东军正式付印出来了。这个草案把对“满蒙”占领的统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预计半年到一年，作战初期，将部分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二个时期一年至两年，计划占领整个东北，并拟将东北三省当时收入的（1亿2千万或1亿3千万元）40%至50%作为关东军军费开支，不足部分可以由“帝国军费填补”；第三个时期，预计东三省将收入2亿元，计划将其中的1亿6千万元至1亿7千万元充作统治费用，产业以农业为主，工业在不威胁日本国内工业的范围内，发展依靠当地原料的工业。总之，贯彻“以战养战”的原则，准备长期占领“满蒙”。

此外，日本军部亦于1931年6月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该计划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以及今村钧等，反复研究而成。这个大纲明确规定了关于侵略东北的步骤和措施，其主要内容如下：

1. 缓和张学良排日行动的工作由外务省主持。

2. 排日行动尚不炽烈，不作军事行动。

3. 满洲问题的解决，拟先取得国内外的谅解。因此，陆军大臣应该努力通过内阁会议使各大臣都能知悉当地的情况。

4. 陆军省军务局应与参谋本部情报部协力，使全国国民了解满洲的实际情况。

5. 军务局情报部应与外务省关系局加深联络，使各方友好国家备知满洲排日之实况，俾日本行使武力时，能给予谅解，不出来反对或给日本施加压力。

6. 军事行动所需兵力，由作战部与关东军协定之。

7. 国内外谅解政策之施行约须一年（至少到明年春）。

8. 在上述期间内，关东军必须隐忍自重，力避事故发生，如有发生亦宜局部处置，勿使扩大。

1931年7月，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面授机宜，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以，它实际上成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行动的原则纲领。无疑，也是对关东军以武力占领东北具体计划的支持，东京军部少壮派与关东军少壮派虽然在"满蒙"问题处理步骤与时间上有异，但在以武力占领东北的主张上却完全相同。

策划牵制张学良军在关内的阴谋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制定一项计划：关东军参谋新井匡夫和日本航空公司大连支所长、预备役大佐麦田平雄策动阎锡山、邹鲁，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策动石友三，结成阎锡山、石友三和韩复榘"反张（学良）联盟"，以便向张学良夹攻，企图把张学良军牵制在关内，以此作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行使武力的准备。这一阴谋计划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长三宅、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的支持，为石原、板垣所赞同。1931年8月5日，麦田驾驶的飞机把阎锡山从旅顺送往大同市，阎锡山得到了正在沈阳的邹鲁的支持和配合。

（摘自《"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阎锡山和“九·一八”事变

赵承绶

阎锡山留学日本时，正值明治维新末期，他十分羡慕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就竭力结交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军国主义分子。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早有侵略我国的野心，正在有意识地培养汉奸“种子”，阎锡山这个自私自利，爱财如命的人，自然成为意中的对象，便多方培养，灌输亲日思想。阎锡山更是想效法日本军国主义做法，企图回国后达到他统治人民的欲望。两相需要，自然就会紧密勾结。罪恶之根从此种下了。

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在中原进行了一场大混战，结果阎锡山战败，不得不被迫离开山西，逃居大连。阎锡山选择大连这个地方，有他的用意，一方面仍然可以就近秘密控制山西；另方面可以进一步和他的日本主子勾结，主要是想凭借日本力量，图谋东山再起。在大连期间，经常由其亲信靳祥垣、宋澈、李庆芳等极端亲日分子，不断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勾结，干出卖国家民族的罪恶勾当。

1931年，我仍然充当山西军队的骑兵司令，驻在山西大同。是年8月4日，随同阎锡山逃往大连的侍从副官张逢吉（寿阳县人，自幼即充当阎锡山的贴身侍从，为阎的心腹，太原解放前夕，跟着阎锡山逃跑，现在可能仍在台湾），突然来到大同我家中。我知道他来必然有要紧事情，所以立刻引入住室，问其由来。张马上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红布条，上边有阎锡山的亲笔字，

说即乘飞机回省，要我密接。张逢吉接着和我耳语："总司令（指阎锡山）明天就坐飞机回来，请司令（指我）务必亲自去接，并且要严守秘密。"我问："你何不早来两天，我好早作准备。"张答："这是总司令计划好的日期，早来怕泄露了不好。"第二天，我和张逢吉一起坐上轿车亲到大同飞机场等候（当天我的汽车不在大同），时间很久，飞机才到，降落后，阎锡山身穿绸大衫、头戴草帽，还戴着一副黑色眼镜，俨然一个舞台上的汉奸形象，从飞机上走下来。我立即上前迎接、敬礼，阎微笑和我握手，随即上车，坐在轿车里边，我和张逢吉分坐车前沿左右，遮住阎锡山，以避免人看见。当时，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既高兴阎锡山回来，又怕蒋介石、张学良知道后问罪。当晚，阎就住在大同城内户部角新教巷二号我的家中。我把家里人都临时迁到外院，把里院腾出专供阎居住，并严禁家人进入里院。我曾试探着问阎："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阎说："张汉卿自顾不暇，哪顾上管咱们的事，他也管不了咱们。我是不怕他们的，要怕他们还不回来呢！只要你们好好整顿队伍，有了力量，就好办事。事情不能没有（意指蒋、张找麻烦），但他们绝不能把咱怎么样。"言下之意，好像要让我知道有一种"力量"在后边支持他，我自己也从阎锡山坐日本军用飞机回来一事，看出是日本人在做他的"后台"，所以他才有这样不在乎的口气。阎锡山所谓的"张汉卿自顾不暇"一语，是阎锡山当时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明。

（摘自《山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我送阎锡山回山西

麦田平雄

“我当时任日航大连飞机场长。”

“石原参谋响应天津机关长土肥原关于对石友三进行工作的建议，提出‘坚持夜袭直到保定为止’的方案，阎锡山本来的方案是攻打北京，因而未采用，却孤军袭击天津，结果失败。”不得不逃到大连。

“在我军的怂恿下，阎锡山逃出大连。1931年8月4日夜间，由我将其带出。搭乘无标志飞机于5日拂晓前起飞，11时左右在大同着陆。我和阎当即告别。不意，为了汽油及其它问题竟被带到军法会议监察院。午后3时，好容易才获得自由。次日夜始返航大连。”

“土肥原机关长虽说未能达到目的，但可以说是取得拖住张学良部队的效果。石友三日后虽在失意中度过一段时光，但至1933年，再次成为板垣天津机关长手中的一个角色。”

（摘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译稿《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孕育危机的东北

古屋奎二

一、“九·一八”事变前夕

中国的东北，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一贯的侵略目标。

日本抱着如果没有东北的铁与煤，他就不能达成工业化，如果没有东北的农产品，他就无法自立的念头，故而认为有必要征服东北，将之属于日本支配之下。

因为是日本怀有这样的奢望，所以中、日两国在东北发生冲突，可以说是不可避免之事。

二、日军部蓄意侵华

1929年11月20日，新任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协商修订中日通商航海条约事宜而返回日本述职。

佐分利自杀带来恶兆

“佐分利贞男在箱根自杀”的报导，映入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眼帘时，是在他归国不久之后的29日。当时传说：佐分利之自杀，是自由于他对中国的稳健外交意见未能为日本政府所接受——这不啻是中日关系前途的一种预兆。对于寄予期待的佐分利之死，王正廷表示了“非常遗憾”的吊唁之意。

佐分利贞男是在和中国政府方面交换了意见之后，准备对日本政府作重要的进言而回国述职，但这个当口，正在伦敦所举行的海军军缩会议而极度繁忙的外务省分不出时间来和佐分

利商洽中国问题。于是他的自杀，乃使日本因而失掉了转变对华政策的机会。

佐分利贞男未留遗书，以致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各种揣测出现。

佐分利是于11月28日晚间在箱根富士屋旅社寄宿，他曾表示明天要去东京，嘱咐服务员早一点叫他起床。并且在上午7时叫理发师来。

可是，第二天上午当服务员去叫他的时候，他右手握着手枪，击穿了太阳穴，死在房间里。

据重光葵所著“外交回忆录”——佐分利就任驻华公使，中国方面颇为欢迎，产生了对日空气已见改善、排日运动趋于缓和的效果。佐分利在和中国方面接洽之后，携带修订通商协定问题返国，和外省协商，但很难得到结论而延迟返任。于是，对佐分利寄于期待的中国方面，开始为之焦躁不安；好不容易才见好转的对日感情，看来又有冷却的光景。

正因为佐分利是在这个当口自杀，所以中国方面也大为惊诧。至于他自杀的原因，则议论纷纭——有说是在政治夹缝中左右为难；有说是受到胁迫；有说是出于厌世。

又据重光葵在其另一著作“昭和的动乱”中提到：“佐分利公使在东京滞留颇久，其后自杀辞世，颇不乏人认为：是由于政治因素，使他的意见不能实行的结果。”

又外相币原喜重郎则更指出：“右手拿着手枪，射击左太阳穴，说是自杀，怎能相信。”

继任人选发生纠葛

在佐分利贞男自杀之后，关于继任人选问题，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了一点纠葛。

此时，日本拟调驻土耳其大使小幡酉吉，出任驻华公使，征

求中国政府同意，小幡过去曾任驻华公使馆参事（公使为日置益），是在交涉二十一条之际，公然蔑视中国态度的外交官。

在中国政府的立场而言，对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能给予同意的，尽管日本政府带着威胁地要求接受，但国民政府还是予以拒绝，而且民间反对声浪高昂，也纷纷电请政府断然抵制。结果，日本政府终于不得不放弃调任小幡酉吉的念头，而于1930年元月以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兼代公使职务。

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旋即与重光代办进行关税决定的交涉，至5月6日才终于协议签约，虽则是给予日本在3年内对于特定商品的税率不予变更的条件，但中国方面自此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溯自1925年在北京举行的关税会议中，中国提出要求以来，已经历时5年之久。

币原外交遭军方排斥

象币原这样的外交态度，在日本国内则被认为是“软弱”而形成了问题，军部方面以及对华强硬论的人士们，对于币原外交心怀不满，反更背道而驰，趋向侵略路线。

加以当时世界经济，正遭受着空前不景象侵袭——这就是从1929年10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落开始，所造成的世界性恐慌。而日本对中国输出，则在世界恐慌之下，再加上受到济南惨案以来中国社会排斥日货的影响，以致极度恶化。日本为了要扭转不景气的境况，乃更增加了把富有资源的中国东北当做是“日本生命线”的重视；于是，在日本的军部中便日渐茁长了必以东北为所谓日本的“王道乐土”之论调。

在截至“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对“满洲”的投资达17亿日元，占其国外总投资额的60%；对于整个日本经济具有极大影响力。

又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据李顿调查团报告——日本

对中国输出额，以1925年的4亿6千8百万日元为最高；而其后则一直下降，及至事变前一年的1930年，则降落到了2亿6千万日 元。另一方面，在伦敦所举行的海军军缩会议，也是日本军部不满的原因之一。当时，决定美、英、日海军舰艇为“五·五·三”比率的军缩协定，是在1930年4月签订，对此不满的军部，乃批判滨口内阁对外怯懦，并认为是“干犯统帅权”，酝酿出政治问题；而成为在这一年11月右翼暴力分子暗杀滨口雄幸首相的背景。

正当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在东北又发生了一个颇大的纠葛——就是葫芦岛建港工程问题。

本来，这只是中国国内问题，可是，日本却硬找借口，说是侵犯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尤其是南满铁路的利益。

三、日方密订侵华策略

葫芦岛筑港，是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为了对抗日本经济侵略的一个计划。

张学良进行葫芦岛筑港

1930年元月24日，由北宁铁路局和荷兰一家建筑港公司签订了契约，建筑经费达640万美元，向美国及其他方面洽借。张学良在考虑葫芦岛建港之外，并打算在东北地区建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线，其经费亦拟商借美、英资本。

过去向东北运输物资，是在日本租借地的大连港起卸上岸，再经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运转；但如在葫芦岛筑成新港，而又能建好新的铁路网，则以后即可以葫芦岛为卸货起点，好由中国方面经手转运。

谁知认为南满铁路为其“生命线”的日本，则以：“此一计划，将使中国铁路包围南满铁路，以打击大连港，是有在东北

排斥日本之意。”而表示抗议。

当时，由于世界性的经济恐慌，中国东北的特产大豆、豆油、豆粕价格暴落，输出激减；又与大豆同为东北主要物产的煤炭，也为之停滞。因此，以输送大豆和煤炭的运费占其收入90％的南满铁路遂陷于营业不振，1931年，出现了自创业以来的最高赤字——340万日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学良所采取的对日强硬政策，给日本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在以军部等方面为中心、而强调危机意识的政治运动中，更高嚷出“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口号。

板垣策划占领东北

1930年11月，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管理；北宁、四洮、长春三铁路改为国有；同时葫芦岛港湾建设也隶属于中央指导。

至此阶段，日本对于东北的武力侵略计划，更迅速具体化。

其策划中心，为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而推动者则为该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上校）和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

板垣原任驻奉天日军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团）长，于1929年5日调任现职（其前任河本大作因主谋炸死张作霖而被免职）。自板垣到职之后，他参加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便开始策划在东北发动全面军事行动的谋略。

在此之前的上年12月，实则已经有了一个由石原莞尔作成的“解决奉天闪电战术秘密计划”；但板垣则更在作全面战争的想法，打算设计包括东三省北部地区在内的作战计划。

板垣的第一步骤，是“北满战略旅行”。

1930年7月3日，板垣等日军参谋团由旅顺出发，经过长

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泰来、洮南等地，作了13天的侦察旅行；特别对于在哈尔滨附近的攻防战，更有缜密研究。

然后，由石原莞尔依据旅行观察，整理了一个完全占领东北的方略——“满蒙占领统治研究”，其要点为：（一）平定阶段——将中国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全覆灭。（二）统治阶段——使朝鲜人经营水田，中国人经营小商业，日本人经营大企业。（三）国防阶段——使获自东北的收入，足够扩充占领费用而有余。

此研究，是石原莞尔在东三省北部旅行中命令关东军司令部的属员佐久间亮三大尉（上尉）经办，佐久间在一年之间埋头研拟，于1930年9月最后定稿。当时，三宅光治参谋长根本未加审核，只是说了一句“会管用吧？”就盖了章；石原莞尔则含笑表示：“管用！还得要两年。”

翌年（1931年）5月，板垣更整理了“满蒙问题”处理案，包括有：（一）蒙古独立案；（二）间岛独立案；（三）北满骚扰案等内容。其中“北满骚扰案”，乃是要在东北制造反日大暴动，俾引以为关东军出兵的借口——可以说就是“九·一八”事变作战计划的底稿。

东京也在进行密谋

不仅在东北当地的关东军如此，并且东京方面也同时进行着各种阴谋，其中之一就是“灭亡满蒙秘密计划”。

这个秘密计划，是于1930年12月7日在拓务省大臣办公室聚集了拓务大臣松田源治、满铁总裁仙石贡、满铁理事木村锐市暨外务次官、参谋次官等协商决定的。

他们分析东北的情况，认为：“张学良与蒋介石乃一时性吴越同舟之妥协，预料两者之间将有战争，……斯时，为张作霖第二之张学良政权会为之瓦解，且有第三、第四、第五之张作

霖接踵而起，分制东北之地盘。”于是，乃决定计划如下：

1. 奉方（张学良）欲将满蒙外交权名实皆归至南京，吾人取外宽内严的方法以反对之；现在仍以张学良为外交负责长官，并以其为交涉对象，保持帝国特殊地位及权益。2. 对奉方铁路网之建设，阻其实现；特以迫战求和策略，永保南满铁路与大连港之繁荣，俟天赐机会到来，可达帝国对满蒙最后之目的。

所谓“帝国最后之目的”，显然是以武力侵略东北与蒙古的意义。

四、日蠢蠢欲动

当武力侵略“满蒙”正在逐渐形成为“既定方针”的过程中，日本军方以中坚将校为轴心之急进分子的活动，也益见显著。

急进军人图发动政变

最好的事例，就是急进将校在1931年所发动的苦迭打——“三月事件”。

三月事件，是由以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中校）为中心的“樱会”所策划。樱会，是中佐以下的陆军现役军官们为会员的秘密结社。他们的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后之目的；为达此目的，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

他们觉得一旦在“满蒙”行使武力时，值得担心的是国际舆论，尤其是苏联的动向。在他们的心目中——“软弱”的币原外交，是不可能突破国际批判的。故而他们所着眼的“国家改造”，乃是要把军事色彩涂布在政治上，确立一个“以军领政”的政权。

对于樱会的急进论，有民间的右翼分子大川周明等人加以赞同。

他们所策划的“苦迭打”，是在打着这样的主意：3月20日前后，征求无产政党合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万人大会。会后，全体游行示威，前往国会，同时，以右翼浪人闯入警视（察）厅，造成混乱状态；立即借此时机，出动第一师团（师）包围国会，在军队的压力之下，由陆军少将小矶国昭和建川美次进入会场，强迫要求现内阁下台，并实现以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相的内阁。

可是，这个苦迭打由于动员群众的计划失败，加以他们所推戴的宇垣一成在即将行动之前改变了态度，以致胎死腹中。

在军方如此冲击之下，“币原外交”也就面临了限界。

治外法权谈判决裂

于是，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驻华代办重光葵之间所进行的撤废治外法权交涉，卒于4月间决裂。先是，中国曾在1929年12月向国外宣布：“取消在中国领土内的一切领事裁判权”，进而收回租界与租借地；但日本方面则一直强硬主张——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维持现状，乃终于达不成协议。

据重光葵“外交回想录”，对于交涉决裂的背景，大致有如下的说法：“由于张学良所采取的反日政策、葫芦岛建港问题，一连串的排斥日本人运动等因素，使中日之间的空气，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军缩问题等契机，以致日本国内实在欠缺推进币原外交的背景；而相对地，中国方面在旺盛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动之下，则正进行着革命外交。”

“过去，中、日之间的交涉，似乎有一种暗默的谅解，就是不涉及微妙的‘满洲问题’；而首先修改有关中国本土的不平等条约，使在两国之间造成良好空气之后，从而进行‘满洲问题’之解决。”

“可是王正廷的革命外交则非如此，对于日本在‘满洲’的

权益，和他国一例看待，并且要在短期内收回。”

“1931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中决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对各国表示由单方面废除的决心，似乎有迫使实行的态度。”

关东军伺机行动

对于日趋迫蹙的中、日关系正在侧目注视中的日本军部，于6月12日成立了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为委员长的一个委员会，委员有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及该课课长补佐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暨支那课长重藤千秋、欧美课长渡久雄6人。

这个委员会整理出一个“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其内容，是在“以一年为准备期间，然后再进入军事行动的方针之下，约束关东军在此期间内应暂时隐忍自重”；并对列强及日本国内进行“军事行动是出于不得已”的游说与说服工作。

同时在6月间，南满铁路总裁改由对华强硬论者的内田康哉出任。内田积极主张：（1）日本负责维持东北治安。（2）日本应依其特殊关系，确保在东北经济上的自由。（3）南满铁路采取两大干线主义，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实施吉会铁路的筑路权。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对于内田的主张也终于予以同意。故在当时日本新闻界一致报导：“币原外交”，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驱向“积极外交”。

日本实则已经进入了战争的准备状态。

在南满铁路的主要车站，借铁路运输业务需用仓库的名义建筑军队营房；又在沈阳的满铁附属地工厂及住宅构筑防御工事，使之堡垒化。

日本在大连的警察本署，组成了特务纠察队8个队，进行间谍活动；城市和乡镇的日本人商店，也都成了关东军司令部的

特务机关，或者是由持有武器的在乡军人所经营。

“满洲日日新闻”的主持人佃野繁胜，也发表“满蒙之重大化与实力发动”一文，鼓动言论：“中国的反日政策，是和敌对的行动并无何等差异。所以，循普通外交交涉，以图维护我满蒙权益，求和平发展，实属于事无济；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实力的发动。”

到了这个程度之后，所剩下来的，就只是等待时机了。

此时，接连又发生了两个纠争——“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就是这两个事件，点燃了关东军所装置的“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

（摘自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

乌云笼罩的事变前夕

“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

何柱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深重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几乎是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了整个东北，益发助长了它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当时我虽然不在沈阳，但根据事变前后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忆述如下。

事变前的国内形势与东北概况

“九·一八”之前，蒋介石正热衷于“第三次围剿”，集中兵力向解放区进攻，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是导致“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原因。

那时的东北情况，表面上似乎稳定，实际上已危机四伏，尤其是军事上的弱点，更暴露无疑。首先是东北地区辽阔，而兵力比较分散。其次是东北的两条主要交通大动脉，操于日、俄之手；一条是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自满洲里至海参崴）；一条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自长春至大连），这条铁路虽然路线不

长，但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况且日本根据条约[①]，有权在铁路沿线驻扎重兵，这就不啻在东北的心脏地区插入了一把尖刀，使我军长期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概况。

张学良接受蒋介石不抵抗密令的内幕

张学良于1931年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枪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张学良下的一道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① 此处有误，并无此条约。

当时敌我的兵力部署

日本关东军，实际于7月1日就开始积极的军事行动，如调整指挥系统，加紧战斗演习等。到8月1日，又开始集结在乡军人，进行夜战训练。他们的磨刀霍霍，与我们的麻木不仁，正好成了个鲜明的对照。

在“九·一八”前，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10 400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警察（满铁沿线的“黑帽子”及其狗腿子）约3 000人，共计约兵力2.34万人左右。日本的所谓在乡军人，就是在日本内地退役不久的现役军人。日本军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把他们安排到满铁沿线各站的铁路职工附属工厂工作，在“九·一八”事变时，他们都参加了战斗，有的还当了参事官和附参事官。等到伪满洲国傀儡登场时，这批人更加飞扬跋扈，有的当了副县长或其他高级官员。（伪满洲国的体制，是由日本一手制订的，明文规定：一切政府官员，正的都是中国人，副的一定要由日本人担任。实际上正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副的。）

“九·一八”事变前，我方在东三省的兵力，实际达30万人。除了进驻关内的部队外，在东北的军队还有26万多人。其分布情况为：沈阳北大营8万人，东山口4万人，辽阳、郑家屯3万人，锦州2万人，吉林及黑龙江两省约各5万人，总计在东北的正规军，达27万人之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及全国人民，对日军的狂妄侵略，无不义愤填膺，群情奋激。国民党当局，如能因势利导，命令东北全军努力抵抗，则2万多日本关东军，不难给予致命打击并全部歼灭之。

写到这里，还应当补叙一点关于东北军工工业的设备与损失概略。东北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火药厂等，是张作霖

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我国最大、最新的军火制造工厂，所有设备，均购自德国。当时投资累计已超过1亿元银币，一切由杨宇霆总其成，有东方“克虏伯”的称号。“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就被日军全部占领，库存的步枪8.7万多枝，机关枪4 000多挺，飞机200多架，及所有的粮秣弹药等，均被日军抢掠一空。更为痛心的是，以后日军所用的主要武器，大半取给于此。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六辑）

“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阴谋活动

王子衡

我从1919年起，同日本众议院议员永田善三郎（“九·一八”事变时任日本海军省政务次官）在大连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关东报》，并任总编辑。“九·一八”事变以前，我还在辽宁省政府兼了一个咨议的名义。因此，我同日本军政各界人物和东北方面的臧式毅、于冲汉、袁金铠等亲日分子皆有联系。

永田善三郎透露的日军侵占东北的消息

1931年7月发生所谓“中村事件”后，日本军人、政客、财阀、学者等前来我国，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旅行视察，特别频繁。8月中旬，永田善三郎到中国各地旅行后，归途路过大连，在大和旅馆找我闲谈。他开口就说：“时机到了。”我问：“什么时机？”他说：“也可以说是你出头露面的时机到了。”我越发不得其解，追问：“我怎样又会出头露面呢？”他说：“我

知道你十几年来不是曾经奔走奉天（沈阳）、北京各军阀官僚之间，总想弄个一官半职，在政治舞台上露露头角吗？我看你这个愿望在最近的将来可以实现的。”我说：“你的话我始终不解，请你明白说了吧。”他说：“我今晚无事，我们到星乃家（日本料理馆）喝酒去。”

当晚，我如约前去。永田和我边饮边谈，他突然激动起来，拍桌骂道：“张学良这小子太混蛋了，这么大的满蒙地方不去好好治理，却勾结蒋介石，跑到北京胡作非为。我看他的命运将和他老子张作霖一样，永远回不到奉天（沈阳）了。他仇视日本，欠下日本的债务不还，订立条约也不履行，还想拉拢英美来抵制日本，因而对于日本人不理不睬。我这次到北京时，本来和他已事前约定接见时间，但是届时他却派出他的秘书叶弼亮对我说，‘副司令现有紧要事情，不能见你，你如果有什么话，请告诉我，我可以转达’。岂有此理，张学良太骄傲了！最近我们日本军人、政党、财团、学者们来中国视察，常常受到他这样的待遇。我看他大祸临头，还不自觉，他是下决心不要满蒙的老家了。”

我说：“照你说，东北将有什么政变吗？日本将参加这个政变吗？”他说：“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学者和各方面的舆论，已一致认为满蒙局面必须改变一下，不然日本在满蒙的生命线将遭到危险，受到损害。”我说：“那么说，日本将积极参加这个政变，这样做，不会惹起国际问题吗？”永田说：“满蒙这块地方，是日本流血换来的，是日本的生命线，只有日本有权利管理它，其他国家无权过问。如果没有强大日本存在，整个满蒙早已沦亡了，不归俄国独占，也必成为国际共管，早已不归中国所有了。张学良这小子妄自尊大，胆敢不理日本、仇视日本，最近杀害中村大尉，还想狡赖，敷衍行事。日本朝野，怒

不可遏。你想这事能放过去吗?”我说:“那么,继张学良之后的将是谁呢?”永田说:“你先不必问,到那时自然会明白的。中国人应该想想,如果没有日本的明治维新,打败满清,战胜俄国,成为今日的强大帝国,不仅满蒙早已不保,即整个中国也早已完全成为列强的殖民地了。老实说,从我们日本人看来,满蒙非中国的土地,中国也不成为国家。你想想,世界上哪有一个独立国家里会有外国的租界、外国的军队、外国的治外法权、外国的工厂矿山和铁路等等存在呢?中国哪一次政变,没有外国人参加,哪一个政党,没有外国人在后边撑腰呢?满蒙是个富饶的地方,但近年来叫张作霖父子搞得民困财竭,而张学良丝毫没有悔祸之意,却袭用中国历来远交近攻的老一套政策来对待日本,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况且苏联继承俄国的侵略政策,逐年向满蒙扩张势力,企图赤化整个中国,影响所至,祸及日本,日本能够坐视不理吗?以日本强大的兵力,一星期内可以拿下整个满蒙,两个月内可以拿下整个中国。现在所以不这样做,一方面是等待张学良翻然悔悟,跟日本亲善合作;另一方面是不忍中国人民陷于巨大的兵祸。但是,现在已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这次到中国各地视察,看到中国形势日非,新旧军阀火并恶斗,连年不休,去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互相混战,还没有结束,而张学良又于9月卷入战事,帮助蒋介石攻击阎冯联军。现在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和广东政府的陈济棠、李宗仁、孙科又发生新的战争,而阎锡山的败将石友三投降张学良后,现又瞅上机会,勾结广东政府,通电反对张学良,顺着平汉路进攻天津。我看石友三将军一定会胜利,因为他现和我们日本很要好,又和张学良的族弟张学成联合一起。关里关外,两路夹攻,张学良老家的地盘就发生动摇

了。但是，张学良还没有什么觉悟，却把关外的残兵烂将大批地调进关内参加内战，攻打石友三，东北防务非常空虚，如果日本略一举手一投足，满蒙天地不仅已非张学良所有，恐将也非中国所有了。”

“在满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社”

永田接着就谈到了“在满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社”这两个组织的由来。他说：“满蒙这个地方，日本于日俄战争时不仅牺牲了无数的宝贵头颅，流了大量的鲜血；在战后又投下了20多亿元的资本，开发满蒙产业，东北经济才有像今日这样的繁荣，中国人的生活才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张学良得有今天这样的势力，也就是他继承他老子张作霖的遗业，直接间接地受到日本的支援的结果。至少张学良应当饮水思源，感激日本才是。但是相反的，他却蔑视日本、仇视日本。例如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原是日本外务大臣、伯爵贵族，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很高，也是国际上知名之士。他在今夏就任满铁总裁，初度巡视满铁沿线各地，到奉天时拜访中国军政各方面人物。张学良虽在北京，不得会见，而其代理人荣臻、臧式毅等对他很冷淡，没有什么招待。这不仅对不起内田总裁，也是日本的耻辱。在国际礼节上，这也是说不下去的事情。全体满铁五万多名社员都因此而异常激愤。”

永田告诉我说，内田康哉受到中国方面的冷遇，非常愤怒，回到大连满铁公司号召满铁5万青年社员要认清时局，提高警惕，组织起来。因此满铁日本青年社员包括在东北各地的日本青年在内，多响应内田的号召，以满铁公司卫生课长金井章二、文书课长中西敏宪为首，组织了一个“在满日本青年联盟”，从大连满铁公司本社到长春沿线，包括各方面日人在内拥有会员

1万多人（本书编者注：此处有误，满洲青年联盟1929年即成立了）。他们经常开会，通过决议，发出“满蒙是我们日本人的满蒙”，“满蒙是我们日本大和民族的生命线”，“日本今天在满蒙的地位是大和民族用鲜血换来的，不容他人蔑视，更不容他人干涉，”“我们以鲜血换来的满蒙，现在须有以鲜血保护它的决心”，“经营满蒙，开发满蒙，是我们大和民族的神圣天职”等等口号，广泛进行宣传鼓动。

同时满铁社内的日本青壮社员，又有一个以笠木良明为首的“雄峰会”组织，约有会员1 000多名，都是专业及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大亚细亚主义者，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整个亚洲民族的历史和它的命运及现在所处的境遇。他们常说：“拯救亚洲各民族的任务，划时代地落在日本民族的肩上。日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人应觉悟到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领导亚洲各民族团结起来，打击无色人种的侵略尤其赤俄的侵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容许无色人种在我们卧榻之旁鼾睡。”

至此永田又对我说：“你可能看到在满铁的《协和》杂志上常常载有‘亚洲是我们亚洲人的亚洲’、‘打倒白色（白种人）的侵略’、‘打倒赤色（苏联）的侵略’、‘亚洲民族的命运与大和民族的责任’、‘匪人之子（指张学良）是否应为满蒙的统治者？’‘哪个民族对于满蒙最有发言权？’等等为题的文章。王先生，你要认识到日本这些青年都是有志之士，这样喊叫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青年联盟、雄峰会这两个组织的分子后来多为伪满的各部局省市县的首脑者）。我看满蒙局面将有巨大变化，希望你注意形势，要抓住机会露露头角，一展平素胸中的怀抱，不是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应有思想吗？我所以说你的出头露面的机会到了，理由就在于此，哈哈。”

我也笑着说："谢谢你的关怀。听了你这番话，我对于目前中国的形势已明白了一些。日本田中义一大将的奏折的精神，我也是知道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实现日本'大陆政策'的时机吗？实现起来不会惹起国际问题吗？日本在军事上已有充分的准备吗？"

永田冷笑着说："你的脑筋太迟钝了，你对日本实力的估计太轻视了。现在这样有利于日本的国际形势，日本一定会抓住的。首先说，日本在满洲的兵力已有4万多人，分驻在旅顺、大连湾（柳树屯）、海城、大石桥、沈阳、铁岭、公主岭、连山关等地，控制了整个辽宁、吉林两省的各重要城市和铁路线。以这样强大的日本兵力，对付张学良现留满洲的土鸡瓦犬般的残兵烂将，真像摧枯拉朽一样，48小时以内可以占领整个满蒙。加上朝鲜驻有日本陆军3个师团（编者注：应为2个师团），一声令下，可以立刻跨过鸭绿江来。张学良的军队现在正被石友三军拖住，一时调不回来。张学良又与蒋介石明合暗不合。蒋介石虽然靠近美国，但他和日本也早有密切的联系。日本抓住了蒋介石的弱点，就是扶植他的势力，共同防共。"

他又说："至于谈到国际方面，日本陆军的强大是世界无敌的，多年来的训练主要目标在于苏联。苏联内政不修，人心不服，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很困难，现在它不敢动。即使敢动，日本陆军过去能打败白俄，现在更能容易地打败赤俄。日本海军在数量上虽与美英海军为五五对三之比例，但在实力和质量上日军海军已成为太平洋上的霸王，美英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世界所公认的。请你相信我的话，早作准备。我敢保证，你的时机已快来到了。在必要时，你可以去见满铁顾问高柳保太郎。他虽是个退役的陆军中将，对于满蒙事情和国际形势可能比我熟悉，你也认识他，时常同他谈谈，对你会有帮助的。"

日军准备发动事变和高柳保太郎的一段谈话

我听到永田的话后，仔细观察局势，益发感觉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果然，8月下旬关东报社得到消息说，日本驻朝鲜的两个师团移向图们江沿岸并举行水陆大演习，同时驻在满铁沿线的关东军也举行大规模的演习。但是关东厅警务局通令各报社，凡关于日军的各种行动不经警务局的许可，一概不准登载。接着，报社又得到满铁沿线日本守备队大批集中在沈阳苏家屯和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的日本在乡军人已奉密令纷纷向各地报到的消息，这些消息也不能登载。此外，所谓“满洲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等组织在大连、沈阳、长春连日召开会员大会，发表宣言，说什么“近来不祥事件累出，万宝山事件还没有解决，中村事件又发生。张学良存心挑衅，不负责任。我们在满洲的日本人生命日感危险，没有保障。我们已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了，应当赶紧起来，采取适当的措施，保卫我们日本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才不负我们先烈流血牺牲换来这块土地的代价”。同时，居住大连和满铁沿线各地的日本居留民也纷纷开会，说什么“中村事件就是张学良否认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存在的表现。胡匪的淫威逼人，已杀到我们的头上来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已经没有保障。我们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不能坐以待毙，有辱祖先，起来斗争，杀此贼子，谁还说不应当呢。”

在东北的日文各报，每天用大字标题成篇成幅地大肆宣传鼓动，大骂张学良“远交近攻，勾结美英对抗日本，他既承袭乃父张作霖的事业，而对乃父同日本缔结的各种条约，如吉会铁路的修筑借款3 000万元，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农矿权利借款3 000万元，满蒙四铁路修筑借款2 000万元，既不还本，也不

付息，更不让日本履行已获得的开发吉黑两省产业和筑路的权利，这种背信弃义的胡匪行为，必须给以实力的惩罚……。”

我当时在关东报社里接到这些消息，认为时局确实紧张起来，当即走访满铁顾问兼弘报系主任、退役的日本陆军中将高柳保太郎，问他时局究竟会怎样。高柳干笑了良久，才徐徐说道：“会怎样，还没有什么难以明白的。只是我们日本人自中村事件发生后，都感到自己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希望张学良基于中日必须亲善的精神，负责任保护日本侨民和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既得权利。如果得不到满足的答复时，日本也就无法再客气了。张学良如果是个聪明的孩子，应当赶快觉醒过来，讲求保存实力的方策，否则他的命运如何，恐怕谁都能断定的吧！”

臧式毅的不抵抗主张

9月上旬，日本军竟在沈阳城北开始演习，并在北边门外架起机关枪演习市街战、夜袭战，向中国示威。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视察满铁沿线各地，检阅部队，并将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在南满车站前和商埠地交界地区架起大炮，炮口对着沈阳城，满铁本线和安奉线已阻止中国人来往。我接到这些情报后，即由大连到沈阳，面见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当时我兼任辽宁省政府咨议，每月白拿200元，随时可以见臧式毅）。我问：“东北形势这般紧张，当局有什么妥善的对策没有？”臧式毅叹息地说：“日本企图侵占整个东北，处心积虑，已非一日。它在东北的势力已根深蒂固，这是你也知道的。现在形势日紧一日，我们军政两方面的负责人已把详细情况报告张副司令和南京中央政府，一切只有遵从张司令和中央的指示相机处理。”我又问：“万一日本不顾一切，实行进攻，主席将怎样办呢？”臧式毅说：

"你想想，我们自己正在关里打得不可开交，东北可用的军队大部分调进关里，留下的只是一些没有什么战斗能力的部队。万一日军攻打上来，我们东北方面是腹背受敌，怕是招架不住。为了息事宁人起见，我方尽力忍耐退让，不使发生事故。万一发生事变，也不欲使事件扩大，只有敌来我走、敌退我守之一策。张副司令和中央的意旨也是如此。我们身为地方官吏，守土有责，本应作一种积极的打算，才不负人民的委托。但是东北不仅是我们当官吏的东北，而是东北人的东北，更是全中国和全国人民的东北，我想中央政府必有妥善的应急办法。"他说到这里，反问我说："你看时局能怎样？"我说："日本人向来是沾边必赖的（实际上不仅是沾边必赖，而是无端侵占），这次不得到便宜，怕是不能完事的。"臧式毅说："关于中村事件，我们已承认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但是日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强硬要求我们履行过去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的所谓二十一条的一些条款，这是我们无法承认，也是无权承认的。事已至此，只好听之。但我决心不作卖国的勾当。"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

花谷正　原著

张德良　译注

译者话：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通称"满洲事变"），是从柳条湖事件即沈阳事件开端的。花谷正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都是密谋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核心人物，也是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罪犯。1931 年，花谷正任日本陆军少佐、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补佐官，后因侵华“有功”擢升少将。在 1946 年至 1948 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板垣被列为甲级战犯判处死刑。石原因病，庭外提审，旋病死。花谷正这篇回忆录写于 1956 年。在本文中，他仍然坚持反动立场，观点亦极荒谬，处处为日本统治集团和他们自己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并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敌意。约略言之，以下两点必须澄清。

第一点，“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基本国策在新形式下的实施。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即逐步确定了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包括所谓海洋政策和大陆政策。这些都是有据可查，并且列为“基本国策”，逐步地付诸实施的。吞并朝鲜和霸占台湾、辽东半岛就是实施大陆政策的早期行动了。1927 年田中内阁时代，明确提出了“灭亡满蒙”的新大陆政策。到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夜，已经形成了完整地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理论和政策。例如“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和“武力占领满蒙”的叫嚣，成了日本政府、军部、财阀、右翼团体的流行语。又例如日本参谋本部的《1931 年度形势之判断》、关东军司令部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日本陆军省《解决满蒙问题对策之大纲》等内部正式文件中，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法、步骤、策略乃至肇事的时间、地点，都明确而详尽地作了规定。所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新步骤而已。板垣、石原、花谷等人正是新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和推行者，是当事人并非局外人。可是花谷正这篇回忆录，避开日本侵华的既定政策，硬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从板垣、石原、花谷等几个人的头脑中凭空设计出来的方案。仿佛事变的发动、事态的扩大、傀儡国的建立，都是他

们几个人的“杰作”，这纯属弥天大谎。

第二点，应该承认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只是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步骤、方法、策略方面的意见分歧，绝非实施“基本国策”的对抗性矛盾。相反，在侵略中国、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的利益一致，意见一致。例如在花谷正等人制造柳条湖阴谋事件的5分钟之后，板垣就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攻占北大营和沈阳城的4项命令；3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下达了攻占南满各军事要地的8道命令；8个小时之后，日本中央军部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合适的”，并同意增派援兵；6天之后，日本政府公开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认为日军是“自卫”，应当“先发制人”，并且这个声明是在军部起草基础上写成的。花谷正在回忆录中无限夸大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把板垣、石原和他自己等少数军人说成处处主动，日本中央军部和政府处处被动，而由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是背着政府和中央军部的孤立行动，他们有反对日本财阀的纯洁理想等等，这些均属无稽之谈。

关于这篇回忆录，我们并不是赞同他的荒谬论述，而是因为它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例如：“柳条湖铁路是谁爆破的?”这一桩重大历史疑案，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都没有得到解决，读了本文，当可涣然冰释。其它关于“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帝国主义策划阴谋的真相，本文也可作参考。

编者按：下面这段序，在日本右翼中是很多人所持的观点：认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没有错。错就错在不应该进而发动“七·七”事变，及后来的太平洋战争，结果弄得鸡飞蛋打。殊不知即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就如脱缰之马，不可逆转，势必不断扩大侵略战争。

序

在东京审判（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业已查明：应把太平洋战争的起点，追溯到满洲事变。的确，柳条沟（注：系柳条湖之误）事件的爆炸声及以后引起的连锁反应，竟使我国卷入了无休止的大规模的战争。今天回想起来，满洲事变如果按照我们当时设想的路线处理，多少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发动满洲事变的当时，无论从时机或方法来看，都绝不能认为有错误。当时，形成对立集团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必然趋向。日本没有满洲，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反之，如果置之不理，那么来自张学良及其背后的南京政府的排日（译者按：当时南京政府并不排日），日本就会失掉在中国大陆上的立脚点。我们面对世界出现的危机，只有使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才是日本前进的必由之路。我们还相信，使受虐待的满洲居民，建设王道乐土，乃是稳定远东秩序的上策，而丝毫没有打算愚蠢地同中国本土进行无止境的大规模的战争。

作为满洲事变开端的柳条沟事件，今日除我以外几乎没有人能把它说清楚了。因为，大部分的当事人已经死去。迄今为止，即使有人做过一些含混不清的猜测，但是，谁也没有能够说出事件的真相。我想一边追忆往事，一边把当时的情景记述下来。

在旅顺偕行社聚会研究

我到满洲当关东军参谋，是1928年8月炸死张作霖两个月以后的事。又过了两个月，石原莞尔中佐也到任，当作战主任。完成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不论怎么说也应该是石原。此后，到满洲事变发生前，其间除开一年时间外，我和他交往密切，促

膝谈心，深知他的为人。石原是第一流的军事学者。他从年轻时代起，就研究弗理德里希大帝、拿破仑战史，树立了站在军事学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世界观。

虽然他是日莲宗色彩很浓的信徒，但是作为一位思想家，在当时的军队中也是罕见的，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在私生活方面也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年轻时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嫖娼宿妓、酒席宴乐等等，一概与他无缘。他的唯一的"短处"，就是能比别人早10年、20年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他说的事情，称赞他的人，认为是天才的见解；贬低他的人，则看作是离奇古怪的，或者误解为脱离现实的。然而他决不是梦幻式的理想主义者，而是能够制订周密计划，敢于雷厉风行的胆略家。满洲事变初期的作战，就曾引起世界军事学界的震惊。

我到满洲不久，炸死张作霖的真相就逐步明朗化了。河本大作大佐被召回东京受审，使当地的气氛无法平息下来。为了调查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宪兵司令官峰，于10月间抵达满洲。由于关东军方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一无所获。峰在归国途中，路过朝鲜，向驻朝鲜日军司令官倾诉了苦衷，军司令官马上召集中队长以上军官，设晚宴招待。宪兵司令官峰在宴会席上的闲谈里，从亲自执行爆破作业的龙山工兵队神田中尉的口中，得知了有关皇姑屯事件的情况说明，峰就算完成了使命。

河本大佐利用炸死张作霖之机，占领南满的打算失败了。如果成功的话，后来的满洲事变，也许在那个时候就爆发了。相反，登上新的东三省统治宝座的张学良，不久就实行了易帜，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和南京政府相呼应，发起排日的攻势。满洲的形势也日趋恶化。另一方面，北方苏联正在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逐步充实战备实力，即将成为与我国相毗邻的远东的一大敌国。石原对苏联的实力发展，给予了特殊的注意。创

建满洲国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正是在于筑起一道遏止赤色势力南下的防波堤。

再说，在炸死张作霖以后，板垣征四郎大佐也前来就任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与石原相比，具有相反的性格。板垣不是秀才型的人物，他具有宽宏大度、坚韧不拔的性格。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领袖人物。板垣的实际能力和石原的周密计划能力的结合，铸成了满洲事变的大业。我们这样说，并非过誉。

于是，我们就面临着日益恶化的满洲形势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每周一二次在旅顺偕行社聚会热心地进行议论和研究。这件事情的动议，起源于1929年7月畑英太郎中将（畑俊六元帅的胞兄）代替村冈为关东军司令官到任之时。我们首先想分辨清楚新任司令官对满蒙问题的见解。经过探询，确认中将对此抱有充分理解的态度。当天夜里，我们三人会面，就当前满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石原中佐提议："利用旅顺安静的环境，从世界形势和满蒙现状出发，研究我们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为此，每周一二次在偕行社聚会，彼此推心置腹，坦率地交换意见，不明白的地方，向有关专家请教。再有，应当扩充不只是调查中国马的中国马调查班，以进行更高水平的研究。石原的提议获得了一致意见，以后3人每周都要聚会进行研究。

我认为新的满洲，要以双重国籍的日本人为骨干，以建设各民族共同享受的王道乐土。日满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犹如月亮之沐浴太阳的光辉一样。那时的设计是：日本人从事大企业和脑力劳动，朝鲜人从事农业，中国人从事小商贩和体力劳动，各尽其职。以达到共存共荣之目的。因为是拯救受虐待的满洲人，以建设王道乐土，所以不允许像日本内地那样，大资本家横行肆虐。我们一贯主张禁止财阀进入满洲。我们引进"日产"康采恩，也是因为"日产"公开招收广大群众的股本，

我们只不过是单纯地利用其经营技术而已。

进入1931年，我们的计划很快地具体化了。这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满洲粮食价格的暴跌，张学良铁路平行线的奏效，及满铁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而造成的。

参与谋划的人们

1931年春，制定了柳条沟事件的概略计划，制造战争借口显系轻而易举，可是问题在于处理善后难。吸取了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的教训，这次制订了周密计划。今天看起来，那时炸死张时机并未成熟，只是杀掉了一个人，事后所应采取的行动则一无所成。当时既与中央军部全然没有联系，又与毗邻的驻朝鲜日军也没有任何磋商；日本国民对满洲问题也很冷淡。总之全国上下步调不一致。加之，既使用日本浪人，又使用中国游民，结果日军的阴谋全部败露。这次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满洲事变一经发动，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动军队，一夜之间占领奉天（沈阳）；在列强干涉尚未介入之前，即应迅速占领预定地区。那时当然必须考虑来自政府和驻外地外交官员方面的干扰，然而如果犹豫不决，必将一事无成。因此，那时有必要实际上置中央命令于不顾而加以强制推行。为了使关东军的行动得到支援，可求助于中央军部将校中的骨干分子，把他们拉到我们一边，引为同志，实行内应；还有桥本派策划的国内军事政变若能和满洲事变同时并举，那就更属千载难逢的良机；还必须取得毗邻的驻朝鲜日军的适时增援。

值得庆幸的是，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在满蒙问题上阅历较深，赞同我们的计划，因此一旦有事的时候，可以指望从驻朝鲜日军那里得到援助。应石原的重托，神田中佐在满洲事变发生前，大约三次来访旅顺。他出身于俄国班，也在

哈尔滨特务机关任过职，是俄国通的硬汉子。他来到驻朝鲜日军后，发现朝鲜事态的发展，远较预想的要更坏，为此他大吃一惊。朝鲜人的排日气氛，一直贯彻到朝鲜儿童的意识里，如果单独一个日本人到乡村去，则有生命危险。这也是受到满洲的中国人排日影响的结果。因此，从驻朝鲜日军的立场上说，也有必要发动满洲事变。

展示最初计划之时，恰值驻朝鲜日军司令官南中将任内。南面有难色，向神田表示，自行越境显系无理。林铣十郎中将上任以后，征询意见时，他表示充分理解，这才放心。另一方面，在中央军部，当时由第二部长调任第一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从他处理张作霖事件的原委看，他是最可信赖的。任参谋次长的二宫，是一个精明人，因此有点靠不住。可以无条件信赖的人有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三人，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也是一位大致可以信赖的人，对他们透露我们计划的程度，如果用数字表示的话，那么桥本、根本为95%，建川、重藤为90%，永田为85%，小矶、二宫为50%。

6月，我为了和他们作大致的磋商，返回了日本内地，会见了桥本、根本，同他们交换了意见。他们二人正热衷于国内改造。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如果发动满洲事变，国内改造也将容易进行。桥本是政变第一主义者，主张首先举行政变。结果相约10月同时举行。至于详细的爆破计划，他们并没有多加过问。

8月，召开了师团长会议。南陆相陈述了对满蒙问题的积极意见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时因为关东军司令官、驻朝鲜日军司令官、驻台湾日军司令官都出席了会议，所以板垣大佐也跟随新任司令官本庄繁晋京，神田也是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的随行人员。

这时，到兴安岭进行地志调查旅行的中村震太郎被杀事件发生了，接着又有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气氛日益紧张，实施计划的时间日益逼近。8月下旬，我到东京。任务是使中央军部认识满洲实况，在中村事件中，我曾以奉天特务机关补佐官的身份同张学良的官员谈判。但是越是反复交涉，问题越是纠缠不清。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实力发动。可是不知中央军部究竟有什么意见，想再一次弄清情况。

我同二宫、小矶、建川、永田等交换了意见。二宫、建川特意嘱咐说："按照现状看，中日两军近期内势必发生冲突。因此请考虑对策。如果冲突一经发生，即可听凭关东军做临时处置。关东军必须慎重地考虑国际形势，周密地计划自己的行动，直至每一个细节，以避免外来干涉"。同时对于发动群众的场所、是否把局面控制在南满范围，作战的时间，兵力的估计，转换为外交交涉的时间，对住在北京的张学良如何处理等项问题，也都作了商讨。二人还根据我讲的情况，要我领会言外之意："对于政府将来能采取怎样一种态度，现下虽不得而知，但应尽可能努力贯彻贵军主张为是。"双方就这样约定了。

后来会见桥本、根本，我对他们说："因为准备完毕，所以按预定计划坚决执行"。根本劝我延期执行，他说："现在看来，如果想实现计划，我很忧虑能否得到国内支援。特别是若槻内阁很难办，因此是否等到推翻内阁之后再说。如果操之过急，恐怕只有逼得本庄先生剖腹自杀了。"我说："事到今日，更待何时，箭在弦上，唯有一放。"就这样返回了满洲。

现场的同志们

我们究竟怎样进行现场谋划的呢？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是1931年8月到任的。虽说是新上任，然而他是与中国交往

人员中的老前辈，是一位性情浑厚、人格高尚，堪称将才的人。

他作为重大时期的军司令官是个适任的人选，中央人事当局似乎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的。我们关于事情的细节，虽然什么也没向本庄先生讲，可是根据平时的观察，我们判断："一旦有事，他一定是可以信赖的人物。"

三宅参谋长等幕僚中的大部分并不知晓计划，爆破工作分派给4月到任的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的补佐官今田新太郎大尉承担。今田大尉的父亲是个汉学家，他本人精通剑术，是一个天真、固执、富有正义感的热血汉。

因为在超越必要的人物中泄露秘密很危险，所以在人选上是颇费一番苦心的。爆破工作如果交给一般非军事人员去做，无论如何容易暴露，因此只有使用军人才是上策。既然在爆破后，必须立刻集合部队开始行动，那么，无论如何需要向驻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透露秘密。因此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使之尽情饮酒，畅所欲言，然后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

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即川岛大尉、小野大尉（他们都是驻奉天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的中队长）、小岛少佐（驻奉天第二十九联队副）、名仓少佐（驻奉天第二十九联队大队长）、三谷少佐（奉天宪兵队）等人。辅助作业则由甘粕正彦预备役大尉、和田劲预备役中尉等人参加。岛本大队长因为不摸情况，所以在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完全如晴天霹雳一样，感到事出愕然。

另一方面，与柳条沟事变发生的同时，向满铁沿线各地投掷炸弹，以治安不良为理由，由领事出面要求增援，再以此为理由，迅速出兵。为此，令甘粕正彦等人潜往。9月18日刚过，在哈尔滨和吉林所挑起的类似事件都是预先筹划好的。

还有现场的警戒和联络工作，指使无法谋生的浪人和青年充当，由和田劲统率。经费从日本内地筹措，由河本大作经手

送交，当时活动经费还算宽裕。

谋划的暴露

我们最初，预定于9月28日实行爆破，以爆破声为暗号，用安装在奉天日军驻地兵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译者按：一说安装在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队部内）内的24厘米的要塞炮，炮轰北大营中国驻军兵营。与此同时，驻奉天部队夜袭奉天城，随即占领之。然而这种要塞炮原来并不在此地。这年春天，永田军事课长来满洲视察时，我们向他说："在满洲的关东军总兵力不过1万人，张学良的军队素质虽然不好，但大约有22万人，还有从法国购入的飞机30架，而我们在满洲不但一架飞机都没有，而且在奉天连一门重炮也没有。如果一旦有事的时候，还能不陷入困境吗？"于是从旅顺（注：从日本东京运至旅顺后，又密运到沈阳。）把要塞炮拆开，运来奉天，然后再重新安装。若说安装重炮，太使人神经过敏，所以便以打井为名，将周围圈起来，这样外人便看不到里面在干什么了。即使这样，外边的人还是觉察到了，如领事馆就曾前来探听过。虽说是24厘米口径的大炮，但性能不好，安装也不好，再加上没有会操纵的炮兵，于是一开始就计算出距北大营的水平射程，把瞄准器对好，放在那里，这样即使闭上眼睛发射也能命中，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让它起威吓作用，并不指望它发挥多大的实际效果。

这个重炮虽说9月10日就已安装完毕，但还要教会临时炮兵的操作技术，因此仍需花费时间。而且割倒高粱后才适于作战，高粱繁茂就难以发现躲藏的敌人。从这个观点出发，选定9月28日。这个日期之所以提前，是由于发生了下述情况的缘故。

9月15日，特务机关收到了从很早以前同我们有联系并进行过接触的桥本中佐那里打来的电话。其中说："因为计划暴露，

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请我们不要犹豫，要尽快行动。即使建川到达也来得及，要赶在尚未听到建川传达中央命令之前行动。”

后来，我才听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满洲策划的种种事情，当地的外交派出机关，隐隐约约有所觉察，风声甚至越过了海洋传到内地。其原因我估计是由于我用钱收买的浪人的酒后狂言，或者是弹药和物资的集中而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以及我借助酒兴说些夸口之谈所造成的。总之，那些情报是先传到币原外相的耳朵里，然后被带到内阁会议议席上的。

陆军大臣是南次郎，此人是一位东洋长者式的不着边际的人物。币原提出的种种问题固然百般挑剔。可南次郎也只是作些不得要领的回答：“我认为军队不会任意干出那种事情，那是偶发事件。”币原将奉天总领事林打来的电报给他看，他显得有些惊慌，并表示：“究竟是否属实，调查一下再说。”他这样回答之后，回去就把第一部长建川叫来。建川听过南的询问之后，回答说：“难以否认‘在满洲正策划着某种事件’的谣传。”于是南说：“那可难办了，你应该去到那里劝阻。”就这样建川以“和事佬”的身份只身前来奉天。可是，建川感到事情棘手，就把桥本和根本叫来。在建川的暗示下，桥本立即将前边说过的那封电报拍发给关东军。

这时，桥本等中央军部的同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由东京归任途中，18日在汉城和神田中佐相会后，回到奉天。建川于15日夜，从东京出发，一路上慢悠悠地乘坐火车、联络船，潜往满洲。18日午后和到本溪湖车站前去迎接的板垣大佐一道从奉天站下车。我马上用车把建川从车站送进奉天柳町的一家带有艺妓的菊文高级饭店。

九月十八日夜

另一方面，我接到桥本电报后，9月16日午后，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上，有关全体人员聚集一堂商议对策。这一天，恰值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首次巡视。板垣、石原也正好逗留在奉天未走。到会者除板垣、石原、我和今田以外，有执行部队川岛、小野两大尉，小岛、名仓两少佐。奉天宪兵队长三谷少佐缺席未到。

围绕着是否坚决执行既定计划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的主张是："建川是奉谁的命令前来，还无从知晓。假如是奉天皇之命前来，我们就将变成乱臣贼子。果真如此，还有没有坚决执行既定计划的勇气？总之，在没有和建川相会之前，是无法决定我们将如何行动是好。"但是今田却说："我们的既定计划，已被泄露。所以必须趁没有会见建川，大家没有泄气之前，务必坚决执行为好。"因为争论不休，没有结果，最后通过划拳，姑且听从了我的意见。

可是到了第二天，今田来到了我的住处，他说："无论如何要在建川到来之前动手。"我说："还是要和东京合拍，而后执行方是上策。"尽管我怎么说，可是今田怎么也不听从，最后我也只好同意说："建川方面由我亲自去说服。"就这样约定，并且决定18日夜坚决执行。首先叫来了小岛，接着又叫来了川岛、名仓。我宣布说："18日动手已经定下来了。小岛，你们大队的任务是连续出击，要一夜之间攻占奉天城。川岛只要攻下北大营即可。"对于担任现场巡游队的和田劲也取得了联系。至此，一切准备停当。

18日，我到建川住的菊文饭店，同换上浴衣的建川，一边喝着酒，一边暗中试探他的意向。嗜酒的建川，尽管从风度上看是一位从容不迫的豪杰，可是他也是一位具有头脑缜密、感觉敏锐

的人。对于我说的事情，他似乎已基本理解，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竟然今晚动手。然而他绝对没有制止之意，这大致还是清楚的。于是寻找适当的机会，当建川欢乐的时候，我丢开了他，回到了特务机关。板垣也回来了。石原跟随关东军司令官，于前一天去旅顺，今田因为跑出去指挥计划的实施，不见他的踪影。

9月18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800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10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在炸毁路轨的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报告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这时呆在爆破地点以北4公里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进攻北大营。今田大尉不但在现场附近直接监督实施爆破作业，而且他是一个精通剑术的人，发起冲锋时，他挥舞着军刀，亲自杀进了北大营。片冈、奥户和中野等雄峰会的一群浪人，也从旁协助，在特务机关方面，岛本大队长一无所知，宴会回来，正在熟睡。得到紧急报告后，慌忙赶到现场，这时板垣代理军司令官业已下达命令，令第二十九联队和岛本大队，立即集合部队，参加战斗。

在北大营，一无所知的中国军队，多数人还睡在梦乡，带着武器库钥匙的将校军官外出。士兵拿不到枪，正在赤手空拳，东奔西窜时，日军已经冲进兵营。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军队很早就得到内部命令(注：指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己逃出了营房。随着24厘米重炮的轰击声过后，就开始了向北大营的炮击，使得大部分中国军队败走，到黎明时，奉天全城都落到我们手里，很快就实行了全城军管，土肥原大佐就任奉天临时市长。

中央军部的限制

我接到爆破的报告，立即拍电报给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中佐召集全体参谋开会，向军司令官说明了作战方案，军司令官马上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于是，军司令部在19日早进驻奉天，分散配备在满铁沿线的第二师团主力，除了防守吉林方面的驻长春部队之外，都迅速地向奉天集中。独立守备队在各自配置兵力的地方采取行动，分别占领了凤凰城、安东、营口等地。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以及第二遣外舰队(注：停泊在青岛和旅顺)司令官津田静枝少将请求协助增援。津田司令官对于将海军集中于营口的请求，以山东形势不稳为理由加以拒绝。此后对于满洲事变的进展，海军方面，常常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驻朝鲜日军方面，当我们认为可以畅通无阻时，也出现了预想不到的障碍。19日早，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发来电报，内称："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为了应驻奉天附近关东军之紧急请求，自行决定将旅团长指挥的第五步兵大队和第二飞行中队派往奉天"。大家看到这里都在为由于神田的努力，终于促使林下定决心而欣喜。往下还看到电文上写着："派出部队，从10时起，陆续由卫戍区出发"。可是就在同一时刻，中央军部作出的判断

却是满洲形势并不严重。于是给驻朝鲜日军下达了命令说:“越境出兵须待圣上裁决,在未获批准前,不得擅自行动。”为了更加彻底贯彻这一宗旨,还给新义州的宪兵队长发一封电报:“如有越境部队,即令其停止前进!”就这样,越境计划暂时受到了阻碍。

在那天的半夜里,从驻朝鲜的日军方面又拍来了一封令人失望的电报。其中说:“参谋总长对卑职再三陈述的意见,竟置于不顾,严禁派出增援部队。”我们的既定计划是:一俟20日早驻朝鲜日军到达奉天,关东军即行北上,出兵哈尔滨。恰好在我们布置部队集结于长春之时,接到了这封电报,真令人气愤万分。

正在这时,从神田那里又得到消息说:“如果关东军出兵吉林,则驻朝鲜日军以奉天守备薄弱为理由,可再次越境”。21日早,我们指使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令其投掷炸弹,然后以保护侨民为理由出兵吉林。驻朝鲜日军按既定计划,命令嘉村旅团自行越境,抵达奉天。神田为了制造出兵间岛(注:即吉林延边地区)的借口,到过龙井村,进行密谋策划,但没有成功。

我们的计划是按照上述顺序,迅速果敢地占领整个满洲,因遭到中央军部的阻挠而难于进行。中央认为如果放任自流,关东军还会惹出事来。所以,首先派兵务课长安藤大佐来到满洲,他向我们提出质问说:“东京方面,盛传此次事件是关东军的阴谋所为,你们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接着在月末又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来到满洲,他作为中央军部的监察官,逗留在奉天,凡事都想过问,以牵制我们的行动。然后参谋本部又给我们发来带侮辱性的罗里罗嗦的指示,一般地说,这样的指示是不应该向关东军这样的大机关发布的。

我们认为占领吉林以后,无论如何也要出兵哈尔滨。为了制造出兵的借口,甘粕正彦大尉悄悄地潜入哈尔滨。9月21日以

来，向正金银行等几栋建筑物内投掷炸弹。见效后，由哈尔滨总领事以及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出面，打电报请求出兵保护当地，关东军再三要求中央军部派兵，但中央军部害怕出兵哈尔滨，会惹起苏联方面采取行动而加以拒绝。

参谋总长下达了如下严厉的命令：

一、不准进兵宽城子以北；

二、不准管理满铁以外的铁路；

三、未获参谋总长的指示，不准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既然如此，只好暂时作罢。

占领哈尔滨已是第二年1月的事了。这时我们同上海的田中隆吉少佐合作，点燃了上海事变。趁着混乱局面，很容易地就结束了作战。

我们以石原为中心所作的判断是：即使出兵北满，苏联也不会出兵，国际联盟也好，列强也好，没有干涉满洲事态的实力。当时美国、英国、法国的利害关系，使他们在远东互相对立，不能形成一个遏止日本的联合体制，苏联也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无暇兼顾西伯利亚以外的事情。然而若槻内阁害怕国际联盟方面排斥日本，中央军部也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的实力。把超过限度的行动看成是冒险。

然而就此止步，将和3年前一样半途而废。为了改变政府的怯懦态度，我们的行动是10月8日轰炸锦州。此时，石原亲自搭乘小型飞机向锦州张学良的驻军兵营投掷了小型炸弹。实际的损害虽然很小，但给予国际联盟的震动是很大的。桥本一伙大吃一惊。便来责问我们。但遇到针锋相对的回答。他们一气之下回国了。这次轰炸事件，促使国际联盟对日本的态度急剧恶化。我们达到了目的。

对不服驾驭的关东军感到棘手的中央军部，于10月中旬派

遣侍从武官川岸少将前来“慰问”。我们正打算聆听圣上嘉奖“干得好”的赞语，可是侍从武官到来的当天早晨，却收到了由陆军大臣拍来的电报：“外间有关东军闹独立的谣传，必须切实中止此项企图”。这是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简直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事后还听到，与此同时，逮捕了“十月事件”的首谋者。其原因可能那时不知是谁散布的谣言，被小题大作传开了的缘故。

（译自《理性》增刊，“昭和秘史”1956年12月号。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

桥本大佐手记

桥本欣五郎　原著
张德良　译注

译者的话：《桥本大佐手记》原书名为《昭和历史的源泉》，1935年4月23日动笔，同年6月1日完稿，发现于1961年。译文选择了《手记》中“九・一八”事变部分加以节译。

《手记》的作者桥本欣五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为樱会的主要首领，日本陆军中佐、陆军参谋长部俄国班班长。1935年写作《手记》时，任三岛野战重炮第二联队长，晋升大佐。他是日本国内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军事政变的主谋者；是“九・一八”事变的阴谋策划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罪犯。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搜索到他的《手记》幸免于绞刑，被判无期徒刑。假释后，于1957年病死。

《桥本大佐手记》和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两文所坚持的反动立场和荒谬观点，如出一辙。但是两文所提供的第一

手史料，可供参照研究。

《手记》不但提供了“九·一八”事变的真实内幕，而且从反面给中国人民提供了教益。这就是在日本关东军和日本中央军部的内部，确实存在着阴谋集团。桥本欣五郎、建川美次、大川周明等人都是在日本策划军事政变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他们在计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参谋本部第二部形势判断

每年(每年均为4月份举行)在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都要形成判断世界形势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再制定日本帝国陆军的作战计划。1931年度形势判断，是在第二部长建川少将指导下，听取各班长以上的意见，才作出的决定。

1931年形势判断有其特异之处。例年的形势判断都是做出一般世界形势的判断，文件的结尾部分都是以老调重弹的结论而告终。这次相反，一下子就构成了以满洲为中心的形势判断。立下此等功绩的原因之一，应当说是建川部长的远见卓识。建川部长先是在欧洲度过了多年的岁月，接着他成了驻中国公使馆的武官。他能摆脱欧化而转向东洋味，说明他的头脑不同于一般将领。

各班长集合到一起来审议形势判断。但会议没有讨论满洲必须如何处理的问题，更没有提出意见的人。在这里我倒发表了一个论调：满洲事变一经发生，关东军勿须等待政府命令就可以发动战争。当时没有一人公开表态赞成我的意见。如果审议要能反复进行的话，对我的提案多少表示共鸣的人是会有的，不至于没有响应者。其次，满洲事变一经发生，如果我国政府对此不

愿行动，也没有成功的希望。这样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在会上也没有讨论，更没有提出意见的人。明哲保身之流是一伙庸俗之徒，他们不可能实行，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建川征求我的意见，我直截了当地说："在满洲制造事变后，如果政府不追随军方行事，我们就应坚决的实行军事政变，满洲问题就会易于解决了。"听了我说之后，其他的人都缄口无言，只有建川一人没采取缄默的态度。

形势判断的结论部分，即文件的最后的字句，是这样决定的："满洲问题，已到非处理不可的时候了，政府如果不顺从军方的意见，届时军方就要有断然处置的决心。"

这个最后的字句，是依照我的主张写下的，其他的明哲保身的人们，其真意何在，我无从了解，只有建川充分了解他们的意图。

此一形势判断成文后，需要由建川呈送给部长会议讨论通过，并且还要三长官理解承认才行。在此之后建川所花费的各种苦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最后字句的真意是显而易见的，建川就是不向高级将领说明，也是一见便知的。当时，向军方的高级将领说明最后字句的真意，该形势判断就不会被通过，因为那是使人望而生畏的。

总之，该形势判断，一经三长官会议通过，将来，一旦追究满洲事变及国内改造（国内军事政变）的责任，在军方我将蒙受不白之冤，如果引用形势判断最后字句制裁我，即使同僚之间也爱莫能助，对此我在所不惜。

花谷少佐晋京

1931 年7 月左右（?）（花谷自己回忆是6 月）花谷少佐携带关东军少壮派的《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译者按：《方案》为1931

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其中规定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三种供选择的方法，即和平外交法、内部策反法、制造战争借口法）来到东京。这个方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在满洲制造某事件”（即9月18日夜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村制造的自毁南满铁路事件，史称柳条湖事件），以便日军采取军事行动。为此需要活动经费5万元（相当于日本战后3 000万元，供关东军指使的日本浪人制造阴谋事件的活动费之用）。

我本人是为了向陆军中央部进言到东京来的。重藤大佐（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和我，很快地到了赤坂高级饭店去迎接花谷。我首先向他说：“请你注意这个《方案》要防止泄露给陆军中央部。”由于陆军中央部，眼下还没有采用这个《方案》的意图，如果把这个《方案》展示给他们，他们会产生恐怖感，必以否定这个《方案》而告终，所以这个《方案》并没有给陆军中央部看。并且我向他转达了我们的决心，希望他做为志同道合者，对于这个《方案》的贯彻执行一定给与全面的援助。花谷表示同意之后，他回到了满洲。此时的中央军部并没有得知关东军少壮派策划满洲事变的情绪已经兴奋到了顶点，正在玩弄高明手法，因为花谷没有向他们说明。

从这以后，每时每刻都要为筹集这5万元资金而费尽心血。

同板垣大佐的会见

1931年夏，板垣大佐来到东京（与关东军司令官同行?）。板垣和石原都是关东军的代表。我马上去偕行社新建社址的宿舍去拜访他。在我之后，来拜访的还有重藤大佐，晚些时候来的是根本中佐。在这里定下了解决满洲问题的决心。

双方相约，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完全听凭关东军临机处理，我只给与必要的军事活动经费，以及如果政府不追随军方的话，我

就在国内实行军事政变。

满洲事变发动后下一步怎么办?我主张成立独立国家,板垣主张领土宣言,这个问题只好留待满洲事变后再来解决。今后我们的同僚,就象那些对满洲问题不感兴趣的人一样,不露声色,不做任何讲述。这样相约之后就分手了。此次会见仅10分钟左右,同僚间信赖之情,溢于言表。发动满洲事变的预定日,定于此次会见后一个月,即预定于9月28日举行,没有特殊理由不许改变。(后因消息走漏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

慷慨解囊的藤田勇

为了筹措满洲事变所需的5万元经费,我向各方面展开了活动。最初找的是三尾(政友会代议士),其次,通过高桥、根岸向藤田谦一(当时因某事件被审问中)等募集,再次又向松尾忠二郎、万俵喜藏(藤田、松尾、万俵均为日本财阀)搭上关系,但是都没有成功。

某一天,会见了重藤千秋的同乡藤田勇(日本财阀,时任东京每日新闻社社长)透露真情给他,藤田立即应允,并且言而有信,把他带来的1 000元钱当即交给了重藤。重藤为了通知板垣筹款已有着落,命令和知少佐携带1 000元前往奉天。藤田这个人,思维敏捷,且富有先见之明,可以说在东京的谋士中无出其右者。

紧接着,第二天来到了藤田府第,向他说明了策划满洲事变的内情,他欣喜若狂,祝愿我们早日成功,遂相约由他逐次给筹措5万元,这5万元由大川周明的儿子分给中岛和土肥原等中间人,再亲手交给板垣。

满洲事变发生前几天,走漏了消息。此时,藤田把我偷偷地找到新桥的某高级饭店(午后4时)会晤。他问我:"满洲事变已

经走漏消息，剩余一部分未支付的钱款今后怎么办?”我回答说：“走漏消息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想强制推行。”他同意我们的意见，并把剩余的一二万元交给了我。当时，我正值在东京，就向即将回满洲的土肥原贤二转述我的意见：满洲事变的密谋策划虽已暴露，但仍应断然施行。土肥原对此表示同意，我叫他把钱带回满洲。

后来藤田勇还为十月事件(1931 年10 月发生的日本国内军事政变)等出钱捐助(先后捐助巨款给“九·一八”事变及十月事件计63 万之多)，“五·一五”事件(1932 年5 月15 日发生的日本国内军事政变)后他对大川周明也深表同情，使得大川入狱后，解除了后顾之忧。勿庸置疑，藤田勇可以称得上一世之枭雄。

三长官会议(策划满洲事变消息走漏)

满洲事变爆发前四五天，满洲正在策划的某重大事件已经走漏消息。其原委如下。

黑龙会(日本右翼团体)某壮士来到了外务省夸张地说：“从满洲归来的头山满(黑龙会首领之一)说，有人把钱交给板垣，让他在满洲制造重大事变。所以板垣花钱根不介意。”听到这个消息的外务省大臣币原(当时他是为着显示威风啦!)来到了陆军省询问是否有其事。事情就这样，终于漏了风声(尽管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正在这时，陆军三长官(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军省大臣南次郎、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在参谋本部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遣建川少将到满洲去，以防患于未然。

当天，我像平常一样去上班，由于突然召开三长官会议，我觉察到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探听到上面所说的内容，预感到此事并非寻常小事而是一件大事。首先使我想起的是建川少

将给板垣那份个人之间的密码电报原稿，还携带在建川身上。我马上来到了第一部长（建川已由第二部长调任第一部长）室，我示意把这份电报密码暂借一用。建川从衣兜里拿出来给我看，我好象抢一样地夺来收下，然后来到参谋本部的值班室，把根本中佐喊来，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板垣发出了“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的密码电报。我又马上责令小原、田中把全文抄下来，然后再把密码电报原稿退还建川。

我向建川索行密码电报原稿时，小矶军务局长也在座，但他只是笑了一笑，就连建川也只是说了一句话：“干什么，桥本？”谁人知道，正是这个密码电报原稿，对于坚决发动满洲事变以及其后关东军采取的行动，发挥了多么大的通信联络作用啊！

接着，建川出发去了满洲。当时陆军三长官并不希望发动满洲事变。这在三长官会议上，态度是非常明朗的。

满洲事变的前夜

如前所述，策划满洲事变的消息一经走漏，我就立即发出了坚决行动的电报。可是时间过去了，并没有真的坚决行动起来。只好再次给板垣发出密码电报“必须在建川到达奉天之前坚决行动！”然而，依旧没有坚决去做。又发出了第三次密码电报：“不必担心国内，应坚决行动！”还是没有坚决行动起来。

在此之前，曾经有过打算，如果一旦走漏消息，就派遣河本大作到奉天去督促关东军方面的少壮派。尽管连发三封电报，他们竟不理睬，使我深感不安。满洲事变爆发前一天，我去满铁调查会，拜访大川周明，同他议论关东军能否坚决行动的问题。大川说有二分之一的可能性。我心中闷闷不乐，就劝大川：“你我二人，今夜痛饮一番如何？”得到大川的慷慨允诺。午后4点钟左右来到了神生坂（应为神乐坡）的一家高级饭店。以前我并不知道

有这个饭店，大川那时也很少在这个饭店喝酒。他是午夜12点左右回家的，我因为午夜1点下大雨而留宿于饭店。

第二天早晨，即满洲事变当天的早晨8时刚过，从参谋本部俄国班打来电话，问我看报没有？听电话时，我还在睡意朦胧中，顺口回答说："没有。"但是从这里我知道发动满洲事变之事已经坚决执行了。我带着醉意马上回到参谋本部，立即给驻朝鲜日军的神田参谋拍发一份电报，叫他擅自出兵。其实神田远在未接到我的电报之前即已出兵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满洲事变前一天晚上，板垣已经打来"坚决执行命令"的电报，由小原、田中等人拿到我的住宅，正赶上我不在家。到了第二天早晨，见我还没有上班，小原、田中以为我大概被软禁起来了。他们哪里会知道，我留宿在一家我所陌生的饭店过夜。

据说大川当时想，桥本当然已经知道满洲事变爆发了，因而就没有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是在建川抵达奉天的当天坚决执行的）。

满洲事变当天的内阁会议

满洲事变当天，中央军部高级将领及其他一般人员都感到愕然。尽管平时大家对满洲问题议论纷纷，但并没有立下贯彻到底的决心，多属纸上谈兵。事至今日，其理自明。果不其然，满洲事变当天一片惊慌失措。在午前的内阁会议上，陆相附合其他阁僚，同意了"不使事件扩大"的内阁决议。陆相和他的随声附合者，也都为当时的那种气氛所卷入，在他们脑子里念念不忘的就是不要挑起任何重大事变。他们一边同意了内阁的决议，一边又认为同意内阁决议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为什么不能扩大事件？如果军事行动是出自军方的独立见解，加以限制就没有实

际意义，也不应该附加条件。这里，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度量之狭小。

基于上述内阁决议，当天参谋总长金谷大将，对关东军发出了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命令的训令，对驻朝鲜日军电令必须停止擅自出兵的行动。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是一个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正面临着或者停止下来，或者违令前进的选择。正在这关键时刻，我立即用个人名义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参谋本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决议的表面文章，其真意并非叫你们停止军事行动。"就是这样，我的电报加快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当然关东军的此次行动，固然根据石原、板垣的指示而来，同时也是得到了本庄的默许而然后进行的。在此之后，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每一行动，都要发出制止的命令，以至弄到关东军不得不发出抗议性的电报："关东军都是基于完成一定的任务才采取行动的，来不及一一接受参谋本部的指令。"这对皇军来说，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同时也表示中央军部威信的下降。

然而，在参谋总长系统的总务部庶务科的人员，在此重大事变中，他们对于是否要给关东军发停止军事行动的指令，多所议论。这是因为他们曾被本庄司令官从日本国内召去满洲参观过1931年的军事大演习的缘故。

现在的中央军部为此等之辈所盘踞，真是不堪想象。

金谷总长是一个徒具虚名的人。我从"此次事变不扩大"的内阁决议一直到与板垣相约，终于下定决心，不实行国内政变，就不能使满洲事变在今后获得成功。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

关东军制造柳条沟事件

河本大作笔供

（1953年7月25日）

“九·一八”事变

如上所述，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无视日本的“独立与生存”，强迫使日本签订协约。同时，币原的软弱外交甘心接受这一协约，甚至连满蒙权益也置于不顾。对此，日本不少国民表示不满。尤其是热中于军国主义的少壮军官们，对于满蒙这一“国防生命线”的被侵犯，忍无可忍，甚至有人认为不如伺机侵略满蒙，将其纳入我国的势力范围，以树国家的百年大计。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国内参谋本部第二部（处理情报事务）的少壮军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桥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少佐）、和知鹰次（大尉）、长勇（大尉）等人。在满洲则有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为首，包括奉天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以及所属独立守备队的大部分青年军官。而其中最有力者为板垣与石原二人，他们早已志同道合。首先，为了做好准备，他们指责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中将）对满洲问题态度冷淡，鼓动东京中央军部以本庄繁取而代之，然后一心等待时机的到来。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此之前，位于奉天北郊邻近北大营的柳条沟道口，多次由北大营的奉天军士兵或堆石块、或拔道钉，屡屡制造破坏南满铁路运行的事故。因此便选

中了这一地点，于9月18日夜，派虎石台（奉天以北8公里）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就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另外，还计划利用中国人的密探炸毁太子河铁桥，但被日本军哨兵赶走，未能达到目的。结果，只破坏了柳条沟的一座小桥，然而它却成为"九·一八"的直接导火线，使事变发展扩大。而这一夜日本军突然袭击的部署是极薄弱的。计划以一部兵力（岛本中佐率领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袭击北大营；以主力（由平田大佐指挥的步兵一联队）袭击奉天城内的督军公署。如果当时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抵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本方面的夜袭必败无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主力的到来，再次发起攻击，那样，战局就将再起波澜，陷于复杂的状态，决不会有几天之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以及吉林的结果。当夜日本军的唯一依靠就是两门24cm榴弹炮，企图以这两门巨炮的炮火威吓奉天军。重炮是在约一个月以前从旅顺要塞取下的备炮，通过铁路运到奉天，待炮座、备附等完成后，便以奉天城内的督军公署和北大营为目标进行瞄准演习，经过反复练习，掌握了在夜间看不到目标时进行射击的各项必要的要领，达到了第一发可命中目标的程度。此外，9月18日傍晚，东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带着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训令来满洲。训令的内容可能是告诫关东军不可轻举妄动。当时为了参加检阅正在奉天的板垣参谋，早已从国内参谋本部的同伙那里得知建川少将出差的密报。掌握这一情况后，他认为最好是在接到训令之前采取行动。于是，当建川少将到达奉天时，由花谷少佐出迎，然后将建川带到菊文饭店，劝他喝了烈性酒威士忌，使建川烂醉如泥。传说建川是被上述24cm榴弹炮的炮声惊醒的。本庄军司令官等关东军幕僚在辽阳结束了对第二师团司令部的检阅（9月17日），暂时返回旅顺。18日夜便得到奉天事件的报告，立即赶

赴奉天，担任全军的指挥。在此之前，板垣参谋早已同石原议妥，以军司令官的名义自行处理善后。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毫无主张、定见，是一个只适合作副官的人，所以，在此次事变中，一切都由板垣和石原二人裁断。石原头脑缜密，是一位出色的参谋，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他为人狷介，非统率之材。而板垣较之石原，浑厚大度，善于接纳他人意见，秉性笃实，长于统御之术，具有足以弥补石原之不足的素质。两人结合起来，共同处理“九·一八”事变，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从帝国主义立场而言)。如上所述，就满洲当地而言，确实取得很大进展，但其拥有的兵力除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四个大队)之外，只有从朝鲜赶来增援的一个混成旅团。随着战线的不断扩大，兵力及军需物资宣告不足，势必要请求国内支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然而，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铃木操六对于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深感不快，更谈不到给予支援了。在这一形势下，上述重藤、桥本等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等，便策划以10月18日为期，在东京举行政变，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向宫城也派出一支部队，拥戴天皇，发动“锦旗革命”。号召以东京卫戍部队为首的静冈、甲府、宇都宫等地军队参加革命，酿成事态严重的形势。但上述计划被同伙中的根本博泄露给人事局长冈村宁次，冈村又向次官杉山元告密。因此，在行动之前，以重藤为首的桥本、和知、长等人全部遭到宪兵逮捕，被监禁在箱根和千叶两地。举事计划终成画饼。但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上层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关东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似乎不妥。这时，荒木贞夫已代替南次郎任陆相，荒木给予关东军以积极的支持和增援，使关东军摆脱了后顾之忧，更加积极地从事侵略活动了。石原曾留学德国，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自由资本主义。满洲建国初期，曾拒绝日本财阀涉足满洲。日本财阀认为石原在满

洲，对他们大为不便，于是便唆使有关当局将石原调回国内，其后任安排了便于资本家操纵的小矶和冈村等人。尤其是满洲国的高级职员，都是由日本大藏、商工、内务等省的官吏担任，他们认为只要是为了日本，就一切都好，不顾满洲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引来日本财阀，使满洲成为其口中的猎物，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河本大作笔供

（1950年4月）

“九·一八”事变前夕，我正住在东京涩谷区园山家中。9月8日清晨，接到参谋本部重藤千秋（大佐）课长电话，要求我立即去参谋本部。当我赶到，重藤拿出用纸包着的5万日元，并说，此事难以委托他人，特烦前辈代劳。要求我尽快乘飞机将此5万日元亲手送交奉天特务机关长（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少佐。我以金额过大而抱有疑虑，询问重藤可否电汇。重藤表示，为保密起见，必须亲身携带。我预感到奉天可能正在策划某种行动，当即承诺，着手准备9日飞往奉天。次日晨从东京出发、经大阪、福冈、京城［汉城］，到达新义州后，因天气原因飞机停飞，便改乘安东始发的夜车，于10日晨抵奉天，立即奔赴特务机关，将纸包的5万日元亲手交与花谷正（少佐）。花谷向我诉说了缺乏机密费等实情，表示十分感谢，将钱放在神坛上，合掌礼拜。我在奉天逗留数日，9月16日板垣、石原两参谋出差来奉天检阅军队，约我赴金六饭店聚餐。席间虽未公开说明“九·一八”行动，但委托我在返回东京途中，要在大连和京城停留。在大连要动员满铁领导人，在一旦有事时望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在京城，朝鲜军参谋神田（中佐）定能前往机场迎接河本，届时应敦促其不失时机地越境支援关东军。对上述要求，我立即表示接受。17日下

午乘"鸽"号快车从奉天出发，当夜抵大连。次日，即18日晨赴位于星浦的大和旅馆访十河信二（理事），如实地传达了板垣等人的意见。板垣等认为满铁中以部长为首的全体社员完全同意全面地支持关东军，而只有内田总裁和江口副总裁的态度暧昧，希望十河能从中斡旋，使满铁领导人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十河毫不踌躇地表示接受，并约定亲赴旅顺将同满铁领导人商谈，结果将向板垣、石原进行传达。19日晨从大连出发，10时抵京城机场，神田中佐因出差不在，由中山大佐参谋代替神田出迎。当我问及朝鲜军是否已经越境时，中山大佐的回答是，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尚在犹豫不决。我当即传达了板垣等人的希望：必须尽快支援关东军。并委托中山与神田配合，尽力说服林军司令官。11时过，从京城出发抵福冈，当夜乘下关始发的快车，20日回到东京。

基于罪恶，我认为我对"九·一八"事变造成直接影响的配合行动是：

（一）为奉天特务机关送机密费；

（二）劝告满铁首脑，务必对关东军给予积极支援；

（三）督促朝鲜军越境。

这三项活动看来都不超出一个"带信人"的范围，但其影响却未必很小。由于这些活动，使关东军增强了威力，支持了关东军的侵略行动，罪责不轻。

编者注：河本大作去奉天的日期几次交代，前后不一致。

城野宏笔供

（1954年）

大多数日侨已经尝到侵略大陆的甜头，因此也倾向上述舆论。他们不断制造各种口实，以使侵略行为合法化。在国内进行

煽动鼓吹，同时促使关东军动用武力进行侵略。而关东军则由于外国，尤其是美国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日本，很难以微不足道的理由行使武力。

这时，随着抗日气势的高涨，奉天军乘满铁警备力量薄弱之机，曾有在柳条沟附近的铁路上放石头、拔枕木道钉之类的恶作剧行为，以破坏铁路运行。恰好在"九·一八"当夜出现一次规模稍大的破坏列车运行的事故，关东军以此为借口突然采取军事行动。

此次"九·一八"事变，是由板垣和石原两参谋密谋的，除他们二人外，在关东军内部则无一人知晓。只有在中东路事件[谋炸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上充当主角的河本大作，当时已成为浪人，让他在事变中充当配角，即担任与配合制造事件的满铁当局、出兵援助的朝鲜军进行联系等工作。此次事变共用经费35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满铁负担，其余150万元由哈尔滨(吉林)的熙洽付出。

事变发生当时，以本庄司令官为首的大部幕僚都在旅顺，在奉天的只有板垣和花谷参谋，此外还有中央派来制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少将，但当他到达之前关东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由岛本独立大队夜袭北大营，平田联队奇袭督军公署。事前曾以演习的名义用火车从旅顺运来的重炮(24cmHB)设在日军练兵场内，用以掩护上述平田联队和岛本大队的进攻。另一方面，第二师团主力由多门中将率领从辽阳赶到奉天集中；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幕僚也急忙从旅顺赶到。驻长春的第二师团所属长谷部旅团进攻宽城子的吉林军，公主岭独立守备队主力(约一个半大队)奇袭南岭的吉林军，借以支援关东军主力对奉天军的攻击。

张学良与宋哲元(王以哲)等急忙退至锦州。东边道的于芷

山军（约三万）犹豫不决，迟迟不积极行动。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军沿洮昂线发起攻击，于是，关东军以部分兵力进攻吉林，以主力沿满铁线和洮昂线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面进攻。在双城子和昂昂溪附近展开交战，很快就将马占山逐出齐齐哈尔；吉林方面的天野旅团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吉林。关东军的第一阶段侵略行动至此告一段落。时值1931年10月末。继而关东军获得来自日本国内的增援，便开始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在此之前，日本认为在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侵略基础已经奠定，便从国内派来驹井德三和坂谷希一，分别担任关东军统治部长和副部长，并配备了以满铁〈经济〉调查会为中心的大批满铁社员，以充实其阵容。此外，还命令大连税关长福本顺三郎接收大连、营口及安东税关，以便为将来伪满洲国的独立打下基础。

东京三月、十月阴谋事件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前后，3月和10月在东京相继发生两起阴谋事件。这两次事件都未曾表面化而暗中了结，社会上一般不了解其真相。然而，它却是不久发生"五·一五"、"二·二六"事件的预演，是使人们意识到日本正处于暴风雨前夕的事件。

在从1930年末到翌年初召开的日本帝国国会上，政友和民政两党仍然为了争夺政权而相持不下。国会中的斗争早已从口头辩论发展为喧嚣吵闹，最后甚至将活蛇抛进会场，简直是丑态百出。这使一般国民感到震惊，使有识之士无比愤慨。

这里，野心勃勃意欲跻身政界的宇垣一成，目睹国会腐败堕落之现况，认为有机可乘，便妄想以整顿国会为借口，发动政变、解散国会，天皇授命自己组阁。除宇垣之外，还有在陆军部内身居要职的人也怀有同样野心。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宇垣同乡、冈山人）以及参谋本部第二部

长建川美次等四人暗中集会、密谋行动方案。他们策划首先唆使右翼暴徒闯入国会，制造混乱，其间军队发布戒严令予以镇压，然后以收拾时局为借口，煽动舆论，从而使天皇授命重新组阁，组成军部内阁。

为实现这一计划，原定由右翼法西斯浪人的巨头头山满作为肇事的带头人，但他毕竟已年近90，无力担此重任。因此，又选定由满铁东京事务所（东京支社）所属〈东亚〉经济调查局局长、法学博士大川周明担任这一角色。小矶国昭将大川召至官邸进行密谈，委以重任。

大川周明一向同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自己也经常身着黑衬衫而洋洋自得。其手下还拥有狩野、松波等拓殖大学出身的勇士型青年。当大川听到这一建议后，毫无异议，立即承诺。同时，除自己同伙之外，还要纠集右翼团体大行会清水行之助一派，和以九州福冈为根据地的水平社的松本某。

经过秘密策划确定了行动方案。即在位于东京南北两端的品川、上野和中央的银座三处的百货商店、松坂屋和三越点燃假炮，将警视厅的大部警官和警察吸引过来。利用这一时机，将袭击国会队伍的主力一分为二，扮作送葬行列，从山手和下町两方面涌向国会。行动时间初步确定为3月上旬。

然而，小矶国昭对于大川周明的上述计划稍感不安，因此便向河本大作透露了这一阴谋，就关于大川能否完成任务问题征求河本的意见。于是，河本立即拜访大川，了解其准备情况，大川竟是得意洋洋，大言不惭，似乎宇垣即将奉命组成法西斯内阁，自己也将入阁占有重要的一席，语言轻率，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河本发现他完全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书斋中的幻想家的形象，因而深感不安。几天之后，河本在筑地的某酒馆中进餐，忽然听到隔壁有人酒醉后口吐狂言："最近东京要发生一起大事件。"

经查询，河本发现该人就是大川周明。河本更加认为此人不可委以重任。而且，河本后来又得知当时大川每晚从一个酒馆喝到另一个酒馆，酒醉之后必定胡言乱语。河本继而走访了大川的门徒狩野敏等人，详细了解实现阴谋的准备情况，当问到有无信心时，狩野等人虽然一向崇拜大川，但认为若委以如此重任尚需考虑。同时，让大行会一类的臭名昭著的右翼团体参加这一行动更为不妥。狩野等甚至请求河本劝告大川放弃这一计划。于是河本便拜访小矶，反映了这一期间所获得的消息。正值此时，宇垣从元老西园寺的心腹原田熊夫处得知，不久天皇即将下达组阁命令，所以最好不要采取世间传说的那种非常手段。宇垣闻听喜讯，心满意足，已无意再将阴谋付诸实施。另一方面，执政党自民党（民政党？）内的安达谦藏虽任内相，但自知不负众望，曾同宇垣暗中勾结。他以内相的职务之便，也获得上述情报。所以大川等人的阴谋活动在社会上的部分人中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已经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然而一旦要停止活动，大川等人又以已经着手准备为理由，坚决反对放弃计划，这使小矶等人感到非常棘手。结果付给违约罚款，才遏止了这次阴谋。大川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甲级战犯被送上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在法庭上发作精神病。

所谓十月事件虽同上述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却同“九·一八”事件有关联，是东京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煽动东京卫戍地各部队的青年军官制造的一次事件。后来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可以说就是这次十月事件失败后再次发动的。

“九·一八”事件是由板垣和石原两人极其秘密策划的，因此关于这次事件的对策毫无定见，当事件发生后也始终无所作为，使关东军一度陷于孤立境地。在这一情况下，以参谋本部的课长重藤千秋为首，有桥本欣五郎少佐、和知鹰次少佐、影佐祯

一[昭]大尉、长勇少佐、根本博少佐等骨干军官秘密结党，并纠集驻京各部队的青年军官，此外还吸收千叶县和霞关的海军航空队司令小林省三郎少将作为其党羽。扬言如果陆军中央对于满洲问题仍继续采取消极态度，就要坚决在东京发动政变，用以威胁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闲院宫载仁。

最初，上述以大川周明为首的右翼青年也曾参加这一阴谋，但板垣和石原二人避讳军部以外的人参加，因此完全由军人结党开始着手这一运动。其中，以桥本欣五郎和长勇二人最为偏激。他们主张无论中央是否支持关东军，都要断然实行革新。后来尽管中央下决心支援关东军，他们还要断然实行革新。另一方面，关东军内的板垣和石原等人建议，既然中央军部已经援助我等，就无需再采取非常手段。但桥本等人拒不接受，强调坚决采取行动。他们连日在新桥、牛込等地的酒馆中，昼夜狂饮，气焰嚣张。安达内相同参与这一活动的同乡青年军官有秘密联系，从中得知这一消息。安达认为即便将此情况报告给警视厅，只靠警官队恐怕也无能为力。正在他犹豫时，党羽之一的根本博(战败时任蒙疆军司令)偶然将这一秘密泄露给陆军省人事局长冈村宁次，冈村立即向陆军次官杉山元汇报。由于事关重大，陆军首脑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宪兵司令部将主要人物桥本、长、和知、影佐、重藤等人拘留，软禁在箱根和千叶，从而使运动自消自灭了。但它却构成了后来“二·二六”事件的起因。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九·一八事变》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

炮轰沈阳及北大营的两门巨型重炮

日本广播协会《昭和记录采访组》
天津编译中心　译

密运24厘米榴弹炮

大约在1930年11月中旬到12月，在任陆军省军事科长要职的永田铁山大佐与石原等人的奉天会谈中，关东军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约定好，满洲事变之际，进攻奉天城和北大营时，给奉天独立守备队配备二门能发挥强大威力的24厘米榴弹炮。

这二门重炮于次年(1931年)7月秘密从日本运到满洲。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进攻青岛时发挥了威力的、可以称为日本陆军之珍宝的炮。

在从日本运来及配备方面，均高度注意了保守秘密。存放在东京兵工厂的巨炮，由于体积和重量都过大，在运输时，为了不被中国方面觉察，拆御之后，竟敢用客船从神户运到大连。在大连码头的卸货任务，由穿上中国服装的旅顺重炮兵大队松本正文大尉等12人承担，从船舱直接搬入码头的地下室。然后，从地下室装入货车。向奉天转移时，为了蒙蔽当地中国人的眼睛，将长大的炮身用木箱遮盖，伪装成大官的灵柩。另外，炮架和架框，假称是石碑的基石和洗澡桶，运至奉天。

在独立守备队中，假称要构筑游泳池，挖了一个深1.3米、宽7米的安大炮底座的坑。然后在坑上面搭了一所10米见方、7米高的马口铁小房子。工作是每晚从12时至黎明3时进行的，

避过了世人眼目。然而，由于繁重的劳动和酷暑，其中有的士兵得了夜盲症。榴弹炮安装完毕后，其目标是瞄准奉天城和北大营的。

为了准确地射击，曾几次按目标测定了距离和方向。预先在炮身上刻了刻度。一旦有事时，只要开始射击，炮弹就会自动地达到目标。极其注意保守秘密，24 厘米炮，假称是阵地高射炮。然而，中国方面也觉察到了异常气氛，用飞机进行侦察，并在附近赶建了哨所等，紧张气氛逐渐浓厚起来。

1931 年 9 月 13 日夜，刚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独立守备队发出旨在应变紧急情况的通知。此事在次日的《满洲日报》上大肆登载，紧张程度一举高涨。

军司令官对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的训示

近日匪贼猖獗，严重妨碍铁路运行，甚至多次窥视我附属地，确实令人不胜寒心。对轻视我军威严的此等不逞之徒，应积极采取果断措施，并在完成铁道守备任务之同时，努力为帝国侨民扫除不安。

昭和 6 年(1931 年)9 月 13 日

关东军司令官　　本庄　繁

关东军司令官的这一训示，是由关东军参谋部第一课负责警备、兵站任务的中野良次参谋(炮兵大尉)起草，经本庄军司令官同意的。在此之前，中野参谋也征得了上司石原中佐的同意。石原大体上了解其宗旨，但在字句及其它方面稍有意见，对盖章表示犹豫。据说，两个人激烈争论达数小时，这时夜色渐深。于是，板垣大佐出面仲裁，石原参谋终于同意盖章。

石原说："我并不是完全赞成。"为表示非出本愿，把图章盖在了离规定稍微错开一点的地方。这一逸话写在中野良次所著的《满洲事变真相》一书中。

按照1930年秋关东军石原中佐和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大佐的密约，运到满洲当地的24厘米榴弹炮，发挥威力是在这5天之后。

震撼沈阳城的炮声

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战后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讲的。由于原来的目的不是破坏铁路，所以的确爆炸危害极轻。

以爆炸声为信号，正在进行夜间演习的川岛大尉，立即率兵向北大营南下，开始攻击北大营。

在柳条湖发生事件的消息，马上用携带式电话机向独立守备队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的岛本大队长、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的平田联队长，急忙赶往奉天特务机关。晚11时左右，在此从板垣参谋那里接受了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负责攻击北大营、奉天城。

同时，24厘米榴弹炮向着早已选定的进攻目标，吐出猛烈的火舌，炮声严重震撼了奉天的大街小巷。

从京哈线的道岔口向西约走100米，在柳条湖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满洲事变的事件现场目击者之一、74岁的韩永泰老人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那天夜里发生的情况。龚先生在旁边一面听着讲述，一面将此绘成平面图，帮助我们理解。

"共落下三发炮弹。第一发炮弹落在北大营跟前南面的小桥上。接着，第二发落在望花屯，第三发落在北大营的西门附近。那真是惊人的巨响。于是，日本军的装甲列车很快从南边赶来，士兵们向着北大营的西门发起攻击。"

这天晚上，韩老人在离柳条湖爆破现场300米处的菜园小屋里，与往常一样，和13名小伙子正要睡觉。当时，他18岁，从山东省来这里当了一家菜农的长工。铁路附近，只有他们的那间

小房子，此外再无人家。据说，那天夜里繁星满天。

“突然从铁路方向传来了爆炸声，很快就响起了枪声。我们都很害怕，先是在小屋里挤在一起。过了一会儿，炮弹从头上飞过去，大家都慌慌张张从小屋里跑出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日本兵便把长工们的小屋包围起来了。韩老人等吓掉了魂，心想：是不是要杀我们。他们13人象被轰赶似地被带到柳条湖爆破现场。那里，已带来数名过路人。于是，这时日本兵揪来了六七名穿中国服装的男人。然后，又面向韩老人他们命令道：“记住！这就是昨夜炸坏铁路的犯人。”

很快韩老人他们就被释放了，但仍魂不附体。心想：不知什么时候要杀我们。从昨夜听到炮弹的爆炸声以来，一直很紧张。据说，告诉他这种事以后绝对不能对别人讲，所以以后一直闭口不言。

（摘自《皇帝的密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九·一八”事变前的活动

关宽治

新任司令官本庄到任

参谋本部的森纠大尉，7月同石原就中村事件的问题进行会谈后回国。但8月18日他作为总领事馆对中村大尉事件的外交交涉监督官，再次来到奉天。在总领事和其他势力的压力下，森纠来到奉天省政府主席臧式毅的私人住处，提出强烈抗议说，

只要东三省方面不表诚意，日本军部则将以武力解决。在19日的报纸上，通过特务机关公布了中村事件的经过情况。总领事林（久治郎）对花谷抢先下手的行动提出责难，并将这一情况电告币原。

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于8月15日在东京车站迎接前任司令官菱刈（隆），在这位大将租的房子里办完了交接手续后即从东京出发，8月20日到达大连。原任第十师团长（姬路）本庄接到调任关东军司令官的非正式消息是在7月20日，8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军司令官之后，本庄以板垣为随行参谋出席了8月3、4日召开的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从9日开始走访了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同各位首脑进行了细心而深入的重要会谈。据说同永田、冈村、重藤、小畑等人也进行过特别会谈，9日又同板垣进行会谈。不过很难推测本庄是否已经知道9月下旬在柳条沟行使武力的计划。板垣同本庄在9日的会谈结束后，先行一步回到满洲。

本庄于20日到达大连后，21日听取了三宅参谋长和各位参谋的报告，访问了关东厅长官冢本。从22日至25日巡视驻旅顺的官民。26日，分别听取了张学良顾问柴山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报告。8月29日，本庄向三宅参谋长和板垣高级参谋就满洲时局的对策问题作了指示，其内容可能是遵循中央部关于《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的精神。

9月1日上午，本庄听取了石原谈的有关作战计划，晚上又把石原叫来，征询他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虽然，很难设想石原会在这天晚上就向本庄全面透露准备在柳条沟行使武力的计划。但是可以想象，他的议论肯定要比中央的精神更强硬，估计对以中村事件的交涉为契机而进行武力解决的必要性，将作为一般主张提出来。

不管怎样，石原和板垣似乎相信，这个新来的司令官是能够实行他们的计划的。9月1日，本庄向全体关东军所作的训示说："本职深深有所期待"，谈到满蒙形势的紧迫时说："关东军的责任确实重大。"

接见关东军两大支柱

8月26日，柴山同本庄进行会谈，9月2日回到北京，向张学良转达了关东军的强硬态度。之后，柴山为传达张关于和平解决的意图，他决定回国。9月3日，土肥原也会见了臧式毅，督促解决中村事件，并转达了军部的强硬意见。这一天，本庄又同关东军的支柱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进行了畅谈。

畅谈时，他指出"中国官民的反日运动"越来越有组织性，感到最后解决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他谈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军队的下级军官""越来越轻侮日本军，不断向士兵鼓吹反日"，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加之他们士兵的愚昧无知和随声附和，难保不对我军采取挑战行动。……一旦日中发生正面冲突"时，"我军势必要下重大决心"。

又说，为解决满蒙问题，自然应抓住"可乘之良机"，但由于(日本)"现政府"还没有"坚决采取措施"的决心，所以计划由在满各民间团体向国内派遣宣传员，"军方正在暗中支持他们。"(多门二郎和森连)两人都认为，"对满蒙问题的最终主张(解决领土问题和开展日中战争)，军部不主动提出，要国民起来呼吁"，军人不应参与"政治性活动或在华浪人的谋划活动"。

视察各地军事部署

本庄司令官于9月7日开始检阅4月中旬驻扎的第二师

团，逐次巡视了大石桥、鞍山、连山关、奉天、铁岭、公主岭、长春乃至辽阳及其主要部队。在巡视途中，9月8日，本庄在奉天带领石原前往总领事馆走访了林(久治郎)。

林表示"希望谈谈时局问题"，石原却对本庄说："司令官，旅行若不按计划可不行"，企图阻止他们交谈。林也还击说："我和本庄的谈话不是私人之间的交谈。"石原又回绝说："军司令官眼下正在视察演习，没有机会进行这类闲谈。"因为本庄还要来，所以林希望到那时能谈一谈，就不再作声了。石原于8月来访时，林曾试图限制过他的行动，因此对石原来说，林便成了眼中钉。

这时，石原对总领事馆的监视存有戒心，对今田、三谷、花谷等人说："9月下旬的柳条沟计划不搞了。"带着藤田(重藤)提供的资金来到满洲的河本，听到这一消息颇感意外，就去问石原。石原改口说："因为外面流传着风言风语，所以表面上我假装停止了。"板垣也吐露真情说："我决不改变态度。"这是9月9日的事。

9月12日，本庄巡视公主岭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守备队司令官森连报告说："中国官民正在大力组织反日运动，土匪的猖狂活动也随之更甚，最近，轻视我军队，企图主动加害于满铁和附属地的不法行为日趋明显。"

次日(13日)，本庄在出发赴长春前，作了异乎寻常的强硬训示。他说："对不良之徒，必须采取主动、坚决的措施，完成铁路守备任务，同时要努力消除帝国侨民的不安。"

九月十七、十八日的紧张局势

在辽阳的本庄司令官接到旅顺的三宅参谋长打来的电话，正式告诉他："因为建川少将要从东京来奉天，希望将板垣参谋或石原参谋留在奉天。"此间，中岛信一也来到辽阳同板垣取得

联络。据估计，在联络事项中，可能包括建川想在本溪湖下车后同板垣商谈的通知。夜里，板垣把石原叫到辽阳白塔旅馆的一间屋子里进行密谈，并再次确认板垣负责处理奉天问题，石原负责对旅顺进行部署。

9月18日上午9时，本庄在辽阳的师团司令部，就检阅驻扎部队向多门师团长作了最后评语。评语在最后结束中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话虽抽象但很强硬。军司令官一行于下午2时乘上由辽阳开出的快车前往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本庄到达旅顺后与一行人分了手，前去野田画伯家看了看画好的那幅自己的肖像画，于晚上10时许回到官邸。那正好是柳条沟铁路爆炸之前不多久的事。

（摘自《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三

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

恣意挑衅　制造侵略借口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车向忱*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形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积极从事于殖民地的掠夺。它的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1894年和中国挑起了战争，不久中国海军大败于黄海，陆军大败于平壤。次年订立《马关条约》，索我辽东半岛，嗣以俄、德、法因均势关系出而干涉乃罢。但中国赔款2万万两白银，割让台湾、澎湖诸岛，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境内享有最惠国待遇。

日本和帝俄的侵略势力，从此也发生了尖锐的矛盾。1904年，在中国东北的领土上，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帝俄失败，订立了《朴次茅斯和约》，将东清铁路支线的长春到大连段让给了日本。日本又迫使清政府承认它继承帝俄在南满的一切所谓权利，加紧经济、文化侵略，以至最后疯狂地武装占领，而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

* 作者为我国著名教育家，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副省长等职。

日本在东北除了掠夺资源、垄断市场外，还以南满铁道为大本营，干了许多野蛮卑鄙的勾当。这里举"九·一八"以前的几个事例来说明一下。

（一）扰乱治安。沈阳"日本站"（南满铁道用地）有好些商店，是日本人为贩卖军火而设的。仅我记得的就有吉田商会、大正洋行、青木洋行、敷岛洋行、上田商会、吉川组商店和元田茂商会等10余家。他们卖大盖枪、匣枪，也卖各种子弹。土匪买到这些枪以后，就到城内外各地行抢；抢到财物再回到日本站避风。那时候东北土匪很多，抢案迭出，就是他们制造的。

（二）贩卖毒品。日本在东北的官宪，还纵容他们的"浪人"在满铁沿线各站大量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因而当时中国的吸毒者日多。1930年初，辽宁邮局扣留了日人由德国贩来的毒品，价值奉大洋百万元左右。

（三）投机倒把。南满铁路沿线各大站，都设取引所。专作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买卖。四平衔、孙家台（开原县）、沈阳都有。中国商人贪图暴利，多堕其术中，有的蚀 了本，弄得家破人亡。

（四）强占民田。1928年7月，新民日本领事唆使日商劝业公司执事人飞田隆，强占七公台稻田，当地农民起来制止，发生了纠纷，日本的武装警察击毙了会首韩锡奎。1930年6月，沈阳日本领事支持榊原农场，强占北陵附近高钧阁田地。象这样的事情，在东北各地也是层出不穷的。

（五）杀害良民。日本在东北，特别是辽宁，无视中国主权，在南满沿线各站以至各县、镇都设立警察署，残害我国人民。1931年，辽阳回民米双祯，就被日本警察诬为窃盗，用凉水灌死了。

（六）军队行凶。1929年9月，住铁岭的日本守备队包围我铁岭公安局，绑去官警30余人，非刑拷打，逼死卢大队长。

以上这样事件，在"九·一八"前是屡见不鲜的。辽宁人民忍

无可忍，乃不断掀起反日运动。

（摘自《辽宁文史资料》第二辑）

榊原农场

佟尔佳

从晚清到民国，沈阳居民都知道小北边门外，有座北老爷庙。所谓老爷庙，是供奉关羽的庙，塑像一般是红脸，唯独这个北老爷庙，把老爷的脸盘塑成白色的，人称白脸老爷庙。年代久远，人们虽觉得奇异，也没人考究其所以然。1928年满族名流金梁先生，在奉天道德研究会讲演满洲遗闻时，曾考证白脸老爷庙供奉的不是关羽，而是清太宗皇太极。说皇太极西征锦州宁远时，在这里誓师点将，曾留有一座砖砌的点将台。早年这个庙有位住寺道士，写过一副门联："一兴京，二盛京，都京独坐。先辽阳，后沈阳，昭阳存身"。虽然对联的文句，不怎么高明，但也可以说明庙是为皇太极修建的。金梁还说，这类白脸老爷庙，在关内冀东一些地方也有，是当时人们苦于腐朽的明朝统治，盼望解救之意。

白脸老爷庙，庙产土地是相当多的，差不多柳条湖村的西部（现柳条湖公社柳条湖大队）都是这个庙的香火地。香庙的道士姓陈，人称陈老道，他的家族很多，这片庙产向来由陈姓各家包种，每年交纳租金给庙上。二三百年来就是这样的租种关系。但在1916年的谷雨前后，当陈姓各家携带种籽牛具，下山耕种时，突然来了几十名日本武装军警，沿着六国会馆的高尔夫球场北面（现昆山路东段、北两孔桥东，北陵东南地区、现辽宁省政府东

南方)散开一个包围圈,设置岗哨,驱使大批朝鲜浪人进入圈内,见着中国人就打,硬把种籽、牲畜抢走,日本兵将这片土地抢占,并在周围钉上木桩,上写"榊原农场所有"。陈老道率领陈家各户,到奉天交涉署告状,拖了好久,交涉署才非正式地告知陈老道,说这是袁大总统答应日本有商租权,地是要不回来了,只可向榊原去索讨租金。榊原抢占皇太极庙上这一大片土地,使用朝鲜人,把中国水利局调通的新开河,硬扒个口子放水,改旱田为稻田。榊原农场,向来用水不缴纳水利费,水利局前往征收水利费和陈老道索讨地租均遭到毒打。中国官方对于榊原的横行霸道,一点对策也没有,受害人家,更是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不了了之。

关于袁世凯给日本人商租权问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趁其他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机,于1915年1月18日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廿一条"要求,5月间又以"哀的美顿书"(最后通牒)形式,强迫袁世凯承认"廿一条"中:"日本臣民在南满洲,为建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经营农业,可得租赁或购买其需用地亩"的条款。榊原就是根据这一条强占了这块农田。

继榊原抢占土地之后,南满铁路沿线,也出现许多日本官民抢夺中国土地、毒打中国百姓的事件。如东洋拓植株式会社、东亚劝业公司等,都曾猖狂侵夺土地,进行大量殖民掳掠。在民国4至6年中,奉天省交涉署曾受理大量的控诉日本侵犯所有权案件,均不了了之。

榊原的名字叫榊原政礁。在1906年日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得了南满铁路,大量向东北殖民时,榊原就窜到了奉天,勾引日本军队霸占了北陵土地,谎称是中国人卖给他的。清政府派员与日本交涉,经过10余年,花20万元的代价,才将土地收回。

榊原获得这笔意外之财，贼心并未稍敛，仍然要求继续商租其地，用日人浦本政一郎的名义又承租下来，通过中国的三陵衙门将北陵水田1600亩，旱田30亩，房7间，与浦本缔结商租契约，明文规定日本人每年需交田租奉小洋600元，旱田及房屋交租洋100元。但后来由于日人积欠租金拖延不交，经三陵衙门照会日领催交也无效。1925年三陵衙门取消，省长公署命令解除契约，将地收回，日本领事不但不允，且以种种威胁相恫吓。榊原霸占北陵的田地，20余年从没付出一文的租金。

东北大学（现辽宁省政府）理工学院所属工厂为了运机器、材料、产品的需要，与北宁铁路局双方协议，修筑一条支线——北宁铁路北陵支线。路线由皇姑屯向东北，通过东北大学工厂，续向东北方向（现公安厅后院）至五一商店附近，进入东北大学。支线的车站，设在现龙江中学附近，当时中国的沈阳公安机关为了保障治安，在支线车站以西（现公安厅稍北）设立一个警察派出所。北陵支线有一段通过榊原农场地界，即从皇姑屯车站至东北大学工厂一段，已敷设铁轨并已通车。榊原农场于1929年6月27日，勾来日本铁道守备队80余名，竟将这条北陵支线铁轨拆毁数段，把车站和警察派出所统统捣毁，并竖立木桩，大书“不准通过榊原农场”。辽宁外交特派员公署，向日本总领事馆虽提出严重抗议，迄无结果。1930年6月，榊原农场又将新开河木桥南的官地一段占踞，立标桩，两面写上“榊原农场事务所建筑用地”及“榊原农场小作工人住房建筑用地”，迭经交涉，日本均置不理，纵容榊原肆意侵害中国公私权益。

榊原派在农场的大管家池之内岩光，也是个颇有来历的浪人。他经常住在御花园东边长宁寺（现沈阳市黄河液压件厂），大门上悬挂一块木牌，右边写着“华族池之内岩光”，左边写的是“榊原农场”4个大字。日本社会分为皇族、华族、贵族、士族、平

民、新平民等阶层，池之内属于华族，社会地位是不低的。他长时期孤身一人，住在农场，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有什么家属，他腰间插着一支手枪，喂养两条狼狗，狗脖上戴着皮圈，圈上满是铁钉，池之内长相狰狞，望之可怕。他手下有个朝鲜浪人，外号金大头，带领四十多户朝鲜农民，垦种强占的那片水田。1930年夏季，农场院内一间房屋的玻璃窗，被拘囚在屋内的人用头撞出个大窟窿，想要逃走，池之内立即掏枪把那人打死。村里人看到榊原农场出事，报告给沈阳县第九区(御花园原第九区)，区官带人赶到现场，看到榊原农场的牌子，没敢进去办案，只在外边向院内窥探一下，听听村里反映的情况，就走开了。第二天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把池之内带走，告诉村公所负责把死者埋起来。奇怪的是时已盛夏，死者身上还穿着过冬的缎子面大棉袄，看来是早就把那个人拘禁起来的，被日警带走的池之内，过一个星期安全无恙地大摇大摆回来了。后来才明白，死者是朝鲜浪人金大头从新民绑来的一个票，勒索巨金来赎。死者长期被囚，才撞坏玻璃想逃走被枪杀的。

(摘自《辽宁文史资料》第九辑)

忆一九二九年的“铁岭事件”

孟克毅*

1929年是个多事之秋，继“中东路”中俄战争之后，斯年9月，铁岭县城又发生了一次较大的中日纠纷事件。这次事件的性

* 本文作者孟克毅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陆军学校校长(军级)，已离休，现住大连第四干休所。

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人民的一次最野蛮的侵略行动。

我当时13岁，在铁岭县立中学最低年级十三级学习，我是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这次事件的千万个中国人之一。虽说我年岁较小，但对我的心灵刺激太大太深了，使我终生不忘！虽说这一事件距今已有58年之久，回想起来，记忆犹新。现将这“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事态发展的过程、事件的结局和对我的影响，概述如下：

记得在1929年9月一个星期六下午，铁岭火车站日本守备队的几个士兵，在广裕大街一家饭店喝酒，喝得熏熏大醉，吃完就走，也不付钱，当店家向他们索取酒钱时，他们就动起武来，用刺刀把店家刺伤在地，这几个日本士兵走到街上，气势汹汹，象个疯狗，见人就打，遇上什么抢什么，抢不走就砸烂，吓得人民群众争相逃避，无人敢来过问。随后这几个士兵，又闯进了唱戏的“清乐园”里，无理取闹，逢人非打即骂，秩序大乱，演出停止。在场维持治安秩序的我公安兵，向前劝阻，竟遭日本士兵刺伤，当即就有一名公安士兵，被刺伤倒地。这时，铁岭县公安大队的大队长卢振武见事不好，亲自出面前来制止，但日本士兵仍不听劝，反而又向大队长行凶，公安大队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命令我公安士兵动手，将其中一个打倒在地，另几个日本士兵仓皇逃回车站，“事件”随即发生。

铁岭火车站日本守备队，得知其士兵在城里无端肇事被打伤的消息之后，当夜调兵遣将，从沈阳调来大批增援的日本部队，于次日早4时许，开始分头出扰，首先将铁岭县公安大队驻地包围起来，进行武装搜索，见人就打，见兵(公安兵)就杀，扬言要活捉公安大队长处以极刑。同时派兵又将铁岭县政府包围起来，里不能出，外不让进，黄县长下落不明。日军并在各主要马路

和街道上，派设岗哨，警备森严，不叫人、车通行，有违犯者，当即枪杀，曾有许多无辜的民众白白地被枪打死打伤。叫人最不能容忍的耻辱，是日本鬼子派兵将铁岭中学也看守起来，不准学生出入，学校被迫停课。更为蛮横无理的做法，是日本鬼子竟把铁岭各界用电的电源切断，到了晚上无灯可用，无明可照，一片漆黑，那种暗无天日的情景，真叫人又可恨又可怕。另外，所有县府机关部门，都陷于瘫痪状态，学生失学，商店关门，停止营业，市民恐慌不安，社会秩序大乱。就是说，由于日本鬼子的发难，把一个和平乐业、买卖兴隆、市景繁华的铁岭城，变成了一个任由日本鬼子杀人行凶，为所欲为，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屠宰场。

"铁岭事件"发生后，奉天省(辽宁省)当局立即知晓，派专人从外交方面与日本驻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土肥原交涉，并派人协同日本方面来铁岭调查，我方表示愿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尽快解决，以防势态发展。但日本方面所提条件过苛，把发生"事件"责任推给我方，什么交出杀人罪犯县公安大队长，什么赔款多少多少……诸如此类的要求，致于日本士兵首先行凶杀人，打伤我公安兵，打死打伤我民众多人，以及武装侵占铁岭城，袭击县政府，危害市民生命财产等等侵略罪行，只字不提，这些无理要求都被我方拒绝。

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我东北当局张学良将军曾派一个步兵团，由沈阳出发，徒步行军，于"事件"发生后第三天到达铁岭，其任务是控制事件发展，维持地方治安。为了避免中日军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暂未进城，临时住在城东南郊区乡下。

经中日双方代表几天交涉，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日本方面要求，中国交出公安大队长，由日方处刑，否则拒不撤兵。中国方面坚决拒绝了这种蛮横无理、损害国家主权的要求，斗争激烈，相持不下。

说起公安大队长，他于事件发生后，在日本鬼子进兵侵占公安大队部和包围县政府之际，带了两个公安兵，躲避在广裕大街某小巷的院子内，敌人不易发现，以观情况发展变化，他并未估计到日本会出重兵动武，侵占县城，残杀人民的这种严重后果。在此期间，曾有人劝他暂时外出，避开锋芒，待机行事，但被他拒绝了。他认为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遗祸于国危害人民。当他得知日本鬼子非要他不可，不达目的，绝不善罢甘休时，他为了铁岭县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中华民族崇高无尚的荣誉，毅然决然要挺身就义，都被人们劝阻。但他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计，他最后毅然悬梁自尽，以身殉难，以忠报国，公安大队长的这种豪情壮志，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行动，感人至深。

公安大队长以身殉难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无不为之感叹而流泪。中日双方谈判代表也赶来现场，检验属实，日本方面再无隙可寻，于是将其军队撤回车站，中国军队开进城内，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商店营业，学校开课，此"事件"闹腾了六七天，中国方面损失很大，不了了之。

"铁岭事件"平息后，约一个星期，铁岭中学的师生自发地起来组织了对殉难的公安大队卢大队长的追悼会。记得在一天的下午4时许，全校师生千余人集中在教学楼南侧大操场，召开了庄严沉痛的追悼大会，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都讲了话。全体师生正沉郁于悲痛之际，忽有几个日本鬼子(特务)身着便衣，乘马车来校，直接闯进追悼大会的现场，进行无理干扰，当即引起了广大师生的愤怒，坚决提出抗议，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几个日本鬼子作贼心虚，见势头不对，狼狈遁去。我们胜利地开完了追悼会，使广大师生受到了一次很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

(摘自《铁岭文史资料》第四辑)

龙井事件

金仁哲

“龙井事件”的中国警察与日警的冲突，是由华人小商贩杨福瑞与朝鲜人斗殴而引起的。1930年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日）晚9时许，以贩梨为业的小商贩杨福瑞在龙井阜宁胡同卖梨时，不知由何处来的六七名朝鲜人，并未问价，随意伸手将梨拿去数枚，杨福瑞要钱，他们不但不给，反而将杨推倒在地殴打，将杨左眼打伤。杨情急呼救，幸有邻近一名中国人上来，将杨救下，捉住不给钱的一名朝鲜人，拟扭其赴商埠局公断。适来一中国警察要处理此事，恰在这时，突来10余名日警，不由分说，将朝鲜人夺去。中国警察刚要说理，这伙日警强将中国警察一并带至日警所。后经商埠局派翻译吕秉和宪兵胡宝山前往交涉，将中国警察索回了事。但市内秩序依然相当混乱，华、朝人众愈集愈多，渐渐接近驻军哨所，哨兵遂即赶散，希望就此息事宁人。

不料，随后发生了一场更大的流血事件。当夜10时，驻龙井东北军十三旅七团一营三连哨兵发现，携带武装的10余人，突然从新安街南头往北朝着三连哨所急行而来。哨兵见这伙人形迹可疑，甚恐不逞之徒乘机肇事，当即喊令停止前进，并诘问口令。这伙持枪之徒不仅不听不应，反向哨兵开枪。哨兵出于自卫遂还击。这时阜宁胡同口里亦突来数名持枪之徒，由北朝南射击。三连哨兵断定这是暴徒们有预谋的南北两面夹击。对己颇为不利，遂退避商会院内。事后查悉已击毙2人，即龙井日本总领事馆警察吉冈、藤田，伤1人，为该馆警察勤务员高桥。

日方使出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反诬中国军方有意造事。10月8日开始，日方以保护侨民为由，大批军警（103人）公然由朝鲜境内开入龙井村，到处添设警所，增加岗位，陆军、马警及骑自行车的日警，成群结队地到处搜查，他们不仅埠内如此横冲直撞，埠外各乡屯也派遣武装军警逐户搜查，10月17日竟出动飞机在我领空作示威飞行。

但是，面对俨然以兴师问罪之态，恣意扩大事态，到处寻衅滋事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地方政府却告诫军民以“隐忍为重，静待上级解决。”但群情激愤，毫无畏惧，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10月1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根据张学良的呈报，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提出抗议。16日，间岛日本总领事到延吉交涉龙井事件。经过中日间的多次谈判和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如下三条协议：（一）延吉市政筹备处长到间岛日本总领事馆表示惋惜；（二）处罚责任者及行为者；（三）对殒命日警和受伤的日警由华方付吊慰金日币1万元和医药费200元。

11月5日，入侵龙井的103名日军才退去。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供稿）

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经过

王福山　王贵山口述　郭坚林整理

我叫王福山，今年82岁，他叫王贵山，今年73岁。我们都是原万宝山乡黄家村马哨口屯的农民。我们在10岁左右就在这里落脚安家了，在马哨口这屯子都住一辈子了。万宝山事件时，我们才二十多岁，亲眼见到了日本鬼子强占咱中国地盘的经过。

民国20年(1931年)那年春天，冰雪刚刚开化不久，有五六个日本人和韩国人(编者注：朝鲜于1910年被日本侵略者吞并，以前曾称韩国。在1931年万宝山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习惯称朝鲜人为韩国人。)坐着小汽车，连续几次到我们马哨口和姜家窝堡看地形，他们来了以后，挎着望远镜站在我们屯西头河沿(伊通河)上往北张望，一边看一边翻“洋话”，左瞅右瞧一看就是半天。当时，屯中的老百姓谁也不知道外国人想干什么，都很担心和纳闷儿。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有一个叫郝永德的，他当时在长春干事，听说他还在宽城子“窑子”(妓院)里混过事，还有当过保长

的姜家窝堡的绅士张洪彬。他们为了个人捞到好处，也不知什么时候和日本人、韩国人勾搭上了。他们和外国人一鼻眼出气，私下把马哨口、姜家、官荒、三姓堡的400多垧熟地和大片荒地都租给韩国人了。

郝永德恐怕有地的人家起来反对，就去找地主孙六爷(孙永清)说:“把地租给韩国人大有好处。”孙永清当时没有答应，住在长春干事的兄弟孙永彬知道这事后，就对孙永清说:“把地租给韩国人种稻子，就是勾引外国，那还了得。”当时，孙家兄弟俩都主张:说啥也不能把地租给外国人种，南北二屯也没有一个愿意把地租给韩国人的。可是谁知道就在这时，郝永德他们这些汉奸卖国的家伙，勾串日本人和韩国人，背着政府和老百姓早在4月把出租土地的契约文书和韩国人就立好了。

(编者注:1931年4月18日，朝鲜侨民李升薰率180多名朝鲜侨民在伊通河马家哨口破土动工、挖掘水沟，因遭孙永清等人阻拦，曾两次停止挖沟。

5月2日，百余名朝鲜侨民又来挖沟，经交涉后，朝鲜侨民代表申永均曾决定停工解散。但日方胁迫朝侨，并派军警监督挖沟。

6月初，形成中日双方对峙状态。)

等到那年五月开铲前(阳历6月上旬)，果真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头子申文达带着二百多韩国人就像一窝蜂子似地拥上来。他们先在河沿上搭上帐棚后，没容分说操起锹镐，从伊通河马哨口入手，向北排开阵势就挖起来。韩国人穿的都是白衣服，老远一看白花花一片。

韩国人先动手挖的是孙永清的地，孙永清领着十多名本家人，骑着马挎着枪就去阻挡。可是到河沿一看，韩国人那么多恐怕打不了，就回来了。于是，他就联合屯中肖万林等有地的人家，

到长春去上告，要求政府出头作主，赶走韩国人。当时，咱中国政府就和长春的日本衙门口（日本领事馆）动了交涉，要求韩国人从万宝山赶快撤出去。可是日本人不但无视中国人民的主权，反而暗地里继续支着韩国人。

又过两天（6月10日）韩国人就猛增到四百多人了。这回可不象头回了，其中还夹杂着二三十"黑帽子"（日本警察），他们还带着4挺机枪和步枪，把机枪支到河套的柳条丛里藏着，准备随时开枪打中国人。

韩国人增多了，就不分黑日白天地筑坝挖沟。他们还用"王八捞子"（大铁铲）用人拖着开沟。当时受害的农户有十多家，马哨口屯有个姓马的农民，在河沿上有二十多条垄头的半垧地，韩国人挖到他的地块了，他就出来拼命阻挡。有几个韩国人上去就揪住他的肩膀子，把他搡到一边去了。老马还想去拦挡，可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就这样，一条南北长二十多里，一丈多宽的水沟很快就挖成了。6月末，又在马哨口河段修起一道坝。

这时，讲仁讲义的中国农民，还等着政府出力赶走外国人呢，可是一等再等交涉无效。眼看大片量的熟地被挖成沟，又在河中修堤拦水，必定造成几十垧洼地水淹成灾。当时，我们农民怎能不顾虑乡土呢，心里真是又气又急。大伙都说：不能再忍耐、再等了，咱们团结起来和日本人、韩国人干。

于是，在7月初的一天（7月2日）就集合了一千多人，由孙永清和姓曲的几个人领头，还有官荒西孙禄屯的姓孙的，他当时是打旗的，大家伙就开始平起沟来。韩国人白天挖，咱中国农民就黑天平，一连干了两三个回合。真看出来咱中国人不是好惹的。那年我们正在年轻，都参加了回填沟的斗争，连屯中的十多岁小孩都动手了。小南一间堡的乡亲们也行动起来，带着自卫的枪支和铁锹参加平沟。当时，真是人山人海，数不清的铁锹一起

一落闪着亮光。人心齐，力量大。那天从早晨6点钟开填，到7点多钟，一气就填平了五六里，决心夺回来被毁坏了的土地。这时，日本警察竟向我们填沟的人开枪射击，可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并不害怕，继续填沟。为了自卫也操起来快枪抵抗他们，战场就在马哨口屯西头河沿上，那天上午双方开火交战时间不长，后来，咱中国农民在政府来人劝阻下就停火了。

在这一场大仗中，咱中国受到的损失是很大的。农民被日本警察殴打致伤，陈××(外号陈聋子)等十多个人给抓走了(编者注：据原始材料判断，事件中并无中国农民被捕，亦属以误传误)。把咱们的良田给毁坏了好几十垧，折合"现大洋"(银元)能有几万元。可是再看看日、韩方面呢，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这场仗打过以后，虽然中国政府继续出头交涉，可是韩国人并不撤走。事隔一天(7月3日)，贼心不死的日本人又增派四十多个日本警察，还运来帐篷十多架，在马哨口壕沟附近，搭起了临时驻军营房，黑日白天扛着枪在壕沟上来回放哨，如果发现咱中国人，哪怕是一个孩子靠近水沟，日本哨兵举枪就打。

日本人在马哨口河沿安上营盘后，那时没有电话，他们就用鸽子通信。我们时常看到从日本的军营中放起鸽子向长春那面飞去。

到了这年8月秋成时，又从长春来了6架飞机，在西河套马哨口附近扔下了2颗炸弹，我们都知道那是吓唬咱中国老百姓的。又过了些日子，紧接着就到"九·一八"事变，从那时起咱中国人就当上亡国奴了。

事变以后，由于咱东三省被日本鬼子占了，转年春天，韩国人就越来越多了。南从马哨口起，北到姜家窝堡、官荒、三姓堡这一趟河川能有千八百垧地，全被韩国人占了。当时，领着韩国人种水田的头子叫金龙角，他仰仗日本鬼子的势力，到处强占咱中

国农民的土地。转年春天，官荒屯农民王宝喜正在他的两垧地里种地呢，一个韩国人闯到他的面前就说："你的地我们的水稻的干了。"王宝喜当即反对说："你的水稻干了，我的什么的干"？他坚决不同意韩国人强占他的土地种水稻。

万宝山事件是怎样挑起来的，当时我们是不知道底细的，后来才知道是日本鬼子要占咱东三省，利用一些韩国人，到咱中国来惹事生非所使的花招。现在，韩国人在我们马哨口屯西头挖的那条沟子还在呢，我们给它起名叫"高丽沟子"，还有韩国人在沟口上修的水闸门也在那儿保存着，那都是日本鬼子侵占中国的罪证。

（德惠县政协供稿）

万宝山事件真相

杨昭全

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为寻找出兵我国东北的借口，挑拨中朝两国人民关系，蓄意制造的一次大规模反华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北约30余公里（今德惠县万宝镇），当时隶于长春县公安局三区辖境，是个92户、1 100余人的小集镇。当时，由万宝山西南9公里均为长春县公安局三区辖境，由三区辖境西南2.5公里至伊通河沿为二区辖境。

长春市七马路居民郝永德受日人怂恿，成立长农水稻公司，自任经理。日本帝国主义则通过郝盗卖中国土地租给朝鲜侨民，从而达到收买土地、设领置警之目的。郝在日本领事馆的授意

下，在吉林省万宝山地区为日人盗买土地。

1931年4月16日，郝永德租得万宝山地区姜家窝堡肖翰林、张鸿宾等12人所属之生荒熟地500垧（旱田），租期为10年。租契订明："此契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准，仍作无效。"① 郝并未履行呈报县政府手续，进而将所租土地转租给李升薰等9名朝侨，为期也是10年，此契也未报县政府批准。李升薰等9人，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以"兴办三星堡水稻农场"为名骗到万宝山地区的188名朝侨的领队。李升薰等租得之土地，实即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汉奸郝永德的盗买和朝侨的租种，取得中国土地的占有权。

李升薰等依日人之命，决定将租得之500垧旱田改为水田，计划引50余华里之外的伊通河水进行灌溉。为此，要在伊通河截流垒坝，挖掘引水沟。李升薰等率180余名朝侨先赴伊通河岸马家哨口祭河神。尔后，于4月18日破土动工，挖掘水沟。水沟首先在长春县三区界内张鸿宾等12家耕地开始挖掘。此沟由孟昭月的蒲草甸界沟西南角起，至盛家屯房西，长3.5公里，宽3米，深50厘米，两侧积土约1.50米。至月末，李升薰等又分出30余人到二区界内孙永清等41户耕地内挖沟。此沟与前沟相接，向西南延伸直至马家哨口南侧。长度也约3.5公里，宽5米，深1.90米，两侧各积余土4米。

李升薰等朝侨截流垒坝，引水挖沟，对万宝山一带中国农户有巨大危害：

1. 引水沟所掘之土地为另外41户（二、三区居民孙永清等）中国农民所有。李升薰等和郝永德皆未与这41户中国农民签有任何契约，硬在这些中国农户土地上挖掘水沟。而且，挖掘

① 《肖翰林与郝永德订立之租契》，《新亚细亚》，3卷1期。

出来的泥土堆在两侧作为堤坝，两侧各宽约1.50米，长约10余公里。这样，水沟占地及堤坝毁田将达40余垧，每年损失数千元。

2. 在伊通河上垒坝截流，水大时将使上游两岸低洼民地2 000余垧被淹没。

3. 李升薰等所租之地地势较高，改成水田后，无处泄水，附近低洼土地又将被淹没数百垧。

4. 引水沟两岸低洼处，当渠水涨溢必将又侵入田地，将约有4 000—5 000垧良田被淹。

5. 马家哨口为伊通河河东河西交通要道，垒坝截流，水势增高，河东河西交通将为之阻断。伊通河是长春一带农民夏令航行运输必经之路。中间垒坝丈余，长春、农安两县运输航路将为之阻断，沿岸将有数百户以航运为业的农户生活受到威胁。

因此，李升薰等朝侨挖沟引水、垒坝截流，一开始就遭到当地中国农户的抵制。4月末，李升薰等在孙永清等中国农户土地上挖沟时，孙永清等11人进行两次阻拦，朝侨曾两次停止挖沟。5月2日，百余名朝侨又来挖沟，孙永清等又赶去阻止，但未奏效，于是发生冲突。此后不断发生口角，但挖沟仍然持续进行。孙永清等中国农户无奈，遂派众多代表进城向长春县府请愿。孙等申称，马家哨口一带民地与郝永德并无契约关系，无端受害，要求县府出面制止朝侨挖沟。长春县长马仲援虽表示尽力去办，但并未十分重视。其实，长春县、长春市、吉林省政府乃至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初期对这一中朝民间水田纠纷皆重视不够，制止朝侨租地挖沟不果断，尤其是其后与日交涉妥协软弱，终于酿成万宝山事件。这时，长春县三区区长曾彦士始向长春县长马仲援呈报朝侨租种土地及挖沟之事。马仲援请示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周玉炳不但不积极支持中国农户申

请，出面制止朝侨租地挖沟，相反，却是害怕中国农户起来斗争惹出事端，令长春县府"切谕民众，听候官厅核办，勿轻启事端。"5月27日，长春市政筹备处电请吉林省府。吉林省府以朝侨未经我当局许可，擅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府派员协同县公安警察前往劝止，并令朝侨出境。于是，长春县政府遂传讯肖翰林、张鸿宾等12人，限令3日内解除与郝永德之契约。并传讯郝永德，令其解除与朝侨李升薰等所订之契约。但郝利令智昏，一味拖延。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县公安局长鲁绮率骑警200名赶赴马家哨口，对挖沟朝侨进行劝阻。经说服，众多朝侨同意停工解散。朝侨代表申永均等并出甘结，决定停工解散，内称："今蒙贵局长忠告劝导，始知被郝永德欺蒙，大众情愿停工，于二日内全体回长，决无迟延。倘至期如不走者，代表等甘愿领咎。恐口无凭，立此甘结是实。"① 殊料，日本驻长领事田代派土屋波平、高桥和两名日警也于同日赶至万宝山探询朝侨与中国地方官府交涉情况，并于贾家店留宿。在此期间，他们又对朝侨进行胁迫，翌日又赶赴腰营堡。于是，翌日（6月1日），申永均等遂翻称至死不能停工离境。于是，鲁绮遂将申永均等10人解县讯问。申等在讯问时称"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这期间，朝侨继续挖掘水沟。6月3日，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致函日驻长领事田代，就日方支持朝侨挖沟提出抗议，要求依法严办"其教唆主要各人犯"，同时逮捕郝永德。但田代属于当日派便衣日警数人携枪去马家哨口，以"保护"为名，督促朝侨继续挖沟。同日，长春县公安局长鲁绮与保卫队长率警察再至马家哨口挖沟处，并将申永均等10人带回该地。鲁绮派代表与挖沟朝侨进行联络，要求朝侨派代表面议，但被两名督促朝侨挖沟的日警所阻。日警斥责

① 《韩人代表申永均等六人甘结》，《万宝山案》（专卷），吉林省档案馆。

朝侨说，没有他们的命令，不得随意行动。这时，长春日领馆警察署警部中川义治率日人高桥等赶来会见。鲁遂询问中川等之来意。中川称，奉领事田代之命调查真相。鲁质问朝侨因何不停工？中川回答说："须奉有命令，方能（停工）回长。"又问日警何时回长？答曰"亦须奉有领事命令。"由此，日警驻屯马家哨口，名曰"保护韩民"，实为武装监督挖沟。于是形成中日军事对峙之势。

双方对峙后，吉林省政府仍不积极出面与日进行交涉。而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恶人先告状，面见在沈阳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借口中国地方官宪"压迫韩民"，向张提出抗议。张作相不但不力驳日方之无理，反而屈从地表示"双方撤警再说"①。其实，"万宝山非南满铁路附属地"，也不是双方条约的"垦居区域"，日警擅入本身就是非法。

同日（6月3日），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玉炳再次致函长春日本领事田代进行抗议，除将申永均等10人引渡给日领外，要求日方立即令朝侨停止挖沟，并且予以遣散，严办教唆强占民地挖沟之李升薰等9人，并赔偿受害中国农户之损失。翌日（4日），在日警并未撤回的情况下，长春县府竟连张作相双方撤警的条件也不坚持，单方面首先将警察撤回。同日，周玉炳再次致函田代，要求日方严办李升薰等9人，并立即停止挖沟、赔偿损失和撤回日警。5日，周玉炳又致函田代，要求日方撤警。6日，长春日领田代始复函周玉炳，声称不能令朝侨停止挖沟与离境，还表示在未圆满解决此事之前不能撤回日警。8日，中方提议联合调查。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派柳井领事来长调查，同意中方提议。于是，于当日晚7时双方达成"调查万宝山鲜人稻田开掘水道问题之临时协定办法"。主要内容有：1. 双方警察悉行撤

① 《吉林省政府致东北政务委员会龟电》，辽宁档案馆。

退；2. 双方派员实地会同调查，并延请中日双方调解人协同调查；3. 朝侨立即停止挖掘及修筑伊通河之工作；4. 本案解决后，该处朝侨再行分别去留，在此之前，长春县公安局负责保护；5. 调查后双方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本案。于是，中方代表长春市政筹备处外交科长郭承厚、长春县农会干事长吴长春，日方代表长春日领馆书记官土屋波平、警部中川义治、南满铁路会社长春地方事务所涉外主任龙谷保等9日赴万宝山实地调查。日方并于同日撤回日警。11日，中日联合调查组返回长春。中国方面认为，引水沟应填平，恢复原状，朝侨应赔偿损失；朝侨所租之地可以种旱稻，若朝侨不拟耕作，损失应由郝永德承担。同日，长春市政筹备处长周玉炳就上述内容致函日领。指出"沟坝工作于法律、事实均不可行，绝对不能容忍"①。但又表示，可以向韩民赔偿三千日元的损失，以便换取日方之谅解。但是，长春日领田代并不满足，于当日下午5时致函长春市政筹备处，严加拒绝，声称："韩人贫弱可怜，所挖水道工作将次完成，拟令韩人于本日继续施河流水坝工作，以免有误本年农作。"其后，周玉炳复向日领提出"按照租得稻田改种旱稻，经与地主改订契约"，即实际等于承认日方的"商租权"，但仍遭到日领之否决。日领也看出中国外交十分软弱。于是，又派12名日警至马家哨口，督促百余名朝侨继续挖沟，并迫令朝侨编织柳条帘子，准备筑坝。这时，众多朝侨得知挖沟给中国农民将造成损失后，曾多次向日警提出放弃在此种稻，另到他处谋生。但日警不但不听，反而督促更为严厉，并限朝侨于7月5日以前一律竣工。朝侨无奈，在日警督促下继续挖沟。6月25日，筑坝工程开始施工，28日因坝漏水停工，加宽堤坝。30日，水沟基本竣工。

① 《万宝山华鲜冲突事件》，《国闻周报》8卷27期。

这期间，长春市政筹备处虽于6月12、14、17、23、27日多次致函长春日领进行抗议，要求停止挖沟、赔偿损失、撤警。长春日领馆于同月13、16、26日数次回函进行抵赖与狡辩或提出变相占地要求和建议，如虚伪地承诺可以赔偿挖沟地户之损失，上等地每垧予以租米三石；河沟可以架桥等。长春市政筹备处不是据理力争，驳斥对方，反而依日领13日来函之内容，召集受害民户代表进行劝解，企图以日方之三石租米为诱饵，平息农民愤怒，自然遭到受害农户代表的正义驳斥。

面对长春县、市两级政府的软弱无能，交涉无力，忍无可忍的中国受害农民遂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抗争。6月24日夜间，受害众农户曾偷偷平沟（约18丈），但翌日旋被朝侨掘开。6月25、26日，受害农户代表两次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制止朝侨挖沟。6月30日，长春县二、三区受害农民500余人，在万宝山召开"反对日警睐使韩民筑堰后援大会"，由孙琅瑄任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交涉经过，然后由各村代表发表意见。结果公推正、副会长各1人，正副干事各1人，干事30人，负责办理后援事宜。并且议决除催请官府进行强力交涉外，由各干事联合受害村庄，按户出工，进行填沟平坝；要坚决进行斗争，纵有官府干涉制止也不听从，即使流血亦在所不惜。①

7月1日上午10时，中国受害农民300余人，手执锹镐进行平沟，"是日填1公里余，并将横河柳条所筑之坝拆毁，""是日，有日警8人，韩人多人在旁观看"。这时，闻讯赶至现场的长春县公安局第二分局长田锡毅带同7名警察制止中国农民平沟。结果，被愤怒的农民殴打。② 傍晚，日人高桥对中国平沟农民进行

① 《万宝山华鲜冲突事件》，《国闻周报》8卷27期。
② 《长春市政筹备处呈吉林省政府冬日代电》，《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第240页。

威胁说："明天你们不多备枪，就多准备棺材吧。"①

7月1日并未发生中朝农民互殴和日警射击中国农民之事。但中外一些史书却这样记载，并进而说万宝山事件发生于7月1日，这实属以误传误。据笔者查阅许多原始资料，皆未提及日本警察开枪射击中国农民之事，即当日(7月1日)并未发生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事件实发生于次日。

7月2日，早上7点30分，中国农民四五百人，各执铁锹、镐头前往马家哨口，继续平沟填壕。因昨晚日警之威胁，许多农民携带猎枪以做自卫。这时，长春县公安局二分局长田锡毅与三分局长曹隆标，根据县政府"劝谕人民禁止平沟"的指令，也赶至马家哨口。田、曹等遂上前劝阻。这时，马家哨口已集有日本武装警察50余名，便衣警察10余名。8时左右，日本警察开始对平沟的中国农民进行镇压。日警先是制止中国农民填沟。中国农民与之据理力争，有的竟为日警殴伤，旋被中国农民奋力夺回。于是，日警首先向中国农民进行射击。日警实弹射击38发。愤怒的中国农民立即跳入壕沟，开枪向空中射击，以示反抗。双方射击约半小时左右②。这时中国警察急忙出面制止中国农民射击，并制止平沟。平沟的中国农民遂被迫解散回家。当时并未有中国农民被日警开枪打死和被捕之事，只有几名中国农民被日警殴伤。中外一些史书关于中国农民死10余人，被捕数十人之记载，据笔者所依原始资料判断，亦属以误传误。此后，长春县公安局第二分局长田锡毅遂留6名警察驻在张鸿宾宅内；第三分局长曹隆标亦留一名巡官、6名警察驻马家哨口贺春荣家，并将当日日警殴伤中国农民和开枪射击中国农民之事报告长春县公安

① 少一：《万案导源地马家哨口访问记》，《新亚细亚》3卷1期。
② 《长春县公安局长鲁绮补报马家哨口日警与居民开枪冲突详细情形》，《万宝山案》(专卷)，吉林省档案馆。

局。

长春日本领事田代闻讯后，于当日上午在领事馆召开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宪兵队等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中金川藏司令、中村大队长等50余人参加。会上决议：1. 继续派兵，断然镇压；2. 对中国进行最后抗议，限48小时圆满答复，否则采取最后手段；3. 以实力支援万宝山韩农，依然督促其工作；4. 唤起全东北日人之援助与舆论上的协助；5. 将此案经过、现势分电日本政府、旅顺民政署、关东厅，向中国最高当局进行强烈抗议。上午11时半左右，田代派日警30余人乘两辆汽车驰援，于下午3时许到达万宝山马家哨口。而后“占住马家哨口四周土墙，并筑炮台于贺姓房院。”① 下午6时，日本中川警部放出信鸽将万宝山事件经过报告日本领事馆。同时，向关东厅长官冢本清治请求出动日军1000名，妄图以扩大事端，趁机出兵侵占东北。信鸽后为梨树县兰家堡子中国农民截获。②

同日下午3时。长春日领田代又派守备队骑兵50名由长春驰赴万宝山。同日晚，马家哨口之日警，在中川警部率领下奔入稻田区，“协助驻警赴各村捕人，并搜捕华农自卫枪弹”，将村民捕去十五六人，严刑审拷，灌煤油及辣椒水。③ 第二天才将被捕民户放回。日本警察捕人气势汹汹，闯入民宅。当时闯入马家哨口前村农户于泽家时，于之孙媳于马氏正在分娩，“因受惊，腹内胎转，不能生下。次日午后10时，母子均死。”④

7月3日，日本驻长领事田代为进一步扩大事端，又于上午11时许，续派20名宪兵驰援万宝山。同日下午1时，复派500名日警携机枪2挺、快炮2门、弹药50箱，炮弹50发、长枪200余

① 《万宝山事件调查》，《万宝山事件》下，辽宁省档案馆。
② 《日本侵华案》，辽宁省档案馆。
③ 《万宝山华鲜冲突事件》，《国闻周报》8卷72期。
④ 《万宝山事件调查》，《万宝山事件》下，辽宁档案馆。

支、短枪数十支、子弹万发前往万宝山,[1] 企图武装朝侨之用,妄图长期驻屯。大批日本军警到达马家哨口以后,分别驻屯于稻田区及镇街,有的在河岸搭住帐篷,有的强占民间房舍。并且埋设地雷,挖掘战壕,架设机枪、大炮,砍伐树木,扣留船只,禁止中国人在马家哨口附近五华里之内通行。与此同时,迫令朝鲜侨民不准离开此地,并将被填之水沟再度挖掘,加速修复水坝。水坝于7月5日竣工。堤坝于马家哨口处横截伊通河水,顶宽3米,底宽16米,全长30余米。7月5日,马家哨口之日警竟公然在河岸高处悬挂日本国旗,"少顷即移至黄家窝堡北山韩民坟最高处,竖杆悬挂一日。"[2] 这些日警还对中国农户进行威胁、搜捕。7月4日、15日,日警藏本英明、高桥分别到长春县公安局第三分局,要求会见中国平沟农民代表和肖翰林等12户租主。被严词拒绝后,日警又派人四处侦察农民代表住处,并声称"如能介绍代表和解,酬日金千元。但能见面虽不能和解,亦酬金500元。代表如能同意,更酬金不赀。"[3] 但中国农户代表均拒绝出见会面。其后,日领事田代又派数名警察多次到头道沟庆丰达栈找平沟农户代表孙永清。因孙不在,日警竟将其弟暴打一顿,扬长而去。7月15日,马家哨口之日警迫令附近中国农民到马家哨口看日军机枪演习。演习结束后日警大声询问中国农民"前次平沟有无在内?"又问:"你们知道吗?此为机关枪,一秒钟能若干响。你们若不怕,再有不轨活动,我们用此枪即将你们均行打死。"[4] 但是,中国农民并不屈服,他们对侵占马家哨口之日军进行经济封锁,不向日人出售蔬菜、粮食。日本军警遂迫令朝侨从数十里之外的米沙子车站背运粮食、蔬菜。许多朝侨在运粮过程中遭到日警毒

① 《万宝山事件调查》,《万宝山事件》下,辽宁档案馆。
② 《万宝山事件调查》,《万宝山事件》下,辽宁档案馆。
③ "万宝山消息",《万宝山事件》上,辽宁省档案馆。
④ 少一:《万案导源地马家哨口访问记》,《新亚细亚》3卷1期。

打。

7月2日，日警开枪射击中国农民事件发生后，长春县政府召开县长、商会长、公安局长、各地方法团首领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决如下事项：1. 对日提出最后抗议，令日撤兵；2. 派300名警察保卫队前往马家哨口；3. 派员调查肇事原因，慰问伤者；4. 牒请日领令朝侨停止工作，听候中日两国政府解决；5. 将日警开枪打死、打伤农民真相电告辽、吉省府，向日总领事严重交涉；6. 要求日领将被捕之10余名中国农民释放，并抚恤伤亡。① 随后，长春县政府派300名警察保卫队奔赴马家哨口。于是，中日双方再度形成军事对峙。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当日（7月2日），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便捏造与传布许多耸人的消息在朝鲜各地日文报纸发表。同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又将捏造的消息文稿，交给朝鲜《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的长春支局局长、特派员金利三。金以急电、特急电告朝鲜汉城的《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朝鲜日报》为了抢新闻，于当日（2日）晚首次发行《号外》。7月3日早、晚又连续两次发行《号外》。这些《号外》登载日领馆捏造的上述消息，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挑拨性标题。诸如：中国八百农民与二百朝侨发生冲突、朝侨受伤累累、中日警察已交战1小时、驻长日军已经出动、中国当局将于8月1日一律驱逐朝侨出境、中国出动六百骑兵、朝侨处境危急朝不保夕等②。由于朝鲜各地日文、朝文报纸大量刊载这些捏造的消息，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朝鲜人在别有用心的暴徒、亲日分子的煽动组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进行了排华活动。

这次排华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其目的是挑拨

① 《万鲜两案之事实与认识》第12～20页。
② 《万宝山事件之研究》，《韩国史研究》28卷。

中朝关系，使中国官民仇恨东北朝侨，扩大万宝山事件，以便在“保护韩人”借口下出兵侵占东北。

日本外务省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一面令驻东北的日本领事向中国当局进行抗议、交涉，一面密令“朝鲜当局煽动韩民迫害华侨，以作外交有利之后援”①。7月5日，日驻吉林领事石射与日驻长春领事田代密谋后，遂向中国吉林地方当局外事部门进行交涉，表示日本决不撤军，要求赔偿朝侨损失，保证朝侨开垦水田。7月7日，日本内阁决议派在东北之日本官员进行实地调查；利用这一事件解决土地商租权、居住权。7月7日，代理张学良统辖东北政务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始去北平见张学良，请示万宝山事件处理方案。同日下午，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会议召开会议。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事件经过。决定万宝山事件为地方性质，由地方当局处理；保证朝鲜排华事件为中央性质，由外交部处理。8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指示张作相，万宝山事件就地解决。

7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作相交涉万宝山事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1. 保障朝侨生命财产安全；2. 赔偿朝侨损失；3. 朝侨在吉林之自由；4. 准允明年在该地种稻；5. 在满足上述四项要求后，始行撤军。同日，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始向日本提出抗议，并且建议双方派员调查和开始就地谈判；要求日本军警撤退和朝侨停止挖沟等。7月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十郎在吉林省城进行交涉谈判。按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令提出的设想，地方谈判只解决“补偿问题”。但是，日本连撤警和取消契约这两项犹未同意，“补偿问题”自是无从谈起。于是，钟毓在首次会谈

① “蔡智堪秘密情报”，《万宝山事件》上，辽宁省档案馆。

时提出要求日方"先行撤警"。对此，石射答复是"撤警亦非不可，但须贵方声明：第一，负责保护鲜人；第二，维持现状，即已成工事至交涉解决之日止，不得加以妨害。"钟毓明知日人以撤警要挟，但他恐日警不撤将酿成武装冲突，遂答应以特派员身份担保"劝导人民，暂勿动作。"① 于是在谈判尚未谈及正题以前，日方就迫中国承担"保护韩人"、"维持现状"的义务。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迟迟不下达交涉原则，使两国交涉形成虚设。7月21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始会见日本代理公使重光，就万宝山事件提出抗议，向日本政府提出朝侨退出该地等三项要求。22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代理公使，要求日本撤警、撤退朝侨、取消契约、赔偿中国农民损失等。2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始向钟毓下达交涉方针：撤消契约、恢复原状已由外交部进行抗议，加以要求；赔偿地方损失由祸首负责。此后，关于万宝山事件之交涉才真正开始。由于日本方面在谈判中强辩抵赖，交涉无有任何进展。7月26日、8月5日，钟毓两次致电外交部，诉说日方在谈判中对撤军、朝侨停止挖沟筑坝仍无切实答复。8月7日，吉林省政府始派调查员张庆云赴万宝山马家哨口进行实地调查。这期间，中国各地抗日呼声日益高涨，日本迫于压力，经过中方20天10余次的交涉，日方代表始于8月8日同意撤警。藏本英明率日警26名、朝侨12名自马家哨口撤出。至于其余朝侨，日方宣布听其自便。同日下午，中日"继续讨论万案本题"。中国方面在外交部照会基础上提出三项要求："1. 万宝山非垦居区域，鲜农应即退出，所订之不合法契约完全废除，占地挖沟堵河筑坝一律恢复原状；2. 中国民户所受之直接、间接一切损失及前项恢复原状所需各费调查列表归日方及鲜民担负；3. 此后

① 《关于万宝山案第二次谈话记录》，《万宝山事件之交涉》，（专卷）辽宁省档案馆。

不得再有此等不合法举动，并应将本案之日方责任者加以严重处分。"但日方代表石射在历次谈判中强词夺理，百般狡辩，胡说什么"以万宝山非鲜民垦居区域为言，则与民四条约敝国已享之既得权不合"，"如果契约不合法，可令其以合法手续改订契约"，"对于鲜人贵方取之政策既为宽大主义，万宝山鲜人既愿在该处耕田，仍援宽大主义容认原无不可。"[1] 日方主要借口是所谓《民四条约》，即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之灭亡中国之《二十一条》。

中国代表钟毓对日方所谓之《民四条约》问题进行驳斥，指出《民四条约》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两次均由我方全权代表提出宣言废弃，""况该约于威胁缔结之时，始终未得我国国会之同意与承诺，即未完备我国约法上批准条约之要素"，所以"不能认为有效"。

中国代表虽然进行如此驳斥，却迟迟拿不出新的提案，只是重复"移归国际法庭裁判"。相反，日方代表却很主动、异常蛮横，动辄以"停止交涉"为要挟。中日谈判自7月下旬开始，直到9月中旬，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

8月26日，日本政府正式就万宝山事件答复中国，照会也仍引用《二十一条》之有关条款。9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组研究日本关于万宝山事件之照会。决定：1. 反驳中国"压迫"朝侨之论点；2. 不承认1915年之《二十一条》，并令外交部进行批驳。9月15日，国民党政府经长时间拟稿、审核，始发表驳日本政府之照会，而在日帝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的当天，长春县长马仲援在给长春市政筹备处的呈文中，还呼吁"盼交涉早日圆满解决。"随着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炮声，为期数月的

---

① 《万宝山事件之交涉》(专卷)，辽宁省档案馆。

中日交涉也就彻底结束了。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汉奸郝永德的罪恶发迹和可耻下场

李香洋

根据我耳闻目睹并参照部分史料对汉奸郝永德的罪行发迹和可耻下场叙述如下：

郝永德祖籍山东，青年时来东北吉林省长春县。1905年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攫据了长春至大连的铁路修筑特权，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就把长春车站和头道沟一带据为满铁附属地，然后开辟商埠。开始给日商当佣人的郝永德，在附属地内靠赌博和开小妓馆为业，同时结识了一伙流氓地痞专门为日本黑帽子① 出力。日本警察张效九（中国人）与郝永德的关系极为密切。到1931年以前，郝永德在长春朝日通（即今上海路）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今省政协地址）以东，现在的儿童电影院以西地段，先后购置大楼六七栋以上。他在头道沟满铁附属地内的商行、旅馆、上等妓馆、饭店、影院均有股本，家中收藏的古代文物就能装两三间房子。当时郝永德不仅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成为经济上的暴发户，而且在政治上也成为长春满铁附属地一带有权势的地头蛇。他经常出头露面于头道沟商工会议事务所（商务会所），和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关系也极为密切。郝永德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主子出力，进一步大发横财，乘他家住朝日通

① 黑帽子系附属地的日本警察。

（当时这个地方住有很多日本朝鲜侨民）之便，郝永德一面勾结个别朝侨从朝鲜往中国走私白面（海洛因）大发不义之财，同时他又伙同少数日本朝鲜的浪人合资经营稻田公司，凭借日本侨民势力大捞一把。万宝山事件就是他亲手点燃的导火索。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郝永德畏罪躲入长春满铁附属地。当风声稍静溜回家时，被捕解吉林扣押。“九·一八”事变后，他依仗日本势力，更是扶摇直上，成为日本的一条走狗和恶棍。

1946年4月长春第一次解放，郝永德隐藏起来，没有落入法网。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占长春，国民党长春地方检察厅按汉奸里通外国罪将他逮捕审讯。经过长春地方法院多次审理，大约在1946年秋冬之间，经该院院长于春和公布以汉奸危害国家民族罪判处郝永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收监在长春监狱。1947年夏秋之间，郝永德病死在长春监狱。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我人民政府没收了郝永德的房产。这就是汉奸郝永德的可耻下场，他的名字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平壤排华事件

崔殿芳

30年代初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各地，掀起了惨无人道的排华行动。这次排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唆使，利用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对华商、华人施加种种暴力而造成的流血惨案。当时我年方20，旅居朝鲜，因时间过久，有些事也记不清楚了，好在丹东老归侨较多，经大家的回忆，又充实和丰

富了一些情况，但也仅能写出一些轮廓，作为历史学者们的研究参考。

1931 年“九·一八”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挑衅，借由闹事，而此时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正是一个突出实例。万宝山位于吉林县境内。1931 年 4 月 1 日，长春市居民郝永德受日本人怂恿，成立长农水稻公司，自任经理。日本人企图通过郝盗卖中国土地租给朝鲜侨民，以达到其收买土地、设领置警之目地。郝在日本领事馆的授意下，在万宝山地区为日人盗卖土地3 000 余亩，租期10 年。契约上写明“此契约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批准，仍作无效。”郝未呈报县府批准即将土地租给朝鲜侨民。朝鲜侨民为引伊通河水浇田，在中国农民田里挖沟，使农田遭到破坏。中国农民向政府申诉，长春县政府派人劝告朝鲜侨民停工。但是，日本驻长春领事唆使朝鲜侨民继续挖沟筑坝，并派日本军警前来“保护”。7 月1 日，我受害农民忍无可忍，自动集合500 多人前来填沟，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恫吓，并保护朝鲜侨民强行通水。长春县政府也被迫派警察前往万宝山，双方形成军事对峙。日本帝国主义者借此大造舆论，扩大事端，煽动仇华。他们利用最凶的是《东亚日报》，一天出过几次“号外”，送报人腰拴一铁铃沿街叫喊撒送，所以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尤其是在东北有亲人的眷属，群情激愤，有的沿街朝着中国侨民，拍脑叫骂，有的醉汉到华商家滥摔乱砸，也有一些老年人到华侨家去哭去闹。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一片恐怖景象，谣言越传越多，骚乱越闹越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挑起排华的真实情况。

当时旅朝华侨共有40 万之多，杂居于朝鲜各地，市县有华侨的商铺、饭店等各行各业，乡镇和一些大的村庄，也有华侨的小吃部、小铺和菜农。

平壤是这次排华最惨重的地方，它始于1931年7月5日晚9时。在事件发生的前两天晚间，曾有二十多人在平壤的南门外，一户朝鲜面店里聚过一次会，作了一些准备工作，所以事件发生前，有很多朝鲜人事先知道5日晚要打中国人。有一些好心的朝鲜人暗地告知华侨，有的把华侨藏在自家的衣柜里，有的帮助华侨换衣化妆，逃匿外地、外户。脱险活下来的，大都是朝鲜人掩护营救出来的。有些华侨对当时的情况估计不足，存在侥幸心理；有些人舍命不舍财在观望；也有的户备下开水、辣椒面等准备抵抗，这些人大都惨遭杀害。

5日晚6、7点钟日落以前，市里就有为数不少的青年，在窥视华商的动态，华侨们也有所察觉，也都较平时提前闭店了。晚8、9点钟，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不到10点钟的时候，街上先有人呼喊，接着就听到砸门声惨叫声。有的商铺房屋、门窗比较坚固的，一时砸不开，他们就在汽车的尾部绑上一块石头，将门撞开随即一哄而入，先打人，后抢商品。暴徒们使用的武器大多是铁筋做的钩枪（日常用来打野狗的）或是铁锹木棒。被害者的尸体都是头部受锐器致命的，腹部被掏的也有，小儿多是摔死劈死的，全部血肉模糊，面目皆非，惨不忍睹。在搬运尸体时有的华侨哭，有的不敢看、不敢搬，而日本警察却说："你们打我们比这个还惨……"这天晚上仅用4个小时，就把六十多户华商劫掠一空，马路上剩下的破门杂物等，堵塞了交通，电车两天未通。这场袭击持续两天三夜，被害者多是一些菜民和饮食业者。

伤残者大部分拉到皇宫医院医治，床上地下遍地都是，每天都在往外拉尸体，活下来的为数不多，未伤者都进了日本警察署院里临时搭起的一个席棚，每餐给两个饭球，一块日本咸菜。时处盛夏酷暑，棚子小，饭食又不佳，加之思虑自己以后的生计和想念自己的亲人等，又有一些人生病或死去了。

从这次的杀伤情况看，大都是不抵抗龟缩在一起被暴徒打死的，有的商铺10口人、20口人集中在一起被杀害，有的想逃的又大部分是奔警察署或派出所去的，因为当时警察根本不加保护，结果仍被暴徒打死。仅在平壤西门外南岭派出所的门前，就打死华侨壮年二十多人。大同江岸是一个繁华地区，华侨的大酒店大都在这里，如东华园、新升楼、鸿升楼等，每一酒楼都有四五十人，这些人有的当即被打死，有的又被驱赶于江心淹死，冲走的究竟有多少就很难计数，仅横尸江岸的就有四十多具。有的侨胞群起自卫，如平壤有一家粉房，有工人四五十人，外加有部分修补铁锅的游商也住在他们这里，他们与暴徒奋勇搏斗，结果仅有4名华侨死亡，暴徒也有4人死亡。

日方警察只是故作镇静，若无其事，后来又走形式做表面文章。

事件过后，受伤者大部分由日本警察组织医院给抢救和治疗，实质是走形式。有些未伤残的也都组织到警察署保护和管理，如丹东现在活着一位八十多岁的归侨焦凤山，他当时的遭遇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时他正是年壮力强的年纪，以卖菜为生，5日晚有一朝鲜面店经理，事先知道情况，就把他扣在缸下，在半夜他听到外面有什么声音，就自己出来逃到了警察署，有的警察问他："你知道哪里还有中国人，乘车去把他们领到这里。"焦说："有兄嫂在外边。"警察署用了4个警察护他乘一车去拉人。走到西门外时听到有人喊"他是中国人"，他就立即人事不知了，怎么打的他也不知道。后来把他当作尸体拉到警察署院里，幸有一外号"于和尚"的华侨发现他还有气，又从尸体垛上把他搬下送进了医院，他7天7夜昏迷不醒，牙被打掉了7个，颈部被打成深深一个窟窿。口腔吞不下水，吃不下饭，也不给治疗，仅用一块药布每天在头部的窟窿上换来换去，治了1个多月，也未

见效，后来回到丹东治好了。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日本人的态度，先是煽动唆使，后来不得不假仁假义地作一些欲盖弥彰的勾当，据说是汉城各国领事团提出了抗议，日本才不得不这样做。

当时中国驻朝鲜京城（汉城）有总领事馆，下有釜山、仁川、元山、新义州、镇南浦等总领事馆的派出机关，但这些领事人员的态度令人气愤。他们以“上无令，下不行”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如平壤事件发生后，镇南浦领事乘汽车去平壤的主要街道看了一趟遍市的华商是门破货空，又到华人集中的皇宫医院和警察署走了一趟，华人如见亲人一样地顿时把汽车围住，大家语无伦次地哭诉起来了，但他们又怕引起外交麻烦，也只得说一些“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的空洞的保证而溜之大吉。

在这场灾难中，华侨究竟死了多少人？损失能有多少？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当时是炎热季节，连续打杀了两天三夜，人死了以后，有的将尸体搬到警察署，再派华侨装汽车拉到平壤市郊坎北洞的中国华侨墓地中，挖了约有5米宽、10米长的深深两个坑，男女老少尸体不分，混葬于其中，据搬运尸体的华侨说是355人，后来人称为肉丘坟，也有称为幽灵坟的。此外还有一些在医院死去的，或由亲人自行安葬的和后来在郊区发现的尸体随时就地埋了的，难作准确统计，仅在华侨茔地中自埋的就有一百多个墓，大量地被赶到大同江淹死而被朝鲜人发现就地埋葬和死在途中的，那就更不知多少了。当时有人估计总数有一千多人。

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这次排华，其声势之大，伤亡人数之多，损失之惨重，是世所罕见的，但国民党政府的真正态度，如有无抗议等，《申报》未载，华侨也就不得而知了。华侨在国外惨受迫害，思亲人拉一把，盼政府给作主，挽救他们，这是不言而喻的

事。当时侨民每日都在争先恐后地看《申报》听消息，望亲人，但除了看见一些大城市的同胞或民众团体纷纷掀起抗日运动，要求政府断绝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抵制日货，接侨回国等游行示威外，并未见政府有什么具体表示。

祖国同胞的声援、支持是华侨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时民间团体、人民群众，捐了大量的款，并派亲人亲自送到医院。先是因伤势过重而残废的人每人发给120元，稍轻一点的发给60元，作为养伤费。起初大家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发的，都在感恩不尽，后来有一伤员焦凤山要求发给他120元，而日本警察却说："你们中国未给那么多钱，如果是我们的钱一个也不给你们。"从此才知道这钱是祖国同胞送来的。又在8月的一天上午，有一位官员模样的中国人由4个宪兵保护着，不许伤病员下床靠近他，大家都坐或躺在床上听他讲了一些安慰话，又发给每人2元钱。大家虽然不能近前说话，也都泣不成声地好象见了亲人，暗暗地叙述自身的遭遇。有些受伤不重的或未伤的侨胞急于回国，在7天以后，有的乘车到浦南镇，再乘由中国来的船到烟台和威海了，也有的乘火车到丹东了，紧接着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从7月到年底是华侨回国的高潮，旅朝华侨由40万人降为17万人，当时有些人上船以后发誓，今世再也不到朝鲜了，但因生活无出路，而后有一些人又不得不返回朝鲜，我就是其中之一。

难侨回国后的情景是甚感人心的，烟台和丹东的医院都全力以赴为难侨治疗，有些慈善事业承担了难侨衣食住的救济工作。旅舍住不下，电影院剧场停演让难侨住宿，工人店员纷纷捐款。从汤山城去凤城念书的学生也不坐火车，节余下的车费捐给难侨。后来大多数投亲靠友去了，无钱的一律发给车费，直到年底还有难侨无家可归的，聚集于丹东和烟台。

（摘自《辽宁文史资料》总第二十八辑，1990年）

排华惨案纪实

蒋文鹤*

一、日人主使朝鲜排华惨案的铁证

万宝山事件之后，在朝鲜发生的排华惨案，绝不是朝鲜人对我华侨突发的不幸事件，对我国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排华运动，亦即其一贯的侵略政策的表现。因为此次参加暴动的暴徒，朝鲜人中，除极少数是甘心媚日仇华者之外，其余都是被日本人恫吓、威胁或利诱造成的。以下几点事实足以证明。

（一）我们知道，朝鲜人在日本政府极度高压之下，平日少数人集会，尚且不得自由，何能瞬息间聚众数千，作大规模的暴动？纵能聚集，又何能在日本军警严密防范之下，劫掠焚杀，连续四五日之久？年前朝鲜人曾因妇女被日人侮辱，而发生革命运动，规模巨大，但因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而平息，何以此次独令其愈演愈烈，继续数日？由此可知，此次排华惨案，实在为日人所主持，预先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意与煽动。

（二）当酝酿排华之际，日本政府发出训电，竟声称对于最近在"满蒙"种种纠纷，殊难默忍，难保不再造成济南惨案的不祥事件。这无异明告，令其恣意行动，吾人事后以排华的暴行与日政府的训电相印证，谓非日政府蓄意酿造的一种暴动，谁能置信？

（三）当惨案发生时，朝鲜各地的日本报馆，纷纷印发号外，

---

* 作者当时为中国驻朝鲜仁川领事。

捏造谣言，挑拨朝鲜人与华人的恶感，而负有稽查报纸、监督言论的朝鲜总督府，竟不加取缔纠正，一任其颠倒黑白，煽动暴动，以致惹起此次惨祸。此非日政府故意放任，嗾使暴动而何？此外如朝鲜报纸驻长春特派员朝鲜人金利三，当万宝山案发生之初，受日人之利诱威迫，谎报朝鲜侨民被华人杀害之消息，以致激起朝鲜各地疯狂排华，造成空前之排华惨案。乃至"万案"真相已明，不少正直的朝鲜人给以遣责。金利三受日人利用，谎报情况，而金亦深自悔悟，作书声明，披露于《吉长日报》。日本领事竟嗾使日籍警察，枪杀金于吉林东亚旅馆。此亦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金利三以推波助澜于先，而复惨杀金利三以灭口于后之铁证。

（四）当朝鲜各地发动排华暴动时，日人改穿朝鲜服，从中指挥，又分发华侨居住地地图，使暴徒按图攻击。而一般日本警察，亦多摘去警帽及警章，跟随暴徒之后，协助捣乱，俟暴动已过，乃伪驱逐朝鲜人，阳示保护华侨。又当暴动激烈时，朝鲜的知识分子及民众团体，多出而主持正义，印发传单，劝群众不要暴动，伤害中朝传统友谊。但俱被日警阻止，不准散发，以致惨祸蔓延，遍及全朝鲜。日本政府主谋助虐的行动，十分明显。

（五）平壤、元山等地暴动最烈之时，华侨纷集车站，急欲逃生，而车站竟拒绝售票，各轮船亦不准华侨搭载，致使华侨逃生无路，束手被杀。日本殖民统治者居心欲置华侨于死地，无可狡赖。平壤某些日本殖民者，竟有赠与暴徒金钱，作为暴动更足以证明排华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实为正凶。

（六）当朝鲜境各地排华时，我国内发往朝鲜的电报，及华侨向国内报告的电报，日本电局虽然收受，但均搁置，不为发送，华侨电话，亦不为接线。似此故意阻挠消息，显系助成惨案扩大，日政府虽欲诿卸责任，无如事实俱在，岂容讳饰。

证之以上种种事实，可知此次暴动排华，乃是受日本帝国主

义的煽惑强迫，而为日本政府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狠毒阴谋。

日本政府所以煽惑排华的原因，实因我中朝两民族素来亲善合作，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前途，大有不利，故日本殖民统治者蓄意挑拨朝鲜人对华人的恶感，令其排华仇杀，两败俱伤，日本帝国主义乃从中坐收渔人之利。所以这次惨案的正凶主犯，实际上完全是日本政府及其横暴的军阀。

当时国内外报刊的评述，亦足资证明。

英报（即译神户英文纪录日报）关于朝鲜排华事件之公论：

“朝鲜各地，因满洲中韩冲突，发生排华暴动，据官方报告，华人惨死者91人，受伤者约有三倍，然数当不止此，平壤暴动最为凶烈，华人在街道上，被击毙者数十人，日方狡称日警无力制止，似即此可以卸责，虽云暴动，起因含有报复性质，如日警能严密防备。决不有如此惨酷屠杀，此系不可讳饰之事实也。当星期五（3日）暴动酝酿之际，朝鲜各地谣言繁多，已呈险恶之征象，最可注意者，则平壤城内与华侨杂居之日人，事前已迁移他处，星期六平壤、汉城、济物浦、元山等处，果发生仇华暴动，早晨，中国驻韩总领事张维诚，亲赴总督署要求设法保护华侨，并警告，但日官吏，均漠然置之，毫不加紧戒备。星期六晚，平壤发生剧烈暴乱，24小时内，华人死伤者甚多。据云平壤暴动首领，均非当地人参加。暴乱时民众围观虽达数千人，然杀人放火劫掠行凶者，仅只四五十人，且彼辈携有华人住所地图，按图索骥，难期幸免，如事前无组织，日警何不竟预闻？迨暴动发生后，日警既不能积极制止，复未见缉获一二巨凶，竟任其全数漏网，岂非咄咄怪事耶？日本新闻机关，近传出妙闻一则，据称：暴徒事先约定，对于日警可置之不理，若遇宪兵，须稍矜慎，至军队来时，则当立即退避，因暴乱时，屡有不可思议之事实发现，故此项消息，甚堪注意。如星期一晨，传有华妇一人，在街上被暴徒痛殴，日警虽目睹

惨状，竟视若无睹，迨暴徒散后，始前来佯作制止，此华妇不幸重伤而死，复有华人数名，由日警诚如官方报告，所称无力制止，则此事故不足追究，然吾人深信此中有严密调查之必要。日军第七十七师团，常驻平壤一带，于星期一下午特向满洲开发，谓系保护南满日侨。查此次朝鲜排华，满洲华人，态度镇静，加以当局防备森严，自始至终，未有任何越轨举动，日官宪增加满洲军力，预防不测，吾人固不能责之，然当第七十七师团日军尚未越境时，对于平壤韩人凶烈之暴动，不加制止，诚属不幸之极也。”

二、在朝华侨在惨案中死伤人数及财产损失

平壤、镇南浦：7月4日晚，镇南浦徐领事因悉京城、仁川发生仇华暴乱风潮，故于5日晨正式专电平南、黄海两道厅警察部长，平壤警察署长，又面晤镇南浦警察署长，切托对于华侨妥为保护，并与当地商会，会商预防办法，至于平壤事件，据该处华侨各界代表声称，5日上午11时许，接平壤警察署电话，请商会主席往署谈话，其时主席适回安东，即由常务委员张景贤偕同罗翻译前往，由安藤高等系主任接见，谓本地倘有暴徒发生，本署必切实保护，苟遇有暴徒寻衅，望特别容让，并从早闭门，一切可请安心云。归会后，即通知各侨谨慎防范，迨至下午7时许，突然暴动发生，暴徒蚁集，不计其数，手持棍棒、刀斧、石块等凶器，并随带电筒，对于华侨家屋，不问农工商贾，分队轮流袭击，遇见华人，不论男女老幼，持凶殴打至死，毁掠财物，焚烧劫据，且带有引火燃料，随处放火，指挥均用警笛，组织颇为完备，直至6日晨，仍未停止，残忍惨案，世所罕见，而各处警察不佩武装，徒手制止，无补于事。及至9日，遭难惨死者竟达百余人，伤者200余人。此次排华事件中，以平壤为最烈，计损失约在日金254.5万余元，镇南浦及其它地方损失约在日金11.7万余元，至于平壤

死伤人数，据道厅发表，打死95人，而我方调查，则死105人，伤163人，生死不明者63人。镇南浦伤19人，汉川3名，胜湖里1名。长山墓地为安葬死亡侨民的所在墓地，计分五条，每条据道厅发表，葬20人，每人一棺一穴，惟内有婴孩2人，则安葬一棺，最前一条较短，据称其为95人。

仁川：7月3日凌晨2时有暴徒数十名，在仁川的外里地方，向华人理发店饮食店投石，打破玻璃和电灯泡等，及至天明暴动声势愈急，侨民纷向中国街避难。事发后总领事馆驻仁川领事馆蒋领事到警察署交涉制止，并一方报告总领事馆。晚8时许，暴徒忽群集，约有3 000人，大举暴动，全市情形混乱，华侨男女均逃避，蒋领事又要求警察署派武装出动，该署长以未奉道厅命令，未便照办。次日9时许，据报暴徒复在外里地方鸣锣聚众，集成5 000人左右，大举暴动，手持木棍、铁棒、刀斧等，到处搜索击毁。内外里地方所有华商商店，多被暴徒用铁器将门窗撞开，即将刀斧等，割断电话、电线，抢掠撕毁货物，抛于街心，最后将布匹绸缎掠劫一空，又烧毁店面，警察无力保护。至5日上午3时，京城武装警察及宪兵17名赶到，警察亦穿武装，见形势不佳，鸣空枪二响，暴徒始退。至中国街，因警备森严，故未冲入。查侨民被杀身死者，计连魁山、李俊吉2名，重伤者卢焕信、王有智2名，经送入医院治疗。一方面急用载货汽车将远近侨民送至中国街避难，计约1 500人，另轻微伤者20余名。5日晚暴徒在中国街四周聚众数千人，希图攻入未果，乃至府外放火，被焚者二处。在领馆及商会收容者，约有3 600侨民。6日起渐见平静，侨民纷乘华商利通号轮船与日商共同丸轮船归国者，计达8 000人。此次华侨直接损失，约在日元9万左右，间接损失未计在内。

京城：京城暴动，于7月3日午后10时左右发生，侨商多处有暴徒投石击毁窗户玻璃，途遇华人，即施殴打，当由总领事馆

电话宪兵队及各警署切实保护。4日未明，京城府内外华商工人等纷来领馆报告，各处暴动，愈演愈烈，损害业已不少，张维城总领事即通知总督府，请速派武装警察保护，一方面通知各领事馆，一方面由中华商会及团体代表分访各机关、各报馆，请其缓和中朝群众情感，并由总领事馆函朝鲜政务总监迅筹万全保护办法，并酌派武装军警。其时华侨来馆避难者，已达千余人。5日晨，避难来馆者，络绎不绝。是日星期天，复由总领事向总督府提出应急办法四项，旋据电话复称，京城内外僻静处，华侨可由警署送至总领事馆暂避，各道警察，已命充分戒备，京城华侨较多离城，已饬就地切实保护。张总领事当即通知中华商会派汽车分往龙山、麻浦等地载运侨民来馆，是日统计侨民避难人数，已达二千数百人。6日张总领事往访总督府警务局长，请通令各道加派武装军警取缔制止。旋该局长来馆答称，已严令各道警察局警备，是日华侨到馆避难者，约3 600人左右。7日又由各警署派警护送侨民到馆避难者，亦有多起，截至是日前后，统计达三千六七百人。7、8、9日继续由张总领事往总督府交涉，但各地暴动尚在续发。据报侨民家产被毁者，有徐秀升等60余家，侨民被伤被殴者，牛绪吉等140人左右，财物受损失者有孙君集等240余人，京城府内外侨民其损失死伤之数，据前述报告，至为酷烈。

釜山：自7月4日午前，经釜山领事馆因闻仁川、京城发生排华暴动事，当日与警署接洽防范，并于5、6二日要求警署道厅电饬各郡警署竭力保护华侨。7日朝鲜政务总监过釜山赴京城，由陈领事与总监面商严厉取缔暴徒。总监答称，自应完全保护。至8日釜山风声，亦甚紧急，各商店仍照常营业，惟市面各处之华侨妇孺均避难领馆，约10余人。是日中华商会玻璃窗被暴徒击毁，迨至晚间，领馆园内也有小石投入。至夜9时，暴徒集中领馆左侧空地，大约300余人，势将进攻领馆。时馆外街口派警驻

守，断绝交通。天雨而暴徒仍不分散，嗣由署长亲至领馆指挥卫队，向暴徒殴逐，惟暴徒竟向卫队投石该队不支而退，情况紧急，遂致电宪兵队，旋有宪兵到场，暴徒始散去，时已深夜。9日晨3时，市内牧之岛侨商刘振年，饮食店孙振树，被暴徒30余人投石击毁门窗，并将店内货物，悉数抛至街心。是晚，停业侨商避难至领馆者约达160余人。10日晚，领馆街道右侧街上暴徒六七百人，旋经宪兵驱逐散去。11日形势较为平稳，经领馆与道厅磋商保护办法，并决定恢复华侨营业日期，复由各厅答称，已严饬各处竭力取缔暴徒。12日大致安稳，避难至领馆及商会的各商号华侨人数，男约320余人，女约60余人。新义州：受轻伤者14人，华侨商店被捣毁者4家。工人于福京胸肋殴伤致死。其他负伤者五六人，又有三成金矿会社工人被殴死一人。元山：华侨受伤较重者，计21人。被凶徒追击无路可逃，落河溺毙，捞获尸首者，元山、川里各1人，传说死亡可以证明者3人，尚未证实者13人，失踪者19人。其它如云山北镇、大榆洞、宣川、定州南市、龟城、扬市、郫山、博川、宁边、义川等处华侨，也有被殴受伤及商店被袭击者。

据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董长治报告称：自2日起至6日止，华侨之损失当在千万元以上，迄今10余日，其调查，被日警拘至此者，3 112人，市内被捣毁500余家，轻重伤者男女老幼共500余人，被打、被杀死者，216人，不知下落者，不计其数。又据商会会长孟宪诗对调查组说：甚至竟有剖腹剜心，肝肠狼藉，有的被劓鼻，割耳，虽在襁褓中幼儿，亦所难免。我等曾在朝鲜数十年，财产数十万，从未得罪一人而横遭惨祸，日警不准携带财物，将我等拘至此处，在露天受苦，不但不能自由行动，即内部消息亦完全隔绝。谈至此，日警不准继续发言，孟等又放声大哭，不敢再说。调查员召集难民五六十人谈话，尚未发言，全体代表即放

声大哭，调查员不知所云，愤痛交集，即自掌颊数下，表示身为保侨官吏，竟使同胞受苦，为此不能自尽职责，惭愧无地，请同胞特别原谅，我等无丝毫警察权利的苦衷。

调查员讲话时，日警强止三次，但调查员以事已至此，还不许本国官吏说两句引咎的话，真岂有此理，故不听制止。讲话完毕后，继到各处巡视，迳见千余女同胞，提抱300余名婴儿，哭作一团，向调查员蜂拥而来，牵曳我等大呼救命，我等赤手空拳，怅然心伤，相与痛哭。最恶毒的，不但一般工农侨胞，即商会会长等各干部等人，亦须在草棚湿地上睡觉，吃粘饭团等。我等又请日警带我等到郊外大同警察署管内墓地，向被杀死之侨胞行礼。

三、一份沉痛的报告

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京城华侨和国民党支部组成调查组，于7月8日前往平壤调查灾情和慰问被害侨民，事毕后的工作报告中有云："平壤有华侨5 200余人，500余家商店，被暴徒袭击捣毁，抢劫一空，竟无一幸免。先后被棍棒短刀打死，戳死者，计男子71人，女子6人，财产损失一时无法估计。调查员等，车近收容所地方，见日方军警大队，武装戒备森严，车到门前即见院内无数侨胞被害男女老幼，破头瘤腿，折臂，瞎眼者，令人酸鼻，目不忍睹。调查员要求会见灾民中商会干部及党部同志，日人不得已，始将商会会长孟宪诗等10余人，派通华语军警送来，我等相见默然，瞠目而视不能一言，全体相抱痛哭，泣不成声。"

据孟宪诗云："事前我因事羁留安东，风闻朝鲜有不稳之讯，急赶回平壤，要求日方警察负责保护。日方警官谓不必惊慌，必能担保平安无事。不料当晚9时即有数百不逞之徒大起暴动，手持长棍，短刀，石块，砖头，遇华侨即杀伤毒打，遇华户即捣毁焚掠，有打口哨以下令者，有喊口号嗾使者，华侨遇之者，无一幸

免，所有华商未剩一家。我等请求去墓地向被害侨胞致哀，日警颇有难色，经我等要求再三，彼始允先带赴平壤医院，然后再赴茔地。我等乃先至医院，见受害侨胞负重伤者，男女200余人，儿童三四十名，头部均有重伤，正视察之间，在我等眼前死去2人，其惨状难以言喻。至茔地，见日警数十人帮助朝鲜工人正在仓卒掩埋死尸……。我等对于此次视察结果，其结论曰：此次之大惨案，完全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有计划的残杀，其惨毒为亘古所未有，较尼港之巴鲁机残团，尚野蛮百倍，文明国之举动，固如是耶！言念及此，令人心痛，我全国国民共鉴诸。”

四、一封华侨的血泪书

仁川华侨、中华商会董事王仁鸿先生，安徽人，自少年时代即随其祖到朝鲜经商，已有30余年。在这次排华惨案后，致其国内亲属的书信中，沉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排华惨案的血泪斑斑的文字，当时曾在京沪各地报纸上披露过，兹节录如下：

“此次以万宝山事件为借口，在朝鲜各地，忽于7月3日同时大举排华暴动，纠集大批暴徒，到处抢劫烧杀，惨不忍睹，其是否有背景，蛛丝马迹，不无可寻。我住仁川，地处要冲，华人为数甚多，2日，即有侨胞闻将殴戳华侨之事，于是华侨转相警告，互为警惕，中国街之华侨，亦有自卫之准备。暴徒得悉后，3日，乃纠集数千人，捣毁同生泰等华商84家、华农菜园130余家，财货抢劫一空，家具尽被砸碎，火烧两家大商店，并将店主曹高登等2人毒打重伤，被击死者甚多，但只发现尸体三具。重伤数十人，溺死者1人。警察敷衍保护，内中指挥，有许多侨胞亲眼目睹，暴动时，中有红裤绿衣1人为总指挥，警察在旁专俟此家捣毁后，至彼家肆暴。7月3日下午8时起至4日午后4时正，暴徒纵横

捣毁华商，殴杀华侨连续达8小时之久。京城自4日至7日排华暴动最烈，四周僻偏侨农菜园、伙食铺，被毁灭者，400余家，损害之巨，较民国16年惨案，加重十倍。

平壤方面更是不堪言状，日警以保护华侨为名，实则指挥暴徒抢劫杀戮之能事。在此次排华惨案中，遭难惨死者，就有200余人，重伤者200余人。其他知釜山、元山、清津等地，华侨被害者，亦不在少数。我在这次惨案中，华生祥商号被抢劫一空，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人也险遭毒打，家中5人，一个星期未敢出家门一步。现虽较前几天平息一点，但仍人心惶惶，安定不下来。我数十万华侨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村事件始末

关玉衡

社会背景与中村大尉出现

1928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獗。其时我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曾会同军法处长王朴山①在永平防地上书给炮兵军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旋经张学良批准，并予屯垦军经费400万元。当以30万元购买蒙旗荒地，地点选在索伦山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洮儿河南至白城子，总长450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

① 王朴山：吉林榆树人，周恩来青少年的好友。曾设法营救被捕的“五四”学生运动领袖马骏，未果，后又冒风险掩埋其遗体。1930年病故，终年34岁。

间，宽约300余里，在交、洮、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草木畅茂。沃野千里，划为兴安屯垦区。

1931年，我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第三团驻余公府。这年2月某日（日子记不清），据第一团一营营长迟广胜的电话报称：有便衣乘马的外国人3名及俄国人1名，在绰尔河东岸盘桓，旋向扎赉特公爷府方向驰去。复有本区顾问寿玉庭发来的情报内称，扎旗巴公秘密召集各旗王公会议，当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兴安屯垦公署备查。又据哈尔滨特警处通报："有日人要求发给护照入贵区，本处未批准。"（这段通报是以后我向特警处王瑞华处长联系，他复我的。）

当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曾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说："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嗣即复照认可，惟日本总领事默无一言。

日总领事默无一言，不外以下原因：

（1）蒙古王公对兴安屯垦不明真相，初期多方反对，并依靠日本庇护，多不愿出售荒地，留待日本"拓殖"。经邹作华派我任交际处长游说蒙古王公后，多数愿将其荒地出售，惟有图什吐旗蒙王叶喜海顺，几经劝说，终无成效。叶喜海顺原系前清肃亲王之婿，保皇思想浓厚，早与日寇勾结，图谋不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投敌，曾充伪满洲国兴安省南分省省长）。

（2）由于北宁铁路联运开始，建筑洮索铁路在即，创建火犁机耕农场于王爷庙（现在乌兰浩特），设飞机场于七道岭子等措施，均为日本所忌，以为有碍其"满蒙拓殖政策"的侵略。

（3）因东北修筑洮昂、齐克铁路，且又以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的联运和葫芦岛的开港，日本也认为影响了其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经营。

(4)日本在其拓殖政策上加紧控制蒙古王公,豢养土匪,骚扰滋事,并煽惑大汉奸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反对屯垦。

1931年5月24日,新编骑兵第六连连长宫品一报称,该连新招募骑兵编练完毕,我遂前往校阅。25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日本间谍4名,地点在四方台附近,董副团长请我回团部处理。我连夜返向团部,凌晨方达。少校团副董平舆当即向我报告,捕获之间谍为日本人2名、俄国人1名和蒙古人1名,并呈上所搜获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经详加检阅,计有:(一)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过的);(三)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四)透明纸作业一张;(五)洮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6年1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驿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事,如洮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忘记姓名,系张海鹏的代言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九)表册三份: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项;(十)所携带之物品:甲、洋马三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乙、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支;丙、望远镜一架;丁、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方、圆框

罗盘针各一件;戊、寒暑温度计一具;己、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庚、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

证据确凿,构成间谍罪行

我将上列文件译成中文后,证实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分,即对他进行审讯。中村系中等身材,面方而多髭须,身着深灰色棉裤、棉袄,外罩俄式皮制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皮帽,上套风镜一副,脚穿短筒皮靴。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中村从其衣袋中掏出名片一张,上写“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另一日人叫井杉延太郎,他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问他晒蓝纸俄文地图是从哪里来的?井杉答:“我不知道,中村不认识俄国字,用时就叫俄国人看。俄国人不会中国话,只会日本话。”再对中村讯问,他什么也不说。

从以上所获种种文件和井杉口供,中村确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被派遣来兴安区作谍报工作无疑。因此对中村不再继续讯问。

我思索中村一路所接洽过的人物,都是反对兴安区的汉奸和南满办事处的“拓殖”者。他们勾结张海鹏与扎旗巴公爷阻挠开垦,而且济匪养匪企图颠覆兴安区。中村此来,显与这些人有直接关系,记录上又把他们的这些计划都摘录下来。据营长迟广胜从索伦山发来的报告和寿玉庭的情报来看,中村曾在巴公府

开会。我觉得胸有成竹，即作出如下的判断：(1)肯定中村是间谍，因他的笔记本载明是参谋省派出；(2)他到洮南又增加新的任务，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参与“拓殖”工作；(3)参与蒙古王公召开的会议，即将采取颠覆破坏的行动。

但中村配备的俄国人有什么作用？蒙古人又有什么作用？据井杉供称：“雇用俄国人是给他看地图和问路。”至于那个蒙古人，经我派团部蒙古籍军士了解的情况，确是巴公爷派来的联络员。这样，我又想到中村的任务可能分为两项：即日本参谋省要他马上提供有关入侵蒙古方案的报告；满铁拓殖会社要他提供联络的计划。

既然如此，对中村大尉如何发落？间谍文件和证物又如何处置？我心目中打下了初步腹案，认为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一经揭开这个案件，日本是非索回不可的。现在正处于剿匪之际，权柄在手，既要处理这个间谍案件，莫如召开官佐会议，集思广益地征询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二次审讯

在华灯初上时，各官佐齐集于团部大军帐内(第二营营长与第三营营长正外出未参加)，由我提出破获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应如何处理，并说明，从已缴获的文件和军用地图等证物、证件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大家对这个案情有什么见解？请各发表己见。首先发表意见的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和副团长董平舆，2人均认为秘密处死刑为对，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是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更有的说在剿匪职权上也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在征得到会

官佐意见后，我提出的主张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但他们说这是徒找麻烦。于是我再提出的第二步办法讯取他的口供。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我本来不主张刑讯的，在此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讯问后，在令其在笔录上划押时，他又借机撕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陆鸿勋营长说，象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4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在执行时已午夜12时30分钟。天亮时我携带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等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绂（督办邹作华行将出国考察垦政，故由兴安区总办高仁绂暂代）报告处理中村大尉的结果。同时，我在兴安区防地拟就快邮代电连同其间谍文件、证物托苑崇谷（苑在座，他因新授团长职衔去北平晋谒张学良）至北平呈报张学良副司令长官。适张在协和医院养病，乃交副官长汤国桢转呈。

折冲外交，去沈等候对质

兴安屯垦区第三团秘密处决日本间谍中村大尉等是5月25日午夜12时30分钟左右的事，而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直到8月初旬才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张学良适在北平养病期内，由荣代理副司令长官职务）提出抗议。在其初次提出抗

议时带有讯问性质，是试探性的。但在确悉我方对此未作外交准备时，才一步进逼一步。8月12日辽宁省政府和东北长官公署用“文电”向屯垦公署询问：“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屯垦公署答复“并无其人”。同时电我注意。而此时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日报》(都是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上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同时日本在交涉上一天紧迫一天，最后就公开地揭开说：“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在华的报纸，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是专门挑拨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报刊。沈阳《盛京时报》等捏造“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等情，纯系淆惑世人听闻，企图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适于此时(大约是在7月末或8月初)我奉到北平张学良副司令电报指示：“妥善灭迹，作好保密。”故此，我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对待，同时向张学良请求退还中村间谍证件和证物，以利于与日领林久治郎交涉，并向荣臻说明出事后未向他报告的错误，致陷他于不悉底蕴的境地。因此荣心存芥蒂，实际错误是在我身上，我应该分报沈阳和北平。以致日领林久治郎向荣询问时，荣以不明真相含混其辞。于是林久治郎态度更加强硬地说：“谁杀害的，由谁偿命！”而日本在东北的报纸于是大噪，每天报道中村震太郎为兴安区胡匪队伍杀害；旋又公然指名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之所为，甚至在日本报纸上报道：“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为此，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不得不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虽然有了这样的声明和驳斥，但仍不能抑制日本在外交上

的压迫。不仅日本浪人在沈阳滋事寻衅，而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则到处煽风点火，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切莫前往，并谓这样作法是给关玉衡以极大的压力，致酿成事件不好收拾。而土肥原贤二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姑且允其只身前往，长官公署并派铁参谋（忘其名字）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在土肥原贤二动身前故作危言耸听地说他带关东军步兵一团到兴安区用威力搜索。这虽然是土肥原贤二的故作吹嘘之言，但本区不得不予以防范。因此，本团与第一、第二两团在农隙训练之际，调齐队伍，严阵以待。迨至土肥原贤二到达白城子车站甫下车就被检查和验照后始予放行。为此，他才感到有些不对头，所以在其抵达屯垦公署竟要求派兵随行保护时，又遭到高仁绂总办的“本区向无此例”的拒绝后，只得与铁参谋向葛根庙出发。在途中备受沿途的检查和盘问，他看到部署森严，料想至余公府是要受到很多困难。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余公府的目的，不外乎收买蒙古人为他寻找中村大尉的尸骨。结果，蒙古人无敢应者，故此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这段情报是当时洮索路养路段职员何荣昌报告的。此人现在河南平山任矿务局工程师）。

土肥原在回到沈阳后大肆宣传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而日领林久治郎则在外交上更加施加压力，不是迫使东北当局把关玉衡逮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就是以“暂停谈判准备行动”作要挟。

前已略述，我将中村大尉处决后向高仁绂代理督办报告时，曾托苑崇谷把中村间谍活动的证件等转呈北平张学良副司令。在中村事件外交案发生后，我又奉到张副司令的“灭迹保密”的电令指示。因此，我是有恃而无恐的。但荣臻参谋长在未获有中村大尉间谍活动罪证时，一时急切无以应付的情况下，又怕兴安

区部队果真哗变，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势。因此，除与我函电商议外，并于9月10日前，又派前东北炮兵重炮旅旅长王致中以私人资格来兴安区与我商讨时说："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来，先放你走，就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入苏联了，只要保持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所借口'。"我听了这番说就知道荣参谋长不信任我。我说有证据确在北平行营，我立即将张学良给我的电报拿给他看（王致中据此用："兴密"给荣电说明张副司令电的大意）。他看后说："这倒占得住理了！你有这样把握，何不出而折冲外交呢？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此时我的妻子在侧说："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我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如果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以给荣参谋长打电报，赶紧向张副司令长官调取中村震太郎间谍活动证件，我一定到沈阳对质就是了。"

此时，林久治郎在沈阳对荣参谋长一天三次抗议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被迫不得已，始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殊不知我和王致中早已悄然到沈矣！到新站（西边门）由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把我接到小东关小津桥冯的私邸暂居，并在冯处见到北平派刘多荃统带送来给荣的中村间谍活动证件，并嘱我也过过目。盖此时沈阳南满驿、商埠地的日本人和汉奸闹得乌烟瘴气，谣言纷纷地传说："已经把某人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从而也引起日本新闻记者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给我照相。而日本守备队也一

天几次到监狱去搅闹。冯总监对我说："荣为保护你的安全，才把你接来敝寓，城内尚平静无事，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当晚冯并设宴为我和王致中洗尘，且有荣参谋长在座。在宴会上我即席向荣说明前次越级把中村大尉等间谍活动的证件和证物托人直接报呈北平张副司令的错误作风，当面解释并致歉意。同时，刘多荃也在座，刘是北平张副司令长官特派其亲身来送中村间谍活动证件者。此外，还有宪兵副司令李香甫亦在座，都是熟人。席间曾谈及陈兴亚司令大张旗鼓的作法，是作给日本人看的，陈司令率队走了数天，现在才行军到马三家子。继而又研究我的住处问题说，在李副司令家里最好，原因是前面有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日本浪人不敢去捣乱，而且外人没有知晓是李的住宅。席散后我即乘汽车赴李宅，这是1931年9月16日的事。

日领理屈辞穷，提出无理要求

9月17日晨，李香甫对我说："到帅府看看什么时候谈判，你是否也列席？"李说毕就匆匆走出。迨至傍午，香甫回家对我说："尚在高压阶段，证物现尚未提出，是怕日领林久治郎用暴力，必先经辩论驳倒他后才能拿出来。"晚间香甫回来，我再询问谈判消息时，他说："竟日在外布置监查警戒，未去帅府，内情不详。"次日，长官公署赵法官来访，我以为是交涉失败了是来传我到案的。坐下后他说："事情较前缓和多了，但尚未结束。原来是想叫你抵面对质的，及至提起你来，林久治郎等势甚凶狠。我们深怕出事，就改口说，已看押在监，将你的书面抗议拿给他看，而林久治郎仍不服，所以才将中村的文件和证物一部分交给他看时，他的态度才大变，似有转环的余地，然后再将全部材料都交给他看了。而在此时荣参谋长的态度和谈锋也有力了，林久治郎

的气焰一落千丈地说：'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训。'至夜晚林久治郎返回重行谈判时，提出以下四项条件：

(1)道歉；

(2)处罚责任者；

(3)赔偿一切损失；

(4)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日领林久治郎所提出四项条件都在每条内附有一个解释，如：

第一条，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第二条，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第三条，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第四条，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参谋长阅毕林久治郎所提出的四项条款后称：'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赵法官在讲完这些话以后，又继续对我表示不是来传我到案，而是荣参谋长恐我惦念叫他来说明的。并说："关于对您的处理的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说毕就辞出。李香甫说："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正说话间有宪兵走来报告说，今早见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咱们抄录下来了："大日本奉天驻屯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布。"现在街上人心惶惑不安。香甫听完报告。就急赴长官公署面报，直至下午归来说，北平回电话：日本示威运动不要管它。我正想询问关于四项条件有无电话的事，李又匆匆出去了。

此次来沈阳，我是身着便衣来的，为了行动方便，也叫随从

李贵臣换上便装。几天来听说外面情况紧，并叫他到街上探听消息。据他回报说：街上行人个个自危，商店、钱庄多未开门，物价上涨，日本兵砸监狱，汉奸亲日派在街道上横行霸道，尤其见了我们的士兵故意寻衅滋事。这日虽然有日兵、浪人和汉奸等滋事生非，但还未发生较大的事故。香甫和我正在闲谈中，宪兵来向香甫报告说，北大营西卡子门外守兵与日本兵发生冲突，已经开枪。又据北市场的宪兵报告，日本守备队百余名向北大营方向出动，时间是夜晚10时30分钟，戏院等娱乐场所均行停演。此时，日本守备队和日商（日本在乡的军人）约五百多名已冲进北市场。马路湾警察派出所又来电话报告称，日本兵已向被包围者（我商民等）开枪射击，我们正在还击抵抗中，也是10时30分钟左右，可见两路日寇是在同时行动的。复据报：自南来的列车，满载日军到站，未停直向北驶去，据云文官屯有战事。我军第七旅云：某团已在北大营还击。至11时后，又据报第七旅之一团由北大营撤走，向山城子地方转移，是为了避免与日寇冲突不叫开枪，李香甫说是北平来电话不叫抵抗，同时命第七旅撤退的。此时，日寇正沿商埠地分两路向城关进犯，李香甫去帅府回来称：北平来电话不要再抵抗，已将肇事情况向国联公布云云。当夜12点左右敌寇的火力骤增，已迫近商埠南市场。12点以后，有炮声甚巨，讯悉是讲武堂学生出动千余名出击，至下夜2时左右炮声寂然。据说是帅府有令不叫抵抗才停止的。日寇攻城的兵力约有五六百人，而在乡军人和便衣持枪者也不过五百人，就攻陷了南、北市场，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正式军队。只有宪兵一营多人，警察的战斗力极为薄弱。拂晓前日寇趁机节节进逼，枪声彻夜不停，在日寇爬城时炮火更为激烈，及其冲入城内时，首先包围帅府，将残余的卫队团捆绑用卡车载走。约于下夜2时左右，李香甫化装到荣宅（荣臻的寓所）时早已无人，又到二纬路意大利领

事馆探询荣的消息和下落，而门役推托不知，便又想到荣宅靠近美国领事馆，可能他走不出去的。这时我便问李香甫怎么办？他说咱们俩共命运吧！我招待你是私情，原来在你来沈折冲外交时，同时负有监视你的任务，那时不好明言，现在四项外交条件提出后就松多了。现在咱们俩既在一起，我还能不顾全你？只好共同想办法吧！今天可不能闯关，看看情况再说。李香甫在与我说这番话时，就又另行化装了一番，好似城市士绅的打扮。李贵臣正在这时外出哨探回报说："门关把守的很紧走不得，街上汉奸们臂上缠'自卫者'，大西门墙上贴有'布告'，有鬼子兵10多名把守，悬挂了几个人头。我没有停留，'布告'上说些什么也没有去看，只看下款仍用中华民国年月日，署名是'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李毅'。今天外边太乱，不能走，明天再说！"

不抵抗主义招来侵略战祸

9月20日，在晨光曦微中，我和李香甫离开了这座已被日寇侵陷的沈阳城。在途中，听说皇姑屯尚通火车开往关内去。因此，就奔向皇姑屯车站去，售票处人群非常拥挤，据在车站听到的消息，满铁兵车已是昼夜不停地向北开驶。我对李香甫说眼看事态扩大了！但是皇姑屯车站上尚无日寇踪迹，老百姓搭车去关内者甚多，我们也登上开往关内的火车。在车上听到旅客们谈论"九·一八"夜的消息，他们说先是日寇叫亲日派、汉奸们宣传中国兵如何不讲理，无端地把文官屯柳条沟的铁道破坏，有的说是北大营兵干的，有的说是西卡子门开火不久第七旅就撤退了，也有的说沈阳没有兵，可是洮辽、安东两镇守使还没有兵吗？因为张海鹏、于芷山两个镇守使都投降日寇了。

列车在驶抵打虎山车站时，我对李香甫说："我要换车回兴安区去，你到北平给我代呈一封信给张副司令。"这时，我和李一

同下车到了一家小旅馆，这时打虎山还未被日寇占领。

李香甫在探询中所得洮辽一带退军的消息很多，据报：日本多门第二师团在郑家屯以北、开通一带击溃该地驻军，向黑龙江省地区进犯；又讯：日寇广濑第八师团自旅顺登陆，现已到达沈阳，并准备向吉林、长春方面前进，后续尚有大量部队。这样看来，凡此都是由于沈阳当局那天晚上不抵抗所致，假如那天晚上予以抗击，就有很大可能以地方事件解决，不致扩大。在我写完呈张副司令的信后，又给宁安老家拍了一份电报。告诉我父亲我已脱险，但对于兴安区的消息是不明真相的，同时我的眷属还在彼处。正在车站上徘徊时，忽然遇到骑兵第二旅旅长张树森。据他谈，他的骑兵被敌机轰炸溃散，又经日酋多门师团的扫荡已收容不起来了。他又说兴安区在9月18日向黑龙江省退却，全部归马占山指挥，集中在嫩江桥构筑防御工事，屯垦军的家属大部分向哈尔滨输送。此时打虎山车站上突然挂出不售通辽、辽源的客票，我只得仍赴北平。在去北平的客车上，也听到现时北平同样很纷纭，人民纷纷责难政府对日寇采取的不抵抗主义而放弃沈阳的屈辱政策，引起学生列队到政府请愿、示威游行等等。抵平后方知荣臻参谋长在中央饭店寓居，极守秘密。我于23日晚在电话中和荣联系后，于次日早去该饭店谒见荣参谋长，在寒暄后，我便对荣说张副司令生我的气吧？荣说：“没有什么！”我便将我在打虎山车站准备回团部的事说了之后，荣说：“你的队伍归赵振武带领了，已经向黑龙江集中，马占山为总指挥，在嫩江桥堵截日寇北犯，当前的敌人是日酋多门第二师团。昨天的情况不明。你先回利通饭店等候，听我的电话再约你去见张副司令。”

面陈经过，慰勉留用

9月24日晚8时许，接到荣参谋长电话命我即到中央饭店。

及至汽车抵中央饭店门前时，荣亦与我同车至顺承王府官邸，晋谒张副司令后，张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还跑出来了！"我答："全仗荣参谋长的掩护。"在我晋谒张副司令面陈事件经过时，除荣参谋长在座外，还有副官长何立中和汤国祯等亦在座，我正要向他"报告经过"。他说："不谈了。"我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他说："六十多条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接着又问："你有钱用吗？"问毕就写了张条子交给何副官长后，又说："江桥完了，你回不去了。"又对何立中说："给予关玉衡参议名义，月支200元。"至此，我即行礼辞出。

次日晨饭毕，我即到行营见何立中副官长，他说："昨晚的条子是批给你500元钱，一切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要住东城。"晚间我即移寓在西单花园饭店内。这几天内学生游行示威的队伍不少，墙壁上张贴的尽是"打倒张学良"和"打倒不抵抗主义者"的标语。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中村事件真相

董昆吾

1931年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发生的"中村事件"，我是亲身参与的一个人，现将这一事件的实际经过概述于下。

1931年我任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附，团部与所属的第一营同驻兴安区佘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爷庙北约40华里，居洮索铁路线上）新建营舍内。在那年的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皖人）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

场操练，见有4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4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时值团长关瑞玑（字玉衡，吉林宁安县人，今属黑龙江，现任该县历史博物馆职员）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称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据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据说时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将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语。我看见他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又该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军曹（等于中国军队中的中士），一个喂马的白俄，一个带路的蒙古人，而且时当夏季，他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我既经知道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南"为词，将他们4人扣留。当时的关团长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团，我即派人向他报告并召他回团。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

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当日下午关团长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的会议。我仍主张我的前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服，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当时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调查知晓，我们曾想尽方法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领事已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并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过二十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那时该铁路尚在铺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及至佘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佘公府调查，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沈阳日本总领事随即向我东北代理长官荣臻（那时张学良还在北平）提出严重交涉，此时始知中村是日军大尉，是日本的参谋本部所派出的军事间谍，为了准备出兵兴安岭对苏联作战而由东北海拉尔出发，经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的。日本军阀借口“中村事件”激愤嚷叫，摩拳擦掌，遂于9月18日之夜，不待交涉解决，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当时张学良遵奉蒋介石的命令，采取不交涉、不抵抗主义，

不数月而将全部东北大好山河，以及飞机武器等拱手让于日寇。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被调任为东北讲武堂（在沈阳东山嘴子）步兵研究班队长。荣臻曾召我询问“中村事件”的经过。我就把这事件的真相向他作了详细报告。荣为应付日寇的严苛要求，将关团长传到沈阳，派宪兵看守于一旅馆中。在“九·一八”的当夜，日寇在沈阳各处搜捕关团长未获。关在旅馆中以钱散给士兵，于当夜脱逃，后到北平①；我亦化装到平。

同年冬季国际联盟所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时，关于“中村事件”这一部分的材料是我和荣臻商量写的，并绘图加以说明，交给调查团，其内容大意是：“佘公府到王爷庙间，时有土匪出没，道路不靖，为了保证中村一行4人的安全，拟派兵护送，故暂留他们于团部中。当日深夜，中村一行4人乘隙逃跑，守兵追赶，中村等以枪射击守兵，守兵还击，当将他们4人击毙。该团干部以中国系一弱国，而日军强横，恐有无理要求，遭受处分，故将尸骨焚化扬散，以图灭迹”，等语。

1936年夏间，有长春天宝堂国药店商人常某往来于长春、上海间贩卖人参，他到沪告我说：屯垦军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于“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寇，任伪满炮兵团团长，1936年春日寇伪称调他赴新京（长春）受训，将他逮捕。陆供出“中村事件”的详细经过，曾在满洲报上以大字登载。日寇对我和关团长再次悬重赏通缉。陆被日寇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奠祭。日寇并将中村残杀经过编成戏剧、电影，大肆宣传，借此来鼓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仇视中国的情绪。

同年春间日本大使川樾曾为“中村事件”寻访我的踪迹，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此事告

---

① 关于关玉衡从沈阳脱身的经历，应以关本人的回忆为准。

我，让我注意。我即由那时起把我的原名“平舆”改为“昆吾”。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关于《中村事件真相》的补充

谷振寰

关于《中村事件真相》文中所述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陆鸿勋被日人残杀祭灵的经过，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我是在1936年（伪康德3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动思想大检举时离开东北的，与陆鸿勋相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随兴安屯垦军转移到黑龙江省，参加马占山领导的抗日战争。屯垦军全部编为一个旅，旅长是苑崇谷。马占山退驻海伦，苑与马意见不合，去职进关。该旅长遗缺由炮兵第九团团长璞炳珊继任，编为黑龙江省暂编第四旅。

陆鸿勋于1933年接受伪满改编，任黑龙江省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队中校队长，统辖炮兵两个营。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是张文铸，参谋长是于治功。

1934年陆鸿勋因母丧回安徽原籍，数月未归。当时我以为他已归还祖国，不再回沦陷区。但他竟向伪司令官张文铸、参谋长于治功通信续假。等他回任时，见面谈及此事，我颇不以为然。他说：“家中经济困难，不得不回来。”竟贪图伪满军官生活待遇（中校级七级薪220元，办公费250元），这是他自投死路的主要因素。

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儿子，由日本国内来东北寻找他父亲的骨灰，住于伪黑龙江省第三教导队骑兵第三团团

长姜鹏飞的家里。姜由顾问长治辛介绍与日女伊藤结婚。伊藤和中村是亲属关系。这个小中村往来于齐齐哈尔、洮南之间，半年有余。到1935年冬，伪军政部发令（大臣于芷山），召集军官入训练处受训。此令发到黑龙江，通过第三军管区高级主任顾问中佐河崎思郎（曾任中国陆军大学教官）有用意地选择，把陆鸿勋选送到沈阳东山嘴子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受训。

1936年初，由长春（新京）日本宪兵司令部会同沈阳驻在宪兵部队，把陆鸿勋由在学的军官训练处逮捕。经过百般拷打，多次审讯，陆受刑不过，终于将事实全部经过供认定案。当时伪满各报都在第一版用大字登载："谋害中村的杀人巨魁罪恶滔天犯陆鸿勋落网"并附照片。后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祭灵。其子正当其事，编成戏剧、电影大肆宣传。事后，我曾向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打听这件事，他说："这是血债巨案，谁也不敢说救。"陆鸿勋两次自投罗网，终遭杀害。

（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

中村事件亲历记

金东复

记得，1931年我刚满20岁，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屯垦军三团二营任中尉骑兵中队长。团部及所属各部队，除三营外，均驻扎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余公府附近，即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境内。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中村事件"，就发生在这里。我曾参与其事。现将我目睹的有关"事件"的真实情形记述如下。

事件发生在1931年7月下旬。当时，我团二营，即我们骑兵大队，在团长关瑞玑（字玉衡）上校的率领下，前往团部驻地余公府去王爷庙南突泉县一带执行剿匪任务。一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我们已经休息。突然，传令兵传达团长命令："有紧急情况，要在20分钟内喂好马，准备出发。"这时，我们中队为前卫，在集合时，我请示团长往什么方向前进。团长指示说："回团。"队伍很快就出发了。

一路上，团长不断地催促队伍快走，后来，他的坐骥索性跑到我们队伍的前头，命令部队紧跟。团长的战马，高大健壮，跑得又快，后面队伍中的马弱者，有的逐渐掉了队。因为我有一匹备马，换着骑，所以才勉强跟上。此时我的心里十分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回团部竟如此急若星火？

经过100余里地的强行军，到达营房驻地已是下半夜了。战马浑身汗水淋淋，人也极端困乏，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不是由传令兵而是由团部副官亲自秘密通知，让连以上干部去会议厅开会。当时，我团三营是屯垦公署的卫队营，驻扎在洮安（白城子）。团部所在地尚有一营、二营（即骑兵大队），团部直属通讯连、机枪连、追击炮连、军械处、军医处等连以上的军官共有20人左右。到会议室等了片刻，团长与三位副团长从内室走出。宣布开会后，副团长董平舆（后改名董昆吾）少校先介绍说："昨天清晨，哨兵发现有人在营区外拍照，上前制止时，来人不但不听而且盛气凌人。我接到报告后，出来用日语询问（董副团长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日语说得很好）。为首的说他叫中村震太郎，是来东北考察农业的。他随即拿出了由南京政府签发的外交护照，上面还有路经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签字。我们交谈中得知，中村是日本士官学校我的上届毕业生，我们是同学。中村一行人还有一个日本人、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那

个日本人叫井杉延太郎，是中村的助手，蒙古人是带路的，白俄是马匹的雇主。我将他们领到团部后，经检查发现他们携带有军用地图、测绘仪器等从事间谍活动用的物资器材，并在日记本上有对我边防地区兵力分布、军事地理等情况的详细调查和记载。于是我赶紧派人向团长做了汇报。”

当董副团长讲到这里，才解开了昨夜团长之所以那样急切返回营地的疑团。

团长关玉衡接着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已将中村等人拘留起来了。经初步审查，中村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大尉，那个日本人是退伍军人，原上士曹长。他们系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兴安岭、索伦山，到我们边防军事要地调查军事地理的。对我们这一带的气候、雨量、村落、居民、兵力等详细情况，都有记录并绘制了地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早就野心勃勃。中村显然是为他们侵略中国东北搜集军事情报的，纯系军事间谍。我们若放了他们，国家的机密就要落入日本手里；要是把他们扣留后再通过外交途径，恐怕也不好解决，因为我们是弱国，一些当权者怕外国人怕的要命。因此，不如我们将他们秘密处死，这样既能保住国家机密又不致于召来许多麻烦。何况本地区，经东北长官公署早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谢绝外国人来屯垦区参观游历，不发护照在案。所以经团部研究，准备今晚就把他们处决，大家看行不行？”

短暂的沉默之后，大家开始议论。有人说：“中村有南京方面的护照，是经外交允许的，杀死他们一是不好向政府交代，再说纸包不住火，日本国迟早是会知道的，追查起来怎么办？”

关团长立即回答说：“中村是以外交面目为掩护，实际是进行军事间谍活动的，已经超过了南京政府允许的范围，所以我们有权处置他。再说，我们这个地区很偏僻，周围人烟稀少，只要我

们行动周至、严守秘密，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他们，谁能知道呢！”

大家又议论了一会，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在东北横行霸道，罪行累累，不知屠杀了多少中国同胞。中村来搞特务活动，现在落入我们手里，决不能轻饶他。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然后，团长非常严肃地宣布了保守军事机密的纪律。我记得是“约法八章”，大致内容如下：

1. 此为军机，不可泄露，上不许传父母，下不许告妻子，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

2. 如有任何上级机关，或哪一个长官问及此事，只许异口同音回答“不知道”，谁如透露出去，依第一章处理。

3. 不许私留中村一行人的任何财物；收缴的东西，必须上交团部，违者枪决。

4. 由今日起，不许官兵聚集，交头接耳，任何人如发现有议论此事的，立即有处决权。

5. 在书信中向亲友谈及此事者，枪决。

6. 通信必须经团副官室检查后方准邮出；不经检查私邮信件者，依第一章论处。

7. 外来亲友必须向团部报告，经审查后方可留宿；否则，来者按坏人处置。

8. 擅自离岗离职者严惩不怠，确认有投敌行为的，依第一章处理。

最后研究了怎样处决办法。团部驻地虽然是坐落在荒漠空旷的山坡下，但余公府——蒙古王府，却离此不远，大约有2华里。为防止枪声引来不测，而制定了“刀杀”的行动方案，并做了具体的分工。我们骑兵大队关琛大队长不在家，由刘大队副、我本人和另外两个中队长负责现场及外围警戒，一营营长陆洪勋

等四五个军官负责捆绑押送，其余官佐负责现场处理，执刑的刀斧手是一营一连连长宁文龙。

约近晚8点，我们依照命令，各就各位。当时，团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天刚黑就开始戒严，兵舍全由排长站岗，士兵一律不许外出，连大小便也只准在屋内。

刑场设在会议厅。大厅约有100余平方米，地面是用石灰与炉渣混合铺成的。两侧是团部各部门的办公室，中村等人被分别押在那里。

首先是中村被五花大绑地押进来。这时大厅内非常沉寂，笼罩着十分威严的气氛，每个人也都是正气凛然的样子。团长先命令解除中村眼睛上的蒙带和拿掉嘴里的堵塞物，由董副团长担任翻译进行审问。

“你到我们东北来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关团长厉声指问。

“来考察农业，准备进行经济贸易。”中村狡辩地回答。

“胡说，考察农业为什么到边防军驻地搞军事情报？”关团长愤怒地斥责，并且令他交代特务活动的背景和罪行。

罪证俱在，中村已感到无法抵赖，于是他暴露出强盗的嘴脸，大喊大叫地威胁说：“如果不放我，就要上告中国政府，日本关东军是饶不了你们的！”

关团长是黑龙江省宁安人，中等个，身体魁伟，性情刚毅暴烈。张作霖被害、“万宝山事件”，更加深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此刻，见中村如此骄横，他怒不可遏猛然大喝道：“混蛋！今天我就要你的脑袋，叫你去上告！宁连长，行刑！”

中村立而不跪，狂呼乱叫。几个军官用强力让他跪下，宁连长从旁边走出，手操大刀，走到中村身后。只见刀光一闪，中村就倒在地上。由于宁连长紧张，中村没被砍死，还在地上挣扎，此刻关团长一个箭步上前，从宁连长手中夺过大刀，只听咔嚓一声，

将中村的头颅砍下。这时，负责清理现场的人员上来，先将尸体抬到大厅旁的一间空房里，然后用破布将地面的血迹拖擦了一下。继而，关团长又命令："带下一个！"就这样，那个日本曹长也被杀掉。为防止失密，另两个人也被同样处死。

之后，大家一起动手把大厅收拾干净。整理完毕，团长关瑞玑又给大家开会，并命令团部副官赵衡、刘天鹏俩人在厅外执勤放哨。

会上，除重申保密问题外，又商议了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等尸体的处置办法。为尽量缩小目标，最后决定将其尸体分解后掩埋于荒山。

就在这天夜半时分，我们10余个连级军官，每人背了一条装有敌人尸块的麻袋，手持一把军用小铁锹，一盏马灯，在团长的亲自率领下，向驻地东南方向的山岭进发。记得当时没有月光，走入灌木丛后，大家便分散开，点上马灯，各自找寻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将碎尸深埋了起来。

与此同时，兵分两路，谷副团长尚带一部分人，到距营区七八里远的山洼里，将中村等的4匹马砍死，连同其一行人的衣物焚烧后掩埋起来。

翌日，团长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会。原来，董副团长提出：这样处置不可靠。怕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来检查，他们的狼狗嗅觉很灵敏，能把尸体给找出来，不如将其投入河里稳妥。

因此，团长命令必须把各自埋的所有尸块全都找出来，缺一块也不行，而且要在夜里行动。团长的话音刚落，军官们的脸上便都不由地表露出为难的神色。因为埋尸块是夜里的行动，埋时又只顾及保密，所以很难记准和寻找到自己的掩埋地点。但军令如山，大家也只好去执行。

天黑后，我们又拿起麻袋、军锹、马灯，惴惴不安地向荒山走

去。虽是夏夜，但山风很凉，加上心情颇有些紧张，因此，感到特别的冷峭，手中的马灯更是一颤一抖的。折腾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尸块挖了出来，回到指定的集合地点。然后，我们又跟着团长来到了洮儿河，选择了一深水地段，将碎尸集中到几条麻袋内，用钢丝扎上口，再坠上大石头，沉入河底。

当大家返回团部时，天已破晓。一夜的紧张心情和劳累的身躯，此刻才算略觉轻松。

事过不久，大约在8月上旬，我们听说日本人已知道了中村大尉死于我团的情况，并要派兵来武力搜查。军官们都觉得很惊奇。大家偷偷地议论说：此事处置得这么严密，怎么会这样快就泄露出去了呢？当时，有这样一种猜测的说法，即此事是由我团的副官刘天鹏中尉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告的密。

猜测的事实根据是这样。原来，当时中村被杀后，尸体放于空房内。团长在给军官开会，由赵衡和刘天鹏两位副官在外面担任警戒。刘副官乘机溜进停尸房，想捞点外快，恰被赵副官发现。因为这行为是违犯“约法八章”的。赵副官向上报告后，团长闻之大怒，欲当即处决刘副官。刘系山东人，与我团第一副团长李允升中校是同乡。经李副团长说情，刘副官幸免于死被禁闭起来。刘副官对此事非常恐惧，怕日后有个万一。于是他偷与家中联系，不久家里发来双挂号信，说父母双双病重，让刘赶快回家。刘副官哭着与团长请假，团长不准。又经李副团长从中说情，答应给7天假；经李再次说情，才勉强给10天假，并令他务必按时归队，且不准以任何理由续假。刘副官匆匆离队后，不仅一走没复返，而且下落不明。恰值此时，我们听到关东军将要来讨伐我团的消息。所以大家都怀疑是刘天鹏向日本人告的密。时至今日，仍弄不清当时这个猜测是否准确。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见，屯垦军处死中村，是出于广大爱国官

兵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愤慨，是为了保守中国军事机密的正义举动。然而，当时的国民党卖国政府，事发后，不仅不敢揭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相反地却对屯垦军的爱国军官进行惩处，把关玉衡团长扣押在沈阳，并且任凭日本帝国主义歪曲事实真相，利用“中村事件”为其公开发动侵华战争制造舆论和作为武装侵占我东北的口实之一。蒋介石等掌权者们当时认为，是因为我们处决了中村，日本帝国主义才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所以参予处死中村的人们，都成了历史的“罪人”。正因如此，使我多少年来一直不能谈及此事。

今天，当我追忆起五十多年前的这段往事，面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现实，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欣慰！当年我们出于爱国的义愤和作为军人卫国守疆的责任感，杀死了两个日本军事间谍。但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之下，仍然没能避免我东北同胞遭受十四年沦亡的苦难。

（本文根据金东复1981年12月的谈话记录整理，并经过本人的修改审定。整理人：赵汇娟。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

中村事件——察尔森镇的一场劫难

巴图·舍旺
陈泰山　整　理

1930年冬，奉天（沈阳）日本领事馆领事林久治郎，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指挥下，将退伍军人、军曹（上士班长）井杉延太郎派到昂昂溪设旅店。以此旅店为据点在东蒙地区进行间谍活动，收集掌握当地风土人情、交通路线、民

族关系等情况。

1931年1月，日本帝国陆军省参谋部情报科从日本东京派遣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到我国东北的昂昂溪与井杉延太郎会合，进一步开展间谍活动。为在途中安全起见和便于活动，井杉延太郎出面雇用一名白俄猎民做向导，雇用扎赉特旗蒙古族无业游民刘顺宝（有人说刘顺孝）为其喂马烧饭。

中村、井杉等人伪装成“农业科技人员”，窜入海拉尔、索伦山等地进行将近3个月的军事间谍活动。他们在所到之处侦察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山水桥路、军事设施、驻防兵力、将校姓名、武器装备、气候资料、土质水源等情况，并进行了详细绘图和分类记录。

中村震太郎从海拉尔前往索伦山前夕，与奉天的日本领事馆人员预约，5月中旬到洮南接头。他们在由索伦山南下去洮南的途中，因迷路而行至察尔森。这天，驻扎在察尔森的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陆洪勋正在操场训练士兵时发现了乘坐大马、身着棉装的4个人，驮载行装甚多，从北向王爷庙方向急驰。陆洪勋感到行迹可疑，当即指派士兵数名，将中村等人追回查问。中村说：“我们是日本帝国科技人员，从索伦山前往洮南的，因途中时有土匪出没，为安全起见绕道而行至此地。”并取出假冒科技人员掩盖特务身份的名片和护照递给陆洪勋看。在其名片上印有“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等字样。在其护照上写有“中村等人系调查土壤、水草、气候等的科学考查人员”字样。中村故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护照为证，你们无权阻挠我们的正当行动，望速放行！”陆洪勋营长见中村的态度蛮横、言词无理，更感到其行踪可疑。遂将中村等4人领到三团团部。经与少校团副董昆吾研究决定，对中村等人进行搜身检查。中村当场提出抗议，表示拒绝检查，

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董昆吾等人以我军负有守卫边防任务为由，当即下令强行搜身检查。结果，当场搜出南部式手枪一支和弹药约千发以及军用地图、测绘仪器、表册记录、行动路线图等实物甚多。在那些书面材料中，详细记载着他们所到之处的军事设施、枪炮种类、驻防兵力、营房容量、水源、气候、雨量、风向、道路、桥梁等情况。又从中村震太郎的个人日记中发现，在当年1月初，中村从东京出发时，日本有关军事要员送行的情景及其所表决心。

屯垦军第三团完全掌握了中村一行是军事间谍的真凭实据。董昆吾和陆洪勋等人对中村等进行了正式审讯。中村震太郎在当时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坚持其所谓“农业学会会员”的身份，并继续蛮横无理地要求立即将他护送到王爷庙或洮南府。董昆吾和陆洪勋等人感到事关重要，不宜擅自处理，立即派人将公出在外的团长关玉衡请回来研究对策。是夜，关玉衡团长赶回察尔森，召集连级以上军官开会研究做出决定：根据所收获的罪证，对中村等人一不能放行，二不能解送。如放虎归山，必生后患。为了避免走漏风声惊动邻里百姓，必须进行秘密处决。于是，1931年5月25日晚，指派少尉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数名，将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刘顺宝及猎民(白俄)等4人用马车拉到察尔森北山沟，背对背捆绑在大树上，身浇汽油，焚烧处死。

屯垦军处死中村等人的消息一直封锁得很严密。但是，后来还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据察尔森老户、民间艺人韩老二说：屯垦军第三团赵团副的勤务兵马允富，在中村事件发生的前半个月在一次渡河中因落水而丢失手枪一支。为此事马允富曾几次被打得遍体鳞伤。正在这时中村事件发生了，马允富为逃避那种生活，当晚弃械逃跑。因其手中钱无一文，速返家乡心切，只

好在途中讨饭赶路。马允富路过洮南，身穿旧军装在街上讨饭，被当地驻军发现，将他以“逃兵”罪名领到部队审问，在审问中马允富将屯垦军第三团杀死日本人的情况供了出来。这样一来，当时在洮南街的南满铁路公所的日本人西村××立即向奉天作了报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获悉后亲自调查，终于掌握了实情。

中村震太郎被杀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关玉衡团被调往江桥马占山部参加抗战。后来马占山抗战失利，陆洪勋于1932年率部接受了伪满洲国的改编。日本人通过姜鹏飞得知陆洪勋的情况，而后于1936年逮捕了陆洪勋，在昂昂溪处以剐刑为中村震太郎祭灵。

与此同时，察尔森的老百姓跟着遭了殃。日本侵略者为中村树碑立传，大兴土木，强令蒙民寻找中村尸骨。老百姓有送猪狗骨头的（当然是不满的意思），有送人头骨的。最后日本当局悬赏100元来寻找尸骨。在察尔森屯，一个名叫桑布的猎民，领了日本人的钱，找回不少骨头，日本仍说不是，将他以“欺骗罪”拉出去活埋，土埋半截时被巴颜那木尔求情，才饶了一命。

在无法找到中村遗骨的情况下，日本人在居日很达坝北发现一只水袜子（胶鞋），在此处为中村造了墓，在居日很山顶立了碑，在山脚下盖了5间小庙并安排了两个日本喇嘛看管。祭奠中村那天，将原屯垦三团蒙古士兵桑阿等二人找来，迫使他们跪在灵前。以后每年春季进行一次祭典，勒令当地军民学生都来参拜。

对日本侵略者如此残暴行径，当地蒙古族农牧民无不恨之入骨。察尔森屯的民间艺人韩老二，自编歌曲到处演唱以示反抗。其中有一段歌词唱道：

我们丰美的草原，

遭到魔爪的蹂躏，

自由幸福的生活，

被水深火热代替。

勤劳的蒙古民族何处有出路荷伊！

只有团结起来反抗到底呀荷伊！

有一次，在察尔森屯，韩老二正当众演唱时被警察逮捕，要以“反满抗日”罪予以处决。当时人们以其患有“精神病”为由做担保，才免去一死，被罚做劳工42天。

“八·一五”光复时，察尔森的群众将中村墓碑砸碎，并将墓毁平。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关东军是如何得知中村被处死的消息的

刘庭华

由于中国方面对中村事件采取“灭迹保密”和“以静制动”的策略，因此日本方面迟至7月中旬才开始得到中村等人被杀的消息，且其真相仍模糊不清。据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著的《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一书有关章节的记载：从7月10日左右由旅顺出发、参加关东军组织的所谓“北满参谋旅行”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行，该月中旬到达黑龙江省在昂昂溪准备换乘中东铁路火车时，该地昂荣馆的女老板是随同中村震太郎的井杉延太郎之妻，她告诉板垣等人说：她将近1个月与井杉失去了联系，要求他们回到旅顺后，请求关东军

协助寻找。于是关东军开始注意了解这件事。7月17日前后，中国东北屯垦军某军官的情妇、名叫植松菊子的日本女人，把她所知道的有关中村等人被杀的情况，告诉了哈尔滨满铁公所雇员佐藤的妻子：6月27日夜，两名日本人、一名俄国人和一名蒙古人，在苏鄂公府被屯垦军（代理团长关玉衡）杀害了。于是，佐藤立即将这个情报递送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

关于中村被处死的日期问题，历来被说成是6月27日。其实这完全出自关东军与驻沈阳日本总领事馆的编造。1931年9月9日，林久治郎以第576号电报呈日本外相币原说：关东军顷商本馆欲将中村大尉被拘留日期定在6月27日，被害日期定在7月1日，以期与他事相配合，职已应允，请对外声明时注意此日期。1932年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沿用了关东军编造的6月27日这一说法。此后，在研究"九·一八"事变的许多中外著作中，亦都照说不误。这是不准确的。战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关中村震太郎专档一宗，并列为东京裁判中I. P. S. 2981号之证件，上载：中村系陆军现役大尉，昭和3年（即1928年）陆大毕业，昭和6年（即1931年）以参谋部部员，奉派来满，受关东军密令，前往洮南侦察军情。其同伴井杉延太郎则系骑兵伍长，久在昂昂溪开设旅馆，其人精通俄蒙及中国语言，干侦察工作最为相宜，因中国官宪监查甚严，遂由哈尔滨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办农业专家游历之护照，于1931年5月14日，自哈尔滨入呼伦贝尔，而至洮北。当时亲自参与和直接处理中村等4人的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在他1981年8月写的回忆录中，把处决中村等人的时间定为1931年5月25日午夜12时30分钟左右（即26日零时30分）。

（摘自《"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四

发动事变　占领沈阳

回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纪略

李济川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发动了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我当时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对于事变前中日双方的交涉，及汉奸们的卖国投降活动，有些亲见亲闻，现就记忆所及，叙述于下。

从时局紧张到北平请命

这次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具体贯彻。开始他们以中村大尉事件等为借口，用外交手段对东北当局进行压迫。那时，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代理长官张作相亦在锦州小岭子私第为伊父治丧。沈阳主持外交的只有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外交特派员王镜寰（字明宇）。在事变的头些天，就盛传日本帝国主义要实行武装占领，他们在军事方面作了布置，除关东军调来满铁附属地外，对在乡军人，也发给了武器，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9月14日突接张作相电，要我速去锦州，面商要事。我当

天到锦州小岭子张作相公馆。张说："上次参谋长荣臻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他，东北外交和军事都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行动。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臧主席（式毅）和荣参谋长想如何办理呢？"我答以没有头绪。并告以多门师团的部队开到南站，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作相要我马上去北平，按照他的意思请示张学良究竟怎么办，是准备抵抗，还是屈膝求和。我当即辞出，下午4点钟去车站。

次日8时到北平。下车后，直赶协和医院。当时张学良患重感冒，在该院休养，住东北角地下室内，由侍卫副官长谭海引入。张问我沈阳情况怎样。我说："东北目前局势严重，究竟如何处理？我受辅帅的指示，来向副司令请命。"张说："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也不好。前几天荣参谋长来，我已告诉他，东北大事，由张辅帅、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对重要问题咱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中村事件的交涉，可向辅帅说，微末事情，咱们可以相机办理。"又说："请辅帅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我说："今天的紧急情况，还不知怎样处理？"张说："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你迅速回去，请辅帅相机处理。前些日子驻日大使汪荣宝由东京回来，已到锦州和张辅帅说过：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装占领东北。你赶紧回去吧！"

当夜12时我到锦州小岭子，面见张作相汇报。他对我说："荣参谋长来时，我已告诉他，关于中村事件，任何赔偿道歉我们都可以担负过来。"我由沈阳来时，情况就十分紧急，形势相当严重。这时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沈阳，明天一起回去行不行。我还说："沈阳没有大员主持，军、政两方互相推诿，恐把事情弄坏。"他说："京津方面安福系来了不少人吊唁，大概明后天

他们走了，我就回沈阳。”

中村事件最后一次交涉

我于9月16日离开锦州小岭子，即乘快车回沈阳。下车后，遇见副官处驻站副官李凤楼和许仲仁。他们很惊慌地对我说：“处长啊，不得了，情况严重，南站日本军队和在乡军人都成行成列地拥挤不开。马路湾西边日本‘忠魂碑’附近，放有10余门大炮，情况紧急，恐怕今天就过不去。”我告诉他们要沉着，有事用电话联系，明天辅帅就回来。

之后，我直奔三经路荣臻参谋长公馆，见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正为伊父庆祝寿诞。我一进楼，见当中摆设寿堂，香烟缭绕，灯烛交辉，颇极一时之盛。到东客厅内，满屋大员，抽鸦片、打麻将，更有张筱轩的京韵大鼓，热闹非常。荣参谋长叫我上楼。他问我：“副司令和辅帅有何指示？”我说辅帅指示：对中村事件，日方要求赔偿道歉，我们都可以担负起来，关于要价还价问题，等辅帅回来再说。

时近中午，下楼就餐，大家将入座，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突来祝寿。林对寿堂行三鞠躬礼。礼毕，约荣臻于午后4时在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会谈。

林久治郎走后，荣参谋长对我说：“午后3点你先到公署，并约王明宇（外交特派员）一同在公署等我。”我于午后3时到公署，打两次电话请王明宇未到。林久治郎于4时来公署，他见荣臻不在，问我：“荣参谋长怎么没来？”我说：“他家宾客很多，一会就来。”我随即用电话告诉荣臻，说林久治郎已到。不久，荣参谋长来了，开始关于中村事件的会谈。因事机秘密，林会说中国话，这次会谈没有译员。会谈之前双方很严肃，甚至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屋内只有荣、林和我。林说：“关于中村

事件现在已到严重关头，参谋长如何答复？”荣一转身将中村搞间谍活动的证物拿出来，有中村在兴安岭一带绘制的军用地图和其它文件，让林久治郎看，并说：“林领事你看看，这些东西让我没法办，你们没有向交涉署照会，没有我们的护照，我们不能负保护责任。”林说：“参谋长，现在经过这么多次会谈，还把这东西拿出来干啥！”林看到这些证物，精神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拿出手帕紧擦。

稍后，林久治郎静下来，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也很愤怒地说：“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我当时急得冒汗，看事情已成僵局，荣并未按辅帅的指示办，我站起来说：“参谋长，我是副官处副处长，本没有参与军事和外交大事的权利。不过我有传达任务，请参谋长按辅帅指示办事。否则，我担负不起责任。”是时，林久治郎用手帕擦汗，斜视我一眼。荣站起愤怒地说：“我不能作亡国史的头一页。”我说：“亡国史头一页不是你作的，谁说了谁负责。”这样一来，林就知道了我方对中村事件处理态度的底细。林一跃而起说：“这件事情不能办了，我回去了。”并用威胁的口吻说：“中日友好关系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说完转身而出。荣送出二门，我送到大门外，时间是9月17日晚6点。

林久治郎走后不久，臧式毅到，问林久治郎怎么谈的。荣说：“没有结果。”我告诉臧式毅说，荣参谋长没有按辅帅的意思去办。荣说：“这事我算办不好了。”臧说：“赶紧找王明宇，让他就来。”不久，王明宇到来，手执文明杖，若无其事地笑哈哈地进来。荣说：“明宇，你怎么才到？”王明宇很稳当地说：

"我去南站大和旅馆，本想面见本庄繁（关东军司令）谈谈，未遇。土肥原（特务机关长）对我说。'本庄司令有事去大连，你们对于中村事件怎么办吧？能办就办，不能再推了！'"臧式毅顿足对王明宇说"你赶快去日本领事馆找林久治郎，对他说，有关中村事件的任何赔偿道歉，我们都先担过来。至于讨价还价，明天辅帅回来再核计。"时已7点半钟。

北大营的炮声

我8点到家，吃完晚饭正是10点25分，忽听响了第一炮。我赶紧去边防公署。到大东门时，城门已闭，这时已响了第四炮。我对守门警察说："你们的厅长（警察厅长黄显声）在厅没有？赶快打电话或派人去找。"到公署门前，见有卫队二十四团吴营长（名忘记）带领两排卫队守卫公署。我到副官处，只见值日副官萧涤五一人。我赶到办公厅给荣参谋长打电话，荣随即到公署。不久，北大营步兵第七旅来电话（打电话人的名字忘记）告急说"西门外有日军行动"。电话是荣接的，他问："你们旅长呢？"回答不在营。5分钟后，王旅长（王以哲，字鼎芳）到，他对荣说："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呢？"荣说："往北平给副司令打电话，请示一下。"于是，荣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他说："副司令陪美国驻华武官到前门中和剧院看戏去了。"荣问："对东北局势，副司令有什么指示？"谭在电话中说："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这时东北电政监督朱光沐来电话，约荣参谋长和我到电政局，为的是向北平通话方便。当时我和电话室说："谁来电话，可向电政局找我。"于是和王旅长、荣参谋长一同去电政局。这时北大营第七旅又来电话告急，说："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已突

破西卡门。”荣臻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对方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刚说完话，奉天典狱长倪文藻也来电话告急，说：“日军爬城，在城上向狱内开枪射击。”我说：“凤山（倪文藻字）哪，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不能派军前去保护，只有你们沉着固守。”

这时东北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字建文）也来电话说：“情况危急，我们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我说：“建文，赶紧飞锦州，飞去一架是一架，锦州不能降落，辽河以西任何地方都行。”

臧式毅来电话，让我们到他公馆去。我告诉电政局，再来电话时往省长公馆打。这时荣参谋长还想往北平打电话，可是线路已被破坏，打不通。同时小西门警察也来告急，说：“日军攻城，如果城门不开，他们就用炮打。”我告诉他们听命令，暂时不开。倪典狱长又来电话说：“城上站满日本兵，用机枪向院内扫射，在禁犯人已有暴动行为。”我说：“在此情况下，你开门放。”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来电话：“我支持不了啦，各方派人找飞行员，一个也没找到。”我问荣参谋长怎么办，荣说：“让陈参谋长酌情处理吧！”就这样，机场内的飞机及其它设备，拱手让给日寇。

这时，秘电处处长张志忻来了，拿着南京军委会十万火急电报，原文是：“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大家看完电报，心情稳定了，认为没事了。臧式毅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

语未毕，北大营第七旅来电话，请旅长速即回去。我问什

么事，回话说："日军满院都是，已砸开枪库，打死中校军械官。"王以哲闻讯后，对荣臻、臧式毅说："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是否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日本硬说我们破坏柳条湖铁道，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吗？"荣说："鼎芳，你回去吧，随时来电话，有事听命令。"王遂出门，但他的汽车已被日寇掠去，中途受阻折回。

事后得知，北大营第七旅绝大多数官兵，并没有执行"不准抵抗，把枪放到仓库里，挺着死"的命令。在日军逼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时，官兵们奋不顾身地抗击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敌人。由深夜2时许，激战一个多小时，伤亡很大，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才突围，撤退到东山嘴子集结待命。

官员逃避与汉奸活动

9月19日拂晓5点多钟，日军占领北大营后进入城内，秩序顿时混乱。这时我们都在臧公馆，臧式毅说："日军已进城，就不是什么演习了，我们派人向日军作交代吧。"遂派秘书长赵鹏第去省署，派我去长官公署，向日军作交代。

我与赵鹏第乃分头去省府和长官公署。我到长官公署后，得知卫队二十四团吴营长被俘，公署牌子被砸碎，号房电话也被砸碎。我急返回向臧式毅复命。时荣臻已不在，我问："荣参谋长到什么地方去了？"臧说："他已躲了，你尽快把制服脱去，快去吧！"

中午，我又去臧式毅公馆，见袁金铠（政务委员）、李友兰（本溪煤铁公司总办）、佟德一、张振鹭（财政厅长）、金毓绂等，正谈交涉问题。有人说："我们几个人去南站见本庄司令。本庄不接见，告诉传达说：我们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东北官吏没有接谈的必要。"继而又有法团代表去见本庄繁。本庄说："对

于地方秩序维持问题，你们可以酌情办理。”法团代表拟出办法：（1）成立保安维持会；（2）成立自治警察团。交给本庄看，当即照准。袁金铠说：“人家日本人已经占领沈阳，还有啥办法呢，就成立这个会团吧！”另外，没有人吱声。臧式毅对我说：“你赶快去北平报告，省署派教育会姬金声会长去。”

我于9月19日下午2时由皇姑屯上车，走了三天两夜，21日到北平谒见了张副司令，将“九·一八”事变详情作了报告。张说：“沈阳的事情，我全知道，我正在想第二步办法，将长官公署迁到锦州，仍以张辅帅代理，现正等候中央指示。”

（冯应春、于俊满整理，摘自《辽宁文史资料》第四辑）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纪实

赵镇藩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任东北军第七旅的参谋长，事变的当天晚上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我正在北大营旅部住宿，亲身遭受了日寇的突然袭击，并率第七旅退出北大营，现将当时情况追忆如下：

事变前的敌我形势

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由于清政府昏庸腐败，允许日本在南满驻军，日军早已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迨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当时日本驻在辽、吉的军队实力和分布情况如下：一为铁路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辖四个大队（实为六

个大队），分驻公主岭、沈阳、大石桥和连山关，是永久驻屯性质，由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一为驻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驻辽阳，下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旅团司令部驻柳树屯，所属两个联队，分驻柳树屯、辽阳；另一个旅团司令部驻铁岭，所属两个联队，分驻辽阳、公主岭；骑兵联队驻公主岭，炮兵联队驻海城。这一部分驻在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此外还在旅顺设有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所有以上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在日军的编制上，关东军司令部的职权很大，司令官直隶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权，遇有非常事件并可当机立断，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军阀认为条件成熟，随时就可以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1931年，日本军阀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多方制造借口，向我寻衅。是年8月，日本侵略者继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准备军事，企图发动进攻。8月下旬，日本铁路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同时驻在朝鲜境内的十九、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们江沿岸，并举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国龙多岛和图们江领水；南满铁路沿线日军亦同时举行演习二周，武装示威。9月初，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到南满路沿线巡视并检阅部队。9月8日，日军越境在沈阳北边门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随后还不断地演习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等。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亦于9月8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日军当局并于9月10日左右分别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来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时适有驻沈阳的日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三十三联

队要“瓜代”归国，我们照例为村田联队长饯行，他在酒兴正浓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情说：中国好，不愿意归国；又说：归国后不能升级，又不能进入陆军大学，只有退伍，表示留恋东北。随后他又在酬谢我们时向我透露：他的联队得到新的命令，归国的部队必须等到新兵到齐后同时返国，他感觉奇怪。同时我们还获得情报说：沈阳南满站附属地缝纫厂正大量赶制中国军服，用途不明。所有以上征候，都说明东北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东北有识之士都预感到日寇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在形势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平时不做对日作战准备，而且连年进行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相持数月，胜负不决。9月间，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阎、冯，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了关内，随后为了巩固蒋介石的政权，张学良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由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发生了新的内战。中原大战后投降张学良、驻在河北顺德一带的石友三，受广东国民党非常会议收买，就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7月间通电反张，进犯平津。此时日本侵犯东北阴谋日益显露，形势日益危急，但张学良不但没有将东北军调回关外以作防备，反而尽可能抽调部队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进了关内），致使东北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瘩都拿出来了。”这样，东北在军事上陷于非常空虚的状态。

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而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第七旅、张廷枢第十二旅和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分驻沈阳、锦州和通辽，常经武第二十旅驻洮南一带；连同火力很弱、平日缺乏训练而又被腐朽昏庸的张海鹏和于芷山所掌握的洮辽和东边两个镇守使署所辖的两个省防旅在内，辽宁全部兵力也不过五六个旅。特别是当时东北军队的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日意志，充满恐日心理，平素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日军一旦发动进攻，就不战而溃了。

第七旅的应变措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王以哲对于执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当时是比较"忠实"的。他由北平回来后，有一次召集团以上军官研究我军如遭受日军攻击时如何对付的方案。我和团长王铁汉、张士贤、

王志军以及丁、朱两参谋都说："遭受日军攻击，采取不抵抗方针怎么能成呢？那样，全军势必遭受歼灭。"王以哲笑着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办法？我们要绝对服从。"大家都不同意王以哲的意见，朱参谋说："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是也不能坐着等死。"有人说："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但是敌军若来了我们想走也不成，只有起来应战，不抵抗怎么能成呢？"最后王以哲作了个见机行事的决定。所谓"见机行事，"就是敌来我跑，但是逃跑也得抵抗呀，否则也逃跑不了。经过反复研究，我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三面待敌军进到距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结集，候命行动。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了下列各项措施：1. 官兵一律不准归宿；2. 加强营垣工事；3. 继续加强侦察；4. 为了防止敌军伪装我军官兵进行偷袭，特将我军官兵改变姓名，更换符号颜色，放在兜内，以易于识别。

日军进攻北大营情形

9月18日上午，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三联队长村田来到北大营要求见王以哲，我答以王旅长出席水灾会议未回。村田对我说："赵参谋长，这些天咱们之间多事，容易发生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咱们相处得很好，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我回答说："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最好不要发生任何事故。"

当日白天平静无事，至晚间10点20分左右，突闻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事后方知是日军在南满路柳条沟附近炸毁铁路，诬为我军所为，以作发动事变的借口）。不到5分钟，日军

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并据情报人员报称，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开始进逼。我得报后，向三经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说，他去找荣参谋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给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作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我问他王以哲是否在他那里，他说：曾来过，已经回旅部去了（王在回旅部途中被阻折回）。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11点钟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是否可将驻洮南的常旅（第二十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且说，调常旅已经来不及了，指示我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深夜2时许，敌军已逼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集结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3点多钟，伤亡颇多（事后调查，计伤亡中校以下官兵290余人），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

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寇俘虏。

北大营打了一夜，王以哲始终未回军中，也未来电话指示部队如何抗击敌人的进攻，及至我率部队脱出重围抵达东陵附近时，始遇我旅军械官方贵传达他的命令说："旅长让我告诉参谋长，将枪搜集到一起放在东山嘴子库房内。"我说："敌人还在后边追着，那怎么能成呢？"我没有执行王以哲的收枪命令。

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但是有一部分团以上军官由于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战斗意志却是消沉的。虽然事前已规定官兵不准归宿，但旅长王以哲经常不在军中，日军进攻北大营了还不回旅指挥；团长张士贤当晚也回家未归；另一个团长王铁汉炮响起来了才临时赶回军中，因而指挥不灵，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不得不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狼狈撤退。

同时，驻在北大营的军事单位很多，而事前又缺乏联系和统一应变的措施；战事发作后又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家都争着及早脱出危险，以至由于有些单位撤退过早，反而暴露了部队突围的企图，使敌人的攻势愈益猛烈。及至营垣内发生巷战，还有很多部队被敌人牵制着不能脱离战场，最后陷于狼狈逃命状态，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我军撤退经过

19日清晨5点多钟，我军撤退到东山嘴子，稍加整顿。6点多钟，发现敌军骑兵来袭，当即决定向山城镇转移，因山城镇地形复杂，且驻有于芷山部，同时也便于解决补给和冬服问题。出发后，约10点多钟，因有敌机3架空袭，决定就地隐蔽休息，俟天黑后行动。我军在敌军空、骑、步联合部队的追击下，3日后方始到达山城镇。

当我见到于芷山，把敌军攻击北大营的经过和我军转移到山城镇的原因告诉他时，想不到他竟然要求我们离开山城镇。他说："你们的给养和冬服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离开此地，免得我们遭到日机轰炸。"我见他心地如此卑劣（此人以后投降日寇，作了伪满大汉奸），感到非常气愤，对他说："日本人还能分于芷山、王以哲两旅不同吧？"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他见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要求王以哲来面谈。恰巧这时听说王以哲已到草市车站，正在打听我的下落，我随即派人把他请来。王以哲来后，我向他说明情况，认为不能接受于芷山的条件。他说，这里不能久呆，能得到给养就算了。

我随即同王以哲研究此后的行动问题，决定第一步先到锦州候命。王以哲说，为了解决补给问题和请示机宜，他要换上便服先走，部队交给我负责率领。当时我不赞成去锦州，因为我认为短期内可能反攻，走了容易回来难，主张留下打游击，以策应反攻，但王以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械弹给养无法补充。

部队到达锦州后，王以哲已先到。他见到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对我说："当时如果听我的话（指把枪放在库里）就坏了，我这个旅长是你给我的，谢谢你。"

不久我们部队即离开了东北，开进了山海关，进驻清河镇

大楼休整。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九·一八”我在北大营

李树桂

一、“九·一八”前的北大营

“九·一八”当时，我正在北大营，担任军士队队长。北大营是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的驻地，环境优美，我们在这里学习、操练，颇有故居之感。

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是东北军中的王牌，军纪森严。每逢节日阅兵，或欢迎中外来宾，都以该旅为仪仗队。此外该旅有自办的小型兵工厂；还有织线袜子、制牙粉、雪花膏等手工作坊。各营、连还饲养畜禽，在营垣空闲区种植蔬菜。不仅自给，还能以大部分供应市场。所以当时被誉为东北军中能“移兵于工”、“移兵于农”的最典型的军队。

整个营垣成正方形，每边长约2 000多米，四周的土围子有2米高，夏季长满蒿草，上边可并行两人。土围子两侧有约1米深、3米宽的干壕沟。围墙每边中间各有一个卡子门，设有岗哨。南卡子门有卫兵室，经常有一个排的兵力，昼夜分班站岗、巡逻。门外有相对的两个岗亭。

北大营南距沈阳城约5公里，东距东大营约10公里，西距南满铁路（即现在中长路）约300米，距文官屯车站稍南的柳条湖村不足500米。南北卡子门外各有家属住宅区及营市街，有饭

馆、杂货铺、理发店，定期有集市。

营内中间是大操场，为各团、队每日操练的场所。北面一列营房中间是旅司令部，东侧是旅直属连队，西侧是六二一团（该团有一个营驻东陵），东面4座营房，六二〇团占3座，东南角1座由军士队占用。在东围墙外有同样的4座营房是六一九团占3座，东南角1座由步兵研究班占用。

旅部后面的一列营舍是：兵工厂（修械所）、仓库、马厩、草垛、厕所。东西营房外面到围墙边除厕所外，都是菜地。大操场边缘和营舍前有“马蹄形”的林荫路，古木参天，枝繁叶茂，路宽约3米，可畅行4路纵队，唯有南卡子门通旅部门前的大路，因为有影壁墙，没有栽树。

旅的编制：是步兵三团制；旅直属有骑兵连、重迫击炮连、通信连、特务连。团直属重机关枪连，有马克沁式重机关枪12挺；轻迫击炮连有8.2口径轻迫击炮6门；平射炮连有3.7口径平射炮4门。各连有捷克式机关枪12挺。

每营有4个步兵连。每连有：捷克式轻机关枪12挺、捷克式步枪120支、掷弹筒2支、榴弹枪每班1支。

全连实有官兵约150名左右，分3个排，每排4班。每班士兵10至12名。（按编制全连官士兵夫应为227人），每班有中士班长1人，下士副班长1人，上等兵2人，一等兵4人，二等兵8名。

全旅军官除一部分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外，大部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也有少数是教导队毕业的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

士兵经过长期教育，一般都有初小文化，个别人可达中学程度。除假日，每天都在营内勤奋学习、操练、劳动。在旅部设有军官讲堂；各团设有军士讲堂，每周至少讲三次课。因之

全旅官兵的素质优良，战斗力强，堪称是东北军中的一支劲旅。

旅的主要军官及其出身：

中将旅长王以哲，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军事学识渊博，富有韬略，治军严肃有方，爱部下如子弟。是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

少将旅附兼六二一团团长何立中，辽宁人，与旅长王以哲是同期同学，后任百十师师长。

上校参谋长赵镇藩，黑龙江人，东北讲武堂四期、陆军大学七期毕业。后任军参谋长、师长、副军长，解放战争中起义。

第六一九团上校团长张士贤，辽宁人，东北讲武堂四期毕业（“九·一八”后不知去向）。

第六二〇团上校团长王铁汉，辽宁人，东北讲武堂四期、陆大特别班毕业。后任军参谋长、师长、军长，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解放前夕去台湾。

第六二一团团长由旅附何立中兼，中校团附王志军负责（东北讲武堂五期毕业）。

二、日军在霍霍磨刀

日军在满铁沿线，平时由“满铁守备队”负责警卫，总兵力约一个联队（团），在沿线大小车站，驻有中队（连）、分队（排）、小队（班）不等，另有铁甲车昼夜不时来往逡巡，租界地由日本的宪兵、警察维持。日本警察出张所遍布全区，沈阳城内凡有日侨居住的地方，都设有巡逻箱，随时由日本警察巡逻启箱盖章。

1931年夏，驻沈阳日军以互访、参观、学习、会餐、联欢为名（经总部批准我方是上尉以上的军官，日方是少佐以上军官），先来北大营内巡视，口头上表示“亲善”，实际是对军管

禁区，进行公开的侦察，对营房的布置、周围地形，都进行详细的了解。但我们去日本兵营回访时，只能参观外貌，余都高悬“禁入”二字。从此以后，日军竟得寸进尺，常常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强行要求到北大营来胡闹。全旅官兵无不气愤。更使人痛心的是日军已在蠢蠢欲动，蒋介石除在8月16日以“铣电”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外，又在9月1日直接通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旅长王以哲为了遵守上级的命令，多次教育军官要遵守命令，不要闹事。就这样第七旅的官兵只好忍气吞声。但是全体官兵在思想上，都有一种压抑不平、愤懑不舒的情绪，并预感到：日军包藏祸心，居心叵测，迟早必将要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日军步步紧逼，我旅官兵处处容忍退让，旅长鉴于日军蠢蠢欲动，报请总部批准，于9月12日召集团、营长商讨决定：在13至15日夜间，连续三夜向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作转移演习。目的是一旦日军进犯，以便有秩序地退走，不致临阵措手不及；同时也是为了暂避其锋，等待外交上的解决。

三、北大营惨遭夜袭

1931年1月，我由沈阳东北陆军高等军学研究班第二期毕业，被旅长王以哲指名调到北大营任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司令部的少校参谋，并在东北陆军步兵研究班讲战术课。该班毕业后又在全旅军官讲堂校官组，讲现地战术演习课。7月派任本旅军士队队长，该队由全旅有文化的上等兵约二百多人组成；另有东北保安总司令部考取的军医、军需、训练班的学生约二百多人，实行6个月的“入伍生教育”。共编4个中队（连），军士均携带武器、弹药。由步兵研究班毕业的本旅军官中，选任中

队长、中队附。一切准备就绪，并请准定于9月19日上午9时举行开学典礼，请柬业已发出。不料9月18日夜，发生了日军公然大举袭击北大营的突然事件。

9月18日深夜，日军在北大营西北侧的柳条湖村东的南满铁路线的铁轨上进行爆炸，制造假证据，作为日军进袭北大营的借口。

“九·一八”之夜，我正在北大营，当夜22点20分，从北大营营房西边，传来一声霹雷似的巨响，震醒了正在甜睡的第七旅官兵。接着从铁路附近射来了机枪步枪的子弹，并有炮弹连续轰击，有一发炮弹正击中我住宿营房的屋顶。将我由床上震到地下。在灰尘迷漫中，我连忙爬起来，摸着衣服披上，拿起手枪将要出屋门，又一声巨响，一发炮弹落在我外屋会议室的西北角，烟尘弥漫，全部屋顶势将倒塌下来。我急忙卧倒，稍停，当我带着轻伤跑出屋外时，听清枪声是从西围墙传来。这时几个中队长和两个组长来报告说：“日军已进占了西围墙，正向六二一团及步兵研究班的营房袭击。”当时我一面派人去旅部请示（电话已叫不通）。一面指示各中队在营房东面紧急集合，同时派出中队附率两名带枪的学兵，去西围墙侦察情况。这时枪声更加猛烈，北院六二0团传令兵跑来说：“旅部赵参谋长通知：军士队的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等等。当时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得坐着挨打呢？正踌躇中，派出的中队附派人来报：“日军已越过西围墙，冲进六二一团及该团三营的营房了。”我侧耳一听果然枪声已向这边扩展，火力更为密集。可是我方仍无动静。情况变得模糊。于是我再次派人向旅部请示；另派军士继续侦察，随时来报；同时命令各中队按顺序用低姿势跑步到营房外东侧的壕沟内潜伏，并派哨兵在沟沿警戒。我乘

机到炸塌的屋子里，利用颓垣为掩体，观察一下敌我情况。这时，旅部后面骑兵连的草垛，中弹起火，在火光映照下，隐约可见西营房前，有人影窜动，随着一阵爆豆似的枪声，有人应声倒地，有人还在拚命地奔逃。很显然这是日军在追杀我方士兵。我还听到北院的六二0团喊口令的声音，可能已集合隐蔽待命。西营房却寂然无声。后因草垛火熄，日军进来多少，一时判断不清。但可以肯定的：这是日军有计划的行动，是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但是旅部为什么还不立即按照演习所预定的路线撤退呢？是否西营房的六二一团，是由于敌人火力封锁，撤不出来了呢？这时沟沿的警戒兵向学兵讲述他在火光下亲眼看见日军枪杀西营房士兵的惨状，大家怒火中烧，在壕沟里潜伏的学兵们，装弹入膛，准备还击。恰在此时去旅部请示的军士回报说：旅长从城里打来电话，奉总部荣臻参谋长指示："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学兵们听后，非常愤慨，纷纷提出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的欺负我们呢？"问得我哑口无言。这时，派去侦察的军士跑回报告说："旅部和六二一团的士兵，有少数人已撤出来了，其余大部分仍没有消息和动静。可能被敌人火力封锁，或是被围在林荫路附近，必须赶快用火力支援，不然就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他又说："据撤出来的弟兄们讲：日本兵闯入营房，因为没有遇到还击，见人就杀，有的人原地待命，仍躺着不动，竟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有的人从枪库取枪冲出营房，但仍不敢擅自还击，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学兵们听到这种情况又都喊嚷起来："中队长！我们难道不是人吗？咱们跟日本兵拚了吧！""这简直是欺人太甚！我们也有枪，怕什么？"第一、二两中队学兵因手里有枪，又有实战经验，坚决要求还击，第三、四两中队虽是徒手的新兵，但

听见这种情形，也按捺不住忿怒，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我和各中队军官们，虽然心情和学兵们一样，但迫于命令，只得硬着头皮，仍以压抑的口吻喊道："大家镇静，做好准备，听候新的指示。"这时枪声越来越猛烈。很明显是敌人又向前推进了。

不久，在旅部和六二一团附近的林荫路上，突然响起了还击的枪声，虽然稀稀落落，但在我们听起来，却是那样的清脆、有力，而且也越来越激烈了。我们初步估计，可能是被迫处于绝境的官兵，出于忿怒不得已向日军开火了。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我们这方面的火力支援，林荫路附近的微弱的抵抗火力，是不会奏效和持久的，也是难于脱身的。情况不容再拖延了，这时第一、二两中队学兵和大部分军官纷纷要求还击，我也在考虑，是否先干一下？把友军救出来再说，反正他们已经先打起来了。刚要下达还击命令，突然旅部的王副官跑来，口头传达总部和旅长转达的张学良副司令受蒋介石的命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因为这是最高级的命令，人们听后都寂然无声了。而全队官兵的惊讶……怀疑……忿怒，是可想而知的。良久，一个学兵说："现在不是缴械和占我们营房的问题，而是日军想要把我们全都打死。"另一个学兵说："看情况我们这里还能跑得出去，可是旅部和六二0、六二一团怎么办？难道扔下他们不管？任凭日本兵宰杀吗？"又一个学兵说："现在就是想走，恐怕只能走出一小部分了。"的确，这些人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们只有马上逃跑的一条路了。不然会全部被敌人消灭的。但我们是军人，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于是我派一个中队长和一个中队附到旅部，向赵参谋长请示，一面令各队按四——一队的顺序，以低姿势撤到营房后面隐蔽，暂避敌人的火力；由第一中队留一个分队担任掩护。当学兵跑步撤退时，日军的机、步枪突然扫射过来，几个没经验

的徒手学兵，因姿势稍高，竟中弹负伤，被人搀着撤下来。在后面掩护的分队，一看这种情况，眼睛都红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人干脆不顾一切，向日军还击，但是我们必须执行上级命令，这个分队不得已才愤愤不平地退了下来。当我们最后转到房后时，先到达的军士向我报告说："队长！六二一团的一部分也撤退到这里了。"我马上令全队继六二一团一部的后面，按原来的顺序，向东卡子门快速前进。恰好派去旅部的中队长、中队附跑回来报告："赵参谋长指示：旅长命令以六一九团担任掩护，其他团队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不久，就听见，也看到：东围墙上卡子门两侧，约有无数支机枪、步枪，吐出忿懑的火舌，向着逼近的日本兵猛烈还击；而日军方面的枪声，很明显地稀疏下来，他们的攻势遭到了压制。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军士队到达东卡子门时，发现六二一团、六二0团，绕过六二0团院内，也撤到这里。有的军官一人背几支枪，有的搀扶着伤员，衣履不整，队形混乱，我率领军士队立即跟了上去。当我们走出很远时，六一九团掩护的枪声，仍在时断时续地响着。我打听六二0团的预备队，才知道旅部和直属连队已先行撤出，正在前方领着我们这支溃兵急急向东走去。我看一下怀表，恰是半夜的12点半钟。

由于六一九团的掩护撤退，日军不敢追击。但敌人炮弹却在空中呼啸着，向山嘴子东大营继续轰击。

四、第七旅怀恨东下

"九·一八"事变，北大营第七旅奉命"不准抵抗"，幸赖下级官兵的自觉防卫，和向东大营转移，才减少了损失。但是被日军惨杀在北大营内的官兵已无法统计，而最感痛苦的是负伤的官兵，伤口包扎本来就很潦草，又无药可医，还得拚命的

跟上队伍。较重的伤号，虽有人换班抬着，因颠簸震荡，呻吟之声一路不绝。这就引起士兵们的怨恨，边走边骂："为什么打上门来了，还不准还手？叫我们白白地等死！"有的士兵说："咱们为什么听蒋介石的呢？得了他什么好处呢？"有人接着说："这不是蒋介石想借刀消灭咱们东北军吗？"

19日凌晨3时许，全旅官兵到达东大营大操场，各团、队整顿队伍，清点人数、械弹。这时讲武堂第十一期的在校学员及教职员工等，也得到总部转来"不准抵抗"的命令，为了躲避敌炮弹的轰炸，才到这里集合的。随后向东退去，进入一个村子休息。这时发现……不仅讲武堂的大批学员、第七旅部队，还有从沈阳城内逃来的宪兵、警察、卫兵和一部分老百姓，北大营官舍的军官家属混杂在一起。当即由持枪的第一、第二中队，立即组成"纠察队"，由中队附带学兵十几名，配带"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纠察队"的袖标（临时找来红布写的），在村内轮流巡视，维持秩序。同时我亲自找到村长、保长，在他们帮助下，全队吃了早饭。

下午，旅长王以哲化装来到旅部，换上军装，他说："我是今早出城，直奔东大营来的。"于是各团、队长都来相见，并依次汇报。这时我才知道，六二一团因首当其冲，伤亡最重；六二0团损失较轻，六一九团在掩护及殿后时，敌人没敢尾追，故无伤亡。军士队在转移时，有三名徒手学兵负轻伤，王旅长听完汇报非常凄楚，噙着眼泪当即做出指示："各个团、队清点人数，彻查枪械、弹药、装备；伤员集中调护。军士队解散，军士各回原连队。入伍生分到各连当兵，你（指我）回参谋处。讲武堂学员愿意在本旅的，留下。分到参谋、副官两处临时差遣。"

散会后，旅长亲自巡视岗哨，探望伤员。就这样，整顿后，休息一宿，翌日继续向东前进，途经……章党、苍石、斗虎屯、

草市，向山城镇方向前进，六二一团的一个营和其他部队一部分经东丰县也向山城镇汇合。经旅长和当地驻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联系，暂驻该地待命。在此期间用无线电台多次与总部连络，呼叫不应。王以哲旅长命令我化装回沈阳。或沿着沈山线寻找总部，指示我接头后速来电，或回来面报。我冒着风险混进沈阳，终于打听到，总部已移往锦州。我连夜赶到锦州，在薛家屯一家粮栈内找到总部参谋处王达科长（讲武堂四期、陆大七期毕业的）。当面汇报了旅的情况和现在驻地。他说：昨晚已与山城镇电台接通，已电告王旅长令你旅绕道来锦集结待命。这样我才一块石头落地，总算不辱使命。

10月上旬，第七旅绕过南满铁路，到黑山县新立屯坐火车经大虎山，到达锦州，休息整顿，10月末，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即来平北清河镇营房，整训待命。"蒋介石就这样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给日本，三千万东北父老和全国人民莫不齐声唾骂。

五、王以哲噙泪入关

回想日军袭击北大营时，由于第七旅士兵激于义愤，最后被迫还击，才得撤退，保存了实力。日军也承认"经过激战"的事实。以致后来蒋介石也不敢公然撤销第七旅番号，这也是第七旅用血换来的。

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都有了新的认识。以王以哲来说，他当时是噙着眼泪入关的。开始时，他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命令。向来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使他也在思考问题。当我们从锦州向关内清河镇转移时，在火车上，我们都在他的车厢里闲聊天，谈起北大营时，他以极其沉痛的表情双目噙泪说："如果'九·一八'事变的当天

夜里，我们不理蒋介石的命令，全旅团结一心，坚决抵抗，那么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敌人侵略的野心必然遭到遏止，他的阴谋诡计，就会彻底被揭穿。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成了千古罪人，这也是有口难辩的呀！古语不是有句名言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的内心非常凄楚、痛苦！这一段谈话使我没齿难忘，至今记忆犹新。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思想转变，终于在5年后，即1936年，在许多事实的教训下，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他成为第一个与共产党接触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在4月9日同张学良将军到达延安，在天主教堂内，秘密会见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商讨联合团结的大计。为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础。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授予王以哲"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不负他立功自赎，救亡图存的初衷。也充分证明他为中国抗日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2辑）

"九·一八"事变亲历记

姜明文

写在前面的话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距今已56年了，有关这个在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事件的始末，已有很多记载和论述。但有些与事实经过大有出入，甚至把某些事实渲染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如有的说：当时北大营的驻军有多少万人；当夜北

大营驻军如何反击以及如何支援谁，又如何地部署，等等。

是的，当年，我们部队得到日本方面的各种情报以后，是有部署、有准备，也准备还击的。但是在蒋介石的一再不准抵抗的命令下，我们想打而不敢动，只有任人宰割。我这样说，好象太泄气，但事实就是这样，没必要给自己涂脂抹粉。当时，我们所以这样地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这是因为在军阀时代的军队里养成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驯服思想，忘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至于说北大营驻有多少万人的事，纯属无稽之谈。从清末民初修建北大营开始，也没有计划修筑能容纳下几万人的房舍。辛亥革命党人蓝天蔚任奉天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时，即驻于此，北大营的名，也是由此而得。旧制军队一个协，等于一个旅，一个旅的官兵人数有多少，这是每个人所共知的常识。

笔者在这篇回忆录里，首先要说明的是："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发生在1931年？其次，事变发生后一再不准抵抗原因的来龙去脉；最后把"九·一八"当夜的实况和北大营驻军的部署、关系位置等，存真求实、把个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实就回忆所及，如实地写出来，供参考。

"九·一八"是怎样发生的

自从张作霖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阴谋炸死后，日本当时很想趁沈阳混乱之际，来个"兵不血刃"而侵占之。但由于奉天当局采取了镇静处理的对策，使日本侵略者无隙可乘；尤其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再加上英、美帝国主义的掣肘故使日本未能达到提前发动侵略的目的。

张学良将军继承父业，当上了东北保安总司令，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地进行离间、分化、阻挠并采取了威胁、利诱等种

种卑鄙手段，认为张学良将军年轻，容易就范。如在张作霖治丧开吊之时，日本政府派来一个号称“中国通”的林权助，借吊唁为名，对张学良将军施加压力、阻挠其与南京谋和；同时进行拉拢、威胁利诱。如对张学良将军说：“少帅是否愿意取得整个中国？如果有意，我们大日本帝国支持你，用最精良的武器，装备你的陆、海、空军，保证你在一年内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张学良将军不但不为所动，而且庄严地对林权助说：“请你不要忘记我张学良是中国人；我不做这个卖国的蠢事。”当南京国民政府派何成浚、方本仁先后来沈阳商谈易帜问题，日本人又勾结杨宇霆从中作梗，阻挠换旗。杨宇霆认为张学良年轻不更事，掌握不了东北的大局，同时又以老辈父执自居，日本人与之一勾结，正中杨宇霆的下怀。这为后来杨被张所杀埋下了伏笔，凡此种种。日本侵略者要尽了阴谋诡计，而张学良将军毫不为之所动。但后来，由于东北军大部进关，防务空虚，东北的军队又四处分散。同时东北的几个大员又离开职守，如吉林督军张作相回锦州原籍，为其父大办丧事，由督署参谋长熙洽代拆代行；黑龙江督军万福麟随张学良将军在北平，由督署参谋长谢珂代行职务，这就形成群龙无首的状态，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为其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抵抗”的真相经过

1931年9月11日蒋介石电约张学良去石家庄会晤。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的消息，日本在东北马上要有军事行动。我们兵力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联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晤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还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

明明是日军先挑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候就分辨不清了。”（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何柱国写的《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

当“九·一八”之夜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在城里立即向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职务的荣臻，报告请示行动。荣又向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报告，张又向蒋介石报告。这样，层层地报告，最后得到蒋介石在电话中的指示：“沈阳日军的行动，仍按以前的指示处理，勿逞一时之忿，致误大局。”随后又补发了电报命令。蒋介石由于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江西的工农红军正在进行“第三次围剿”，竟置日本军国主义必欲吞并中国的罪恶阴谋于不顾，而使张学良将军背了多年的“不抵抗”的罪名，当了替罪羊。所以在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群众大会上张悲愤地说：“我张学良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的罪人，有何面目见东北的父老……”。张学良当时是声泪俱下，涕泣而言。

事变前得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准备

在南满铁路线上日本的兵力动态

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沿线，向来驻有日本守备队4个队，分别驻在沈阳、大石桥、公主岭、四平街，而沿线各站又都驻有中队（连）分队（排）小队（班），其司令部在公主岭，是永久性的驻扎。另有一个常备师团，辖两个旅团、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在沈阳的是河边旅团。这个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师团司令部驻辽阳。在旅顺的有要塞司令部，辖有重炮兵大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给张作霖当过顾问），司令部设在旅顺；事变时特驻沈阳，开始设在大和旅馆（现在的

辽宁宾馆)。

在日本军部的编制上，关东军直接隶属于天皇，权力很大，遇有非常事件可独断专行。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有机会，条件成熟，即可随时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1930年2月，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发动所谓“中原大战”时，东北军进关，进行武装调停，阎、冯失败后，一向受张学良将军接济帮助军饷而又受他指挥的石友三，竟忘恩负义，在日本人唆使下公然叛变。张学良将军为了迅速消灭这个叛逆分子，将在辽宁驻防的军队又调进关内三个旅。石友三部被消灭后，这些进关部队仍然停留在关内，造成辽宁省境内防务空虚，剩下的部队，又四面分散。

1931年8月，日本人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做军事准备。如8月下旬，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守备队，秘密向苏家屯、沈阳集中；9月8日，日本军队在沈阳大北边门进行军事演习。这些挑衅行动，当局都置之于不顾，特别是负有守卫沈阳之责的我们第七旅，明知这些情况而又不加警惕。尤其是在日本站（沈阳南站）附近居住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和侨民都换上了军服，并发给了枪支弹药，练习打靶；与此同时也发给很多朝鲜人穿上与北大营士兵同样的军衣和胸前的符号，唆使朝鲜浪人在小北边门外沙土坑一带，开赌场（黑红宝，金钱摊等），设暗娼，引诱北大营士兵聚赌、冶游，借机打架斗殴。敌人的种种卑鄙无耻的行为，都在说明他们是要借端寻衅，并已大有蠢蠢欲动之征兆。

我们的准备

我们得到以上各种情报后，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对策。最后，为了应付敌人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而决定采取了以下几项消极的准备措施。

(1) 利用营房四周的围墙，由旅部参谋处计划分配给各团、营，以练习土工作业为名（不敢公开说挖战壕，恐日本人提出抗议），构筑各种掩体、散兵壕，在北小山上构筑半永久性的地堡数处，一旦发生情况即可进入本阵地。

(2) 加强谍报工作。由各团挑选精干的士兵组成谍报队，侦察日本人、朝鲜人的行动，特别对南满站方面进行严密侦察，随时向参谋处报告情况。

(3) 士兵胸前佩带的符号，在背面上一律加盖连长名戳以资识别。

(4) 严禁士兵进城走沙土坑经小北边门这条路；如必须进城时，各连要由官长率领走大北边门这条路。

(5) 枪支每天擦拭涂油，刺刀开刃，每兵子弹袋2条，200粒子弹；轻机关枪的弹药盒装满子弹；每兵4个手榴弹装入弹袋内；掷弹筒等也都准备好。

(6) 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

(7) 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

这几项措施决定后，要求各连都要彻底做好准备，以应付意外的事件的发生。如一旦发生事变，即按照这个决定部署实行。同时，报请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备案。但“九·一八”之夜，事变突然发生后，并未按照计划实行。如今回忆往事，仍令人殊堪慨叹！

北大营的地理位置及驻军情况

北大营在沈阳城北约七八华里。占地面积很大，四周筑有土围墙，每边长约两千多米，成正方形。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卡子门，每个卡子门都修筑有一个排用的卫兵舍，内有军

用电话，门外有两个岗楼。南卡子门外是老瓜堡子和营市街，有住户、商店、理发馆、饭馆等。北卡子门外，也有与南卡子门外相同的商店、住户，但不如南卡子门外多。西北边有一个面积不很大的馒头山，一般叫之北小山。东北角有一座“子药库”（属于兵工厂，现仍存在）。

“九·一八”事变后，一首民歌中有这样几句歌词：“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日日本发来兵，先占子药库，后攻北大营，……”实际上子药库在东北角，日本兵是先由西边围墙冲入的，这与事实不符。东卡子门外有肇新窑业公司，创始人为杜重远，在肇新窑业公司与东卡子门中间，以后又修建了一个团用的营房。西卡子门外距南满铁路仅1华里，中间杂草丛生，不许百姓割草、放牲畜，土围子外，挖有深约2米、宽约3米的外壕，夏季各处雨水都流入壕内，形成了“护壕河”。

围墙内部，正北面有前后重叠的3个大院。前面的3个大院，旅司令部居中，房屋比较高大，有一条通东、西卡子门的宽约4米沙石路面的马路，门前有一个影壁墙，墙外有阅兵台。当时，正在阅兵台上搭戏台，准备过八月节演戏。东侧大院由旅属重迫击炮连、特务连、通信兵连使用；西侧大院为六二一团团部和团属连使用；后边3个大院，分别驻有骑兵连、技术队（由各团抽选的士兵练武术和中华刺枪术）、修械所、仓库、马厩、草垛等；再后边是北卡子门。旅司令部门前有一条直通城里的宽约4米的沙石路面的马路。由旅部到南卡子门这段路的两边没有树，由卡子门外通城里这段路的两旁都有枝叶繁茂、绿树成荫的垂柳。团纵队东西两边各修建4个大院，院内兵舍的建筑按连纵队、营方队的形式，每连使用四趟房子（每排一趟、连部及仓库一趟），两连合用一趟做厨房，东西厢各有一趟，为4个连共同的讲堂。正面是团（营）部位置，中间是集合场。从

1930年每营成立一个生产日用生活品的工厂，如织毛巾、制牙粉、牙膏、缝纫、织袜子、做皮鞋、做布鞋等工厂。我们第三营是专制布鞋的。这些产品不但供应本旅官兵使用，还可以到市面出卖。同时在每个连、营的周围空地种上各种蔬菜，以改善士兵的生活；也间种些花草美化环境。这些措施颇有寓兵于工、农的味道，由于生活的改善也增加了乐趣，士兵跑的也少了。

第七旅辖3个步兵团。旅直属有4个独立连。按1928年的编制，全旅总兵员有1万多人，每连官士兵夫227人。团有直属的重机关枪连（马克沁式12挺）、迫击炮连有8.2生的（厘米）迫击炮6门、平射炮连有3.7生的（厘米）口径4门、有线通信兵一个排。每个步兵连有捷克式枪120支，同式轻机关枪12挺（每班一挺）、掷弹筒每班1个，还有充分的手榴弹。另外有铁轮大车1辆、骡马3匹。由于兵额不足，每连只有一百五六十人。全旅战斗员也有六七千人，同时配给属旅司令部指挥的坦克车一队（轻型坦克车12辆，中校队长李振元，留法的）。

七旅的武器装备是东北军中最精良的一个旅。军官的出身学历也是最高的，不少人是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东北教导队各学校毕业生。还有少数留学英、美和日本的。士兵没有不识字的，基本是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各团的驻地由东往西，按六一九、六二0、六二一团的顺序排列的。六二一团在最西边，所以事变发生时，这个团遭到的物质损失、士兵伤亡最大。不但机、迫、平炮等重武器没带出来，连步枪都没有拿出来。

“九·一八”之夜经过实况

1931年9月18日，是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当时我在北大

营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第六二0团三营九连任上尉连长。这天全旅发放8月份官兵薪饷，上午我由团部领到支票后，带一名勤务兵骑自行车到大北门里东三省银号领取现金，回连后发饷。按旅司令部的规定，这天是我的宿假日。因为我是营值星官，营长（于天宠现在台湾）又不在营，我没有回家。军营里士兵照例9点钟熄灯就寝，我由于是营值星官的关系，带上手枪和两名勤务兵，到各连查夜，查看士兵是否有醉酒闹事、赌钱的。回连后已过10点钟了，我也脱衣就寝，躺在床上继续看张恨水写的《春明外史》小说。正看到“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这段时，突然听到西南方向发生强烈的地雷爆炸声，紧跟着就是一排密集的枪声。我立即意识到是日本人在开始挑衅了。于是我马上传令各排士兵起来着装，领取枪弹，到集合场集合。这时正是10点20分钟。我穿好衣服，带上手枪跑步到集合场等候各连队伍的到来。

十几分钟后，各连均跑步到集合场。检查人数后，我向全营官兵说明方才的巨响和枪声，并简单地讲了些鼓励士气的话。这时士气激昂万分，真是个个怒发冲冠，都咬牙切齿地发出了怒吼声。我们立即按旅司令部事先的决定，部署向既设阵地前进。当我这个连还没走出营门时，中校团付朱芝荣出来（团部、迫击炮连和第三营，住一个院）喊：“姜连长，把队伍带回来。”我当即令各连仍回到集合场地待命。我会同第十连连长王德义、第十一连连长杨再山、第十二连连长廖云龙来到团部，问朱团付喊回部队是什么原因，朱说，旅长来电话，叫队伍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回宿舍睡觉。日本人如果进来可由官长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我们听了这些话，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脱口而出地问：“要命也给吗？”朱说：“这是旅长的命令嘛！”在军阀统治时代，我们受到的都是“军人以服从为

天职”的驯服思想教育，对上司的命令只有绝对服从，没有申辩的余地。我们只好把队伍各自带回本连。我向本连士兵说："把子弹袋扎好，手榴弹袋放在身边，枪不离手，在床上休息，听见我的哨音马上出来集合。"我又找了三个排长小声告诉他们说“旅长的电话命令，叫这样做的。你们把士兵好好地掌握住，我到团部听听消息。”正当我们集合各连队伍时，日本人打来的炮弹，落在我们的兵营、厨房、仓库、讲堂各一枚，但都没有爆炸，原来这些炮弹都没有引信。

六二一团各营、连住在最西边。日本兵事先在土围子的西南角约500米处（属柳条湖村界），在铁路轨下埋了炸药，自己炸毁了一小段路轨，却贼喊捉贼，诬赖北大营士兵破坏了南满铁路，作为进袭北大营的借口，这完全是敌人有计划的预谋。事先日本兵已秘密运动到土围子外面埋伏起来，而我们西卡子门的哨兵竟毫无发觉。当枪声响后，日本兵很快就冲进了六二一团各营连的兵舍内。官兵们在睡梦中惊醒，仓猝中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日本兵即用刺刀扎；我们的士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走，有的越窗而逃，有的来不及逃脱而钻到床下。这样被扎死、扎伤的很多。尤其可怜的是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死，无一幸免。那时，我有个哥哥，在第三营（营长朱辉）办的皮鞋厂当经理。他听到枪声后即藏在厕所里，幸免于难。

第三营逃出来的士兵，顺着马路向东跑，经过我们营门口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日本兵进来啦，不放枪，净用刺刀扎，我们连长衣服都来不及穿。”我们把这些士兵收容起来，叫他们穿好衣服，有富余的枪也发给他们，枪不够发就给他们手榴弹。其他各营连的士兵也遭到同样的情况，沿着大操场向东跑，到六二0团第二营后，穿上衣服，又继续往东去了。

这时，日本兵已进入了大操场，前进号、冲锋号吹个不停。枪声不绝，喊杀连天。但听其枪声没有弹道声（即子溜子声），都是放的“无铅箭”（又名空包），这种“无铅箭”没有子弹头，是军队平时作对抗演习时用的，形同真子弹一样，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试探性的“佯攻”，看我们还不还手。结果一看我们真不还手，随后即变成真的攻击，真枪实弹向我们干上了，炮弹落在地也爆炸了。此时，上边既然不许我们进入阵地还击，只好用麻袋装土在营门口临时堆成掩体，并派士兵爬到树上了望。虽然夜暗无光，但影影绰绰地也能看到日本兵在大操场上乱窜。我们在树上的士兵向他们时时地射击，所以日本兵始终没有朝我们这方向前进，没有接近我们的营房。这种情形一直到半夜12点钟以后。

准备退出北大营

当半夜11点多钟时，团长王铁汉（现在台湾）由家骑马绕道来到团部，他先到各营连走一遭，立即向旅长王以哲通电话。这时，我正在团部。王铁汉在电话中除了报告这里的情况外，只听他连连地答应是！是！是！最后王铁汉说：“报告旅长，请你放心，我绝对听从你的命令。”电话筒搁下后，他立即召集连长来团部，向大家说：“旅长来电话说，司令长官接蒋总司令的电话，叫我们不要打，必要时可以退出北大营，留待政府向日本交涉，要打就不好办啦，我们军人讲的是服从嘛，希望大家忍耐一下。”……这时在大操场上的日本兵，仍然是喊杀连天，枪声不绝。

午夜1点钟以后大操场上的日本兵，又是一阵剧烈的枪炮声。听其声音，显系是准备退却的模样。因为这时我们的六二一团各营连早已向东溃逃了，旅部和各单位及直属连队，也都已纷纷向东逃跑了。六一九团在接到王以哲的电话后，已自动

地撤向东山嘴子方向。只剩下六二0团的二、三两个营和团直属追击炮连、重机关枪连、平射炮连和通信排了（第一营在几个月前已被调到皇姑屯去了），不久枪声逐渐稀落乃致停止。当时我们以为敌人真的退却啦，可能是由于上边交涉的结果。日本人承认是夜间演习迷失方向，误入北大营。因为平时日本兵白天常在北大营周围演习，有时还有少数日本兵直接进出旅部。结果事实决不象我们这种幼稚无知的想法，实际是日本兵都已运动到东、北两个方面的土围子外面，埋伏去了。这时和旅长的电话也中断了。一直挺到4点多钟，团长王铁汉也没有和旅长王以哲联系上，急得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筹莫展。又召集营连长商议，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六一九团早已向东撤走了，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呢，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旅长既有电话指示，必要时退出北大营，现在电话不通了，个别团也都走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于是他令第二营和重机关枪连，由东面撤走；第三营、团部、追击炮连、平射炮连、通信排等都由北围墙出走，到榆林堡集合，然后向辉山方向前进。

决定后，各连跑回本连集合队伍。我回到本连，立即吹哨集合。检查人数后，告诉士兵们现在的情况和出走的方向、集合地点，因枪弹都在士兵手中，不用再领取，所以行动很快。我率领全连士兵首先到达北围墙，刚一上围墙顶，外面枪声大作，象放鞭似地向我们射击。这时已不待指挥，士兵们即自动卧倒，向敌人猛烈还击。随之其他各连也都到来，全体官兵以满腔的怒火，枪炮齐射向敌人。6门追击炮一齐向敌人轰击，将敌人火力压制后，我第十、十一、十二连越壕北走，我们连作掩护。当我率领本连士兵通过自己种的白菜地时，敌人在后面又以火力追击，我们向北小山前进，无多大伤亡。到达北小山后检查人

数，只少十几个人。我想不一定都是伤亡，多半是借机携枪逃跑，但也只好听之任之，遂继续向榆林堡前进，此时太阳已经冒红，村里有人在挑水。士兵们跑的口渴，搬起水桶喝了一阵凉水。当时地里的高粱、苞米正是快要成熟的时候，一片青纱帐成了我们的天然的掩蔽物。这时的士气，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随后其它各连也都相继到齐。十二连长廖云龙和我说因他父母年迈，家中无人照顾，不能随队伍走了。趁着团、营长都不在跟前，和我说一声，委托我把他这连兼管一下。我说："叫王排长（第一排的排长名记不得）负责吧！等见着团长时我和他说一下，那你就快走吧！"这样廖云龙就离开了部队。我和王德义、杨再山率领部队继续前进。到了榆林堡遇到了唱独角戏的营长于天宠狼狈而来。他说他是随六一九团东来的，六一九团已由东山嘴子向抚顺方向走了。我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当天（9月19日）我们这个营在辉山（现辉山畜牧场）驻一宿，派人与团长王铁汉取得了联系。

"九·一八"以后我们的行动

9月19日天亮后，日本兵进入城内，占据了各城门。旅长王以哲换成便衣，化装成老百姓模样带领随从副官张长友和几名卫士（也都换成了便衣）由小东门随同百姓混出城外。此时守城的日本宪兵是新来的，不认识王以哲。如果是原先的日本宪兵，差不多都认识他，那恐怕就难混出城了。这是王以哲后来亲自讲的。

王以哲逃出沈阳后，找到了部队。他命令各团向山城镇方向前进，并令参谋长赵镇藩先到山城镇与于芷山联系，希望和于部联合收复沈阳。于芷山是东边道镇守使，有一个省防旅的编制。于对赵说，我们这点兵力怎么能行。同时还说，你们的

队伍也不能在这边停留，免得我们受影响。部队如果缺少服装，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赵镇藩回来报告王以哲，又令各团向海龙镇方向前进，企图与吉黑部队联合反攻沈阳。并电请张学良指示今后行动。张指示开进关内，到北平待命。这时，我们六二0团已到达东丰县城内。我这个连驻在城北王家大院。这时已经是农历八月十四日了，我们买了两口肥猪杀了，给官兵过了个八月中秋节。

当我们退出北大营向山城镇方向前进时，发现日本飞机抛下很多传单，都是印的红字。一看始知，"九·一八"之夜，日本关东军不但袭击了沈阳，凡在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城镇如辽阳、海城、鞍山、大石桥、复县、金县、本溪、凤城、安东（今丹东）等地，同时都有军事行动而被日寇占领了。

我们在一个星期的狼狈逃走中，军纪荡然无存。如有的士兵竟敢趁机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拿走一些金银（手镯、现大洋）、眼镜、手表等物。有一次我们连1个上等兵和两名二等兵正在百姓家翻箱倒柜索要金钱的时候，他的家人到连里报告，我立即派中尉排长黄得盛带人前往将这3个兵抓回来，问明情况属实，当即集合全连士兵，宣布他们的罪状，立即枪决，并对受害者进行了安慰，随即报告了团营长（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在逃出北大营后付予连长以上的主官有这个权力）。此后，扰民的事情就很少再发生了。在当时各团营连类似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亦都绳之以法，毫不徇情。

以后乘沈海路火车西行，到"元帅陵"（改称元帅林）站下火车，利用青纱帐天然的隐蔽，昼伏夜行（因白天有日本飞机侦察），预定在虎石台、乱石山子中间的空隙地带通过铁路，过辽河，向彰武县新立屯前进。在接近南满铁道时，部队先在高粱地内隐蔽。事先侦察了通过的道路，利用夜间以迅速的步伐

过铁路。当部队在高粱地内隐蔽时，日本的铁甲车时时在铁路上行驶，用探照灯向左右探照，因为日本人知道，北大营的军队都往东跑，必有过铁路西去的可能。我们通过时，幸而未被发现。

渡过辽河后，士兵精神稍为安定。到达新立屯后休整两天，乘打通路火车经过打虎山转北宁路直开北平。当路过锦州时，辽宁省政府已迁到此地。代理省长米春霖还到站上看了一下，并没有讲话。这时部队的军容，形同叫花子，衣服不整，枪支不全，更没有重武器。

到北平后，旅司令部和直属连队及六一九团驻清河镇（北平北20里）；六二0团驻昌平县；我这个连住在城内一家商店内。六二一团分别驻在南口、沙城、怀来各地。部队开始整顿补充。时间已经是10月中旬了。

（摘自沈阳市大东区政协《大东区文史资料》第一辑）

不抵抗之抵抗
——沈阳北大营守军团长关于“九·一八”的回忆

王铁汉

“九·一八”前夕东北军政情势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位驻在北平行营，并养病于协和医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事务由军事厅长荣臻代行，东北边防驻吉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

作相，居父丧在锦州，东北边防驻江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因公留北平，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驻哈尔滨，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在沈阳。当时东北军政，实际上是由荣臻、臧式毅负责，亦即后来日本对中国办理交涉的对象。

东北军力：东北空军代司令张焕相驻沈阳。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在葫芦岛。陆军为自陆军独立第七旅至第三十旅，共24个步兵旅（装备精良而有战力的，不过16个旅）。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两省者12个旅，辽宁4个旅，吉林8个旅。骑兵为第一、二、三、四、六旅共5个旅，驻河北省2旅，辽、吉、黑各1旅。炮兵为独立第六、七、八旅共3个旅，主力在平、津一带。辽宁省防军为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所属步兵两团、骑兵一团。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所属步兵一团、骑兵两团。黑龙江有省防军3个旅，苏炳文即当时之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一旅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兼黑河镇守使。

北大营被攻的经过

事变当时，我任陆军独立第七旅第六二0团团长，本旅共辖六一九、六二0、六二一等3个团。旅长为王以哲，第六一九团团长张士贤，第六二一团团长何立中（因公在北平）。只有本团第一营驻皇姑屯，第六二一团3个直属连驻东山嘴子（沈阳城东）营房，其余全部驻在沈阳北大营。北大营的营房，是坐北向南并列着，第六一九团在东，第六二一团在西（外墙距南满铁路二三百米不等），旅部及本团在中间。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北大营的本旅。

约在“九·一八”夜间10时15分，忽闻南满铁路方面爆炸

声，这就是事后查明日军自己炸坏南满铁路一段，诡称“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为借口的爆炸声音。我正在团部[1]，判断又系地雷爆发，这是多少天以来，司空见惯的事，本已不再惹人注意。但5分钟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态并不寻常，当即叫通旅部电话，始知旅长在城内，又叫六二一团电话，已无人接听，复问第六一九团张团长也不在营里。至11时将过，才得知第六一九、第六二一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我在未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作战斗准备。到12时，接奉旅长由城内来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虽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

19日凌晨1时40分钟，日军步兵200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团营房。此刻，适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我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也告中断。

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

① 据赵镇藩、姜明文的文稿叙述，王铁汉将军是在柳条湖铁路爆炸之后，火速赶回北大营的。

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晨5时。本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次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公布“日军死伤120余名”，乃是为了扩大“中国军队滋事”的反宣传，并不确实。

本团撤出北大营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柳河县属）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旅长相遇，本旅在山城镇及东丰县（县长为现任监察委员王冠吾先生）附近，略事收容整顿，王旅长命令我代理旅长职务，他要自山城镇乘火车经永吉、长春，先往锦州。我就指挥本旅又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9月29日，分别从彰武县、新立屯两地车运锦州，即调驻北平。

对荣臻的建议

到达锦州的当时，我随王旅长（25日到锦州），晋见已由沈阳化装来锦的荣厅长，在报告撤出北大营经过之后，荣厅长即说：“我们已将这次事变经过情形，报告中央，经由外交途径，向国际联盟申诉。现在将驻辽宁的部队，向辽河以西移动，吉林的部队，驻地太分散，先将主力在长春、永吉以北地区集结，黑龙江部队不多，暂维持现状等待国际变化。不过万主席（福麟）仍留北平，刻在此地（锦州）的张主席（作相）一二日内也要前往天津，吉、黑两省军政失去重心，还有许多问题。”

我听了以后，很是惊异，当即未加思索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其往后退以待变，莫如向前进以求变。”荣厅长冷笑着说：“你有何高见？”我答：“按目前情况，万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黑龙江省会），稳定黑龙江局面，张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

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通往齐齐哈尔、哈尔滨的铁路，并无阻碍）。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然可以转圜。”我说到此处，荣厅长又笑着问：“这样大的事情，就象你说的这样容易吗？”我答：“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做，如果有困难，您可以转向北平建议和请示。”荣厅长稍犹豫一下说：“再说吧。”看情形，不便再说下去，我即先行辞出。位卑言高，自然不会被采纳的。当日晚本团由锦州车运北平。

在赴北平火车中默想，日军侵犯吾国土，占领吾城市，在军人的立场来讲，没能够拼之于敌人攻城攻地的当时，也应不计成败利钝，和敌人拼之于失城失地的今日，坐视不前，反向后走，总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

在李顿调查团作证

国联李顿调查团从沈阳回到北平以后，要我们去作证。王旅长率同我们3个团长及我方译员张歆海（前驻波兰公使馆），于民国21年（1932年）6月10日上午10时，来到北京饭店，接受询问。届时，调查团的5位团员全体出席。李顿爵士开口就说：“本调查团曾到过沈阳北大营现场。”接着立即询问王旅长“九·一八”事变当时日军攻击北大营经过，均由旅长答复。李顿爵士随又拿起一张日军给他的北大营写景地图，对我询问几点：一、“你看这张地图是否正确？”我答：“正确。”二、“你的部队，是否驻在这所营房（以手指图）？”我答：“是的。”三、“日军在这所营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队击死击伤共120余名，你是否知道？”我答：“知道，但是据我的正确估计，日军死伤不会超过50名。”四、“依你的观察，日军伤亡以少报多，其用意何在？”我答：“我认为这是和日军当时自己炸毁这一段南满铁路

（以手指图），借口‘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突向北大营攻击，同一用意。”五、“你们攻击日军的理由是什么？”我答：“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吾国土，攻击吾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李顿爵士颔首未语，并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伯爵[1] 说：“这是正当行动。”作证即在12时结束。

国联根据李顿调查团报告，于民国22年（1933年）2月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美国国务卿史迪生曾在1932年1月，发表不承认日本非法侵略的领土，并要求英国与美国联合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初，系采取试探行动，如果当时英美共同出面干涉，根据国联决议，坚持日本撤兵，未必不能实现，这样就可以消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英国外相西门拒绝了史迪生的要求，因之，国联中几个强国也就没有对日本制裁的决心。日本看穿了英美不采取联合行动，国联的权势，又是纸老虎，于是蛮横狂妄地退出国际联盟，并肆无忌惮的续行侵略。

李顿调查团到达沈阳时，沈阳邮政局意大利籍的副局长普莱第在他给李顿爵士的备忘录中曾指出“如果列强不在东北就地阻遏日本侵略，他相信不出3年，他的祖国意大利，就要染指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英国著名学者凯士博士，于1940年所著《战祸的原因》一书的结论中，也曾说：“从满洲事变中，墨索里尼学会一课重要的课程，所以西门爵士，不能不对这次战争负有一部分责任。”其实学会这一课重要的课程，岂止墨索尼里一人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诚然是祸首罪魁，又何尝不是由于

---

① 系译音，吴秀峰所撰文稿中译为‘阿尔杜鲁万地”。

列强纵容所致的呢？

“不抵抗”的由来

“九·一八”之夜，我两次接奉电话命令：“不抵抗，等候交涉”，“不准抵抗……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这就是事后备受舆论攻击的“不抵抗主义”了。当时荣厅长、王旅长何以下令“不抵抗”？根据民国21年（1932年）的日记，知道“不抵抗”出自“不与抵抗”的鱼电，那是民国20年（1931年）8月6日，张司令长官从北平发给荣臻厅长的。原电：“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当夜事变发生，荣厅长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10时30分钟以前的情况，那时日军只是炮击北大营，沈阳其它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司令长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指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19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范围太大。

事变前的交涉

日本即决定“武装占领东三省”，即从1931年6月起制造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事件、中村事件，来激动日本军民“用强硬手段，解决满洲中日现存之困难”。但是表面上仍通过外交形式，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权助[1] 与我方之荣臻厅长、臧式毅

---

① 1928年4月至1931年12月，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为林久治郎，本文中写成林权助，可能是回忆有误。

主席进行交涉。几月来，一方在必有所得，一方则虚与委蛇，当然不会获得协议。林权助在交涉中看出我方在推拖敷衍，曾告知荣、臧两氏“日本军方不耐了，你们必须有具体的答复。”而我们认为这是日本外交上惯用的虚声恫吓，绝没有想到会大规模来侵犯，同时，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因此，既无应变的计划，更无应变的准备。到了“九·一八”日军攻击北大营时，荣、臧才在惊疑中向林总领事交涉“立刻制止日军行动”。林答：“全不知情，正向军部探询。”随后臧主席又找林权助询问日军真意所在。林支吾其辞地说：“军方行动，无权过问，外交官只能向东京请示。”延至19日凌晨2时，日军攻势益急，荣、臧再约林总领事询问究竟，林已避不见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荣、臧束手无策，军政即入无主状态。沈阳就在19日上午被日军占领，永吉、长春、四平衔等地，也同时失陷。这一次的国耻，也就是这样造成的。

（摘自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一期）

“九·一八”之夜

杨安铭

自张学良就任蒋家王朝的陆海空副总司令，东北军主力入关，坐镇北平，东三省一时形成空虚状态。当时，在沈阳的中国军队只有驻在北大营的王以哲所部步兵第七旅的3个团，和在山嘴子炮兵研究班为教育演习用的炮兵教导团的一个团（拥有各种火炮36门）。至于外城，驻在沈榆线和打通线上的步兵、骑兵不过4个旅。吉、黑方面的步、骑兵，总共约10个旅；且

都是分散驻防，一旦有事，远水难救近火。除张学良留北平外，东北军的“边防”司令官都离开了本职岗位：吉林的张作相奔父丧回到了原籍锦州，其职务由参谋长熙洽（格民）代行；黑龙江的万福麟也随张学良进了北平，其职务也由参谋长谢珂（韵卿）代行。于是东三省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何况日本方面早已洞悉：中国军阀军队向来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凡此，都予日寇以乘隙而入之机，遂于9月18日夜制造借口，首先侵占了沈阳。

在“九·一八”前夕，日本方面早有发动侵略的种种迹象，如指使朝鲜推进其驻屯师团，在南满线上增兵和检阅；在哈尔滨、长春、沈阳日本站召集其在乡军人，以及将日侨编队点名，发枪练习打靶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然而，东北军文武官吏由于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一味深溺于奢靡淫逸的享乐生活之中，对此不以为意，以致直到“九·一八”之夜，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其部下三名团长等都不在营地住宿，旅司令部只留下平日被称之为“窝囊废”的参谋长赵镇藩一人在“看堆儿”。在旧军队中，参谋长不论大小都是无权的“副差使”，只能“坐办公桌”当摆设，或者起一点“看堆儿”的作用，遇事都要请示主官，绝不敢越权独断。

日本关东军军部所制造的借口是：在距北大营几百米的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路轨上私埋炸药，而于9月18日夜10时许，自行炸毁铁轨一小段，以之诬栽系北大营第七旅官兵所为，随之以猛烈炮火炮击北大营。夜半，早已作好侵略准备的日军部队从日本站侵入市区，致使全市商民惊恐莫名，闭门躲避，街市无形戒严。日军到处鸣枪示威，恣意杀人，除屠杀平民不下百名外，凡见着军服者即格杀勿论。当日军占据北大营后，遂由北关入城。在北门内见一人家尚有灯火，日军一拥而入，见

一身着军服的中国军官正在屋里收拾行李、书籍，当即将其刺死在炕沿上。死者郑锦堂，原系保定军官学校八期出身，时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闻变立即收拾，致罹此惨祸。又前古北口镇守使韩云鹏，原系保定军官学校五期出身，家住马路湾与日本站交界，正当日军侵入市区之要冲，韩打算托庇于西洋人宇下，带领小老婆乘汽车直驶三经路，投住德商所开“凌格饭店”，其小老婆于仓皇间将金钏遗忘于家，嘱韩回家去取，韩在途中，被日军乱枪击毙于汽车里。

在“九·一八”之夜日军炮击北大防军东北边营时，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假三经路蒋斌家召集高级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时，沈阳西区与城内，由于日军侵入市区，交通遮断，因此只有住在三经路附近者才能参加，计当时到会者只有副官处长杨正治、军衡处长朱光沐、电政监督蒋斌和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五六人。荣首先述及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曾以电话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交涉，日总领事推诿这是日本军部所为，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荣旋以电话与住在城内的省主席臧式毅取得联络，接着向北平张学良官邸打了长途电话。据张的侍卫长谭海答称：张偕于凤至和赵媞正在前门外中和戏园听梅兰芳唱《宇宙锋》。当告以日军侵占沈阳，张始从戏园赶回来接电话。张重申了蒋介石“铣电”(同年8月16日蒋拍给张的电报)的内容，大意是：如日军侵入，应避免冲突，一切忍让，勿逞一时之愤，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以待“国联”处理。张并询问驻沈之其他各国领事对日军侵犯抱何种态度？荣臻于是分别用电话向英、美、德、法、意等领事探询。他们的回答都是，未得本国政府指示之前，不便表示态度。荣臻又一次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了各领事的答复。张指示说：“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有忍辱负重，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等准

备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听从'国联'处理"云云，因此，荣臻当即指示王以哲旅长打电话给北大营第七旅旅部参谋长赵镇藩彻底执行这一不抵抗的指示。当晚的紧急会议如期，与会的官员们只得垂头丧气，各自回家了事。这次会议的情形，事后国内各报纸均予登载，但对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特别是"铣电"原文，均被删去，或开了"天窗"。

"九·一八"翌晨，我穿着便衣进城察看，但见沈阳城西门紧闭，不准出入；城门和城楼站着日军哨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城垛上插着日本国旗。我绕行到南门外，见菜蔬、粮食商贩尚在营业，城门半掩，有日军把守，对出入城门之平民未加盘问。我走进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所住的工部衙门胡同。胡同口有日军一个分队（班）踞地而坐。我正在宅门徘徊间，有一挑馄饨担小贩似已察觉我的来意，便悄悄告诉我说："别进去啦！荣参谋长刚才出来，小鬼子就进去把主席监视起来了！"我听罢，急出城回家。臧以后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从此国民党辽宁省主席一变而成为伪满大臣，此是后话。

9月19日早饭后，我到三经路去见荣臻，据其家人答云："参谋长已搭早车去北平见张副司令了。"从这天起，凡沈阳有资格逃难的高级文武官吏，纷纷乘北宁铁路火车逃往"歌舞未已"的北平。在北宁铁路两侧，这时"土匪"乘机蜂起，他们怀着"好小子们，你们搂够了，现在往关里跑"的愤懑心情，劫持过往火车。这消息不断传来，达官显贵莫不诅咒："东北老百姓'太没心肝'，在这时候趁火打劫。"殊不知平日制造"土匪"的不正是这一批"逃难"的人吗？"掠人者人亦掠之"，又何怨为？

"九·一八"事变后，我抱着"唯有美国可以制服日本"的念头，想托荫于美国庇护之下，遂匿居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秘

书周福全家以观究竟。几天之中，原住三经路一带的中国官员的宅第，俱遭日军抄搜洗劫。我家也被掠走一空。我居周家一周，眼看大势已去，也从沈阳逃到北平。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沈阳沦陷纪略

熊正平

“九·一八”事变的前夕

“九·一八”事变时，我（当时名熊飞）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公安局长由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将军兼任。当时沈阳市武装力量除正规军队外，全市警察和公安队共约2 000人；其它各县也都有警察和公安队，人数按县的大小有所不同。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我接到情报后，都随时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曾在一次省政府会议上向省主席臧式毅提出报告，并亲见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的荣臻参谋长作了报告。臧、荣二人都指示黄迳报张学良，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他回来向我说：“副司令派王维宙（王树翰）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黄显声回来后即将辽宁公安队改编为12个总队（3县至5县编为一总队），并拟请更换武器，以

备必要时使用。

是年8月中旬情况更加紧张：中国人到南满、安奉路线工作渐形困难，日本关东军大量向沈阳集中，并在沈阳南满站日本忠魂碑附近架设大炮数十门，炮口指向城内。日本侨民纷纷传说，日军将占领沈阳，解决中村事件问题。我向黄显声报告后，黄又据情向荣臻、臧式毅请示，万一日军进攻，如何处理。荣、臧指示说："中央一再指示，避免冲突，不可扩大事件。"9月17日早10时，荣臻与日本关东军代表会谈中村事件的解决办法，承认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荣臻、臧式毅等认为这一事件既已如此解决，即可望不致扩大了，因而未作任何应变措施。

日军进占沈阳实况

9月18日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与本庄繁见面，闻其携有密谋，将采取爆发行动。我得此情报，遂向黄显声报告，黄当晚到市公安局办公。夜10时20分钟，日本南满站忠魂碑附近的炮兵突然开炮向我北大营射击。10时50分，王以哲也赶到市公安局，与黄显声会商如何应付。王以哲表示如被攻击，即服从命令，退出北大营，向东山嘴子东北讲武堂撤退。黄显声则表示公安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

9月19日晨，日军占领了北大营，复向我军追击。第七旅撤退到东山嘴子后，会同讲武堂官兵学生向海龙方向撤退。同日，日军攻占我沈阳市商埠地及大小西关，这些地区的各警察分局及公安分队与日军接触后，颇有伤亡，余部集中东关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部。

9月20日，日军继续攻占我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多架，不时在空中侦察，有时扫射，居民有些伤亡，并有坦

克车多辆，在街上纵横驰骋，商民愤恨异常。时市公安局尚能与臧式毅通电话。20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并开始于其占领区派持枪上刺刀的士兵，在重要的街巷路口站岗，并有日本宪兵向民户搜查武器及抗日分子。沦陷区的警察及公安队除向总局及总队部集中外，尚有一部分分散潜匿于各人家中。当时大汉奸赵欣伯开始作建立伪政权的活动。

9月21日夜间，沈阳砖城各城门及东关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部大门，先后被日军坦克车攻开，守门公安队颇有伤亡。在总局及公安总队部集中的员警及公安队官兵受黄显声的指示，尽量携带武器弹药，以分局分队为单位由后门退出，连夜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

22日，伪自治警察局成立，伪警左臂带白臂章，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是伪政权的开始；同时地方维持会也在酝酿成立。荣臻、黄显声看到形势日非，遂化装去北京，请示以后行动。臧式毅未及走脱，在家被日军包围。我督率警务处人员及沈阳市警察及公安队分散潜匿市内的人员，向锦州集中。当时其他各机关公务员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不甘心为敌人利用者，纷纷由皇姑屯上火车转赴锦州或北京。当时皇姑屯至北京的铁路尚能通车，但皇姑屯车站有日军放哨，检查甚严。

我率大部警察及公安队到锦州后，受黄显声指示，整编警务处及公安骑兵3个总队。9月底，米春霖奉张学良命令由北京到锦州，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的职务，其他各省府委员及厅处长也多到达锦州。辽宁省政府在锦州正式成立，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大部分职员到锦州办公。当时据我方遗留在沈阳市的人员向锦州的辽宁省政府报告说：日军逼迫臧式毅仍以省主席名义办事，但称新政权（即伪政权）。至此，沈阳遂全为日军占领。

东北当局平时对日军既毫无作战准备，事变起来又不抵抗，致使大批作战物资均被日军掳去。东北兵工厂一处即损失步枪95 000余支，各式机关枪2 500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650余门；迫击炮厂损失各式迫击炮2 300余门；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飞机260架。此外，还损失了大批的弹药、器械、被服、粮秣等。而在沈阳的驻军如东北步兵第七旅、长官公署卫队、东北讲武堂、辽宁省警务处、省会公安局等亦损失武器甚多。至于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其他各机关、企业、学校等损失的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山河沦丧　国耻难忘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关东军司令部

编者按：本文摘自“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辑出版的《板垣征四郎》一书，此书是一部充满军国主义的反面教材，选摘其中部分史料，以供参考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九·一八”夜晚的旅顺

旅顺市位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州西南端。

旅顺市当时是日本租借地关东州的首府，位于北依日俄战争时乃木将军麾下的第三军激战地——有名的二0三高地、东鸡冠山等一带丘陵地带的旅顺港内，是一座南向的幽静城市。

满洲的秋季降临得很早，虽说刚跨入9月份，清爽的寒气已经笼罩着这座港城。

市街修建在从海岸向曾经进行过激战战场的背后群山的慢坡上。当你登上城市的高地时，旅顺港的闪烁灯火可以尽收眼底。这就是美丽夜晚的和平港城的风光。

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晚。

旅顺市寒冷寂静的秋夜突然被打破了。在这座城市一角的住宅区喧嚣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那时已经过了半夜11点了。

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部军官片仓大尉的官舍中，家属们刚刚入睡。

片仓大尉在某种直感下跳下床来直奔电话机而去。

果然是当晚军司令部的值星官小西大尉挂来的紧急电话。

参加今晚在街上举行的同学会宴会后已经醒了酒，并恢复了平时紧张作风的片仓大尉，在一面“啊，啊”地回答的同时，把电话的重要内容都记录下来。

这台电话的受话筒传来了惊天动地的消息。

军机电报（第一号）

这天晚上10点多钟，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大营西侧破坏了满铁铁路，袭击守备队。接到和我守备队发生冲突的报告后，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二营已奔赴出事现场。

在电话中听取小西大尉以急促的声音报告的军机电报内容

的片仓大尉，心中想到的是自己身为参谋部总务军官的责任感。

“好了，我立即去司令部进行处理，请你马上把电报送到三宅参谋长公馆去！”

回答完毕放下话筒的片仓大尉，马上转入青年军官那种麻利简捷的行动中。

他首先给石原参谋以下的竹下、新井、中野、竹田参谋们挂了电话，通知他们说：“在奉天突然发生重大事件，马上到三宅参谋长官邸集合！”自己也立即在身穿的和服上扎上裤裙，急忙奔向在军司令部附近的三宅参谋长官邸。

继石原参谋、片仓参谋到达三宅官邸以后，大家都陆续到齐了。因为大家都是匆忙而来的，所以都和片仓一样随身穿着和服，唯有石原参谋一人整装而来。大家都对石原君在这样紧急时刻尚能抓紧时机整装而来表示钦佩。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总之，石原以外的参谋们不得不怀疑石原君是否早已穿好军装在等待着这次紧急集合。

小西大尉把军机电报送来了。片仓大尉听过电话之后，总觉得有些放心不下。

三宅参谋长看过电报以后，马上直接向司令官官邸挂了电话。据副官说：“初次到辽阳巡视后刚刚回来的本庄军司令官正在洗澡。”三宅参谋长请求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来。

到场的全体军官立即到军司令部集合，必须刻不容缓地决定初步作战的最高决策。

参谋长公馆前面有一棵在秋风中摇摆的柳树。散会后走在大家后面的片仓和武田2人在柳树下停住了脚步，并叫住了中野、新井两位参谋。这4个人都是刚出茅庐的年轻参谋，而新井已升为少佐，其他3人还是大尉军衔。

“喂！我以为这次事件有些可疑，你们有啥看法？”

首先由资格较老的新井拉开了话题。片仓以下3人也都把刚才心中产生的疑团，象决了堤的河水一样一下子都倾吐出来。

“前几天花谷（奉天特务机关成员）醉酒时曾夸口说：‘如果发生什么事件，可以在两天内占领南满洲让你们看看’莫非就是指的这次事件？”

“板垣和石原很可疑，板垣以建川少将昨天来满为理由，从辽阳返回奉天。在今天那样紧张时刻，不是只有石原一人整装而来的吗？”

中野和武田等都相继地叙述了感触，不由得大家的心目中都产生了一种“他俩背着我们搞策划想要抢头功”的奇特想法。

“要打就打嘛，为什么事前不告诉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从前有过河本大作事件（炸死张作霖事件），中心人物板垣和石原都在我们中间，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在4人之间暂时出现一段沉默。

旅顺的夜空，秋天的满洲夜空呈现出一望无际的深蓝色。头顶的柳树上面夜星在闪闪发光。

然而，在深夜的寒气中走动着的他们，心情十分激动，头脑里立即闪现出“参谋”的理智，相继地谈论起他们各自的意见。

“关东军乃是天皇的军队，用这支队伍莽撞行事是要慎重的，但从整体的立场来看，我们如果不支援板垣和石原，他们将成为第二个河本大作，而要死无葬身之地吧。我们假如不协助他们，他们采取的这一行动，对国家的百年大计没有好处，形势将成为中央的姑息敷衍见解和消极主义者的牺牲品，他们必将彻底垮台。这样一来，就等于对在满数十万同胞坐视不救。对排日侮日一直在隐忍自重的日本派遣机关的努力也成为泡影。葬身于满洲的数十万士兵的血和泪的结晶——日本权益，也不

得不放弃。当前日中的正面冲突，对关东军来说是最好的机会，我们现在应当不顾面子去协助他们。”

他们4人又沉默地相互理解地走着。

不知不觉中他们产生了平时工作中的预感。同样都是参谋部的军官，板垣和石原究竟干了些什么？无论如何也难于理解。他们总觉得有些疏远感，然而，对一直很佩服的、有实行力的、豪放的板垣；才华出众的石原从心往外持有尊敬感的他们，这时却抛弃了疏远的、反感的个人恩怨，毅然决然地翻然醒悟过来，作为一个青年人要为祖国效劳。

位于军司令部背后的是漆黑的二0三高地一带的山峦。那栋两层砖瓦结构的楼房，只是正门口亮着电灯。室内当然都安装着电灯，由于一直处于没有夜间办公的平时状态，所以二楼的司令官办公室和作战课办公室都没有安装灯炮，因此只好都点上了微光跳动的蜡烛。

关东军的真相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关东军的沿革。

由于日俄战争，将俄国势力从满洲驱逐出去的日本国，从中国手中把西南端的关东州租借到手，便在旅顺设置关东厅直属于拓务大臣。在奉天、长春、哈尔滨、吉林等主要城市设总领事掌管日本侨务工作。南满铁路主要经营从旅顺、大连——奉天——长春间的“旅大线”，控制了主要车站周围的，叫做满铁附属地的，排除中国经济权益的所谓“治外法权地区”。

当初为了保卫日本权益，警备满铁，并确保南满洲的治安起见，从明治末年设关东都督府，自大正9年顷脱离关东厅长官管辖，决定设立关东军司令部的编制，司令部设于旅顺，大约拥有10 000名兵力。

昭和6年，当时的兵力以第二师（师长为多门中将，驻防在辽阳）为主力，但是这个师是平时编制，没有辎重等兵站部队。在4个步兵团中每个营都缺少1个连，是以3个连队编成的兵力，共约8 000名左右的师。此外，为了护卫铁路，设有独立守备司令部（司令官森连中将，驻扎在公主岭市）和6个独立守备营，分散地配备在铁路沿线上，共计兵力约为5 000人左右。除此之外既没有空军也没有坦克，是一支有少量炮兵的步兵部队的整体，几乎是忽视了机械化配备的大约13 000人左右的部队。

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地位问题，按军司令官的序列来看，第一位应是朝鲜军司令官，第二位则是台湾军司令官，最后才是关东军司令官。为了顾忌到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和反感，仅配备了保护既得权益的最低限度的兵力而已。

然而，以满洲为根据地的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隶属下的军队，已扩充到拥有飞机、坦克装备的约有20万人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司令官的序列也逐渐上升，昭和6年8月，本庄繁中将接替了菱刈隆大将，其幕僚为三宅参谋长（少将），板垣高级参谋（大佐），石原作战主任参谋（中佐）以下等人。在奉天、哈尔滨、吉林等地设立了担当外交、策略、谍报等任务的特务机关，分别任命土肥原大佐为奉天、百武中佐为哈尔滨、林大八大佐（后为大迫中佐）为吉林的特务机关长。

本庄军司令官的果断　板垣参谋的登场

等候不久，本庄便带领住友副官来到了司令部。

三宅参谋长以下全体人员集合在点着几盏蜡烛充满异常气氛的作战室里。

三宅参谋长马上根据第一封电报向本庄军司令官作了情况

报告。为了争取作战的主动权，首先命令军队主力在奉天附近集中、或者命令出动，乃成为主要议题。石原参谋马上坚决主张“立即向全军下达出动、攻击命令。”

关东军平时即有对中国的警备计划和对苏作战计划。

并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条令规定：

“关东军司令官为了警备南满铁路，为了关东军的防卫，在紧急必要的场合有权出动兵力。”

对在平时作战计划中规定的如在南满铁路沿线发生事端时，“首先要把军的主力集中在奉天附近”的原则的例外便是“采取行动”，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军司令官独断专行的权限的重大责任问题。

石原正是在要求本庄军司令官下定这样的决心。在这个背离平时作战计划案为中心的是非问题，参谋长以下全体幕僚们展开了讨论，直到零时以后本庄军司令官还不能轻率地下结论，时间就这样一分一分地过去了。

时钟指向零时28分时又接到奉天特务机关拍来的第二封电报。

军机电报（第二号）

北大营之敌炸毁了满铁铁道，其兵力为三四个连队。虎石台连队在11时许和五六百敌军交战中，占领了北大营的一角，敌军正在增援机枪和步兵炮部队，我连队正在苦战中，野田中尉负重伤。

全体幕僚根据这封电报更加紧张地等待着军司令官的决心。于是，本庄军司令官便不慌不忙地说道：“好！由本职负完全责任。”

以坚定的态度下定了如下的决心，即：

一、打乱平时作战计划，长春驻在部队的主力要原地不动

地在长春待命，在万一的情况下要处置宽城子和南岭之敌。这也意味着根据情况发展的需要，作好开赴北方哈尔滨的准备工作。

二、对来自吉林方面之敌的进攻，也采取同样对策。

三、军的主力根据奉天附近的战况要依次投入兵力，坚决进行攻击。

已经过了半夜到了9月19日。遵照军司令官的决心，由石原作战主任以下武田、中野等人提出命令方案请求审议；又决定了各部队的部署；向第二师师长、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等发完电报时已是午前2时了。

军司令部决定在午前3点钟（19日一译者注）带领坪井大佐指挥的步兵第三十团从旅顺站出发，负责铁道运输的中野参谋和佐伯中佐（满铁嘱托）互相协力，编组军用列车做好了准备工作。

决定三宅参谋长和新井参谋以及各部部长暂时留在旅顺待机，等待命令北上。较预定时间推迟了一些，在19日午前3点半钟本庄军司令官、石原参谋以下的幕僚们，和步兵第三十团同车从旅顺站出发了。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白玉山上的表忠塔闪闪发光。北上启程中天渐渐亮了。每到各站时都传来了各处的战况，车厢变成了临时作战指挥所，首先根据石原参谋的指示，制成了参谋本部的业务分工表：

主　任
高级参谋板垣

- 总务课（政策、外交）课长板垣，课员片仓
- 第一课（作战，兵站；铁路，通信）课长石原，课员武田、中野，小松
- 第二课（情报）课长板垣，课员新井及翻译官
- 第三课（占领地行政调查）课长竹下，课员冈部，会计佐藤（勇），住谷

在此期间，已经向朝鲜军司令官拍发了请求马上按既定计划，增援1个混成旅兵力的电报；并委托旅顺第二遣外舰队，向营口方面派遣部分舰只切断并监视海路。

然而最重要的是应当向中央、大臣、参谋总长及时报告。而关东军尽管在接到第一号电报数小时后，就已经开始向奉天推进了，但是，参谋部并未向东京拍发任何电报报告军情。

本庄和石原一直没有命令电报收发负责人片仓向中央拍发电报。片仓在从旅顺出发前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不向东京拍发报告电呢？"很明显，这种事在本庄和石原的心目中是不能忘却的重要事项，用不着我们年轻人多嘴多舌。准备好了电文的片仓，在猜测事件突发以来已经经过5个多小时，还在考虑"是否向中央报告"的军司令官的心理，更加感到其责任的重大性。

不久，列车即将到达大石桥。

本庄终于下了决心："石原参谋！向中央拍电报告！"

时针正指19日9时。

本庄的决心已经坚定了。关东军以现在的重大责任感和决心，毅然地挑起了这场战争。片仓为了拍发这份电报，在列车进入大石桥站台时，立即跳下车厢直奔站长室。

天已大亮了，晴朗的天空，耀眼的旭日刺激着一夜没有合过的双眼。

站前挤满了数百名侨民，手里挥动着日章旗（日本国国旗）在激励着自己的军队。

“大干一场吧，现在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拜托了。”

“不要重演张作霖事件，这回要彻底干一场，假如军队撤退，我们就躺在道轨上，请把我们轧死吧。”等等，有不少起哄的人。在万岁万岁的欢送声中列车继续向奉天进发。

9月19日午前11点多钟，关东军司令官以下乘坐的军用列车，到达到奉天车站的站台。

在站台上紧绷着苍白色的脸，身材虽然不高但很精悍的参谋大佐，率领着许多佩带参谋绦的军官整齐地排列着。

他便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他所率领的是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少佐、今田大尉、奉天讲武堂的教官矢崎少佐、须田、江崎大尉等。他们都在右肩上佩戴着参谋绦，使片仓以下各参谋感到奇怪。原因是花谷以下并没有正式任命参谋的职务。原来，尽管是陆大出身，擅自佩戴参谋绦也是违法的，可能是板垣为了便于作战指挥而准许的。现在还没有佩戴参谋绦，没有正式任命为参谋的片仓心中暗想“这些家伙太随便了。”

花谷以下却辅佐板垣处理了昨夜以来的大事件，现在在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意气轩昂的表情。

马上就把车站的贵宾室做为临时司令部，首先由板垣高级参谋向本庄军司令官报告了昨夜以来的作战经过。

第一个抢先进入中国军北大营的今田新太郎大尉更是得意洋洋，他展开了地图说明战况。说明情况后的今田，把从衣袋里掏出来的，叠得很小已经烧焦了的中国式便笺舒展开来，说是在北大营找到的证据递给本庄军司令官过目。

大家都围拢过来破译为：

——19日午前2时实行紧急集合，集合后科目自行规定……

写着如上文字的便笺，据说是王以哲的演习攻击命令。

片仓也在上司们的身傍，他看过这个所谓文件很惊讶地想到“哎呀，真怪呀！”

19日午前2时太可疑了。事件是18日午后10点多钟发生的，如果不是18日不是太滑稽了吗？总之这个文件是伪造的已经暴露无遗了。但那时谁也没有发现这个落款日期大有问题。片仓立即走到本庄军司令官面前问道：“阁下，这个文件可以收起来了吗？”

得到司令官的许诺后，拿着这个纸片的片仓，把今田领到相距不远的房间里。他用温和的口吻说：“喂！这上面的落款日期是否有些不妥呀，这样的文件做为证据给别人看怎么得了啊，要严谨些为好。”

今田的脸上显出了诧异的神色，过了一会儿说：“嗯，是啊！”终于察觉了这个问题。

片仓一面瞅着今田的脸一边说道：“现在不能更改日期了，所以，把落款日期烧掉才好。”

说着，便从今田那里借了火柴小心翼翼地只把落款日期烧掉了。

两个人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大家集会的房间。

板垣和石原离开大家继续在秘密商量着，即将大显身手的两个人，大概正在得意洋洋地研究今后的作战计划吧。

板垣平时以冷静、沉着、豪胆的言行使得参谋们肃然起敬，但事遇紧张时脸色就增添几分苍白，使他那白净的容颜上添了几分朝气。

司令部推进到奉天

关东军司令部在当天午后即迁入板垣事先安排好的中央广场前的东拓大楼，幕僚的宿舍安排在从车站到东拓大楼途中中间的，叫做沈阳馆的旅馆里。

在东拓大楼的正门上悬挂着一块白木黑字的“关东军司令部”的牌子，门前站着上了刺刀的卫兵。这种森严的战时气氛，使行路的中国人侧目而视。他们根据昨天的枪炮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现在又亲眼看到关东军司令部推进到奉天的铁一般的事实，对旧城内的城墙上插上了日章旗的现实，不能不加以重新认识。

奉天全市已被日军占领，营口、凤凰城也被攻克。长春的长谷旅也正在进攻长春南岭、宽城子的中国兵营。换言之，由于关东军昨夜以来的奇袭作战，长春以南的南满洲据点已被平定了。

本庄和板垣、石原等领导，对既成现实的问题如何对待哈尔滨、吉林？特别是如果进攻哈尔滨，苏联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些正是他们“思考”和“下决心”的焦点。

在这个阶段板垣和石原已经搜集了可靠的情报，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在判断苏联不能动手的前提下，才坚持强硬果断的态度。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总第25辑）

日本驻朝鲜军越境增兵

日本广播协会《昭和记录采访组》
天津编译中心译

《奈良侍从武官长日记》的发现

访问精通军事资料的、防卫厅战史部的森松俊夫时，他告诉我们一份资料。这就是当时以侍从武官长身份随侍天皇陛下的奈良武次大将（1868～1962年）的日记。

根据森松的情报访问奈良家，是在2月上旬的一个大风天，出新宿站西口，向左望见高层建筑群，步行15分钟左右，便到了我们要找的奈良家。1962年武次去世以后，其孙子武康继承了家业。

已改建成高级公寓的奈良家的会客室里，挂着天皇陛下从伦敦买回来赐给奈良侍从武官长的狮子画。

奈良大将在历代侍从武官长中，是天皇陛下信任最深的人之一。

据说，奈良武康至今一直认为：不能给陛下招来麻烦，强烈拒绝将日记公开。过去虽曾有一二次提供作研究之用，但将《奈良日记》公诸于世，这还是首次。

日记每年一本，每日都写。据武康说，祖父武次至1962年94岁去世止，每日就寝前一定要坐在桌旁写日记。这是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成的，通过字面表现了他一丝不苟的性格。

从《奈良日记》中看到的满洲事变

我们试从《奈良日记》来追述一下满洲事变的前后情况。满洲事变发生的一周前——

9月11日　　星期五

下午1时30分，南陆军大臣拜谒，上奏有关改革军备制度和裁军会议的关系。

这时，陛下提醒，陆军的军纪问题及陆军首倡的国策是否有拖延之倾向等。陆军大臣说，曾听到此类传说，故充分注意管束，已将内容上奏（后略）。

天皇陛下已敏锐地察觉陆军中有不稳动向，提醒南陆军大臣注意。天皇陛下的这种担心，一周之后便以爆发满洲事变的形式出现了。

奈良侍从武官长19日晨，从报纸号外得知“满洲事变”。虽在休假，立即前往宫中，拜谒天皇陛下。陈述了事态将不会扩大的个人见解。日记中对那天的不稳情况记述如下。

9月19日　　星期六

（前略）上午9时45分，南陆军大臣拜竭，上奏日华两军在奉天附近发生冲突，我军攻占北大营。此时，大臣似乎已知关东军司令部侵占奉天及长春，我军攻击中国兵营等，但未上奏。只是说，今后的情况应由参谋总长上奏。又谈及应在上午10时召开临时内阁会议。

我提醒说，关东军按其条例中规定的任务范围内之活动，军部可独自决定，超出范围的应等待内阁会议的决定。另外，需大量出兵时，应召开御前会议。此时，陆军大臣把这些话写到了纸上，匆忙退下。

下午3时，金谷参谋总长拜谒，上奏满洲事件至此时的发展

情况（占领奉天城、攻击长春南岭的兵营等）。还上奏朝鲜军司令官因关东军司令官要求，已独断将混成旅团用火车派遣至满洲，据报先遣列车已于上午10时左右出发，故向三处发了加急电报，命令其必须停止。并表示了对擅自出兵行动感到惶恐。

这时，内阁会议决定必须竭力防止事态扩大。下午，若槻首相拜谒、上奏。

然而，关东军出乎意料，正在日益扩大其行动（后略）。

早晨9时45分南陆军大臣拜谒天皇陛下，报告了满洲事变爆发一事。这时，奈良侍从武官长提醒南陆军大臣，关东军不要超越所规定的职权范围，需要增兵时，一定要提交御前会议。可是，下午3时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拜谒之际，报告称：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应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要求，已令混成旅团（驻朝鲜的日军）于上午10时出发。于是，自己用加急电报发出停止增援行动的命令。

实际上发出停止增援命令的背景是由于上午10时若槻内阁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作出了"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这一决定。因而，陆军不能使朝鲜军合法越境。

朝鲜军的独断越境事件

然而，关东军按着既定计划采取了扩大事态的行动。

尽管金谷参谋总长和南陆军大臣想遵从内阁会议的不扩大方针，可是次日（20日），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等人提出了强硬政策，并确认了推进支援关东军事宜。

这天，9月20日的日记——

（前略）下午2时，金谷参谋总长拜谒。上奏：其后关东军的行动情况以及趁来自朝鲜军的混成旅团现在尚未越过国境之

时，可加以控制，令其在新义州待命。

这样一来，事态似乎是平静下来了。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求增援的关东军，实行了一个作战方案。他们以保护吉林侨民为名，把大部分关东军派到吉林，结果故意造成满铁附属地的守备空虚，促使朝鲜军越境填补防务空白。

关东军处于困境之时，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不等待奉敕命令，即下令混成第39旅团于21日下午1时越境，开赴奉天。

9月21日的奈良日记——

（前略）下午5时55分参谋总长拜谒。上奏：据悉朝鲜军混成旅团无视总长的待机命令，由于军司令官独断专行，已经越境，向奉天进军。实在令人惶恐不堪。此外，有关善后事宜待研究决定后采取某种措施，再行上奏。

南陆军大臣在当日的内阁会议上本已极为主张需要增兵，要求内阁会议承认，总长也同样期待，请求天皇批准公开增兵，但最终未能得到内阁会议的同意。（后略）

陆军中央所采取的方针是：林朝鲜军司令官的行动，并非干犯大权，决定请求天皇陛下批准，以追认的形式收拾解决。但是，在这天的内阁会议上增援一事也终于未得到承认。

没有找到解决对策，便迎来了9月22日。上午9时，金谷参谋总长把请天皇陛下批准的处置方案委托给奈良侍从武官长。而奈良回答说，只要首相不批准就没有希望。金谷参谋总长就又拜会了若槻首相，恳求在这天的内阁会议上无论如何予以承认，然而未从若槻首相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

到了下午，形势急转直下。

（9月22日）下午，应陛下召唤，前去拜谒。因陛下垂询：是否已提醒总长不宜扩大事态。我遵旨奉答，已转告其注意，但未及传达圣意前总长已知圣意及内阁会议的主旨，分别作了处

理，惟已经出动的军队有骑虎之势，诸多越轨，实感遗憾，且无任惶恐。

（中略）下午4时左右，若槻首相拜谒，上奏内阁决议主旨。

下午4时20分，金谷参谋总长拜谒，秘密上奏：请求追认允许派遣朝鲜军的混成旅团越境问题。拜受陛下御旨：本次不得已予以追认，今后应多加注意。

以此，从朝鲜增兵问题虽合法解决，朝鲜军司令官独断专行及参谋总长管束不力等责任问题待时局平静后，需审议追究。

天皇陛下通过奈良，传达命令给金谷参谋总长：对满洲事变扩大事态始终是反对的。

这天的内阁会议，虽不赞成朝鲜军独断越境，但结果承认了增兵事实，也决定支出经费。若槻首相将这一内阁决议上奏。

这一来，天皇陛下下达了批准令，给独断越境合法化开了端。但是天皇陛下忧虑事态的发展，提醒金谷参谋总长今后决不能再做此类事情。结果，若槻内阁被既成事实所推动。内阁的追认使陆军和关东军增强了信心，加剧了扩大满洲事变的势头。

（摘自《皇帝的密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满洲事变和奉天总领事

林久治郎　原著
张德良　译注

译者的话：林久治郎于明治39年10月，经外交官和领事官考试合格，先后在吉林、天津、济南、青岛、北京、福州等地日本驻中国外交机关任职。1928年4月至1931年12月任日本

驻奉天总领事，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满洲事变和奉天总领事》，写于1932年至1935年期间。林久治郎死于1964年，死后13年遗著在日本出版。本译文系《满洲事变和奉天总领事》一书的第十四章“柳条沟事件”。

本文对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指挥柳条湖事件、封闭柳条湖爆破铁路现场，及中国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开城门迎敌的情况，均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林久治郎主张一元外交论，即由外务省及其派出机关主管外交事宜；反对双重外交论，即除外务省及其派出机关外，陆军特务机关不干预政治办理外交。他给币原外相的三封密电，对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起了某种抑制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冒险的侵华战争。由此看出，多头政治、双重外交，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一个特点，只要日本侵略者不停止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步伐，这个弊端就不会改正。

柳条沟事件

1931年9月18日夜，我在津久居平吉老先生家过夜。因为他是我的一位同乡好友，又是在满洲培育果树的恩人，此刻他逝世了，我去他家守灵。根据死者生前留下的遗言，不由僧侣念佛经而代之以“清元节调”来供养。生前友好大都来了，我也置身其中。正当听到“清元节调”最高潮的时候，时间约10时半，从官署打来电话，敦促我急速回领事馆。因为正赶上“清元节调”最高潮的时候，等了大约10分钟告一段落之后，我才踏上了归途。当我从驻地军队门前通过时，忘记是谁向我报告说：“现今在北大营附近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目前正处于会战中！”我在这里才开始听到柳条沟事件（按：应为柳条湖事件）

的消息。回到住宅，马上就知道全体馆员和全体警察署成员早已动员起来了。我又命令森岛领事，即刻去关东军特务机关弄清事实真相。根据特务机关的报告，当夜10时半左右，在柳条沟附近的满铁线路被爆破，那时正值被在夜间演习中的第二独立守备大队士兵看见，马上追击犯人，犯人向北大营的方向逃匿。在追击遭到了犯人从高粱地里的射击，由此遂开始了战斗。目前向北大营进击中①，据此报告，我们想通过特务机关使其立即停止我军的军事行动。不料，这时，第二十九联队也出动，开始向奉天省城进击。今春以来秘密安装在我兵营内的4门24厘米重炮，于11时刚过，开始向北大营和东门外的飞机场射击。隆隆的炮声震向四方。我军的行动，迅雷不及掩耳，使得中国方面，来不及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奉天省长公署向总领事馆申明，中国方面官民均无抵抗之意，因此请求我军停止攻击，从午后11时许（注：23时）奉天城遭受攻击。到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奉天城被占领为止，这期间，奉天省长公署不间断地以电话委托领事馆转告关东军停止军事行动。到了午前3时左右，中国方面打开城门，通知没有抵抗我军之意。

当天夜里碰巧正是星期五，在奉天俱乐部开舞会，多数侨民都聚集在那里。满洲事变爆发当时，舞会刚开始不久。俱乐部所在地，靠近各国领事馆，位于商埠中心和交通要道，作为观战的场所是一个适宜之地，自然也是危险之地。各国领事，尽管已经是午夜时分，他们还是为本国侨民能否安全而来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请求保护。此时，恰值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玛依雅斯回国度假，看家的领事托马斯又去了葫芦岛。副领事林

① 柳条湖事件为日军在沈阳近郊柳条湖村附近，自毁南满铁路的阴谋事件，与中国军队无涉。这里说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而编造的谎言。

钦在家，几次到我总领事馆办事处，登门责问，他愤愤不平，牢骚满腹。

在满洲的日中关系，不易调节，以致引起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这不可避免的冲突，如何展开交涉方能对我方有利，外交机关则负有重大责任。这好比治病，由于误用了药而中毒，就有生命危险一样，外交工作出现差错，也将给国家的未来留下隐患。就个人关系来讲，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协作思想，事情是办不成功的。就国际关系而论，没有舆论的支持去企求成功，也是困难的。如日清（注：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两次大战，当时为了同横暴的中国作战以及从自卫出发同俄国作战，除了怀有野心的二三个欧洲国家另作别论外，国际舆论大体上对我国有利。我国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取胜，而且还能在战后实现经营占领地，不能不说是有赖于舆论的支持。在此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把它叫做舆论战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德国方面，在整个4年里，尽管它在战场上始终占着优势地位，但战争的结局，还是无可奈何地宣告了无条件投降，这是因为世界舆论不站在它那一边的缘故。满洲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国运兴衰攸关的大问题，所以才被人们称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在满洲发生的日中冲突，如何使之向有利于国际交涉方向发展，对于我国实有绝对之必要，因此必须从今日起加速舆论方面的准备工作。关于这一点我同币原外相多次建议过，向老前辈和同僚们说服过，同一部分军人也交谈过。可是，动不动就想急于求成的中央军部，不能不走上轻举妄动的道路。特别是对于关东军的干部，我曾试图说服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满洲问题的解决，不仅国际关系重大，而且必须考虑到满洲居民的人心得失。为此，平时就要做好舆论准备工作。

去秋以来，当牵涉到铁路交涉时，日本内地逐渐兴起了对

华强硬论。本年入夏以来，以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为契机，军部的活动逐渐表面化。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中央要员到地方上的师团长、联队长为止，公开发表有关政治、外交意见，或广为散发宣传小册子，违背了军人敕谕中关于“军人不得参与政治”的诏敕规定。他们无视政府，丝毫不去顾及在满洲采取行动将会引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后果。而因循守旧、姑息养奸的政府当局诸公，又不敢加以管束，遗憾的是终于导致了满洲事变的爆发。因为事先早有计划，所以我军进兵神速。我曾为停止军事行动全力倾注，但是，如箭离弦无法复归。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的当天，板垣参谋为了解决日中关系前来奉天，呆在特务机关。尽管我有时派领事，有时通电话，讲明事理，劝告板垣停止军事行动，可是关东军方面，一旦果断行动起来，伴随着隆隆的炮声，神经兴奋起来的军部，想要制止他们已经不可能了。事态发展到了第二天黎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竟然一发不可遏止。我除了注意使之在国际方面避免出现过失之外，已无挽救之策。

事实已经证明，关东军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在当地已无法制止，他们的行动业已超越我国政府大政方针所允许的限度，这时，政府应该出面加以制止才对。所以满洲事变爆发伊始，我每时每刻都把事态的发展电告给东京政府。象过去把抚顺会议（注：9月14日驻抚顺日军召开警备会议，确定了进攻沈阳的任务和进军的路线）情况电告给东京政府一样，只要不误公事，我宁可自己受到别人的轻蔑，也不悔恨。因此，虽为时已晚，我还是电告给了东京政府，以求防止事态的扩大。（注：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给东京政府的外相币原喜重郎拍发过三封密电。9月15日就抚顺会议情况拍发的第一封密电电文是：“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并携带有弹药物资，

近期有采取军事行动之趋势。”9月19日黎明就“九·一八”事变爆发拍发的第二封第623号加急绝密密码电报电文是：“据报参谋本部建川部长，18日午后1时乘火车进入当地，军方虽系秘密安置，但我认为以上情况属实。另据满铁木村理事密报所传为中国方面破坏之地段，满铁为了修理曾派遣养路工人，可是军方之旨趣是不许接近现场。所以可以想象此次事件完全是出于军部有计划的行动。”紧接着拍发的第三封第624号密电电文是：“中国方面已数次建议圆满解决此次事件，本官用电话通知板垣参谋说：‘日中两国不仅未进入正式交战状态，而且中国方面已声明完全以不抵抗主义为宗旨。此刻至为重要之点在于应努力使事件勿作不必要之扩大，并希望经由外交机关来处理此次事件。’可是板垣参谋回答说：‘此次事件关系到国家及军队之威信，也是为了尽保护在国外的日本侨民之义务，中国军队既然对我军加以攻击，我军就必须彻底地干下去！这就是我军的方针。’因为看不出军方有允准的动向，所以本官不得不将前述旨趣，多次唤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北大营当时有以王以哲为旅长的第七旅驻军。中国军队一方面为我军的突然击袭所惊呆，另一方面还得执行上级不抵抗和撤退的命令，所以被我仅有600人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所驱散。拂晓，北大营即为我完全占领。向着奉天城内进军的第二十九联队，途中反复扫荡中国警察，于午前4时左右进入城内，这里也是天未亮就完全占领。与此同时，在长春也开始攻击了南门外（按：应为长春南岭）的中国兵营，其中一部分立即投降，余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经过19日午前激战之后，到中午稍前即平定。为此，我将士也付出了190人的伤亡代价。

在满洲事变爆发的同时，满铁方面认为有必要修理被炸毁了的线路，准备派遣技师立即到现场去，可是未被关东军允许。

直到第二天早晨6时才允许进入现场。满洲事变爆发的场所，离北大营不远。当着该地危险减少到最小限度时，调查满铁线路破坏的地方加以修理，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直到6点前还不允许进入，这是因为关东军怕引起有关单位的怀疑，从旁插手。

驻辽阳第二师团司令部，19日黎明到达奉天。关东军司令官午前11时率领幕僚自旅顺到达奉天。尚未到正午，我在火车站拜访了司令官，和司令部人员同车一起到指定地点东拓支店，毫无顾忌地交换了意见。司令官照例用温和的口气，快速的谈吐，反复申明说："在柳条沟附近爆破铁路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行为，兼之又遭到中国军队频繁地顽强的抵抗，况且我军是遭受突然袭击，并非出自任何有计划的行为。"我向他说："现在能否返回到事变未发生之前状态中去。考虑到国际关系，事态不能再行扩大，有必要尽可能早些结束。"我还向他说了抚顺会议有关事件，并请他注意来自外部的种种猜测，以及由此容易引起的社会惊恐与不安。

本庄将军调任关东军司令官仅仅14天。按照军部的传统，象满洲事变这样的计划是全体幕僚的工作范围，准备工作司令官有许多事情不一定知道。大体上的安排，不用说应该是知道的，至于具体的计划司令官是否真的知道值得怀疑。根据调查所得，在这之前，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少将身着便服乘坐安奉线快车，于18日午后1时抵达奉天，隐居在某一小旅店。等他拿出主意来已是天明时分了。建川少将是1929年8月，由北京公使馆武官转任第二部长的。此次抵达奉天的时候，我向他说明了军部玩弄阴谋的过错。并警告他说，各机关不能保持步调一致，坚持到底，是很难期望取得完全成功的。建川在参谋本部，执青年将校之牛耳，故敢于坚决执行此次大事，发动了

满洲事变。在建川抑郁阴沉的脸谱里，却蕴含着一种大胆妄为的气质。他和关东军参谋石原中佐一起，是此次满洲事变的核心人物。

遵从我军预先准备好了的战时计划，长春、营口及其他满铁沿线的主要地区点在19日内完全占领。入夜，将驻在鸭绿江对岸新义州附近的驻朝鲜日军第二十师团中的一部分集中起来，令其做好整备，立即进入满洲。

20日，第二师团除第二十九联队留驻奉天外，全部进入长春。多门二郎师团长也于同一天到达长春。为了第二天黎明进入吉林，责成满铁职工，做好吉长线军事运输的准备工作。

当时，在满洲的我驻守部队，第二师团有5 000至6 000人，独立守备队有6个大队不超过5 000人。当军事行动发展到进军吉林的时候，自然要产生兵力不足的问题，作为后备力量，林铣十郎司令官率领下的驻朝鲜日军的一部，支援满洲，乃是预定的计划。

关东军出动到满铁沿线以外，或者驻朝鲜日军派往满洲，平时并不属于关东军司令官的职权范围，只有奉行天皇敕命，方可实行。当时军部派出机构既然已有无视政府的意向，超越了职权范围去发动满洲事变，这就势必要负违敕之责。我殷切希望满洲事变不要扩大到满铁沿线以外去，并立即向政府报告，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事态就会延伸到吉林去，驻朝鲜日军也势必进入满洲，以此提请政府注意。根据转告得知，19日午前9时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讨论处理善后问题，议定事态不扩大方针。在内阁官员中，首相、外相并不是策划满洲事变的核心人物，但他们也没有和陆相一起，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制止满洲事变的发生。

开往吉林的临时加车，还在20日夜列车既已编组完毕，做

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惟当夜未下令开车。到21日黎明，好不容易关东军司令官才发令。午前10时左右，从长春发车。在多门师团长指挥之下，第十六旅团在同一天午后3时刚过，到达吉林。代理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职务的参谋长熙洽，原先就没有抵抗我军之意，到途中去迎接，并与多门中将一起，到了名古屋馆。经过磋商，采取和平方法。吉林的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旧吉林省政府解体了，新政府组织起来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军在吉林未经流血，即开入城内，并使吉林出现了万象更新的气象。

关于进军吉林，本庄司令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对于幕僚的建议并没有马上答应。从20日午后8时起的长时间里，在幕僚们强硬的建议下，司令官才算同意，并于第二天午前3时下令攻打吉林。

19日在新义州集中待命的第三十九旅团，曾制定了在进入满洲的同时，出兵吉林的计划。由于受中央军部指示的限制，20日才没有能够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关东军司令部的幕僚们对于外交机关的干扰，非常愤慨，终于在21日擅自渡江，深夜到达奉天。

关东军本来就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一味地反对外交派出机关。关东军的行动都是这样干起来的。至于司令官的内心想法，当另作别论。

军方对我领事馆，没有任何照会，甚至也不联系。他们这样做，是怕妨碍军方的行动，所以对总领事馆势必存在戒心。然而，从大局着眼，譬如说，既已挑起军事行动，损害我国利益，又比原来事态扩大，对此不容许视而不见。为了使事态不致于再恶化，先得着手于善后处置。在可能的范围内，找到一个对未来有利的问题解决的方案，这是派出外交机关的义务。我们一方面将实情及时地报告给政府，以便采取切合时宜的措置；同

时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同军方的联系；在国际方面，力求尽量减少出现过错。当时的政府为意外发生的事件所震惊，为使事态不扩大，可以想象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无论以币原外相的思想来说，还是以南陆相的人格来说，他们都为限制事件的扩大克尽诚意，但优柔寡断的政府没有能够起到阻止战争的作用。

军部的轻举妄动，对国家的将来有酿成严重灾祸之虞。在欧洲大战中，我在山东任职时，就已痛切地感受到，政府当局如不狠下决心，就无法纠正军部的轻举妄动。1919 年凡尔赛和平会议时，日中关系发生了纠纷，关系到我国政府的方针和态度。那时不要说一般民众不满，就连青年外交官的不满呼声也很高。他们在霞关（注：外务省所在地）组成了革新同志会。那时，我向同僚们说："重要的不是制度的革新，而是思想革新和精神的确立。欲想对外强硬，先要对内明确承认外务省的存在，树立自己的主义，采取自己的方针。对于一切阻挠此种行为的障碍，必须果断地加以排除。历来的日中关系之所以不能按照设想进行，乃是所谓'双重外交'酿成的恶果。因为外务省常常持消极态度，而使持积极态度的军部，从旁无视并蹂躏外务省。因而，欲图使我外交革新，第一要义是振奋外交官的精神状态，采取自主积极的态度。至于制度的革新，不过是为思想革新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手段而已。"我用这些主张，努力地去说服周围的人们。不幸的是在当时还没为大多数的同僚所理解。尔后，日中关系日益复杂困难，外交机关的责任也随之日趋重大，可是上述的状况，仍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陆军方面，驻中国的日军所在要地，都设置有特务机关。在这里任职的是陆军大学出身的，称王称霸的，年轻有为的将校。特别是在重要地点，都由军部内的优秀人员驻扎该地。不用说他们要进行军事上的研究，就连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也不放过。

此等驻扎人员的训练工作和任务分配，都由参谋本部直接管理。有事之秋，就是执行机关；平时以搜集情报为主及布置种种研究课题，令其回答。其中对政情报告以及献计献策尤为重视。如何才能使事态向有利于我国方向发展？当代中国有什么人可以利用？如何来利用？就此类问题，每年都要提出意见。这种工作，中央军部方面也同样要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

此等特务机关的所在地，原来大部分都是有领事馆的地方。虽然说有外务省的现职人员在那里，但陆军方面的特务机关的人选标准，同外务省则大异其趣。他们是由军部内部的最优秀分子充任其职。其实，极而言之，也不过就是任用以普通方法培养成的学习过中国话的人员，和外交官的选拔怎能相比。外交官，须经过考试及第，才能出任，其中成绩优秀者一般地都被派往欧美，留到中国的，都要抱怨自己是怀才不遇者。霞关（注：指外务省）对特务机关的这一切，几乎漠不关心。

由此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特务机关一方，可以有很多经费供开支，外务省派出机关一方，仅仅限于领取法定的有限的经费供开支。因此，在机构设置上，人选上，要想振兴我正当外交，压制军部的横暴，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实际上霞关有没有压制军部矫正双重外交之意，并将其贯彻到底的决心，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满洲事变爆发之后，政府竟然束手无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满洲各地的领事，对军事行动的结果，自然不能发挥外交的职能作用，而且由于军部对外交机关有反感，使各地同僚陷入了非常困苦的境地。我向我的同僚们说：“隐忍自重吧，设法避开和军方的冲突，但要注意报告满洲事变的真相，勿稍懈怠。另一方面政府对满洲事变可说是优柔寡断的。作为为我国的当政者，我国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对于采取无视现政府的

行动，又不能加以控制，应当引咎辞职。当然对最高当局来说，应当立即控制派出机关的行动，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是不断地提出强烈的建议，遗憾的是我国政界缺乏得力人士，丧失了对满洲事变爆发后的善处之机，遂导致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变。

当时，外务省几乎不知道满洲事变所发生的事情。19日外务省派亚洲局第一课长守岛伍郎书记官前往满洲，22日到达奉天。我以为他一定是衔有重要使命来的呢！哪里想到什么特别使命也没有，只是说：“来这里看看。”值此重大时机，作为亚洲局活动中心的课长先生，竟然什么使命也没有，如此漫不经心地出差在外，不得不使人怀疑上级机关的起码工作常识。由此不难看出政府当时是处在怎样的一种窘境。我向守岛课长说：“既然你特意来到此地，那么你就在现场做一点制止的事吧，以表明中央政府尚且存在，用以实现对政府下级机关的控制。统制是金科玉律，关系到我国荣誉所在，对我军统制的混乱现象，不容复活，何况，满洲事变是我国空前的一大紧急事件，一刻也容不得动摇不定。政府当局人士应当立即明确职责所在。你应速归，将此宗旨转告给外相。”非常爱激动的守岛先生，怀着沉痛的心情，几乎一言未发，对我所说的一切，均表示谅解。第二天赴大连，会见满铁总裁内田伯爵，第三天乘飞机踏上返回东京的途程。

中国方面本来就没有武力抵抗外来进攻的能力。他们的传统作法是“以夷治夷”。国际联盟理事会此时正值开会中。21日，根据联盟规约第十一条，中国向理事会申诉要求处理满洲事变，时时刻刻都在往日内瓦呈送情报。我国政府，由于是突然事变，同时又是国内机关失于统制而挑起的事变。因此，首先需要在我国内部加以统制，同时派出军部和中央军部又缺乏完全一致

的步调，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处置。由于这样，当初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处理本案时，我方的态度不够明朗，虽属遗憾，但也是出于不得已。

政府在初期，丝毫没有打算扩大事态，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在内阁会议上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向国际联盟、向美国、向一切方面，都发表了同一旨趣的声明。然而，军事行动迅速扩大了，不要说满铁沿线，进而出兵吉林、郑家屯。到了24日，大有出兵哈尔滨之势。不过在事实上，在满铁方面，他们忧虑在长春能否迫使中东铁路职工强制运行，因为多数列车员都取观望态度，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出发的准备尚无把握；再说第二师团出兵吉林行动告一段落之时，大部分都返回了长春，没有新的行动准备；此时又有政府不准出兵哈尔滨的严峻命令，所以没有能够实现。在军部幕僚中，对派出外交机关的干扰，表示愤慨者，颇不乏其人。

通过在联盟理事会上的对美交涉，政府极力牵制军部。9月下旬，调兵至洮南及通辽一带的军队也退回到郑家屯。这样，总算使军部发热的头脑，稍稍冷静下来，或是给人以军部回到了正确轨道上来的观感，以此向联盟理事会保证，我政府对满洲事变采取不扩大方针。9月30日理事会作了九条决议，决议中未从正面反对日军的军事行动，对我军撤回附属地也未加反对，但撤兵的条件是必须保障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译自［日］林久治郎：《满洲事变和奉天总领事》，1978年原书房版，第115页至126页。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

“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校内外见闻

徐景明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占领沈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东北人民14年的开始。当时我在原东北大学文学院俄文系学习，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人民遭受离乱、蹂躏的悲惨情景。

一、东北大学校内外一片慌乱

当天早晨，东北大学就乱套了。学生没有人组织，只好各自纷纷逃命。他们顾命唯恐不及，就顾不了自己的行李、衣物了，任凭附近的朝鲜人成群结队地进入学校，随便拿走东西。当时家住在沈阳市内的学生，悄悄绕道溜回家去，可苦了外地的学生，特别是家住在哈大线上的，不敢乘坐日寇的火车，只好三一群，俩一伙，随着大批逃难的人流，盲目逃跑。一开始，奔法库县往北跑，但跑出不远，突然从高粱地里窜出一伙劫道的强盗。跑在前边的学生被抢个精光，后边的马上往回跑。由于迷失了方向，稀里胡涂跑到沈阳驻军营房附近，只见烟火冲天，军队早已撤走，只留几个看房喂马的人。不大一会儿，就见从营房里跑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边跑边哭叫，原来他的一只手被日本鬼子用刺刀砍掉了！

我们俄文系同班的五六名男学生，为了相互照应、壮胆，始终结成一伙，抱成一团，但辨不清方向，一会向东跑，一会向西跑，没有定向目标。后来有个人说：“我们逃到北平去吧！”可

当时的沈阳中国火车站（今北站）早已被日本人占领，我们只好奔皇姑屯车站。

我们好不容易跑到皇姑屯时，已日落西山，我们几个学生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可谁也不想吃啥。看到车站上人山人海，都不要命地抢着上车，但车上早已超满员。只见车上的人手推脚踢，不让下边的人上去，一倒一片。我们也不敢近前，没法上车。

正为难时，又听说另外还有个火车站，说是要花钱买票才让上车。可当时车站上没有人售票，我们正在发愁的时候，突然来了个铁路员工打扮的人，手中拿着自己做的简易车票，票面上只印有“皇姑屯至北平”的字样，每张票售价20元，比原有票价高一点，我们几个人一起凑了钱，很快就交钱买了票，都很庆幸，拿着“车票”上了车。可马上就明白了原来我们花钱“买票”是受骗了！我们所上的“火车”，没有火车头，都是开不走的废车厢。我们哭笑不得，没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下来了。

后来，又听说那边有台敞口运煤的货车，是拉难民的，我们一个一个都爬上去了。但直等到半夜，那趟车还不开。身上穿的单薄衣服都被露水淋湿了。这时我们才感以又冷又饿，难受得很。要买吃的，手里又没钱；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只好仍留在那个车上。

后来，看见相邻的客车上往上坐人了，才半信半疑地转移到那个车厢里。在车厢里有两个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枪，把每个难民手中的包袱都给挑开了。我们五六个人相依为命，挤坐一团。鬼子用刺刀对着我们问：“你们什么的干活？”有一个胆大的同学答道：“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才免得被刺刀挑开衣物。这时车已开始西进。正这时，车里有人听见外边有飞机

的声音。接着有人说："火车的上空有4架日本飞机"。车里人都提心吊胆，就怕飞机"下蛋"，火车开到"打虎山"车站，停了下来，就在这时，听到连续爆炸的声音。车站附近的中国军人的3匹马被炸死了。

稍停以后，火车转向南进。不一会，车又停下来，车厢里有一名妇女，抱着一岁左右的男孩大便。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车窗前，这个妇女刚把孩子伸到窗外，车突然开动了，那妇女手中的孩子突然掉到窗外不见了。孩子的妈妈哭叫着要往外跳，被旁边人拽住。于是孩子妈揪头发，捶胸大哭……接着，有人发现车窗外面，有血水自上流下来。原来外面车顶上也有难民挤坐，车过隧洞时，头被撞伤而流血了。

二、在北平的苦难遭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逃难学生，先后到北平的不下六七百人，约为原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到北平不久，即由"流亡处理"大员，安排在各省的"会馆"里。我们同车逃难的几个小学生，住在江西会馆里，睡在会馆楼上走廊的地板上，没有被褥，没有枕头，都是枕着自己的胳膊合衣而睡。吃的是大锅粥，事先把流亡学生分成许多队，每天按每队人数发给定量的小米和咸菜。煮饭由学生轮流煮粥。由于锅大、水多，学生又没有煮大锅饭的经验，几乎每顿都吃"锅底糊，锅上生"的小米粥。吃饭时，每人都是一人手端一碗粥，一手拿块大咸菜。粥很稀，不用筷子，撮起嘴唇"哧溜"一声喝光完事，只管"了"而不管饱。嘴快的能喝上第二碗，嘴慢的只能喝一碗，半饥半饱。

那时，当局说要东北大学搞军训，将来要打回东北老家，但既无军装，又无枪支，没有组织训练，实际是一盘散沙。当局

美其名曰“复学于北平”，然而既缺教室，又少教授，实际上大批学生都无所事事，只好游大街，逛小巷。有的学生喝大锅粥没吃饱，进饭馆吃一顿后，掏出“奉票”付钱时，饭馆主人才“傻眼”了，弄得哭笑不得，“奉票”在北平早已不用了。但“免费进餐”只能享受一次，不到三天，所有的饭馆都不谋而合，不再接待东北学生了。这时东北逃来的学生，无家可归，无书可读，无饭可饱，颇有“哀鸿遍野”之势！东北大员们忙于发国难之财，无暇顾及学生的疾苦。当时东北教育界的大员，有王化一、宁恩承等人。宁是留英学经济的大学生。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他承接替“写遗嘱”的东北大学副校长刘风竹的职务。东北大学的学生，在北平一个多月以后，看到复学无望，军训不成，天气日渐寒冷，而衣着单薄，不发棉衣。因此，有不少学生只好纷纷返回东北。

我在海城同乡，北平大学学生黄德本的大力帮助下，弄到一套军人副官的制服，免费乘火车到天津。后在同伴罗士珍的帮助下，由天津乘轮船到营口。在营口他家开的商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我独自一人返回海城荒岭子村老家，那以后东北大学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刘多学整理，摘自《海城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九·一八"——灾难深重的日子

关士杰

灾难降临

"九·一八"事变，我正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上学。9月19日清晨，我正在盥漱，忽听有人喊叫："快去看号外，东北炮响了。"我飞快地跑到图书馆。这里早已挤满了人群，都在翘首看门旁那张"号外"。报上大字标题："日本军于9月18日夜10时12分，突然炮击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吉林消息不明……"。

9月21日，北平市各界代表在中山公园，举行抗日救国运动大会，全市下半旗，各影剧院停止放映，表示沉痛。同日，东北抗日学生会35 000人，在法学院开会，以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名义，发表抗日救国通电。

在法学院的我们8名吉林省扶余县学生义愤填膺，有的参加了宣传队，去市内外宣传，有的加入抵制日货检查队，号召各界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

雪地卧轨

时局继续恶转，噩耗频传，群情愤激。12月中旬，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会发出通知："凡愿南下请愿的同学，火速报名……。"同学们闻讯，纷纷响应。我东北学生多有当了衣服备作盘费而报名参加的。扶余同乡，全部参加了。

队伍组成后，便列队至前门东车站联络车辆。但路局不肯

拨车。我们表示要坚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于是决定露宿卧轨。是时其他各校亦来声援，建议派人去占西车站（平汉路线）进逼一步。然路局亦另有布置，他们决定把平浦、平汉两线的列车，均规定由丰台站乘降。这样一来，我们空守东西两站，也就无济于事了。

次日傍晚，我院接到请愿团组织的命令，叫法、农两院前去占领丰台站，就地要求乘车。两院同学立即准备出发。

这天晚上阴云密布，若有雪意，天黑不便认路，指挥部为我们准备了十几盏纸灯，两院男女同学列队出发了。为了互相照顾，前后队以口笛联系。因为不熟悉路途，只得缘铁路线前行。队伍出发将及半时，忽有路局方面人员追赶上来。他气喘吁吁地说："今日夜半，有一列由天津向北平开来的日本军用车。你们去丰台，途中相遇，怕引起误会发生危险……。"大家听罢，齐声喊道："谢谢你们的好心吧！我们没有指挥部的指示，是不能更改计划的。"

途中，有时要过桥梁，必须步步踏着枕木前进。桥上没有栏杆，夜里虽有几盏纸灯，也照不清楚。有几名女同学穿着皮鞋，更不便行走，后来她们脱掉鞋，三五人携手前进。

一路上灯火相连，蜿蜒蛇行，笛声不断，所经村庄，群犬狂吠。突然远处红光闪闪，继而传来了火车的吼叫声。日本军车真地开来了。大家不见则可，一见立时红了眼，旧恨新仇，涌上了心头。乃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石块，伏于路之两侧，严阵以待。一眨眼间，车身冲近面前。忽听一声高喊："打！"于是乱石齐发，对准了列车，两侧夹击，势如急风暴雨，只听乓乓乒乒，车上门窗俱碎。火车立刻熄灭了灯光，在车头放出的雾气掩护下逃出了包围圈。谁知冲过之后，又遇到前面同学的围打。远处听去，有如除夕接神的爆竹声。

奇怪地是我们快到丰台站时方才被打的那列军车也退回来了。车上有人喊道："不要打了，是咱们人回来了。"车停后，才知道该列车受到了几起猛击后，弄得晕头转向，不敢继续前进不得不停车喊话。接头后才知道这列车乃中国的军用车。车上人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并没责怪学生，还把学生们送抵丰台。

南下请愿

丰台一占，果然生效，次日北平车站就允许挂车了。我们接到电话后，便徒走返回了前门车站。时站内已拥满了人群。大、中、小各校，有的来了代表，有的列队前来欢送。到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还我山河，还我东北!"的标语和口号声。群众摇旗呐喊，声震天地；彩旗蔽空，鼓乐齐鸣。真是气壮山河，动人心弦。

车徐徐开动了，不觉离开了车站。但后面的口号声、鼓号声仍不绝于耳。法学二院有一位女同学，高声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立时大家都合唱起来。真是雄壮有力，气势磅礴。

车抵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也正在要求挂车南下请愿，尚未得韩复榘的允许。迨我车到此地时，他们得到了援助，车也就拨给了。又前行至安徽蚌埠，安庆大学亦随之挂车南下了。

我们到南京时，路旁的群众与附近学校的师生们列队欢迎我们。我院学生住在中央大学的风雨体育馆。是时上海、苏州等地的同学也先后来到南京。

鉴于以往赴京请愿团均未得圆满结果，我们乃把请愿团改为示威团，并换了新袖标，以示抗日救国之决心。

次日各地学校，一起列队游行示威。行于某一街中，一辆轿车飞奔而来，意欲切断队伍通过。群众对之不满，于是一拥而上，将车包围。车内坐着一位国民党要员，身穿蓝缎袍，青

色团花褂子，头戴青绸红结帽头，胸前佩一朵红花，花下黄绸条上写着中央党部秘书。学生们对这类官僚、政客本来就有反感。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又因其无理蛮冲队伍，于是就把这位要员请出车外。据他说是去车站迎接汪精卫的。学生们要求赔礼道歉。

队伍继续前进到国民政府门前，要求蒋介石接见，被拒绝。后来听说蒋在中央党部。大队乃开到该处，要求见蒋，又未成。当时由于右任出面接见，讲些什么，因人声嘈杂，听不清楚。但大家念于名高望众，乃高喊："请您退回，今日之事，您无力裁决。"继由南京卫戍司令陈铭枢出面，同学们仍然劝其退回，但这位司令不理睬，仍然在那老生长谈。同学们急了，说你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请蒋委员长出面吧！陈司令依然讲那些陈词滥调。前边有位同学，耐不住性了，他用维持秩序的木杆，推了司令一下，陈由于没有注意，就被推倒了。这回可捅了马蜂窝，突然台后枪声响了。顿时人声大哗，同学们为了自卫，就挟持着陈铭枢退出了党部院。出院后，同学们把陈放在一个胡同口，就各自撤走了。

兴师问罪

第二天中央日报报道说我们是什么"骚动"，是共产党嗾使的，是劫车、扣审党国要员，棒打陈司令……。同学们一见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们抗日救国行为的有意诬蔑，用心毒辣。

次日继续游行示威，再次要求蒋委员长接见，但仍无人过问。于是又由国民政府来到中央日报社，质问中央日报为何对学生爱国请愿行为造谣中伤？要求抗日、要求收复失地何罪之有？同学们越说越气，在愤怒之下，砸了报社室内几件器皿。当时报社门前人山人海，正在内外吵嚷之际，突然笛声响起，只

见警察与便衣特务蜂拥而至，入室抓人。室内同学见警察特务要大打出手了，乃夺窗而出。谁料窗外是秦淮河，同学们纷纷落水，幸亏河中有许多船户，急忙抢救，救活了许多人，但有的受了伤，更惨的有数名同学竟牺牲了生命。

当我们回到中央大学时，已近黄昏，各队清点一下人数，均有缺额。大家都在担心他们是被捕了或者是被淹死了。去人打听，亦不得着落。夜间队里规定不得外出，以防意外。

次日清晨有人外出小便，刚到门口，便见楼下有着灰军装的士兵，手持大枪，匍匐前进，把我们楼房包围了。他立即返回室内报信。队长立即号召大家要镇静，坐起来不要动，看他们怎样行动。话刚完，兵已冲入室内，枪口对着我们。一个头目喊了声："不准动！把自己东西收拾一下，到外面站队！"大家听后仍然静坐不动。他又说了一遍。我们有人问他："把我们送到哪去？"他瞅一眼说："一会儿就明白了。"接着又有几个人问他，他只说外边有人向你们讲。

我们的队长下令了！"起立！把东西都带好，依次到外边集合！"

外面楼前，有一骑着红马的军官。他身边站着十几名士兵，手端着枪。我们都在想：放下日本敌人不打，对我们要的哪套威风！军官见人已来齐了，便向我们下口令：立正！看齐！报数！

我们都心含恨怨，谁肯听他那套立正、看齐，他只得马马虎虎放过不提。可是报数一项，只报了几声便停了。军官急了，他用讽刺的口吻说："连数都不会报，还讲什么抗日呢！"我们的队长哪肯受他的冷眼，立刻自下口令："立正！"唰的一声，都站好了。"看齐！"既快又齐。"报数！"只听声音响亮，从头到尾仿佛一气呵成。可把那位军官气坏了，他瞪着眼睛，好久没

说出话来。两旁的士兵也看得出神，他们还相对一笑。

这时天空出现了飞机，在我们头上回旋了一阵，就低飞下来，随之在空中撒下许多彩色的传单，慢慢落在我们的脚下，上面大字写着："读书就是救国"、"要相信政府……"、"收复失地中央自有办法……。"我们说，国破家亡，谁还能坐着读书！军官一听不耐烦了，他命令式地说："收拾好东西，送你们回去！别的我无权回答。"

我们被押运到了下关车站，在这儿等船。我组坐在站旁木垛上，与一个来押运的号兵靠近。我读中、小学时吹过号，遂与这位号兵谈起有关吹号的事。接着他说："我是河南人，当了多年兵，军人的任务，就是保家卫国。可现在日本打咱们，上级叫咱不抵抗，这不是挨打还不准还手吗？这个道理咱不懂。这次叫我们包围你们，是今早紧急集合才下的命令。命令说，如你们抵抗，可用枪把打。你们如开枪，就用枪还之。现在才知道包围的是学生，对学生何必用这么大的举动。来的那位是旅长，不该对你们摆威风。东北学生家都没了，谁还忍心伤害你们！"说到这时，船已来了，他才停住了话。

我们回到北平，已是12月下旬了。

市府请愿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留平学生的生活顿时成了问题。回忆张学良进驻北平时，东北学生是到处受欢迎的，曾几何时，情况就大不同了。凡是住在公寓的学生，有的饭费无着，被停了伙；有的连行李、东西都被人扔在外边。这些店家也确实负担不起这笔食宿费用。这类事情经常闹到市公安局，他们也无法解决。寄宿在校的学生，住的虽然不成问题，但是吃的却无处去求，多数是当衣卖物，用以糊口。他们头发长了无钱理，鞋

袜露脚不能换，大有花儿乞丐乞讨街头的样子。我省名画家王庆淮老师当时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就是这样穿戴的。面对这些吃、穿、住的问题，总要想个方法解决才行。学生认为只有要求政府帮助解决。于是组成了东北留平学生请愿团，在“民大”集合后，便打着大旗去北平市政府。但那天是星期日，不办公，没人接待。大家商议一下，都同意在这儿住下，等待明天市长上班再说。这一措施，市府小头头慌了手脚，忙向上级反映。市长鲍贵卿得知后，认为不出头不行了，便安排当晚接见。

黄昏时节，突然有人高声喊市长来了。我们一看，有人高举一把藤椅，边走边喊：“大家躲躲，请让市长过去！”这人身后，紧跟着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身穿长袍，人们知道这是市长。

市长来到正厅台阶上，向大家扫视一下，便开口说一些什么兄弟因身体欠佳来晚了，叫大家受委屈了。接着说：“早就知道同学们生活有些困难，怎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市政府也非常贫穷。大家都见到了咱们市里的马路，多是坑洼不平，早已应当修补，然而无钱难办。外国人经过此地时，该怎么耻笑咱们啊！”他说到这儿，有些同学不愿听了。他高喊道！“那是外国人坐汽车，蹾不蹾屁股的问题。而今天要解决的是东北学生吃住的问题。不要专为外人着想，而忘记受难的老乡！”有的人又插话说：“先想想你家乡的学生吧！”他有些尴尬了。过一会儿他接着说：“兄弟本人不敢贸然决定这样的事情，还得向上级请示。先请同学们回去，兄弟一定给向上转达，尽力而为！”群众又高喊：“我们已无家可归，现在更无舍可宿了，还往哪儿去？不要饱汉不知饿汉饥；我们已没饭充饥了，你们应该管管，不能打官腔向外推了！”最后这位市长说：“好吧，大家暂等一下，

我去商量一下。说完仍由那个喝道人护理着退走了。

约过五六小时后，果然打来了电话，说马上就给同学们发放生活费。大家听了，心甚宽慰。说着现款就运来了，叫各校排好队，按人依次签名领取，市府有人记录。当第一人签名领款后，大家一看，只得两元钱。有人便问：这两元钱是几天的饭费？市府人员说：市府命令如此分法，详情我们不知。群众一听又凉了。于是议论纷纷，结果都认为不能要这两元钱，这解决不了问题，要求派代表再去研究。时已9点钟左右了，多数人都是从早吃点饭，少数人连饭也未用，饿了一天，只得用白水灌肠。因又饿又累，都悄悄地找个地方休息去了。市府的正厅与西厢均被占用。

休息时同乡之间，都在互问近况以及家乡音信，仿佛尚不知饥困。有的面色苍白，时而悲叹，时而激愤。大家说："这些贪官、军阀，只需百姓养他，不知保国爱民，致使我们有家归不得，有书读不下……。"

夜深了，人们多有倦意，室内安静下来。朦胧间，忽听得有人泣哭。只见西北墙角处倒着一位女同学，她身穿布旗袍，脚下扔着一双夹鞋，看样子不过十七八岁。有人说她是弘达学院的学生。只听她边哭边说："关内外交通隔绝，不知爹妈都跑到哪里去了，是否还在人间？如果活着，对我这在外的女孩子，又不知怎样挂念呢！想起家来睡不着，吃不下。前天傍晚，我走到西单马路上，电车铃响没听见，差点没让电车撞上。人家看我象个傻子。"讲到此处，她又"妈呀，妈呀"地大哭起来。旁边有人劝道：大年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东北学生，体会最深。日寇铁蹄残踏我国土，蹂躏我人民，令人悲愤，但中国是不会亡的，早晚要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一定打出去！

话音未落，忽听东厢房也有人喊打，大家听了一愣。是否

他们同情我们给我们鼓劲呢？侧耳静听，果然听到有人喊“打！”并清楚地听到了打人声。屋内人说声不好，一齐奔到门口。门一开，先露头的猛然吃了一棒。大家急了，齐喊你们为什么打人？欺压学生算什么英雄，有种的去打日本！但一群疯狗，不懂人语，仍喊着“打！打！打！”

屋内的同学怒不可遏，有的拿着椅子，有的拿起壶碗等物，要冲出相拚。一位同学忙劝道：“咱不是来打仗的，这样拚，只会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并且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一场恶斗避免了。

当我们走到外面，见院中站满了军警。有身背大刀腰挂盒枪的，有手持长枪或黑红棒的，好似恶狼一样，到处乱扑，把我们赤手空拳并饥寒交迫的学生们，连推带打地拖出了门外。他们是集中全力而分屡分批地将我们赶走的。

子夜，人们正在酣睡中，而北平市政府附近突然喊声震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除夕思亲

可怜的东北学生，家乡被占，生活无路。年关将至，谁不思亲？他们的苦恼，能向谁诉？有谁过问？实在过不去了，辽宁籍的同学被迫找了张学良，黑龙江省的见到了万福麟，向他们问一问家乡情况，求他们照顾一下目前生活。据说他们都略有所得。惟独吉林学生，见到了张作相，张反向学生们报起苦来。他说：“人家学良有兵权，命令好使，有力有势，可以照顾同学。万福麟儿子国宾，曾掌财权，又有几旅兵力在关内，也能活动。惟有兄弟于事变当时正在原籍办理亲丧，身边无财无势。往昔给吉林省府，打个电话，可谓一呼必应。而今去信，那

熙洽能听咱指挥吗?”说时不胜感慨。最后他指院中一辆旧汽车说:“有人能买,把它卖掉,好为同学们过年。我说了就算,绝无虚意。”

这些消息,传到了天津市长萧振瀛耳里,他对扶余学生说:“照顾全吉林省的,我力不足,单为扶余老乡花点,尚能尽力而为。请把老乡名单写来,容我斟酌办理。”结果扶余老乡,每人各有20元的意外收获。

日本军阀为了配合侵略平津,阴谋收买我国一些地痞流氓,嗾使这些败类,夜间持枪出来骚扰。使我商店不能正常营业,百姓不敢在街停留。天津每天都有抢案发生,报纸上天天登载此类消息。

1933年旧年三十晚上,关内的同学们都回家过春节去了。剩几名东北学生,孤苦伶仃守在宿舍里。我院老柏、小杨都来到我这里。大家想以酒解愁。惟有酒无肴难下口,只得买几个冻柿子,回来边啃边谈心。

老柏忽然站了起来,把墙上的京胡取下来,然后说道:“我们不能苦闷度大年,来!我唱你拉。我给你们唱一出新四郎探母。”我这胡琴过了门,他即高声唱起:

柏××,坐学院,自思自叹,
思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我好比,南来雁,失群离散,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恨日本,贼强盗,家乡侵占
汤玉麟,率官兵,东逃西奔。
义勇军,发誓言,还我河山,

我流亡，在北平，有家难还。
二高堂，与兄妹，不能团圆，
贼熙洽，引多门，吉林来占。
扶余县，李海清，日满推翻，
我有心，回家乡，体会一遍。
怎奈我，身在平，远隔天边，
思老娘，思得我，肝肠痛断。
眼睁睁，高堂母，难得相见，
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

他唱之后，小杨问道："你这是哭，还是唱？拉的也噪音，不悦耳。"

"俗语道：人得喜事精神爽，快乐时的唱、拉，听也令人愉快。我今狂歌，用以消愁，何乐之有！"老柏解释一下。

我们正在心绪紊乱之际，忽听爆竹声响。

噢！已到接神的时辰了。

咱家怕是不能有此举动了！

能吃上接神饺子吗？

能吃也无心做了。

说到这儿，有人推门而入。原来是校役杨瑞。小杨问："老杨，你来拜年来啦？"

谁想杨瑞沉着脸，带着惊慌的神色说："外面响声，不是炸炮，是日本兵的枪声，可能是日本人要闹事。我从家来时，听说街里断行人，戒严了。许多中国兵包围着日本人，怕他们冲出东交民巷来骚扰。"

"日本人也欺人太甚了！"老柏气愤地说。

小杨接说道："这是轻者，我们东北三省外加热河，不是都被他们侵占了吗？"

“强权之下，无公理！”

“公理一定胜强权！不然何谓公理！”

走投无路

1933年5月的一天，日本飞机9架，飞抵北平上空。我院学生，均至地下室暂避。传闻日军已迫近通州，北平形势紧张。前门外东西两站，包裹累累，南运物资，堆集如山。各学院亦自行解散。院方准备迁移，迁往何地，其说不一，但事先均未通知学生。我住的寝室楼，仅存我与山西姓孙学生二人。孙催我说：“你还不走，等待何时？日军来了，学校肯定被占，那时怕走不出了。我奔平汉路，尚有车可通，你则不然。”

我到了走投无路之时，眼看不走是不行了。校役杨瑞看我为难，诚恳地劝我说：“关先生，不必愁，日本人来时，你可到我家。”在这种局面，有人能说出这样话，该使我怎样地感激呀！可我一想杨瑞，每月工资两元，鞋袜经常露脚跟，吃饭依靠师生们在年节假日赏给点钱。年近三十，方才结婚，夫妻同老母共居一间小屋。我怎能留宿他家，且饮食有谁能供给。我含着感激之泪，向老杨谢绝了。

形势逼我走后楼，找到了小杨商量一下。杨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不走是不行了。可山海关在打仗。只得由天津乘海船去大连转道而归。可是听说大连海关，日人盘诘甚严，辄有被穿上鼻锔子或以铁丝穿耳朵，而投之于海者，真是惨无人道！”

我说，日本军警杀人如儿戏，这样事能作出来的。不过，他也要老虎带念珠，装一下假善人。如杀人无戒制，他这条道也就无人走了。

我把所有的衣被、用具、书籍等全都纳入条包而送进当铺，

以换取路费。起初当铺不肯收留，说仓库已满，无处存放了。经再三说明苦衷，才给了一条生路，当了5元钱。

在由平去津的车中，报童叫卖报纸，说有重要新闻。我们买了一张，见一版头条大字标题：黄郛北上、华北时局有急转直下之势……。第四版则登有北平各大学的启事，内容为通知学生返校，准备学年考试……。

杨问“咱们怎办？”

我说：“咱们回校，不单无伙食费，连被褥都没有了。”

回到扶余后，由于国破家亡，家里已无力供我返平读书，因而做了14年亡国奴。

（扶余市政协文史委供稿）

柳条沟系柳条湖之误
——有关“九·一八”的两点考证

李若松

“九·一八”事变发生系日本关东军伪造“中国军队炸毁柳条湖附近之南满铁路”为借口，进袭北大营，随即占领沈阳。此系日本军部蓄意侵略中国满蒙之一步，其后之一发不可收拾，国人已耳熟能详。日本虽屡次试图窜改其侵华历史，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恐怕很难能够达到目的。

此处笔者仅就所见资料，对日关东军自导自演炸毁南满铁路之地点名称及部位，稍加考证。

“九·一八”事变铁路爆破地点的地名问题，历来的说法很多，如“柳条湖”、“柳条沟”、“柳河沟”、“柳河桥”、“柳条湖

沟"、"北屯"，还有的解释说："柳条沟原名柳条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承德县志书"、"沈阳县志"、"满洲帝国行政区划便览"等地方志记载，从清代、张作霖时代、伪满时代、国民政府时期，直到今天，该地地名始终叫"柳条湖村"，从未更换过地名。该村的老年居民也说：这里一直叫柳条湖，没叫过别的名字。"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这里也设过派出机构，有满铁的"柳条湖养路工区"，关东军的"柳条湖分遣队"，都称柳条湖。关东军参谋部1931年7月绘制的"奉天近郊地图"标出的地名也是柳条湖。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9月18日的日记里，记有"柳条湖事件"字样。1938年日伪在铁路爆破地点修建的纪念碑也叫"柳条湖纪念碑"。

那么，怎么叫错的呢？经查证，可能同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社驻奉天通讯局局长武内文彬有关。他在9月19日发给东京朝日新闻社的第一封电报稿中，把铁路爆破地点错称为柳条沟。据此，日本报纸当天的号外都误刊为柳条沟。从此以讹传讹已56年。

至于铁路爆破的部位问题。首先应指明，爆破部位是铁路路轨，而不是铁路铁桥。当时中国大员如张学良、荣臻等在"九·一八"事变时的电文或谈话中，都叫柳河桥或柳河铁桥，误认为是炸"桥"；中国记者的报道也叫柳河铁桥，都是沿袭日方宣传的结果。这也是应该顺带更正的。

（摘自朝日新闻社"满洲·上海事变全记"第365页）

“九・一八”事变前后外交部见闻

宿梦公*

一、我进国民党外交部工作

1931年6月间，我和友人孙秉乾由日本留学回国到南京旅行并寻找工作。7月间经留日前辈、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王家桢介绍进入外交部工作。我们入部后派在亚洲司四科任科员。我们名义上分在四科，但所作的是掌管日本业务的一科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亚洲司是主管司，工作繁忙紧张。为了集中全司力量应付这一事变，我的工作由翻译日文改为协助当时管理亚洲司档案的科员朱震，并建立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新档案，因此见闻较多。

二、“九・一八”事变后在外交部的见闻

改变臧式毅电文内容

我到外交部工作不过两个多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当时留守沈阳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急电告外交部，说“日军突然向我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发起进攻，我军寡不敌众，北大营已被敌人占领，王已阵亡”等语。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但外交部指示当时正在日内瓦国联开会的代表施肇基立即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四科科员。

通知国联的电文内竟把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改成“中日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的辞句。此电稿出于亚洲司一等科员白德俊手笔。当我将此电稿归档时，我反复阅读，感到诧异。臧电内容明明说日军向我发动进攻，怎么能说是中日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一方向另一方进攻与双方发生冲突，其含义不同，明眼人一看便知，怎么可以混为一谈？电稿虽是白某所拟，而电文内容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一个小小的科员岂能擅专？特别是改变臧的事关重大的来电内容肯定是出于上级指示。那么作为外交部长的王正廷究竟用意何在？莫非是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

1940年年底，我奉外交部命令从上海来到抗日后方的重庆，回部报到。当时王正廷已出任驻美大使。据一位从驻美使馆回部的老同事说，王在“九·一八”事变后被学生打下台来，曾被国民党监察院弹劾，停止任用5年。王出任驻美大使，是他5年来第一次重新任用。监察院究竟为什么弹劾王？是否与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指示施肇基的电文有关？这是耐人寻味的。

犬养毅暗示国民党政府要抵抗

我在南京外交部时部内盛传，日本继田中义一任总理大臣的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孙中山的老友），曾通过某种渠道暗示国民党政府：以后中国对日本军队少壮派发动的对华侵略一定要抵抗。否则，日本军队里的少壮派军人更会认为攫取中国领土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会指责主张慎重对华政策的保守派老政治家们为老弱无能。而且长此下去，日本政府也将无法控制等语。这一传说，真假莫辨。犬养毅在1931年12月组织政友会内阁，距离“九·一八”事变后不过两个多月。在他任首相期间，一方面不仅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继续进攻，到1932年1月已经占领

了整个东北三省；而且在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由租界向我闸北一带进攻，发生“一·二八”事件。另一方面，同年日本国内发生“五·一五”事件，犬养毅竟被日本少壮派军人刺死。不知是否与上述传说有关。

回忆事情经过，即由传说犬养毅暗示国民党政府对日侵华要抵抗到他被刺死，也不过半年多的时间，事情的巧合，值得深思。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蒋介石正在集中力量“剿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消灭“共军”比什么都重要。抗日期间在重庆时，流传着蒋说的一句话：“宁肯亡给日本，绝不亡给共产党。”说明他反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何况日本侵略军进攻东北，蒋认为这正可借日本侵略军之刀削弱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使张以后可以服从他，这将大有好处。因此，蒋命令正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同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以及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等东北军主要将领，对日本侵略军不要抵抗，并令他们把军队撤到关内，一切由“国府”通过外交途径静候国联处理。张误信并以为国联可能作出合理的处理，可能迫使日本侵略军撤退，从而服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坐失东北大好河山。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南京情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群众特别是学生，群情激昂，愤慨万分，成群结队走上街头，不仅游行示威，还到处张贴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滚出去”等等。同时学生还向街上行人演讲，告诉人民：侵华日军已公开大规模武装侵略我东北三省，我东北已处于日军铁蹄之下，我东北同胞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国家已到危急存亡的边沿。我

们唯一救亡的办法，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等等。并要求“国府”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谴责日本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同时向世界各国呼吁主持公道，迫使侵华日军由东北撤兵，还我河山。而且特别攻击国民党外交部丧权误国。当时，我亲眼看到这些情况。

四、外交部长王正廷在纪念周上讲话

外交部每星期一举行纪念周一次，全体职员参加。纪念周的程序是首先由主持纪念周的人（多半是部长或次长）默读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然后由部长或次长，有时指定地区司的司长作有关国内外形势或业务的报告。

这次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个纪念周，因此，由部长王正廷亲自主持。这一天王照例是西装革履、裤线笔挺。不过他面现忧色，讲话声音低沉，一反常态。

王的讲话大意是，这次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国是一个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强国，日本帝国主义焉敢肆无忌惮地大举侵略一个主权国家。接着王讲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历史。他说：“当时帝俄把满洲视为它的势力范围，不断向满洲发展。而日本自从获得朝鲜后，也引起它向满洲发展的野心。这是日俄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帝俄想独吞满洲，不仅与日本为敌，而且也引起美、英、法等列强的嫉妒和不安。因此，战争时期日本得到列强的暗中支持。当时帝俄在满洲的陆海军实力并不雄厚，战争结局日本战胜了帝俄。这时美、英、法等列强认为时机已到，出面调停，压迫帝俄转让旅顺、大连两港口和南满铁路（由长春到旅大的铁路）。这不过是转让由中国获得的既得权益而已，帝俄并无多大损失。在和谈会议上，日本的首席代表小村寿太郎不满足和谈条件，坚持要求帝俄赔款。

而帝俄代表态度强硬决不退让（帝俄准备调黑海舰队，同时陆军方面也准备动员），甚至扬言不惜再战。小村了解自己国家的实力，如果继续战争，胜败莫测。因此，小村向当时以桂太郎为首相的政府报告和约条件，并做了说服工作，获得政府批准，得以在和约上签字。日俄和约完成后，小村返国时被日本国民视为外交上失败的代表，而不是胜利的英雄。日本国民对小村谴责辱骂，怪他为何不向帝俄要求赔款，甚至有人叫喊要打死小村。”

王最后说，群众只是感情用事，而不了解国家实力，瞎哄一气有何用处？言语之间，显然是说，只有当政的人才了解国家的实力，感情用事无济于事，甚至会招来亡国之祸。因此，必须“知己知彼”，才能用理智克服一切。

五、王正廷被学生殴打下台

王在纪念周上讲话不久，一天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汇合外地来京请愿学生不下数千人，每人手持标语小旗，队伍前面打着各校校旗，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最前面由学生拥着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沿途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滚出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等等。游行队伍到达南京鼓楼后，直奔外交部请愿。当时外交部的办公楼是两幢旧式楼房，部次长的办公室是在北楼，南楼上下是地区司办公室。学生队伍擅进外交部后，直奔两幢楼房。学生到了南楼，所有职工都感到惊慌。但学生们对职工说，不要怕，与你们无关，我们要找王正廷算帐。不多时只听得北楼人声嘈杂，打砸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这些在南楼的职工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人感到惶恐不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司里兼代司长徐谟，他是苏州人，比较胆小，当时被这种混乱

情况吓得发呆，不知所措。因为掌管有关“九·一八”事件的档案我也有责，特别是部里与施肇基的来往机密的电报卷宗正在徐处使用。因此，我就跑到司长办公室问徐是否还用，如果不用，我就要收回放进保险柜，以防万一。当时看见徐的惊慌不安的样子，我也感到有些紧张。因此，我就向徐建议由我陪同从部里东北角后门出去在马路上暂避一时，等到学生队伍走后再回部。徐对于我的建议点头同意。于是由我和徐分提公事包各一个，我在前面带路，徐紧跟在我的后面。当我们刚走到后门时，只见两个人（一个是部长办公室的工友、另一个是王的秘书）架着满头血迹的王正廷狼狈不堪地匆忙走出后门，乘上已经停在后门外的部长专用汽车急驰而去。我和徐都清楚地看见王，王当然也看见我们，双方都未敢打招呼。

学生队伍在捣毁部长办公室并打伤了王正廷后，边喊口号“打倒卖国贼”，边整队伍离开外交部。

事后，据在南楼办公的职工说，当部分学生撞进南楼时，看见楼下客厅里坐着一人，误认为是外国使节。此人是政务次长李锦纶，因被认为是外国使节得以幸免。

学生到北楼未进客厅，直奔楼上。上楼后，撞进王正廷的办公室，见王正在办公。学生齐喊“打倒卖国贼”，并用手中的标语小旗向王打去，最后有人将王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盆花向王头上砸去，王的头部当即开花，血流不止。王后来引咎辞职。

六、顾维钧出任外长，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

王正廷被打下台后，“国府”明令特任在日内瓦开会的施肇基为外交部长。施以工作需要并未回国就任。在此过渡时期，外交部的一切重要部务，临时多由宋子文决定。因此，兼亚洲司司长徐谟每日一次或多次去北极阁宋公馆汇报形势或参与会

议。为时不久，“国府”改任张学良派去南京作外事咨询代表的顾维钧出任外长。

顾在上台前，即将他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设想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顾上台后，立即电令在日内瓦的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议：把我国辽宁省锦州划为中立区，并要日军停止前进，而以中国在东北的驻军调进关内为交换条件。

顾在一次会上为他的提议辩解说：只有这样，可以阻止日军继续前进，至少可以维护锦州到山海关二百多公里这一段领土的安全，并可以维护平津两地以及华北地区的安全。不然的话，日军将直趋山海关，那么华北地区也将危在旦夕。

顾的这个提议，完全是丧权辱国行为，引起在京学生以及各地来京学生的极大愤怒。于是学生结队直趋外交部找顾质问。学生在部里各处搜查找不到顾，盛怒之下，捣毁各处办公室，并用墨笔在办公室墙上书写“打倒卖国贼顾维钧”大字标语后，才离开外交部。

学生当时找不到顾，那么顾到哪里去了？顾自到南京后，吸取王正廷挨打的教训，一直住在国民党励志社内，有军队警卫，比较安全，并对外保密。部里也只有徐谟少数人知道。

自从学生捣毁外交部后，顾越发不敢白日到部，几乎整日隐藏在励志社内办公，不敢出头露面，只有晚间到部办公，一般都深夜去。

（摘自《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

洪　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正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办公，现将我当时所知关于张学良在事变当时的情况，追记于下。

先是，张学良自5月28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9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彼时日本图谋东北的阴谋，已很为显露，其见之于积极行动的有增兵朝鲜，满洲改置常驻师团，更换南满铁路公司正副总裁与朝鲜总督等等。同时，石友三在华北叛变和阎锡山突然由大连返晋，也都是与日本有勾结的。9月12日，张学良曾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军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9月18日的夜间，悍然发动进攻。

9月18日夜间，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

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10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19日午夜1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臧式毅、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条沟制造炸毁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总之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

19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以上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比较多

的为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由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系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9月11日由沈来平的），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在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逾二日，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的所谓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朱启钤、潘复、张志潭、胡惟德、陈箓、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27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由于这二次的会议，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的会议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23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万、鲍二人回平将此意转达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于学忠曾经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

张学良当时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的字）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在这个时候，平市各界人民、东北籍旅平学生以及东北军的中下级官兵，都要求与敌人作战，群情激昂。张学良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们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他又召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会的代表们说："我的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二事与同学们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他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在这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

战乎？和乎？矛盾丛生，而在军事上的布置，外须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内又无东北军作战的整个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只有把一切的幻想寄托于国际联盟。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对事变的措置情况。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五

东北各地相继沦陷

对营口、安东等城镇的占领

营口“九·一八”事变目击记

之一

孙宇辉

“九·一八”事变的当年，笔者家住营口日本附属地新市街，时年只有10岁。父亲在此开小铺。在这日本附属地里，目睹了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兹将当时的所见所闻记下。

1931年9月上旬，新市街内各道口就增设了武装日警和华人巡捕特务，昼夜放哨盘查，限制中国人出入。从事变前四五天开始，一些一直活动在新市街内的日本商人、码头和铁路员工，就慌忙奔走于“大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就在这时，也发现了新市街小花园内有许多枪架、桌案、三八步枪和各种箱子，约有三四十在乡军人在这里擦拭和搬运枪支武器。又过了两天，其中一些年纪大的都换上了军装，并佩戴了军衔，为首的是“桶口中佐”。这人是“在乡军人会”会长，当年五十多岁，参加过日俄战争，退役后在新市街开设了一个东京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各大报纸经销处。听说换上军装的人都被召集到牛家屯关东军驻营口日军守备队去训练去了。

1931年9月18日，新市街内一片阴森气氛。我早晨上学也

被日警堵回，这一天，除“大衙门[①]”的日警巡逻，摩托车频频活动外，几乎看不到日本人往来，中国人更不得随便活动，日本妇女和儿童也显得很慌张，换上了如“阿信”式的短衣靴鞋。

夜幕降临，街上死一般寂静。突然在8点钟左右，听到“大衙门”前的东西马路上传来急促嘈杂的摩托车、汽车声和马队行进的吵闹声，断断续续地喧嚣了一夜。次日（9月19日）早晨，人们风传昨晚日军只用守备队的一个小队，加上在乡军人，总共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一枪没放，轻而易举地解除了营口中国驻军练军营的全部武装。

此后，营口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但营口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时有反抗，遭到日本特务、巡捕的镇压。据来我家小铺给日警买烟的“大衙门”杂役董桂林透露，被抓的人都是有来无回，或解到日本宪兵分遣队[②]或送到大石桥喂狼狗。

之二

魏景业

“九·一八”事变时，我在边业银行营口分行做职员。这个分行成立于当年7月，由于刚刚建立，办公地点是租借的（现人民银行后面）。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楼下有个小院，轮换着由两名守卫持枪把守着大门，院内还有个小车库，三间伙房。

1931年9月19日晨，天刚放亮的时候，我们照例起了床，打开窗户后，则发现了意外的情况：楼下的小车库、伙房的房顶上，站着一些头顶钢盔，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有的

① “大衙门”，原址尚在，即现营口海关路北的红砖三层楼，建于日俄战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营口人民的专政机构，拥有日警五六十人；华人巡捕、特务、腿子三四十名；马队一支，约二十匹，还有可收容关押人的班房。

② “宪兵分遣队”简称宪兵队，原址即现站前副食品商店西邻的红砖两层楼。

可能被我们开窗的所惊动，向我们投来了凶狠的目光。我们紧忙关上窗户，来到了副经理高仲平的办公室。刚打开门，又吓了一跳：一个日本军官正在屋内与高副经理说话。高副经理快步走出来，低声对我们说："不要随便走了，日本人把营口占了。"

我们回到宿舍时，于宝英、崔德新、陈济川等同事已凑到了一起，都面带惊慌的神色。凭感觉，我们知道现在发生的情况非同一般。

过了一会，我们几个结伙去吃早饭，发现每天站在大门两侧的银行的守卫不见了。那些日本兵仍然竖立在那里。一位同事还偷着指一个日本兵说："这个人好面熟呀。"还有的说："那个人以前和我儿子有过来往。"我们过后才知道，这些人大多是以前活动在营口市面上的"买卖鬼"临时穿上军装，成了军人。

上午，经理李元良来上班后，打了一通电话，告诉我们：日本人昨天晚上袭击了沈阳北大营，现在，把我们营口也占了，你们不要乱走了。这一天，我们也就没有出去，只敢从窗户向外张望，看到有的道口也被日本兵放了卡子，时而传来摩托车的突突声，我们的心也随之咚咚地跳个不停。

从这天起，街上的商店都关门了，我们边业银行也就随之停业了两个多月。

以上是"九·一八"事变当天我的所见，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

之三

杨际明

1931年9月19日，早6点钟，我由家到学校去，刚到东双桥子大街口时，就看见有3辆载重大汽车满载日本兵向西飞驰而去，笛声嘶叫，令人恐怖。我当时看此情景，心中怀疑，遂

跑至学校打电话。电话不通即派人到街上去打听，才知道大汽车先到营口练军营，正值该营李营长率大部士兵到田庄台演习，其余部分被日本兵缴械。然后分三路到营口县警察厅、渔业局等单位放置步哨，检查行人。约8点多钟日军到营口县政府（当时营口未设市）集会，召开县内各机关首长会议，到会的有营口县县长杨晋源、警察厅厅长白铭镇、渔业局局长李安人等。日本人宣布，各单位要各安职守，不许妄动，听候分配。散会后，将县长杨晋源、翻译孙金波带到新市街日本地方事务所去开会，这是第一天的情况。由此以后每天早7点钟即看见杨晋源和孙翻译坐小汽车到新市街去报告县内每日应行事宜，讨论营口县内各单位的人事问题。可见当时营口县内行政权是属于谁了。如此经过十几天后，营口县即行改组，除县长杨晋源照常留职外，另派日本人左川为参事会议长，还有日本人参事二人（都是新市街日本商人）。该参事长期驻县政府，掌握县内行政事宜。县内设有四局一科。

其他附属机关均设有日本人指导员一人至二人，唯警察局派有指导员五六名之多。各分局都派有日本人指导，这是事变后营口县政府机构的情况。

（摘自《营口县文史资料》第五辑）

“九·一八”在安东

林懋功

1931年9月18日夜11时许，侍者传来安东县政府电话，召开紧急会议。我（时任安东县教育局科长）立刻起床，趋步到

县府（今县前街利民商场）。出席的主要人员有：县财务局长于麟炳、县公安局长王颖、县教育局长李绍芳、市公安局代局长张汉威、鸭浑两江水上公安局长栾云奎、安东总商会长孙荣明、总商会理事袁华东、安东市肥料公司经理张学礼、木业公会会长白××、县总务科长兼外交科长黄福元、县财务局科长林铭绶等，约20人。

当我甫始入座，县长王介公向众宣告："刻间，日本领事来县告我，日本关东军业于晚10时占领省城（沈阳），安东驻军刻下也要进入中国市街，我和你以私人关系，先来通知你。你的意见怎样？"我答："以安东地方人民不流血为原则。"领事说："我也是这样看法。"我说："容我考虑一下，再通知与你。"领事说："现在已进入军事时期，我是无能为力的。"说着就告辞了。

此刻，全场人士，精神紧张起来，互相扫视。市公安局代局长张汉威，怒气冲冲，首先发言："我公安局500来人，豁上和他拚一下。"其次是总商会长孙荣明和理事袁华东发言："安东尽是商民，一旦发生冲突，胜败姑且不论，眼前损失，即不堪设想。"另一些人，则一旁推测：沈阳驻有重兵，日本是否敢冒风险？有的则说，安东虹桥交涉[1]，是一实例，你若敢干，他就老实了……。

县长王介公的主张是：事关大局，不是一个县所能解决的。暂保安东之安全，静观大局。几百警察，无济于事，徒自牺牲，于事无补。

正在议论中，外面传来日本军队已经开来，大门外架设机

[1] 虹桥交涉：虹桥今头道桥。1926年5月，为反对日帝强修虹桥，安东市2万多市民举行示威，推出各界代表22人进行交涉，迫使日帝不得不仍在原址，并由中日两方共同修筑。

枪，卫队缴械啦。县长慌忙带同黄科长前去应付。此外，市公安局代局长张汉威、县公安局长王颖、水上公安局长栾云奎、商会会长同理事等都从县政府后院，逾墙而走。教育局长李绍芳，他是国民党员，没等王县长的话说完，早已悄悄地溜走了，中途被日本宪兵队接去了。

时已19日凌晨3时矣，县政府内外，断绝出入。日本军人，气势汹汹，控制门口。黎明7时许，经县长交涉，由县政府派专员在大门口守候，认定是县职员，准予出入。

我回到教育局，首先掩藏秘密文件。一年来，省、县屡次下达文件，日本企图行动的指示。8时许，日本警察署的一名特务（朝鲜人）来局见我。问李局长的去向。接之，交出一份名单，上列各校长、教员的名字约三四十人，让我逐一作出鉴定：亲日，排日。我当时的答复是：各校长、教员，平日安心教学，既无亲日之表现，亦无排日之行动。一时难于判定，容我详细考察一下，再行告你。继之，日本宪兵、刑事、特务，此彼来去，观察情况，不一而足。

19日早8时，日本宪兵队长加藤，全副武装，乘坐吉普车，杀气腾腾，入驻县政府大客厅。同时，安上军用电话，发号施令。

日本士兵在中国电报局门口站着双岗。中国银行、东三省官银号、税捐局都由日本设岗把守。商号门半掩着，人们互相窃窃私语。只有小贩，如卖豆腐脑的，卖麻花烧饼的，照旧做生意。

从二道桥通往县政府的街道上，异常忙碌。日人架设电线的，安装电话的，日本电灯厂安装日本电灯的，自来水公司、瓦斯公司，挖掘马路，安装水管、瓦斯管的……日本军车，架着机枪，日军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汽车响出刺耳的喇叭尖叫声，

沿街梭巡。

19日凌晨，市内武装部门，全部被日军缴械占领。朝鲜人老少妇孺，成群结队，涌来市内观看。

10时许，日人将中国电灯厂（大沙河沿东坎子）机器全部拆卸，斯夜一片漆黑。

9月19日夜晚10时许，听有远处响起枪声。正在人心恐慌之时，以为朝鲜人又要过来了。及到天亮，传来消息，九道沟的宏聚永丝厂工人，为求安全（预防朝鲜人）上房顶了望，持木棒铁器等，被日军巡逻队发现，开枪射击，9名无辜工人被枪杀。20日，日本报纸发表号外，并附照片，诬为“持械反抗者”、“皇军又一胜利”云云。

从20日晨起，沿街见到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安民布告。内容大意：东北三省人民受军阀压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皇军本人道主义，除暴安良，驱逐张学良。大军所至，秋毫不犯，鸡犬不惊，各安生业，勿自慌恐云云。

为了稳住人心，王县长与日本宪兵队长加藤核商，打开中国银行的金库，发给公务人员9、10两个月的薪俸，公务员心情安定下来，22日，学校照常上课。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辽宁省教育厅便函，通知派专员去省县领重要文件（以前报省各职教员履历证件，审核入党资格）。同时收到锦州辽宁省政府教育厅训令：日本侵占东北，业经提交国联，听候解决，不得擅离职守，一切文件，呈锦州省政府。此后，再无文件往来。

徐铁珊入安东县政府，是安东县的一大转折。徐铁珊，名鏞，浙江绍兴人，汉文饱学之士，精通日语，口齿伶俐，为日人所赏识。曾在七道沟日本租界地内包办市场，人称徐总办。后任东边道交涉署外交科长。徐进入安东县政府后，始为顾问，常

以代表县长身份，出头露面。嗣后，竟成安东县政府的决策人。徐入县后，对于日本国策，熟览胸中，卖力实行。徐吸食鸦片，在客厅里陈设烟具，来访的要人，可以自由吸食。徐是整天一榻横陈，喷云吐雾。

约一个多月后，县政府改组为安东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下设六大处：总务处、财务处、教育处、警务处、水警处、实业处。原县长王介公任总务处长，徐铁珊任财务处长，原凤城驻军陆军第七团团长姜全我任警务处长，栾云奎为水警处长，王介公兼教育处长，实行处长一时无妥人，暂缺。原县总务科长兼外交科长黄福元，是县长王介公的翻译，与处长享受同等待遇。

11月1日，"安东县地方治安维持会"在县政府客厅举行成立典礼，参加人员县属各科、处、局长以上及市内机关法团首领约50人。由王县长致开幕词，日本宪兵队长加藤致贺词，内容是漫骂张学良，日本皇军是吊民伐罪，最后由徐铁珊领呼："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万岁"三唱。会后设宴席五桌（鸭江春）。在此情况下，饱尝亡国滋味，暗自悲伤。中国人除少数几个外，大都面色阴沉，举箸难咽。便衣特宪，横眉扫视。

安东县地方治安维持会建立，即缴销安东县政府旧印，由中央政府颁发的铜质县印，截角作废。从此，安东沦为日寇铁蹄之下，受尽凌辱，历尽灾难。

（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一辑）

“九·一八”日军入侵海城实录

刘程九

1931年“九·一八”事变，沈阳北大营硝烟未散的第二天，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一枪未放就侵占了辽南军事重地海城。当时县长是孙文敷（斗南），我任公安局督察长。

9月19日清晨，从日本站前（满铁“附属地”）的日军频繁调动及日本“居留民会”在乡军人的武装械备狺狺的目光中，已显露出这座古城的灾难即将来到。

9时许，县电报局叶省三局长匆匆赶来向孙县长报告：“打往奉天（沈阳）的电报、电话都不通了，据刚由沈阳归海的商人说省城昨夜已被日军占领……”。

城乡沉静，街巷行人稀少。南北大街所有的商号都仍关板闭户，连鲜果店、小食铺都没有开门营业。县府街拐角的素称消息灵通的“吉成福”杂货庄偶而打开一扇闸板，掌柜的、年青的交替探出头又缩回头，窥视街上三三五五的行人，窃窃耳语，莫不面呈惊慌、恐惧与不安。

街谈巷议，悄悄私语不外是：“日军要进城缴械了”、“商民要遭殃啦”、“说不定还要杀人哪”人心惶惶。也有的说：“咋办哪！县太爷该怎么办？瞧着吧！”

9点半，我将所见所闻及从各方面获得的情况，一一向孙县长汇报之后，县长闭目沉思片刻，终于决定下令：“立即召集部属”。各局（队）长、科股长到齐之后，孙县长面带忧伤沉痛地说：“目前局势大家可能知道，现在四面消息断绝，据说奉天城

已被日军占领了。日军蓄谋已久的野心终于得逞。唉！本县也将被接管。”接着他向全体官员宣布：各人暂按职守将经手文牍、账册清理一番即可各自归家，听候通知。然后命令公安局长崔文凯率其全部公安队，携带较好的枪支，暂驻城东20里的山地（现王石乡陈石村东）待机行动。城里可留少许行政警察，以维护治安。最后命令财务局赵立英（瑞严）局长：汇集所有公款，妥为放置。

傍午，接到白衣寺分驻所（与“附属地”交界处，现海城宾馆前）打来电话说：“日本军队和警察都全副武装进城了，还有‘在乡军人’……”孙县长立即令我把县衙正门打开，他一个人正襟危坐在大堂上（除我以外的官员已遣散一空）等候日军的到来，作了接受最大不幸的准备。

日军官兵、警宪、“在乡军人”一行60余人，中午由北门入城，首先沿街张贴出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的“安民布告”，足有两张对开报纸大。然后分4股：3股同时行动分别包围了公安局（县府东院）、公安队大队部（原火神庙街，现震兴东路）、公安一分局（尚王祠北侧）。1股直闯县府大堂，持枪威吓县长。孙县长仪态从容，不动声色，任其四壁搜索。

过午，另外3股日军纷纷携收缴枪械前来，在大院汇合，均报告城内枪械无多。这时随行的一个果子店的商人，不到30岁，是个“中国通”，这次作为日军引导兼翻译，人们遍称“三谷二小”，先用日本话再用中国话大声说：“城外学校还有枪。”指的是张学良创办的玉皇山下的同泽中学，那里有武装校警。日军遂即强令马上送缴。被迫前来用车送枪的人，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暴跳如雷，摔枪大骂：“为什么一枪不放就交枪？”未及三谷翻译，日军便将孙县长和公安局崔文凯匆匆架走，乘马车出北门直奔“附属地”老巢。北门外至白衣寺之间，卡哨林立，警

戒森严，禁止通行。

日军出城后，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一些人想要得到一些国难城灾的消息。也有人担心被架走官员的安全。街面一时呈现无政府混乱状态。

下午2时，我去内宅告知县长夫人肖氏：孙县长和崔局长已被日军架走。她听罢只是惊慌，无何主见。我只好顺日军的去迹，前去探听县长的下落。遂只身徒手经日本宪兵队、守备队、日警派出所，直到"附属地"的华商会。素有私交的会长贾博臣（《泰东日报》分社长）才告诉我："孙县长被胁迫到野炮联队去了。"我立即急奔北炮队。到门岗我写了个"我见县长"的纸条，交给卫兵。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人，他是商人，叫中山，我与其稍有旧识。我说明来意后，他一面指着从炮队大院里驰出的车痕马迹，一面用中国话说："县长已经坐马车回城了。"

果然，孙县长和崔局长，不到6点已回到县府。县长看到空荡荡的大院，凄零零的大堂，百感交集。刚进内宅，夫人劈头就问："你看见程九没有？"

"他上哪去了？"孙县长惊奇地问。

"他说去找你。"夫人答。

"上哪找我？北门外都戒严啦。这不是玩命吗？说不定被日本兵给扎死了。"孙县长一时焦急万分。

晚7时，我七拐八绕终于平安归来。简要陈述经过后，急切地询问了县长去野炮联队，是否遭到麻烦。孙县长说："那里的一个大佐让我协助皇军维持治安，并说官员可以照常上班。我说枪械都被贵军收缴，无法维持治安。那个大佐想了一下说：'好吧，借给你一些枪。'"（第二天还了几十支收缴去的长枪，枪筒上均用白铅油涂上了记号）。接着，孙县长怆然饮泣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国破家亡，人民涂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

之下，岂有完卵。我虽身为一县之长，守土有责，奈今人单势孤，徒唤奈何。唉！民众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了。亡国奴的滋味，今天我算尝到了。"说完令我当夜召集士绅及各界人士开会。

9点刚过，孙县长在会上道出了所以不能毅然一走的实情及贸然抵抗的主客观原因，表露出他对在任已近5年的第二故乡的留恋。同时也道出保境安民的决心，诚恳地向到会人士及全县民众保证说："有我孙文敷在，将尽一切努力，决不让海城民众遭受重大痛苦。"看样子，他对局势、对日军今后似乎要以消极的态度去应付和周旋。与会人士莫不深受感动，同时悲愤交集，有的士绅如辛子香、韩辑五等竟泣不成声。

散会后，秋夜沉寂，听不到烦挠人的秋虫鸣叫，只有孙县长和我两人辗侧难眠。深夜，孙县长霍地坐起，沉痛地说："程九，作为一个人，应该走人的道路。国家已经这样了，苦难迫近眉睫。日本人的凶残为我所久知，我辈不能甘陷水深火热之中，必须坚定救亡图存的决心，在日军铁蹄蹂躏之下，也应自奋抵抗，首先要唤起民众……，但这要付出重大的牺牲。程九，你能知我，你我亦能步调一致……具有此心，方不愧为人。"我连连点头："斗南，你知我，我知你，甘愿患难同赴。"

海城沦陷后一周，9月25日，孙县长密派公安局长崔文凯赴已撤到锦州的辽宁省政府请命。崔只身匹马经河西直奔锦州，与当时辽宁省警务处督察长熊飞会晤，报告日军入侵情况之后，得到的只是"暂时不动，听候命令"八字的口头指示。不久，锦州也相继沦陷。

孙文敷后调离海城，因"安东救国会"事件，惨遭日寇杀害。刑前高呼"打倒倭寇！"、"中华民国万岁！"

（高蒿整理并根据笔者亲见亲闻有所补充，摘自《海城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九·一八”事变当时盖平县的地方情况

叶剑忠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任盖平县职业学校校长。

1931年9月19日上午，盖平县县长辛广瑞用电话紧急召集全县机关首领会议。我放下电话便急趋赴会。甫入会场，见室内满满地挤了一层的人，会场气氛非常紧张，与会之人都是面色苍白，眼含酸泪，我很以为怪。站在我身旁的电话局长李甲三沉痛地低声告诉我：县方倾接日本关东军的警告，说今天午后2点，日本军队进攻盖平县城，实行占领。我听完这话，觉得一阵脑晕，全身发抖。认为亡国之惨祸，就在目前。这时，辛广瑞大发其词，他说南京政府的国策是欲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是集中兵力讨伐华北叛军石友三，对于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不抵抗主义，将靠国联代为解决。省政府早有明令，本县长奉命惟谨，坐守此邦，事事要听中央命令。尔等要深识大体，服从国令，都应一律服从日军接收，不得任意抗衡。在军警方面只许缴械改编和遣散。这完全是执行投降政策。于是开门揖盗，设酒迎凶，大摆欢迎宴。从此日起，全县人民就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了。

教育局长杨庆春，也更是小心翼翼地、惟慕惟谨地发表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他命令各中学校要切实管束学生，如有学生挑衅惹祸，拿该校校长是问。

散会之后，我和李景章、沈襄卿等几位中学校长互相商议了一下，就各自回校。回校后，我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校务会

议，传达了县长、局长的口头命令，并安慰了全校教师，要平心静气地服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然后，我就信步出校，想听听外面的情况，刚一进城，就看到各商号都上严了门板，再回头一看，西城墙上站了不少黄色的日本兵，正在鸣枪示威。县署门前，一群更为凶恶的日本兵也把机关枪架好。这时，县长、公安局长命令全城军警，谨慎小心地听候日军的接收、查点。

这时，我心似怀鹿七上八下，赶回校中，还得故示镇静，不能声张。教室里一团死气，老师和学生沉默不语。我回到办公室后，又接到县方的电话，内容是让学校挂牌放假。于是，训育课集合点名，会计课算帐找费，里里外外忙做一团。天黑以后，县方催逼更紧，限令各学校学生连夜出校，不准在城内逗留。这一夜，谁也没睡觉，天将破晓，学生都离校回乡了。安东（今丹东）籍的王开山老师也登车回去了，其余的本县老师也都整装返里。只剩下我和几位校役负留守看校之责。

9月21日，市面的情况又有了变化，落款"本庄繁"的关东军的布告贴满了四门，内容大意是把东北军阀的"残暴"臭骂一顿，把"皇军"的"救老济民"大肆恭维一番。当时街上是冷冷清清，很难见到一个行人。我在街上也不敢久留，回校后，藉酒消愁，一醉了之。约10时许，校役张维民从街上归来，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说：日本兵带来不少日本侨民前来查校，怎么办？我藉酒壮胆，说，这有何妨？就迎上前去。果然见日本兵手提刺枪，怒目而来，向我说三民主义拿来。这一句我还听得很清，我说三民主义烧了。他们就拉我上教室去翻，我说教室门封死了。他就逼张维民打破一个窗户钻了进去，结果没有找到三民主义。临走时还骂了一顿混蛋……

象这样亡国痛心的遭遇，我一生也不能忘掉。

当时的盖平县公安局长是位姓胡的（名字忘记）的开原人，

他在县长辛广瑞的监督下，把一座文化古老、经济繁荣的县城和地方优秀武装拱手交给了敌人。

我还记得在盖平西关中学的小东山上驻有一小队炮兵，拥有山炮两门，为守城之用。在栾队长的率领指挥下，偷偷地把炮运走了。

10月10日，我擅离学校，私自回家。我家住在县城西南的腰屯村，当夜，日军炮兵乘满火车在我村西北方停车一小时，向龙门汤发炮10余发。一声声巨响声震天地。时正夜间9时，村人已就寝。炮声惊起，四处逃避。我与家人同避于床下。翌日讯之，炮弹皆落入龙门汤温泉中。日军这次炮击的目标是地方称之为便衣队的一支抗日武装。便衣队的头领一是丁家生（二道河里沟雪帽山），一是野狼（绰号）。共带兵200余人，占据了龙门汤南山为根据地，经常向各处日军袭击。经过这次日军炮击之后，觉得难以在根据地站稳，就连夜撤军了。后来，在日伪两军夹攻之下，丁永生在熊岳东山三岔被牛德坤所包围，从容就义。临死前浩气冲天，大呼中国不亡。实可称为爱国烈士。

伪满盖平县警察所长高学本，为日本人卖命，杀死不少便衣队员，牛德坤也是屠杀义勇军的刽子手，后来皆被镇压。满天血债，一笔还清。

10月20日左右，我返回了盖县，辛广瑞在老商务会礼堂召集大会。大发牢骚地说，事变以来，以将及日，县城各机关胆小的都避难去了，胆大的在城内不是抢官就是夺印。辛为什么发这牢骚？是话中有话。原来盖平县有个在旧社会宦海失意的坏家伙，说他是地痞也好，是土豪劣绅也行。此人名叫刘冠三，曾在哈尔滨特区警察管理处，当过金荣柱的入幕之宾，为争权夺利，曾和金荣柱大起冲突，互相倾轧，成为当时社会宦海中的两个政敌。事变初，刘冠三在家赋闲，想借日本人势力，混

上一个伪满开国勋臣，作一番卖国功业。后来事败而死，侥幸没当上伪国汉奸。至于金荣柱，得天独厚，一帆风顺，不几年就扶摇直上，官至奉天省长，“荣升”为伪满一流大汉奸。

事变当时，刘冠三认为日本人占领东北是他当官的好机会，就弹冠相庆，想东山再起，尝一尝满洲国盖平县地方官的滋味，并把将来的“刘家天下”的全部新贵名录，做了一番安排。偏在这时，在盖平发生了一起“大案”；10月初，一位卖吗啡的日本浪人（名为山口）被杀，凶手在逃，一时难以结案。日军刚一进城就有日本人被杀，实可为“大案”了。辛广瑞当然是责无旁贷了。刘冠三在这时，便下井投石，说山口之死与辛广瑞有关。于是，大石桥守备队和警察所就责成辛限期破案，提回凶手，否则，就让辛广瑞偿命，移出来的县长位置给刘冠三作为酬劳。辛广瑞也确实知道他是被刘冠三陷害和中伤。当即下令捉拿刘冠三。刘闻声投到日警派出所恳求保护。事关生死，辛广瑞要求行渡，日警无法再做保护，不得不放出刘冠三，于是，刘为辛所擒获大堆子路西某商店后院。几经拷问，刘供出真情，山口案也真相大白。辛广瑞将刘冠三处死之后，保住了县长的官椅。

事后，辛广瑞在曾大发牢骚的地方——商务会礼堂大摆宴席，日方的大石桥守备队长和警宪长官等和全城士绅百余人出席，百余名妓女也落坐席间，灯红酒绿，热闹非凡，酒菜面前，那些中国人已经不知“国”为何物了。辛的这一活动无非是为了取日本人欢心，保自己的官位。

“九·一八”事变初，我抱着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想法，认为天下大乱，就在眼前，自以为大乱住乡、小乱住城。我还是回乡安排山中生活要紧。至于留守看校的事，推在几个校役身上，说给他们多准备点大米、白面就可以了。

另外，事变时日本人对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是十分注意的，10月下旬，日本兵到西关中学去检查，用刺刀挑开了张学赢老师的箱子，取出一本笔记，认为有反日嫌疑，当即逮捕，受尽酷刑，这一事实使教育界的人士受到很大威胁。

关于“九·一八”事变当时盖平县的地方情况，我所知道的今作以上记述，还请知情者加以补充。

（摘自《营口文史资料》）

郑家屯沦陷一瞥

崔翠华回忆　刘长顺整理

1931年9月18日，日本炮击沈阳北大营，占领了当时的东北首府沈阳，继而东北沦陷。

当时我在郑家屯的辽宁省立第四高级中学读书。事变消息传来，震动了郑家屯的人民，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尤其是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当晚大家聚集在学校，情绪激昂，慷慨陈词，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深憾东北军不予抵抗。

这天夜里，驻守在郑家屯城内的东北军裴团部队奉命撤退；也有些仁人志士不愿作亡国奴，悄悄整理行装，准备奔赴关内。辽源县庆余银号为不使货币资敌，在军警严密警戒下，把一堆堆纸币点燃焚毁，浓烟滚滚，火光照亮银号一条街。我从学校很晚回来，目睹这一切，感到怅然若失。

第二天早晨，我怀着十分沉痛苦闷的心情来到学校，见同学们在操场上、走廊里，三五成群，谈论着自己的见闻，一扫过去那种井然而欢快的气氛。

如怒如泣的钟声响了，同学们回到教室静候老师上课。平日笑容可掬、好开玩笑的陈老师仍穿着那件阴丹蓝士林布长衫走进教室。她今天脸上失去了素日的微笑，面容显得庄重严肃，操既浓重的唐山口音讲道："同学们，日本对我国东北觊觎已久，现已占领了沈阳，不期便会侵略我们郑家屯。我们不得不在这即将毕业的前夕分别。"说到这里，陈老师的声音忽而激扬起来："同学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是有血性的中国之青年，岂能听凭敌人的鞭打、宰割！中华民族历来是勇敢的，不屈于外侮的民族，国难当头，有志之士应当挺身而出，我们青年也要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尽到一个中国青年的义务……"。

陈老师的讲话，使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突然，一架敌机带着怪声俯冲而下，在低空盘旋。老师停止了讲话，同学们争着到窗前去看，飞机飞的很低，机身上的"红膏药"和螺旋浆的转动都清晰可见。敌机在城市上空大约盘旋15分钟才向南飞走。于是学校的林黎仁校长通知停课、疏散。同学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匆匆地离开了学校。

这一天，街市上许多店铺停了业，人心惶惶。夜里我辗转反侧，很久不能入睡，想着白天老师意味深长的讲话；想着今后自己的去向……

9月22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郑家屯这个古镇。清晨，我在睡梦中被隆隆的炮声惊醒，原来是日本侵略军不敢贸然闯进郑家屯，而是在火车站附近向距郑家屯城镇10余里处的东山连续发炮，同时又以重机枪对空射击，采取攻城先攻心的战术，企图震慑郑家屯人民。只见东山那边硝烟弥漫，烟柱直冲霄汉，爆炸声、机枪声响成一片，大有重兵压境之感。城内家家关门闭户，路上行人稀少。

近午，日本侵略军骑着马，挎着战刀，手里持着枪，在维

持会汉奸走狗的引导下，开进了郑家屯。城里的人们早已躲避起来了，那时我寄寓在马路头刘家大院（现在的玻璃纤维厂）妻子的舅父家中。当时爬到房上，趴在房顶上往大街上看，整个街市空荡荡的，唯有那些日本侵略军的骑兵队和汉奸走狗挨门挨户地敲门。

日军进城后，住在日本料理店——大红楼（现供电局）道南的大院里，以后又在现文化馆院内建立了宪兵队。从此，郑家屯就沦陷于日本的铁蹄下，直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郑家屯人民才从日寇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摘自《双辽文史资料》第三辑）

侵占长春、吉林

日军侵占长春、吉林经过

冯占海

日军攻占长春

“九·一八”事变时，吉林副司令长官兼省主席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参谋长熙洽代理军政大权。当日军在沈阳开始炮击北大营后不久，臧式毅用长途电话将日军进攻沈阳的

情况告知熙洽，最后臧式毅和熙洽两人曾用日语讲了一段话，说的什么内容不得而知。后又接到吉省驻沈阳办事处李树荪电话，也同样报告了沈阳被日军侵占的情况，未说完电话即中断。警耗传来，吉林市人心震动，这时因情况还不甚明了，熙洽似乎还抱着观望态度，并未作何举动，市面也未发生骚乱情况。

事变当时，长春驻军有吉、长警备司令兼第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所部。沈阳事变发生后不久，李桂林即奉到熙洽命令，令该旅除傅冠军一个营留驻二道沟外，其余全部避往双阳县境内。时长春南岭尚驻有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团长任玉山、炮兵第十团团长穆纯昌等部。

9月19日拂晓5时许，日军驻长春的多门师团的一部分部队，向我长春市铁北二道沟驻军第二十三旅傅营袭击。该营立即自发应战，营长傅冠军身受重伤（后因伤重牺牲），因敌众我寡，部分官兵被缴械，部分官兵撤出防地。

同时（19日拂晓）又有一部日军向长春南岭驻军穆纯昌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第五十团的营房偷袭围攻，我哨兵发现后，部分官兵起而应战，激战数小时，敌我互有伤亡。后来该两团接受熙洽命令撤退，炮兵团36门大炮及库存械弹等全被敌掠去，炮团官兵仅携带步枪退往市郊外40余里的新立城一带，以后由穆纯昌率全团官兵投敌。任玉山团有两个营（李辅臣营、张乐山营）撤至麦子沟一带，后来在榆树县作战后参加抗日军。日军得手后又分头向长春市各机关进袭，长春遂于19日陷于敌手。

另外，日军于19日上午又向长春车站进袭。吉长铁路警务段原有武装警察百余人，事先日军授意该警务总段长，假说点名，将全体官兵集合，以待日军。日军开到后首先开枪袭击，我警务段官兵奋起还击，因敌我距离甚近，战斗颇为剧烈，敌我

均伤亡不少。

长春被日军占领后，日军又以步、骑、炮各队在市内作军事示威行动，有时飞机在上空盘旋飞行，企图镇慑人心。同时日军又由公主岭调来数列车军队到长春郊外米沙子车站，以防我军哈尔滨方面部队南进向长春进攻。

长春市政处处长张书翰、公安局长修长余，原是两个亲日分子，长春沦陷后两人即积极为日寇效劳，到处奔走，同时熙洽也用电话嘱告他们和日寇取得密切联系，二人也不时向熙洽报告情况。日军占领长春后，对通往吉林市的电报、电话路线不但不加以破坏，反而进行保护，以便于利用熙洽向我南岭驻军下达不抵抗的命令。

熙洽出卖吉林

长春既陷，吉林省垣由于熙洽叛国降日，被日军不战而得。

熙洽是清朝皇族的近支（爱新觉罗氏），又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日军师团长多门二郎有师生关系（多门曾任士官学校教官），素有亲日倾向，更暗藏恢复清朝统治思想，妄想借日寇力量，恢复清朝政权。所以在日寇侵占长春后的翌日（9月20日），熙洽即派张燕卿（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携密函赴长春面见多门，表示甘心卖国投降。他得到多门的暗许后，即着手布置出卖吉林的叛国阴谋。

在熙洽未迎接日军到吉以前，省城原有驻军为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所辖步兵二十二团（团长刘宝麟）、三十三团（团长夏鸿谋），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所辖步兵三个营，骑兵一营，炮兵一营，迫击炮、重机枪、通信等各一连。9月20日下午，熙洽以副司令长官名义发出命令，略谓为了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各部队长应严约所部不得擅

自抗击，致使事件扩大，着驻省城各部队即时一律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当时各部队因不明真相，二十五旅全部遵命向乌拉街方面，卫队团全部遵令向永吉县官马山地区，分别退走待命。

先是，9月19日，熙洽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名义转下电文，略谓："未喻：日军侵占东北，我军应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等语，但此一电报并未写明来历。当日下午，熙洽来电话约我面谈，见面时熙洽说："日军因中村大尉事件和柳条沟事件，已占领沈阳市，同时于19日晨日军又因长春万宝山事件，已占领长春。你应率部队整装待命。"

我当时即向熙洽建议说："应当命令驻长春、吉林各部队向日寇反击。"熙说："我奉电令避免冲突，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我问熙："此系奉到何人电令？"熙说："此电发电人不准传达姓名，此时不便告知，日后你会知道。你不需派兵出去迎击。"

20日下午，熙又来电话约我见面，见面时，熙问我："你接到退出城外命令了吗？"我答："接到了。"熙又问："驻省城部队应迅速撤出城外待命。"我问熙："日军未到，因何将部队撤出省城？"熙说："我准备跟日本军交涉，和平解决吉林事件。"我又问："如要和平交涉，为何不到长春去交涉？"熙答："派不出合适的人去。"熙又说："我拟约多门师团长带少数军队到吉林来谈判。"我问熙："如果日军到吉林谈判后不撤兵，怎么办？"熙说："日本人不会不守信用。"我激愤地说："日寇侵占我国土，我们可以命令部队抵抗、打他。"熙急忙说。"年青人光凭血气，太不量力，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少数军队妄自发生冲突，是以卵击石，徒使事件扩大。现所有军队应即本着命令撤出城外数十里待命。"熙当时又说："你给我留下二个连暂时负保卫两署警卫之责，并将徐文田

营长留下（因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即同意将徐文田营长带领第三连连长刘济宾、第四连连长林甲春留于省城。熙又说：“你这就将徐营长找来，当面命令他暂时在省城直接听我指挥。”当时我就将徐文田营长找来，嘱他听熙的直接指挥，而后我就率全队撤出省城。临走时，我问熙：“万一谈判不成，应怎么办？”我问到此处，熙装着十分痛心样子说：“万一谈判不成，我单人找你，领你们一起抗日。我个人为了国家，生死存亡已置之度外。”

我当时受了熙逆蒙蔽，即率队退出城外。

当日寇进占吉林以前，我省一些工人、学生和爱国群众，激于义愤，张贴标语，高呼口号，宣传反对日寇侵略我东北，要求军队起来抵抗日本，保卫国土，并表示愿作后盾。因当时熙逆投敌真相未露，所以群众尚未能提出打倒熙逆等卖国贼的口号。

9月21日，熙洽召集省城各厅、处、科主要负责人开会，声称不日约多门师团长到吉林市，和平交涉吉省的中日事件。当时省府委员诚允说：“约日军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非常危险。”熙洽坚决不同意，诚允即时退出会场前往哈尔滨。省府秘书长潘鹗年也不同意约日军到吉林，熙洽亦置之不理。潘是当时的抗日派人物，吉林伪组织成立后，他曾送熙菊花两盆，并写诗两首，讽劝其不要变节，熙颇为不满。潘后不辞而别，离吉去哈。此外尚有实业厅长马德恩等亦不同意日军到吉市，劝熙洽多加思考。此时只有建设厅长孙其昌、吉海铁路总办李铭书、前第十五师参谋长郭恩霖等10余名亲日派附和熙洽“日军打不得，和平交涉为上策”的谬论。

9月22日晨，熙洽找徐文田营长面谈。熙说：“你带的这二连兵，即时撤出城外，归回原团建制”，并说：“你见到冯团长

时，告诉他省城安静，经过与日领事交涉，可望找到和平解决吉林事件的途径。”

徐文田于9月23日晨，率兵二连返回官马山防地。徐与我见面时告诉我说：“熙洽这两天与日领事会见频繁，会后面带喜色，他在最后二次会晤日领事时，不用翻译，用日语密谈，态度很不正常。他每逢会见领事时，告诉我在客厅周围派兵警卫，严禁外人往来行走。9月21日熙洽会见日领事时，我在客厅门外窃听，听到日领事问熙洽：‘省城内怎么还留武装部队和警察？’熙回答说：‘省城只有二连，暂时警卫两署，武装警察也只是少数，大部分已撤出城外。’并说：‘这些部队我准备在多门师团长到吉市前夕，命令他们撤出城外。’日领事问：‘吉省所有部队能听从你的命令吗？’熙答：‘多数还能听我的命令。现有两署机构必须撤销改组，重立新机构。’日领事回答说：‘象这样事情，等候多门师团长会面时再行商谈确定。’”后徐对我说：“看熙洽的举动行为，很可疑。”我当即打电话到省府讯问情况，得悉日军在2小时内就要来到吉林市。

吉林伪组织的出现

到了9月23日下午①，熙洽竟派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张燕卿、军官教练处总办齐知政等，陪同日寇多门师团长所带天野旅团部队进入吉林，接着就分别占据省垣重要机关，并掠夺官银号大批库银和军械厂原存大批枪弹。

当晚，熙与多门会面后，即接受多门指示，将旧省政府、司令长官公署一律撤销，成立伪组织。第二天熙洽即又召集省议会、商务会和各厅负责人开会，当场宣称已经与日军交涉妥协，

① 作者回忆有误，日军侵占吉林市为9月21日。

为了免去战祸，将原有军政两署撤销，合并成立一个“吉林长官公署”，胡说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中日事件和平解决后，仍请“帅座”（指张作相）回任，请大家推举长官人选。到会人员中，亲日派孙其昌10余人高声拥熙任长官。当时虽然有些人心中不满，因恐遭不测，亦不得不表示赞成。至此，熙洽就出任了伪吉林省长官，并将原省府改为一厅制，即民政厅，任李铭书为伪厅长；原有司令长官公署各处取消，改为军令厅，任郭恩霖为伪军令厅厅长。

熙洽于9月25日又召集各法团及厅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就伪长官职，并宣布旧有法令不合新政府要求，以后一切听从新政府命令。会后熙洽即发出通电，大意谓：为了吉省安宁，免遭战祸，经各界推为吉省长官，即将旧有军政两署撤销，所有各部队长、各县长、各公安局长、保安总队长，应继续维持治安，不得擅离职守。电到之日，应各自权衡，共济时艰，何去何从，应表明态度，等语。

此电发出后，凡迟迟未表示态度者，均被撤职。如驻哈市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被撤后，任宋宇之为伪旅长。二十八旅旅长丁超被撤后，任白文清为伪旅长。吉林省警务处长王之佑被撤后，任赵汝梅为伪警务处长。直到李杜率各部抗日军到哈市后，邢、王、丁三人始行复职，邢参加抗日，丁、王二人，一度参加抗日自卫军，后亦投敌。

熙洽成立伪政府后，吉市中学大部分自动停课，表示反抗，一部分学生参加抗日军，一部分到外县躲避或赴北京，其余部分学生，直至翌年春始行复课。日寇宪兵昼夜搜查枪支，并迫害抗日爱国人士。日军天野旅团长带领步、骑、炮和坦克部队，在城内主要路线行军示威，并有多数飞机在城上空盘旋飞行。省城商民极为惶恐不安，商店多数关闭，群众对熙洽叛国，极为

痛恨。外县爱国群众和学生纷纷起来自动组织了救国军、抗日军、讨逆军，有的数十名，有的数百名，有的千余人。有的农民放弃收割，以作消极抵抗，直至年底，地里尚有高粱、谷子等作物，无人收割。

熙洽的诱降活动

熙洽甘心降敌以后，一面派员对我团威胁利诱，一面令日军骑兵进占口前车站，与我团官马山的骑兵对峙。双方不时发生接触，但因敌人妄想诱降，故尚无大冲突。熙逆在9月24日前后曾三次派人到官马山对我团驻军威胁利诱：第一次派永吉县长关荫轩持熙逆亲笔函劝降，大意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应忍辱负痛，勿与日军发生冲突，免将事件扩大。兹任你为吉海护路司令职务，应听从新政府命令"等语。第二次又派伪司令长官公署参议杨沛然持函前来威胁，大意谓："日军屡次准备向你进攻，均被我劝阻，你应祸福相权，当机立断，率部返回省城，今改任你为省城警备司令职务，并保护你生命财产绝对安全。余与你有师生关系，决不食言"等语。第三次派艾乃芳携熙函前来劝降，略谓"传闻你有意准备向日反击，日军已得到情报。日军嘱我转如果你向日军抗击，则将吉林市人民洗光。倘若如此，则应告你，由你个人负责。希望你念及省城百姓灾难，速即解除兵柄。如不愿就官职，可送往日本留学，先发给数万元留学费用，以后一切费用由政府负责"等语。

我对熙逆先后派员威胁利诱劝我投降，均严词加以拒绝。我部全体官兵对熙逆甘心投敌卖国的行为，深为愤慨，人人切齿，一致表示要抗日讨逆，誓死不屈。至是我军即将原有部队正式改编为抗日军。

9月24日，熙逆曾派前第十五师参谋长郭恩霖、参谋处长

佟衡携熙逆劝降书到乌拉街二十五旅防地诱降。三十二团团长刘宝麟、三十三团团长夏鸿谋各率所部的一部投降，其余部分官兵不听伪命，撤至榆树县。军官教练处总队和原有省城公安武装保安队等部队，经熙逆派齐知政前往劝降后，这些部队也都附逆。此后在吉林即展开了抗日讨逆的斗争。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长春、吉林沦陷片断

马树棠

9月18日晚，日寇占领了沈阳；19日拂晓，进占长春；21日晚，吉林又告沦陷。当时我兼任长春和吉林两地的无线电台台长，亲眼看到并听到两地沦陷情况，兹叙述如下：

“九·一八”之夜，长春无线电台向沈阳电台联系通讯，一夜未能叫通，拂晓始知沈阳失守，同时日军多门师团长所率领的北上部队也到了长春，这并不足以说明日军进军神速，实际上是蒋记政府不抵抗主义帮了它的大忙。当时，沈阳到长春为南满线的一部分属于日本管辖，距离不过300公里，急行车5小时即可到达，平日皇姑屯、公主岭、四平街、铁岭、开原直到长春，各站都驻有日军守备队。日军既掌握了该线的通讯运输，又因占领沈阳未遭到任何抵抗，所以夜间分兵，拂晓便进占长春，占据了各机关和驻军营地，如永衡官银号、中交银行、镇守使署、道尹公署、县署、长春无线电台、护路军营和南岭驻军防地均被占据。日军对驻军防地最为注意。他们进占无线电台的情况如下：

一、驻长春二道沟哈绥线护路军一营，营长傅冠军夜间到市区公干，拂晓前回营，通过日军步哨线时，被日兵开枪打死，[1]日军乘机袭取二道沟，将傅营全部缴械，自此枪声四起，交通断绝。

二、南岭系东北吉林军防地，这时驻有吉林陆军第十五师步兵二十七团（团长张某）、炮兵第十五团（团长穆纯昌，包括野炮两营、山炮一营）和一个辎重营。当日军进袭长春时，夜间分兵一部到南岭驻军附近，举行夜间演习，突然包围吉林军营房，袭击驻军，限令全部缴械。所幸尚在夜间，电话线未破坏，因此穆、张两位团长急用电话联系，请示吉林军署熙洽参谋长（当时张作相因父丧在锦州）说：日军突然包围我军防地，悍然开枪射击，为自卫计，请准予开枪还击，否则无法维持军心。熙洽复电说：上方已请示过中央，坚不许可还击，恐惹起国际交涉；叫士兵们听候命令。两团长接电后，叫士兵在营房里静坐等候命令。然日军围攻甚急，机枪声和迫击炮声不绝。这时士兵怒不可遏，争说与其等死，不如拚命。遂冒弹雨砸开库房铁锁，取出弹药。就在砸锁的一瞬间，即被射杀10余人。步二十七团士兵领取子弹后，开枪还击，猛向日军反攻。在重重包围之下，连续冲锋三次，然未能冲出。这时炮兵团长穆纯昌下令撤退，向吉林方面集结。炮兵第三营营长张瑞福，因走脱不开，急迫中抗拒团长命令，亲率山炮布置放列，用零线子母弹开炮还击，仅10余发，击毙击伤日军多人，将敌击退。驻南岭吉军部队始得安然撤退。我到吉林时，与穆团长及张营长会晤，得知其经过。

三、日军是在9月19日下午3点钟占据长春无线电台的。

① 关于傅冠军身受重伤、后阵亡的情况，作者所述与冯占海等人回忆有出入。

当日下午2时，我奉吉军署熙洽电召，乘吉长客车（当时尚能通车）赴吉林。临行时召集全体报务员讲话：情势紧急万分，请大家特别注意，报房里的来去转官商电报存根，务必收藏起来或是烧掉，还有字纸篓内的碎纸也要烧毁。可是他们在慌乱中未能照办，我走后不到一小时，即午后3时，日军混成步兵连，突然包围电台，因惧台内驻有吉林军而停留不前，旋派翻译马显图率军人向内搜索前进，看到并无吉军驻守，日军才进至发电机室、硫酸电瓶室、收发电报电机室搜查几遍，把报务员王春圃、赵东藩、董梅生、李庆玉、陈淑石、徐士杰和技师王瑞生等押在一屋，又在报房中搜出电报存根，于是将他们7人排成一列，倒捆双臂，每两名日兵押解一人，徒步走到头道沟日军宪兵司令部，情同犯人，遇有熟人，都掩面走避。到日宪司令部后，早备有审讯的安排，案前设有宰猪槽一具，牛耳尖刀两把，还有持刺刀和持手枪之士兵站列两旁，威胁恫吓，分别审问，问是去哪里的电报。其中机智的，都说是商家电报，遂不问，都一一押问。惟问到徐士杰，他说出其中有官电，日军一听即怒，唯恐其中有调兵遣将来打日军的电报，立刻施加恫吓，令徐士杰译出，徐答须用密码本，又押徐回电台，找出密码本，回宪兵队译出。原来是我在长春即将沦陷之前，密拍给锦州张作相的官电，内容是：9月19日拂晓日军占领长春，二道沟傅营被解决，南岭驻军撤退，长春各机关已被日军控制，市面人心惶惶，交通断绝等。日军得知不是调兵电报，始回嗔作喜，仍将徐押入禁锢室内，因门矮须低头，日兵趁此上头一推，底下一脚，把徐踹倒在室内。徐苏醒后，发现满身沾染鲜血，始知被踹倒在被害者的血泊中，并且知道自己也要遇害。正惊疑间，适日兵送来饭盒，徐把饭盒踢在尿桶里，日兵怕他寻死，又进来搜出纸烟和火柴，当即拿走，直到后半夜才把他放出，发给

通行证，仍叫回电台，有事随时报告可以领赏。这时电台全部机器已被拆走，日军也不留人看管，被捕之报务员随后放回电台。

9月19日下午2时，我搭吉长客车去吉林。5时到达，径去军署见熙洽参谋长，看到文武各要人正在开会。熙洽对我说，你来得正好，准备随时向哈尔滨、北京通讯（那时吉林电台规模小，向北京通讯须转哈尔滨），又询问长春情况。我把日军占长春情况叙说一遍，并预计说：两三天内，日军必推进吉林，我方应派兵在土们岭一带构筑防御阵地，相机出击敌人。见大家都默默无言，我便退出去准备通讯去了。20日晨9时，有敌机一架，在空中盘旋侦察，下午3点又发现一架飞机盘旋侦察，即将以上情况报告军署和在北京的张学良副司令。9月21日晨，日军多门师团混合列车一支队，10时从长春出发向吉林开进，一面试探侦查，一面前进。从长春到吉林仅120公里，而日军这次进军却比从沈阳到长春慢多了，因为吉长线和沈长线不同，不属日军管辖。途中熙洽派参议安瑞珊婉劝日军不要进城。多门说：他奉命令非进吉林城里不可。当晚到吉林时，多门住车站附近的名古屋旅馆，他让安瑞珊带信回去，让熙洽参谋长到旅馆开会，安归报熙。这时我也到了军署，听了安的报告，得知上述实情。只见偌大一个参谋处境阒无一人。熙洽神色惆怅，仅有日文翻译刘燏芬在侧。当晚熙偕同刘燏芬和副官搭汽车前往车站名古屋旅馆见多门。多门对熙洽说：张作相不在，你就当吉林省长。熙洽表示不接受。多门说："叫你当省长你就当，否则对你不客气，限你几分钟考虑。"良久未见答复，多门勃然大怒，掏出手枪，对准熙胸膛，气势汹汹地说："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就立即处死！"以后经刘燏芬从旁劝解，熙洽便答应了多门的要求，担任了吉林省长，投降日寇当了汉奸，吉林遂告沦

陷。我将以上情形，及时电报哈尔滨电业局徐士达局长，转报北京张学良副司令和在锦州的张作相（关于熙洽和多门会见情况是听到熙洽本人和他的副官亲口说出的）。

当晚8时许，日军已开始侵入吉林，从东站下车，派尖兵搜索前进，以次占领通天街、牛马行和各机关。吉林电台在建设厅前靠松花江沿，我早派有了望哨。及至日军侵占建设厅后，我发出最后一份电报说：吉林沦陷，从此不能通讯。遂将机器撤走，抬到江沿埋藏起来。翌晨（22日），我看到日军对穿军服的人任意杀戮，有些老百姓也因穿破旧军服而被杀。以后我穿便服乘客车抵长春，回到家里。听说我去后，当天下午3点，电台被日寇占据，搜查各室并把全体职员带走，并拆走电台全部机器。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日军侵占长春见闻

王稔五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正在长春任"泰东日报"驻长春分社长的职务（该报系日人在大连出版的报纸），对于事变前后日军侵占长春地区的情形，回忆所见所闻，概述如下：

敌军阴谋进攻，我方毫无戒备

满铁沿线的日本驻屯军，经常在铁路用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已属司空见惯之事。虽然也有时把预定演习的时间和地点通知我方，说是实弹演习射击，请转告居民勿为惊疑，但是

事情长了也就没有引人注意。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几天，驻长春的日本军三十八联队，又在头道沟铁路用地的街道巷口，如临大敌一样堆积沙袋，装设铁丝网，修筑工事忙碌异常，人们认为又要进行什么军事演习，也就照常不加理会。至于地方军政当局，虽然也都知道当前的中、日关系颇为恶化，形势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总是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我们事事退让不去惹它，或不至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地方当局，曾经时常告诫所属，无事不要到头道沟附属地去闲游，以免发生事端。在这种情况下，当敌人无所顾忌地修筑工事，显然别有企图的时候，也还是熟视无睹。于是长春的“九·一八”，也就同沈阳一样，是处在事前不加戒备，事后不予反抗的情况下沦陷的。

在不抵抗命令下断送了长春

“九·一八”事变当时，日军在长春头道沟西大营只驻有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而我军在长春南岭驻有东北炮兵第十团穆纯昌团，步兵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任玉山团和一个辎重营，二道沟驻有步兵第二十三旅六六三团一个营。此外城内还有一个机枪连。不但是在数量上比日军多，而且在配备上也非常完备，尤其是如穆纯昌所部的南岭炮兵独立团，素称为东北军的精华，装备武器都很完备。这样的实力是会引起日本军的极大注意的。所以在日军发动事变时，事先就把它驻在公主岭的骑兵调来长春，配合驻长春的三十八联队共同行动。当日（9月18日）午夜，驻公主岭的日军骑兵，急行军赶到长春，由大岛联队长统一指挥，配合三十八联队开进南岭我军的驻区，向我军炮兵团和步兵团采取全面围攻的阵势。同时又抽调部分兵力，开往二道沟偷袭我步兵营。日军这样的布置，我南岭和二道沟的

驻军事前竟毫无戒备，当时都安然进入梦乡。及至哨兵发觉得到报告时，日军已逼近营房。二道沟驻军步兵傅冠军营长，得到哨兵报告还不肯深信，竟打开门灯向外张望，恰好给包围在墙外的日军找到瞄准的目标，枪声响处傅营长受重伤，同时阵亡炮兵连附一人，伤亡士兵数十人。营长既伤，所部就乱成一团。子弹库同时已被日军机枪封锁，想要应战已不可能，只好徒手空拳向外突围，以致遭到大量杀伤。

南岭驻军炮兵穆团长和步兵任团长，得到哨兵的报告后，立即电话请示吉林，当时东北边防军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兼主席张作相因父丧回原籍锦州，参谋长熙洽代行职务，竟向穆、任二团长指示说："急速撤走，不准抵抗。"当时两团官兵，虽然群情激愤，愿决死战，无奈重武器库已为日军所控制，只好携带少数的轻武器（多数官兵是赤手空拳），冒死突围且战且走，死伤非常惨重。后来炮兵团撤至距长春40余里的新立城，步兵团撤到长春东稗子沟，而大炮36门及库存弹药粮秣悉被日军掠获。

周斗钦、修长余屈膝投敌

当日军于9月18日深夜，开始向我南岭、二道沟两地驻军进行包围时，城内居民都正在睡梦中，拂晓（19日），因我军向外突围始闻枪声，还认为日军又在举行什么实弹演习，并未疑及其它。晨起，路上行人议论纷纭，不知发生什么事故，群相惊疑。我从三马路住所走向头道沟，在七马路口（头道沟和城内的交界地），才发现有日本军警在把守，不准任何人通行。上午11时左右，我到城内市公安局访问修长余局长，得到以下一些情况：

满铁沿线日军驻军，在昨夜全面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详细情况和原因现在不明。

长春市政筹备处周斗钦请示吉林省当局，熙洽参谋长电话指示说："不准抵抗"。

周斗钦命修长余到日本领事馆探询真相，同时向日方通知：长春市坚决执行吉林指示的"不抵抗"的命令。修长余在日本领事馆见到田代领事，田代对我方采取不抵抗政策表示满意。认为这样，则事件不致扩大。并且派臧本书记生和修长余同到南岭会见大岛联队长。大岛说："南岭、二道沟的军事行动即将结束，剩下的还有驻在城内的马团的一个步兵营，希望能立即撤走，不然将采取行动"。大岛又表示，只要城内我方的军事力量全部撤走，日军可以不开进城内。城内秩序要以公安局现有的武装力量负责维持。修长余对大岛表示，为了城内免遭战火，他决定劝说马团立即撤出，并坚决负责维持城内的治安，保证不发生有伤中日感情的任何事件。大岛表示满意。

当日（19日）夜里，马锡麟团长不得不率领所部一营的全体官兵移向乌拉街，原有的一营驻防地（不久马团长归附熙洽的伪组织，建立吉林伪军第三旅任旅长）。就这样，不到一天的工夫，所有长春地区的我方驻军，在日军偷袭威逼之下，撤走一空。修长余即带领原有不足800名的公安部队，在日本宪兵监视下，维持市面治安。城内和头道沟的交通，中断不到几小时就恢复了正常。而在周斗钦、修长余的屈膝降敌的情况下，长春市的行政机关竟也依旧照常上班，工厂、商店保持完全营业，一如从前。

熙洽认为修长余在这次事变中维持长春市面有功，所以在他组成吉林伪政府之后，就提升修长余任吉林全省警务处长。

翌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修长余转任伪首都（长春）警察总监后，赵汝梅继任吉林警务处长职。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回忆日军侵占长春的情况

田芝年

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当我就寝不久的时候，忽然听从到西北边和正南边传来机关枪的声音。枪声连续不断，显然不同于往常日军的打靶演习。听了一会，我就起身走到邻居一位公安局会计科长王执中的住处，我问他，今晚的枪声怎么这样响呢？他说，情况很不好，方才局里来电话说，今晚日本鬼子在沈阳长春各处向我发动了武装进攻。看情形事态要扩大，现正在南岭和二道沟兵营附近开火。当时我因担任着益通银行副经理和市商会常务委员职务，对行里和市面都负有责任，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就在家呆不住了。那时市商会的常务委员有5人，孙大有休病假，在长春的有史焕亭、董树堂、杨连芳和我，会长由史焕亭代理，因此我急忙跑回自己屋里，告诉家人，等我出去以后，要将大门关好，别让外人进来，也别出去，一切要加小心。我出了街，由东边胡同走较为僻静的道路，东经二马路到四道街的市商会。此时天已黎明，街上秩序尚未显出纷乱现象，行人稀少。我到市商会后，见人们正在沉睡，坐办史清心仍在卧睡。我唤醒他们，并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他们后，他们都表现出惊疑不定的神气。我当时嘱咐他们赶紧召集常务委员开紧急会议，来商讨应付办法。然后我又到南大街三道街口益通银行里，人们也多未起床。我催促经理马益堂速作应急准备，将一切重要钱款账目等收藏起来，并预备一些麻袋装土，将所有门窗堵塞，以防歹人抢劫放火等危险。布置完

后，我又回到市商会，见各常委都到齐了，大家商议了半天，都提不出什么好的办法。这时外面枪声更激烈，情况还是难明，估计南岭和二道沟两处的驻军如果阻止不住日军的进攻，那就会很快地打进市街，那时，全市工商业者的生命财产都会发生危险。大家最后乃决定派代表去找公安局负责人商量设法保护安全，并探听一些情况。

大家推我和代理会长史焕亭出头接洽。当我们到了公安局，见到局长修长余后，见他正在手执电话耳机不断向各处打电话。他一会儿接通二道沟，一会儿接通南岭，一会儿又向吉林市副司令长官公署打电话，非常忙碌。当时据二道沟来电话报告说：那里已经发生冲突了，营长傅冠军已受重伤，许多士兵阵亡。又说：稽查处处长孙仁轩因为给日军送信请和被士兵打伤了。这样几次电话后就沉寂了。据南岭方面来电话说：南岭炮兵团的一团兵已经被日军打散了。我们一再追问修长余吉林市方面的电话请示怎样。他说熙代长官指示要忍耐，不要抵抗。还指示说要等候派杨参谋长来长春处理等事。我们当时看情形省方已有决心不去抵抗，在这里当然也研究不出什么办法，乃约同修长余去找市政筹备处处长周斗钦。认为他是长春地方的首长又兼外交特派员，守土保商均有责任。可是当我们见他以后，他表示说：日寇蛮横无理，擅挑衅端，他是文官想不出对付办法。我们对他说，你是地方长官，守土保民有责，又是外交特派员，对此事有向日本领事馆谈判的必要。周斗钦遂又和修长余一同去见日本驻长领事田代。修长余会说几句半语子的日本话，他们是请日领事馆秘书藏本先打个招呼之后，才去见田代。田代支吾其词地说，这是关东军人闹的，他没办法给联系。这时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已到长春（平日日军驻长部队首长是大岛队长），他们又一同去见多门。据说，他们会见后，周斗钦曾向多

门质问为何擅挑衅端，发动战事。但修长余既未给翻译，反将他得到熙洽指示不要抵抗的话告诉了多门。因此多门得到底蕴，就张狂地说，既然不抵抗，就应当把在长春的所有机关交出来，才能不打。周斗钦修长余向多门表示投降。修长余竟无耻地假意向多门请求辞职，多门即命令他继续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须接受由日军派出的宪兵队驻在监督。然后即派修长余和日宪兵队长坂野一同到南岭宣布停火。修长余回到公安局向我们说了以上情况后，即同坂野去南岭了。

当我们在公安局时，曾经看到长春县长马仲援来了。马仲援是熙洽的妹夫，又是万宝山事件的祸首，他来到公安局时表现出仓惶失措的样子几乎是面无人色。呆呆地坐了一会也就无精打采地走了。当时我看到这几个地方负责当局，什么市政筹备处长啦，什么公安局长啦，什么县长啦，都是这样脓包，甘做汉奸奴才，真是令人气愤。我回到商会后，把所见所闻的事情向大家传达了之后，又到行里看看，就回家了。到傍晚的时候，市商会来电话让我到市政筹备处去开会。当时我因满街都是日军在活动，单人外出恐有危险，遂请史焕亭会长带人打着有商会街的灯笼去参加会议，这样容易使日军了解放行。第二天，听史焕亭说，昨夜在会上由周斗钦宣布说是双方停火了，地方治安由修长余负责，让工商业者各安生理，勿自惊扰等情，从此以后果然就不见周斗钦的影子了。据说后来周斗钦和马仲援都当了汉奸了。

在事变发生的当时，驻长春的部队，是由吉长警备司令兼第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统率的。部队中有驻在南岭的东北炮兵第十团，团长是穆纯昌，步兵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团长任玉山等部。驻在二道沟的是第二十三旅六六三团傅冠军营。此外还有辎重营、弹药库都在南岭。据说平时在南岭的部队，都由

团长命令平时不得开火，枪械经常入库封锁，将炮闩拆下来另行放置，不和炮身放在一起。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当19日拂晓，日军向南岭袭击时，当时两个团长都不在团部，这时士兵仓促间虽然气愤，但没有办法，有的士兵从库里抢出一些枪支和日军抵抗，激战数小时，敌我互有伤亡。传说我军伤亡四百多人，日军伤亡百余人。事后据陆军医生王瑞麟说，在次日用汽车运到医院的伤兵有270余人，战死的都由商会常委董树堂带人掩埋了。驻在二道沟的傅营遭到袭击后，立即自发应战，颇有伤亡。营长傅冠军身受重伤，后因伤重牺牲。还有马二团的留守处在长春。当我们在公安局时，听到团长马梦熊给修长余打电话问怎么办。修长余竟叫他把破烂枪械准备好等候交出，把好的枪械让士兵携带出去。事后，听说各部队都按照熙洽的命令，撤离长春。炮兵团撤至距长春40余里的新立城，步兵团撤至长春东稗子沟。后由穆纯昌率全团官兵投敌。任玉山团有两个营（李辅臣营、张乐山营）在榆树作战后参加抗日军，我炮兵团的36门大炮及库存械弹粮秣悉被日军掠获，市内的陆军医院、被服厂以及所有军事机关也全被日军占领。

修长余既然甘愿为日军效劳，日军就派出宪兵队分别进占全市的政府机关，并由公安部队维持地方治安。长春市就在这一天的几小时内轻易地被日军武装占领。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关东军侵占长春经过*

一、长春时代的新京

事变前驻在当地的日本军队有大岛第四联队的两个大队（长谷部第三旅团所属）、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的一个中队（大队长小河原中佐，大队队部设在公主岭），总兵力1 000名，保卫着铁路和约一万名日本人的生命财产。

二、事变前夕的中国军队及其态度

1. 南岭中国兵营。该兵营设于清朝咸丰年（八、九、十年前），后经扩建共驻步、骑、炮兵约1 000人，曹锟和吴佩孚曾一度在此分别担任团长和营长。从大正14年起以三年时间进行营舍的大规模扩建，可容纳兵员1万人。事变前拥有兵员4 500人，称为边防军，堪称东北陆军之精锐。其中包括有：

步兵：2 500名（边防军步兵第六百七十一团），机关枪9挺、迫击炮6门、平射炮6门。

炮兵：1 370名，炮36门（边防军炮兵第十九团）。

辎重兵：970人，汽车8台。

2. 吉林省防军。城内驻有以吉长镇守使李桂林中将为旅长的，相当于日本旅团司令部和联队本部的机关。此外还有：

1个山炮中队，4门。

1个迫击炮中队，4门。

---

* 此件摘译自满铁新京图书馆编《关于南岭和宽城子战斗》。

1 个机关枪中队，6 挺。

吉林省防军总计约700 人。

3. 宽城子兵营。在离城北方二公里处的宽城子，驻有步兵一百六十三团第二营约650 名边防军步兵。兵营是俄式砖瓦建筑，周围有厚达50 公分的防护墙。这里曾经是俄国兵营，出兵西伯利亚时，我守备军也曾驻此地。

三、满洲事变的爆发

1. 9 月19 日午夜零时30 分，当时驻长春的长谷部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和独立守务队都接到长春铁道事务所的电话，报告"奉天附近日中士兵发生冲突，目前正在激战"。守备司令部命令如下："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守卫长春，立即出动进攻南岭中国兵营。"大队长小河原中佐首先考虑的是，确保铁路运行和附属地的警备，按战时部署安排守备地区各要害地点的兵力。当准备完毕时，恰值午夜2 时20 分，旋又接到司令部第二次命令："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火速赶赴奉天进行支援"，这等于是取消第一次命令。小河原大队立即命令部队在公主岭车站集合。

事实上，当时的奉天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根据地，驻有数万军队，而日本军除独立守备队外，只有一个联队。小河原中佐既担心奉天守备队的危急处境，又考虑长春附属地的守备等问题。

(注：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队部设在公主岭，第一中队驻长春；第二、三中队驻公主岭，负责铁道守备任务)。守备长春的日本军只有长谷部第三旅团所属的大岛第四联队和小河原中佐的独立守备队一个中队。

小河原中佐认为必须奔赴奉天支援，但又担心如果设在南岭的中国炮兵，以36 门大炮同时开火，则长春附属地将化为灰

烬。恰值此时又接到命令："步兵第四联队现在进攻宽城子。黑石第二大队进攻南岭炮兵营。长春守备队正在受到中国兵的攻击，警察队与在乡军人队正在附属地与市区交界处交战。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立即赶赴南岭支援。"于是守备队乘军用列车（从公主岭）北上。

2. 驻长春步兵第四联队出动

长谷部第三旅团长决心竭尽全力紧急支援奉天。然而，旅团如南下支援奉天，则留下的只有不足两个中队的兵力。而驻长的中国部队则有五千人以上，我军将三面受到包围。如果独立守备队和留守部队共同配合，则将宪兵、警察和战时义勇军集中起来，也或许可以进行持久性防御，但问题在于南岭的中国36门大炮。炮弹如连续从相距仅一里半的地点袭来，则附属地无疑将化为灰烬。长谷部第三旅团长最后决定派主力支援奉天，留部分兵力夜袭南岭炮兵营。命第四联队第二大队长黑石少佐率第五、第七中队和一个机关枪小队夜袭南岭。午夜零时30分，驻长春步兵第四联队紧急集合，听取大岛联队长的训示后，于凌晨3时10分向奉天进发。

四、南岭附近的战斗

1. 进攻炮兵营

时值农历八月初八，夜色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以道路崎岖，虽只有五六公里的路程，跑步到南岭时，已是凌晨5时，夜袭的时机已经丧失，完全成为拂晓攻击了。

敌兵营的西北方是一片高粱地，部队在田里隐蔽，每个中队派出三名尖兵，接近围墙，利用人梯窥探营内动静。发现敌军刚刚起床，对我方的奇袭毫无查觉。于是，黑石少佐命令首先摧毁敌军第一营。命第五中队江口大尉从北侧左门，第七中

队井上大尉从西侧右门，第七中队主力从尚在紧闭的西小门同时分别冲入。并命令佐佐木少尉率领的机关枪小队在兵营西门附近，第七中队平冢小队以敌步兵营方向，在炮兵营西南角附近采取掩护态势。

西侧右门有一步哨，听到高粱地里似乎有动静，走近前来察看时，被我军以手枪击毙。

第七中队利用带来的梯子越过围墙，此时，敌军才发现我军奇袭。于是，开始利用全部窗口进行猛烈狙击，使第七中队陷入困境。井上中队长大呼："将门打碎！"于是菊田、畑山两小队利用随身携带的铁镐瞬间将门打碎，全体队员蜂涌而入。另一方面，大队部和第五中队从北门冲进。敌军惊恐万状，企图关闭通往兵营内部唯一通道、马厩的第二道门。当即被第五中队长发现，菊地少尉立即用军刀劈倒要关门的士兵，冲进门内，又砍倒数名敌兵，我军得以顺利地进入敌兵营。这时敌军从前方敌兵营的窗口利用各种枪支开始猛烈射击。我军破坏其门窗，向进行抵抗的敌军还击，战斗十分激烈。

黑石大队长进入敌兵营后，身先士卒，继续前进。忽有一传令兵飞跑前来报告："大队长，发现大炮位置"，"立即破坏。"只用了10分或15分钟的时间，将16门大炮全部予以破坏。

这时，井上大尉所率第七中队踢开菊田、畑山两小队长打破的小门，从此侧左门涌进。第五中队以破竹之势从北方前进。

由佐佐木少尉率领的机关枪小队及时采取果断行动，有效地配合了第一线中队的突击，同时在第五和第七中队的中间地带，以有利的态势向敌阵猛射。敌军终于放弃抵抗，突破围墙，四散逃亡，遗弃大量尸体。当时已是清晨6时40分。

这样敌炮兵第一营被全部占领。黑石大队长集结兵力，以第五中队为左翼，第七中队为右翼，从北方进一步攻击第二和

第三营。

敌军曾一度进行抵抗，但几乎未曾交战便向东方退却。占领第二营、第三营的同时，将残留在各营的其余大炮悉数破坏。

黑石大队长再次集结队伍，撤至袁家窝棚，以便向步兵营发动攻击。

步兵营位于炮兵营南方，有兵员3 000。东方与机关枪兵营和迫击炮兵营相接。当我军进攻炮兵营时，步兵营犹如隔岸观火，对我军未采取任何行动，对于我军的进攻极为有利。中国军队这一独特的背信弃义行为，不禁令人瞠目结舌。

2. 对步兵营的联合进攻

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的小河原中佐在孟家屯下车，支援南岭战斗。因已获得第四联队黑石大队已占领南岭炮兵营，从现在起，为进攻步兵营，正在向袁家窝棚前进的情报，为了配合黑石大队共同攻击步兵营而继续前进。上午8时30分，两大队长在袁家窝棚汇合。

当时，两大队长根据情报得知，第四联队长大岛大佐率联队主力和机关枪中队正在宽城子进行激战。经协商决定，从上午10时开始进攻南岭步兵营，以独立守备队为南方右翼第一线，从东南方包围攻击敌军；由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从西方进行攻击。

上午10时，守备队的步兵炮队开始炮击敌步兵营。黑石大队将队伍展开在大练兵场的林荫树附近，逐步前进。当第一线部队接近敌前400米处时，敌军凭借两侧的沟堤，集中发射步兵炮和迫击炮。平坦的练兵场上毫无隐蔽物，在集中射击下，我军出现大量伤亡。子弹落在高粱秸上乒乓作响，黑石大队长仍大声命令："前进！"井上大尉的第七中队在右翼第一线，江口大尉的第五中队在左翼第一线，佐佐木少尉的机关枪在左侧，第

五中队的佐藤小队作为大队的预备队随在第七中队后面前进。机关枪小队在右侧方设阵地开始对敌猛射，用以掩护友军前进。我部队逐步到达练兵场西侧的菜田里。这时敌军的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还有炮兵营东侧的步兵炮、迫击炮，以及刚才败退的炮兵又拉出的一两门大炮，同时向我军集中猛射，前进十分困难。而我军冒着炮火一举冲至敌兵营西侧的堤防线。第二大队隔着距敌营仅有4米的堤防，同仍在顽抗的敌军展开了手榴弹战，而敌军利用后方兵营的窗口、通气孔等一切枪眼狙击我军。黑石大队长直立在佐佐木机关枪队后方的一个小山丘上，督促各中队作战。这时独立守备队前来报告，独立守备大队第三中队以中队长仓本少佐为首伤亡惨重，几被全歼。当时已近正午，敌我间的战斗达到高潮。我军士兵上好刺刀，超过沟堤，冲入敌阵，多次击退敌军反攻。最后顽敌屈于皇军威力，从下午1时开始退却。我军抓紧时机，打破西部兵舍坚固的砖墙，第五、第七中队相继冲入，敌兵仍在兵舍内顽抗，在我官兵刺刀和军刀的进攻下，敌军全部败走。

另一方面，独立守备大队也冲入兵舍，展开肉搏战，敌军冲出兵舍外进行反攻，被我军击退。下午4时10分，敌遗弃大批尸体和伤兵，向东北方溃逃，步兵营全部被我军占领。

3. 武田中尉关于战斗的回忆

南岭位于长春东南约6公里处，是东方通往吉林，北方通往哈尔滨的门户，附近有农安和怀德县城，西方约四五公里处有满铁铁路，地处要害。这里有旧军阀的精锐部队：3个步兵大队，兵员3 000。3个炮兵大队，大炮36门，兵员约千人，加上机关枪，迫击炮等，约有4 500人。每个大队周围都筑有坚固的砖墙，高3米，厚40公分。内侧筑有立脚点，可以站在上面向外射击。墙的四角的厕所筑有许多炮眼，也可以射击。

左前方是第一步兵营，是我小队攻击的正面。右前方是由山本小队攻击的第二步兵营，其右后方是第三步兵营。

从第三步兵营向右转处有一兵舍，这里是吉田大尉的第二中队和栗崎大尉的机关枪小队奋战的敌机关枪兵舍和弹药库。步兵营的西方是练兵场，其右方，即北侧是第一、二、三炮兵营。

我等参加此次战斗的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的第二、第三中队，平时同部队一同驻在公主岭，去年9月18日夜，事变爆发，当夜1时整装，清晨6时21分在小河原中佐率领下，从公主岭出发，在孟家屯车站下车，进攻南岭。上午8时半赶至孟家屯以西的袁家窝棚。在这里同拂晓已夺取了第一炮兵营的第四联队黑石大队汇合。经协商决定，从上午10时起，我大队作为右侧第一线从南向北，黑石大队作为左侧第一线从西向东进攻步兵营。这一天天气晴朗，高粱尚未收割，骑马走在高粱地里看不到人的头顶。但这里有南岭的练兵场，兵营周围二三百米间全是白菜地，没有借以隐蔽的地形地物。随着大队长的命令，官兵开始攻击前进。

我中队是左侧第一线，中队共有官兵69人，吉田中队为70人。当时我们小队是大队的预备队，因此，仓本中队长只带领30余人前进。当我中队到达第一步兵营东南角附近的高地时，敌机枪开始猛烈射击。同时，第三步兵营的敌军开始溃逃，中队长命令射击逃敌。当时是上午10时左右。作为大队右侧第一线的吉冈第二中队也勇猛前进，进攻右前方的机关枪兵营。

敌军凭借坚固的围墙向我军猛射，第一和第二步兵营的敌军接连登上围墙，加强攻势。山本小队的轻机枪分队长战死，伤亡不断增加。

大队长小河原中佐见仓本中队的苦战情况，便命令作为预

备队的我小队支援仓本中队，我等立即赶到中队长身边，共同进攻左前方的第一步兵营。我的小队当时有26人，以须藤分队为右侧第一线，川田轻机枪队为左侧第一线，以五十岚分队为预备队，面对约千人之敌发起攻击。中队长为打破难局，部署在轻机枪掩护下，登上围墙，冲进敌营。但这时从右前方的枪眼射来一颗子弹，正中中队长头部，当即阵亡。接着，芦田少尉、太田伍长、相田上等兵以及土田上等兵等相继倒下。这时是上午11时许。在失去中队长的情况下，继续展开手榴弹战，敌军也不示弱。我步兵炮命中敌兵舍，浓烟滚滚。中队的一部兵力登上围墙，准备冲入敌兵舍，另一部则冲上前从枪眼中夺取敌军步枪，展开一场混战。一部敌军企图从兵舍内发起反攻，但均被我击退。

尽管如此，我拥有三个分队的轻机枪队大部均已伤亡，连续发射的自动火器哑然无声，听到的只是敌军射击的声音。敌军乘机再次发起反攻，其数多达五六百人。这时，中队的预备队富樫中队及时果断地进入中队右侧。大队长带领大队通信班等对接近我中队左侧之敌军展开突击，步兵炮也以所余无几的弹药对该敌进行射击，通过一致努力才将其向东北方击退。

然而，遗憾的是步兵炮队长前市冈大尉阵亡，小河原大队长左腿负重伤。我军伤亡惨重，生存者屈指可数。这时，又发现敌军再次从我右方发起反攻，我军相互鼓励，步枪手拿起机枪，终于击退反攻。

占领南岭步兵营约在下午3时左右。这次战斗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共用5个小时，而且又是在近距离内展开的激战。结果，我中队以中队长为首有25人阵亡，19人负重伤。加上吉田中队的伤亡，共阵亡38人，重伤30人。

五、宽城子战斗

进攻宽城子兵营

在长谷部旅团长指挥下，大岛联队长正在长春车站准备乘车向奉天出动，突然接到关东军的电报命令："长谷部少将负责长春警备，并准备进攻长春附近的中国军队。"由于黑石大队已经出动夜袭南岭，因而立即命令攻击宽城子兵营。大岛步兵第四联队长奉命率领第一大队、机关枪队、步兵炮和山炮队从长春车站附近北进，隐蔽地到达宽城子兵营南侧。然后发起攻击，上午4时50分，正当准备冲入中国兵营时，事先已有准备的敌军突然开始射击。当时，已近黎明，我军预定于上午5时全线猛攻，一举攻占敌营，但敌军利用坚固的俄式墙壁和多处枪眼，疯狂狙击，不肯轻易放下武器。其间，我第一大队派中国的宪兵队长再三交涉，使其解除武装。但敌方不仅不停止射击，反而继续顽抗。这时敌营长已被击毙。

上午8时30分，第一大队的第二、第三中队前进，占领部分敌营，但西兵舍仍在继续顽抗。于是，位于中央的第一中队长率先寻找兵舍入口，一度从北、东两方突击。但由于入口狭小，全部人员不能进入，不得已占领该兵舍北侧的建筑物，敌我之间展开激烈的火力战。我军士兵伤亡严重，干部相继阵亡。迂回到敌军背后的熊川小队长遭到狙击而阵亡。

大岛联队长随军旗进至散兵线后百米处督励作战，命令于上午10时发射山炮及曲射炮。我两炮队奉命同时开火。敌军惊恐万分，又恰值我军全部冲入营内，敌军放弃抵抗，部分逃窜，其余大部共386人投降，上午11时10分宽城子兵营全部被我军占领。

驻在城内的吉林省防备军，于下午1时许全部解除武装，至

此，长春又归于平静。

六、结束语

在满洲事变的首次攻击中，战斗最为激烈的是长春附近的南岭及宽城子和北大营。其他在我军的进攻面前，不是未执干戈，仓惶溃逃，就是毫无抵抗，任凭我军解除武装。

据说在南岭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晚，旅长李桂林偕心腹某团长（可能是步兵团长）在妾的家中打麻将。听说日本军来袭，由于他一向轻视皇军，因而迟迟不曾起身。后来听说步兵团已经危机，他立即逃跑，恐怕步兵团长也和他一起逃走了。

李旅长原是东北边防副司令张作相的部下，但他更是张学良的嫡系，步兵团长又是李桂林的直属部下，而炮兵团长穆纯昌则是张作相的嫡系，因此二人始终不能积极合作，结果一旦有事便被皇军所击破。正因为如此，所以南岭的36门大炮除被我奇袭破坏者外，其余24门大炮的炮弹才没有向附属地飞来。

总之，关于南岭及宽城子的激战情况，从以下的伤亡数字中即可一目了然。

	战死者			负伤者			总计
	军官	士兵	计	军官	士兵	计	
奉天附近	0	2	2	4	19	23	25
长春附近	3	63	66	3	73	76	142

此外，宽城子战斗中死伤30名，其余全部是南岭战斗中的伤亡。在第一次作战中，南岭战斗的激烈程度居首位，但也正因为如此，我附属地才免遭毁灭。

如上所述，长春至此已完全处于我皇军武威之下，长春北

方中国军的行动不明，同时它面临苏联红军，在将来的军事行动中也是要害之地。因此，多门第二师团司令部移至长春，并将师团主力集结于长春附近。翌日，即20日步兵第三十联队驻旅顺的主力和驻海城的一个野炮兵大队也赶至长春，前来增援。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九·一八事变》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

日军侵占吉林

齐知政

（1954年10月25日）

我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在张作相部下充任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少将总办职务。当“九·一八”事变的数小时后，驻在长春南岭的吉林陆军第十五师之中国军队，被日寇多门师团的各部队围攻。在9月19日早晨，我奉吉林代督军熙洽命令，随同吉林督军署日寇顾问大迫通贞少佐去长春南岭视察现地情形，结果中国军队因被日军围攻，死亡很多，被迫撤出长春南岭。当晚即返回吉林，把视察的情况汇报给熙洽。当天驻在吉林的中国各军队听说长春中国军队被日军围攻的消息之后，都撤离吉林省城。吉林代督军熙洽为了维持当时的所谓治安，即命我组织吉林省城警备司令部。因为我在熙洽部下充差八年之久，他对我是很信任的，所以委我为吉林省城警备司令部司令。我即以原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教官及学职员，前吉林警察厅水上警察二百多人，警察队八百余人，和原有的前中国宪兵五十多人为基础，于1931年9月下旬组成为吉林省城警备司令部，内

设稽查、军法等单位，维持吉林省城的“治安”。由于吉林省城警备司令部的组成，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吉林铺平了道路，因而在1931年10月(9月)，熙洽派吉林督军署中将参谋安玉珍去吉长铁路途中接日寇多门师团的军队进入了吉林。日寇占领吉林后，即很快占领各机关、兵营，并缴获前中国军队的全部武器。我把原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做演习用的小山炮1门、迫击炮1门、步骑枪120支（每支枪配有子弹20发）、马30余匹、大车两辆也都交给了日寇多门师团。熙洽就此投降了敌人。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其势力起见，又发表了吉林省“独立宣言”，脱离中华民国中央。更为了帮助日寇掠夺中国土地，于1932年1月，熙洽即命令我偕同日寇大迫通贞、甘粕正彦去哈尔滨，接任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长职务。当时因为丁超、李杜攻进了哈尔滨，不两日，丁超、李杜军队又退出了哈尔滨。当时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张景惠业已派了丁超属下旅长王瑞华为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长，于是张景惠派我为副处长职务。我因职务低的原因，未到差即返回吉林，继续充吉林省城警备司令。这是我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及当时投降日本，背叛祖国，支持日寇，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

编者注　齐知政，又名化民，1893年生，辽宁省开原县人，1919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历任东三省巡阅使署上校参谋、直隶督军署上校参谋处长，直鲁联军少将参谋处长、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少将总办等职。“九·一八”后，曾任伪吉林省城警备司令，吉林省警备司令部附兼特务部长，辽源、新京等专卖署长，间岛省民政厅长，伪满首都警察厅总监，伪满洲国国务院参事官等职。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九·一八事变》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九·一八”事变后的吉林省城

苏立仁

1931年9月19日清晨，太阳刚爬出东山，省城吉林市就塞满了嘈杂的卖报声。往日，《吉长日报》须在9点才能出版，可今天居然提前两个钟头与市民见面，报纸登载着震骇人心的消息：

“日本兵昨晚占沈阳！”

“今晨日本兵又占长春，二道沟傅营长殉难！”

大东门外菜市场卖菜的、赶市的、过路的都忘记了自己的事，纷纷议论。往时日本人经常出没的东大滩、二道码头等处却不见了他们的踪迹，日本人住宅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其实，他们昨晚早已搬到日本商埠地去了，那些不愿搬家的日本居民被强行迁入日本领事馆。领事馆派日本警察在商埠地大马路上增设岗哨，并架起大炮和机关枪，省城所有的日本人都躲避到商埠地。

国难当头，谁还有心思去听课呢！学生们自动聚集在一起讨论着、研究着对付这突然事变的办法。此时，教育厅已把紧急命令发送到省城各学校：严禁学生跨出校门……有些校长阻止学生开会。19日9时许，学生们一队一队地准备到街里讲演，却让大批军警挡在了校门里，双方发生了冲突，省城的气氛紧张起来。赤手空拳的年轻学生当然抵御不住全副武装的军警，游行的队伍被冲散了。但过了一会儿，学生们化整为零，在街面的墙上贴满了传单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

义”、“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教育厅长闻讯后，坐着气派华贵的大马车来到街上，监督学生们的行动。突然，从小胡同里飞出一些小石头子、碎瓦片，教育厅长连人带马都被打伤，只好逃了。

9月20日，熙洽把布告贴在各个路口，大意是：务须遵守秩序，商人好自营业，如有不逞之徒乘机煽动捣乱，一经查明，军法从事，决不宽容……街上又派出了大批警察，背着大枪，在人多的地方穿进穿出，分明是在监督人们的行动。火车站内停着一列专车，准备中午11点直开锦州。省城各厅长、会长、处长要为张作相的老太爷送殡，可如今专车却僵直地躺在铁轨上不敢开去。在人们不留意中，大街上钻出许多荷枪实弹的灰衣兵，放着步哨。“是要守城吗？”、“要打仗啦！”、“可千万不要在城里打呀！”老百姓骚动了。

街上有许多人往乡下搬家，平时那些出卖苦力的小杠整天蹲在牛马行，犯愁找不到雇主，混不到东西吃。这回可派上用场，阔绰人家争先恐后地找来这些人去搬东西、挑担子，工钱虽然是平时的三倍，但还有许多人雇不到呢！女校这时已被宣告解散，那些外地女学生无处可去，她们哭泣着、咒骂着。天黑了，城里时隐时现地响着枪声，省城兵营的三团人马陆续撤离防地。

9月21日，省城从惊恐的梦境中醒来，嘈杂混乱的局面被死寂沉闷的气氛替代，没有行人，没有车辆，商店、学校紧闭着大门。驻防省城的7 000军队禀承熙洽避让令，已完全撤出，省城已无御敌之兵，只有少数警察背着长枪在街面游弋。多余的子弹已被熙洽收回，每枪只留5粒子弹。中午过后，火车站开出一列专车，那是熙洽派出的“降使”去土们岭迎接日本兵。午后2时许，省城上空突然飞来两架日机，嗡嗡地打着盘旋。日本

领事馆和商埠地响起了鞭炮声，日本人叽哩哇啦地呼喊着、狂叫着。城内居民手足无措，唯恐飞机扔下炸弹。飞机绕了两圈后，抛下雪片似的传单，上边恐吓道："日本占领沈阳时，有学生军武力抗拒，因此发生激战。但吉林的商民机关军队不必惊恐，如有抵抗，必取灭亡……"居民们谁也没有心思去捡传单。晚6时许，一列由火车头推着的日本军车驶进省城。因为日本人不完全相信熙洽投降的许诺，唯恐爱国军人用武力反击，假如遭到伏击，就由倒挂的火车头牵引列车，全速逃回长春。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长陆军中将多门次郎及第十五旅团长陆军少将天野六郎以下800人，俨然以主子身份走下列车，6时48分，多门与其部下在站前拍照留影，以示占领。卖国贼熙洽率省府各厅处长赴车站躬迎，并奴颜婢膝地设宴犒劳侵略者。

日军占领省城后，将城内千人警察枪械收缴。令其徒手维持地方秩序，又提取省库款钞，提前颁发九、十两个月的警饷，收买警察，从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寇将省狱所囚禁的不法朝鲜族人352名全数释放，将守狱用的枪械发给这些囚犯，以示收买鼓励其骚扰。城池各城门都换上了日本兵站岗和驻守，又在新开门外日本领事馆附近添置了大炮和许多机关枪。

日军在站前一带集结后，向城内各处派兵。东市场有一工人好奇地从墙后伸头观看，只听"呼"地一枪，这名中国人应声倒地。这是省城沦陷后第一个被枪杀的华人，当地耄耋老人清楚地记着那天是八月初十（9月21日）的晚间。

省城各银行及省库所在之永衡官银号，皆被身穿黄呢军服的日本兵把守，并勒令停止一切款项支付。于是，全省经济为之封锁，商民及各机关款钞断绝，顿感"命脉"危急。日军还强盗式地从省库提取现金250万元，做为军费。

9月22日晨，只一夜之间，城内街道上就拖满了纵横交错

的日本军用电话线。日本兵将省垣各行政机关、交通机关完全控制。电报局与外方的通讯完全中断，日军每天都在邮局检查来往信件。那些头戴红箍大沿帽的日本骑兵、步兵沿街梭巡，站在街面的中国警察要向日本兵立正敬礼。东局子军械厂所存3万支捷克式步枪和军需厂全部粮食全被日军虏获。省城东大营、莲花泡、江南、八百垅、德胜街等处兵营所存剩械弹也全被抄没。日寇又迫令熙洽将调离城外的中国军队缴械，撤至乌拉街的两个步兵团大部被缴械，日军又得枪1 600支。卖国附逆的官员唯恐中国人民起来反抗，于是，假借原军、政两署及张作相的名义，张贴布告，内容如下：

为布告事，查日军来驻吉垣，地方治安一切如常。所有一般人民须知日军态度和平，务安各业，勿庸惊恐，惟日军有合理之要求，不可无端加以拒绝，或妨碍其行动，违则必予查究。合行布告，其告懔遵，切切此布。

驻吉副司令长官

吉林省政府主席　张作相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熙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日寇兵不血刃地侵占了吉林省城。

9月23日，侵吉日军第十五旅团以下第十六、三十联队、野炮联队、骑兵联队、守备队、宪兵队顾问团等各部分别抢占了公私房屋，布设岗哨，法西斯式地“办公”。驻吉日军司令官为天野，省城警备司令为坪井大佐。城内轻重军用汽车、省府机关及其它各官厅汽车均被日军各部抢走。时时有三五日军士兵乘坐汽车在各街巷奔驰巡查，那些较气派华贵的汽车专为日本军官所乘坐。为避内讧，各辆汽车外边写着：“××队专用”、“炮队第××队专用”满街尘土飞扬，行人低头缩肩，时时要准

备接受日本兵的盘查和搜身。有的人出于好奇，经过新开门外时，往往挨近大炮多看几眼，于是就要遭到敌人一顿毒打。省政府的行政、治安，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向日寇请示。熙洽等卖国官员生怕群众闹事，给自己增添麻烦，又张贴布告，以示弹压，并取悦于敌。

吉林省会公安局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本局现受城内警备司令坪井大佐之指挥，维持城区治安，兹规定事项开列如左。所有全境商民人等须一体遵照，不得稍敢背违，致于究惩，是为重要，切切此布。计开：

一、本局受本司令官坪井大佐指挥，维持城内治安。

二、若不受日本军队暨日本勤务人员之令者必须治罪。

三、妨害日本军队之行动及意图，妨害者必先通知司令官逮捕之。

四、城内若有欺压日本人者同上。

五、公安局所有人员如不服命令或纵之者依军法处罚之，其不服本司令之勤务者同此。

公安局长　刘国铨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省城附逆大小官吏，为虎作伥，甘做汉奸走狗、民族败类。

9月24日，熙洽遵从日寇意旨，取消原军、政两署，宣布成立伪“吉林临时省政府”。

9月26日，熙洽嗾使其幕僚草拟“临时省政府组织大纲”十条，规定伪省政府设长官一人，其办事机构名为“吉林省长官公署”内设军政、民政两厅，下设辖财政厅、建设厅、实业厅、警务处、交涉署。

9月28日，在日本警备司令坪井的导演与监视下，熙洽召集吉省各机关法团负责人会议，除宣布就任长官外，还发表了

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的通电，在东北抢先宣告“独立”。一批寡廉鲜耻的汉奸官吏粉墨登场，日本顾问充斥各级部门。

为巩固汉奸政权，熙洽自觉省城原有警察力量不足，遇事恐难维持，所以又招募警兵五百人，城内五区各添百人。此外，日本飞机每天从长春飞临省城上空一次，盘旋侦察，以示佑护日伪政权。

日军侵占后，省城各学校完全停课，学生四散奔逃。日宪兵到各学校图书馆和街内各书店检查书籍报刊，其中有涉及日本者、满蒙问题者、中国外交者，则一律收缴。城内各机关不准悬挂孙中山像，不准讲说三民主义。日军宣传机构在城乡内外贴满了侮辱中国的漫画、标语和告示，其内容不外什么“日本无领土野心，日本为谋日华人士之治安而来，以期共存共荣……”还说什么“铲除军阀，爱惜民命”一类的无耻滥言。为谋取军事上的便利以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侵吉日军稍事休息后便强征民地二千余亩，农民们未来得及收割的庄稼也被野蛮地霸占了。日军又抓来数百名劳工，在省城东北郊的依兰岗修筑军用飞机场（吉林城原无飞机场）。

铁蹄蹂躏的一个月之中，日军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行路人被搜身检查，如认为有害于日寇者，便赐之一弹；日本兵经常到居民屋舍搜查，许多无辜百姓遭到枪杀，其中最惨者就是：一天半夜，日本兵敲开粮米行的一家店铺，该店铺老板从睡梦中刚起，他揉着眼睛，趿拉着鞋慌忙前来迎接。由于行路不便，他弯腰伸手提鞋，日本兵认为其有敌对行动，“砰”地一枪，老板倒在血泊之中。诸如此类事件很多。为炫耀武力，防止人民反抗，日寇驻吉炮队于10月11日至17日，在北山演炮7天，说是欢迎中国人参观，实则强迫城内居民接受法西斯统治。

侵占黑龙江与马占山抗战

马占山与江桥抗战

谢　珂*

一、日军侵占辽、吉后的黑龙江局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数日之间，沈阳、长春、吉林相继沦陷。日军于辽、吉得手之后，即积极进图黑龙江省，但因黑省远处日军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以外，且与苏联接壤，日军进犯亦有所顾忌。当时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叛变投敌，日军乃谋利用张逆为前驱，使先攻占黑省，以便兵不血刃地再由张逆手中夺取过来。日军遂大量接济张逆械弹，并派遣特务帮同张逆策划进犯黑省。

黑省自接到北平不抵抗主义电令后，又陆续听到辽、吉两省沦陷的惨状，并闻张海鹏在洮南有投敌攻黑的阴谋，人心顿呈不稳现象。当时，我任东北边防军驻龙江副司令公署参谋长，遂即访问龙江日领清水八百一，问："日军对黑省有何企图？"清

---

* 作者当时系东北边防军驻龙江副司令公署参谋长。

水未具体答复，仅说“日军在东北是地方事件，决无领土野心”云云，此后清水有时也来访问，意在探听消息。

黑省军政两界自辽、吉陷落以后，颇为恐慌，并因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群龙无首，如何应变，亦莫衷一是。日军睹此情形，更大事制造日军行将至黑的空气，意在恫吓，增加纷扰。省会龙江自9月20日起，市面交易几陷于断绝，迁往东荒（即黑龙江东部各县）及泰安镇的人民络绎于途。9月24日，各校奉教育厅令休假20日，学生各返还原籍，群众心理更加混乱。万福麟电令黑省，略谓：“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处长窦联芳负责照料，参谋长谢珂副之。”但窦氏接电后并不关心也不负责，军事上一切仍由我处理。

洮辽镇守使张逆海鹏，于9月底有日军几人到其私宅居住，允许供给大批械弹，张当即宣布独立，企图进犯黑省。消息传到龙江，全城大为震惊，重要人员的家属有移居哈埠的，也有远走平津的。洮昂路局长万国宾为了试探张逆的意图，派省府委员马景桂前往洮南，伪称黑省有欢迎张氏之意。张逆当谓：“本人年近古稀，毫无野心，惟日人压迫太甚，部下主张分歧，暂赴黑省躲避亦无不可。”马闻之急回黑省报告。9月28日，黑省警务处处长窦联芳、民政厅长刘廷选携北平张学良及万福麟电赴洮南，劝张坐镇洮南，防敌北犯，勿为日人利用，致贻后世之讥。张初不悦，嗣经他人苦口力劝，张意稍悔。10月初，北平副司令行营委张海鹏为蒙边督办，万国宾亦派员至洮南访张，表示好感。张于10月10日派其长子张冠军到黑省答礼，并接洽军饷及给养问题，黑省当即委张冠军为上校参事，并极力与张海鹏周旋，一般人士以为自此张海鹏与黑省可能走上和平的道路。但自10月初张逆得到日军供给大盖枪两万支，并允许随时接济弹药以后，即秘密召集所属，讨论进袭黑省的阴谋。张逆

经其部下推为保安边防总司令，同时编八大处，积极扩充军队。消息传到了黑省后，万国宾令将全路车辆陆续调到昂昂溪，以防张逆使用。

黑省自辽、吉沦陷以后，9月下旬即开始布置军事，由军署分电海拉尔、满洲里、黑河和东荒各地的驻军积极准备补充，听候随时调遣。当时黑省军队除王永盛第二十九旅、于兆麟第三十旅等两个国防旅调赴关内讨伐石友三以外，在黑省的部队多半为省防部队，共约3万余人，其番号如下表：

队　号	兵　力	主官姓名	驻　　地	备　考
步兵第一旅	两　团	张殿九	扎兰屯、昂昂溪	护路任务
步兵第二旅	两　团	苏炳文	海拉尔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哈、满护路司令
步兵第三旅	两团（骑步各一）	马占山	黑河	黑河警备司令
骑兵第一旅	三　团	吴松林	克山、拜泉	
骑兵第二旅	三　团	程志远	满洲里、扎兰诺尔、小蒿子等地	哈满护路副司令，后改骑八旅番号
卫队团	三　营	徐宝珍	龙江	
炮兵团	三　营	朴炳珊	泰安镇	
工兵营		刘润川	龙江	
辎重兵营		孟宪德	龙江	
保安第一大队		王克镇	绥化	
保安第二大队		陈海胜	大赉	

10月初，我认为黑省环境复杂，日军在所必图，遂向万国

宾（身兼十余要职，黑省的政治、财经、交通、报纸、学校以及军事中的人事问题等均与万有关系）建议，应电请北平副司令行营选派带兵大员来省坐镇，应付危局。万初尚犹疑，继经我详细解释，说明洮南距省不远，一旦日军援助张逆进犯，非常危险，为了镇定人心，统一指挥，此举极有必要。万始认为可行，当即决议由我们两人分电北平请示，请由马占山、苏炳文两人中选派一人担负黑省责任。10月中旬得到回电，特任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黑省军事派马占山为总指挥，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

军署于9月下旬，调中东路驻小蒿子站的程旅朱凤阳团进驻泰来，对洮南方面警戒，派工兵一连驻守嫩江桥并构筑北岸阵地的据点工事。10月初，调驻拜泉的吴松林旅开到龙江附近待命。此时日领清水带日军步兵少佐林义秀向我提出要求，谓日军拟派一中队经洮昂路开到昂昂溪驻扎。我当即答复说，现在我军由泰来至昂昂溪沿途军队甚多，如日军来昂，途中恐有误会。林请通知沿途军队，我答，现在军事时期，为了保卫黑省安全，不能令任何外方军队通过；如日军来昂，途中危险，本人不能负责。此后日军亦未敢前来尝试。

10月中旬，张海鹏闻黑省已派马占山为主席，图黑的空气日益紧张。我即电北平副司令行营报告日军援助张逆图黑的情形并请示方略。复电大意谓："如张逆海鹏进军图黑，应予以讨伐，但对于日军务须避免直接冲突。"

10月15日上午，省政府召集各厅长、委员、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员和地方士绅等约50余人开会，军署由我参加，讨论应付当前局势问题。北平来电内容，由我报告。会上大部人员认为张海鹏图黑难以抗拒，其中以黑龙江劣绅李维周、赵仲仁为代表。窦联芳认为日军支援张海鹏，黑省兵单，抵抗非常不利。

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吴焕章认为可以抵抗，但响应的太少。开会结果，未能作出决定而散。军署在省府开会以后，由我召集各处处长唐凤甲、王治澜、李冠三、金希均、蔡亚民、李鸿逵等，及部队方面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炮兵团长朴炳珊等20余人，开会讨论对张海鹏进犯黑省的对策。各人均以北平既有电令指示，应遵照电令施行，最后决议准备即时迎击。我以奋勇杀敌并应严守纪律鼓励出发部队，并饬军需处发饷一个月，借支一个月，安置家眷。我随即下令即日夜间卫队团全部出发，工兵营两连、辎重兵一连、炮兵一营归徐宝珍团长指挥，开赴嫩江桥北岸构筑阵地，并令军务、军医两处迅速筹设运输、救护机构，将库存的99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有百挺，有一挺拿去作模型仿造)发到卫队团使用。当时万国宾反对发枪，对我说："这是督办（万福麟）购置的，不请示督办不能动用。"我向万解释："辽宁、吉林陷落时，成箱的枪械交与日军，今天迎敌非常需要，如黑省不亡，枪仍存在士兵的手中，假如沦陷，在士兵手中比成箱损失好得多。"万理屈词穷，终于不得不同意发给卫队团使用。当军队决定出发时，窦联芳向我要求说："千万不可打。"我说："北平有电令，如何不打？"窦说："只要不打，将来责任由我负。"说："我这是大家决定的，你负不了这个责任。"至是，省府以万国宾为首的厅长、委员等均连夜逃到哈尔滨，公安局长梁横也逃往哈埠。万国宾逃哈时携有大小皮箱十余件，到哈后即抢购金票，哈埠金票价格一时为之暴涨。日领清水请求保护，于17日夜车率领馆员退往哈尔滨，行前有致我保护侨民的谢函一件。我为了维持市面秩序，暂派朴炳珊为龙江警备司令，将炮兵两营开进省城备用。派公安局督察长刘允升代理局长，并令教导队学生暂时维持地方治安，同时由军署电令马、苏两旅各抽调步兵一团开到昂昂溪，电满洲里程旅积极准备补充待命。另

电哈满护路军司令将护路部队急速从新布置，保护交通安全。

张逆海鹏于10月13日派少将徐景隆带3个团为前锋进犯黑省，15日开到泰来，同时有日军飞机两架到龙江附近上空示威。我方令驻泰来的朱凤阳骑兵团撤到泰康以西，掩护江桥我军左翼的安全。16日拂晓，张逆前锋进抵江桥南端，我军开炮迎击，伪司令徐景隆误触我驻守江桥工兵埋在南岸的地雷阵亡。我军当即齐出阵地进行袭击，把张逆3个团一齐击溃，四散逃走，同时我军把江桥破坏三孔，阻止敌军再犯。日寇以张逆军队质量太弱，且无斗志，必须增派日军进攻黑省，才能成功。

二、马占山到龙江就职

马占山在黑河接到代职电令后，即率步兵李青山团乘大兴轮西上，同时并电促在哈的窦联芳、赵仲仁等返省。马于10月19日午后2时半抵哈，即搭东铁3时的车赴龙江，当夜到达。是时黑省重要机关接到万福麟电令，凡擅离省者以弃职潜逃论罪，因此，窦联芳、万国宾等亦回龙江。21日上午，马占山正式就任代理主席的职务，当即发表朴炳珊为黑龙江省城警备司令，并向各省市、各党部、各报馆发出就职通电，同时万福麟对黑龙江省城及各县父老兄弟发出说明辞职原因的通电。马占山就职后，即致电前方激励将士，并发出悬赏购买张海鹏首级的布告，张贴各处。当马占山就任代理主席后，我就把军署一切情形详细汇报，关于物资款项、军用物品等，令负责部门即时开列清单详细呈报马占山存查。一天，万国宾向我说："马占山到此是指挥军事的，关于军署一切物品应由参谋长负责支配，马应另组指挥部，要啥可向参谋长负责商请。"我说："现在大敌当前，黑省大局如此危险，还能分家么？马主席既然负军政的责任，一切事务应向马请示，各项物资更该由马支配。我今后一切应服

从马主席，否则黑省前途不堪设想。”万国宾的计策未得施行，即派其表兄弟张中校副官印刷传单对我造谣攻击，进行离间。我见传单后，把情形向马说明，因此在江桥抗战期间，普通事务均顺利无间。

10月中旬，有驻洮索铁路沿线的东北屯垦军少将统带苑崇谷，带领步兵三团、骑兵一团、炮兵一营，由景星绕道来省（军队由中东路运到昂昂溪），马占山命令苑部改编为暂编步兵第一旅，并电告北平备案，随即下令该旅开驻大兴以西布防，骑兵暂在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面警戒。

三、日军进攻黑省的准备

马占山就职后，日本领事清水亦于10月20日由哈尔滨回任，同时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的有日本上院议员7人，均为窥探黑省情形而来。

10月26日，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借口匪患，进占四洮全线，此是日军以军队援张逆海鹏犯黑的第一步。马占山为了刺探张逆动静，派国防处参谋长王静修前往洮南。王于28日回省，据其报告，张有再犯黑省的准备。

10月27日，有日军步兵少佐林义秀以关东军司令代表名义向马提出要求书：“限黑省政府于11月3日以前将洮昂路嫩江桥修竣，否则，日方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同时，日方极力宣传，以为采取积极行动的前奏。29日，日方不俟我方动工修理，又由清水领事向省政府送致代修江桥的通牒，略谓：“洮昂系满铁借款铁路，且于交通运输经济上有重大关系，如长此放任，华方的自行修理桥梁认为绝对不可能。故与有密切关系的满铁决即派人着手修理，希望黑省军队断勿妨碍，并予以适当的保护。倘妨碍修理，则日本方面将予以适当的措施”等语。此

是日军援张犯黑的第二步。

张海鹏于10月30日午前在洮南召集军事会议，到会者有各团长，并有日军官等11名列席，讨论再犯黑省的军事计划。日方以张在泰来的军队有向洮南撤退情形，深表不满，日酋山本等当面斥张，并派日军官须本、加藤、大矢、吉村4名与张同到泰来，监视张军的行动。山本并由洮南派少佐林义秀再至龙江见马占山，接洽修复江桥问题。日军以监视张军的军官业经与张赴泰来，遂由四洮路派铁甲车三列，内载重炮两门、日军一小队，进出洮昂路向嫩江桥进发。日军少佐林义秀于11月2日午前10时至黑省，偕日领清水谒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理，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筑，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语。当由马氏答复，"南满铁路对于洮昂路仅有借款关系，债权者不能代债务者修理，且洮昂路并非黑省所属，亦不能代为承认由满铁兴修，可由黑省代为通知洮昂路自行修理。"林义秀悻悻而去。另又有致马占山的通牒，内容如下：（一）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二）至11月3日正午止，南北两军各由桥梁撤退至10公里以外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侵入其地域以内，修竣的日期，俟预计后，随时通知两军；（三）不承当上述要求或妨碍修理者，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用武力。此无异是向黑军进攻的通牒。

当日马占山与我等讨论研究对付日军的策略，我说："江桥阵地非常坚固（利用道木、铁轨、铁板构筑），如后撤，无异于让防，尔后更难以抵御。我阵地距江桥桥头正面约四五里左右，是很好的桥头堡，日军对此阵地感觉头痛，妄想欺骗我们舍去这个良好阵地。"当时黑省大汉奸赵仲仁在座，在当时形势之下，也未敢有所表示（有些会议马邀赵参加）。因北平电令有避免向

日军直接冲突的指示，各人均有所顾忌，不敢主张下令进攻日军，但采取自卫措施是必要的，最后决定江桥阵地不能向后撤离，目前对日方采取应付的态度，如日方问及，即说已经向后方撤退10公里了；对修桥的事暂取放任态度。3日午后，日飞机两架飞到昂昂溪站上空侦察甚久始南去。11月4日晨6时许，日领清水与我军政当局会商，同乘齐克九0三次专车赴大兴站，勘测已破坏的江桥（此桥是木制，距洮南站187公里），8时乘九0四次车归省，当时并未抵江桥附近，显系借辞侦察我方军情。同时上午8时许，复有日机飞来散布传单于昂昂溪等站，大事恐吓；11时许，日军炮兵由桥南向我阵地轰击。我军不得已乃采取自卫行动，也还击了几炮。

四、嫩江桥的激战

11月3日上午11时，日军铁甲车二列，士兵30余名，开到江桥，并有飞机5架飞翔天空，实行以武力掩护修桥。我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即将少数防守江桥的部队撤退到本阵地。日军飞机向我阵地投掷炸弹，伤我士兵9名。天黑时，日军百余名渡过江桥（破坏处用木材垫好），对我阵地施行射击，并用飞机指挥，伤我士兵7名。至夜深时，因我方力求避免冲突，未与抵抗，日军始行退去。

4日早5时，日军少佐林义秀、日领书记早崎、我方秘书韩树业，为了避免两军冲突，乘汽车到昂昂溪，会同石兰斌（石驻昂站，负中间指挥部责任）到前方哈尔葛江桥视察。石向我驻军讲话，林少佐亦向渡过江桥的日军讲话，彼此训诫士兵严守纪律，避免冲突。当石正在训话之际，林竟迫石签字承认将驻军撤退，并迫石立即下令。石谓本人是步三旅参谋长，无权下令。正交涉中，日军突进入我防地，捕去我哨兵3名，虽经石

再三交涉，终未放回。日军此举，显系挑衅。是日午间，日军百余名在我左翼渡江，向我军猛攻，并来飞机五架掷弹，我军死伤数十名，大兴车站亦被炸毁。至是，我军忍无可忍，不得已实行正当自卫，给以还击，日军乃退。下午6时，日军复以炮火掩护步兵一大队渡江，并携带山炮多门，另有飞机7架、铁甲车4列配合向我猛攻。我军正面是徐宝珍卫队团阵地，官兵皆激于义愤，奋勇杀敌。左翼是骑兵连防守，该连少校张连长阵亡。在炮战中，我炮兵也阵亡连长一名。是日我方官兵计伤亡数十名。日军连日苦战，迄未得逞，乃于5日变更阵容，驱使张海鹏的军队在前，由日军督饬向我军猛攻，张部不支败退。是役我军伤亡百余名；敌军死伤数目，据日方发表，死者167人，伤600余名，张逆部死伤700余名。日军素藐视黑军，认为黑军装备较差，但我卫队团自补充捷克式轻机枪以后，发挥了极大的战斗力量，出于日军意料之外。自此，日军广播中说，黑军也有新式武器云云。6日拂晓，日军向我阵地大举进攻，据闻是役有步兵两联队、野炮40余门、重炮8门、飞机8架、铁甲车4列，自早至晚，终日激战。我军伤亡太重，又遭敌机连续轰炸，运输断绝，为了保持余力，于6日下令江桥部队乘夜撤到大兴站以北整顿补充。

自11月4日以来，日军开始向我进攻，以6日最为激烈，上而飞机，下而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是役敌军伤亡亦重，闻有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完全歼灭，高波骑兵队死伤殆尽。这是日军到东北以来空前损失的一次。我军伤亡约600余名。自与日军冲突以来，我方随时将战况向北平报告，新闻记者也发表消息，从此各地贺电有如雪片飞来。我军虽放弃江桥阵地，而全军士气仍极振奋。马占山11月7日将连日战况和退保三间房阵地的苦衷，以及誓与敌周旋到底，绝不屈让的决心，

通电各方。

五、三间房的激战

三间房距江桥约25公里，距龙江约35公里。10月下旬，马占山下令暂编步兵第一旅开驻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布防。11月初，我率领参谋同苑崇谷旅长视察该线地形，作为我军第二道防线。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据点工事，并指派苑崇谷为该线指挥官。

11月6日江桥守军奉命令撤到大兴以北整顿补充后，派步三旅李青山团、步二旅吴德林团接大兴吴松林骑兵旅防地，并将该旅东调，掩护我军左翼，以防江桥方面敌军侧攻。

马占山于11月7日早晨，率参谋处长金奎璧等乘汽车到前方视察，对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等加以嘉奖鼓励，并在昂昂溪中间指挥部指示收容补充等事宜。马于8月下午回省，派我赴前方主持。北平副司令行营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因马捍卫省土有功，来电奖誉，并令全权主持军政，各将领对马亦愿听命一切。惟省府委员赵仲仁别有阴谋，极力阻挠马的军事计划。他谬称黑省代表，暗中曾与驻黑日领清水、驻哈日领大桥秘密接洽，欲使马让出省垣，由张海鹏主政。乃日领已允，而战事忽剧，赵自此被日领拒绝往见。

11月8日起，战事较缓，一由于日军不敢轻视我军，一由于国联对日有严重的劝告。但同时日军少佐林义秀又向马占山送致本庄繁强迫马氏下野的通告，限时答复，林并以个人名义用书面表明日方真意，兹译录于次：

本庄繁通告　（十一月八日）

马主席如欲避免日军之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希速于八日夜十二时以前提出回答。此致黑龙江主席马占

山。

林义秀短札

考察现在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为唯一之方法，即马主席于此时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无他良策。

马阅后均置之不理。

日军在江桥一战损失颇重，竭力补充实力。第二师团长多门次郎9日晨自长春转往洮南规划一切，旅顺驻屯军的重炮队于10日上午开抵公主岭，即晚由四洮路赴洮南。洮南近郊辟有飞机场。当时洮南方面发现救国军，为蒙边4旗7县所组织，集3 000余人，在东平、镇东起义，张逆部队进攻失利，日军遂拨炮助战，因此进攻黑省暂时停止。日军侵黑的损失，实出于意料，深恐消息传出去，对其军事不利，因此宣传黑军得到苏联军火接济。日军经过这次失败，对于黑省的侵略，除调重兵以外，并采取用少数飞机更番投弹的手段，以疲劳我军，另以骑兵迂回我军侧后，进行扰乱。景星、朱家坎方面曾发现过少数日军，我方派程旅骑兵一部开驻景星，右翼已无所顾虑。

日军在江桥受挫后，宣传苏联接济我方军火，以掩饰其薄弱真相，马占山于11日通电驳斥。是日午日机两架飞昂昂溪上空侦察，经我射击，向南方飞去。本日晨，哈尔滨各界组织慰劳团约六七十人，携带物品到龙江慰问。当由马占山代表全体将士致谢，并向各代表表示抗敌决心，誓不屈服。各代表分头到各医院慰问受伤战士，午后返哈。是日有英伦《每日邮报》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亦访问了马氏，对马氏英勇奋战称赞不已。自兹以后，中国各地纷纷汇款劳军，甚至外国青年来信请求马占山签字的大有人在。中外报纸均争先登载黑省抗日

消息，这足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为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深恶痛绝。

黑省战事消沉了4日，至12日战事又重新沸热。11月12日午时，林义秀又送来本庄繁的通告，提出三点要求：（一）马占山下野；（二）黑军由省垣撤退；（三）日军部为保证洮昂路的安全，将向洮昂路昂昂溪行动，并限12日夜12时以前回答。马占山当即电北平请示张学良将军，得复电"饬死守，勿退却"。12日晚马答复日方，略谓："（一）下野本无不可，但须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代，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权；（二）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自有权，非日本所能干涉；（三）昂昂溪车站为中国与苏联合营的铁路站，贵军要求进兵，殊与芳泽代表在国联所声明的日本无领土野心一语自相矛盾。且余奉令保守疆土，在未奉到明令让渡与日本前，碍难照办，同时在法律、事实两方面，亦非贵国所应要求"云云。其实日军未等答复，早已在前线采取行动。

我军自江桥撤退以后，马占山和我曾经召集参谋、军务、军械等处秘密讨论，认为日军虽然暂时受挫，决不甘心，三间房阵地薄弱，很难持久，应速筹备下一部署；万不得已，军政两署移驻海伦，与哈埠抗日军队成为犄角之势，主要阵地放在克山、拜泉、泰安镇一带。此种计划虽已决定，但绝守秘密。库存步枪3 000余支、子弹数百万粒，应利用晚间向泰安镇运走，尔后分存东荒各县，连同其他军用物品为将来补充编队之用，并决定自12日起，由军务、军械两处负责运输。

12日午后1时许，日军先以骑兵五六百名向我乌诺头、张花园（三间房附近）等处吴旅防地进攻，激战历40分钟敌始退却。午后3时，日军大部来攻，有长谷旅团在我左翼，森连满铁守备队在我右翼，并飞机数架投弹助攻。经我苑旅竭力抵抗，至

午后6时，敌军改为炮战，我军亦以炮还击，8时停战。是夜程旅骑兵两团奉令由满洲里、扎兰诺尔开到昂昂溪待命。13日拂晓，日军攻我新立屯阵地，飞机数架投弹助战，几次进扑，经我抵抗，均未得逞。14日拂晓，日军骑兵扰我汤池、蘑菇溪间的骑兵防线，并用重炮向我射击，大兴方面战斗亦烈，并有坦克数辆助战。我程旅骑兵涂全胜团向前增加，士气一振。萨力布骑兵团亦继续开到增援，蘑菇溪方面调卫队团两营增援，三间房阵地派步一旅孙鸿裕团两营增援，我全线阵地与敌激战一日，敌军均未得逞。

15日早3时，马占山乘载重车带参谋、卫兵赴前线督战，先到昂昂溪指挥部。适驻黑日领清水于14日夜由省到昂候车，谓将赴哈，临行马曾挽留，并谓："领事离黑，应按外交惯例签字再去。"清水谓："此行是本人私事，其他一概不知，故未照办。"其余馆员亦均撤退。这是日军大举进攻省垣的信号。当日晨，洮昂线战事稍停，但日军后方大部援军开到。我方令绥化一带的保安大队王克镇部2 000名编为一个独立团，加入大兴正面。是日午日军坦克袭我前进阵地，我军稍退。16日上午11时，日飞机一架在富拉尔基上空投弹，有数枚落在东铁工房附近，东铁当局大为恐慌，急电哈总站请示。同时日军以步、骑、炮、空、坦克相配合约4 000余名向我全线猛攻，我军奋勇抵抗，双方鏖战极为猛烈。我军装备太差，死伤甚重。日机数十架飞我上空，适天气骤变，大风突起，尘土蔽天，两军陷于混战状态，敌飞机失效。午后3时，日军攻势渐缓。17日，日军利用飞机轰炸和重炮射击，以疲劳我军。当时参加的张逆海鹏的部队，除被击毙者外，多数潜逃，战场上完全由日军作战。18日晨，日骑、步、炮约三个联队对我三间房主阵地施行猛攻，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激战至午，多门师团前来增援。我军伤亡过重，不

得已乘夜向昂昂溪方向撤退，大兴方面同时亦向后撤，沿途被飞机轰炸，死伤的极多，步二旅团长吴德林在乌呼马站身受重伤。当18日激战中，马占山由昂昂溪站用军用电话调省垣某团，限一小时乘车开到前方，该团迟到了三小时，马愤极，当将该团长枪决。连日以来，部队伤亡过重，马下令全军退保省垣，当夜电告北平，并向各方面发出撤兵通电。

19日4时，马率军、政两署人员退出省垣，由商务会组织商团维持地方秩序。日军前锋于是日午越过东铁乌黑站，见我军业已撤走，午后2时骑兵一部入城；晚间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次郎率大部进入省垣，分驻城内外各地，我方军用物资，一无所得。多门驻于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城内街上满布日军，张贴各种标语，路绝行人，凄惨万状，惟见日旗满街飘扬。20日下午，日骑兵500余名沿齐克路追我到宁年站，经我骑兵迎击，退归黑垣。至日本人委张景惠兼任伪省长，成立黑省伪政权，并迫龙江各界筹备欢迎。自此，龙江即陷于傀儡政治的局面。

六、黑军撤抵海伦

21日马占山等抵达克山，所部尚有2万余人，即在该地收容军队，并配备防务。22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布防问题，到会的谢珂、程志远、吴松林、苑崇谷、朴炳珊、徐宝珍、金奎璧等，决定以程志远为骑兵总指挥，吴松林为副指挥，驻克山；程旅朱凤阳团与吴旅王克镇团（绥化保安队改编）驻泰安镇；苑崇谷为步兵总指挥，徐宝珍为副指挥，驻拜泉；其他各部由各指挥妥为布置；炮工辎驻于海伦；警备司令仍由朴炳珊担任，负海伦治安责任；前方各部布置，对敌采取守势。

23日，马占山和我到达海伦，驻于广信涌油坊。是日，马占山电报北平及各地，略谓“占山率同军、政两署人员移驻海

伦，部队分驻克山、拜泉等地，敬待后命”云云。至此，虽有少数日机到齐克路上空侦察，殊少军事行动。日军既占龙江，据有政治中心，对于海伦乃改用政治手腕进行阴谋活动。

黑军集中克山、拜泉以后，前方军队亦陆续收容到了各防地，从事补充整顿。军、政两署均设在海伦广信涌油坊内，各机关分设在各商号。省府委员如民政厅长刘廷选、建设厅长马景桂、教育厅长郑林皋、省委潘景武等，先后达海伦。党部委员到此者有吴焕章、王宾卿、王化南等，其他各机关重要职员百余人亦先后到此。

马占山积极整顿军事，编制新军。有许多东北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纷纷到海伦从戎。关内各地学生有“援马团”、“义勇军”等组织，愿赴黑援马。马对东北学生到海伦要求入伍的，令苑崇谷组织“学生团”，担负各地宣传工作；对关内学生则有“齐电”请各报馆转各省市劝阻东来，并婉谢其爱国热忱。这足证明当时全国人民对黑省抗日的热烈支援。肇东一带蒙古王公对马孤军奋战，极表钦佩，亦要求收编蒙旗精壮，自成一军，先在肇州一带训练，有事听候指挥。海外国内各地慰劳捐款接济纷来。马占山派专人张瑞三担任保管，因此张瑞三常往来海、哈两地，报告捐款汇存的情况。

此时日军因即将有事于辽西，而且也知道海伦地近山林，人亦强悍，亦不愿急作军事行动。日军作战部队多由南满调来，御寒装备甚差，进入黑垣时，冻伤过半，黑垣市上的乌拉（防寒鞋）毡靴抢购一光，因而对于东荒各地的严寒亦有所畏惧。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江桥之役和马占山抗战

邢介兴

1930年5月，我从东北讲武堂九期毕业后，被派到黑龙江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当了上尉副官。翌年，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我所在的卫队团爱国官兵，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不久，在齐洮铁路的大兴车站，抵御了日本关东军的进犯。江桥一役，重创日本侵略者。这就是载入抗日战争史册的江桥战役。

江桥战役之前，我已调卫队团机枪连当了上尉连长。江桥战斗一开始，我正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距今已有50多年了。手里仅有的一点资料，在10年浩劫中荡然无存。如今仅凭这早已衰退了的记忆，回叙这段往事，挂一漏万，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觊觎我东北三省，已是路人皆知了。可是东北军政当局却无视这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竟于5月份调黑龙江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万福麟率仅有的国防军两个旅（王永盛旅长所率十五旅，于兆麟旅长所率十七旅）被派往关内打内战，仅留下参谋长谢珂率我们卫队团驻守齐齐哈尔。另外还有5个旅的省防军，他们是驻守在黑河的马占山旅、海拉尔的苏炳文旅、克山的程志远旅、拜泉的吴××旅和扎兰屯的张殿九旅。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午11时，收到沈阳急电，始知日本侵略者炮轰北大营，侵占了沈阳。便立即召开了军政

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署副官长唐鸣久、庶务科长张宾桥、齐洮铁路局长万国宾（万福麟的长子）、广信公司庶务科长孟沛洲、省警察厅长梁冲和省教育厅长、民政厅长、财政厅长等。会上由谢珂传达了急电内容。我卫队团长徐宝珍、工兵营长刘润川和辎重营长孟献德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回来后，又召集全团军官作了同样传达。

当全团官兵闻知日本这一侵略罪行时，怒不可遏。一致要求赴前线打鬼子。不久，团长徐宝珍向全团下达了如下命令：一、取消军官的宿号（在家住宿）；二、调遣二营所属的四、五、六三个连开赴江桥大兴车站布防；三、一营保卫省城齐齐哈尔市的安全。

大兴车站是齐洮铁路与嫩江交汇点，位于嫩江大桥北侧，为一重要桥头堡。由此北去50公里地便是省会齐齐哈尔市，是黑龙江省的门户。当时我军派重兵驻守在这里，实在是至关紧要的军事部署。

当我军在该地采取防范措施时，日本驻齐齐哈尔市的清水领事向我方提出了一项要求：为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和日商在华利益，允许日军驻扎在日本领事馆内。我方当即严词拒绝了这一践踏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当时日本除在齐齐哈尔市设有领事馆外，还在市内永安大街经营一家专供日本人居住的龙沙旅馆；在雷家胡同开设一家专门贩卖日货的百货商店叫昭和祥；在南门脸开设一家出售日本药品的药店叫富山堂。许多日本人在这些地方出出入入，其中有日本在乡军人（退伍军人）会的成员，情况极其复杂。为防范日本人从事间谍阴谋活动，卫队团将我所率的机枪连从二营调出来（此时我已晋升为上尉连长），除负责保卫无线电台外，还派便衣军人监视出入龙沙旅馆的日本人，并负责阻拦我军人员不要去昭和祥、富山堂购买物

品，以防日本人寻端挑衅，滋生事端。

大约在9月末，我军沿嫩江东岸，以江桥大兴车站为中心阵地，北起依布气村北侧的一四一八高地，南至韭菜沟，整个防线绵延五六里地。防线指挥部就设在大兴车站、前敌指挥官是二营长王绍忠。至此，二营、三营、团属骑兵连、省防军所属工兵连（连长车东离），还有我所属的机枪连，共两个营又三个连，近两千人的兵力全部投入了阵地。我们仅用一个星期便修筑了堡垒和蛇形、锯齿形、横墙形的交通壕。我机枪连守卫在总指挥部江桥大兴车站北侧一里许的依布气村，连部设在一名叫吴子衡的村民家里。士兵居住在村头一座依傍在嫩江江边的古庙里。依布气村是清代进贡的朵儿烟地，我们连的工事就隐蔽在江沿的烟地里，这样对岸是很难发现的。

当时我们东北军的编制和装备情况很差。就拿我率的机枪连来说，编制是160人，去团、营占兵额，实有人数仅有120来人。除配有4挺日本造“三八式”重机枪、6挺捷克式轻机枪外，就是百八十支韩林春造、“三八式”杂乱步枪了，即或这样，还算是全团装备最为精良的呢。

当我军作好了还击日寇的准备时，齐齐哈尔市所谓市民代表也开始了阴谋活动。以《盛京时报》经理高祥为首的伙同旧军阀刘继武、清朝旧吏道尹赵仲仁、士绅纪武以及原清乡处的窦处长等人，不顾黑龙江全省军民的反对，窜到洮南敦请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前来主持黑龙江省的军务（张海鹏系高祥的义父）。这时张海鹏已投降日本，果然他带彭旅、徐旅两个旅的兵力北犯。结果，在江桥为我军阻击溃退，阴谋未能得逞。

刚刚击退叛军，日军旋即进逼江桥。原来日军占领沈阳后，立即向吉、黑两省进犯。仅以半个月的时间就兵临黑龙江省界。日本关东军的多门师团、天野旅团、里木旅团和配有炮兵、空

军的混合旅团沿齐洮铁路北上，准备突破嫩江桥我军防线，直逼省城齐齐哈尔。

在江桥布防的我军，士气高昂，枕戈待旦。农历十月初的一天拂晓，我守卫在江桥上的哨兵发现日军步兵从对岸哈拉尔方向向江桥蠢动，我哨兵当即开枪射击，日军也立即还击。随后，日军大部队赶到，敌我双方隔江交火，鏖战数日后，我省防军炮兵十四团在卜大同团长的率领下从克山前来增援。接着，苑崇谷旅长也率一旅屯垦军从王爷庙赶来参战。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也派浦木师团前来支援多门。双方交战，愈形激烈。

先是我军为阻击敌人进犯，在敌人没有到达之前，我工兵连已将江桥炸毁了两孔。日本侵略军采取了猛烈的攻势，地面有山炮、野炮掩护轰击，空中有20来架飞机轮番轰炸，低空扫射，企图采用“敌前架桥”和动用船只等伎俩，一举渡江登陆。但由于我防备有素，致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

迄农历十月中旬，日本侵略军采用白天飞机轮番轰炸，拂晓步兵进犯，接近江沿又企图渡江登陆。但又被我方的猛烈炮火打了回去。就这样，敌人再扑，我们再打，双方拉锯，达十余次，战斗之激烈，为开火以来所未有的。我机枪连阵地设在依布气南侧的烟地里，靠近江沿，敌人始终未发现，我们机枪连的火力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激战10余天，由于我军阵地被敌机和炮火炸得已经到了无法再守的地步，所以不得不做战略性转移。

在战斗过程中，骑兵连长张德新冒着敌人猛烈炮火在巡察一处渡口时，不幸殉职。二营营附李英奇在敌空军轰炸时，以身殉国。连副张九洲在反击战中亦壮烈牺牲。

敌军伤亡惨重，他们来不及收尸，很多尸体横躺竖卧，在晚秋的阳光下，曝尸在异国的荒郊旷野。

马占山，原系省防军骑兵三旅旅长，驻守在黑河。江桥战役伊始，他立即赶到齐齐哈尔与参谋长谢珂、卫队团长徐宝珍、齐洮铁路局长万国宾等人、共议时局，商讨御敌大计。四五天后，他带领随员亲临江桥前线指挥战斗，并到三间房和一四一八高地督战。

当江桥战役传出，举国上下，人心振奋，大力声援；国外爱国人士也纷纷来信表示支持我抗日的全军将士保国卫土的正义行动，并寄来很多慰问品和美金。我们机枪连得到的慰问品有饼干、罐头、糖果还有10余套毛衣。我这个机枪连连长还得到了10元美金。当时1美元可兑换广信公司的钱（俗称江洋）6元。这10元美金，我与连的事务长商议，补贴连队伙食，为大家改善了生活。士兵欢欣鼓舞，一致表示决心坚守阵地，保卫国土，痛歼日本侵略者，以报答国人和国外同胞的关怀和鼓励。

江桥失守，马占山率军撤至海伦，苑崇谷旅退到拜泉，徐宝珍卫队团去三道镇。我机枪连住三道镇的姜家油坊和杨家油坊。马占山到海伦不久，所谓齐齐哈尔的市民代表原帮人马，有高祥、刘继武、赵仲仁、纪武和窦处长等汉奸，投敌叛国的贼心未已，从沦陷齐齐哈尔窜到海伦，他们百般诱惑马占山与日本“议和”。此时，马占山被汉奸包围了，踌躇不定，迟疑不决，夜难成寐，他抗日的决心终于动摇了。苑崇谷旅长对马占山这一表现，义愤填膺，坚决表示：主战，誓死不辞；主和，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谢珂、卜大同、徐宝珍等也坚决反对“议和”。我们这些青年军官主战最为坚决，甚至在海伦通往齐齐哈尔的路上曾设卡阻截马占山去与日本侵略者“议和”。不知何故，马占山竟于1931年末，绕过我们阻截的路卡从呼海路去了齐齐哈尔。苑崇谷旅长闻讯后，返回驻地拜泉，将所率一旅屯垦军交托给卜大同，换上便衣悄然进了关。

我军在政治上连遭重挫，但军心未涣散。仍是各自坚守阵地，精诚团结，克服困难，继续在与日本侵略军对峙。

1932年2月，马占山突然潜离齐齐哈尔，他先后又在黑河、嫩江、布西和讷河一带，再度领导了抗日活动，联系以徐子鹤（吴俊升部驻黑河的司令）为司令的大刀队，李海清（黑龙江有名的绿林人物）为首的大团，哈满护路司令苏炳文，驻扎兰屯旅长张鸣久以及地方一些有枪民团，组织抗日队伍，并印发了白色的面额10元一张的军用票。

1932年8月，我们卫队团转移到讷河一带，马占山在讷河东门里的广信公司接见李振华团长，我们几名营连长亦在座（这时我已提为少校连长）。他在接见我们时，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他已给南京政府和各地军政当局、中国工农红军去电，要求全国一致对外，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二、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顾维钧，即将前来东北调查"中日冲突"，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必须加强抗日军事活动；

三、他将去海拉尔见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去哈尔滨见丁超、李杜两位旅长，联合他们共同抗日。

同年9月间，我卫队团长改由张兢渡担任。一次他率领全团收编不久的一部分地方抗日队伍，从驻地讷河出发，去拉哈尔车站攻打日军小泉联队，激战两昼夜，在即将攻克之际，伪蒙古骑兵赶来增援日本侵略者，致使我军腹背受敌，一部分撤到讷河，一部分退守嫩江。11月，听说马占山途经海拉尔进入苏境。至此，我东北的抗日斗争，因缺乏坚强的领导，又在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再加上不坚定分子的动摇而瓦解了。嗣后，这支抗日队伍有的被改编伪军，有的离开部队，有的进关

另寻他路。当时我也放下枪杆子，回齐齐哈尔家中，隐居10余年。

文末还要提及一件惨痛的事：当年坚决抗日的我卫队团长张兢渡，他不为日本侵略者的利诱，解甲归田。当他乘车刚刚回到齐齐哈尔市，却在火车站被日本浦木师团捕捉住。由于他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被浦木师团长下令枪杀了。

我现在虽然已年过古稀，可是在半个多世纪前那铁马金戈与敌鏖战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每每忆起当年在江桥战役中为国家、为民族而捐躯的诸君，不禁潸然泪下。而最令人喟然可叹的是当年曾并肩于江桥御敌的同仁者中，多有沦落天涯海角，风烛之年，难能聚首，共叙往事，实为憾事矣。但愿他们见到拙文能勾起爱国热忱，为振兴中华和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大业，竭尽全力。如本文能对青年读者有所裨益，则更不胜欣慰。

（高仑　整理，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

马占山遗事

刘沛霖

马占山，怀德人，怀德旧时叫八家子，归奉天管辖，现属吉林省。他绿林出身，报号“大老疙瘩”。江湖生涯使他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就是在烈马驰骋中也可迅疾地下马仆地，并同时发射子弹；就是在飞蝗般的弹雨中，也可娴熟地做“镫里藏身”，奔腾向前；捡起一块马粪，只要嗅上一嗅就能断定马过去了多长时间；黑夜从路旁拾起一块“土拉坷”，只要捏一捏，凭

着软硬的感觉就能明辨方向（土块朝阳的一面质松，背阴的一面发硬）。1911年，马占山投清军吴俊升部。民国年间吴俊升在郑家屯当旅长时，他是连长，驻军怀德。那年月土匪蜂起，在辽吉一带从青纱帐起到庄稼撂倒前活动极其猖獗。马占山带队剿匪，作战英勇，穷寇务追。一次追歼"天下好"匪帮，当双方短兵相接、匪徒已无路可逃时，"天下好"告饶地喊道："干什么'大老疙瘩'，已经给你甩了几个'嘛子'，够你的就行了呗，非得抓住我去请功怎么的？""甩嘛子"是黑话，意思是处于绝境的土匪将新入伙的小伙计或不中用的匪徒扔出去几个，让剿匪的部队抓去报功以求生路的伎俩。

以后马占山在海伦当团长，区官（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分局长）王绍周从散伙的胡子那里得了一支德国镜面"匣子"，送给了马占山。他爱不释手，跟他的儿子高兴地说："把枪库打开，拿出几把，给你二哥！"这区官是投奔马占山去海伦的。他也是怀德人，他父亲是当地开着两家木匠铺的绅士，跟马占山称兄道弟，过从甚密。因此王绍周跟马占山叫"老叔"，很了解点马占山的底细，而且饭后茶余常与人道起。郭甫仁老人就是亲闻者。

"九·一八"事变时，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正在北京。万氏惜钱如命，有时一连三个月不给兵士发饷，即使发上一回，也要每人扣上一吊，所以人们称他"万一吊"。万氏不理正事，虽目不识丁，但"雅兴"颇浓，成天价练习书法，写他那"万福麟"几个字，准备批文件时一显身手。万氏喜怒无常。一次，军署的报话员跟电话局的报话员张雁行给万福麟要电话，因这两个报话员相熟，常开玩笑，所以张雁行说："别瞎说，你净拿'老豆包'唬人！"偏巧被电话机旁的"老豆包"听到，结果张雁行被抓去，挨了一顿军棍。万氏纵子执政。他的大儿子万国

宾乳臭未干，不孚众望，但谁有事请示万福麟，他总是这样问："没问问'大爷儿'吗?"万福麟主龙江的德政换了个美称——"万不是人"。

"九·一八"以后，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日附逆。他的几个儿子，人称"四虎"，这时把两个儿子派到齐齐哈尔做说客。这两只"虎"匪性十足，有的胡子明火执仗地抢劫后便钻入张氏父子的大营，给换上军服，仍招摇过市，没人敢吭气。这两只"虎"生性残忍，一次和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发生口角，竟蛮横地开枪杀人，接着又掉转枪口毫无因由地将自己的随从也一枪打死，这真是比虎豹还要赛过几分。张海鹏的儿子，在齐齐哈尔受到万国宾的接待。人们看到万福麟的儿子和张海鹏的儿子骑着马蹓大街。

形势日趋恶化，要人的公馆大都迁避哈尔滨，军署一片混乱，群龙无首。连万福麟从北京拍的电报，都在一般职员中传来看去。其中有一封很重要，电文是用八裁纸写的，有好几篇，大意是：国宾年轻无知，我远离东北，特委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一职。

马占山就是在大兵压境、省政混乱的局势下受命的。他来到齐齐哈尔，毫无封疆大吏"吆三喝五"的派头。在大街上人们看到，他戴礼帽，着外套礼服呢马褂的棉袍，手拿文明棍，身后跟着两个挎双"匣子"的卫兵。省城各界在省议会召开了欢迎大会。马占山做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即使战至一人，只要一息尚存，也要抗战到底！散会后，正赶上日本双膀飞机窜入齐市在省议会附近低空飞行撒传单。愤怒的士兵用步枪射击，打得敌机"噼哩啪啦"地作响。此时民气激昂，士兵激愤。马占山率部于哈尔葛江桥与日寇浴血奋战，进行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战役。旧历九月廿五，卫队团骑兵少校连长张德新，在打退

敌人的进攻后，巡查韭菜沟到依布气一带的渡口，不幸中流弹壮烈牺牲。他是抗战以来第一个牺牲的军官，省城为他举行了吊唁仪式。吊唁者的队伍在唢呐等的哀乐声中，从大街上缓缓走过。

江桥失利，省城各机关撤退。例如，民政厅长刘廷选带着高级职员去了海伦。留守人员事事不过问，百姓可随意进入民政厅，甚至任人将挂钟、桌椅、炉筒子拿走。当时齐克路并未全线通车，只能从齐市开到泰安，再往前虽敷设了铁轨，但未钉道钉。因而从铁路撤退的军政机关和军械厂，首先集中到泰安镇。泰安的粮栈和客店都住满了从齐齐哈尔去的人。当时军心不稳，秩序很乱，有的士兵在饭馆竟随意向天棚放枪。

齐市的爱国青年，如中学教师、中学学生、律师等，在马占山撤退的第二天也自动撤退。他们总共有三四十人，现在齐市师范学校退休的陶铸仁老师，当时是省一师的教师，就在随军之列。他们到泰安住在一个粮栈里，马占山也住在那里。两三天以后，马占山坐汽车离开泰安，刚过大桥就被截住，幸亏站在车踏板上的卫兵将作乱者一枪击毙，才算脱险。马占山走后，青年们找到参谋长石兰彬，石兰彬让大家去找苑崇谷。苑崇谷为人很好，他所属部队的纪律也远比黑龙江省的军队好。苑崇谷旅长把大家安置在军营住下，并安慰说："不用害怕，不会有什么变故，军营里的底子我都了解。"军营的夜晚非常紧张，有的兵士想离营逃跑，但守门的卫兵强行阻拦，所以推枪栓的"叽喳咔喳"的声音一夜不断。

青年们随苑旅长向克山撤退。为了安全，苑崇谷把青年们的汽车安排在部队的中间。车过了钟知府窝棚，前面就有人截路了。大家的心情紧张，有位叫李远斋的总点火抽烟，大家很耽心火光会引来灾祸。那台倒霉的汽车总出毛病，要一边走一

边给轮胎打气。问到目的地克山有多远，一回回得到的回答总是30里，队伍就是这样缓慢地撤退着。由克山去拜泉就更困难了，连漏气的汽车也没有了，而且路上更乱了。一辆头一天向拜泉去的车，因在癞马沟遭到匪人的袭击，又折了回来，有的人被打死，有的人受了伤，车上的人都血迹斑斑的。大家在拜泉住了一宿，第二天奔向省府所在地海伦。到海伦后，青年们便四散了。人们最恨的是万国宾。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他扣押3个月的党政军费并席卷逃跑，到哈尔滨隐避起来（以后又用这笔钱在北京开了西单商场）。所以有些人，如留日的大阪“高工”学生赵在田等，便去了哈尔滨，打算抓住万国宾跟他算帐。

这时的海伦“热闹”非常，连哈尔滨的妓院也赶去做生意。耍钱推牌九的风气很盛，有人说“上边大推，下边小推”。建设厅长潘景武推牌九赢了大钱，赏了不少给“侍候局”的下边人。他一个当差的李春祥，就是这时候发的财，自己赢的加上潘景武赏的，一共捞了一千多块。回到齐齐哈尔，他用这笔钱从妓院领出个妓女，又开了一个大屠户铺。

马占山，一度降日回到齐齐哈尔。一次，马占山的汽车从正大街向南开去，传说是日本驻齐齐哈尔清水领事请马占山赴宴，宴后又打了半宿牌。接着，消息迅速传开，马占山已离开省城，走了！

后记：本文是根据陶铸仁、郭甫仁、邢介兴、商继春等老人的回忆材料整理的。

（摘自《齐齐哈尔文史资料》总第10辑）

江桥抗战时期省城局势和支前的点滴回忆

麻耀山

1931年初冬，天气逐渐转寒，日寇双翼飞机连续窜入省城上空盘旋侦察。那时中国军队还没有高射机枪，军警就用手枪和大枪射击敌机。在街头巷尾，人们纷纷地议论着战局，省城气氛十分紧张。

我当时在秉彝学校读书（市第三十四中学旧址）。学校组织学生在“东山”挖了战壕。所谓“东山”就是校园东边的土岗子。我们的老师脱掉了洋服，换上了长袍，而且叫学生把教科书埋起来。这意思是，日本人即使进了城也呆不长，把书保存好以备将来使用。我记得，埋藏起来的书中有一本《三民主义》，书里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中侵略罪行的篇章。省城马巡队在大街上不停地巡逻，维持社会治安。军警督察处，每天数次派人在大街上监督巡察。他们出动时，不是5人，就是7人。后边的一个人带着枪，手捧着“大令”。“大令”上边写着一个很大的“令”字。这物件是木制的，高约2尺，顶部呈尖形，象令剑似的，是权力的象征。前边的4个人或6个人排成双行，身上带枪，手拿“黑红棒”，据说用它执法可以打死勿论。《黑龙江民报》不断地报道着，从前线回来的民工兴奋地传诵着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有人说，我军勇敢机智地打击着敌人，没有高射炮就把炮身竖起、把炮筒子绑在大树上，将敌机击落下来。

马占山将军率部浴血奋战的事迹，更加激起了市民爱国支

前的热情。

省令公安局一、二、三署的人员，在各路口设岗，征调民工、马匹和车辆。有位外号叫“李傻子”的马车会长，不仅协助当局张罗车马，而且把自己的几匹好马也送到前线。征调的群众的大车，几乎承担着所有的运输任务。群众赶着支前的大车，来往于省城和江桥之间，运送军队、伤员、给养和弹药。至于有支前任务的商家从业人员和齐昂铁路的职工都不在征调之列。他们上街都带着标志，例如各饭馆的人，都佩带黄色袖标，上边写着饭馆的字号，并加盖商务会的方形印章；齐昂铁路的人都佩白色袖标。还有，穿夹鞋、单衣服的人不征，腿脚不好、身体羸弱的不征，“蹲小店”的不征。那时公园关帝庙下坎到博济工厂（现丰恒街广播电台处）有“工夫市”，开设着品三店、裕丰栈等许多小客店，有许多“跑腿子”打零工的“小店瓤子”在那里“偎冬”。他们都未被征调，因为这些人衣服单薄、鞋脚不周整。我叔叔麻相荣也被征调，因为穿的是“靰鞡”，民工的领队特让他回家去换穿棉鞋。军民同仇敌忾，为保卫祖国疆土而并肩战斗。

我记忆最深的，是饭馆为前线蒸馒头、烙大饼的事。这是由商务会组织的，全市的饭馆连煎饼铺都参加了。芙蓉街、永安里一带的饭馆，就有同心园、天一坊、同乐园、富有园、味美斋和美华春等等，都为支援前线做出了贡献。先是所有饭馆都蒸馒头，可以挂幌半营业。饭馆按自己的任务从商务会领出22公斤的小袋面粉，每袋面粉蒸出26公斤馒头。以后用的面粉是大袋的军用“沙子面”。面袋是白斜纹布做的，袋底上有绿色的菱形戳记。再以后挂双幌的饭馆改烙大饼。这时所有饭馆不挂幌，全部停止营业，支前任务也大大加重了，有的饭馆，如同心园，干脆用大板子交叉地把前门钉死，以防影响劳作。由

于战事，平时成队卖炭的"勒勒车"和"柴火"车进不了城，饭馆的燃料因而很缺乏，但是困难都被克服了。刚开始的时候，蒸馒头、烙大饼只是在白天，后来就白天、晚上连轴转。我父亲麻长荣在同心园掌管面案，支前任务加重后，有十多天都没回家。饭馆的师傅们，听说前方将士吃不着菜，烙饼时就主动加上有咸淡、作料的汤油，以使他们吃好打日本。蒸出的馒头和烙好的大饼晾凉后，装在原面袋里交到商务会（有时商务会也到饭馆去收），再装上插着小黄旗的大车，由穿着灰色军服的兵士押车，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

事情已五十多年，人多物故，仅凭个人记忆写下这个材料。

（刘沛霖整理。摘自《齐齐哈尔文史资料》总第9辑）

哈尔葛江桥

刘沛霖

从齐齐哈尔南去，火车过大兴站十几分钟，就驶在了嫩江大铁桥上。从车窗向西南望去，扑入视野的是一带江崖子，高高的，黝黑黝黑的。过了桥，一直延续到火车站，是鳞次栉比的夹杂零星土屋的排排红砖房，这就是新兴的江桥镇了。

震惊中外的1931年哈尔葛江桥战役，就是在这里和隔岸的大兴发生的。

江桥镇在齐齐哈尔南65公里，位于泰来县东北部，北隔嫩江与大兴乡相望，东临嫩江，西连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南连胜利乡三合村。嫩江同绰尔河汇流后进入泰来县境，东流并转向东南，拐弯处即江桥镇所在。

江桥镇原名“哈尔葛”，也做“哈拉尔葛”，为蒙语的译音，是由前述的江崖子得名，是“黑色崖岸”或“黑岸”之意。江桥镇原为蒙古扎赉特王爷的领地，1892年蒙族牧民乌拉基姆德和高温照类游牧到此，后定居立屯。东清铁路筑成后，人们在此设了摆渡，向昂昂溪运销牛、羊、粮食等产品，从昂昂溪运回烧酒、白面及日常用品。民国年间移民增多，拉了街基，开了买卖、烧锅和油坊，于是逐渐发展起来。洮昂铁路，1920年在此修建大桥；1926年6月通车，并设“江桥站”，从此“哈尔葛”逐步为“江桥”取代。1944年伪满“国势调查”时，镇北头的“街里”人口700余，镇南头火车站附近，包括“马架子”、地窨子，共140户。解放后，这里的发展突飞猛进，1985年4月命名为“江桥镇”。

大江襟带，巨野的拱卫；长桥飞架，江省的锁钥。江桥镇是战略要地。

江桥原为大桥，长度和现在的铁桥相仿，约八百多米，桥址在今铁桥西15步外。大桥北另有4座小木桥，从大桥往北算起，称“一桥、二桥……”五桥在现在的五桥村，离大兴火车站整3.5公里。有些书刊有“嫩江铁桥”一说，实为误会。伪满初期邻木桥修建铁桥。“大同2年”（1933年）7月开工，“康德元年”（1934年）8月竣工。原四座小木桥用从依布气运的土囤死。

“九·一八”后，日寇及其走狗张海鹏进犯黑龙江。黑龙江军义愤填膺，枕戈以待，为扼制敌人，将江桥破坏。有些人说是“炸毁”，实则为“讹传”。我刘润川工兵营先在南桥头布下地雷，并晓谕百姓：不要乱走，否则有危险。以后将大桥中部拆断，人们看见铁轨都耷拉下来。10月13日，张海鹏派徐景隆带兵北犯。徐景隆在南岸用望远镜向北窥探，恰巧触发地雷被

炸死。具体地点是南桥头之东的制高点，离铁路120步，此处之西有棵大榆树。后来大批日军开到哈尔葛。当时江水很大，路基外一片汪洋，敌人除了偷渡别无它法。但是当地只有10来条船，船户们当然不为敌人驱使，早已将船藏好躲避起来，所以日军只能越桥偷袭。偏偏第二日拂晓下起大雾，一直持续到10点多钟，20米以外什么都看不到。日军趁雾从桥上爬到对岸，到傍黑，枪声大作，双方开火。我军在三桥（现铁路公里标"508"处）设下阵地，用机枪向铁路交叉射击，敌人一步也不能前进，一片片地被击毙。鏖战一夜，我军仍坚守阵地。第二天战斗更形激烈，日军派出四五架轰炸机，我军的4门野炮也加入战斗。敌机从江南飞江北轰炸后，到江南基地装炸弹再去轰炸，如此往复不已，一直到第三天上午，我军岿然不动，日军因死伤过重，少许残敌不得不撤退逃跑。

江桥之战，义声所播，震动寰宇，从此哈尔葛蜚声中外。

如今，哈尔葛大桥风光无限：田野，农民送肥、整地正忙；江边，渔工缀网、备船正欢，真是无处不春风。我想，人民心中的丰碑必将在嫩江大地树起，永志为国守土、捐躯的爱国志士！

后记：本文是根据江桥镇人民政府提供材料和采访目击者张书臣、陶长发、赵铁庆等几位老人的口述材料编写的。文中说我军有野炮4门，是确指。张书臣老人说："我军的炮声总是'咚咚'地一连4响。"另，赵铁庆老人说："我军有4门炮，阵地在依布气（即今之大兴乡）南门，就在陶福生现在住房的门前。"

（摘自《齐齐哈尔文史资料》总第9辑）

占领锦州与哈尔滨沦陷

日军侵入 盘山沦陷

孙孟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南满铁路柳条沟事件，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九·一八”事变。当天，日军占领了沈阳。接着，东占吉林，北上黑龙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东北200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完全断送于日本之手。

1931年11月，日军又分兵三路向锦州进攻。一路自沈阳出发，一路自通辽出发，一路自营口出发。三路日军，直逼锦州，其中以营口一路的日军战斗最为激烈。

1931年12月21日，营口日军多门师团开始向田庄台进犯。23日，在田庄台车站东面魏家沟与东北军铁甲车展开炮战，东北军奋勇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另分兵四五百名绕至铁路左侧，向东北军阵地包围。23日午后1时半，东北军被迫退回田庄台。

24日，日军增添大批援军，用大炮、飞机猛击田庄台。东北军被迫退守大洼车站，田庄台被迫占领。

25日，日寇用飞机四五架，向大洼车站大肆轰炸：投弹20多枚，铁轨被炸毁10多节。东北军的铁甲军被阻于大洼站南。但兵士冒着炮火抢修铁路，不久即经修复。26日，日军用炮兵一个连掩护一个中队向大洼猛烈进攻，发射70余炮，路轨又被炸毁。27日早晨，日军以飞机一架作引导，用平射炮一连配合步兵，继续向大洼进攻。但遭到东北军的英勇抵抗，日军败退。9时30分，日军又调集大批兵力，向东北军阵地猛攻，飞机也投弹向阵地轰炸，战斗十分激烈。当地群众激于义愤，自动集合了五百多人前来参战。日军又败退。

28日中午，日寇骑兵三百多名，配有载重汽车30辆，绕至大洼南七八里地方，与东北军铁甲车相遇，双方展开了炮战。至下午2时，因东北军孤立无援，被迫退到盘山。大洼便被日军所占。

大洼失守以后，东北军分兵一股乘日寇不备，收复了牛庄。接着盘山群众也立即行动起来，向大洼反攻。在这样前后夹攻之下，日军于夜间10时，狼狈逃奔营口。大洼、田庄台被收复。

日军退回营口后，贼心不死。营口日军全部出动，疯狂地向田庄台阵地反扑过来。更以飞机4架助战，大肆轰炸。铁路被炸毁，铁甲车被炸坏，东北军又被迫退出，日寇又进入田庄台。

日军攻入田庄台，以闪电之势，进驻大洼，并向盘山方面猛扑。东北军十九旅的六五五团两个连在营长李济民率领下立即投入战斗，十分激烈。日军陆续增援，以飞机、大炮、机枪向东北军猛攻，阵地全被炸毁。东北军英勇奋战，至死不退。最后，两连士兵竟全部壮烈牺牲。1931年12月29日午后1时，盘山和东北其它各地一样，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下，沦陷于日寇。

盘山沦陷，沟帮子失去屏障，锦州相继不保，1月7日，日军长驱直入锦州。

从此，日军便盘踞在盘山境内，进行了十四年的血腥统治与残酷掠夺。但盘山人民却不甘心屈服，以各种形式和敌伪汉奸展开了反抗斗争。

（摘自《盘山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锦州沦陷纪略

熊正平

扑灭两起伪军的胜利

1931年9月底，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在锦州开始办公后，调驻通辽的骑兵第三旅、驻洮南的步兵第二十旅集中锦州附近，连同原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凌河（在锦州东17.5公里）布防，维持辽西一带的秩序；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驻锦州北20里的三屯附近整训。10月2日，日军飞机9架来锦州轰炸交通大学（辽宁省政府办公地址），有俄籍教授一人炸伤了右腿，附近居民伤77人，省府人员无伤亡，次日即分散办公，警务处移住东关一个皮铺院内。

日军进占辽、吉后，即积极进行建立伪政权和组织伪军的活动。10月初，日本关东军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司令部驻盘山沙岭镇。日军派浪人仓岗繁等15人为凌的顾问。当时日本报纸对这股伪军大肆宣传，声称编了18个师，实质上凌印清是个光杆，自己并没有武力，只是给辽西一带的几股胡匪发了些委任状，企图收买胡匪，扰乱锦州。代长官荣臻命令黄显声扑灭这股伪军，

黄即派我带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前去剿办。

我到盘山后，找到了当时任伪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的我的学生单庭秀，说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单庭秀向伪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等传达后，项青山等遂即将凌印清及日本顾问等擒获，只留仓岗繁一人，其余均就地枪毙。随即将搜获的敌伪证据如日本参谋本部的委任书，以及伪司令的大印、伪军编制表等，持赴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赏出力人员现洋5万元，但不许将反正部队编成正式部队，只准成立地方部队或义勇军。遂由黄显声委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驻盘山；张海天（即东北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司令，驻辽中；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驻台安。

11月初，日本关东军又派张学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在黑山县高山子附近张作霖的地窝棚设司令部，乱发委任状，收编辽西一带的胡匪，号称为军队，编成18个旅，并有4个日本浪人做他的顾问，用红蓝白黑（旗右上角）满地黄的旗帜（这也就是以后伪满洲国用的国旗）。这支伪军的声势不如凌印清之大，但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熟悉东北内部的情况，荣臻、米春霖感觉难以处理。黄显声说："谁投降日本作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并且张副司令也不会同意他的堂弟作汉奸的。"他并亲赴北京见张学良建议进剿。后经张学良电荣、米派我率公安骑兵两总队往剿。因我当时驻盘山给项青山等发赏金，编制他们的部队，并处理战俘仓岗繁，乃派第二总队长庄景福带公安骑兵二、三总队，乘火车到高山子下车，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等击毙，并生擒伪旅长荣庭等多人。我将所获证据如伪总司令大印、旗帜、布告、文件等带到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又赏出力人员现洋5万元，并命令将俘获人员一概遣散，不得留用。日本人在辽西一带搞起来的第二批伪军又

被我们消灭了。

日本侵占锦州实况

12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顾维钧与日本大使交涉，双方决定划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留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并防守大凌河岸；同时约定日军不过大凌河，听候国联派调查团前来调查解决东北问题。因此，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陆续撤退至山海关内，留在锦州的武力只有我率领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高级人员只有省府秘书长黄剑秋、警务处长黄显声及其秘书刘澜波等。12月下旬，我派公安骑兵第三总队防守大凌河南岸，以第一、第二两总队驻锦州附近。旋接情报，知日军以第八师团集中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准备了20列火车，拟向锦州、山海关进攻。黄显声即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指示说，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三个总队退入关内。

1932年1月2日，日军第八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我军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三个地点用炮火掩护步兵实行强渡。我守河岸的第三总队开枪还击，双方互有伤亡，敌军最先渡河的7人被我军擒获。时已天黑，我军又无重武器，难以固守，遂向城内撤退，至城内时，已经夜半。黄显声率省府人员退至城西10公里的杨官屯，我仍驻城内，半夜2时，日军开始攻城。4时，我命令炸毁女儿河铁桥，保护省府人员向虹螺岘、锦西撤退。1月3日早10时，日军飞机9架至虹螺岘上空侦察，我全部人马在山坡森林中隐蔽，未受损失。1月4日，日军派古贺骑兵联队向锦西方向来追，我全部人马退至锦西的西南大山中。

1月10日，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退至抚宁，日军进至山海关外前所车站后，即不再前进（当时山海关驻有何柱国的步兵第九旅，山海关外10公里是河北、辽宁两省界限）。日军侵占锦州战事，至此告一段落。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双城阻击战和哈尔滨的沦陷

赵毅*

抗日派与投降派的斗争

吉林省的军政人员，在吉林沦陷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分化成两派——抗日派与投降派。一方面，以熙洽、孙其昌等为首的投降派，早在日军孵翼下组织了傀儡政权；另一方面，以若干爱国军政人员为中心的抗日派，也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宾县建立起抗日救国政权。

在投降派方面：吉林伪组织成立以后，熙洽、郭恩霖、孙其昌、于琛澂等分别向各地驻军将领进行拉拢，威胁利诱，冀使与之同流合污。熙洽首先派吉海路总办李铭书偕同少校副官刘宝元到哈长路线和哈尔滨一带，向各旅团长"慰问"，声言只要服从熙的命令，关于个人地位和军队饷糈等都不成问题。郭则派其参谋处长佟衡及其胞弟郭雨霖，孙则派袁庆濂（袁金铠之侄），分头以私人名义向有关系的将领进行拉拢活动。于则派

* 作者当时系东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

阿城电灯厂长张星桥等持其亲笔信深入部队策动合作。他们都是一方面宣传日本已动员几个师团，兵力强大，难以抵抗；另一方面就鼓吹团结，充实自己力量，消灭异己，然后待机“抗日”。当时坠入他们的圈套起了动摇的大有人在（如驻哈的第二十八旅团长白文清、第二十六旅团长宋文俊等）。

我也是汉奸们拉拢的对象之一。我原是驻双城的第二十二旅第六六二团团长，因旅长苏德臣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去吉林投靠熙洽，张作相命我接任旅长职务。那时候，张作舟的第二十五旅、冯占海的卫队团以及在长春遭到日军袭击的炮兵团、辎重营等都先后集结于松花江以南地区。我指挥的第二十二旅，除第六六一团驻在敦化外，第六六二团和第六六三团都驻在双城及哈长铁路沿线。哈长路因有国际关系，在事变后始终畅通无阻。在吉林、哈尔滨两方对立的情况下，双城便成为哈尔滨的门户，我旅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宾县抗日政权成立后，吉林伪组织要想统一全省，就必须经过双城夺取哈尔滨。因我和他们都有悠久历史关系，所以他们竭力对我威胁利诱，企图使我软化，跟他们同流合污。熙洽、于琛澂先后派车玉堂（双城商会会长）、张星桥、李铭书、刘宝元等人到双城找我会谈，并送到“委任状”任命我为“剿匪副司令兼参谋长”，附送大洋35 000元。我当时把钱收下作为军饷，伪委任状和命令原封退回，并分别函复熙、于，责以大义。后来，孙其昌、郭恩霖两人又以和我师生、同学的关系，分派袁庆濂、郭雨霖、佟衡等分头向我进行游说，均被我严词拒绝。

吉林群奸在向各方面拉拢活动的同时，并抓紧时机利用省军械厂储存的武器（步枪2万多支、子弹约5千万发），以附逆的各部为基干，在日军直接扶持下，很快就编成了5个旅。熙洽

为了统一军事、"扫荡"未附逆的军队起见，于10月底委派前被张作相撤职的骑兵师长于琛澂为"吉林省剿匪司令"（"匪"是指未附逆的军队），委派李文炳、刘宝林、马锡麟、王澍堂、李毓玖等为旅长。当时附逆的各部队下级官兵，都为那些大小汉奸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一时认不清他们的卖国伎俩，故而蜂拥蚁附地作了他们的爪牙，成为汉奸组织的有力工具。

与此同时，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的态度，已由暧昧而明朗化。哈埠系哈满、哈绥两线的国际交通中枢，更为南、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张景惠的职权虽只限东铁特别区，与地方军政素无关系，但因他是张作霖当年的伙伴，资格最老，地位高而且重要，所以他的动向，影响很大。在事变以前，他早已成为日酋心目中的宠儿。板垣退之助不断与张有联系，汉奸谢介石（早已入日本籍）和张的干儿子日人义田经常包围他并为之奔走。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已由日军的宠儿变成了日军的代理人。

原来日军在扶植吉林群奸的同时，就着手在暗中扶植张景惠的工作了。他经日军由沈阳兵工厂拨给步枪3 000支和一部分重武器，以扩充警察队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大事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企图等待时机，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哈埠原驻有丁超和邢占清两个旅，张景惠名头虽高，武装力量甚小，所以他虽然亲日，暂时还不敢公开反对抗日。但到日军侵占了哈尔滨的时候，他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无遗了。

在抗日派方面：初时，人们对熙洽等的认识还很模糊，因熙标榜着"忍辱负重"等等谎言以淆惑视听，欺骗群众；及至10月初清朝遗孽罗振玉、金璧东等潜入吉林后，熙洽的汉奸面目始完全暴露，张作相也对他绝了望。但张始终遥领吉林军政长官名义，对熙的投敌卖国，并未下令撤职，亦从未通电声讨。

迟至11月间，张作相才电令吉林部分军政人员不要听从熙洽的伪命，委派诚允到宾县组织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的汉奸组织相对抗；同时委派原吉林省陆军整理处副监李振声（后来附逆了）到哈尔滨代行边防副司令长官的职权，希望他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结果，因诚允与李振声两人意见不合，互相倾轧，以致数月之间，一事未办。

最明显的是哈尔滨竟成了“三不管”的地区。张景惠虽尚未打起投降的旗帜，却公开进行卖国活动，无人过问。镇守使丁超负有地方绥靖责任，但一则对同时驻哈的邢占清旅无权直接指挥，军事行动不免有所掣肘；二则丁并无抗日决心，虽宣称决不与熙洽同流合污，暗中却派参谋长孙武忱等去给日酋本庄繁送礼物，妄想与日方合作，在哈独树一帜。李振声虽为张作相所委派的全省军政大员，但系只身到哈，又不孚众望，因之一筹莫展。这三个势力各自为谋，互相猜忌，形成谁也不管谁的局面。这种情况，使投降派势力日渐扩大。

约在1932年1月间（旧历腊月中旬），于琛澂的“剿匪部队”五个旅，已编制装备齐全，为了消灭不肯附逆的抗日力量，在日军的主使下开始了军事行动。于亲率李毓玖、马锡麟、刘宝林等旅由舒兰经榆树大举向北推进，1月16日在榆树先把张作舟部（第二十五旅）击溃，并俘虏了张作舟本人和团长任玉山等。同时，于为了进军哈尔滨，要假道双城，一再派人到双城跟我商谈，并直接跟我通几次电话，都被我拒绝。他们看到我的部队是以逸待劳，而且严阵以待，乃绕道拉林，于1月23日在拉林把冯占海部击溃。这是抗日派和投降派武装冲突的开始。

于逆占拉林，曾约我去面谈，我劝他早日悬崖勒马，一致对外。于很不入耳，但因我系哈长护路部队，他既顾虑国际关系，又怕糜烂其双城家乡，故不敢扣留我。最后表示要我相信

他，同他合作，将来他另有主张，并频嘱我于日军经过双城时，切勿冲突，我漫应之。

熙洽等汉奸准备就绪后，即下令撤免丁超、邢占清等的职务，并调动伪军节节向哈埠进逼。但不愿做亡国奴的军人们在这种形势下，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哈埠人心惶惶、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亲率步兵一团，于1932年1月25日夜赶到哈尔滨（道外），混乱局面，开始澄清。他首先会同丁超、王之佑在江北呼海铁路车站约马占山会面，痛陈抗日和保卫哈尔滨的利害。马表示赞成在哈成立统一军事机构，允予派队过江增援，并补助枪弹50万发（实际上他正在作降日的活动）。丁超为了保持地盘，也极力表示合作。遂即由丁、李等召集所有抗日派军政人员在哈开会，决定保卫哈尔滨，并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战军事，公推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同时由李、丁和王之佑、冯占海及我等会衔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号召军民一体奋起抗战。地方团体和银行界拨哈洋50万元支援粮饷，哈埠人心为之大振。至此，哈尔滨便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心，同时也更成为敌伪所要“扫荡”的主要目标。

遗憾的是，李、丁等并未能以斩钉截铁的手段把张景惠消灭，对其卖国活动，竟仍听之任之，不加制止；而张作相对李、丁等在哈的抗日组织，始终未予以正式名义和鼓励，对其成败也是不加闻问。自卫军抗战所以失败，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双城阻击战

吉林于琛澂部先后在榆树、拉林击溃张作舟旅和冯占海部以后，接着就把矛头指向哈尔滨，而双城位处要冲，他们为了配合长春日军的北进，就非控制这个地方不可。

当时汉奸熙洽、孙其昌和郭恩霖等都妄想把我拉过去，但我和部队内的基干却有一个共同信念——不当汉奸，打日本。不过，我们在当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可能跟他们硬碰。因此，我不能不对他们虚与委蛇，以期能在有利时机发挥更大的力量。同时，我也曾对那些汉奸们存着一定程度的幻想，就是希望他们“猛醒”和“回头”。但是，幻想毕竟是幻想，形势逼着我们非同他们决裂不可。

于琛澂一面率领他的主力北上，向哈尔滨进逼，一面派刘宝林旅开到双城东十里铺附近，对我部进行监视和威胁，其目的仍在逼我跟他们合作。我因与刘是熟人，为使其对我不怀疑，不戒备，也曾虚与周旋。同时在吉林省城的孙其昌、郭恩霖也都和我通电话，告我以日军天野旅团兵车即将北开，路过双城，要我表示合作，不可冲突。

我是早已有了作战准备的，除已把所属部队作了适当的部署以外，还控制了3列装甲车。当得到日军将由长春出发的情报时，我看到形势已急，不容再事迁延，遂下了打的决心。2月1日拂晓我亲率约5个营的兵力，轻装急进，把尚在睡梦中的刘宝林旅包围起来，一举击溃，伪军官兵纷纷缴械投降。除刘宝林率领一部脱逃外，被我虏获大小枪五六百枝，官兵七百多人。这一胜利给官兵以很大鼓舞。

我本来只想打日本侵略军，并不想打伪军，但在当时情况下，如不先解除刘宝林旅对我们的威胁，则不但无从实现消灭日军的愿望，反而还有被他们消灭的危险，也更谈不上保卫哈尔滨了。因此，我们心先给伪军一个“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之后，马不停蹄地驰返双城，再作第二个“出敌不意”的部署，等待日军的到来。

我们解决了刘宝林旅后，在赶返双城途中，于兰旗屯集合

向全体官兵讲话。我首先发问："我们已经把卖国的汉奸部队刘旅打垮，今后还应当打什么人？"官兵们异口同声地高喊："打日本！"真有声动天地、气吞河岳之概。我被士兵们这种爱国热情感动得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激动地说："你们真是爱祖国的好男儿呀，我代表东北老百姓欢迎你们抗日救国，感谢你们抗日救国！"这时候，全体官兵们沸腾起来了，弟兄们个个摩拳擦掌，高呼"打日本"、"打汉奸"，情绪激昂，士气旺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痛击日军天野旅团的计划，已经胜算在握了。

然而，事实上双城战役形成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取得了胜利；后一阶段则遭到惨重的损失。

（一）第一阶段，痛击日军天野旅团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一面令第六六三团陈德才部在兰陵河岸老少沟隘路内布置埋伏，把铁道拆毁，以颠覆日军兵车，然后相机予以阻击；一面在双城车站布置埋伏，等待日军兵车开到后，相机予以歼灭。同时把这种计划报告给已经在哈成立的自卫军总司令部，并要求他们派兵增援。

不料陈德才团（后来他投降伪组织，当了旅长）并未执行命令，不但未能给日军以袭击，连铁道也并未破坏，因之未能达到迟滞敌人前进的目的。2月1日（旧历腊月二十三日）午后，侦悉敌人的兵车已经安然经过老少沟，并且渡过了松花江桥，恰巧这时候我们在双城车站的伏击部署已经完毕。约在晚8时左右，北上的天野旅团[①] 两列兵车先后开进双城车站，拟在双城集合，然后展开部署向哈尔滨进攻。因事先熙洽、郭恩霖等都

① 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称：日军向双城进攻的部队是步兵第三旅团，旅团长为长谷部少将。其先头部队乘车到达双城车站的时间是1月30日黄昏，31日晨5时30分受到东北军的袭击。

认为我们一定默许日军由双城通过，甚至还认为我们也决不敢触犯“皇军”，所以向日方提出双城驻军已撤离铁道线的保证。日军也竟信以为真，未作任何战斗准备。那时正是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冬，日军兵车两列相继进站以后，立即整队下车，架枪、吃饭，同时拢火取暖。当此稍纵即逝的时机，我们官兵在一声号令之下，以猛虎搏兔之势，三面发起突击，先用猛烈而集中的炮火和机枪火力把敌人压倒在站台上下，继以刺刀、手榴弹发起白刃战。日军措手不及，真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有的拥作一团，有的钻在车下，有的跳墙爬入附近院落内企图逃命。我们这次奇袭，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天野旅团的主力遭受严重打击。

我们在老少沟的阻敌计划虽未实现，在双城车站的战斗，却完全实现了预期的计划，并且获得相当的战果(据当时估计，打死打伤的日军约计数百名)。这在当时的确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一场激战。这是正规军队抗战继江桥战役之后的又一次胜利，对北犯的日本侵略军，确是一个迎头痛击，对熙、郭、于等汉奸更是一个当头棒喝——警告他们：绝大多数官兵是爱国的，是抗战的。

双城老百姓的帮助，也是令人感激难忘的。他们不仅在战斗前在人力物力上给了我们很多方便和援助；在战斗开始后，还给我们运弹药、抬担架，甚至还有一些青年人竟投身到队伍中参加杀敌；至于烧水送饭，更属余事。

（二）第二阶段，部队遭受惨重牺牲

双城战役，前一阶段是胜利了，可是接着就遭到日军陆空增援部队的突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当我们在双城车站给天野旅团以奇袭时，日军闻讯，立即由长春派出陆空部队驰赶双城应援，除装甲车、坦克以外，还

有飞机20多架配合作战。而我们在奇袭得手以后，未能机动灵活地及时撤出战场保持有生力量。同时，由哈派来增援的王孝芝团赶到双城近郊，看到战事仍在继续，日军飞机已来增援，因而畏缩不前，望风逃去，致使我旅陷于孤立。而且双城地形开阔，目标暴露，我旅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猛烈轰炸之下，遭到惨重的损失。壮烈牺牲的，计有第六六一团团长吴永和、第六六二团营长苏成翙和连长金永山、张金城、李振海、张宝库，排长刘金胜、何万厚等校尉官20余人，士兵伤亡约六七百人(多在车站左右和韩光第坟附近)。

我旅脱离战场向哈尔滨方向撤退后，哈尔滨的门户双城即于2月2日被日军占领。

日军天野旅团由于遭受我旅的严重打击，引为奇耻大辱，当我军撤退后，立即施行残酷的报复，以图泄忿。他们不但将我遗留在战场上的受伤官兵用刺刀刺死，就连已经阵亡的官兵尸体，亦多被剖腹，有的甚至挖心挖眼，并严令地方百姓不准收埋，暴尸达六七日之久，狼噬狗啮，惨绝人寰，直到过旧历年关后（正月初一）才许可地方收尸埋葬。双城人民钦敬这些烈士们为国捐躯，自动捐献棺木，将此数百忠骸排葬于双城西门外十里铺，并树立忠勇墓的标志，以资永垂不朽。

哈尔滨的沦陷

1932年1月中旬，于琛澂部伪军经榆树向哈埠挺进后，在榆树的张作舟旅和在拉林的冯占海部，先后战斗失利，于逆遂得北上至阿城，逼进哈埠近郊。此时哈埠无人负责主持，而形势又日趋紧张，1月下旬李杜由依兰来到后，才扭转了混乱的局面。经过大家集议，决定保卫哈尔滨，并积极准备作战。

1月27日，于琛澂伪军向哈市的上号、南岗、三棵树进攻，

但因伪军人心涣散，并无斗志，在李杜、丁超和冯占海等部队猛烈反击下，纷纷溃退。从此，我军军心大振，哈尔滨局势也趋稳定。

哈埠在击退于逆伪军的进攻后，即于1月31日正式组成了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丁超任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冯占海、邢占清、王瑞华（后来附逆）和我都分别率领所属部队担任作战指挥。

双城失守，哈尔滨的门户已经洞开。日军掌握了哈长铁路线，利用火车增调大批军队，配合飞机、坦克、装甲车，节节北进，于2月2日迫近哈埠南郊地区。哈尔滨外围保卫战遂于2月3日在吉林自卫军总部的指挥下展开。参加这一战役的部队，有邢占清第二十六旅的两个团、王瑞华第二十八旅的一部、李杜第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和冯占海的部队。我部第二十二旅由双城退出后，也立即重加整顿，参加了战斗。当时我方的部署是：王之佑率部队布防于顾乡屯方面，指挥邢占清、王瑞华两部分别防守三棵树、南岗等地；我率第二十二旅（不足两团）防守上号地区，冯占海则率部向敌后迂回。日军于4日开始总攻，展开了激烈战斗。我军官兵都奋不顾身，争先杀敌，确曾给日军以很大打击。

但是，驻哈埠的丁超、邢占清等由于在事变后的4个月间，一贯存着“依靠国联调停”的幻想，观望徘徊，事先对军事毫无措施。及至于琛澂伪军和日军向哈埠进逼，他们才于惊惶失措中策划抵抗；李杜由依兰到哈，才仓卒组成自卫军指挥机构。所以战事发生时，连极简单的防御工事都未构成，只好利用民房、围墙与敌人作战。在敌机轮番轰炸、坦克横冲直撞的强大攻势下，这些素无训练的军队自然不易支撑，然而竟能苦战两日之久，亦不能不算难能可贵了。李杜曾亲临前线指挥，曾把

嗓子急哑，说不出话，要以身殉国，但已不能挽救战局。北满重镇哈尔滨遂于2月6日陷于敌手。

哈尔滨保卫战的失败，使当时吉、黑两省的抗战局势发生急剧的变化。马占山不但未履行其诺言派一兵、援一弹，而且哈埠沦陷不久就公开投降了日军；李杜、丁超、邢占清率部退往江北巴彦，然后又转进到依兰、密山一带；冯占海部曾活动于团山子，然后转进到方正一带，我率第二十二旅退到延寿一带。至此，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战走向沉寂，东北各地义勇军代之而起，展开了以义勇军为主体的抗日斗争。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从前敌总指挥到降敌从伪

王之佑

（1954年7月11日）

当1931年“九·一八”之前10日，我因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父亲死去，前往锦县吊丧。又因我父正在病中，就向张作相请假回兴城县看望父病（胃癌症，已不能食粥，只能饮牛乳和水）。9月14日携带我父诊断书及透视相片去北京协和医院，请求入院。17日回兴城劝我父去北京动手术。正当此间，于9月19日早，由兴城驻在陆军白团长（他是白永贞之子，张廷枢旅长的部属）向我报告，昨晚（9月18日）日寇袭占了沈阳。我就辞别父兄，早车去锦州。当天在张作相家中举行一个会议（参加者：张作相、其弟张作涛、旅长张作舟、张廷枢及吉林军署副长官宋寿山、吉林陆军训练监李振声、秘书长王宝善、团

长陈德才等十余人），决定留张作涛在家葬父，张作相同我们即日由打通路线回吉林。下午约18时许，张作相召我去他家（小凌河西小岭子村），向我说他不走了，令我带同张作舟、陈德才等共约40人，即刻发车回吉林，并传达蒋介石、张学良的命令："不抵抗，保境安民"。我们就由锦州乘专车去打虎山，9月20日到通辽，由王县长和骑兵三旅张旅长告知我们，郑家屯有日寇守备队占领，我们就改扮商民模样买票去郑家屯，当晚改乘四洮路车去昂昂溪。我在车中见到唐某人，他说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已响应了日寇，我们怕到洮南被张海鹏扣留，改在茂林站下车，由当地公安分局援助，雇用大车赴吉林省长岭县，于22日到农安县，得知长春已被日寇占领，驻守二道沟的傅营长以下官兵数十人阵亡。我们23日到张家湾公安分局，向德惠县李县长、永吉县王县长用电话联络，得知熙洽已于22日派安玉珍、张燕卿充代表，由长春把日寇第二师团长多门次郎及军队（原驻辽阳）迎接进入吉林。我们除各回原职责地所者外，均去哈尔滨，继续用无线电（哈尔滨、葫芦岛间）与张作相取联络，并向东北各县及驻军取联络。到10月初旬间，我们已经联络滨江镇守使丁超、依兰镇守使李杜、旅长邢占清、团长赵毅、冯占海（他是张作相卫队团长，因反对熙洽降日，由吉林撤出的）和县长薛翘如（即珠河县长）、孙象乾等抗日。而熙洽则正酝酿脱离中央成立反动政府，并曾派李铭书、齐知政到哈尔滨劝说我回吉林，被我拒绝了。待到熙洽宣布成立吉林长官公署，自任长官，脱离中国的消息传到哈尔滨后，我同丁超的参谋长杨公衡由昂昂溪去锦州，与张作相等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吉林省政府和吉林军队的指挥措施。当时参加的人有张作相、诚允（吉林省政府委员，曾代理吉林省长）、李振声、王之佑、杨公衡、王宝善、徐××（长岭县长）、张作涛等人。决定在哈尔滨成立

吉林省政府，以诚允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王宝善任省委员兼建设厅长，徐××任省委员兼财政厅长，孙象乾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王文佑仍任省委员兼全省警务处长、保卫团总办、清乡局副局长代行局长职务。李振声代行东北边防吉林副司令职务。丁超任东铁护路军总司令兼滨江镇守使。即日电报北京张学良转报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我在散会后去见辽宁省政府主席米春霖（他们已在锦州组成省政府委员会，邢士廉就是委员之一）询问组织情形。当晚回兴城见到父兄，次日改装由长春回哈尔滨。诚允、李振声等到后，我们去见张景惠，说明张作相的命令。他以哈尔滨市民安全为托词，拒绝我们在哈尔滨组织政府。我们于10月下旬得到张作相（此时他也去北京）电许，遂赴宾县组成吉林省政府。李振声在哈尔滨同丁超指挥在吉林省北部的军队，联合反熙抗日。

由1931年10月至1932年1月间，是马占山领导黑龙江省军队抗战期间。丁超曾以一个团兵力援助过江桥抗战。吉林熙洽方面，于此时成立了以刘宝麟、李文炳、马锡麟为旅长的三个旅，又有于琛澂召集匪人编成的李毓久旅和杨秉彝旅（即杨伏波），准备与我们为敌。当1932年1月（阴历腊月中旬），我接到张作相电报：因李振声血压高入院，令我到哈尔滨代理李振声。遂由宾县回哈尔滨，曾与丁超及李杜代表马团长等会商一次饷械的筹措事情。到腊月二十日前后，于琛澂以吉林讨匪总司令名义给丁超快邮代电一件，内容限他三日把军队撤出哈尔滨，以备他（指于说）来接收。丁超决心拒绝，向我要求联络李杜到哈尔滨抗战。我派徐化民接李杜到宾县蜚克图，同冯占海等会议，决定进入哈尔滨，与丁超联合抗战。冯占海部由上号方面、李杜部队由三棵树、太平桥方面立即进入哈尔滨。当日上午在张景惠家里开保境安民、抗拒日伪（指熙洽政权）的

会议。出席会议者：张景惠、丁超、李杜、王之佑、宋文郁（前道尹）、钟毓（吉林交涉员）以及地方绅士、张、丁的部下共约二十多人。决定以张景惠为首联合抗日。午间得到情报，于琛澂率兵三四旅由阿城县境向哈尔滨前进。当时由参加会议的人公推以王之佑任前敌总指挥，指挥在哈尔滨的丁超（步兵约一团，骑兵一营、炮兵一连）、李杜（步兵四营）、邢占清（宋文俊团）、冯占海（此时约一个旅，四千人）的部队，拒止匪军。战斗一昼夜，将于琛澂匪军全部（四个旅）击退。隔一日，又由原驻双城的赵毅旅的一团（赵原是团长此时任旅长，中校吴××任团长）击退了增援于琛澂的刘宝麟旅。再一日由松花江桥的守护团长陈德才报告，日寇的兵车由长春出发，部队长为长谷部旅团长。丁超（此时称东铁护路军总司令）、李杜（此时称吉林自卫军总司令）令我指挥赵毅旅（吴、陈两团）及马团（李杜的步兵两营）、王团（丁超的步兵两营），由哈尔滨向双城出发拒敌。陈德才未抵抗，致日寇安然渡过松花江桥。阴历腊月廿五日晨，日寇兵车进入双城车站，赵毅指挥吴团伏击，激战一日，吴团长以下阵亡百余人（由双城商会殓葬的）。廿六日晨，赵毅向哈尔滨撤退。我在五家子与日寇遇战，廿七日我率马、王两团撤退到顾乡屯，我们在哈尔滨市郊布防——我率邢占清旅的应占斌团、李杜的陈东山团、和张作舟的残余部队张广玺团（这是预备队）防守右翼（铁路至江边）。李杜率他的马泽周团、冯占海旅，以赵毅部下为预备队防守左翼（上号左右）。丁超率他的两团（约四个营）及邢占清的主力，防守中央（以米立斯营房为中心点）。廿八日，日寇以步炮联合兵力向顾乡屯进攻，至夜七八时撤退。廿九日，以步骑兵联合向上号攻击，以机甲与步炮兵联合向米立斯营攻击，遂到中午由中央突破。我在下午3时由顾乡屯撤去，5时许渡江，夜9时到马家船

口与丁、李相会。此次我又死亡了杨营长以下10名，伤约30人（这是1931年腊月廿九日的阴历岁末日）。这天夜里我们同马占山在呼兰会见，决定将第一线的任务交与他，我们在呼兰、巴彦整理部队，人马给养由他担任。次早（即阴历正月初一日）我就奉丁、李命令去巴彦收容部队，并收容宾县吉林省政府人员的撤退。四五天完毕后回呼兰县。得知马占山应张景惠的邀请，去哈尔滨与日寇讲和。又方正县来人，请去方正收容溃兵，我又被派往方正。由巴彦、木兰、通河到方正县后，就开始使用地方警察、保卫团，及山林警察队（统带宋××，驻延寿县，三个营，分驻延寿、方正、苇河县境内，原属吉林保卫团总办直属的）收容溃兵。计收容了冯占海旅、赵毅旅，及张作舟的一部。约在20天后，丁、李到达方正，令我率赵毅旅、邢占清旅，进占珠河县及一面坡（刘宝麟旅在一面坡，退出去了）。

3月中旬，熙洽派孙其昌（原吉林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代表来珠河县讲和。他的说词是：熙洽等不得已而迫降，为的是人民免受兵劫。国联已派李顿为首的调查团，不久到东北调查后，一定能有法制止日本的军事侵略，那时我们听国家的处理。现在先避免吉林内部的斗争，其方法是丁、李、王退出领导抗日，把军队放在北、东各县驻防，一切饷械衣粮由长春总厂[部]发给。请我们派出代表人，准备到哈尔滨与吉林军方代表会商饷械衣粮数目和防地区域。同时并说我们占领铁路交通线，是足以招致日寇的来夺，不如将珠河、一面坡仍交与刘宝麟旅或杨秉藻旅驻防。我们答应了，当时举出丁超作我们的去哈代表，并约定张恕（当时东铁监事长，丁超的先期同学又是亲家）到珠河来接。

1932年5月3日（我是这样记忆的或者稍差）夜，刘宝麟、杨秉藻由电话通知我，说："李桂林（原吉长镇守使，此时任东

铁路警处长）率专车来接代表。”我就由电话通知李杜与丁超，自己由延寿县到亮珠河公安分局与李桂林见面。丁超到后，他决定不去哈尔滨。说：“总得去个人！”他说：“你去吧！”于是由电话向李杜、冯占海商量改派代表，李同意了，冯曾向我说：“不要心眼太实，要加小心！”我于是担任了这个代表，将指挥部队任务交予赵毅，我就同李桂林去珠河（因自己没带人，临时把赵毅（的）参谋长张皋如带走了）。发车后，在中途阿城、双城县界间看到日寇兵车一列，向东驶去，我就觉得不对。到哈尔滨停车，见到张恕同一日人，张恕介绍：“这是土肥原大佐。”于是把我引到哈尔滨日寇特务机关，土肥原贤二向我说：“阁下主持和平，这最好的。”又引我去见师团长（这个师团长大约是多门次郎，我错记为广濑寿助），他也是说些和平好的话。我到此时是感觉到李桂林、张恕把我出卖了，我自己的思想就走向错误的途径，铸成了祸国殃民、人民罪人的大错。于是答了言说：“和平得没有战争，我见你们的兵车已向珠河开去，一到车站下车，我方即可望见，前进不到10公里就会冲突，还有什么和平可能呢？”他就向我要求避免冲突的办法，我遂就他们进占珠河、延寿、方正之线的目的，当时起草了一个给丁、李二人的电报：“我现在是以调停人的资格说话。为避免立即冲突，只有向珠、延、方这条线以东撤退10公里。”又写给邢、赵二旅长的信，内中说：“要避免立时冲突，就得向元宝顶子、中和镇（这两地就是珠河、方正以东10公里）撤退。此意已用电报报告了丁、李二司令，请你们向丁、李二公请命，我不必管了。总指挥部的人，请他们自己决定行止。”（这两个文件是我降敌从伪的主要罪状，以后一切罪行都是由此演变的。今日说起只有痛自悔恨，向全国人民认罪，请人民政府法办，作为叛国的警诫）。由日寇师团部签了这个电报，由张皋如带走了我的信件。

土肥原贤二把我交与张恕在他家里居住，当晚才见到熙洽所派的代表郭恩霖（他是我后期同学，也是我在吉林的好友，他也是这个工作的主要人）。我到此时，并未责他卖友，反而向他请求对于任广福（他原是李振声的参谋长，在我代理李振声职务时，就约他共同抗日的）、李博生（他是警务处督察长，在宾县省政府退走后来延寿充副官长的）等人予以保护及收容。数日后，张恕告知我父已死，我遂在张恕家中居丧，引起我后来为伪满服务罪状。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九·一八事变》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袭扰内蒙

操纵伪蒙军袭扰内蒙

正珠尔扎布

（1954年4月15日）

1906年我生在辽西省彰武县大冷营子（苏鲁克旗），富农家庭，七间房，二百垧地。父，巴布扎布。母，韩氏。姊，月香。兄，浓乃扎布。兄，甘珠尔扎布。妹，德勒齐齐格。

巴布扎布一方面种地，一方面当了地方自卫团长，有30余名团员。常打胡子，有功得了当时奉天将军赵尔巽的奖状。在地方也是闻名的打手。日俄战时参加过日寇召集的洋队。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外蒙独立。1912年巴布扎布要想参加外蒙古，一夜带着家族和30余名部下离开了家乡，奔向外蒙古大库伦。一路打了许多仗，人员越来越增加，到了大库伦在大库伦得了某某将军的称号。后驻屯在哈拉哈河畔，这时部下有3000上下。正在这时候，日本有名的浪人川岛浪速跟满清肃亲王组织了以清朝复辟为目的的宗社党。川岛浪速知道了在哈拉哈河畔有巴布扎布一部分势力可以利用，因此派人勾结了巴布扎布，秘密运送了子弹和炸药。由此巴布扎布部队称为宗社

党的军队。日本浪人参加了10余名。分兵三路要攻奉天，南下一路打了许多仗。1916年到达南满铁路郭家店车站。在郭家店川岛浪速又给了四门青铜炮。正是这时候袁世凯死去，宗社党垮台了（据说日本大隈内阁变了方针，不叫宗社党活动）。因此巴布扎布想要回大库伦，途中又打了几仗，在林西县阵亡。部队失去了头领，四分五裂，一部分占领了海拉尔后被打散，于是完全被消灭了。在哈尔哈河畔住的母亲和我、姐姐、妹妹，被川岛派来的川岛量平，领我们到了亡命在旅顺的肃亲王的家。我们一家成了肃亲王的食客。

1917年我入了日本旅顺第二小学校，怕人笑话，我随便起了一个汉名韩信宝。

1922年肃亲王死去。我上日本入了东京府立第六中学校（校长阿部宗孝）。保护者是川岛浪速，为了方便起见，又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成信。

1926年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炮兵科（队长是月野木正雄、山田一世，最后是金子定一），因为中华队全部是中国人，为便利起见又起了一个汉名字韩绍宏。在东京期间认识了许多日本人。日本人同学差不多都知道巴布扎布这个名字，特别是军人，因此我也就成了巴布扎布将军的御令息（少爷）。都夸奖我父亲，说“蒙古人古来就是勇敢的民族，清朝的喇嘛政策，王公爵位婚姻政策，都是要灭亡怀柔蒙古的政策，因此蒙古人渐渐减少，走上灭亡的道路。你继承父亲的遗志，应该象成吉思汗一样，蒙古独立。”这样的鼓励勉励我，我也就越发得意起来，要想蒙古独立，做一个像成吉思汗的英雄。依靠日寇的思想渐渐树立起来了。我在日本认识的人，大约如下：

畑英太郎少将（后关东军司令官，中将，死后大将）。

畑俊六少将（后元帅，甲级国际战犯）。

日本皇族春仁王小岛吉藏中佐（后任蒙疆司令官，中将）。

田代皖一郎大佐（后中将，关东宪兵司令官，天津军司令官等）。

吉庄干郎大佐（后大将，华南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中将（后大将，中国派遣军司令官）。

金子定一中佐（后少将，伪满协和会待遇）。

盐田清一（日本有名的小儿科大夫）。

大川周明（满铁东亚调查局局长、甲级国际战犯）。

入江种美（黑龙会干部）。

佐佐木安五郎（川岛浪速义弟，国会议员）。

堀内一雄大尉（五十九联队中队长）。

岩田爱之助（暴力团爱之王国社主）。

神崎正义（律师）。

伊达顺之助（暴力团大化会干部）等等。还有其他士官学生多人。

我在日本期间写了两个小册子：一个是《关于蒙古》（二百册），介绍蒙古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这是翻译的）；另一个是《回顾祖国蒙古》（二百册），介绍蒙古人情风俗和喇嘛王公的腐败状况，都是号召日本人来帮助蒙古成立独立国，主张日蒙亲善的（这本书主要由日本人著《蒙古地志》摘录的）。一部分士官学校日本同学签名勉励我说，将来帮助蒙古独立，要经常联络。

1928年7月士官学校毕业回大连家（母亲已由旅顺搬到大连住。我姐姐1919年已跟肃亲王的第十一子宪贯结婚，宪贯死后跟母亲一块生活，1943年死）念书。这个期间的家庭生活费和我的学费，全部经过川岛浪速的手，由肃亲王的大连露天市场拿出来的。母亲70元，我70元（每月）。回大连后访问了在

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中将，又认识了高级参谋大佐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策划人），以后经堀内一雄参谋的介绍认识了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和花谷正大尉参谋。他们都知道巴布扎布名字，所以很容易见他们。没有谈特别什么事，只谈了我想入满铁，研究蒙古事情，将来还想上蒙古当教官等等。他们也鼓励我。学校毕业后无处去当军人，只想当满铁嘱托（嘱托是不受出勤欠勤的束缚，很自由）。恰好满铁理事田边敏行是第六中学校长阿部宗孝的同学（东京帝大），因此求阿部先生介绍。接到介绍信，见了田边理事，过了几个月满铁采用了我当嘱托。

1928年12月我就当了满铁嘱托（200元）。我从小就离开了蒙古，不知蒙古的情况。我自己希望在郑家屯满铁公所勤务（所长是所谓蒙古通菊竹实藏），在这儿研究蒙古是很方便的。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就上郑家屯满铁公所去了。我又为了方便起见，起了一个日本名字田中正。

1929年、1930年之间，所长派我随同满铁牛疫预防注射队，到了西扎鲁特旗和道辽南华兴公司（日本财阀大仓农场有荷兰牛）。满铁由西扎鲁特王买了一千上下的牛放在该旗，叫蒙古人养活，死了只缴皮子就行，满铁称为“预托牛”。在满铁公所时我的任务是没有一定的，帮助抄写誊写版，有时当翻译，此外自己看书，常回大连家，或去奉天找朋友。沈阳有个叫郭道甫的（早在北京认识的），于呼伦贝尔独立失败后，张学良给他开办了一个蒙旗师范学校，他当了校长。郭道甫介绍给我他的学生滕续文（哈丰阿）等十余名学生和张鸿寿等，我们常谈蒙古问题。我本来没有一个蒙古朋友，在此认识了不少青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我在郑家屯，也不知道事变的详细情况，过两三天我上沈阳才知道了日寇开始了武力行动。于是我和我哥甘珠尔扎布上关东军跟板垣高级参谋要

求枪炮，板垣听我们想搞蒙古独立，答应了给3 000支枪、20万子弹，同时派了一个退伍中尉顾问和田劲。我们（蒙旗师范学生）组织了有八大处的蒙古独立军司令部（后改内蒙自治军），一方面联络东科后旗的统领包善一，东科中旗的韩色旺，他们都答应参加。以后枪和子弹运到郑家屯邻站一棵树站，于此和包善一、韩色旺商量编了内蒙自治军。总司令是东科后旗（博王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兼第一军司令；第二军司令是东科中旗（达尔罕旗）协理韩色旺；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甘珠尔扎布；参谋长萨嘎拉扎布（伪满时任兴安总省厅长）；副官长韩凤麟（士官学校毕业，后在德王伪政权，在北京被打死）；秘书长哈丰阿（伪满时任兴安总省参事官，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官等）；宣传处长李有桐（阿斯根，伪满时任上校军事部情报科长）。我没有正当职务，担任后方联络。为了被服的事，上沈阳去了两次。

1931年（10月）在顾问和田劲的指挥下攻击了通辽县（先派了几个便衣，头子是博彦满都，伪满时期他任兴安总省长）。我亲自参加扔手榴弹，伤亡300以上，没攻好，失败后退回大林站。和田劲顾问有气回沈阳，给关东军报告说蒙古军反了，非打不可（和田劲带来的七八名浪人也一同脱离了内蒙自治军）。这个时候，听了内蒙自治军的消息而自己来的松井清助大佐（浪人）看内蒙自治军没反，回到沈阳跟关东军联络，他当了顾问。后关东军又派了退伍少佐盘井文雄、小泽一六八当顾问。以后日寇羽山支队枪没打侵入了通辽县。于是，我驻通辽天惠地局担任与日本军羽山守备队和宪兵队的联络。这时候内蒙自治军的某些人，随便拉来农民的粮食卖，人民受了很大损失。本来内蒙自治军跟郭道甫约定，他由海拉尔来，在兴安岭汇合，可是郭道甫没消息。自治军内部也乱。关东军又派了三个顾问，军

权完全被他们独霸，松井自己称为司令了。我被盘井驱逐，回到大连，无事可做，满铁也不能呆了。

1932年3月1日伪满成立,我参加了兴安局,长官是齐默特色木不勒（郭前旗王），次长是菊竹实藏，政务处长寿明阿，总务处长白滨晴澄，警务科长坂水梧郎。我当了警务科属官（200元）。我受命参加了寿明阿的接受索伦下木局子的工作。又受命随同警务科长坂水梧郎（退伍少佐）上王爷庙分配各旗治安维持用枪。

1933年受命随同满铁的西乌珠穆沁调查队（10余名）（关东军也派了大尉小川泰三郎调查兵要地志，兴安局派了调查科的五十岚浩五郎和我）我去了西乌珠穆沁。菊竹次长回国，依田四郎当了次长（退伍少将）。善邻协会和困劲上锡林郭勒盟，求我找翻译，我介绍了蒙古人满都呼。又善邻协会请来了一批锡林果勒盟王，我受命当了翻译，参观了旅大和沈阳。此期间我跟日本妓女结了婚。

编者注 正珠尔扎布在“九·一八”事变时组织伪内蒙自治军，任军械处长。1932年6月任伪兴安局政务处警务科属官。1937年任伪治安部官房事务官、骑兵上校。1938年任伪兴安军管区司令部上校参谋处长、代理参谋长、司令部附。1940年任兴安骑兵第四团团长。1943年3月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参谋长。1944年3月晋级少将。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九·一八事变》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

关东军招募、训练伪蒙军骨干

郭文林

（1954年5月22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以翻译的名义，随着凌升（此人是大活动家）于1931年10月20日由海拉尔起程，23日到达奉天。我到奉天后，带着森赳少佐的介绍信去见日寇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上尉，我与他取得联络后，他很表示欢迎。对他说明来的意思，他同意与凌升见面谈话，我得到许可后，回到旅馆（日本站万国旅社）。第二天上午同凌升到关东军司令部见片仓参谋，由他的介绍会见了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凌升对他说明了来意，"目的是协助蒙古民族取得自治权"和征求对蒙古问题的意见。板垣征四郎说："现在不能明确的答复，但是很愿意协助你们的活动。"谈话完后我二人辞别，到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处，同他会见后凌升说明来意，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很表示同意。我同凌升达到目的，于同年11月19日由奉天起程回到海拉尔。同年11月29日又由海拉尔起程，12月3日到奉天，这时候蒙古王公都聚在奉天活动（我所知道的有温亲王阳森扎布、图谢图五业王爷、诺勒尔格尔公、巴公爷等人）。这时候我担任翻译联络的事务。当然，阳森扎布为解决该旗的经济困难（这时该旗因为蒙古自治军的到处吃喝而受到严重的损害），由关东军和奉天市公署借用十万元（当时奉天市市长是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通知凌升借给阳森扎布，但是当时阳森扎布已回旗不在奉天，凌升派我到郑家屯去报信联络。我接

到凌升的命令后，冒着危险到郑家屯送信，忠心耿耿完成任务，回到奉天受到凌升的夸奖。

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后，为巩固其占领地位，很迅速地在中国的东北各地建立忠心为日寇服务的军队，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因此，于1931年12月10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上尉指示我急速回海拉尔，招集有初中程度的蒙古青年20名，在奉天日寇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训练6个月，作为将来在海拉尔编制军队的骨干。我接受指示后，得到凌升的同意，于12月10日由奉天起程，13日到达海拉尔后，得到当地贵都统和当地驻军苏炳文的许可，开始宣传召集工作，很顺利的完成任务，召集了满登泰（战死）、胡复光（战死）、富格吉苏（伪满军中校）、莫得尔图（陆军兴安学校军士候补者队队长，上校）、郭通尚（1936年被判刑15年，押在齐齐哈尔陆军监狱病死）、郭文通（铁石部队的骑兵团团长，少将）、拉玛松（伪满陆军中尉）、额仁泰（伪满海拉尔警察学校教官）、倭兴台（1936年被判刑14年，在齐齐哈尔陆军监狱内病死）、委兴泰（伪满军少校）、喜拉布（中校）、阿钦嘎、双和尔等13名。同月21日我带领他们由海拉尔起程，24日到奉天，当日下午送入了奉天日寇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二中队受训练（第二大队长岛本中佐，第二中队长小野大尉）。他们入队后，片仓大尉指示我住在奉天监督，鼓励他们的学习。1932年3月间，贵都统、凌升到日寇守备队视察他们接受训练的情况，看了他们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1932年5月10日训练完了后，我到奉天接他们回来。我到奉天后，到日寇第二大队，当时由日寇守备第二大队长岛本中佐带领到关东军司令部致谢。我代表致谢词，后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大将夸奖他们学习得好，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努力。而后一同在日寇司令部的楼上照相，参加者有本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少将、板

垣征四郎、片仓衷、岛本。当日晚间由板垣征四郎在志诚饭店设宴欢送，祝贺他们的前途光明。当日晚车送他们回海拉尔。

编者注 郭文林，原名色尔鲁格，达斡尔族，1906年生。1929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回国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从事所谓蒙古独立的叛乱活动。“九·一八”事变期间，受关东军板垣高级参谋等人的唆使，随同熙洽、凌升等人参与拼凑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活动。伪满时期，先后任伪军上校侍卫官、上校禁卫军团长、上校侍从武官、兴安军管区上校参谋长、伪第二师少将师长、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兴安陆军学校校长、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九·一八事变》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六

拼凑伪组织　组建三省伪政权

辽宁省拼凑的各种临时伪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沈阳炮制各种临时伪组织

张 志*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实现了它的以武力侵占东北的野心，并且比较快地建立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傀儡政治组织，加强了它的殖民统治。但是，据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6年审判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时的档案资料，特别是象溥仪、张景惠、臧式毅、于静远、阎传绂、阮振铎等这些“当事者”所供述的材料，以及关东军、关东厅、满铁的一些档案资料来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侵占东北后对于其如何进行统治，建立一个什么样式的政权？事先虽然有一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如金井章次等，也提出过一些方案和谋划，但是，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并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方案。正如城野宏的笔供材料所说的那样，只是“到了1932年，关东军认为这种纯军事

* 作者为中央档案馆中央国家机关档案保管处处长，现离休。

的占领统治状态长期继续下去，日本赤裸裸的侵略意图有可能被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所识破，因此便炮制了一个将东北作为同中国相分离的特殊地区，暂时在政治上使之实现独立的方案。”所以“九·一八”事变初始，日本帝国主义所建立的一些伪组织，带有一些杂乱、临时的性质。从档案材料来看，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及其傀儡政权，大体上是经过如下的一个过程：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0月底，是建立临时性质的地方伪政权组织的阶段，如维持会、县市“自治”委员会等，以维持其占领地区的治安统治。从该年的11月至第2年的10月底，是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制定建立伪满洲国方案，并加紧物色搜罗汉奸成立各省区伪政权的阶段。1932年2—3月为筹备建立伪满洲国及其政府期间。

有关伪满洲国成立的问题，是研究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分割我国领土，实行殖民统治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本战犯，尤其是那些重要的伪满汉奸的供词，既是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又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确切的材料。它肯定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有重要价值。故本文将依据有关档案资料，按照上述过程，着重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地方伪政权和伪满洲国政府的经过情况作一简要介绍，一般不作评论，仅供参考。

“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成立的伪组织。

“九·一八”事变初始，关东军主要在沈阳建立了一些临时性的伪组织，它既是关东军为了确保它的军事占领的需要而建立的，同时也表明了关东军对如何实行其对东北的统治，尚无一个统一的方案。其伪组织如下：

（一）由日本人组成的奉天临时市政府

“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占领沈阳后，立即宣布将沈阳市改

名为奉天市，并于9月20日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成立了一个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奉天市的临时市政府。这是当时一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对东北施行直接殖民统治的一个佐证。现将该布告抄录如下：

"关于奉天市政的布告

日本军司令官鉴于奉天城附近现状，为增进日中官民幸福，自昭和六年九月二十日起，按军的指导，由日中人实施该地区之临时市政。

奉天市政区域以奉天城内及商埠地为范围。满铁附属地一仍其旧。

市政业务范围，除特定者外，包括有关奉天市的一切。

市政主要官员如左：

市　　长	土肥原［贤二］大佐
市　秘书	富村顺一
总务课长	庵谷　忱
警务课长	鹤冈永太郎
财务课长	三谷米次郎
卫生课长	守田福松
工务课长	吉川　康
技术课长（兼）	吉川　康
事务课长（兼）	吉川　康

此外，按另外所示，令日中两国人参与其事。

其余细节另行揭示

昭和六年九月二十日

关东军司令官　本庄繁"

根据这个布告担任日本占领后的第一任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是"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驻奉天的特务机关

长，是密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是以日本占领者的姿态任奉天市长的。根据满铁的“满洲国主要日志”记载，土肥原贤二大佐只当了一个月的伪市长，便于同年10月20日将奉天市政交予汉奸赵欣伯为伪市长，并一直到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时，其伪市长才由阎传绂所替代。

（二）奉天省城维持会与伪奉天自卫警察局

日军占领沈阳，在宣布成立以土肥原贤二大佐为奉天市长之后，紧接着又于9月24日策划组织了奉天省城维持会（根据“满洲国主要日志”记载又叫‘奉天地方治安维持会’）。根据阎传绂写的材料，这个奉天省城维持会，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利用当地绅士袁金铠、丁鉴修、阚朝玺、张成箕等，和当时沈阳的法律研究会会长赵欣伯等为发起人，成立了沈阳地方治安维持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维持地方秩序，以赵欣伯为走狗，操纵其事。”阮振铎也供认“伪维持会委员长是袁金铠，副委员长是阚朝玺和赵欣伯，委员是翁问卿、高毓衡、张成箕、吴贯一、王光烈、方煜恩、阮振铎等。伪维持会的日人最高顾问是金井章次，顾问升巴仓吉、高井恒则和三浦等。”根据有关材料，于冲汉，金粲等亦为该伪维持会的委员。

奉天省城（地方治安）维持会所起的作用，据阮振铎供词材料说：“维持会主要是协助日寇筹备和恢复政府机构，维持一时的局面，听候问题的解决。”所以奉天省城维持会成立以后，“首先协助日寇在省署内恢复了各科，并成立了财政、农矿两厅，伪财政厅长是翁问卿，伪农矿厅长是高毓衡，都是袁金铠从委员中派出兼充的。此外还有伪奉天市公署伪市长赵欣伯（继土肥原贤二大佐之后任伪市长），省城的警察大队，由他统辖指挥。”阮振铎还供认，他是由金井章次的介绍，于1931年11月7日开始充当该维持会的顾问，“负责每天收到的公文，和办理

委员长袁金铠与金井章次之间的联络事情。”由此看来，阮振铎对该维持会的活动应该是了解的，其供词是有价值的。

伪奉天省城维持会成立后，袁金铠等人时时都在窥测关东军的意旨，当他所了解到日本将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意向时，他们就想把该维持会变为奉天省政府。关于这一问题，从袁庆清（袁金铠之子）的供词中也得到证实。他说，他在1931年10月回沈阳时，于冲汉曾要其向乃父传话说，如果不赶快成立省政府，发表宣言，关东军不会长久允许维持会存在下去的。袁金铠等为了他们能够充当日本的傀儡工具，奉天省城维持会于1931年10月25日就决议“设立省政府”，又于11月4日，由“袁金铠、赵欣伯、阚朝玺三人，对于地方维持委员会代行省政府职权问题作了慎重商讨之后，决定付诸实行。由阚朝玺就任公安总局局长，增编自卫警察4 000名和保安队员300名，一同担当奉天省城内外的治安维持。奉天省城维持会便于11月7日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等活动。

但是，到1931年11月，因为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已经制定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并且决定以先建立省级伪政权组织，由其宣言独立脱离中央，再由各省联合成立伪满洲国中央政府的办法，以蔽世人视听。为此，关东军遂于12月13日将原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释出，于16日（据“满洲国重要日志”所记日期）派宪兵警察令奉天省城维持会解散，同时宣布奉天省公署成立，由臧式毅就任省长职。臧式毅也说“该维持会亦于是日在武装宪警监视之下突被解散，各委员亦不得真相。”奉天省城维持会就这样被关东军解散了。

伪奉天自卫警察局，是由王庆璋（曾任该局副局长、伪奉天省公署咨议、伪奉天市长、伪邮政总局长等职）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指使下，经奉

天日本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准许后，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即9月21日正式成立的。王庆璋对此有一个较为详细供述交代：

“后来伪奉天自卫警察局虽隶属于伪奉天市政府，但实际是在日本沈阳宪兵分队的控制之下，为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占领统治起了相当的作用，造下了许多罪恶。”

（三）伪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导部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曾于同年11月9日成立“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导部”，并以地方自治为名，在辽宁省各县、市建立由日本人参加并控制的伪政权，以推进并加强其殖民统治，将其魔爪迅速伸到了县、市一级政权中去。

关于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成立情况，据于静远供认：1931年“九·一八”，时，其父于冲汉正在大连养病，但到“11月3日，大汉奸于冲汉忽然赴沈阳，于11月9日当了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当时曾以“身体有病，不能常住奉天”为理由辞却，但关东军则以“住何处均好，可令长子于静远担任自治指导部顾问，有事时可作联络。”的话，要求于冲汉充当自治指导部长。这说明关东军对于冲汉是非常信任的。因为于冲汉是东北有名的亲日分子，他早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过汉语，曾把鞍山铁矿采矿权卖给日本鞍山昭和制钢所。他早就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于冲汉则当即按照关东军的旨意，于11月9日召其子赴沈阳，充当自治指导部顾问，“负责联络工作及代理部长职”，于是于静远就成为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主导者了。伪自治指导部成立后，随即由自治指导部顾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附今田新太郎大尉，带领于静远、王子衡、王秉铎、林钧宝等六七人，去拜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本庄对他们讲了“日本仗义出兵把张家政权打倒了，除去虐政，你们要

努力把地方自治办好”的话。这是伪奉天自治指导部成立经过的大概情况。

关于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性质，据于静远说：“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原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个办理政治的机构（一说是‘政治组织机构’），到1931年11月9日，日寇把它拿出来，令大汉奸于冲汉当伪部长，以掩盖世界的见闻，好来统治东北。”它的“目的和任务是以自治的名义操纵地方政权”。

关于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据于静远供认“共分总务、调查、联络、指导四科，外有自治训练所和监察部，各县有执行和指导委员会。”据阎传绂、阮振铎、曲秉善等人交代材料证明，中西敏宪曾任该部顾问，结城清太郎任总务科长，笠木良明任联络科长，王子衡（后任伪滨江省长）和王秉铎（后任伪北安省长）担任其它科长，林钧宝（后任伪安东省实业厅长）任秘书。自治训练所和监察部都是于1931年12月增设的，并由于静远兼自治训练所长和监察部长。自治训练所的任务，据于静远说：“是养成作为自治指导员的人材，好分派各地替日寇统治东北人民。”该所共办一期，训练十多人（中国人五六人，日本人七八人，朝鲜人一人）。

1928年5月由金井章次发起，得到河本大作、平岛敏夫等人的支持的，由日本在东北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以武力侵占东北为其宗旨的“满洲青年议会”，其骨干成员如结城清太郎、金井章次、甘粕正彦、平岛敏夫、冈田猛马、保保隆矣、松木侠、中野琥逸等，是极端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在奉天地方自治指导时期，“他们参加了自治指导部的工作，成了自治指导部的中坚。”

伪自治指导部在其存在期间，主要是依据关东军的意旨，配合关东军的军事占领，遴选和派遣指导部员，到各市、县、旗

进行所谓组织和指导行政，即建立地方伪政权。其做法是赶走原县官，派遣指导部员充各市、县、旗的参事官，参与市、县、旗的行政，组成由日本人操纵的市、县、旗的自治执行委员会（公署）。据于静远、曲秉善、王子衡等供认，由他们派遣指导部员去组成的市、县自治执行委员会（即公署），有榆树、昌图、海城、黑山、开原、铁岭、辽阳、盖平、营口、安东、抚顺、瓦房店、北镇、盘山、大虎山、台安等三十多个县。据于静远供认仅由他就向“十六个县派遣了二十多名日本人自治指导员”参事官，伪满洲国成之后，就把这些日本人参事官改任为副县长。而伪自治指导部的这一作法，正是开了伪满使用日本人为伪政府官员的先例，实为它的起源。

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于1932年3月“改为‘资政局’，隶属于伪国务院，不久就取消了。”它的多数成员成了伪满洲国政府和伪协和会的中坚分子了。在伪自治指导部解散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特为其举行了招待宴会，并致词说：“诸位为地方自治是有功很劳苦的，今后尚希望为建设新国家而努力。特备粗宴，略表慰劳之意，并祝诸位健康。”这表明关东军对伪自治指导部的活动十分满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

王子衡

事变以后，辽宁出现了“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的汉奸政权，我当时任这个伪组织的秘书，后来又在伪满洲国历任国务

院秘书、黑河省省长、滨江省省长等伪职。下面所写的，都是我在“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一个汉奸集团成员所亲身参与以及亲见亲闻的一些事实。文中关于于冲汉、袁金铠的言论和行动，除了大部分是我所亲自耳闻目睹的以外，还有些是于冲汉之子于静远和他的管事陶某对我讲的。关于臧式毅的材料，主要是1948年我与他同被拘禁在苏联收容所时，他对我亲口所说的事实。

日军侵占沈阳和臧式毅被扣

9月19日凌晨4时，关东报社接到日本通信社沈阳电报说，中国人在满铁柳条沟附近把铁路炸毁一大段，不能通车，日本军民愤怒异常（事后才知道是日方自己毁坏铁路，诬为中国人所为，以作为侵略的借口）。日军已于10时半从日本车站开始向北大营炮击，在坦克车掩护下大举进攻，下午2时已包围北大营，中国军伤亡约有四五百人，支持不住，旅长王以哲率领败兵向东方逃走。

又据电讯称：9月19日晨6时，日军已完全占领北大营，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包围沈阳城。20日电讯：沈阳大小西关、大小南关、大小北关，都已完全被日军占领。现在日军飞机正在上空侦察，坦克车正在掩护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兵工厂、飞行场已被占领，缴获飞机三百多架，航空军司令官张焕相（后为伪满司法部大臣）以下官员都已逃避。

又据电讯：20日下午5时，在东关的中国军反击，日军迎击，中国军死伤五六人，日军无损伤，城里大街小巷已由日军担任岗哨，日本宪兵队正在三谷清队长指挥下沿户搜查中国逃兵（实际上日军借口检查，抢掠财物，污辱妇女）。

仅仅3天，在所谓不抵抗政策之下，中国军大炮500余门、

追击炮500余门、机关枪2 500余支、步枪10万余支、飞机300余架，弹药、器械、被服、粮秣不计其数，都是原封不动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至于银行所存的金银宝物以及居民财物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2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高级参谋、大佐板垣征四郎到臧式毅家，对臧说："本庄司令官本想亲身来见阁下，因为有事不得抽身，派我来见阁下传达意旨。本庄司令官对于阁下的为人是很钦佩的（本庄于1926年前曾充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和臧式毅很熟，并且臧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和本庄又是前后同学），我们对于阁下也是很景仰的。这次不幸演出这样事变，实在遗憾。但是责任应在贵方，我们日军迫于不得已，才出此自卫的手段。我们的目的是中日共存共荣，尤其满蒙地方，必须中日双方携手合作，才能达到开发产业、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目的，才能共同负起保卫满蒙安全的责任，不使满蒙陷入白种人之手和避免赤化（指苏联）的祸患。我们现在很希望张学良将军翻然觉悟，早日归来，共商大事。但是这个愿望恐怕暂时不能实现，所以想请阁下仍以辽宁省主席的身份和我们合作，发出布告，保境安民，负责处理一切地方行政事务。至于阁下的生命财产和地位，本庄司令官负责保证绝对安全，请勿顾虑。"

臧式毅说："让我向贵军合作，颁发布告，保境安民，这是否等于让我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独立自治的意思？"板垣说："是的，这样作对于中日关系、满蒙地方的人民和阁下的将来都是有好处的，请阁下不要犹豫。"臧式毅说："我身为辽宁省主席，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和张副司令的指示以前，对于本庄司令官的意见碍难接受，请原谅。"板垣说："既这样，我就回去报告本庄司令官，但还请阁下仔细考虑考虑。"

日方诱惑臧式毅，是想利用他现有的地位，为日军维持地方秩序，比日军自己去作容易发生功效。本庄看到臧式毅一时不易说服，就于22日夜间派上尉参谋今田某（忘其名）带领卫兵2人到臧式毅家［鲍宅］，声称本庄司令官有事相商，请他到司令官公馆（沈阳旅馆）去。臧式毅虽然觉察事情有些不妙，但迫于威胁，不敢不同今田乘汽车离开住宅。汽车并没把臧式毅送到本庄的住处，却把他送到商埠地汤玉麟住宅监禁起来了。他被监禁以后，饮食供应倒很丰盛，连他抽大烟的烟具和鸦片烟都拿来了。臧式毅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饱吸鸦片，解愁消闷。衣服等物由他的秘书曹承宗送去，但不能见面。他对于外面的情况，当然也无从知晓了。

赵欣伯在土肥原支持下出任伪沈阳市长

9月23日，关东军大佐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受本庄繁的命令，就任沈阳市长，发出布告，恢复市政，组织伪奉天市警察局，委派尹永祯为局长，查封东三省官银号、东三省三畲粮栈（张学良的私人商号）和其他私人的财产，逮捕一些无辜的居民。但是土肥原感觉他到底是个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太顺手，不如利用汉奸来做，既省事，收效也大，于是他把豢养多年的大汉奸赵欣伯拿出来作替身。

在这里有必要把赵欣伯的历史略提一下。赵欣伯原是满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军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恶，常饰旦脚，颇为某阔老（忘其姓名，据说是国民党某要人）所赏识，因而被拉进国民党。1913年，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赵欣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他在演剧时曾与某王公的爱妾勾搭成奸，此时见事不妙，便诱拐她一同逃到大连。赵改名为刘笑痴（实际上赵欣伯也不是他的本姓名），他拐

来的王公爱妾改名为王爱痴（不知其原姓名）。赵欣伯两手空空，生活困难，幸而他能说一口很好的北京话，合乎那时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学中国话维持生活。王爱痴也粗知文字，经日本人介绍在大连公学堂（初高小和初中程度）作初小教员。同时，赵欣伯因国民党的关系，与逃往大连的国民党有联络，为当时大连日本财阀相生由太郎（此人因包办大连码头装卸车船货物，榨取中国劳动工人的血汗而大发横财）、石本贯太郎（包办贩卖鸦片致富）和日本大浪人、大连泰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这三个家伙所豢养，因为这三个人承担替日本军阀政党财阀豢养中国的胡匪党徒扰乱中国治安的任务，以便发动中国内乱，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侵华的机会。因此，赵欣伯夫妇得到这三个日人的资助，于1915年到日本留学。赵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时才把刘笑痴的假名改为赵欣伯。他虽得到资助，生活仍不富裕，还是边读书边教中国话，因此认识了一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各高等专门大学的师生。王爱痴也因教中国话而结识了不少的日本人。王爱痴后因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施行手术时死去。赵欣伯失去了这个摇钱树，生活收入大成问题，心殊不甘。日本军人和各大学教授素与王爱痴有来往的也支持赵欣伯提起诉讼，控告东京帝大医师，要求赔偿损失。日本帝大医科以名誉关系，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诉。该法院又根据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施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来不以杀人论罪为理由，仅以“过失”的轻微处分了事，并没有判处任何赔偿。各教授们就以“刑法过失论”为题，使赵欣伯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博士论文”，赵在各教授帮助执刀之下，抄袭一些前清“大清律”的旧东西，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释，作为论文向东京帝国大学学士院提出。论文内容平常，实在没有通过学士院授以博士学

位的价值，但是日本学者们多念及王爱痴的不幸而死，极力主张对于赵的论文应当从政治意义方面去看，予以通过，授予赵以博士学位。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称号者，这次使赵欣伯享受日本法学博士的荣誉，一方面既可略酬赵夫妇多年来对于日本的各种贡献，又可以取得中国留日学生的好感，使他们积极亲日，以便归国后为日本作些更多的贡献，对于日本实现"大陆政策"也是有帮助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们都支持这个主张。加上赵欣伯到处奔走，哀求各方面帮助，因此日本学士院居然通过了他这个毫无价值的论文，授予赵以法学博士称号。赵在日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日本军阀以为这只可以利用的走狗长期放在日本，没有多大意义，让他回中国会对于日本有更大的作用，因而通过张作霖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也可能是另一位日本军人，记不清楚了），于1926年推荐给张作霖，并加以吹嘘说赵欣伯博士品学兼优，尤其精通法学，为今日有数的学者。张作霖对于一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无所谓重视与欢迎，现在赵欣伯既有本庄的介绍，每月拿出几百块钱赏他碗饭吃，不算什么，便用赵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欣伯获得了这个头衔，在东北政治舞台上总算有点活动资本，就大肆招摇起来，往来于军阀官僚和日本军阀之间，相当活跃。当时大多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屑和他来往，但是他总想联络一帮人造成一股势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学为名，组织一个所谓"法学研究会"，地址设在沈阳博物馆内。又从张作霖那里每月骗去1 000元津贴作为经费，从日本法学杂志里翻译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稿子登载他的《法学研究》刊物上粉饰门面。从此，赵欣伯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摇撞骗，拉拢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壮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为

亲密。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组织伪政权，并叫他作替身，窃充沈阳市长。

赵欣伯钻营多年，一旦如愿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诈，大发横财，旧军阀官僚巨商如汲金纯、张仙舫等都遭殃及。他在三个月里获得巨款60余万元，贵重财物不计其数。10月28日，袁金铠、阚朝玺等正在伪委员长室里对大家胡说乱讲的时候，赵欣伯忽然带领伪警察50余人闯进省政府院内示威，表面上说是市面不靖，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阚等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议论，为赵所知，致有此举。阚当时忍不住怒，便同赵口角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说："我姓阚的外号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怕死。警察弟兄们如果和我过不去，不要客气，请把我枪毙好了。若是面对面不好意思开枪的话，我可以转过身来。"说着便把脸转向里面，大叫道："请开枪吧！"当时大家把阚朝玺拉进屋去，并没开枪。赵欣伯耀武扬威而去，一场小小喜剧至此收场。这时又有一个曾充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阎廷瑞，持有某日本人（忘其名）的介绍信，来沈阳见关东军某参谋，自称以私人资格奉张作霖第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欣伯从中帮忙。赵要求先给他20万元，才能相助。阎说，手下无钱，俟款取出时再给。彼此相持多日未决，事为别人闻知。赵认为阎既不行贿，又破坏他的名誉，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说："阎廷瑞来沈阳表面上说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寇宪兵便把阎廷瑞抓起拷打折磨，一星期后阎即惨死。仅就这一点，即可见赵欣伯当时凶恶到如何程度了。

老牌汉奸于冲汉勾结袁金铠
策划组织伪政权

9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阳城里见老牌汉奸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现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阳住，医疗既方便，早晚又可以同本庄司令官和我们谈谈，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绝吧。"

先是9月初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时，本庄繁路过辽阳，借口慰问于冲汉的病，曾下车到城里见过他。本庄繁于1926年后充张作霖军事顾问时期，与于冲汉很熟悉，彼此可以谈心。这次见面，本庄繁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和将来的行动已暗示一些，于冲汉心中早已有数。他现在听到板垣的话，便知道本庄让他出来，因而想到他自己过去很得张作霖的宠信，和杨宇霆一样，充任张作霖的总参议。张学良当权以后，对于老一辈人很冷淡，自己也就只好呆了下来。再说现在本庄既这样看得起他，他怎能不听命呢？因此，他便回答板垣说："谢谢本庄司令官的关怀和你的厚意，我这几天就想到沈阳见见司令官，只是身体不大作主。请你回答司令官，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到沈阳。"

当时于冲汉患的是"烟后痢"病，大便带脓血，病情不轻，但是他听到主子赏脸呼唤，怎敢不听从。果然，第二天他便到沈阳，住在军署前的通天街的自己住宅里。从此日军大佐参谋板垣征四郎、中佐参谋石原莞尔、少佐参谋和知鹰次、上尉参谋今田四郎和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等出入于家，催促他组织伪政权。

于冲汉在东北政界虽然是个老资格，要比赵欣伯高出多少倍，但终究由于他名声不好，人人齿冷，这次又是干的这样一

种大逆不道的勾当，煞费力气．他也自知招呼不动．恐怕误了主子的大事，遭到责罚。因此，他想把自命为“关外大儒”的同乡老友袁金铠拉出来作帮手（袁曾作过张作霖父子的秘书长，借势力卖官鬻缺，很赚几个钱，在辽阳占买好地1 000余垧）。他把袁金铠请到他家里（袁住在于的对门），躺在大烟榻上作了如下一段谈话。

于冲汉说：“我看东北局面必将彻底改变。日本处心积虑，想要侵占满蒙，为日已久，这次得机会进军东北各地，是实现它的‘大陆政策’的开端，不是简单能够退兵的，并且有根本也不想退兵的样子。”

“其次，老将（张作霖）在世的时候，还能听听我们的意见，遇事有个商量。现在小六子（张学良乳名）这孩子，子承父业，虽有李世民的雄心（张学良曾以李世民自居），却没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军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他被朱光沐、张振鹭、鲁穆廷等等这一帮轻佻纨袴小子们包围住，这能作出什么好事来？”

“第三，日本图谋侵占东北领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蒋介石、张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们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给日本。我们两手空空，无拳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我们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象蒋介石、张学良那样狠心，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设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计就计，暂时应允日军的要求，起来组织临时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稳住日军，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军的蹂躏，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张学良重归东北，我们也不失为守土保民之士，于国于民，可告无愧。我身体本来不好，现

义有重病，不能出去应付。你的精神还好，我希望你出头收拾这个难局。对于日军方面无论有何困难，我当负责交涉，尽力帮助你担当难局，你看怎样？”

袁金铠原是张作霖手下的红人，但自张学良得势后，他这个“袁大儒”就被冷落下来了，他自然很不满意张学良。他本是个利欲薰心、官瘾十足的家伙，听到于冲汉一番怂恿，早已心旌摇摇，认为好机会到了，但是他表面上却假惺惺地装着颇有难色的样子。他说：“这样作，岂不是有失我们一生的名节，叫人笑骂吗？并且我在东北的政治地位也不高，能力也有限，尤其对付日本人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看还是你出来撑着门面，我在后面帮助你比较妥当些。”

于冲汉大笑说：“你这老奸巨滑，还在我眼前说假话！我问你：自古以来所谓名节二字值几个大钱？胜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关于这些，你要比我明白得多了，还装什么腔？我实在病得动不了，请你不要迟疑。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你放心，我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只管出来，我决不能捧你上去，再撤梯子叫你摔下来。我明天就答复本庄，我们就这样办吧。”

袁金铠说：“假如我硬着头皮勉强出来，用个什么名义呢？”于冲汉说：“先打出东北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招牌来，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袁金铠沉思了半天说：“不大妥当吧？”于冲汉说：“为什么？”袁说：“自治二字岂不是脱离中央独立了吗？”于冲汉说：“你又装胡涂了。南京的蒋介石、北京的张学良拿出不抵抗主义对付日本，就等于不要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我们出来维持地方，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这不是我们见义勇为、责无旁贷的好事情吗？还管那中央作什么，难道独立自治不是蒋、张逼着我们去做的吗？”袁说：“你说的固

然有道理，只是东北二字我看用不得。据说熙洽已在吉林独树一帜，黑龙江是群龙无首，正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力量实际上达不到吉黑两省，我看用辽宁二字比较妥当。并且阚朝玺（张作霖时代的热河督统，奉军军长）这个家伙已纠合一帮无赖流氓，在沈阳城内打起所谓‘四民维持会’的招牌，听说还利用一帮日本浪人小仓正治、水上某，勾结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作为靠山，想拥戴恭亲王溥沂为首领，恢复满清，进行复辟。我看可以把阚朝玺拉过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添了这样一个军人代表，比较有利，又可以瓦解四民会，恭亲王非分的野心，也就无从施展。你看怎样？”

于冲汉沉思半天说：“这也使得。但是委员人选不宜过多，越多越乱，不好办。据我看，你担任委员长，我和阚朝玺，再拉上赵欣伯，担任委员，省得他们背后捣乱。本来还有些人可以拉出来，但是怕他们畏首畏尾，不肯出来，暂时只我们4个人也就够了。”

袁金铠说：“还是你担任委员长，对日军方面办事容易。你身体不好，一切事务由我来负责。”于说：“你担任委员长最相宜。你怕麻烦，就叫阚朝玺担任副委员长，麻烦事叫他去挡。我帮助你对付日本人。这样，赵欣伯就无从施其伎俩了。”

袁金铠还是半推半就地说：“好吧，待我明天召集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吧。”

袁金铠组织伪维持会

10月2日，袁金铠在辽宁省政府召集各厅处长开会。当时财政厅长张振鹭、建设厅长鲁穆庭、警务处长黄显声等都在北京，只有教育厅长金毓黻和沈阳县长某（忘其姓名）出席。此外，商务会长、农务会长、教育会长和各法团代表们也都参加。

袁金铠说："目前时局不定，群龙无首，人民无所适从。我们本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拟组织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代行辽宁省政府职权，以安民心。一俟秩序恢复正常，这个会立即解散，决不拖延，大家以为如何？"到会的人大家面面相觑，默无一言。还是沈阳县长某很机警，首先发言说："我看洁老（袁金铠别号洁珊）的意见很对。事到今日，只好这样办。"大家原无成见，便说："洁老识多见广，老成练达，看怎办就怎办吧。"于是沈阳县长某又提议推举袁金铠为委员长，阚朝玺为副委员长，于冲汉、赵欣伯为委员，大家都无异议通过。袁金铠提议张某（忘其姓名）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大家也无意见。辽宁省伪政权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10月3日，袁金凯即以伪委员长的名义把成立伪政权的经过通令各市县，并发出布告。

伪政权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下僚属，都不满意，认为该委员会的声明，既无东北脱离中国、独立自治字样，却有等待张学良归来的说法，这等于是为张学良看家而敷衍日本的表示。因此板垣征四郎等对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对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很不满意，认为不合乎日军的要求。于冲汉只得哀求主子息怒，容许他日后徐图补救。同时日军立派满铁公司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医学博士金井章次为该委员会最高顾问，升巴仓吉为顾问，监督指挥该会遵照日军的意旨办事。金井对于辽宁省政本来一窍不通，因又拉上阮振铎（当时吉长铁路局医院院长，曾在满铁公司设立的南满医科大学读过书，与金井有师生关系）为该会顾问，作为帮手。但是这个伪政权的政令，几乎不能出沈阳城一步，袁金铠坐在辽宁省主席办公室里所委任的一些伪县长，由于地方秩序没有恢复，也不能到差。一群大小汉奸聚在会客厅里，除了胡

说乱道一阵，便大摆筵宴，每饭成席。金井、升巴、阮等除了作福作威、大吃大喝外，也无所施其伎俩。

日军发动事变后三个方案

日军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各大城市，树立了地方的伪政权，组织了伪军警，但是沈阳的伪地方维持委员会，既不合乎日军的要求，也无实际作用，除在满铁沿线上的六七个县外，对于其余全辽宁40余县完全无力控制。加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在9月底后都已移到锦州，并调辽西一带东北军队四五万人据大凌河南岸抵抗日军进攻，使日军不能渡河。日军采取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手段，把豢养多年的流氓汉奸凌印清拿出来，委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占据盘山县一带，招集胡匪天下好（盖中华）、老北风（张海天）、项青山、单庭秀等五万多人，由日军供给枪械子弹，打起青天白日旗，以"救国救民，保卫地方，实行自治"为号召，但不久即为东北军黄显声部所消灭，凌印清被枪决。

但是日军心殊不甘，声称为凌印清报仇，又利用张学良的叔伯兄弟张学成（素与张学良不睦，具有野心）。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张学成找到沈阳旅馆（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利诱他说："日本进军东北，原无侵占东北领土之意，本想促进令兄张学良的觉悟，脱离蒋介石的牢笼，速归东北，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以便共同保卫满蒙，防御赤化势力的侵入。不想令兄张学良执迷不悟，反友为仇，因此请你出来，共同协力剿灭辽西的东北残军，恢复东北秩序。我保障你作一个东北军政两方面的大首领。请你想想，大好机会不要错过。"张学成是个利欲薰心、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家伙，当即向本庄表示愿作犬马。本庄繁就委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供给枪械子弹，在黑山一带

招收胡匪四万多人，打起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旗帜，宣布独立自治，打击东北军。不料还不到20天的光景，就被东北军打散，张学成也被枪决于黑山县。

据当时南满铁路公司顾问日本陆军中将高柳保太郎说，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善后方案原有三个。一个是估计张学良失去了老家，即丧失了政治上的根据地，等于丧家之犬。他为恢复实力，可能改变排日的态度，自动地投降日本，承认和履行所谓二十一条件，同日本合作，实行中日亲善，开发满蒙资源，共同防御共同的敌人（指苏联）。另一个是，如果张学良不肯归来投降日本，日本就从现在东北的中国人物中选一个堪作东北代表的人物，支持他实行东北独立自治，组织一个实行中日亲善的政权。再一个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就把在天津的溥仪弄来作傀儡，组织伪政权，从历史关系来说也讲得下去。尤其大佐参谋土肥原贤二竭力赞成这个方案。高柳保太郎又说，无论哪个方案，都必须把整个满蒙完全侵占后才能实现；现在辽吉两省大部分虽已侵占，黑龙江省还没拿下，辽西一带也有问题，必须军事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较快地达到侵略的目的。

“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伪组织的出现

关东军因为现有的辽宁伪组织很无力，汉奸人物也不够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再三催促于冲汉成立新的伪组织。同时本庄繁又同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联络，要他赶快选定大批青年人物，以便应用。因此，11月1日，所谓“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伪组织便突然出现。这个伪组织设在沈阳城内女子同泽中学，内部组织为部长由于冲汉担任，他的长子于静远、沈阳税捐局长王家鼎、满铁公司文书课长中西敏宪、日本

律师中野琥逸（大连民政署长、著名鸦片贩子中野有光的儿子）为顾问，辽宁省政府资议、大连关东报总编辑王子衡为秘书，满铁公司庶务课长结城清太郎为总务课长，本溪湖煤铁公司秘书王秉铎为调查课长，满铁公司参事笠木良明为联络课长，于静远兼任青年训练所长。担任参事的，有曲秉善、张贤才、吕作新、张汉仁等20余名和满铁职员中参加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组织的其他各方面的日本人200余人。这个伪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日本侵占东北的大陆政策是“除暴安良、合理合法的义举”，监督指导各县行政，调查研究东北人的思想情况，以便作出对策。因此派出大批日军和汉奸，穿着中国棉袍马褂（当时东北人民爱国仇日情绪很高，日本人穿洋服怕遇害，因而都换上中国便服，避免招祸，进行所谓“宣传宣抚”工作也比较方便）。12月下旬，他们叫嚷着要为凌印清、张学成复仇。这些人随着关东军第八师团前往锦州、锦西一带各县大散宣传品，说什么“日军仗义兴师，讨伐残暴，如有暗藏敌军，援助匪徒，破坏日本军事行动者严加惩处；如有帮助日军密报敌人的行动者给以重赏”。东北军终以众寡不敌，于1932年1月上旬自动地向西退却。日军迫近山海关后即不再前进。整个辽宁省至此完全被日军侵占。辽西8个县政府改名为县公署，派有日本人充“县公署”参事，并有汉奸翻译，指导监督县政，进行所谓宣传抚慰、麻痹人民的“自治”工作，为进行建立伪国创造条件。

于冲汉臧式毅的勾心斗角

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被监禁后，虽然物质生活供应不缺，鸦片也得以大吸特吸，而身体不自由，精神太苦恼，感觉生命很没有保障，因而叛国投敌，服从日军的驱使。1932年1月中旬，本庄繁命今田上尉参谋把他接到沈阳旅馆内。本庄对他说：

“委屈了你，对不起。因为阁下在中国的地位很高，影响也很大。听说阁下谅解日本的立场，愿意与我们合作，太好了。”臧说：“过去我想到自己身负政府的委托，个人出处如不审慎考虑，恐难见谅于国人。多日以来，熟思的结果，感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张学良副司令既都没有抗日的心理，区区如我，更不应有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愿尽棉薄，讲求两国亲善之道，以便对中日合作事业有所贡献，也无损于互爱自己国家的精神。”

1932年1月13日，臧式毅由他家来到辽宁省政府。他看到省政府大门的左边挂着“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右边挂着“辽宁省政府”的牌子，心殊不快。走进屋内，他看到日本人金井章次和汉奸阮振铎高踞在省主席办公室里，袁金铠占据了主席小会客室。臧式毅由差役领到大客厅，益发感觉到“衙门依旧，景物全非”。袁金铠等一群人都进来向臧道喜，由袁说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一切情形。臧听后意气沮丧。他激动地说，“我这次回来，是本庄司令官让我照旧主持辽宁省政府的，现在这样，我还象个什么主席？”袁说：“这只好请示本庄司令官取消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我们得以卸却重肩，倒是很愿意的。”他又说：“即使能够这样作，恐也不能恢复辽宁省政府昔日的威权。一则日本最高顾问好象太上皇一样，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已成为省政府的中心。二则现在又有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机关，监督指导各县行政，县长都得听它指挥。并且他们任意更换县长，也不通知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或许今后他们能通知奉九（臧式毅别号），也未可知。”臧式毅被袁金铠奚落了几句，真是啼笑皆非，越发冲动起来，气愤地说，“于云章（于冲汉别号）也太胡闹了。他躺在家里作个维持委员，还不够瞧的吗？为什么又组织什么指导部来篡夺省政府的职权呢？岂有此理！”说着涕泪交流（并非义愤而是鸦片

瘾发作起来），起身就走，回家吸鸦片去了。

臧式毅过足烟瘾后，寻思于冲汉这个老汉奸真是可恼，混水摸鱼，投机卖国，我委屈了好几个月，好容易才出来了，他却躺在家里不动，也不来看看我。第二天他到省政府，下条子撤销所谓“自治指导部”委任的十几个伪县长，使旧县长复职。“太上主席”最高顾问金井章次说：“这样作不好吧？请把条子收回，以后慢慢再说吧。”臧式毅碰了这个软钉子，气愤难平，便到于冲汉家里想跟他争论一番，出口闷气。于冲汉见臧面说：“恭喜恭喜。我近来老闹病，起不来，没能去看你，对不起。我以既老且病之身，替你维持了这几个月的局面，实在累得不得了。你出来了正好，我可得休息一下了。”实际上于冲汉早已知道臧式毅被放出的原因和他的行动，所以说一些先发制人的话逗逗他。臧式毅又被于冲汉奚落一顿，只好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便同于冲汉倒在床上边吸鸦片边谈话。臧说：“我们辽宁省现在有了三个行政机关（指省政府、委员会、指导部）并立，有些不好办，你看怎样？”于说：“你说的一点不错，一国三公，这教人民听谁的好呢？请你设法把三个摊子归拢在一起，我是很希望的。”实际上袁金铠坐上维持会委员长的交椅，岂肯轻轻下来。于冲汉正想利用“自治指导部”的招牌扩张势力，作他的政治资本。臧式毅本想尽点犬马之劳，报答他主子不斩之恩，但又有个太上主席（最高顾问）掌握实权、岂能容他随便作去，真是内外交攻，很不得劲。他们三人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日方更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操纵，因而发出了建立一个统一东北的伪政权的命令。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吉林省伪政权宣告“独立”

吉长汉奸傀儡登场纪实

金名世*

我是爱新觉罗氏，在清朝时期是“闲散的皇族”；熙洽也是爱新觉罗，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我和熙洽有宗族关系。

熙洽1911年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曾担任过当时奉天的官立维城学堂（这是一个专门造就爱新觉罗的子弟学校）的教官，那时我正在维城学堂学习，熙洽是讲兵学的老师，我和熙洽从那时起就相识了。

1924年6月间，张作相继孙烈臣之后任吉林督军，熙洽任吉林督军公署参谋长。当时我是吉长镇守使署中校军法处长。1926年1月起我任滨江镇守使署上校参谋长；熙洽任督办吉林军务善后事宜公署参谋长，因此在公务接触上也就频繁，我们既是同族，关系就较密切。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事变、熙洽

* 金名世，1896年生，辽宁省新宾县人，满族。曾任东北军中校法官、上校参谋长、少将参议和汪清县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本，1932年任伪吉林省警务亍厅长、伪热河省长、伪新京特别市长、伪吉林省长等职。1944年任伪民生部大臣、1945年3月任伪厚生部大臣，直至伪满洲国覆灭。

组织伪吉林省政权时，把我由现任汪清县长调省任伪吉林长官公署机要秘书，以后派为哈尔滨电业局总办，因此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汉奸罪恶事实略知一些，下面作概略的叙述。

一、熙洽迎接日寇“和平”占领长春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陆军第二师团长多门次郎率领天野和长谷部两个旅团由原驻扎地辽阳长驱北上，进犯长春。在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和攻打沈阳城之际，多门次郎所率领的侵略部队就袭击长春南岭的炮兵部队和驻宽城子二道沟的步兵部队，企图占领长春进迫吉林。

当时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因遭父丧，已回锦州原籍多日，所有吉林省军民政务则由副司令官公署中将参谋长兼吉林省政府委员熙洽代理。熙洽遵守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指示，命令驻长春各兵种部队以及吉长警备司令李桂林等分别撤退。他更于9月21日召集吉林省城各机关法团首脑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吉林军民两署是否撤退”。当经多数意见认为事先撤退则地方秩序必定陷于混乱，商民遭受损害。于是由熙洽派少将参议安玉珍前往长春与日寇师团长多门次郎联络，表示欢迎日军和平进入吉林。安玉珍并以生命保证多门的兵车进入吉林，沿途绝对不会遭致袭击。9月22日①，他与多门同车，把日寇平安接入吉林。

多门到达吉林后，即以车站附近日本人所开设的名古屋旅馆作他的师团临时司令部，与熙洽正式见面。多门以占领者的身份、骄傲的态度，命令熙洽在3日内把吉林省城所有撤出吉林附近的部队（如卫队团冯占海所部撤至官马山一带）完全缴械，

---

① 作者回忆有误，多门率日军于9月21日晨进占吉林市。

并指示熙洽应即撤销东北边防副司令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重新组织吉林省独立政府，由他负责与日本军合作。

当熙洽初听到多门的命令和指示，还有些游疑不定，未能及时应允。多门当即站起，带领他的幕僚等退入别室，给熙洽三十多分钟时间，希望他深深考虑。随后一霎时间，即有不知姓名的日寇排长带领十多名日本兵持枪实弹闯入室内，枪口皆对向熙洽，气势汹汹，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这时熙洽的日语翻译刘燏棻（日本商工毕业，时任交涉署科员）认为情势紧迫，立刻就有生命危险，乃痛哭流涕向熙洽跪下说："你老答应方才多门师团长的命令和指示吧！否则是出不去这个屋子的。"熙洽当时尚装作镇静的态度，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就由外边进来，与熙洽坐谈。石射说："此次日本进兵是决不能善罢甘休的。张学良的统治已一去不复返了，将来的东北政权势要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满蒙，改善生活，防止赤祸（指苏联）。阁下应当机立断，祸福利害，就在于此。"

熙洽经日本大间谍石射的一场游说，打动了他平素所抱狭隘民族观念的心弦。这里有简单叙述一下熙洽的身世和思想的必要。

熙洽的先人是清太祖的弟弟穆尔哈齐，熙洽平素具有极深的封建统治思想。当他青年时期到日本留学，即主张"中学为辅、西学为用"，企图清朝变法维新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以巩固爱新觉罗的封建王朝。在他由日本毕业的当年，即遭辛亥民军起义，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成立中华民国。当时熙洽心中极为不满，还想遇有机缘，恢复清朝的统治。他平素对他认为知己的朋友如邢士廉、金名世等谈起国家大事来，曾叹息地说："我的国家（指清朝）早就亡了！"

这次日寇以武装暴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经日寇的威

逼利诱，就更滋长了他所想的恢复清朝统治的野心，拟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而扶起爱新觉罗的封建王朝。这样他就走上了出卖民族利益投敌叛国的道路。

由于石射的勾结，花言巧语的一席谈话，熙洽当时曾对石射说："多门师团长的指示是可以商量的。"石射听到熙洽已作表示，当即退去。旋由多门带领幕僚再度进来与熙洽相见，彼此握手，重叙师生之谊（熙洽在日本陆军学校留学时多门是该校的区队长）。多门告诉熙洽，他的部队已分别占领吉林永衡官银号、吉林军械厂、电报、邮政、车站各交通单位以及军警重要机关，同时并责成熙洽赶快派人分段缴械和召回部队，准许将来整编训练，重新建制，以与日本军合作。熙洽随即表示愿意组织伪吉林省独立政权，更进一步探听多门口气，要求将溥仪接回东北，主持大计。多门答称此事应徐作后图。

于是多门与熙洽商定，取消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改为"吉林省长官公署"，由熙洽任长官，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多门更由他的衣兜内掏出清单一纸，系原吉林省的简任官姓名，他说这些人在原则上一律不准任用，除这些人以外由熙洽自便，惟须拣用没有排日思想能与日本合作的人物；并限制在官银号提款的数额，超过即须有熙洽和他共同盖章，否则不准支付。

二、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的成立和拉拢勾结的活动

熙洽由名古屋旅馆回去就大肆活动，一面积极派人分头劝说各部队缴械，一面找他心腹人员原军政两署秘书张燕卿（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第十子，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荣孟枚（满洲旗人，清末由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自封为关东第二才子）两人，草拟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宣言、通电，取得多门的同

意，即于9月30日由熙洽再度召集吉林省城各机关法团（省方各厅处、省商工会、省农务会、省教育会等）负责人开会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同时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接办吉林省军民两政，撤销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并发表宣言，通电脱离东北政务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当即由熙洽任命郭恩霖（原吉林陆军训练处少将参谋长）为伪长官公署军政厅长，王惕（原永吉县长）为民政厅长，李铭书（原吉海铁路局总办）为秘书长，金名世（原任汪清县长）为机要秘书，孙其昌（原建设厅长）为财政厅长，荣孟枚为教育厅长，张燕卿为实业厅长，修长余（原长春公安局长）为伪吉林全省警务处长，齐知政（原陆军军官教练处总办）为伪吉林省城警备司令，艾迺芳（原吉海铁路局帮办）为伪吉海铁路局总办，谢介石（台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为伪吉林交涉署长，于琛澂（原东北军第十六师师长）为伪吉林省剿匪司令，金璧东（清末肃王善耆第七子）为伪吉长铁路吉敦铁路局长兼铁道守备司令官。

熙洽所组织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在9月30日宣告成立后，他即以伪长官的名义训令全省44县，宣告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的成立，由他执行吉林省军民两政的最高权力，指示各县今后必须遵照他的命令办事。但是当时只有围绕吉林省城附近各县以及延边一带的县份，约共不到20县因慑于日寇的侵略威势，接受了他的命令，其余大半数的县份都取观望态度。

熙洽为了巩固他卖国求荣的地位和发展扩充伪组织的势力，一面通过日本顾问、关东军部附兼日本驻吉林省陆军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熙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生）向关东军要求接济军火，获得了大量武器械弹（详细数字不知），开始招兵买马，成立了四个混成旅、一个铁道守备队司令部，并派原

东北边防军的团长马锡麟、刘宝麟、王树棠和李文炳分任旅长，杨登举任铁道守备队第一区队长，李文龙任第二区队长；以后在11月间根据关东军指示，又成立伪吉林省剿匪司令部，由于琛澂任伪剿匪司令。另一面直接派伪秘书长李铭书和曾任东北边防军骑兵第十六师骑兵旅长的常尧臣先后到哈长铁路沿线各地和哈尔滨，拉拢煽惑驻在的原东北边防军官兵，希望他们向吉林伪政权投降，并饵以原地位不动和饷械照常发给等条件。但当时在东北已掀起了爱国抗日的高潮，凡是稍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能走叛国投敌的道路的，所以这种拉拢勾当没有取到什么效果。

在1931年10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月零两天，我正在汪清县长任上突然接到熙洽的电报，言有要事相商，希即日动身来省，电尾并说前去冬电何故未来，亦未答复。在这天早晨，我看延边日报上刊载消息，说清逊帝溥仪已从天津到达汤岗子。当时我认为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事态将日益扩大，大概要利用溥仪作东北首领以便合作；溥仪之来一定是与熙洽有联络的。当即决定应熙洽之邀，赴吉林看看再说，因于10月24日到达吉林省城，当晚即到熙洽公馆与他晤面相谈。

熙洽把他欢迎多门次郎和平进入吉林，以及组织伪吉林省独立政权，希图恢复清朝统治进行复辟等情节告我后，我问日本是否可靠，有无把握，并劝他不可不慎。熙洽慷慨激昂地说：“你我都是爱新觉罗，为恢复本民族的统治，肝脑涂地也是理所当然。将来成败利钝不应计较。”正在谈话的中间，侍从喊了一声“谢署长到”，接着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蓦然进入客厅。熙洽即起来向我介绍，原来这是交涉署长谢介石。他看熙洽与我似乎还有事相商，旋即告辞退出。熙洽说：“张勋复辟时此人在

外交部任事，为上边（指溥仪）很尽奔走的能事。他与日本方面最有联系，这次是由罗振玉介绍来吉的。”

接着熙洽就谈起罗振玉特意来吉的经过。他说，在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后的第10天，也就是10月9日，罗振玉由旅顺来吉林向他道贺，并为溥仪联络。熙洽说他当时告诉罗振玉，他要鞠躬尽瘁做到复辟，即使不成的话，也要拥戴溥仪担任东北政权的元首；并说他当即写亲笔信交罗转呈溥仪请他回东北主持大计，以拯救苍生。熙洽说到这里，略为沉吟一会儿，乃小声说：“现据极密情报，上边已到旅顺，情况很好。”随后熙洽的话题转了，他说：“现在驻吉林省境内的旧东北边防军沿哈长、哈绥两线，仍是保持原状，未遭破坏，还有相当实力。将来如被日本军各个击破，未免可惜。倘能把这些部队拉拢过来，不但增加很大的声势，并且也有很大的用处，就是为恢复满洲民族的统治也是一支劲旅。可是这些部队的高级将领都是以代理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滨江镇守使丁超的马首是瞻。你任丁超的参谋长多年，你两人很相契合，希望你代表我前往联络，或能成功。”他说：“现在上边（指溥仪）已来东北，局势急转，前途有利，你是义不容辞的。”当时我因受熙洽的“恳切相托”和平素所抱狭隘民族思想的支配，就与熙洽同流合污，答应赴哈联络。

熙洽所谈联络的对象，第一是丁超，第二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对于丁超的说法，是以保全实力，避免被日本各个击破为名，希望表明态度，拥护吉林独立政权，许以实任护路军总司令，所有一切兼职（如滨江镇守使、护路军长、绥司令、陆军第十八混成旅长）一概不动。对于张景惠则是希望在精神上和实际上与吉林省方面紧密联系，采取一致行动。

我衔熙洽之命，于10月27日到达哈尔滨，首先与丁超会

见。丁超表示极为亲热，对熙洽所组织的伪吉林省政权并无微言，只说格民（熙的别号）怎能用郭恩霖当军政厅长，此人乖张自大，办事的能力尚不如艾迺芳（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上校参谋，满洲旗人）。当我提及熙洽为保存旧东北边防军实力，不愿被日本军各个击破，希望他能与吉林方面合作的意图时，丁超说："在我们士官学校同学中我最佩服的就是熙格民。我知道他是有主义（指恢复清朝统治）的人，他的做法我很谅解。我对他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尤其是中、日两国如正式开战，就是集合中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只能打三个星期，就得失败亡国，这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所公认的。首次李铭书和常尧臣前来联络，我对他们是不能说什么的啊！但是对你可以实说，我不反对熙格民的作法。"说着他就站起来走到办公桌的旁边，由抽屉中取出一封信来，他说："不仅是熙格民希望我表示态度，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给我来信也是要求我表明态度。"说着把信送给我看，并说："我已答复了本庄繁，我是遵守蒋总司令命令的。"他的弦外之音就是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意图。他接着说："吾宣（我的别号）到此，全无问题。我准备间依兰镇守使李植初（李杜的别号）以及别位将领联络好，共同给熙格民拍去电报正式表明态度，拥护他的吉林省独立政权，并听候命令改编，不久这封电报就可发出。"

第二天（即10月28日）上午我往见张景惠，他对熙洽非常恭维，说熙洽是他的老师，因为在辛亥革命的那年，熙洽由日本毕业回国后，曾任奉天讲武堂教官，而张景惠是当时巡防营的管带（营长），在奉天讲武堂上学深造，因之是熙洽的学生。张景惠说："你来得很好，我对熙老师的印象很深，因为他的学识高人一等，做事很有魄力，目光远大。"然后他直接了当地说出他与日寇早已有所勾结的实情。据他说"九·一八"事变的

那天，他正在沈阳，第二天早晨就有他认识的一个在哈尔滨做买卖的日本人（姓名我忘了）特意见他并告诉他说，东北的局势变了，希望他赶紧去见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他当即照着这个日本商人的话去见板垣，板垣说："你来的很好。"并征求他对目下时局的看法。他表示回哈后愿竭力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其不遭受损害。又说他只有行政警察，兵力单薄，希望发给军火扩充部队实力。板垣当即应允先拨3 000支步枪，使他扩充警察部队以维治安，并告诉他在一个星期后到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处领取这批军火。在张景惠与日寇板垣勾结停当后，9月24日回哈尔滨，果在一周后即由大桥忠一处领得这批械弹。他就成立了伪东省特别区警察总队（约3000余人），并派东省铁路路警处副处长于镜涛任伪总队长。此后张景惠就凭借这支汉奸队伍，以维持哈尔滨的所谓治安。

在张景惠叙述完他这一段卖国求荣的情况后，我即本着熙洽的意图，希望他今后与吉林方面采取同一步调，遇事要取紧密联络，而张当即接说："我与熙老师是同走一条路的，绝对合作。"又说："希望你回去报告给熙老师好了，并请随时指教。"

我因联络丁、张两人业有成效，遂于10月30日回到吉林，向熙洽报告。正在谈话之间，丁超等人的电报适于此时到来。这封电报是由代理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滨江镇守使丁超领衔，依兰镇守使李杜、绥宁镇守使赵芷香和东北边防军第七混成旅长苏德臣联名。他们正式表明拥护熙洽的伪吉林政权并服从命令等候改编。

三、丁超李杜反正失败后吉长傀儡登场

旧东北军高级将领丁超等既通电拥护熙洽的吉林伪政权，

至此吉林省的大小汉奸合流，都听熙洽的命令了。于是熙洽着手接收吉林省在哈尔滨管辖的各机关。他首先委派他的机要秘书金名世为伪哈尔滨电业局总办、高文元为伪电业局会办、谢介石兼任伪滨江市政筹备处长，李桂林任伪东北航务局董事长。嗣经与张景惠联络的结果，由英顺任伪航务局董事长，李桂林改任伪东省铁路路警处长，王某（名忘记）任伪滨江县公安局长，刘宝源任伪松江下游江上警察局长。随即由我率领这批汉奸接收哈尔滨这些机关。但是不久，日寇关东军就指使熙洽命令伪吉林剿匪军司令于琛澂带领伪军王树棠、李毓九两个旅以及马锡麟、刘宝麟两个混成旅北进。目的地是哈尔滨、依兰。同时关东军并派部附东宫铁男、小野正雄两少佐直接指挥于琛澂的伪军。在关东军方面是不相信熙洽的拉拢，而要直接侵入北满，将旧东北军各个击破，以消灭实力，然后扶植可利用的汉奸以作他的忠实走狗，由他直接操纵。

于琛澂伪剿匪军北进至榆树、双城一带，与旧东北边防军第十混成旅长张作舟（张作相族弟）所部遭遇，曾有激烈战斗。后张作舟败走，但汉奸部队马锡麟、刘宝麟两个混成旅也被击散，而于琛澂只带他的伪剿匪军王树棠、李毓九两个旅进逼哈尔滨。这时关东军更指示熙洽调任丁超为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高等顾问，月薪2 000元。这更激起丁超的猜疑和不满，认为是抢夺他的地盘，乃邀依兰镇守使李杜带队于12月30日晨到哈尔滨与于琛澂伪军对峙，丁超就命他的长、绥司令部的参谋长杨耀钧到电业局捕我，我于事先接得张景惠的电话，告知哈尔滨有变，已到他的“公馆”去了。同日的上午9时，丁超、李杜、邢占清以及哈尔滨道外商务会长李明远等人一齐到张景惠“公馆”议事，由张景惠提议与吉林方面和解，可提出条件由我带回。当时丁、李等同意，希保持原驻地暂缓移防。我在当晚乘

车回吉。其时日寇关东军已命第二师团长多门次郎率天野、长谷两旅团北上支援于琛澂部，丁、李乃于这年12月31日就任总司令，宣布反对熙洽，标榜抗日。后由于丁、李的撤退，日寇第二师团及于琛澂部队侵入哈尔滨。这是日寇侵入北满的开始，为侵略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

丁超、李杜撤退于松花江下游依兰、富锦地区，南至密山、穆棱一带。1932年秋季，因日寇第十师团的进攻，李杜被迫退往苏联境内。据说他个人取道海参崴回到南京，而丁超则在宝清县被日寇包围，他向日寇第十师团联队长塚朝太郎投降。

日寇第二师团侵入哈尔滨后，继续向北满各要地开始进攻。这时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因江桥一度抗战失败，已经退驻海伦。日寇即以马为对象，对他施行利诱和势迫的手段，先由汉奸韩云阶、王守清到海伦拉拢劝他投降，另一方面日本军采取包围的形势。最后则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带领汉奸韩云阶亲到海伦直接与马占山接头。马占山这时才肯表示投降，要求仿照吉林伪政府的先例由他任黑龙江省长官，掌管军民两政的最高权力。至此，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旋板垣征四郎到吉林、哈尔滨与大汉奸熙洽、张景惠接洽磋商成立伪东北政权的勾当。熙洽竭力主张抬出溥仪实行"复辟"，以与日本合作，但板垣只同意由溥仪出任东北"新国家的元首"，而绝对不是清朝的继续，更极力反对复辟的说法，并预示将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地方实力派会议产生"新国家"。当时板垣实行欺骗手法，由他和熙洽订立所谓协定，言明新国家成立后，日本人是立于顾问的地位，尽指导帮助的责任；对于事务的直接处理完全由中国人来行使。但实际上伪满成立后，中国人只是担任机关首领的名义，凡是枢要职位都是日人，中国的首领只是画诺签字而已。熙洽在苏联时曾对我

说，他与日寇板垣征四郎签订的所谓协定，直到日寇投降、苏军解放长春前两天，才从提包拣出烧掉。

在板垣到吉林与熙洽联络后不久，1932年2月中旬，本庄繁即召集所谓东北地方实力派在沈阳开会。计有当时的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伪黑龙江省长马占山四人，就是当时的所谓“四巨头”会议。但在实际上不仅此四人，还有臭名远扬的老牌汉奸于冲汉，伪奉天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长袁金铠，以及日寇豢养多年的走狗赵欣伯也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完全由板垣主持一切。首先决定成立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由张景惠任委员长，熙洽、臧式毅、马占山任委员。由这个伪委员会委员长、委员的名义发表通电，声明东北独立，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第二议题就是成立“新国家”，板垣由他的衣兜中掏出方案，新国家的国名是“大满洲国”，他说明这个“大满洲国”是由五个民族构成，即是满族、汉族、蒙族、大和族、朝鲜族五族协和的国家；首都是长春，改长春为“新京”；以及国旗的样式等等。众无异议，一致通过。

沈阳会议以后，一方面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请愿代表，请求溥仪出山担任伪国的“元首”。熙洽竟嗾使曾任过吉林省旧省议会议长的林鹤皋冒充是东北3 000万人民的总代表赴旅顺请愿。另一方面因伪国的首都长春在吉林省的管界，由熙洽担任筹备伪国政府各机关厅舍的责任，他回到长春后，就开始筹备，指定以前吉黑榷运局为伪国的执政府，旧吉林督军行署为伪国的国务院办公厅舍。随后内定为伪国务总理的郑孝胥来到长春，告知熙洽已经内定他为伪财政部总长兼任伪吉林省长。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二宫等拥护之下，在长春举行就任伪满洲国临时

执政，发表所谓临时执政宣言。当日成立伪满洲国政府，由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兼伪文教部总长，臧式毅任伪民政部总长兼任伪奉天省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未到任），谢介石任伪外交部总长，熙洽任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冯涵清任伪司法部总长，张燕卿任伪实业部总长，丁鉴修任伪交通部总长。同时并以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所谓建国宣言，这个"宣言"是由万绳栻起草的。同日以伪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的名义向英、美、法、意等十七国通告伪满洲国政府的成立。至于伪临时执政府，由宝熙（清末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清朝豫亲王多铎的九世孙）任府中令，胡嗣瑗（清翰林、北京政府冯国璋任大总统时总统府的秘书）任伪秘书长。与伪国务院对等机关则有伪立法院和监察院，由赵欣伯任伪立法院长，于冲汉任伪监察院长。伪国务院于伪国务总理之下，置伪总务厅和法制局。日寇驹井德三任伪总务厅长，三宅福马任伪法制局长。伪总务厅共置企划、人事、地方、主计、弘报，统计六处。六处处长除统计处长是中国籍外，其他五处长都是日寇。当时标榜司法独立，由林棨任伪最高法院院长，李槃任伪最高检察厅长，设置临时执政之咨询机关伪参议府，由张景惠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伪北满特别区行政长官，汤玉麟为副议长（未就任），参议六名，由贵福、增韫、袁金铠及日寇筑紫熊七、龟边沿通、矢田机担任。

（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

南次郎与熙洽密谋建立伪满政权的经过

王稔五

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但在国际间引起了极坏的反响，就是在它国内，也有人抱着不同的意见，因而陆相南次郎不得不引咎辞职，转为军事参议官。不久（日期不详，可能是1931年底，或1932年年初）他就单身一人密来东北，在沈阳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共同研究如何有利于事变的进展。南次郎根据他们拟定的方案，在沈阳先同臧式毅会谈，据说当时臧式毅不肯明白表示自己的意见，只说他本人决心和熙洽合作，一切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对于日军拟定的方案，一任熙洽来决择，他和吉林当局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一来，主要的关键就落在吉林熙洽一人的身上。于是南次郎电令吉林长官公署顾问大迫中佐向熙洽致意说他来访。

某日（日期忘记）夜里，我（当时我是吉林全省警务处秘书兼财政厅秘书）接到财政厅长孙其昌电话，要我在次日清晨和他同车到吉林车站去迎接日本贵宾。我心中纳闷：日本贵宾是何许人？第二天早晨，当我和孙其昌同车去车站的途中，才知道是熙洽派孙其昌为代表迎接南次郎，要我作翻译，而南次郎远道来会熙洽为的是什么，不但孙事前不知，就是熙洽本人也捉摸不透。当时车站内外戒备森严，日本宪兵全副武装，数

步一岗；月台上除有少数的铁路值班人员外，日方迎接的有石射猪太郎领事、大迫中佐和值日日本宪兵队长几个人。南次郎下车后，孙其昌迎上前去，表达他代表熙洽来迎接之意。南次郎由他自己带来的中岛翻译对孙其昌说："请转告熙洽君，我先到领事馆用过早饭之后，在10点钟左右去探访他，我希望能同他单独会谈，不必有外人，翻译由我来准备。"说罢登车而去。

10点钟左右，南次郎带着中岛翻译到吉林长官公署，熙洽从大门外把他迎接到客厅。于是他二人在极秘密之中开始会谈，当场仅有中岛一人作他二人的翻译。尽管会谈是很秘密，其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在南次郎去后，熙洽立即把他们这次密谈的真相，全部告诉了孙其昌。事后据孙透露，南次郎熙洽密谈内容（自然都是熙洽告诉孙其昌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南次郎说：他这次来东北，是专门为同东北当局商讨如何来结束目前东北的混乱局面，希望东北当局能够明确表示态度和意见。

（二）南次郎说：对这方面，日本政府拟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赶走张学良改用张作相，在东北建立特殊行政权，统一新局面；另一个是脱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

（三）南次郎表示：日本政府没有成见，对这方案任凭东北当局自由选择，但是两者之中必行其一。

（四）南次郎说：在沈阳也曾和臧式毅会谈，而臧不肯表明意见，只是说愿意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两个方案听从吉林选择，他坚决同吉林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五）南次郎说：臧式毅既然是对你们吉林是这样信任，那你们吉林就必须要明白表示出自己真正的主张，不使臧氏失望。

（六）熙洽说：东北目前的混乱局面，必须及早设法结束，

不应再事拖延，在这一点上他和日本政府抱有同样意见。

（七）熙洽说：在办法上，他不很同意日本政府所拟定的第一个方案，因为他深知张作相昏庸无能，难负众望，对统辖东北整个的局势，难以胜任。

（八）熙洽表示：对于日本政府拟定的第二个方案极感兴趣；因为溥仪是满清逊帝，东北本是满清发源地，东北人民对逊帝溥仪有一定的感情，所以他同意迎接溥仪来东北。

（九）熙洽表示：他同意脱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建立满蒙独立国，但是顾虑国际上是否加以干涉；他也赞成迎接溥仪来东北，可是怀疑溥仪是否肯来。

（十）南次郎说：任何国际间的干涉，都有日本政府来负责，迎接溥仪前来的一切筹划工作，他们也要安排妥当，这两点都不必有任何顾虑。

在这次密谈中，熙洽明确表示他同意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的态度，很为南次郎所佩服。孙其昌听到熙洽告诉他以上这些密谈情况之后，立即对熙洽表示，他同意熙洽的意见，拥护熙洽的主张，这就给熙洽直接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孙其昌曾这样说过："熙洽对张作相的评价是正确的，张作相根本不可能统管东北的军政大权。至于熙洽为什么要赞成溥仪，这更是不难理解的。溥仪、熙洽都是满清爱新觉罗的后裔，宗族的观念可能导致其复辟的思想。日本人的主张既得到熙洽的同意，则沈阳的臧式毅自然不会反对。看来这是大局已定，大势所趋，还有谁不高举双手表示拥护的呢。"至于熙洽为什么要把这次密谈的情况立即告诉孙其昌呢？原来是这样：在"九·一八"事变前，熙洽是吉林省军参谋长，孙其昌是吉林省署建设厅长，那时期他二人的感情并不十分融洽。但在这次事变之后，吉林省军政双方抗日派都不满意熙洽投靠日寇的行动而纷纷出

走，留下来的孙其昌等亲日派，无形中就形成了志同道合的密友。这些人都是极力拥护熙洽亲日主张的，所以熙洽对这些人自然是封官许愿极尽拉拢，而在这些人当中，要算孙其昌的资格比较老些；并且当时吉林省内各县的县长、税捐局长中，同孙其昌有关系的人很多，熙洽为巩固自己的势力，就不能不借重于孙其昌，因而事无大小都要同他商量，所以尽管这次南次郎、熙洽会谈如何秘密，而在事后熙洽还是要立即告诉他，其原因就在于此。

南次郎这次来东北，总算不虚此行顺利地完成了它预期的目的；熙洽的明确表示，也可以看作是臧式毅所不能反对的，使他收到“一石双鸟”的功效。自然他是极满意的，可是中国东北3 000万人民的悲惨命运就由这次密谈所注定；14年的沦陷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大小汉奸，人民作了亡国奴了！

二

南次郎在吉林得到了熙洽的明确答复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沈阳，自然要一方面把熙洽的主张通知臧式毅要他通力合作，一方面命令关东军要加紧进行筹划，早日建立伪国家。这种情形当然不在话下。吉林方面，熙洽在南次郎走后，立即把密谈的内容告诉了孙其昌、李铭书、荣孟枚、郭恩霖、谢介石、张燕卿、修长余等，随即进行了一系列的叛国活动。

1932年2月14日夜里10时左右，我接到警务处长修长余从长官公署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份文件送来，要我连夜翻译出来。我接到手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誊写油印的日本文的满蒙地方自治章程草案，其宗旨大意是：东北人民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为了反抗张学良等军阀的统治压迫，各市、县的机关法团人民团体，自动地组织起来，成立代表民意的各级

政府，脱离国民党，驱逐张学良，实现满蒙地方自治。其章程内容，有自治会的成立，代表的选举和代表的职责权限等多少章多少款（已记不清）。我看过之后，心想日本人伪造民意，看来满蒙的独立，是势在必行。当时我找来录事一人帮忙，我一面逐条翻译，录事一面缮清，整整忙了一夜，到天亮总算把这份任务完成了。

就在15日这天早晨，修长余从长官公署回来，把这份“满蒙地方自治章程草案”的翻译本拿到手还没细看，就对我说：“你赶紧换衣服，咱们一同到车站，熙长官要你同他们一起到沈阳去。”当时我来不及细问究竟，急忙换好衣服就和修长余同车赶到车站。车开之后，我才知道随同去的有财政厅长孙其昌、秘书长荣孟枚，以及副官、会计、庶务等十几名。熙洽、孙其昌等因整夜未眠，在专车上合衣而睡。我也是长不起精神，慢慢地进入睡乡。一觉醒来，车到长春，下车到大和旅馆稍事休息，下午专车接上满铁线，一路南下。这时候在车上我同孙其昌在闲谈中，才知道熙洽是应张景惠之邀（自然是关东军的授意）到沈阳参加“东北政务会议”，讨论进行筹备建立满蒙独立国事宜。晚8时半，车进沈阳南满站，我紧跟在熙洽身后一同下车。当时到车站迎接的人很多，臧式毅首先上前同熙洽握手，互道“一言难尽！”这时我猜不透他们是一种什么心情。随后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代表本庄繁向熙洽致欢迎之意，然后土肥原、赵欣伯等多人上前致意。继由臧式毅陪同先到大和旅馆，宾主们在大客厅里畅谈（在这里我第一次见着曾在江桥抗战的马占山）。后来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提议说，本庄司令官约请各位明天会面，现已夜深，希大家早些休息。于是主人们相继散去。熙洽一行十几名的住所，关东军原来预备在这个大和旅馆，熙洽认为不太方便，臧式毅另给介绍到城内利达公司（奉天省官营

收购特产的公司），到那一看，熙洽又嫌其狭小，最后搬到三经路德国人经营的凌格饭店。

张景惠（原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驻哈尔滨）秉承关东军的指示：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邀请奉、吉、黑三省首脑在沈阳集会。由于吉林省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已按期到来，乃于2月16日[1] 在沈阳大和旅馆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主持，举行了出卖东北、建立伪国的筹备会议。会议接连举行了四五次，大部分是利用夜间在日本妓馆（八千代翠庄）进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事前由关东军所指定，其中有奉天省的臧式毅、吉林省熙洽、黑龙江马占山、东省特别区张景惠、奉天市长赵欣伯、奉天维持会袁金铠、奉天自治指导部于冲汉。关东军出席的有参谋长三宅、高级参谋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根据关东军制定的建立“满洲独立国方案”，进行互相交换意见。由于关东军方面事先已经分别同上述这群汉奸们有所接触，所以这个方案就很顺利地得到全体同意一致通过。因为关东军仅仅决定了溥仪为满洲国执政，袁金铠为参议，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于冲汉、赵欣伯分别为监察、立法两院的院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等人选，而对国务院下设各部总长的席位一任汉奸们自己去商量分配，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比较表示很大关心。熙洽、臧式毅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他们既舍不得现有省长的地位，而又都想着弄个部的总长当当。同时他们的部下又都分别包围着他们，希望把总长的席位多得几个。经过各方面一再磋商，最后决定臧式毅任民政部总长仍兼奉天省省长，熙洽任财政部总长仍兼任吉林省省长。各该总长由于不能经常到部，设次长一员代理部务。其余尚有五部，外交、实业两部总

---

① 关于这次所谓“四巨头会议”的召开时间，不同史料记载或回忆有所差异，参阅本书《伪满国出笼经过》一文。

长由吉林省选出；交通、司法两部总长，由奉天省选出；剩下一个文教部，留给国务总理适当安插。这样大家都心满意足，会议乃宣告结束。

随熙洽这次前来沈阳的孙其昌、荣孟枚两员大将，在熙洽心目中，认为孙其昌经得多、见得广，有办法、有主张，遇事同他商量，可称为一个好参谋长；所以每次会议归来，总爱向孙其昌叙说情况。同时孙其昌在这里又一天一趟去拜访老前辈袁金铠、于冲汉两位辽阳同乡，直接间接地得到很多消息。起初孙其昌认为，这次的国务总理一席，可能是熙洽，因为熙是头一个赞成日本人在东北搞独立运动的，而且又是溥仪的宗族，那么他自己可以弄个财政总长当当；但是后来的情况不是这样，感到非常泄气。当熙洽从会场带回来吉林省分得外交、实业两部总长和财部次长席位时，在孙其昌脑海里起着很大的斗争；为名自然是总长的地位高；为利也得说财政部次长的油水好，一时之间取舍无定。正好在这时期，张燕卿（吉林省实业厅长）和谢介石（吉林交涉署长）从吉林赶来，熙洽把孙其昌、荣孟枚、张燕卿、谢介石等人都召到屋里，共同商量如何来安排总长人位的问题。熙洽表示要让谢介石担当外交部总长，让孙其昌担当实业部总长，张燕卿担当财政部次长，问大家的意见怎样。大家认为谢介石、孙其昌分掌外交、实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张燕卿一再表示，说财政部的事务比任何部都复杂，总长既然不能够经常到部，就势必有一位熟悉财政情况的人来代理部务，才能不负总长的托付，自己对财务行政一窍不通，怎么能胜任呢？大家虽然认为张燕卿说的有道理，但是一时谁也说不出好的办法来。沉默了一会，孙其昌说："这样吧，我和张燕卿调换一下，让他到实业部我到财政部，替熙二爷掌这个摊子，部长也罢，次长也罢，我不考虑这些，我总认为吉林的事情就应当我们自己

来解决。”大家都说这样也好。就这样，吉林省分得的总长席位人选确定了。张燕卿很幸运地得到一个伪实业部总长。从这天起他和谢介石，心情焕发，一道地在沈阳向各方面大事活动。

以后溥仪在日本人的欺骗利诱下，欣然应诺来东北主持大计，由关东军派员把他先从天津带到旅顺，然后又转到汤岗温泉，最后于3月初送到长春。3月8日，溥仪在伪新京（长春）正式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同时任命了伪满洲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并举行了特任式，于是伪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3月9日以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为首，举行第一次阁议（各部总长内阁会议），出席的有：民政部总长臧式毅、财政部总长熙洽、军政部总长马占山、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原关东军政治部长）。会议讨论各部的组织机构和司长级以上的人事安排事宜。本来各部总长对部内的人事安排，早在心目中都有了初步计划（有的正在封官许愿），但是谁也没有马上提出来。这时候驹井德三以总务长官掌管人事的身分，拿出一份各部日本人主要官员的名单向大家宣布。按照这份名单，则各部的总务司长和其他主要司长都要日本人来担当，这的确是使大家感到愕然，都在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沉默片刻，熙洽说：“这怎么能成呢？满洲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名日本人作顾问则可以，安置这些日本人作官，成何体统？”驹井一听勃然大怒，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满洲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它包含着满、汉、蒙、日、鲜五个民族的国家。它有五种民族的老百姓，就要有五种民族的好官吏，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况且满洲国是怎样成立的？难道说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日本人是诚心诚意地希望着满洲国将来是能够富强康乐的，但是这种富强康

乐，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所以说日本政府派遣它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这完全是一份好意。你们就应该表示欢迎，而不应该稍有敌视和怀疑。”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不敢正视他，一个个默不作声，会议也就不欢而散。据孙其昌说熙洽懊丧而归，大有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之慨，但是人们有谁能肯相信熙洽受到这次打击之后，能够真心悔悟呢？

（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

黑龙江省的所谓“东省特别区自治”

板垣征四郎诱降张景惠

松本益雄*

昭和6年（1931年）5月，我被调哈尔滨任总领事馆对华关系的负责人，在大桥忠一总领事的领导下工作。

哈尔滨是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事参议院议长张景惠的根据地。张身为东北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在北满握有实权。因身兼南京的军事参议院议长之职，因此，常常往来于奉天和哈

* 曾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秘书官，1986年6月曾来长春访问，他表示愿以有限余年，为中日友好事业做贡献。

尔滨的公馆。

日本外务省拟借助于满洲军阀元老张景惠的协助，和平解决爆发前夕的满洲问题，便于昭和6年5月，把北京公使馆的一等书记官大桥忠一调任哈尔滨总领事，伺机同张景惠会晤。

恰巧昭和6年旧历五月四日是张的诞辰，张从南京返回哈尔滨。于是，大桥和我以祝寿为由拜访了张公馆，说明日本的真正意图和对张的希望等与张恳谈时，张也表示予以理解。

事件爆发后，我们与从奉天归来的张景惠第一次会面是9月22日。访问张时他说："今天在奉天车站见到板垣并进行恳谈，了解到日本的真正用心，因日本答应供应武器，所以决定建立禁卫队。"

从谈话中不难看出张欲协助日本，正在考虑北满，尤其是黑龙江省的独立。把当时的黑河镇守使马占山召回哈尔滨，转达日本的意图，斡旋与板垣会面的也是张景惠。在我方来说，因为其后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险恶事件不断发生，所以大桥总领事要求军方保护侨民。

然而问题是要看苏联的态度如何？我们对向苏联权益的北满中东铁路方面出兵，作了预测，试探苏方中东铁路负责人的意图时，出乎预料地毫无抗议的样子。他说："必须在距离哈尔滨远一些的地方横跨铁路就不加干与。"

于是关东军便坚定了进驻北满的决心。

11月初，板垣带领驹井德三（关东军最高顾问），住谷主计和其他满铁的青年干部（山口、赤濑川、是安等）来到哈尔滨，在武藏野饭店与张景惠恳谈。

最初我没有出席，但因张景惠挂来紧急电话约我速去，便于午夜11点后赶到饭店，一看，这个宴会的确是杀气腾腾。住谷主计一只手握着手枪，和其他年轻人围着张景惠，前面展开

一份文件，充满了险恶的气氛。但是板垣却一如既往，保持着温和的态度，抚摸着下巴默不作声。不难看出，可能是张拒绝了日方提出的要求。

我看到这种气氛，便请求板垣赶快让这些青年退出，板垣习惯地说好!好!。板垣和驹井我们三人和张进行了彻夜的谈判。

谈判的内容是将来满洲独立时，要求张站在有代表性的立场上。日方的条件是：要求同意日本人民的居住、营业拥有土地；日军驻屯；建设飞机场；聘任日人顾问等9个条件。张却以“如果答应这些问题，便失去任何权力，我将被诽谤为卖国贼，这对日本也不利。很久以来熟知日满关系的我，也认为这些条件是合理的，但是现在我不能就任这个职务。”他一直在顽固地拒绝着。谈判继续到第2天早晨5点，结果张景惠还是不肯签字。但是双方疏通了相互间的感情，在恢复了明快的气氛中分手一事，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中。

板垣这个人尽管在这种场合也不动肝火，并又顾全满洲人的面子，从容不迫地以温和的态度相待，使我深受感动。

在同年12月31日，张景惠决定黑龙江省独立，着手起草独立宣言。在元旦黎明前，飞机就起动了发动机待命出发。张的秘书和我忙于起草，经张签字后，便在元旦直飞奉天的关东军司令部了。

到达奉天的军司令部时，参谋部有一位留着长髯身材魁梧的参谋，便把独立宣言的文件交给了他，他高兴地慰劳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便是年轻的片仓参谋。

我记得当时板垣和张景惠的协定内容是:政体为共和制;预定张为总理；日人官吏限在300人以内。

张作霖、张景惠、张作相被称为满洲的张氏结义三兄弟，张景惠比张作霖年长4岁位居老大，他们是日俄战争前结成的统

一战线伙伴。在日俄战争前俄军进驻满洲时，与俄交战而败阵的张作霖命在旦夕，携带夫人抱着年方3岁的学良跑到张景惠家中暂时避难。

据我看来，板垣与张景惠很投缘。从悠闲而寡言，气度宽宏这一点来看性情确实相投。

有一次我随同张景惠、板垣同乘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闲谈时，张说："满州的居民很贫困，满洲的农民只能在过年时吃一次大米饭，尔后便是高粱和稗子了。"

板垣接过话题说："我老家岩手县的贫苦农民平时也是常吃稗子，我少年时也常吃稗子。"一边说着也发出"稗子"的中国音来。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发音。板垣常年在中国生活，并听说他还到过昆明，但他却说中国话一窍不通，要用翻译，现在看来连我这个翻译都不知道的词他却知道。

（摘自《板垣征四郎》，《长春文史资料》总第25辑）

于琛澂东山再起当了汉奸

于也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相继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当熙洽开门揖盗，迎接日本多门师团进吉林市时，六百八十二团团长冯占海毅然举起抗日义旗，率领全团人马奔舒兰、五常、阿城去宾县。当时不愿当亡国奴的有志之

---

* 作者系于琛澂侄孙。

士云集宾县，成立了吉林省公署。那时我正在五常县中学读书，亲睹冯占海率部途经五常县的盛况：全县城民众几乎倾城出迎到城南10里之外；看到冯占海部队军容整齐，武器精良，官兵同仇敌忾的精神面貌，有的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在县城体育场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冯占海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最后冯团在"中华民族万岁！"、"誓死保卫祖国"、"坚决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等口号声中继续北上奔赴宾县。

这时，多门师团长和熙洽正在吉林市铁路大楼（多门师团司令部）里秘谋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配合日军讨伐抗日义勇军。问题是谁能统帅这支军队？经过再三的考虑，熙洽向日本人推荐起用于琛澂。当时我在双城。熙洽立即派专人持其亲笔信去双城，请于立即来吉林商讨要事。于在很多便衣警卫人员秘密保护下到达吉林熙洽北公馆。熙请于琛澂出山，率领军队讨伐叛乱，安定社会秩序。于说："我已经退役多年，懒散惯了，又有高血压症，实无精力再去南征北战，恐负重托。感谢您对我的栽培，这一点请熙长官多加谅解（当时熙洽自封为吉林省行政长官）。"熙洽再三劝勉说："险舟（于的字），您太客气了。您正壮年精力充沛，更有多年统帅指挥军队的经验。我们相交多年，您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此种重任我考虑再三，非您不可。不用推辞了，我已向多门司令官推荐过了，他万分赞同。您也不必有其他的想法。多门司令官说过，日本人绝对没有侵占我国领土的野心，不过援助我们建立一个新国家，两国同盟共存共荣。现在叛逆到处扰乱，影响我们建国，必须尽快地肃清。方针是以讨伐为副，争取他们归顺为主。您的号召力很大，只要把您的旧部下招集起来，扩大军队，日本人答应：用钱有钱，用枪有枪；一切都有我来负责。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又何乐而不为呢？"然后，熙洽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要知道，少帅

（指张学良）始终没忘掉你背叛他们父子之仇啊！有少帅就不会有你于琛澂啊！你如果不按日本人意图去作，况且你老同俄国人一起勾搭，日本人能够轻易放过你吗？你我至交，这是我对你的衷心劝告，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于说：“熙长官对我的厚意我是万分感激的。不过我同俄国人不过是在一起作买卖，并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活动。”熙洽冷笑了一下说：“这点我是知道的，不过恐怕人家日本人不那样认为吧！”在熙洽恐吓利诱下，他终于同意了熙洽的意见。接着，他们一同乘车去师团司令部会见了多门中将，受到了热烈的款待。多门通过翻译，对于加以勉励。多门用很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你的大大的大官大官的，钱多多的有，你的明白？”就这样，他们三人达成了协议。不久，熙洽以吉林省长官的名义，委任于琛澂为北满讨伐总司令，兼北满护路军总司令仍然是原来的军衔陆军中将（到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即提升为上将）。从此他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以上情况是他大儿子于再遇在东京他的住宅一次闲谈中对我透露的）。

当时日本关东军还没有过份的控制，不过派几名军事顾问而已。于琛澂握有生杀大权，叱咤风云，不可一世。招兵买马，大肆扩军，除了一部原有旧军队归他指挥外，又新编了数十个团。他的两个外甥（一个叫朱家训，一个杨某）一个侄儿（于通遇），都是日本陆士毕业，在旧军里全当连长，这次全被他提升为团长。当时，山河屯老家我叔叔辈的、年纪30岁左右的都纷纷投奔他去。但这批人全是纨袴子弟，文不能提笔，武不会放枪。只好委以少尉、少校等拿薪不管事的空头官职。在我祖父辈中有五六人被委为县长。如：五常县长于谦澍，勃利县长于印轩、铁力县长于××等。这批人全是地头蛇、土豪劣绅，既不懂政治，又无较高的文化；又多吸食鸦片，弄得污烟瘴气，老

百姓深受其苦。那时北满几乎成了“于氏天下”。等伪满建国后，政治逐渐进入正规，除了他两个外甥一个侄儿被提升为少将旅长外，其他全部被撤职。朱家训比较有才干，但也更反动。于1940年在热河同八路军作战时被击毙。侄儿于通遇因染有鸦片嗜好，被于介绍到汪伪政权去当少将参议。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总第22辑）

“九·一八”以后的
张景惠和东省特区警备总队

高丕琨

“九·一八”事变后，因哈尔滨是特区，与苏联关系复杂，所以日本人对这个地区的攫取不是没有顾忌的。再说张景惠这个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关系，日本人也重视他。因此日本对哈尔滨的进攻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步骤。东北内部各派互相间的关系也相当错综复杂。特区处于吉黑两省之间，而吉黑两省各有军队，黑龙江局势尚在未定、吉林省的军队大部分为熙洽所控制，熙洽又率先投降日本，已得到日本的支持和重视。而张景惠却是个光杆的行政长官，没有一兵一卒，在平时尚可，在非常时局下，连个护身的卫兵都没有，只能受别人的钳制，实属特别困难。“九·一八”当时，张景惠先是观望，继而因有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密使，令张在不抵抗主义下，对日本要虚与敷衍、委婉周旋等情，于是张景惠才公然与日本接触（于镜涛说，密使是经过于与张会面的，会面时于亦在座）。张景惠与张作霖是八拜结交的盟兄弟，他智勇多谋，为张作霖争霸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犹视之如股肱，以元老相待。蒋介

石亦器重之，任他为军事参议院长，作为笼络东北军的手段，以期统一全中国。日本人亦深知张景惠的出身历史，认为他有极为可利用的价值，所以立为第一候补对象，不惜代价花大力气，拉张景惠上钩。日本先由大桥总领事出头与张景惠接洽。张景惠乘机提出希望日本协助成立一个警备队以保持与其他各方面势力的均衡。经大桥与肥原、板桓协商，同意了他的要求，当即由奉天兵工厂给拨了4 000 支步枪。于镜涛参予了此事。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的事情。

这时，于镜涛的意思是，必须把张景惠这个中心人物坚决地树立起来，让日本人不敢藐视他的存在，所以他完全支持张景惠这样做。张景惠把用日本发给的枪支组织警备队的任务交给了于镜涛。于没有辜负张景惠的委托，立即行动起来招兵买马。以警官高等学校现有的全盘力量为基础，把可靠的有智慧有才力的全体教务人员及区队长等人组织起来定为骨干，并遴选网罗历届毕业生的优秀分子编为各级干部，定名为东省特区警总队。长官任命于镜涛为总队长，在总队下设立四个大队，一个警卫队、一个马巡队（后改为骑警队），各队长由总队长任命。全队员定为4 000 人，总队部设在警官高等学校。大队分驻在汪兆屯、顾乡屯、香坊、新安埠（偏脸子）等处。招募兵士由各大队负责，分别设立募兵站。招募采取推荐介绍和自行报名的方法，本人亲到现场由考试官问话。也定了一些条件，如年龄限制等，最主要的是必须有保证人。当时社会上闲散无职的青壮年较多。很快就共计招募了近4 000 人，在各大队长的监督下，由各级队长负责编队造册。由分队长亲自对新兵进行训练。分队长以上的官员皆为警校学生出身，有的当过军官。总队长于镜涛每日轮流到各队巡视，对官兵讲话冠冕堂皇地告诫官兵要上下一心遵守纪律，学好军事本领，成为国家的干城，在非

常时期为保持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出力。还以身示范亲自教战士学习操典。平素大队长在各大队分别操练演习，常试作分列式。1932年后，总队长请长官亲临阅兵。集合总队于一处由第一大队长为指挥官进行分列式兼作小规模演习。有骑兵和小炮参加。总队长于镜涛陪长官张景惠阅兵，长官甚为满意连连说：“好！好！”

这是一支装备相当齐全，武力比较强大的部队。由长官直接领导支配，可以说是张景惠自身可靠的武装力量。该队经费初由长官公署拨给，后随着张景惠任伪军政部长则移属于军政部，经费亦由军政部支给。最后隶属民政部，经费由警察费支给。

警备队究竟干了些什么，起了什么作用？听听于镜涛的回忆吧。

第一，保护了张景惠的人身安全。当时张景惠的幕下和周围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向张景惠要钱，有的要他割据一方，另起炉灶。弄的张景惠心烦意乱，如坐针毡。自从有了警备队，这些人都泄气了。张景惠也能心安理得地为所欲为了。实际上是坚定了张景惠当汉奸的决心，帮了张景惠效忠蒋介石和日寇的大忙。

第二，有的人想混水摸鱼乘机捞一把。这些人一看警备队成立，都销声匿迹，不敢露面了。警备队是哪里有事哪里去，发生紧急情况，还可以即时出动马巡队，对于地方治安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警备队的官兵纪律比较严明，老百姓也不太讨厌。给长官公署及其他机关、公馆站岗守卫都肯认真负责。企事业单位，如电灯、电车厂、电业局等处也要求给他们出警卫，警备队是神灵庙的匾：有求必应。

第四，为张景惠去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长和会见马占山，特派出两个中队（200 人）执行警卫任务。马占山由省城移军至海伦后，日寇任命张景惠为黑龙江省长。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去海伦向马占山劝降。拉张景惠与马占山在松浦镇与哈尔滨会见商谈，达成谅解。于镜涛说，日寇拉拢马占山，张景惠是主要斡旋者。张与马是老相识，也很谈得来，终因意向不同，各奔前程。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就任省长以及与马占山会晤，都是由于镜涛派出的警备总队两个中队负责保护的（由第二大队长王丕承带队），这两个中队名义上是张景惠的扈从，实际上也起到了保护马占山的作用。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总第22辑）

诱降于芷山、张海鹏、马占山

“九·一八”事变后的于芷山

徐世龙口述　石　岩整理

“九·一八”事变前，我在东边道镇守使司令部参谋处当勤务兵。“九·一八”事变后，于芷山宣布独立，成立东边道保安司令部，我在参谋处又呆了一段。对于芷山“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些活动，略微知道一些。

于芷山的东边道保安司令部的牌子，是在1931年11月挂出来的。我记得那年9月末的一天，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旅长王以哲，从沈阳逃出率领一部分弟兄来山城镇找于芷山。在司令部里我看见了王旅长和几个随从人员。他带来的部队都住在山城镇万全丰等一些大商号里。过了两天，王以哲和他的队伍就走了，听说是进关了。王以哲在司令部里同于芷山谈的什么，我们谁也不清楚。不过那两天，司令部里挺紧张，于芷山也显得很严肃。以后听说王以哲是找于芷山商量联合抗日的事。于芷山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不想得罪日本人，又不好公开拒绝王以哲的抗日主张。就推拖说考虑考虑再说，并催王以哲尽快离开山城镇。实际他是怕日本领事馆的人知道。“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日本驻山城镇领事馆就经常来找于芷山。因为于芷山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不好交底。王以哲走后，于芷山就积极地扩充他的兵力。东边道的兵力原有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卫队营。“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于芷山就成立了步兵第四团和骑兵第二团，同时又把卫队营改编成卫队团。兵权都掌握在于芷山的心腹手中。新成立的第四步兵团团长叫王文斌，是驻防在东丰的第一连连长，这个人是于芷山的干儿子。卫队团的营长都换上了他的亲朋好友。卫队团的团长是赫慕侠，下属三个营。一营营长王霄阳是辽中县人，和于芷山的二太太是同乡，二营营长叫任志范，是于芷山的大姑爷，三营营长是于宗谦，是于芷山的二儿子，外号二少爷。从这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就可以看出，于芷山是想加强自己的势力，特别是身边卫队的势力，以防万一。兵力扩充以后便宣布独立。自称东边道保安司令部，自任保安司令。牌子就挂在原山城镇东边道镇守使署的门上。这个时候，他公开脱离了东北军，但还没有公开投靠日本人。大约在12月中旬（阳历年前后），保安司令

部突然组织了一次军事行动。于芷山亲自率领卫队团两个营和从外地调集来的一部分队伍（调那个团我记不清了），再加上司令部八大处的部分官兵。我当时也参加了。从山城镇坐火车往沈阳进发。当时我们这些当兵的谁也不知道上哪去，干什么去？军事行动又不便多问，只好服从命令跟着走。车到沈阳东站停的时间较长，我们司令部坐的是三等车，弟兄们坐的是“闷罐”，里面很冷，所以都下车到站台上跑步。火车开到大虎山就不走了。部队从大虎山下车一直往台安县方向行进。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于芷山原来是要到他的老家台安县去。台安县本不属于东边道管辖。于芷山的这次带着家眷和部队的台安之行的用心是什么，后来我也没太搞清。我们到台安县以后，司令部就设在宋道尹的公馆。部队就分住在周围。这个时期，于芷山外出访友，迎接宾客，显得很忙。在来来往往的人当中还有一些日本人。有一个看上去可能是个官职很高的日本人名叫小野。我们这些当兵的倒没有什么事，整天闲着。我们一直在台安住了两个多月，在台安过的旧历年。转过年正月间，我们开始有了行动。王营长带着队伍开赴辽中县。说是去收降“吴三胜”。“吴三胜”是一支山林队，经常活动在辽中县，有抗日行动。他们开到辽中县小北河，但是没有碰到“吴三胜”的队伍，就又由辽中转战兴京（今新宾县）去讨伐李春润和唐聚伍。

“九·一八”事变后，于芷山拒绝王以哲联合抗日的正义主张，成立了所谓保安司令部，并暗中积极投靠日本人。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原东边道镇守使所辖官兵的愤慨与不满。步兵一团营长李春润在凤凰城哗变，和唐聚伍一齐组织抗日队伍。李春润原是镇守使署参谋处处长，只因他平日与于芷山不和，被派往凤凰城一团任营长。

王营长去兴京讨伐李春润和唐聚伍，不但没有取胜，反而

被打个丢盔解甲，大败而归，一直被撵到清原县，仓惶退回山城镇。就在王营长率领队伍去辽中县的那时，我们司令部人员也随于芷山从台安县返回山城镇。路经沈阳时，于芷山带几个贴身随从到沈阳停下来（去哪、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其余人乘车回到了山城镇保安司令部。于芷山从沈阳回来后不久，就奉调沈阳任第一军管司区令员。从此，他就成为日本的汉奸，完全暴露了他投靠日寇的本来面目。

从我的记忆中可以看出：于芷山去台安县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绝不是探家访友。他暂时回避了山城镇日本领事馆同他的接触，并能在台安一带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可以说，他一面窥测沈阳方面日本人的行动，等待时机，一面积蓄力量，准备爬上比保安司令更高的官职。以后他被提任第一军管区司令和伪满州国军政大臣的要职，就完全说明了他贪婪的官迷梦的实现。

以上，是我对于芷山去台安县活动的回忆。

（摘自《海龙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现更名为《梅河口市文史资料》）

河本大作游说于芷山及辽源被武装占领

杨启明

关东军司令部将河本找去，对他说："事变之后，日本人还是要继续来满洲的（指日本政府原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50万人一事），现在需要一个真正能体会日满协同精神并能挺身而出的

人，来担当资源开发的重任，因此，有劳你去‘接收’西安煤矿。”并鼓励他要在这项工作中做出榜样。河本大作接受任务后，先后又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特务部长驹井等人进行了详细研究。同时，关东军军部还令抚顺煤矿派出9人分别去原东北矿务局、沈阳中央法院、实业厅等单位搜集西安煤矿的有关文献资料，为“接收”做好准备。

1931年12月4日一早，河本大作与山本庆治2人，携带手枪，在3名便衣特务的保护下，由沈阳乘火车前来西安(今辽源，下同)。车过抚顺时，又有安田勇造、永井俊可、山本驹太郎、绪方八郎、原芝平三郎、中岛规矩夫、富崎义六、桥本熊纳、竹内善太郎等9人上车，与河本会合后的这11人为正式“接收”委员。其他随行人员还有吉田雄助、永相健尔、和田次卫、阿部伴治、柳泽实、平野零儿、海老新谷海、赵金山、林景竹等9人。当日下午，车过东丰时，曾有在事变前驻西安领事馆的一名警察，向河本大作叙说西安城内反日空气甚浓，建议暂时不要去西安，但河本“接收”心切，继续乘车西行，于傍晚到达西安。

5日上午，河本、安田、山本、芝原等4人，去西安县公署联系“接收”事项，声称他们是受奉天省政府的委派和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来这里“接收”西安煤矿并进行管理的。县长王桐(后挂印辞官)装病不出，出面接待的是代理县长崔子和、公安局长戴东藩二人。接待室周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公安队员，气氛比较紧张，崔、戴二人并不听河本一伙的申述，只强烈要求河本一伙退出。河本大作在退出之前故作镇静地说：“如果惹起不祥事件，就看做此地为反满抗日的巢窟。军队可以立即派出飞机，不用一个小时，即可将西安县城炸平”。并要求午后4点再次在县公署会面。由于崔、戴二人经不住河本大作的恐吓，并得知河本一行来此的目的，并无夺取县政府权力之意，所以在

下午的会面中双方取得了谅解，缓和了气氛。6日上午，河本一伙便在县公安队员的保护下去矿区联系“接收”问题。那时，原西安煤矿总办王钧豪已携带细软出逃，矿长傅宝锐避而不出。河本等人在去矿途中遇到了曲××，他代表部分股东与河本进行了谈判。由于利益上的冲突，股东们拒绝交涉，使河本空手而回。7日，河本等人又与崔子和、戴东藩、县商务会长王擢、县财务局长曲海宇、县农会副干事长马荆山、沈海铁路护警头目、以及于芷山派来的翻译冯继光等进行协商，并请求他们从中斡旋。但由于在煤矿经营及任职等问题上，未能与股东们取得一致意见，所以“接收”工作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河本大作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准备返回沈阳，去辽宁省政府办理正式指令再来“接收”；另一方面，也做了凭借武力，进行“接收”的思想准备。

12月9日，河本大作带领几名人员乘火车返回沈阳，路过山城镇时，特地下车前往东边道保安司令部，准备在拜访于芷山的过程中进行游说，想得到于芷山对“接收”西安煤矿的支持。于芷山原为东边道镇守使，管辖东边道23个县，拥有四千多士兵，加上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算是颇有实力的军阀之一。事变前，他与汉奸张海鹏、张景惠就有密切的联系，被视为“满洲独立派”。“九·一八”事变后，他先是采取观望态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以多门师团在北满全力进攻马占山部队，以铃木混成旅团牵制驻在锦州的张学良部队。他则以警备东边道为借口，保存实力，静观两军战况，保持所谓“独立”。所以事变以后不久，关东军曾派一个叫大矢的人到山城镇对其进行拉拢，开始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到10月5日，于芷山看到形势恶化，便与岛本第二大队签订了契约，答应负责保护东边道境内“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投降了。当时，

河本大作还不知其中全部内情，但他从于芷山对日本浪人所采取的纵容态度和给日本商人贩卖鸦片的默许中，看出了于芷山的政治立场。因而在于芷山会见他时，对其极力加以诱惑吹捧，称赞于芷山不为张学良的“威吓”、“迫胁”所动，对日本方面采取了“友好、亲善”的态度，并趁机鼓吹“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滥调。在晚间的宴会上，他又对于芷山大讲所谓“满洲的光明前景”，并就当时的“局势”同于交换了意见。用河本事后的话说，这次会见是“初交如故知”，“极为融洽”。于芷山也向河本明确表示，他丝毫没有抗日的想法，愿意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道，镇压东边道一带抗日的爱国力量。同时，他还希望河本大作能从中协助，乞求关东军在军饷和军需方面给予援助。至此，于芷山的汉奸嘴脸已暴露无遗。河本大作为此行取得出乎意料的满意结果欣喜若狂。回到沈阳以后，即迅速将其在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向关东军干部部、政务部及驹井作了详细汇报，并转达了于芷山的请求，催促要抓住时机，加快与于芷山的联合。然后，河本大作又到奉天省公署求见臧式毅（臧为奉天省省长），详细叙述了他在西安煤矿遭到抵制未能“接收”的情况，并在沈阳很快办好了由省实业厅颁发的正式训令，12 月16 日，河本和实业厅第二科科长安集桐一起，重返西安。在河本去沈阳期间，留在西安的其他人员按照他的安排，分别到矿区的机械工场、东吉煤厂、第一露天掘和明治西安矿等地，了解其经营和组织情况，掌握煤矿的有关资料。

当时时令已进入深冬，日军所控制的铁路、工厂及军事设施用煤都十分紧缺。河本回到西安后，一方面与县政府及矿山有关人员交涉“接收”事宜，另一方面进行“接收”后矿山机构的安排。总办：河本大作；经理：安田勇造；采矿部：山本驹太郎、富崎仪六、绪方八郎、桥本熊纳、水井俊可、芝原平

三郎；营业部：山本庆治、中岛规矩夫，竹内善太郎。同时，并做好了以武力强行占领矿山的各项准备。

18日清晨，河本将其一行分为两伙，一伙是安田勇造、竹内善太郎等人，他们急速奔赴山城镇，请求于芷山迅速派出武装部队，协助河本大作对矿区实行武装占领；一伙以河本大作为领队，带着枪支和信鸽，于当日9点多钟向矿山进发，留下一人负责联系和看管行李物品。由于他们先得到消息，知道县农会下属的保卫团，已经派出以常秀山（后参加了红枪会）为队长的保卫团员埋伏在矿山周围的山腰上，以阻止他们的武装突袭。河本大作一伙行进的速度很慢，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煤矿事务所。在事务所门前，他们看到远山的山腰上，有保卫团在那里放哨，并将枪口对准他们。事务所门内空无一人，只见门扇上贴着"院内无人，强入有危险"的告示。河本判断，院内似乎有爆炸物，因而停在门外，不敢进院。就在这时，受于芷山电话的命令，负责当时西安县地方治安的骑兵连，在王连长的带领下，迅速赶到了矿山，与河本一伙会合，完成了对矿区的武装占领。

自19日至26日，河本等人在骑兵连的保护下，与原公司人员进行了交接。紧接着，汉奸于芷山将县公安局长戴东藩和县农会负责人傅××调至山城镇谈话（傅××未再回西安），迫其向河本妥协。27日，交接工作全部结束，晚间在月明楼举行宴会。从此，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勾结在一起，对西安煤矿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广大矿工开始了最悲惨的生活。

（摘自《辽源文史资料》第二辑）

张海鹏卖国求荣始末

岳 奇

山雨欲来

1931年9月18日夜，在沈阳北柳条湖铁路一声巨响，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日本帝国主义打着保护满铁的旗号，开始伸展它的侵略魔爪了。他们以贼喊捉贼的伎俩，硬说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了柳条湖铁路。事实上是日本工兵中尉河本末守，在其主子今田新太郎的授意下，于柳条湖铁路埋下了42包黄色炸药，准备炸毁铁路，让10点40分从长春开往沈阳的快车车翻人亡。然后以此为口实，好鲸吞中国东北三省这块早已为日本军国主义垂涎三尺的肥田沃野。柳条湖事件发生的当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事先已准备好的一部分侵略军马上出动，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突然袭击，紧接着各地日军分别向长春、吉林等地进犯。东北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

当时身居要职的张海鹏，正驻在四洮铁路北端的洮南县城。洮南北接洮昂路，地处战略要地。势态的发展很明显，日本军将沿铁路线，先夺洮南，再取齐齐哈尔，以便进一步侵占黑龙江省全境。

9月24日，关东军司令部派一支120人的日军携带两门野炮，从四平乘三列铁甲车，向洮南进犯。在此之前，张海鹏曾以打败过日本兵而夸耀于世。那还是他刚升任五十五旅旅长，驻

防在郑家屯（今双辽县）时发生的事。那一年正是香瓜刚上市的季节，张的旅部设在“裕盛当”的大院里，日军有一个连队，住在“四合当”东邻，赶上星期日放假，张海鹏的兵逛大街，看见日本兵吃香瓜不给钱，还打了中国老百姓，中国兵气愤之极，便与日本兵打起来。当时的中国兵上街不准携带武器，而日本兵携带刺刀，这样中国兵赤手空拳，被日本兵刺伤后，跑回司令部报告，日本兵一直追到司令部门岗处，卫兵上前阻拦，又刺伤了卫兵。张海鹏听了这个消息，暴跳如雷，立即下令：“给我打！”于是一场街巷的枪战开始了，机关枪、步枪全都开了火，市面百姓乱作一团，买卖作坊纷纷关板。日本兵一个连，怎能打过一个旅？他们看动硬的不行，就撤出城外15公里，提出讲和，张海鹏才下令停止进攻。这一仗打死打伤不少日本兵，大灭了日本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从此张海鹏敢斗日本兵的名声传开了，张海鹏的身价也提高了。

如今日本兵想进犯洮南，就得先打通张海鹏这一关。于是日本就通过洮南公所所长河野正直（现在四中校址即洮南南满公所所在地，公所是日本特务机关。）出面与张海鹏秘密谈判，后来这一场肮脏交易终于成交了。

卖国求荣

张海鹏又名张宪涛。由于小时闹天花给他脸上留下几朵不规则的花纹，故又称张大麻子。他是黑山县新立屯人，哥俩，他是老二，农民出身，年轻时给地主当打头的，学一手好庄稼活。有一年，正是庄稼即将成熟的秋忙季节，他突然向地主当家的提出辞工，地主用合同卡他，中途不干不行，张坚决地说：“宁可全年工钱不要，也不干了！”最后地主咋留也没留住。他从地主家出来就去投奔原来他哥哥当土匪的绺子。原来张的哥哥当

过“胡子”，因官府抓得紧，就跑到姑姑家“趴风”（躲避），他姑姑是个有钱的大户人家，不招怕惹怒了他背地里下黑手，招他又怕官府知道通匪全家问罪，后来就悄悄地报官了。官府派兵抓走了张的哥哥不久就给枪毙了。张海鹏听到这个噩耗，为胞兄报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找到了土匪头子，表白了为兄复仇的决心，同时把他姑姑家有多少枪，多少子弹，多少现大洋都说了出来，这样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带领“胡子”，轻车熟路，摸进了屯，跳进了院，血洗了他姑姑全家，枪和钱也都洗劫一空。个人的仇总算报了，可是他的路怎么走下去呢？这时土匪绺子正缺少一个头头，“胡子”看张海鹏有胆量、有谋略就推举他当头头，他也就欣然从命了，报字“大连”。有了枪，有了钱，绺子不断扩充，不久就拉起300来口子（指人）。当时，正值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兵匪遍地，黎民遭难，“不当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有的摇身一变，由土匪收降当上了官，张海鹏就是其中之一。38岁那年，他被官府收降了，当时就给了个营长，不久就提升为五十五旅旅长，驻防在郑家屯。以后吴俊升被提为黑龙江省督军，张海鹏就调来洮南，官衔是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统领官兼洮辽镇守使。野心勃勃的张海鹏，老想扩充自己的势力，常对人说：“我就是保宣统的”。还说：“为了让宣统回朝（意即让溥仪继续当皇帝），我宁愿豁出一切！”他的这种保皇派思想，被日本特务机关所赏识，河野就是抓住了这个要害，与他密谋的。日本答应给张装备武器弹药，让他扩充军队以实现他的保皇梦，但交换条件是他必须为日本关东军进占黑龙江打前锋，张欣然应允了。密谋后不久，四列军火运到洮南，计有步枪2万余支，其它还有机关枪、迫击炮、山炮等。张海鹏按照双方的密约，命令军队撤出城外，并与县监督申振先，带领文职人员，迎接日军进驻洮南。紧接着他就召集部下，

谋划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用日本军运来的武器装备起来。共编了8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秘书处、军医处、兽医处、军需处、军法处。扩大5个支队（相当旅），每个支队下设3个骑兵团，这样一下子就由原来的四个骑兵团，扩大到15个骑兵团，张海鹏官运亨通，当上了边防保安司令，实现了他卖国求荣的美梦。

江桥之战

既然与日军订立了密约，就得践约，不然怎么配戴这个司令的桂冠？于是张海鹏一边扩充军队，一边谋划进占黑龙江。消息传到省城，大为震惊。此时，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正在北平，万的儿子万国宾虽然代行省政府的军政大权，但由于资历浅，也难支撑局面，辽吉两省落入日军虎口之后，黑龙江省形势日趋紧张。为了试探张海鹏的真实意图，万特派省政府委员马景桂前往洮南，伪称黑龙江省各界人士有欢迎张氏之意，张海鹏回答说："本人年近古稀，毫无野心，唯日人压迫太甚，部下主张分歧，暂赴黑龙江省躲避亦无不可！"言外之意，他无力抵御日军的进攻。马回去报告后，立即采取了紧急防御措施。接着又派人携带张学良的来电赴洮，电报内容是：劝张坐镇洮南，防敌北犯，勿为日本人利用，致贻后世之讥。张海鹏不以为然，他横下一条心，卖身投靠，保宣统回朝。为了防御张海鹏北犯，万国宾急忙把洮昂铁路的全部车辆陆续调到昂昂溪，同时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也开始做军事部署。命令3万余人的边防军做好御敌准备，并将主力部队集结到省城，严阵以待，同时命令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率兵在嫩江北岸构筑阵地。

10月8日，北平副司令行营来电：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在军事上指派马占山为总指挥，谢珂为副总指挥

兼参谋长。张海鹏听到这个消息，更加恼火，忙派新扩编的第一支队司令徐景隆少将，带3个骑兵团为先锋，进犯黑龙江。10月15日开到泰来镇，想一举攻下龙江，同时日本军派飞机两架助战。16日拂晓，徐景隆的汉奸队伍，刚到嫩江桥南端，便遭到炮轰，徐景隆触地雷，炸丢一条腿，当场死亡，其余的人都溃败下来。刚开到的第三支队迫击炮连，没放一炮就随着溃散的人群往回逃。

10月9日，马占山正式就任代理省主席的职务，并致电前线，激励将士，又发出重金悬赏张海鹏首级的告示，张贴各处。告示中说："张贼海鹏，老迈昏聩，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夺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尔军民等，如能将张贼活擒来辕献俘，或携其首级来献者，在职军人立即加升两级，并奖现大洋一万元，百姓赏大洋两万元，储款以待，尔等军民为国杀贼，不但获得实利，且可留美名于后世，想能勇尽职责。"张海鹏的部下听到这个消息，不免沮丧起来，其中有不少人不愿再为张卖命，自行散去。但是张海鹏的贼心不死，继续向日本军谄媚，准备勾结蒙匪，再图一逞。然而日本军借张之手想夺取黑龙江的企图破灭了。日本关东军不得不亲自出兵，进犯黑龙江省。他们以保护铁路，修竣嫩江桥为借口（为阻止敌人过江，省防军把江桥破坏了），10月30日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关东军司令部派两架飞机，到昂昂溪上空侦察。11月4日，又有日机飞来散布传单，进行恐吓，当天中午，日军不仅由桥南向中国军队阵地袭击，而且又有100余名日军从左翼渡江，向中国军队猛攻，中国军队进行英勇反击，从而演成嫩江桥的一场血战。由于中国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日军伤亡惨重。日军在嫩江桥的受挫，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害怕消息传出，对其军事不利，胡说什么中国军队得到苏联军火

接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马占山发出通告，强令马占山下台，从齐齐哈尔撤出中国军队，并厚颜无耻地说，把黑龙江省主席职位让给张海鹏，这就充分暴露侵略者的狰狞面目。这些无耻谰言，遭到了理所当然的拒绝和驳斥。日军恼羞成怒，于11月18日，调遣第二师团，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总攻，并有10余架飞机进行轰炸，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给敌人以严重打击。为了保存实力，进行了战略转移，军政两署移住海伦，并在克山、拜泉、泰安一带设立新防线。1931年11月19日齐齐哈尔才陷入敌人之手。张海鹏的乌合之众，江桥一战即溃败下来，无法向日军交帐，只好在他的防区之内，干些剿匪、骚扰百姓的勾当。这时张海鹏又当上了蒙边督办公署的督办大人了。

历史罪人

1933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硬说热河省也是满洲国的国土，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于是纠合日伪军10万人，分3路进攻热河。为了出师有名，日本军给张海鹏封了个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的官衔。张海鹏遵照日本主子的旨意，离开洮南，亲率他的部下，往热河进发。

当时驻守在热河一带的中国军队约20万人，倍于敌军，本来可以抵挡住敌人的进犯，但由于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大小军阀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各路军均无斗志，因此各县相继沦陷。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扣留大批汽车，装运私产，弃承德逃走。前敌总指挥张作相，也匆匆逃回古北口，省城顿成空城。日伪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承德。紧接着张海鹏的伪军与日军配合，向热河全境进犯，并以剿匪名义，对一些村镇进行袭击和围剿。当时的所谓土匪，有很大一部分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哪个村落敢于抵抗日伪军，哪个村落

就会招来横祸，给你加上“通匪”、“窝匪”的罪名，杀光、抢光、烧光。在日伪军的刺刀下，不知杀害了多少无辜百姓。而张海鹏却因“剿匪”有功，而飞黄腾达起来。到热河不久，即当上了热河省警备司令官（以后称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兼热河省省长，以后又调往新京（长春），当上了侍从武官长，终于爬到了末代皇帝的宝座前，实现了他保皇荣升的迷梦。

历史人物的功罪，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说。解放后，张海鹏这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决，结束了他不光彩的一生。

本文根据董恩荣老人（原张海鹏部下第三支队迫击炮连连长）口述材料，并对照《伪满洲国史》有关部分进行整理。

（摘自《洮安文史资料》第一辑，现更名为《洮南市文史资料》）

马占山降日经过

谢珂

合谋诱马

1931年11月30日，多门忽然致函海伦马占山，提出下列四项：（一）马占山对于克山、泰安镇的中国军队如能劝说使之投降时，可通知驹井顾问；（二）马占山如确定回省，日期亦可通知驹井顾问，林少佐亲往迎接至泰安镇亦可；（三）马占山生命由林少佐担保，绝无意外事情；（四）马占山准带卫队80名入城。马接此函后，置之不理。

当马占山到海伦后，汉奸赵仲仁亦到海伦。赵的汉奸行为久已暴露，但马对赵始终接近，且有时准其参与机密事项。赵常到哈见张景惠和日寇，并时常劝马亲日。另有哈尔滨义祥火磨经理韩云阶（后为黑伪省长，精通日语）常与马密谈，并与赵仲仁内外结合，往来于海、哈之间作汉奸活动。虽历经我等向马建议远离此辈，马总以赵仲仁胆小怕事，韩是买卖人，无关轻重来答复。实际上此两汉奸已成为马的入幕之宾，正在密谋将马出卖。

马占山对多门来函既未置理，因此日寇又派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行到海伦来作说客。此事与赵、韩两汉奸关系甚大。12月6日，本庄繁派板垣偕驹井德三、嘱托福岛、主计染宫及英法记者于当日到哈，下榻于北满旅馆，午时与张景惠及黑省劣绅赵仲仁会见，相谈极密。午后1时，板垣乘飞机赴黑垣与日铃木美通旅团长会见，午后3时仍回哈埠，即令张景惠、赵仲仁当面向海伦通电话与马占山接谈，谓渠将往海伦相晤。马即于电话中拒绝，谓黑省民气甚盛，日军官切勿前来，否则发生意外不负责任，并说本人自离黑垣，已与日人无有直接交涉的必要，故无须彼此会谈。当时板垣即接听筒向马说话，谓日军欲请马主席仍回黑龙江，马置不答，挂上听筒而去。此是6日晚间的情形。

7日8时，板垣不待马占山许可，径率一行日人及哈日领馆员彬山冈野、大阪《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等报记者，由赵仲仁与前充黑龙江省府秘书韩述彭等引导乘车过江，到呼海路马家船口站，先由赵仲仁以电话向海伦通话，代日人要求准许会见。马初不允，嗣经赵一再说服，并谓板垣前去决不至有恶意，于是马占山乃允许在呼海路绥化站相晤。呼海路即挂专车一列，于午后1时50分抵绥化站。停车后复由赵仲仁致海伦

一电话，得复以绥化既无方便地点，改在海伦相见。专车继续向海伦进发。赵仲仁、韩述彭及中国新闻记者先搭普通客车前往，于午后3时半开车，晚7时至海伦。板垣与英、日、法记者所乘之列车于4时半开车，晚8时抵海伦。

板垣一行抵海伦后，马派副官导往"广信当"休息，各报记者住于益泰永商店。马与我商议，拟先由我会见，看来意如何再决定应付之策。我说："板垣此来，当然是赵仲仁等与日本人商妥的奸计，只要主席不答应具体条件就好，有什么困难可向下推。日人来到我范围之内，量也不敢有何强迫行动。"马说："你可先会会他，然后再研究办法。"我即带翻译乘汽车到"广信当"与板垣谈话，板垣现出不安情绪，要求拜见马占山。我说："马主席现在很忙，贵官可将来意说明，我向马主席报告后再决定会见时间。"板垣说："本人钦佩马主席英勇，此次专为亲善拜见而来，别无他意。"我说："如有书面要求，可以转呈。"板垣说没有。我即回见马占山说："板垣表示无何书面要求，为亲善拜见而来。"马说："我先分头会见中外记者，以后再会见板垣。"10时许，马先邀请中国记者谈他本人的宗旨，谓："无论日人如何利诱威胁，我决不能为降将军，或与日方妥协。"并嘱发消息须一致，以免因日人来此而使外间发生误会。11时半，马接见随板垣同来之外报记者，当表示云："此次中日事件，实属不幸，不过本人守土有责，不能不谋自卫，今后希望中、日、英、法等舆论界，不分界限，共同努力，使此类不幸事件永不发生，则世界真正和平，方能实现。"各记者询问约20分钟退出。

夜12时，马即于居所"广信当"内接见板垣等。日方为随板垣前来的驹井德三、嘱托福岛、主计染宫等4人；我方为马偕我及翻译2人。双方首致寒暄。板垣并取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名片，起立致词，谓："余等此来系代表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

繁，向贵方提出两项要求：（一）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持东亚和平；（二）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两方确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敝国关东军司令官尊重贵主席意旨，希望贵主席变更抗日举动，对关东军之真意，予以完全同意。双方倘能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则敝国司令官为本以前救济东北民众之意，决定仍将黑省军权交由贵主席担任，以共维东亚之和平。本人又有声明者：敝国关东军已下最大之决心，决不许东北任何处有抗日举动之继续存在，即敝国政府亦有整个之计划使其实现，为将来彻底改造东三省之步骤。至敝国关东军对于呼海、齐克路所以无所表示者，因钦佩贵主席之英勇，故不即实行军事计划”云云。马占山当即答谓：“关于贵代表所提第一项，本主席极端赞成。前次冲突，本主席为保全国土，实为环境促成，此后尚望双方遵照贵代表意见施行。关于第二项，亦极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主权，为诚意的亲善。黑龙江省此次所采取的行动，纯属自卫，本主席受命中国中央政府，不知其他，对于中日间的一切纠纷亦望贵国政府与敝国政府早日获得正当的解决。”板垣复向马询问：“（一）此次冲突系一时误会，能否即此谅解？（二）对此次战事观感如何？（三）现在究作何态度？对日军是否仍持反抗行动？请作明确答复。”马所答复大致与前相同，对于所询今后态度问题，则谓“个人态度早为贵方所明了，贵军如不相迫，即可保持和平”云云。至是，赵仲仁向板垣询问：“贵方所提不再继续抗日行动，是否请马主席签字？”板垣点首称是。我当即起立说：“今日是中日两方亲善的会谈，也可说是彼此交换意见的会谈。关于和平是我方的愿望，马主席业已明确答复；所谓对日态度问题，如日方不来攻我，我们决不反攻。签字一节，必须召集团以上军

官会议才能决定；否则马主席一人签字，也不能生效”。[1] 至是会谈已近尾声。稍停，齐到另一客室休息。此时板垣、福岛等令随来的人急电沈、哈，状至喜悦，若有莫大收获者。尔后板垣在日本陆军中扶摇直上，亦足以说明“说马”有功。移时，中外记者纷纷来室拍照。日人请马占山坐于沙发当中，板垣等围马而坐。汉奸赵仲仁兴奋地向马说：“这是镁光照相，请不要害怕。”各记者连续拍摄数次，拍完后各回宿处。不久之后，中外报纸把摄影纷纷登出。翌晨板垣复访马一次。早9时，一行10余人由海伦出发，午后4时抵哈，即转沈阳报告。这是日寇诱马重要的一幕。

8日晚，我在“广信当”严厉质问赵仲仁：“昨晚会上你为什么要求马主席签字？”并斥责赵的卖国行为。赵笑脸应付说：“不要误会。”马占山恐有冲突，出面解劝，我亦未便深究。

12月11日，马占山乘车到呼兰，8时20分过江与张景惠相会，座中黑省代表有劣绅赵仲仁、吉祥、李维周等，哈埠有劣绅于镜涛、魏绍周、梁禹襄、英顺等，会议内容极密。外间纷传马、张会晤是马对日屈服的象征。

马自到哈会张后，某日深夜对我说：“你知道近来日军为什么不向我们进攻吗？”我说：“东荒地形复杂，我们还有实力，用兵费力。”马说：“不对，这里有溥仪的一段关系。10余年前，我在天津，因为好奇，想看看小皇上是怎样的一个人，经人介绍见了溥仪。我叩了一个头，谈了些话，最后溥仪给了我一张古画，一个古瓶。从此以后，他记住了我是马旅长占山。这件过去的事我早已不在意了。这次抗日失利，听说溥仪向日方要求说，‘马占山是我的人，不要再打了’，所以日本不向我们继续

---

[1] 此处史实，说法不一，请参见其他文章。

进攻。”我说：“这不象一个什么理由。”马继续说：“另外还听日本人说，如我愿回省垣，全省军事还交给我，并给我们军队换新枪10万支，到那时，我们有了力量，愿抗日也不晚。现在锦州也不能保了，张学良永远回不到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自存之道，保全实力。不向日军冲突，就有办法。”我说：“这个想法是永远办不到的，日人知道你有抗日的心理，他哪能给你换这些新枪呢？千万不可听赵仲仁的谎语，他是为了自己，甘作日本的走狗。主席的名誉是全体将士拥护出来的，中外皆知，如对日屈服，使援助我们的大失所望。现在我们遇有何等困难，或走到任何地方，也有人帮助接济，大家全不愿对日投降，请好好地考虑考虑。”马点首示意说：“我对日本绝不屈服。”

在马、张会晤后不久，一天晚上苑崇谷、朴炳珊、金奎璧等访我密谈。苑说：“现在外间对马非常不满，我们打日本牺牲了不少人，马的态度令人不解。汉奸韩云阶常经过我的防地，这个汉奸我想秘密杀掉他，如何？”我说：“汉奸自然可恨，尤以赵仲仁更坏，我曾向马谈过几次，不要与赵、韩这类人接近，马总说他对日本人绝不屈服，赵、韩没有关系。我想，杀一个韩云阶并不费事，恐怕我们内部引起内讧，也可能弄到自相残杀起来（军队中有学生、行伍两派）。况马的情形中央和远方多不清楚，一旦内部发生冲突，恰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我们的是非也难使外人明了。目下关键是使马本人明白是非，才有希望。”朴、金认为也对，苑崇谷也不坚持主张。但不久苑辞职入关，旅长由朴炳珊接充，炮兵团长由金奎璧接充。

龙江傀儡政府的丑剧

张景惠为人昏庸，是颇适合日寇要求的一个标准傀儡。辽吉失陷，日寇利用他来应付哈局；龙江失陷，又利用他来应付

黑局。板垣由海伦返哈以后，极力诱导马占山与张景惠联络。张、马固然有旧，其中又有一个典型汉奸赵仲仁与马接近，因此日寇利用他对马进行软化，极为相宜。马自到海伦以来，鉴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形，内心矛盾很多，主要是想名利双保。他虽然加强扩军，只是为了挟此以自重，而抗日情绪则逐渐消沉下去。

龙江是黑省政治的中心，日寇想利用张景惠主持，但张不愿舍去哈尔滨地盘，也很愿意拉马占山下水。龙江汉奸内部有赵仲仁、李维周两派，互争雄长，并不合日人的口味，张景惠也处理不了这个丑剧。黑省的太上主人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林也对两派汉奸的明争暗斗感觉头痛。因此张推荐马，林也认为马在黑省有相当的威望，表示同意。

张景惠11月27日派于镜涛（字鉴寰）率特区警备队500名，由哈尔滨赴黑（齐齐哈尔），翌晨特警处副处长英顺亦偕同顾问数人赴黑，准备接收黑政。

1932年1月6日，马占山由海伦赴哈与张景惠接洽后，张即于当日下午3时偕特区长官公署日本顾问驹井等20余人乘车赴黑垣（省会齐齐哈尔），夜2时半到站，赴官银号休息，并定7日上午10时接印视事。是日欢迎者除华方职员外，有日领事清水、外务主事早崎、满铁总办河野正直、旅团长铃木、特务机关长林义秀等及苏领事博念格。7日晨，军省两署满布岗哨，省政府大礼堂交叉悬挂国民党党旗，中置中山遗像。中、日、苏各机关职员参与典礼者达数百名之多。行礼时首向党国旗行三鞠躬礼，继请张氏启印。迨欢迎者向张氏行礼时，铃木遽尔登台，立于张氏右侧接受礼式。继请张氏宣言，张默无一语，嘱外交办事处主任任玉春将预先撰就的宣言稿用日语朗诵后，复译华语。其中全属日人口吻，听之令人齿冷。次由代理驻黑领

事早崎致词。一幕丑剧既毕，张景惠即于当日下午7时偕英顺、宋文林等返哈。

张景惠就任省长，事先即得马占山同意，关于代理主持黑政的人选，也得与马占山商量，马张两方遂于1月10日商洽妥协，派黑省富绅吉祥为伪代理省长（时吉充两署顾问），马占山派国防筹备处参谋长王静修、民政厅长刘廷选、警务处长窦联芳来省辅佐吉祥。哄传多日的龙江傀儡政权就如此登场了。

代理伪省长的吉祥视事后，1月30日，日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到省署声称洮昂路不抵债，胁其承认以齐克铁路作价抵债。吉以本人系属暂代，拒不敢承。林大怒，急电张景惠迅速订约，遂于2月15日签字。继又要求割黑垣烟酒公卖局、省党部、子弹库、中学、农业学校、中国银行、农矿厅、南大营等处，为日军永久公用地；划兴隆街为界，南为日军驻屯区，北为华界，出入驻屯区不准佩带武器。吉祥一一承认。日宪队迁入省党部，中学、农校为铃木旅团住所，于是勾结流氓，收买土地，包揽词讼，几乎无恶不作。

1月16日马占山派程旅涂全胜、朱凤阳两团，各编一营开驻黑垣，22日安全抵省。张景惠即饬吉祥，商务会长杨公秋、韩雨三、李维周等赴海伦，迎请马占山返黑坐镇，并召刘钧衡赴哈磋商包围马氏办法。但此时马占山采取暂与周旋、待时而动的态度。2月1日有马占山为首的15将领联衔表明心迹的通电，内有“占山等谨率部曲，效死杀敌，念兹在兹，义无反顾。惟由我海内外同胞，共凛匹夫有责之义，群起动员，毋任各个击破而保我子孙，还我山河，在此一举。彼有良械，我有热血，精神终胜物质，胜算贵在决心。祸燃眉急，切共图之，并盼各友邦人士一致主持公道”，云云。列名次序为马占山、谢珂、苏炳文、程志远、张殿九、苑崇谷、吴松林、王尔瞻、崔伯山、徐

景德、朴炳珊、徐宝珍、石兰斌、周兴岐、陈海胜。

投降日本

自从马占山与张景惠接洽以来，外间对马的谣言颇多，迨2月16日，马飞沈阳参加所谓“四巨头”（即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会议以后，马占山出卖抗战的面貌已经公开。“九·一八”以来，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日寇兵不血刃，数日之内即侵占了辽吉两省重要城市。但是，黑龙江将士在人民援助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江桥一战给日寇以迎头痛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斗志，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赞扬，各地纷电驰援，捐助大量金钱和物资，而马竟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投降日寇。因此，全国人民和黑龙江将士非常愤慨，甚至上海当时新出的马占山牌香烟也停止出售。据闻马占山在海伦未赴沈之前，曾于2月12日致国民党中央政府一电“表明心迹”。

实际上，马占山想委曲自全于气焰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之下，纯是一种妄想。马自退守海伦以后，始终有未解决的矛盾。他一面说对日绝不屈服，一面又与汉奸保持联系，最后终于重返龙江，置全国人民赐予的民族英雄的荣誉于不顾，使黑省昔日共同抗敌结成的团体陷于分化与瓦解，实为可惜。

马占山2月16日到沈，据说是接受臧式毅所谓“联省自治”的主张，到后受到日寇的威胁，变为接受“建国会议”。当时日寇将预定的建设伪国计划分交汉奸于冲汉、赵仲仁等，当面迫令4人接受，并限7日以内将“新国家”成立，且指定荣孟枚、宋文林为建国宣言起草者，所谓“联省自治”，至是竟成泡影。建国计划、宣言内容，主要是要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令各人签字承认，当时马占山未允签字，于2月18日回哈转赴海

伦。2月21日马致各方通电中有“现在唯有一面应付事机，一面另谋瓜代，于最短期间接替有人，应即负咎引退，以谢国人”云云，暗示回省之意。

2月23日，马带卫队200名和各厅处职员等乘中东路车转道龙江，于当日11时抵黑垣。日人对马欢迎，别有用心，除在各处张贴标语外，12时，骑、炮兵纷纷出动，在龙沙公园演习，并向西江沿一带放实弹炮一百发，飞机回翔天空散发传单，在示威之中以表示庆祝。日酋铃木美通率领欢迎者至军署，向马表示欢迎，并请致词。马竟丧失民族立场地说：“余病尚未痊愈，谨以一二语告诸君。现在国家已经如此，故余应民众之力请，不得已而归来，想余的初心诸位概以明了。现在新国家已将实现，惟希大众今后对于地方，对于己身，皆应彻底努力为是。至于以前与日军误会，扰民实深，今日思之，甚为惭愧”云云。随马返龙江的重要职员计有教育厅长郑林皋、民政厅长刘廷选、军署参谋长谢珂、国防处参谋长王静修、军署副官长唐凤甲等。各机关均添设日人为顾问。24日午，马在省政府大礼堂行就职典礼。事先布置在礼堂大门外的国民党的党旗和国旗，被铃木团长勒令撤去。参加典礼的日酋为铃木、林义秀、土肥原、清水及军政各机关首领，日人顾问百余人。马略致数语毕，即由参议韩云阶朗读马占山出卖黑龙江抗战、就任伪职的宣言如下：

此次东北事变，我黑龙江省亦因一时误解，不幸引起战争，演成混乱局势，以至人民受此涂炭，遭此战祸，土匪横行，金融梗塞，商民极感痛苦。目下实届春耕，若不注意民食，恐秋收无望。占山猥以铨材，不明政治，自知原非胜任，惟对于我黑省人民之困苦，难以坐视。最近因黑省人民之敦促，迫于公意，实不得不勉膺艰巨，故本救民之热诚，以负地方之重任。年来东北苦于军事耗费、政治失常，而租税负担累年递增，失业

者日渐其多，老弱者死于沟壑，强梁者铤而走险，随之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官府不察致乱之源，亟思补救，乃更滥发纸币，钱法日坏，物价高昂，商店因之倒闭。占山服官黑省有年，深知此弊，早具改善之决心，此番更赖日本友邦表示无领土之企图，互相经济之提携，从此有善邻好意之援助，真诚之亲善，定当锐意革新，增进民生福利。目下当务之急，即先举办全省清乡，肃清匪患，裁汰冗兵，整理财政，减轻民众负担，注意金融调济。至于整顿交通，开放富源，均为当务之急。且今后对于官吏确定登用之途，明示黜陟之道，毅然改进，则黑前途，实利赖焉。占山不敏，素知我省地大物博，人情朴厚，果能上下一心，定能造成天下之乐土。今当就任长官伊始，谨此披沥至诚，聊申至愿，尚祈中外鉴察。

3月8日，马占山赴长春迎接溥仪，9日参加伪国成立典礼，同时发表兼任军政部长之职。

（摘自全国政协、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在与日方周旋的日子里

杜海山

海伦会谈

1931年12月6日，本庄繁派他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

佐，偕财务顾问驹井德三、主计染宫、翻译嘱托福岛[1]到哈尔滨，住北满旅馆。午间与张景惠、赵仲仁会见。当晚张、赵以电话通知马占山："板垣将前往海伦会晤，让我们先通知你。"马占山答："江省东部的老百姓仇恨日本人，日军切勿前来，倘发生意外事故，本人无法负责。再则我已退出省城，无必要与日本作直接交涉。"两方正在谈话，板垣接过电话，直接向马占山说："日本欲请马主席仍回省城……"马占山不等他说完，即放下电话而去。

7日早8时，板垣不待马占山之许可，径率驹井、福岛、染宫、日驻哈领事馆馆员彬山冈野及新闻记者，由赵仲仁、韩云阶陪同过江，到呼海路马家船口车站。赵仲仁从电话中要求马占山许可与板垣会见，马占山不见。赵仲仁再三恳切的要求，力言板垣此来，决无恶意。马占山只允在绥化车站会见。赵以绥化站没有方便地点，固请仍在海伦。得到马占山允许后，他们来到海伦，住广信当铺商号。晚9时，赵仲仁陪同板垣先访参谋长谢珂，说明来意。10时，马占山首先接见中国新闻记者，表示："日人前来，无论是威胁或利诱，决不改变抗日决心，作任何妥协。"

11时半，马占山邀请日方及其他外报记者座谈，谓"中日事件的发生，由于日军挑衅，希望记者先生了解事实真相，主张正义。"

12时，马占山偕谢珂及中方翻译接见板垣、驹井、福岛、染宫等于广信当商号，赵仲仁亦在场，谈至次日（8日）晨2时半离去，会谈经过如下：

---

① 关于海伦会谈日方参加者，目前说法不一。其中板垣、驹井德三、嘱托福岛3人没有争议，另外还有谁，还有一人还是两人，则说法不同。目前提到的有以下几位：主计染宫（职务不详）、哈特务机关的宫崎繁三、日本驻哈领事馆馆员彬山冈野、会计住谷。

板垣先致寒暄，接着拿出本庄繁名片说："此来系代表本庄司令官，向贵主席提出两项要求：第一项，为了保持东亚和平，关东军决不许东北的抗日举动继续存在，对此实有整个计划和最大决心。对于呼海、齐克两路，因佩服贵主席的英勇，暂不即时实行军事计划，以维持东亚和平。第二项：东北地方，中日彻底合作，如贵主席变更抗日举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则日本无领土和政治野心，即划黑龙江省为自治特区，由贵主席治理，日本决不干涉，只要求派日本顾问两三人。"

马占山："第一项的保持东亚和平，正合本人主张，极表同意。但江省此次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纯为自卫，我希望中日纠纷早日得到和平解决。第二项，我亦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主权，先撤退日本在黑龙江省的军队，以表示诚意。"

板垣："必须贵主席变更抗日举动，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日本才能考虑撤兵。"

马占山："不先撤兵，就是无诚意。"

板垣："我们回去商量后，再为答复。"

马占山："一切问题都可以随时商议，唯有撤兵是先决问题。"

板垣："我向贵主席提出三个问题：（一）此次冲突系一时误会，能否即此谅解？（二）贵主席对此观感如何？（三）今后作何态度？对日军是否仍作反抗行动？请明确答复。"

马占山："本人态度，早向中外宣示，今后日军如不相迫，自可维持和平。"

8日板垣等辞去，返回哈尔滨①。

在会谈中，韩云阶作翻译，对某一问题辩论间，韩云阶每

① 谈判内容、时间说法不一。

每偏向日方，不但我方在场的人感觉不快，就是马占山的卫士亦看着不顺眼。韩云阶赴厕，出屋门就被卫士赵振东拦住，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老向着日本，并拿枪抵着他的脑袋，韩云阶吓得跪地求饶。在这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当时任马占山的卫士长）来到，赶紧喝退赵振东，扶起韩云阶，送入会议室，并嘱韩不要向马主席说，以免赵振东受责。

后来马占山到长春，韩云阶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小解赴厕，这位卫士老爷捉住我，坚不放行，我竟尿在裤子里，要不是杜卫士长赶到，可能就危险了，主席的卫士真厉害呀！"马占山佯怒，向韩表示歉意。回省后，嘱赵振东此后不可再如此鲁莽。

支援哈尔滨保卫战[1]

马占山退守海伦后，丁超、李杜率部抗敌，并联络马占山结成共同阵线，马占山欲借与板垣会谈的机会，骗得进省城齐齐哈尔，吃掉该地的日军，然后沿洮昂路进袭洮辽，与热河方面的义勇军取得联系。谁料计划未就绪，吉林自卫军受哈长线日军之压迫，渐呈不支之势。马占山赶派程志远骑兵旅，沿齐克路开向省城附近，以慑铃木旅团之后，牵制其进攻哈埠。复令步兵苑崇谷旅，沿呼海路开赴哈埠近郊，支援吉林军。同时，马占山等发出联名通电，以示保卫哈埠，为国效死之决心。

驻江省省城的日军铃木旅团千余人，2月2日早，开到东铁昂昂溪车站，扣留车辆，向烟筒屯进发，拟去哈攻吉军之后，及阅马占山等的联名通电，并得知张殿九旅拆毁安达一段铁路，准备截击的消息后，遂中止前进，连夜返回省城。在洮昂路的日

---

① 关于此段史实，目前说法不一，分歧甚大。这里是一家之言，请注意参考其他各文。

骑兵千余，亦与省城日军联成一线，互为策应。我军在省城附近的涂全胜、朱凤阳两骑兵团，以势孤恐遭包围，遂退至齐克路塔哈尔桥。程志远闻讯，亦停止向省城前进。马占山恐日军由齐克路来攻，乃饬吴松林、徐宝珍各部，沿该路线布防。

3日午后，我驻双城的第二十五旅张广喜团，闻敌至，未战先溃。二十六旅二团被牵动亦行撤退。李杜在哈急调五家站之预备队马宪章旅往援，马宪章于4时出动，至三闸堡地方（距哈市35公里）发现敌装甲车三部开到双城子铁桥，即将其击退。马宪章所部即停留该地。夜间日军以轻骑来扰，无正式接触。

4日早5时，日伪军步骑兵分两路，在猛烈炮火及飞机掩护下，以装甲汽车作前驱向我猛攻。李杜、丁超都亲到前线指挥，战斗激烈，日军坦克两辆，被我平射炮击毁。丁超的二十八旅，宋文俊的二十六旅，马宪章的二十四旅，宫长海、冯占海两个混成旅，都在火线上拚命抵抗，因受敌空军威胁，骑兵炮兵失去联络，午后2时，被迫节节后退。后防撤至哈西顾乡屯，前线退至三姓屯（距哈市10公里），形势万分危急。丁、李连夜电商马占山增援，马占山即派停驻哈北庙台子站（距哈市7.5公里）的苑崇谷旅相机应援。

5日早7时，日军开始总攻击，主力集中于顾乡屯、偏脸子、何家沟、新正阳河等四处，我军分别抵御。日军投弹数百枚，我军密集处都被轰炸，骑兵受害尤重。我苑旅在何家沟遭敌包围，伤亡特重。至10时，炮声愈烈，市内可闻，交通全部停止，商户闭门，街市上除警察外，几无行人。

下午2时半，日军若松联队从哈市上号（香坊）攻入，占据无线电台和二十六旅兵营，大部队侵入西马家沟。午后3时已抵南岗八乍市及铁路局。我军受敌空军威胁，人荒马乱，纷向哈市东北撤退。午后4时，我军大部队除乘车退却者外，余均步行，

退至马家船口。4时40分，日军滨本联队沿东铁侵入哈市总站，各部同时停止战斗。是日正当阴历除夕，哈尔滨即于这一天陷落。

赴哈见多门

哈尔滨沦陷后，日军连日由长春方面运送军队开赴江省，集结哈埠，与呼海路仅一江之隔，其计划是：一方面渡江攻呼海路，一方面沿齐克路攻海伦。我军在呼海路的兵力单薄，且久战力疲，如战争再行发动，不但呼海路海伦不保，而散在各处的部队，亦恐有瓦解之忧。黑龙江省将永非我有。

当此关头，马占山决定赴哈会见多门，变更策略，相机应付，以缓和当前危局。

1932年2月8日清晨（旧历正月初三），马占山由海伦起身赴哈尔滨，只带我及汽车司机张××两人①，秘密渡江，到江省驻哈外交办事处长王鼎三家中，请王邀谢介石（后任伪满外交大臣）面述来意，谓“此行系根据板垣海伦会谈，来和多门会晤，请谢代马转达”。谢转达后，约定在哈市南满铁道会社相见。马占山穿便衣，内藏手枪两支，我衣内亦藏手枪一支，外佩匣枪一支，汽车内亦暗藏枪支。马占山密嘱我：“把汽车停在门外，敞开车门，车不熄火，如闻枪声，即将门卫击毙，我在里边对付多门，小心仔细，切莫慌张。”谢介石陪同乘车到满铁会社，谢劝我把外佩匣枪去掉，马占山许之。院内有卫兵20余人，多门亲身出迎，握手寒暄导入客室，内有军官7人，按枪环立，土肥原亦在座。马占山觅坐室隅，态度从容。相谈两小时，情形如下：

---

① 一说还有韩云阶陪同。

多门："马占山先生此来，事前没有通知，请将来此的意见告知。"

马占山："因板垣先生上次去海伦，表示希望和平，并允江省自治，日本无政治领土野心，我来此即商谈江省自治问题，我想一切纷争都可和平解决。故尔只身前来，以表示诚意。希望日方重视诺言，开诚相见。"

多门："你既只身前来，真是英雄，我皇军决不小器，扣留或加害你。"

马占山："我只身前来，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愿听贵军对江省自治的办法。"

多门："江省可以自治，惟须设日本顾问数人。"

马占山："江省既然自治，不设顾问，才是名实相符。"

多门："马先生既来此，各事都好办，江省有马先生，一切当然不能与奉天、吉林一样办法，我想本庄司令官亦无异议。"多门即嘱土肥原以电话请示本庄的意见。少时，土肥原返回。

多门："本庄司令官已来电话，只要不打仗，诸事都好办。"

多门说完，与土肥原皆面现喜悦之色，多门嘱以电话告马迭尔饭店备宴，约马占山午餐。

马占山因多门很容易地接受了要求，恐另有阴谋，被骗加害。倘多门临时脱身，和其他人拚命，实不合算。因言："不必去吃饭了，如有怀疑，我愿留在此处，以待事情最后解决；如无异议，我就告辞了。时间太长了，恐我部下发生误会。"

马占山在说话间，注视多门气色尚无异状，似无怀疑之处。

多门与土肥原齐说："不要紧，吃过饭再回去，日军决不怀疑，亦决不作卑鄙无耻的事。"

马占山回答："可以。"

12时同到马迭尔饭店进午餐，多门与土肥原都表现极其客

气的态度。到1点多钟吃完饭，马占山向多门及土肥原告别。回到外交办事处，王鼎三正焦急无措，见他安然归来，欣喜若狂。午后3时，马占山渡江，改乘火车回返海伦。

2月9日，马占山在海伦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报告敌情后，把赴哈尔滨会晤多门的经过向大家说明。到会的人多数都同意接受江省自治的条件，与日军讲和。

马占山在散会前又向大家说："我们抗日的初心，是不改变的，现在与日军讲和，不过是为了缓和目前紧张形势的一种临时办法，借此争取时间，整理部队，为继续抗战作好准备，我们不可因此松懈下去。你们回队后，要加强训练，向士兵讲解抗日的意义。至于外交方面，由我完全应付，你们不必挂虑。"各军官在会议簿上签名后都满意而去。

沈阳会晤本庄

马占山在哈尔滨与多门会晤后，赵仲仁奔走于多门、张景惠、马占山之间，策动江省亲日，以取悦于日本，并企图抬高个人身价。他替多门转达本庄的意旨，向马占山说："江省自治问题，必须马先生到沈阳与本庄司令官面谈，倘有什么怀疑，可以土肥原作质。"马占山慨然愿往，并表示不须土肥原作质。

2月16日午前10时，马占山乘日军所备飞机，于午后1时到沈阳机场，本庄、板垣、张景惠、赵欣伯等20余人均在机场候迎，马占山下机后，与来迎者握手寒暄。本庄说："马先生可到张景惠家休息，明日午前10时会晤，并请午餐。"又嘱板垣陪马先生同到张宅。

当晚，马占山向张景惠、臧式毅建议："与熙洽联合，一致主张东三省自治，不脱离中国。日方如允许我们这个要求，在其他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在让步的情况下给以解决。"

张、臧两人说："日本劫持溥仪，制造'满洲国'，势在必行，无法挽回。"马占山闻言，深感惊愕，立即机警地只谈江省自治问题，敷衍下台。

17日，马占山穿便衣，暗藏两枪，同臧式毅、张景惠一起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司令部大门及二门处，各有卫兵12人，警卫森严。入室后，见本庄已非昨日态度，高踞沙发，不起立，亦不让座，座后站立军官和卫士多人。这个所谓的"联省自治"会议，一开始便讨论建立伪国事宜，马占山知道自己上当了，但身处险境，只好沉着应变。这次会议通过了所谓新国家建设大纲，任命三省省长，马占山为黑省省长。最后，当日方起草了所谓《独立宣言》，要求马占山签字时，他声称头痛，周身不适，并呕吐了几次，借故搪塞，没有签字。翌日晨，便返回江省。

（摘自全国政协、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控制县级政权

攫取县级政权

霍燎原

在关东军利用汉奸大搞叛国"独立"，拼凑伪省级政权的同

时，还积极地制造所谓“地方自治”，以夺取与控制县级政权。在关东军看来，虽然吉、辽、黑三省汉奸先后宣布“独立”，脱离了张学良政权与南京中央政权，日军的势力也逐渐控制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等一些重要城市，但他们与伪政权真正控制的地方，还相当有限。就拿建立最早的伪吉林省政府来说，在全省42个县中，真正听从熙洽号令的只有吉林、长春及延边等地的10余县；相反，却有20余县服从宾县的吉林临时政府号令。在辽宁省尽管汉奸的“独立”运动搞得挺欢，从成立“地方维持委员会”，到成立伪奉天省政府，并先后多次向省内各地发号施令，但效果并不大。只有靠南满铁路沿线及其附近的营口、本溪、抚顺、开原、海城、盖平、怀德、复县、洮南、铁岭等10余县，在日军的胁诱及汉奸的拉拢下，相继成立了所谓“治安维持会”、“保安会”、“自治委员会”、“善后委员会”等伪组织。这些县仅占全省59个县的1/6稍强。至于黑龙江及热河等地，日军与汉奸的势力则更弱。鉴于这种情况，关东军为给拼凑全东北的伪政权打基础，作准备，便在拼凑伪省政权的同时，加紧了夺取与控制县级政权的活动。

1931年10月，关东军参谋长、各参谋与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满铁”以及总领事馆、宪兵队、铁路守备队的头目，一起研讨控制与夺取县级政权的办法。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以大雄峰会的中野琥逸10月20日提出的《关于地方自治指导秘案》和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的《地方自治指导部设置要领》为基础，于11月1日制订了伪《地方自治指导部条例草案》。与此同时，在关东军的策动下，汉奸于冲汉于11月3日出场，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了“绝对保境安民主义”等8条献策，其中也有实行地方自治的内容，很得本庄的赏识，于是起用于冲汉充任伪“自治指导部”的部长。于11月10日在沈

阳伪奉天省政府院内成立了伪“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导部”，制订与通过了伪“自治指导部”的“组织条例”和“评议章程”，并以于冲汉的名义，发表了伪“自治指导部”的“第一号布告”。

伪自治指导部“组织条例”规定：“自治指导部”的任务是“根据善政主义，改善各县的政治，确立完全的地方自治制”。“自治指导部”作为指导与监督各县实行“自治”的“综合机关”，除设部长与顾问外，还设总务、联络、调查、指导4课和自治监察部，分辖各方面的事务。此外还附设一个自治训练所，主要任务是培训自治指导员，作为“指导”与掌握各县伪政权的骨干。培训的内容有“自治指导部”的“第一号布告”和“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等，要求自治指导员要把“第一号布告”与“服务心得”作为金科玉律来奉行。在各县要废除原有的县政府或维持会，由“自治指导部”在各县设立县自治指导委员会和县自治执行委员会。前者为县的自治指导、监督机关，要“以日本人为主体” 其委员长均由日本人担任，以便操纵各县的实权。后者为县的自治执行机关，其头目多由汉奸充任，以便发挥傀儡作用。“评议会章程”规定：在“自治指导部”内设立一个评议会，负责审议决定“‘自治指导部’应当执行的主要事项”。

“自治指导部”的主要成员有：部长于冲汉，顾问中野琥逸、中西敏宪，总务课长结城清太郎，联络课长笠木良明，调查课长中西敏宪，指导课长牧野克己，监察部长和田劲、自治训练所长中野琥逸（继任为于静远）、伊东六十郎、口田康信等。在“自治指导部”中，日本人占绝大多数，上述的各级头目，除2名中国人外，其余全是日本人。在整个“自治指导部”中，日本人约有2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90%；中国人很少，只有20余人，约占10%。上述这些日本人，大都是满铁职员、满洲青

年联盟盟员与大雄峰会会员，其指挥者则是关东军的首脑。正像笠木良明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供述的那样："这个团体所需的钱，是由关东军拨给"，"一切政策与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承诺"，"板垣征四郎大佐主持这个部。"总之，伪"自治指导部"的出笼，是关东军一手炮制的结果，它进行夺取县级政权的各项"自治"活动，也都是在关东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的。

11月11日，即伪"自治指导部"成立的第二天，该组织就向被日军侵占的各县发布部令，规定各县务必要贯彻伪"自治指导部"的"组织条例"和"评议会章程"。随后，又分别派遣自治指导员到辽宁省各县，设置县的自治执行委员会。第一批从11月下旬开始，分别派往昌图、本溪、安东、开原、怀德、铁岭等7县。第二批于12月，分别派往凤城、梨树、盖平、辽阳、复县、海城、洮南、营口、岫岩、新民、庄河等11县。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又派了第三批，共8县，即为锦县、盘山、绥中、兴城、义县、黑山、北镇、抚顺等。此后，又往彰武、辽源、辽中、突泉、洮安、开通、台安、法库、锦西等10县派了自治指导员。到1932年3月5日为止，派人进行"自治指导"的县共36个，每个县多者三四人，少者一二人，共计95人。

这些自治指导员到各县后，不仅积极进行所谓"自治"的"指导"与监督，扶植地方傀儡政权，而且还在关东军的指使下，组织地主反动武装，进行欺压群众，镇压抗日活动等罪恶活动。有相当多的自治指导员，在伪满傀儡政权建立后，又摇身一变，成为各县伪县公署的参事官(后来为副县长)，控制各县的大权。

1932年1月，"自治指导部"又发表《告东北四省三千万民众书》，宣称"自治指导部"要努力"保境安民"、"实行善政"。要求东北人民要"团结一致"、"打倒张学良政权"，以"自治"精神建设"新满蒙独立国"。可见，日本侵略者不仅利用这个

“自治”机构，作为夺取与控制县级政权的工具，同时还把它作为拼凑伪满傀儡政权制造舆论的“特设机构”。到1932年2月，关东军指使汉奸演出促进建立伪政权的“运动”时，更多方利用它谎报民情，假造民意，胁迫民众，蒙骗舆论，并监督与“指导”各地的活动。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关东军起用汉奸于冲汉搞的伪“自治指导部”，只限于伪奉天省的范围；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并没有伪“自治指导部”，甚至在伪满傀儡政权在东北建立之后，日本侵略者往吉、黑两省各县派去的自治指导员，也遭到抵制。后来趁水灾之机，改用救济员之名才把自治指导员派到两省一些县内。在吉林省虽然没有“自治指导部”这个机构，进行所谓“指导”与监督各县的“自治”活动，但日本侵略者仍通过汉奸熙洽等人往各县派人进行威胁、拉拢与安抚，并在一些县份建立了伪政权，甚至组织了伪自警团、自卫团，镇压人民的反日活动。

（摘自《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九·一八”事变时的兴城维持会

刘云程

一、日军侵入兴城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制造一个柳条沟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很快用武力侵占了沈阳和南满全线的沿线

城市。12月中旬，又以重兵大举沿京奉线西侵，在沈阳被占领前，辽宁省政府已仓皇迁到锦州，当日军西下时，偏居锦州的辽宁省政府已无法继续偏安，只好重整档案，迁移北平，于是富饶广袤的大东北，就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指示下，全部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

当日军迫近兴城的前夕，兴城城内所有市民惊恐万分，绅宦富户准备束装西逃。这时，原县政府县长于冠瀛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会议者有县科局长、地方法团首长、城内士绅等二十多人。会议中心是讨论对策，经过一番辩论，后来一致认为，兴城人少势孤，既不能抗，又不能逃，为确保全城安全，只有开城出迎，较为妥当，遂达成举旗投降的一致协议。在日军到达兴城车站时，县政府集合10余人，到站欢迎，卑躬屈膝，俯首归顺。

二、松冈小八郎到兴执政

随日军同来接收兴城政权的是：日本文官松冈小八郎。下车后和迎接（纳降）者互道寒暄，均乘马车入城。是夜，由松冈主持，召开由地方官绅参加的会议，翻译是王一锋，松冈发言，大意是：政权初变，维持地方治安秩序极关重要，当此过渡时期，应首先建立维持会，以代替过去的地方政权，维持会主要任务是维持城乡治安，安定人民生活。与会者自然唯唯称是，随即着手组织成立“维持会”。

三、维持会内部的面貌

维持会内部分为5处，每处置处长1人。

在松冈小八郎示意和监督下，由原有县政府科局长及地方士绅中，互相推选。（一）总务处：选韩拙忱（士绅）任处长；

（二）警务处：选杜希凯（士绅）字汉三任处长；（三）财务处：选刘荇洲（原财务局长）任处长；（四）教育处：选赵畏三（原教育局长）任处长；（五）农务处：选王式屏（原农务会长）任处长。处下设课，课长人选，由处长自行选任，量才使用。各处人事既定，于松冈小八郎统辖之下，所有兴城县政府全部事务，交由维持会接收，县长于冠瀛及所属各科局长，立即宣布解职。

四、维持会行事情况

维持会因系华夷交替过渡时期的产物，所以一切行事，特放重点于治安，其它行政，只维持现状。当时兴城北边新台门一带，土匪蜂起，民心徒变，无知愚民被迫胁从者为数甚众，其中以匪首大有字、孙广发、孙玉田等声势较为浩大，结队南下，假借抗日名义横行抢掠，当时名为拉大排，一时全境骚然，民不安枕。西边梨树沟门一带，有义勇军统帅郑桂林（人称郑天狗），高举抗日旗帜，率军千余，大有攻城捉寇之势。松冈小八郎处此局面，深感不安，连日与各处处长开会研究对策，乃进一步强化维持会的组织，其措施是：

（1）强化保甲制

挑选素有武力，长于缉捕的地方人士充任区团长，经过论结果，公推王干臣为第一区区团长；刘雨锋为第二区区团长；王郁轩为第三区区团长；×××为第四区区团长；邓泽新为第五区区团长；冯怀德为第六区区团长；侯德胜为第七区区团长；李秀峰为第八区区团长。各率甲丁50名，分驻所在本区，有时亦调到县境防堵，有时集中力量追击，土匪确因此而有所敛跡，而对于义勇军郑桂林部止限于防堵而已。

（2）设警察分局

维持会在强化保甲的同时，更注意到防堵"辟谣"，绥靖地方乃设立警察分局，通过松冈以下各首长审议结果：任阎毓民为第一区分局长，任赵星北为第二区分局长，任苏子红（记不大清楚）为第三区分局长；崔岳五为第四区分局长；任杜亚清为第五区分局长；柴桂忱为第六区分局长；邓昌五为第七区分局长；李雨三为第八区分局长。这些人虽粗通文墨但均非警务专业人员，没有什么建树。在维持会期间，个个村屯，花会赌局林立，呼芦喝雉，无所顾忌，村民倾家荡产者时有所闻！则警察之成绩亦可想见矣！

五、维持会的尾声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奉天省公署调委前锦西县县长张国栋，接收兴城县行政事宜。张国栋奉委后，于2月中旬，携随员二十多人莅兴视事，维持会当即交待。接收完了之后，维持会宣告解体。合县人事，由县公署另行委任，委原总务处长韩拙忱为县团部团长，各区团长隶属之；警务处长杜希凯为警察局长，各区警察分局长隶属之；财务处长刘荇洲仍为财务局长；教育处长赵畏三仍为教育局长；农务处长王式屏仍为农务会长。松冈小八郎任县公署参事官，县政全由参事官掌握，维持会从成立到解散，仅仅45天，它的成绩，只是下了一阵官雨，便告结束。

（摘自《兴城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黑山县维持会及“自治执委会”

赵昆刚

风云骤变的“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当时国民党政府执行着臭名昭著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屈辱投降政策，驻守大虎山一带的东北军直属张廷枢十二旅、汤玉麟部所属的十一旅以及黑龙江警备第一旅（王殿忠旅），官兵全部调入关内，致使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伸入我黑山境内。

黑山是九河下稍的地方。东连杂草丛生的新民，南临渤海苇塘的辽中与盘山，西依医巫闾山绵亘的北镇，北接荒凉草原的阜新和彰武。因此，黑山旧境胡匪蜂起，人心不安，以县北及西北两处最甚。一次，县长苏勋曾到县城东十里外颜家窑一带击匪，当时黑山警察大队三小队队长李国贤欲乘机抢劫县商铺及住户。苏勋得此消息，将县北连庄会大队调进城内，强迫警察大队出城，县城才得以保全。

县长苏勋虽然保全了县城，但他恐惧日寇，竟带几个心腹之人，携款5万余元逃走到县北五间房一带被李国贤拦劫，仅只身逃出了性命。

这时黑山境内胡匪猖狂，人心惶恐。县城内士绅出面组织地方维持会，公荐王化南为维持会长。维持会下设机构：内务处由徐海舟负责，财务处由阎佩璋负责，教务处由张仰山负责，总务处由李成善负责，警务处由冯亚超负责。同时成立了东南西北四路捕房。凡住户及大小商铺，能出枪的出枪，能出人的

出人，不能出枪或出人的出钱。每路有练长1人，壮丁20人。西、北两路为土匪出没最多之处，所以在西门又专门成立一个捕房，由徐海舟带领。四路练长，东南路为孙佐廷，西北路为刘鹤林、西南路为苗洞芝，东北路为赵佐臣。

前县长苏勋走后，因月利倒闭，钱法颇紧，由原县署出一种救济券，以县钱粮保证。此券用糊窗白麻纸印制，券面有1元及5元两种，群众称为“大白被单子”，造成市面物价猛涨、人民苦难日益深重。加上土匪充斥，村屯多受蹂躏，县城也岌岌不得保，所以城内日夜处于戒严状态。此时，县内各界爱国同胞万分愤慨，纷纷要求抗击日寇，尤其是青年志士，个个义愤填膺，高举义旗，挺身而起。如大孙家窝堡的孙宝庄、白土厂门的王显廷、小三家子的于汇川、朝北营子的高鹏振等人。如果当时把这些爱国力量组织起来，引导到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去，那力量将是不可阻挡的。

民国20年（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军队在绕阳河同义勇军相互配合，与日寇斥候分队铁甲车展开激战，将日寇军官板仓大尉与1名士兵及满铁2名社员杀死；12月4日在李庆连带领下义勇军一部，于广胜屯劫击从历家西去的压道车，当场击毙日寇7名，缴获长枪7支，弹药甚多。相继在大虎山、八道壕、新立屯等地不断歼灭日寇有生力量。当年12月30日，日寇第十三联队从奉天进入大虎山地区。由于日寇处于我东北抗日义勇军包围之中，龟缩在大虎山铁路线上，不敢前进一步。当时东北义勇军的第一路、第四路、二军团五支队等在县城周围积极抗日，吓得日寇不敢进城，可是城内的地主豪绅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安全，维持会派徐广发携带信件与臂章去大虎山请日寇进城。但日寇对黑山却严加防备，在大虎山通往黑山的公路上，设置帐篷，派兵警戒，把守去路。当徐广发刚接近岗哨时

被日兵截住，上去就是一刺刀，把徐的衣服刺穿，险些丧命，恰巧中国通译出来，一看是黑山维持会派来接日寇的，回去通报日军，发了通行证，才允许徐面见日军指导官，卑躬屈膝地说明来意．即请日寇出兵，进驻黑山县城。

相隔3天，日军第十三联队派83名日军，在石秉璋的带领下陪同伊藤博上指导官前来黑山。当行至南门外时，伊藤指导官下令就地休息，先派石秉璋领几个日军进城试探，经两次寻查无事后，狡猾的指导官伊藤才与站立在南门外等候多时的维持会长王化南等20余人相见，王等前簇后拥地将日寇请入县衙。

伊藤博上在县衙当即召见维持会全体成员，询问一番，命令王化南立即释放监狱囚犯，当众委任王化南为治安维持会长；宣布各机关、学校按原来职务办事，要求工商营业，救济券仍继续使用；一切由日军保护等等。嗣后设宴备酒。席后由于伊藤博上“怕胡”（指土匪）着急忙慌地寒暄几句，就率队离开县城。

数日后，辽西警备司令官嘉村少将来黑山，在城内火神庙院召开民众大会，参加的人有当地士绅、各界人士、学校师生和各捕房壮丁等三四千人。会上宣传什么大日本帝国为了挽救满洲民众，宁可牺牲皇军的一切，使大东亚共存共荣，要求黑山民众与日军一德一心，建设新满洲等鬼话。

1931年旧历年底最冷的一天，突然大虎山日寇警备司令部通知，在原师范附属小学东边的园地上召开捕房壮丁会议，并要各学校师生参加。当人们一一进入会场，就看见场内如临大敌，日寇架起四挺重机枪，一百多名日本兵手持子弹上膛、上着明亮刺刀的“三八”大枪，将会场包围起来；同时在南门外还有日寇一百多名骑兵来回游动，吓得捕房壮丁面无人色，其他参

加会议的人员也都面面相观。日本指导官村上晖文讲话，宣布解散捕房，各练长及壮丁的武器，当即被日寇全部缴械，并向附近水坑中投放几枚手榴弹，日寇随着震天动地的响声，扬长而去。各路捕房从此也就解散了，并改组了黑山县地方自治维持会。

昭和7年（1932年）1月16日，奉天自治指导部派日军税所谨助、近藤平次郎、牟世民指导官、樱井参谋和武藤宪兵大尉等人率日寇大队人马进入县城，由天主教堂法国传教士——梁亨利和维持会、地方士绅等手持“膏药”旗，在南门外夹道欢迎。日寇大队人马入城后，被安排在预先设备好了的烧锅、当铺等处。从1月16日到19日，在黑山城内大街小巷，日寇手持战刀，耀武扬威，进行精神上恫吓，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县公署里的维持会人员与地方士绅出出进进，进行人员磋商，终于在1月20日夜里召开全县各界头面人物会议。在会上日军部代表加藤大尉、大虎山宪兵队武藤大尉、奉天自治指导部代表于静远、竹内节雄、奉天省政府代表陈玉铭等人均讲了话。同时宣布正式成立黑山县自治执行委员会及指导委员会：

自治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自卫团长：王化南

自治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兼总务处长：李成善

委员：警务处长李铭三

委员：财务处长阎佩璋

委员：教育处长张仰山

委员：商务处长王栋忱

委员：农务处长徐海舟

指导委员：税所谨助、近藤平次郎、牟世民

第一区（城厢区）委员长李宝霖、警察署长牛继堂、自卫团长李宝霖（兼）、北路骑兵团长杨子新、东路骑兵团长谭清霖。

第二区（大虎山）委员长庞广汉、警察署长徐庆文、自卫团长庞广汉（兼）。

第三区（姜屯）代理委员长李秀林、警察署长蒋聚宝、自卫团长袁国光。

第四区（无梁殿）委员长安伏波，警察署长庞国风、自卫团长安伏波（兼）。

第五区（芳山镇）委员长刘春台、警察署长张雨滋、自卫团长刘春台（兼）。

第六区（新立屯）委员长何浚洲、警察署长王辅廷、自卫团长何浚洲（兼）。

日寇进入黑山，第一步建立了伪政权。为统治东北人民和继续进行侵略战争，还在黑山地区先后设了辽西地区司令部、辽西地区骑兵团部、辽西警务军顾问部、日本军第十三联队部、大虎山宪兵队部、日本警察署（设在大虎山）日本大使机构（驻大虎山）等许多机关。从此，黑山这块土地上，阴霾惨淡，暗无天日，广大人民被日寇统治长达14年之久。

（摘自《黑山县文史资料》第六辑，原文题目为"'九·一八'黑山县城沦陷经过"）

四平“自治维持会”与梨树被侵占

孙静东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寇进驻梨树县二区四平街。此时，梨树城内驻守东北军常经武旅一个营和县保安大队李宝珍统率的四个中队，还有商团、民团近百名。居民日夜奋战，加紧维修城堡，准备抗击日寇。东北军装备较好，实力较强。在全县人民感召之下，驻军营长在县公署门前主持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全体军民一致表示：宁肯粉身碎骨，也不让日寇踏进梨树城。但没过两天，在上边不抵抗的命令下，军队都撤走了，从而使梨树城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东北军撤走后，失去战斗核心，人心涣散，日寇飞机在梨树上空终日盘旋，又在花园大坑投下两颗炸弹，保安队惊慌失措；公安局长李子元马不离鞍，准备逃跑；末任县长包文峻离职逃避。大汉奸阚朝山和豪绅孟庆彰乘机在四平组织起了“四民自治维持会”。主要成员有旧民国陆军中将马龙潭和匪首王永清，还有梨树八大土匪和三个商号财东。下设总务、财政、警务、交际、司法、教育六个课长。维持会名义上维持社会治安，实质成为勾结日寇，效忠日寇的反动工具。豪绅们有的为了维护自己的财势，而摇头摆尾换取日寇信任；有的为了借洋气，复官职，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因而都摆出一付伪善面孔，打着安民招牌，进行“友邦亲善”的骗人宣传。另外积极组织县公署所属机构，行使原有职权，支持警察和保安军以讨匪为

名，弹压人民对日寇的反抗，竭力赢得日寇的欢心。

9月25日，太阳刚压山，四平开来8辆汽车，装载日本守备队200余人，进城收缴县保安大队枪支。保安队闻讯后，全部溜到九区喇嘛甸一带。日寇进城不见保安队踪影，缴械未成，怒气冲冲，而以强奸杀人解气。狗腿子齐巡官把这群恶魔领进司法衙门教养所，维持会的豪绅围在身前身后，摇尾乞怜，汉奸刘汉文抢前一步行了九十度躬礼说："监狱押的统统是马贼（马贼即土匪）。"齐巡官立即从狱中拉出15名犯人，有的是赌犯，有的是民事纠纷打官司的，多数是无辜群众，都以马贼论处，拉到县公署大坑边（即今师范学校门前），全被日寇用刀刺死。其中一名十六七岁的男孩未等刀刺，就被杀人的情景吓昏了，大坑边留下14滩血迹。当晚用4辆马车，拉着15具尸体到西门外鬼王庙大坑（过去叫杀人场，即今化肥厂门前）去火化，走到城隍庙门前（即今电影院门前）突然一具尸体（即开始被吓昏的那个男孩）站起，抱着一个日寇，咬住胳膊不松口。这时从车上跳下4个日寇用战刀砍掉这个男孩的头，道上又留下一滩血迹，是夜家家闭户，只听一片哭叫谩骂声。

日寇使尽白色恐怖手段后，在9月末授意大汉奸阚朝山以维持会和乡绅名义下请帖，威逼旧民国县长包文峻和公安局长李子元到四平赴宴。宴会由日本顾问主持，许给包、李官复原职，同时命令包文峻给梨树城官、绅、商、民写信，迎接日寇进城接收梨树。第二天中午，日寇开来6辆汽车，带着阚朝山、李子元来到南门外大桥。此时路旁一群穿长袍马褂的豪绅富商排成队伍，打着白旗去迎接，一枪没响把梨树城拱手交给日寇。

不甘心受日寇统治的梨树人民，对日寇屠杀无辜群众，对维持会屈膝投降，表示了极大愤恨，即时编出：

降书顺表范大全（兴农合作社理事），

备马待逃李子元。

一夜监督刘汉文（一区区长），

认贼作父阚朝山。

弃城逃走包文峻，

割须更衣艾锡元（教育局长），

抬手跳脚祝老土（商会会长），

割断电线俞老蛮（邮电局长）。

既讽刺又痛斥，实际是梨树人民对卖国求荣的汉奸们，发出的一颗坚决反抗的信号！

（摘自《梨树文史资料》第一辑，原文题目为“日寇侵占梨树城片断”）

七

挟持溥仪充当傀儡

我们为什么选择溥仪

花谷正

向满洲国的独立迈进

关东军基本上占领了南满之后，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开始拉出溥仪。虽然事前并没有决定拥戴溥仪为满洲元首，但在事变前，我们就已经瞩目于溥仪，并与住在旅顺的清朝旧臣罗振玉取得联系。因为我们认为可以担当独立政权首领的条件是：

一、为3 000万民众所景仰，出身名门而又德高望重；

二、家世方面属于满洲系统；

三、不论同张学良或蒋介石都不能合流；

四、能够同日本合作。

根据以上的条件，溥仪自然被显露出来了。

石原最初是满洲殖民主义者，主张占领论。然而，自从板垣到任以来，又倾向于独立国家论了。那时我们之间，经过大约一个月期间议论这个问题。石原最初对我们的独立国家论持有异议，他认为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即使叫他们从事政治，也只能导致政治腐败的结局，而毫无办法。与其那样，还不如依靠清廉的日本人，实行“哲人政治”更为适宜。我们认为他这种主张也许会伤害民族感情，而且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日本人中恐怕并没有“哲人”的人。人类有神性，也有魔性。我们主张培植现实人性的政治。当石原一经赞成我们的意见以后，他竟然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独立国家主义者。

当时在满洲的日本人中，很多人是在日本内地无法谋生的浪人，从道理上讲，这些人也不足以成为满洲人的指导者。只有后来成为协和会核心人物的满铁人员中和其他青年之中，才有许多情操高洁、心地无邪、真正响往实现五族共和、王道乐土的人。满洲国初期，日本以他们为中心，颇为活跃，充满着清新的空气，后来权益主义横行，日本内地的资本家和官僚接踵而来，我们的理想完全破碎了。最初我们甚至建立“不准财阀进入满洲”的公告牌，但是由于在一纸调转命令下，使建国时期的同志离去，以后被追逐权利的成群的“蚂蚁”们完全占据，而把满洲国搅乱了。

9月22日，把罗振玉找到关东军司令部，命令他们把溥仪拉出来，他马上访问了清朝复辟派的实力人物吉林省的熙洽，接着又会见了在洮南的张海鹏，而后转道天津。跟旧臣一起隐居在天津的废帝溥仪，因为不了解关东军的意图而不安，不肯轻易行动。接着，驻天津日军的三浦参谋前来联络。他谈话的大意是：“宣统皇帝认为，如果有民众和关东军的支持和厚望，即使牺牲个人也在所不惜。以目前的形势而言，可否考虑立即拥立溥仪”。

这时期的工作内容被一点一点地泄露出去。中央军部向满洲发来了命令，不准参加建立新政权，特别是拥戴宣统皇帝的运动。我们考虑如果我们老是踏步不前，就不会有所作为。因此关东军接着派遣浪人上角，同天津的步兵队长酒井隆大佐接头，想挟持溥仪。可是因为驻天津日军司令官香椎不让动手，结果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又改派土肥原大佐去天津。10月末，出现在天津的土肥原，迅速着手进行拉出溥仪的工作，但他的行动很快被中国方面和外务省派出机关发现。

外务省也有人想让张学良出马，不管怎样，日本在南满强

行扶植傀儡政权，从对付国联来说，这样做也是拙劣的。主要还因为当时把清朝废帝拉出来，乃是时代的错误，应当期望自然而然地诞生一个政权。土肥原按着预定计划，在天津挑起暴动，以便在人慌马乱中，把皇帝劫持出来。中国方面探听到了这次暴动的消息，制止了参加暴动的中国人，使暴动未能扩大。

在此次骚乱中，溥仪于11月11日，从天津逃出，乘船到营口。不久局势稳定下来，若槻内阁在年末下台，中央军部最后也同意抬出溥仪，第二年3月1日发表独立宣言的同时，溥仪以执政的名义，登上满洲国元首的宝座。这样，中央军部虽然反对关东军的行动，可是结局还是被关东军拖着走。中央军部因为丧失信念多次表露丑态。

下一阶段的企图是把占领线延伸到山海关。为此，再一次在天津挑起暴动，并以此为理由，出兵长城线。但因驻天津日军不上圈套，又失败了。根据参谋总长的命令，军队在进击途中，在辽河线上即中止了行动，结果在第二年7月占领了锦州。

另一方面，在北方由于禁止进攻哈尔滨，乃稍微改变一下进攻方向，进军齐齐哈尔。每一寸土地的占领，都要打破“停战线”的限制，终于在11月19日进入齐齐哈尔。

好不容易攻取的齐齐哈尔，又是因为参谋总长的命令，不得不陷入撤兵的窘境。中央军部最担心的是苏联的动向，认为把手伸向北满是件危险的事，似乎不能置之不理。后来二宫参谋次长接受了天皇委任的一部分大权，即把“临时参谋本部委任命令”拿过来，达到了实行压制关东军的地步。

就是这样，为了事变的进展，历尽了千辛万苦，到12月犬养内阁上台，荒木出任陆相开始，满洲问题才得以畅通无阻。特别是十月事件的阴谋，在政界中泄露之后，给政治家们造成了“反对军队，就有生命危险”的恐怖感，使他们丧失了以往那种

控制军队行动的热情。我认为，在那个时期发动满洲事变是切合时宜的。除了劳神费力去说服日本内地没有主见的一伙人以外，在国际上，对于事变的进行，并没有受到干扰。

（译自《理性》增刊，"昭和秘史"，1956年12月号。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

土肥原策动溥仪天津出走

片仓衷*

1931年10月15日，土肥原将奉天市长之职让给赵欣伯，从苦恼中解脱出来。但关东军为他安排了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这就是指定由土肥原负责策划溥仪逃往满洲的工作。

土肥原立即赶赴天津着手调查研究，很快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土肥原拍来的情报：

"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并拟在吉林成立政府亦大体属实。惟天津总领事桑岛根据外务省训令，不希望溥仪外逃，正严密监视其行动。因之，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实难达到目的"等。

关东军本庄司令官，认为土肥原采取非常手段的时机尚不成熟，俟黑龙江政局稳定后再使溥仪出走为宜。遂命板垣参谋将以上决定通报土肥原。

岂知土肥原早就将这一事关重大的谋略活动安排妥当。11月9日晨，天津发来了机密电报："11月8日晚10时，天津中国地区发生暴动，目下正陷于混乱中。我天津部队进入戒备并下

---

* 这是片仓衷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审判土肥原贤二时的证词。片仓衷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总务课大尉。

达命令占领日本租界外围沿线，以确保租界，预防万一……”旋接北京武官永津中佐来电称：“天津暴动系以张璧等为主的河北自治维持会一派所策动，已破坏杨村铁桥并已占领天津中国地区各要地，正计划等待韩复榘之到来……”等等。

11月9日夜，土肥原再次来电称：“天津暴乱实为溥仪出走剧的一幕。因进行中发生差错，杨元吉未能及时来津，又加经费不足，因而遭受挫折。”

但是，溥仪与土肥原会面后决定逃往满洲，11月11日由塘沽出发，在营口上陆，终于踏上满洲的土地。

当时天津、北平甚至南京的中国报纸，对土肥原投以监视的眼光，屡屡报道土肥原大佐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土肥原和天津日军惟恐坐失良机，竟不顾关东军司令官前述指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溥仪出走工作。

（摘自《土肥原秘录》）

为配合溥仪出走而制造天津暴动

土肥原

土肥原被派往天津准备挟持溥仪

“关于迎接溥仪的问题，首先是在板垣和石原等之间谈起的。我在大约一个半月以后辞去奉天市长，被派前往天津，目的是为了在天津发起一场暴动。这场暴动是潘燕七和李际春等人搞的。我知道他们在石友三失败之后，想再制造一次动乱，所以企图利用他们一举颠覆华北，并趁兵慌马乱之际，将溥仪由

天津带出。但害怕国内的币原外相不愿溥仪出走，桑原领事也对此戒备森严。”

“我从张勋革命时期即与皇帝相识，因此前往会见皇帝就赴满问题进行商谈。皇帝曾提出种种条件，我回答说：‘现在不论接受什么条件，问题是日后形势如何变化尚难逆料。主要是决心问题，当前一切取决于您的决心。’事后我和郑孝胥长子郑谦会面，进行商谈。郑谦谈到关于逃走的计划，我指出那样不行。然后我在工藤铁太郎（后由皇帝授名为工藤忠）和大谷猛两位浪人的陪伴下和三浦忠次郎少佐参谋进行了洽商，决定伺机行事。”

“第一次天津事变就是这样发动的。时间大约是11日。翌日就使溥仪搭乘淡路丸前往营口。当时天津驻军仅有一个大队左右，由于人数不足，又抽调了巡警，从而将保护溥仪住宅的巡警亦均派往肇事现场，趁此时机使溥仪逃走。”

“当时币原外相慑于外国的干涉，甚至发出如发现溥仪逃走即或击毙亦无妨碍的训令，因此不得不乘乱逃走。此次事变，陈觉生等中国方面人士很有功劳，应予酬谢。第二次天津事变是第一次事变的继续。我表面上佯作出差赴津，事发后被关东军召回，受到南大将的叱责。”

“以后，我转任哈尔滨机关长。苏联表面上不加干涉，暗中却进行阻挠。为了使第二师团由长春进驻哈尔滨，我和大桥总领事与苏方进行了交涉，并和现任外交部大臣的李绍庚也进行了谈判。此时，冯涵清表现积极，后成为该市市长。没有一个日本人遭受杀害，主要由于冯背叛了对方，投向我方，且背叛了王瑞华警察署长所致。以上是在围城中所进行的工作情况。冯涵清因此被张学良抓捕入狱，后由我军释放出狱，派往哈尔滨加以利用，且以该人有功，选任为该市市长。”

关于土肥原机关长的主要活动，大致如上所述。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以下附加说明。

事变前夕的天津机关长

1930年4月以来，中央政府首领蒋介石与西北派的冯玉祥、阎锡山对抗，一直处于交战状态。张学良乘虚而入，以劝告停战、和平调解为名，于9月中旬率7万奉军进关，后来张学良在北平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

进入1931年后，奉军为了压制逐渐抬头的反张运动，进一步增强了进关的兵力，至事变爆发前夕，已达到十一万五千多人。就在这时，1931年3月，土肥原领导的特务机关宣告诞生。

（摘自《土肥原秘录》）

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亲历记

刘家鸾

1931年，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兼任河北省主席，驻天津，我担任第二军参谋长。这年10月下旬，王树常从北平开会回来，召集所属军警负责人开会。王说："日本人占了东北，还想向关内推进，他们现在采取以中国人打倒中国人的办法，利用一些流氓、地痞在各地进行骚扰破坏活动。我这次在北平听说，日本人在天津准备组织便衣队起事，自今日起我们要加紧戒备。"当时我们在天津可以使用的兵力，主要是公安局保安大队，虽然不是正规军队，但枪械齐备，训练有素。总队长是王一民。由于《辛丑条约》的关系，天津市内的驻兵受到限制，第

二军只有第十五旅的一个营驻在市内，其余大部分驻在塘沽、军粮城一带。此外还有第五十三军第三十旅的康团驻在杨柳青，有事时可以调用。大家听了王树常的报告以后，立即开始进行戒备。

11月8日的傍晚，那天正是星期天，我在一个亲戚家闲谈，公安局保安大队总队长王一民突然打来电话找我，说有要事需面谈，我当即到公安局去。与王一民会面后，他对我说："今天晚上10点钟，便衣队要起事。"我说："确吗？"他说："怎么不确，我们派的人打入他们里边，一切都摸底。带头的是张璧、李际春，今天把枪和符号都发了，说得清清楚楚，在今晚10点钟出动。"我说："那你赶快准备，我去报告军长。"说罢，我就赶到意租界王树常家里。王先问情报是否准确，接着又说："不管确与不确，你先回司令部，我待会儿也去。你回去立即把各处处长找来，对他们说明情况，今晚宣布戒严，把铁桥拉开（指金钢桥）。"我回到司令部，就按照王树常的指示进行了部署。还把第十五旅旅长姚东藩找来，要他准备车辆把部队运到天津市区边界来，同时通知第三十旅康团也开到市区附近待命。

部署完毕，王树常来到了司令部。这时王一民来报告："保安队已布置好了，从东南城角到西南城角，都已严密戒备，由东区署长任长春负责，注意敌人情况，随时用电话联系。"

我一直与任长春保持电话联系，直到10时许，仍未见有任何动静。我对王树常说："可能由于我们有了戒备，把事情压下去了。"话音未落，就听见枪声响了。接着任长春的电话也来了，报告便衣队已经出动。

便衣队动手后，我们的保安队立即予以迎头痛击。作战的情况，王一民随时打来电话向我报告。他说："他们分四路往上冲，来势很凶猛，可是咱们还能顶得住。"过了半个钟头，王一

民来电话说："敌人攻得很紧，得增加人。"我立刻命令驻在蔡家花园的姚东藩旅的一连人在东门外天后宫附近参加作战（部队都换上保安队的制服)。这一连人上去以后，才把敌人的进攻顶住。

便衣队是从日租界里冲出来的。中国地区的电话局、电报局都离日租界不远，敌人似乎企图首先占领这些通讯机关。因为我军的坚守，敌人冲不过来，我们的通讯联络得以保持。

自从便衣队的枪声一响，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翻译吉田就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他装作茫然不解的态度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打起来啦，"我心想，便衣队是从你们日租界冲出来的，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可是我当时不便揭穿事实真相。不久，吉田又在电话中说："我们司令官非常着急，在乡军人有很多负伤了，你们得赶快停止射击，不然的话，事态扩大了，后果要由你们承担。"我回答说："那可没有办法，既然那边开枪，我们为了自卫，怎能停止呢！"

又过了一会儿，吉田打电话来质问："怎么从海河也往上打枪呀！"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接到王一民的报告说："日本人正在集中火力向水上警察局射击。"我这才明白，日本准备攻击水上警察局，就恶人先告状，反诬我们从水上往岸上开枪，企图推卸责任。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我军在前线顶住了便衣队的攻势，我也就沉住气了。这时吉田又来电话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撤呀？"我说："天亮以后再说。"拂晓以后，敌人停止了攻击，我们也就不再放枪了，但仍在严密地警戒着。

在这一夜的战斗中，保安队不断地把抓到的便衣队分子押送到司令部来，前后有一二百人。保安队还砍杀了几名便衣队，把人头挂在东马路街头示众。

9日天明以后，吉田又打电话来，要求中日双方进行一次商谈，以“防止今后别再发生误会”，并建议会谈地点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我向王树常请示以后，同意由我出面与日方会晤。王树常叫我带上两名秘书（陈曙升、陈东升，都是留日学生）、1名副官（王鸿儒），按事前约定的时间下午4时，到达国民饭店。我把副官留在外边，带着两名秘书进入日本人准备好的会场。这时吉田已在场，代表日方的是中佐参谋和知。会谈结果，双方都希望能先做到临时停火，维持现状，在中间地带双方都不许通过，如果抓到对方的武装人员，就要追究责任。会谈的气氛很平和，仿佛昨天晚上双方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冲突似的。谈到最后，吉田又提出此次会谈是否向新闻界发布消息的问题，我说：“如果你们不发表，我们也可以不发表。”最后双方一致同意不向新闻界发布。会谈就此告一段落，时间已近傍晚了。

在归途中，副官王鸿儒对我说，在我们会谈时，各国驻津领事馆都派人到国民饭店了解情况，表现出对这次事件的关注。

我回到司令部，立即去见王树常，把交涉的情况一一向他汇报。王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最后说：“会虽然这样开了，但咱们还要继续戒备，日本人诡计多端，不讲什么信义，也很可能是缓兵之计。反正他不打，咱们决不打他，最要紧的是得把电报局、电话局好好守住。”

我汇报完毕回去休息了一会儿，王树常又派人把我找去。他说：“今天公安局陆陆续续送来了不少人，其中有个厉大森，是帮会里有名的人物，过去在褚玉璞当直隶督办时期当过军警督察处长，岁数也不小了，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地位，你看怎么处理才好？”我说：“便衣队都是中国人，杀也杀不尽，最好让八里台派出所的白凯所长负责办理收容，自首者无罪，缴枪的还可以奖励一点钱。厉大森既然是帮会头子，把他放了，可以让

他出去号召帮会里的人前来自首，我觉得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王树常听我说了以后，同意这样办。

接着，就吩咐左右，把厉大森带上来。厉大森带来以后，浑身发抖，一见王树常便跪倒在地，口口声声地申辩自己不是便衣队，王树常不容他说完，就对他说：“你是不是便衣队我不管，但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不应该往这里头搀和。颠覆政府，危害治安，你自己也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吧！政府念在你们都是一群愚民，受人利用，政府也不忍不教而诛。现在八里台派出所设了收容所，可以到那里自首去。既往不咎，缴枪的还要奖赏。我放你回去，你找个保吧。”厉大森当时千恩万谢，又向王树常磕了一个头，就被带出去了。

还有一个姓马的，过去在直鲁联军当过团长，王树常也把他叫上来亲自审问。马某和厉大森不同，在公安局带上了手铐脚镣全副刑具。他也是不承认自己是便衣队，王树常不听他的辩解，对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便衣队，我可以放你出去，你以后若是乐意干，还可以再干。你看看，这么干能成事吗？一夜工夫，死了多少人，不都是中国人吗？有一个日本人没有？中国人为什么让日本人当枪使？你找保出去吧！”

结果，马某交保释放，厉大森找不着铺保，是由国民饭店经理也是帮会头子潘子欣负责保出去的。厉大森出去一号召，帮会里的人纷纷到八里台派出所缴枪自首，这对于日本人利用便衣队的阴谋，的确起到了不小的瓦解作用。

一连十几天，便衣队一再蠢动，大小冲突不断，中日双方都连续发表声明、照会，互相指责，同时双方官员进行接触，商谈停止冲突办法。到了26日晚间，便衣队又发动进攻，同时日军也参与战斗，开炮轰击省市机关。当时我在司令部里，突然连续地落下几颗炮弹，有的爆炸，也有的没有爆炸，没有发生

什么太大的损害。在这次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达成了中止敌对行为的协议，保安队撤出天津市，市区秩序由警察负责维持。至此，日本指使的便衣队暴乱，历时二十多天，终于平息下来。

这次事件过后，我从陆锦和张拱宸那里打听到有关日本人纠集便衣队的一些情况。陆是我的姑丈，曾任北洋政府参谋次长和陆军总长等职，曾留学日本，与酒井隆、土肥原贤二、和知鹰次等日本军人常有来往。张是我的父执，曾在北洋政府时期任京师军警督察处处长，好交际，张璧、齐燮元、潘毓桂等亲日派经常是他家的座上客。据他们谈称，日本这次在天津发动便衣队暴乱，是因为他们以武力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同时国内有些元老派人物也不大赞同少壮派军人的所作所为，故而改变策略，利用中国人从内部进行骚乱活动，以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便衣队的头目是张璧和李际春，日本人对他们封官许愿，如便衣队成事之后，即由张璧当天津市市长，李际春当保安队总队长。参加便衣队的都是一些失意军人、地痞流氓、帮会分子，以及吸食毒品者，都是花钱雇来的乌合之众，因此不堪一击。同时更由于王一民派内线打入便衣队，及时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计划，事前做了周密的戒备，便衣队出动后予以迎头痛击，终于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摘自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天津便衣队暴乱》，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反击天津便衣队暴乱

解方*

我于1927年初被张学良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先补习日语。在到日本军队入伍之前，张学良调我们回国在东北军入伍过士兵生活，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张学良。当时他在保定指挥东北军与北伐军作战，正在围困固守涿州的傅作义。他对我们训话，表示信任我们，鼓励我们体验军队生活，到日本好好学习点高明的学问，回国来致力改革东北军，为东北集团效劳。他这个时期是遵守他父亲张作霖的意志办事，准备继承张作霖大元帅"宝座"的。

1928年冬，士官学校放寒假，我回到沈阳正赶上张学良接受国民党政府任命就东北边防长官之职，同时东北摘下了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改变了张作霖时代的亲日政策，实行依靠国民党政府拥护全国统一的政策。这是由于张作霖于1928年6月初，未接受日本要求他固守北京由日寇出兵对抗北伐军的意旨，竟然退出关外放弃了北京。日寇想要"换马"，在皇姑屯车站把张作霖炸死。张学良继承其父事业后，幻想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同日寇较量，把日寇从东北赶出去，以报父仇救国难。这一政策当然要遭到日寇和东北的亲日派杨宇霆、常荫槐的反对，他们勾结日寇密谋推翻张学良并取而代之，哪知道却被张学良不动声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

* 吉林省东丰县人，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84年4月9日病逝。

铲除了。张学良从此巩固了他对东北的统治，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以说这是张学良在政治斗争上初露头角。

1930年冬，我们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这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拉拢亲率东北的30万大军入关，阎锡山、冯玉祥在北平召开的以反蒋为目的的国民党扩大会议被冲垮了，这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又一次大力支持，张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掌握华北、东北的军政大权。军分会会址本来设在北平，张学良却住在天津法租界的公馆里。因为我和孙铭久是他的弟弟张学铭的同学、又是他亲自保送去日本留学的，刚刚毕业回国，他亲自接见我们并一起共进午餐。张问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情况。这个时期，正是张学良在东北集团内部消灭了政敌杨宇霆、常荫槐之后，统治地位十分巩固；蒋介石对他拉得也很紧，东北集团的势力扩展到掌握华北的军政大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可说在军事政治权力上，是张学良一生中的顶峰时期。午餐结束后，张说，张学铭想留你们协助他整顿一下天津的保安总队，它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变相的军队，你们学的军事还是有用的，跟着张学铭好好干吧。这就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的政治思想状态。果然在8个月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大举侵华首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一切听从国际联盟”。张在事变发生之后，把蒋介石命令照发给在关内的东北军队和政府，没有预计日寇还会继续扩大侵略范围，当然谈不上要求在关里的东北军应提高警惕严加防范了。果然在1931年11月初，日寇又发动的“天津事变”。这一天恰是张学良三弟在英租界举行婚礼的日子，日寇选在这一天发动事变当然不是偶合。我们事先得到日寇天津驻军即将在日本租界组织便衣队，依托租界在日军支援下向我进

犯的情报，我和贾陶、孙铭久等人没去参加张学良弟弟的婚礼。我们一方面建议采取紧急措施组织抵抗，同时特意向日租界提出照会要求逮捕引渡便衣队头目李际春、张璧等。明知日寇不会逮捕，这是有计划地“打草惊蛇”，迫使日寇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发动，便于我主动集中兵力粉碎之；另一方面出乎敌寇意料之外，我们突然于当日下午5时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打乱了日寇企图把大部分便衣队，事先潜入市区里应外合的部署。日寇发动的“天津事变”被粉碎了，这是日寇在“九·一八”后，在关里遇到的首次抵抗。我们俘虏了便衣队重要首领，张学铭派我押送北平亲自向张学良汇报“天津事变”的情况并请求指示。上午七八点钟了，张还躺在床上未穿上衣服，听我汇报后只说了两句话：“知道了，把便衣队头子交军法处。”说完又闭上了眼睛，对于日寇以后还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根本没讲。日寇在天津直接使用武力达不到目的，就通过驻华大使向蒋介石抗议要求撤换抵抗“天津事变”的官员。蒋介石又一次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张学良又一次执行了蒋的指示，暗中授意张学铭辞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的职务，委派了亲日派周龙光、王一民接替。我和贾陶、孙铭久、于毅夫等也愤然辞职。

（摘自《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溥仪由天津出走前夕

金友之*

1928年夏天，我父亲载沣率全家由北京到天津暂居，住在旧英租界13号路166号（系溥仪在未出宫前所购买的一所楼房）。每月到天津溥仪家去看望一两次（原住张园后迁到静园），数年来习以为常，每次都是带着我的二、三姐和我一起去，一同吃完晚饭后回家。现在把我回忆在"九·一八"后听到的两件事写下来：

第一件事是谈论关于溥伟的事（溥伟系清恭亲王奕䜣之孙袭封"恭亲王"，辛亥革命后到旅顺居住）。在报上登载："溥伟由旅顺到沈阳拜谒清陵"的消息。一天晚饭后溥仪说："溥伟到奉天谒陵去了！一定有什么企图。"载沣听了接着说："溥伟很早就作皇帝梦，在光绪末年上朝时他就曾经对大家说：'昨天夜里我梦见一个太阳落到我怀里。'可见他作"皇帝梦"是由来已久的事了，让他去闹好啦！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溥仪听完，当时把脸一板说："好啦！以后再也不用管他的事了。"从那一天起就没有再谈关于"东北"的事。

第二件事是1931年11月8日，"静园"发现有人从旅馆送去两筐水果，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两颗炸弹。9日溥仪给我父亲去电话告知此事，并约当日到"静园"晚餐。那次是带着我三姐（金蕊秀）和我一块去的。见面后首先谈论关于发现炸弹的事。

* 作者系载沣第四子，原名溥任。

溥仪接着说："最近时局不稳，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请'王爷'到静园住几天。"饭后溥仪谈到："楚汉相争"的故事，大意是："刘项相争时由于刘邦一时疏忽大意，以致太公、吕后被项羽所虏，被当成'人质'，刘邦为了争天下只好置于不顾，险遭项羽所杀害。"当时因为溥仪闲谈时常用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等来比喻他自己（因为那时包围在他左右的"遗老"们经常引用那些"创业"、"中兴"的帝王来吹捧溥仪，以期得到他的欢心而达到他们升官发财的可耻目的）。所以听到那些话也毫未介意，当天就住在"静园"了。

第二天夜里，忽然听见枪声大作，我父亲被惊醒后急忙要找溥仪询问原因，被溥仪的随从人员所阻拦。直到次日才送来溥仪留下的一封信，内容："我已于今晚乘船经旅顺转赴沈阳，沿途有人保护，请一切放心……"我父亲见信后惊慌失措，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以后在"静园"又住了几天，感到生活不便，就回到原住所去了。

溥仪怎样成为"笼中天子"

李国雄　口述　　王庆祥　整理

野心勃勃的静园寓公

溥仪在天津时期已经感到了组织军队、武装实现复辟的必要性，但作为日本租界内的寓公，他除了联络军阀，再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为了渲泄心中的郁闷，溥仪找到一种"纸上谈兵"的方式。从"张园"到"静园"，他一直在几张八开大

白纸上布阵，委派高低指挥官、调动敌对双方的将领。他常把这种纸上的军事行动做得很认真，例如指令某军向某军进攻，乃用两色笔分别标明攻方的进攻能力、战术即偷袭还是侧面攻击，以及守方的防御兵力、阵地方向等等。双方胜负当然都由溥仪决定，叫谁胜、谁就胜了；叫谁败，谁就败了。过一两天，溥仪还让再把布过阵的纸找出来，使战斗继续进行，如某方增加兵力多少团，某方变幻战术怎样，于是胜方又转胜为败，而败方则转危为安……纵然局势大起大落、瞬息万变，溥仪照旧躺在床上，在床头小桌边，在一盏台灯下，勾勾抹抹……因为溥仪布过阵的白纸并不信手丢掉，所以我相信在有关档案中还能找到它们，证明当年的溥仪力虽不足，心则有余。

1931年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溥仪的复辟思想也更加突出，遂常常派出人员四处打探消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九·一八”事变前后溥仪接连派出三批人员，一批在天津市内活动，一批派到日本国内，还有一批前往东北。据我所知上东北的有两人，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他部门的消息，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此即佟济煦。他到沈阳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向溥仪报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他说着，双手捧起用手帕包着的一块土进呈溥仪，“这是奴才从东北带来的一块宝土，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

这个动人的“献土”故事，是在伪满初年溥仪亲口讲给他的几位侄子们听时，我因值班正当其侧才把来龙去脉全听明白了。溥仪还很动情地说：“佟济煦跪在地上向我递土时满脸淌泪，堪为壮士之举。我接过土来，用鼻子闻闻，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溥仪把这块土视为珍宝，又从天津带回东北。

记得有一次溥仪让我找东西，从某箱笼中翻腾出一个黄布小包，打开来看，里面有个约10公分见方的土块。我因好奇便故作不知地问溥仪："这块土是干什么用的？"溥仪说："这就是佟济煦从奉天给我带到天津的那块土呀！"

溥仪出关之前

我上楼面见溥仪销假，正赶上他坐在"恭桶"上大便。溥仪在紫禁城使用的恭桶是锡金属方匣子，有3米来高，里边放些锯末，便完加盖，由殿上的端出倒掉再用水冲净，加上锯末备用。到天津以后改用高装搪瓷便盆，便后由随侍倒。欺负人的是，端恭桶者必须高举过顶，以示尊重。

"你回来了？"溥仪边拉屎边问。

"奴才回来了。"

"脚伤治好了么？"

"没好利索。听说天津事变，恐怕園子里出事，就赶快回来了。"

"来得正好，我要走了。"

"万岁爷往哪方启跸？"

"甭多管！今儿晚上动身。"溥仪拉完屎，在一旁值班的祁继忠立即上去伺候。溥仪系着裤带对我说："你一宿没睡觉了，躺下歇歇吧！"于是，我混身打混身，就躺在地毯上了。

由溥仪要走我想起脚伤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溥仪突然命令我和另外几个随侍，立即把全部现在不使用的行李、家具打包装箱，他不说原因，好象要搬家，但实际没有举动。过了几天，溥仪把我找去，问道："你能打开车库里那扇大门的锁头吗？"

"奴才没有钥匙。"

"可以把锁弄坏，别叫旁人知道。"

原来，日本租界方面对静园的警戒部署也和张园差不多，大门外有专为租界地服务的中国警察的哨位，大门里的门房中则住着一个分秒不离的“白帽”。溥仪想避开监视非另寻通道不可。恰巧静园车库有扇通院外的大门，这扇门自溥仪搬来就锁着，从来不曾打开过，钥匙也不知放在谁手。溥仪让我弄坏的就是这把锁。或许是因为习武增强了臂力，我很快就办好了这件事。

“奴才听万岁爷的吩咐，已经把锁卸下来了。”

“先别开门，从正门出去绕过来看看，不知门外站着人没有？别叫闲人瞧着。”

我按吩咐绕过去一看，闲人倒没有，只是有两扇大门的中缝处严严地贴了一张大广告画。向来这里没贴过东西，再说也不是贴广告的显眼儿地方，可以断定是新贴的，有人出于广告以外的意图干的。

我原原本本向溥仪报告了情况，最后说，如果开门，广告画将被撕开，这扇门的秘密也就暴露了。溥仪垂头丧气地说了一句：“算了吧！”

后来我才明白：溥仪让我们打包装箱，那就是已经打定了出关的主意。让我开车库门，是要躲开“白帽”的眼睛。因为“白帽”是日本驻津领事馆派驻“静园”的警察。当时在溥仪出关问题上，领事馆接受日本外务省指示，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宜轻动；驻屯军司令部则受国内军部指导，积极诱引溥仪出关，建立傀儡政权。双方矛盾很尖锐，溥仪既然倾向于驻屯军，则必须背着领事馆，背着领事馆的耳目——白帽。

在跟随侍们闲聊，得知这些天静园发生一连串怪事，最怪的是炸弹事件：有人送来一蒲包鲜货，由祁继忠接手并送到溥仪跟前，打开盖子惊叫一声：“炸弹！”赶快送交“白帽”，再找送货人已经不见了。现在知道这件事是日本军方故意做的，目

的是催逼溥仪上路。我怀疑祁继忠参预了策划，怎么那样巧，炸弹接在他手里，又放走送货人？

溥仪的奏事官张宏志也在接到炸弹前后出事了。早就有人说他与国民党官方有勾结，溥仪也怀疑过，但谁都没有真凭实据，证明他就是国民党派在溥仪身边的暗探。溥仪离津前几天，张宏志请假外出，溥仪不但没有准假，还派人暗中监视他的行动。果然，张宏志找个空子就溜出了静园。溥仪接到监视者报告，即派两名护军随巡捕（日本租界内的中国警察）跟踪并将其抓获。

“你干什么去啦？”溥仪讯问。

“想出去买点东西。”

“告诉过你不准出去，为什么还要溜出去？”

“奴才任罚。”

“回自己房里呆着，不准离开一步！，听明白了么？”

“奴才明白。”

这场讯问发生在上午，不料张宏志趁中午防备松弛又溜了，从此下落不明。遗憾的是尚未来得及问明细节，谁都解不开疑团了。总之，多年守在溥仪身边的人亦不可靠，岂能不令他心惊肉跳？

赛车后厢的秘密

炸弹迫使溥仪做了最后的决定，而且，行动也更加谨慎小心了。

回到天津那天晚饭前后，溥仪向我布置了一个神秘的任务：晚8时整，把赛车发动起来，同时打开后厢盖子，不准提前，也不准错后。

“谁开车呢？”我多嘴问了一句。

"甭管！有人开。"溥仪面孔严肃。

溥仪所说的赛车，正是我经手"打价"花1.5万元买进的那辆敞篷车。该车前部司机篷内只有一排座，除司机再坐一人。后部从外形看是平的，其实是两扇盖子，打开来，再利用车前的两根立柱，顿时可以支起一个帆布篷子来，里边还有一排活动椅，可坐两人，象一部小客车。关上盖子就什么都没有了，盖子底下顶多能有1米长、1米宽、0.6米高的一块空地方。

溥仪连司机篷都不肯坐，让我打开后厢盖子的意思，显然不是要支起帆布篷，或许是要钻到后厢盖子底下去吧？

晚8时整，我准时发动了车子，打开了盖子，然后呆在一边，心里还琢磨：究竟让谁开车呢？

忽然，一条人影在车库前闪了一下，迅速向赛车走来。

"谁？"我发问。

"我——佟功永！"

"你来干什么？"

"开车！"

"谁让的？"

"不是说老爷子今晚要走么？"

我知道这是安排好的，溥仪对我也不细说，不便多问了。可心里不太服气：佟功永并不是司机，是静园一名护军，有时抓车玩玩，摆弄几回，论开车技术还不如我呢。

正寻思着，溥仪由楼内快步走出，祁继忠紧跟在后边。我迎上去告诉溥仪说车准备好了，溥仪"嗯"了一声，迅速钻入后厢空内。不料，祁继忠也三步两步地窜了上去，连一个人也难放的地方怎么挤得下两人？何况都是大高个！我想，万岁爷窝在后厢底下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吧！只见祁把后盖放下后，屁股紧顶盖门，忽闪忽闪地摆不平。事情紧急，我也顾不

了太多，跳上去一使劲儿把盖子按严了。佟功永遂把车子由正门开了出去，“白帽”看了看，只有司机一人，他哪里会想到“私货”藏在后厢盖子底下！

我没有立即返回楼里去，继续呆在车库旁观察动静，我意识到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过了约15分钟，赛车开回来了，我帮佟功永入库关门，收拾完毕。

“车开到哪儿啦？”我问。

“我也不知道！”佟回答说，“只告诉我行车路线，出门后还有别的车领着，最后进一家旅馆大门。我心慌意乱，汽车刮在大门上，差点儿把旅馆的门给刮掉了！”

我心里好笑：不知溥仪搞什么名堂，不找正经司机，硬是要挑象佟功永这样半通不通的人开车，出点儿事故岂不毁了！

不过，我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这个晚上，对溥仪个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竟是那样重要！一部赛车把溥仪送进罪恶的深渊。长期以来，为了掩饰自己，溥仪蓄意把赛车后厢说成是被日本人“劫持”的证据。后来，经过改造的溥仪自己纠正了这种说法。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也能证明溥仪不是被劫持的，虽然他曾经受到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诱骗和逼迫，但是，赛车后厢的秘密却是他自己策划、自己实行的。

次日上午，婉容的太监来传，我在通往婉容房间的走廊里，见她坐在一把椅子上。

“什么事呀，老爷子？”

“你看，皇上也走了，王爷也不来了，把我放在这儿谁管呀？”婉容说着说着抹开眼泪了。

“老爷子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奴才，奴才给老爷子干。”

“那好！园子里的事你先担待着，我今后有事也要找你。”婉容还是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溥仪走后，不但载沣王爷不再来，“行在”的管家人——总务处任事胡嗣瑗也不知所终。又受皇后面托，我只好临时扮充“静园”主事人的角色。园子里有日常事务，错综复杂的往来关系，还有警卫问题、下人的吃喝问题、司房款项收支等，静园是个乱摊子。

婉容离津与川岛芳子

我“受命”主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还要不要给溥仪传膳？溥仪已走，当然无须再吃饭；但如停止传膳，溥仪离津的消息就会立即公布于世。怎么办呢？当时二嬷在，她也是溥仪最信任的人，我就找她商量，决定照常传膳，将膳食放在二嬷房里，由她把各样菜都扒拉扒拉，象溥仪吃过的样子，以掩人耳目，直到报上公开登出溥仪到达东北的消息，才不演传膳戏了。

也是“受命”主事那天晚上，忽然枪炮齐鸣。如果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那回我还若无其事的话，这回可不同了，我感受到肩上的担子，有一种难以自抑的责任感。在屋子里坐不住，我便到院内溜来溜去。正当我迈开步子，“啦”的一声、顺裤裆打过一发子弹去，把对面一个坛子崩得稀碎，吓得我腿肚子打战。细一琢磨，也不对呀！如果这枪炮是中国军队放的，应该往北打；如果是日本军队放的，应该往南打；然而这颗崩碎坛子的子弹，是从法租界向日租界方向打的，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解不开的谜。

溥仪走后第10天，给我写来一封亲笔信，是胡嗣瑗带来的，但没有直接交给我，经别人辗转传递。原信不复存在，但内容我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

李国雄：我走到哪儿你知道吗？我由天津到〇〇，又由〇〇

到〇〇〇。

这信实在令人费解，既不知道他到了何处，更不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但确是他亲笔，毫无疑问。这封信的谜底是我到旅顺以后才揭开的：溥仪写信时正住在汤岗子对翠阁旅馆，他要告诉我的是已由天津到营口，又由营口到汤岗子。然而日本人不许他披露行止，只好写“圈儿”信了。

此后，溥仪又通过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多次向我传达指示，让我干这样，做那样。

又过了些日子，静园总务处任事胡嗣瑗拿着一封信，先找着庶务处任事佟济煦，两人又一起来找我，对我说：“这是皇上的亲笔信，你把它交给皇后，并通报一声，现有两人已经到园，要面谒皇后。”我想问问来者何人？是男是女？姓甚名谁？答称“不许过问”。继而又说“皇后一见这信就明白了”。我很觉得奇怪，毕竟自己是奴才身分，碰上这种口气，虽说临时主事也不敢坚持什么。

佟济煦向我告知这件事的时候，要谒见皇后的人正站在主楼前的台阶上。与此同时，也有人禀告皇后了。随后，就见一位头戴礼帽、西装革履的青年由一日本人陪同，上楼直奔婉容房间。谈话约有20分钟，客人走了，他们说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半小时后，婉容的太监来传。叫我去见皇后。

“老爷子传奴才有事吗？”

“十四格格来了，就是那个穿西服的。”十四格格即肃亲王第十四女爱新觉罗·显玗，又名金璧辉，因过继给川岛浪速为养女，在日本长大，遂改名川岛芳子。她就是当年名声显赫的“男装丽人”，这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半点儿都没有怀疑他竟不是男的。婉容接着说，“十四格格捎话来，皇上让我去呢！今儿晚上就走。这事儿还要保密，皇上怎么走

的我也怎么走。你把车准备好，到时候开到吉田翻译官家，别的不用管。”

“什么时候走？”

“晚上8点整。”

记得那是个寂静的晚上，连续多日稀稀落落的枪声突然在这个晚上停了。像上次送溥仪一样，当晚8时的钟声响过，我起动了那台赛车，打开了后厢盖子，等待皇后驾临。婉容来了，只见她手按车身，“噌”的一声纵身跳进后厢，我万万没有想到关键时的皇后竟有如此利落的动作。当然，从平常那种娇柔作态的样子里，怎会看得出呢？我遂放平后厢盖子，里边只有她一人，且比男人瘦小些，多少能透过气来，但也不会太好受。

我顺利地把赛车从正门开出去，因为这种车本来就是一种玩玩的东西，平时既不用于拉货，更不用于拉人，所以出来进去并不引起人们怀疑。开到吉田翻译官家门口，刚停车，吉田家的差人就过来拽我，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或许以为我是局外人，傻开车的，并不了解后厢的秘密吧！于是吹吹拍拍要把我引开，我竟不理这茬儿，几步窜到车后，双手提起后厢盖子。已经到了目的地，哪能还让皇后在里边闷着？

十四格格又出现了，这时已经恢复了儿女身，着旗袍、挂项链，果然是位相貌出众的小姐，她由吉田的女儿陪着，到车前迎接皇后。婉容也象上车时一样，轻扶车身，一纵便跳了出来，还是那样利落。

“老爷子还有事情吩咐吧？没事的话，奴才这就回去了。”

婉容由川岛芳子等簇拥着，将要往屋里进时，我用这句话告别。不等婉容启齿，川岛芳子开口了：

“你等等！”

她们进屋后，我就等在门口。过了约摸五六分钟，川岛芳

子出来了。因得以“正面相见”，我几乎憋不住笑：这女人竟在脖子上挂的项链下面挂了一串钥匙！

“听着：你回去给皇后取样儿东西——一条狐狸围脖，跟张妈要就行，马上送来。”

川岛芳子说完转身去了，我似乎听见那串钥匙因脖子扭动而哗哗作响的声音。我说声“是”，便开车返回静园。拿了狐狸围脖，我懒得再动车，索性走着送去。静园距吉田家仅一里多地，10 分钟就走到了。我把围脖交给吉田翻译官，他回说一句：“没事了！”

踏上险途

这回我成了静园内名副其实的“老大”了，内心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愉快感。从吉田家返回静园的路上，有个杂货铺，我走进去跟掌柜的打了招呼，买了一袋花生仁、一袋五香瓜籽。一脚迈出杂货铺门坎，“轰”的一声炮响了，寂静的夜晚又被震破。

“静园”仍由溥仪遥控，吉田忠太郎是中间传话人。按传话内容：我照料园中日常事务。

婉容离津后20余日，吉田又携溥仪亲笔信来园找我，溥仪在信中命我携霍庆云和三名护军，以及伺候婉容的刘妈、张妈，共7 人，速往大连。

溥仪和婉容先后离津，我又要离开天津了。我们身分迥殊，却踏上了同一条险途。

当即确定了行期。吉田还给我开了一张日本驻屯军兵营的证明信，并说：“从天津到塘沽，其间发生问题，把这封信交给塘沽日本驻屯军兵营即可，自然有人出面保护你们。在塘沽上船后即行作废，你务必收存好，不要叫别人看见。”我便小心翼翼装进衣袋。

我们一行7人上午离津，乘火车于下午4时许抵塘沽，随即登上日本商轮某某丸号。因吉田先有洽商，登车上船都顺当。

我总感到责任重大，始终不敢疏忽。上船后先把刘妈、张妈安排在底舱，我嘱咐说“外边人员杂乱，你们没事别上去乱走。”

我和几名护军住在第18号舱，刚把行李物品安顿好，甲板上过来两名满脸凶气带着“家伙”的人，在我们舱门口看看就要进屋，我给拦住了。

“你们要干什么？”因为是中国人，我估计他们是岸上稽查处的，心想：绝不可暴露身分。能应付则应付，万一弄僵了，打定主意不下船。塘沽不是租界地，是受中国军队管辖的，下船就麻烦了。只要赖在日本船上，他们没辄。

“你们的人带了几十万现金上船，我们奉命来索回这笔钱！”听来人这么一说我倒放心了，原来不是冲我们来的，他们并不了解我们的身分。

“别说几十万，我们连一万也没有！”我说的确是实话。

“我们的人一直跟着，绝不会错！”那两人语气肯定。

“那你们就翻吧！”

“闪开！”

一个包一个包地被解开翻过，里面全是果品、点心等物。身上的衣兜也全翻了，没能达到目的。这时，我多了一句话，我说我们上船时18号舱本来有人住，为了给我们腾房才搬到隔壁去了。那两人发现这个线索赶快冲向隔壁，门锁着，遂找船长联系，日本人船长不予理睬，急得那两人团团转。我向几名护军交代说，只要不拿我们的东西，无论出什么事情都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暴露身分。

原来那两人确是塘沽港稽查处的，负责在码头和过往船只

上追查走私罪犯。然而，日本船持不配合态度，我们也得以在这种保护之下，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

夜11时，汽笛长鸣，载着我们的日本商船，愈来愈快地驶向黑暗之中。

几十个小时的海上生活过去了，这条日船就要停靠大连码头时，船长忽然装起糊涂来，他来到第18号舱门口，向我们扫了两眼。

“你们，什么人的干活？”

“到大连看看朋友。”

这位前来“履行职责”的船长，居然连个表面上的样子也装不象。他还进舱打开两只箱子的箱盖，马上就关上了。其实，他早从吉田那里了解了我们几人的身分，也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去找谁。与其说他有责任查问我们，勿宁说一路上他必须保护我们。

船停靠码头时，同行的7人全部聚齐，各人带好了东西，下了船。

临行时吉田曾告诉我，在大连下船即会有人接应。现在果然见到了来接应的人，原来是罗振玉之子罗福葆。我们刚登上码头，便被他迎进准备好的汽车，一直开到墨缘堂。这是罗家售卖古书、文具的店铺，那时已成为和溥仪有关系的人来来往往的歇脚站，在那里我们见到了罗振玉。罗道声一路辛苦，嘱我们几人暂且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罗又雇了一辆汽车，载着我们奔驰在通往旅顺的大道上。我长舒一口气，似乎就要卸去肩上的担子了。

从旅顺到长春

1932年3月2日，溥仪传我。

“又要搬家，你现在开始准备。”这件精心安排的事对我来说却是突然的。

“搬到哪儿？”

“长春！”

溥仪向我简要地布置了任务：由我率领护军和茶膳房人员并携带溥仪急用的东西先行赴长，以便为溥仪的到达打前站。

“皇上几时启跸？”

“还不一定。”

大概还要保密，我不再问，当即动手把溥仪现用的衣物收拾起来，装满了几只皮箱，向溥仪报告后他同意，幸好没有笨重物件，路上也轻便些。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霍殿阁、霍庆云等五六名护军及御茶膳房人员数人，由一名日本宪兵引路，在旅顺火车站登上一节铁闷罐车，携带的皮箱及其他物件，由车站搬运人员给装到这节车上。铁门刚刚关严，火车便轰隆轰隆地驶离了旅顺。

闷了一个多钟头，到达大连车站，这才允许我们进入客车车厢。我四外一扫，车厢内几乎满员，但都不象一般旅客，又并非清一色军人，这究竟是一列什么车，我始终没搞清楚，也不敢乱打听，坐着走就是了。经十五六个钟头的行程，抵达长春。其时，日本人已经改称长春为“新京”了。

一辆控货汽车把我们几人，连同皮箱及其他物件，一起运到位于五马路口的原吉长道尹衙门内。这里就是伪执政府的临时所在地，因正处在中国地面与日本租界的交叉地带，是繁华的闹市区。

不知道溥仪几时到达，而他一到就要吃饭，所以我不敢怠慢，立即安排御茶膳房人员把工作条件准备好。同时安顿几名护军和伺候婉容的老妈子各自住下。我就和护军们住在一室。

这个伪满洲国真是在匆忙之中建起来的，连作为“中央机关”的“执政府”还是破破烂烂的，正在装修粉饰之中。我们中国人的住处没有床而是地铺，垫上草、铺上毯子，席地而卧。心中颇觉不平，便特意到日本宪兵的住处去看看，日本人不是地铺，而是铁床，条件好多啦。我又细看看，还有区别：我们中国人铺的是棉线毯，而他们日本人铺的是纯毛毯。我立刻就来气了：这样的小事上还分得如此清楚，太过份了！一气之下，我随便拽了一条毛毯就走，又把我那条线毯扔了过去。过后还听日本宪兵那边嚷嚷，问谁把他的毯子给换了？全屋都是毛的，偏偏出了一条线的，岂能发现不了？我也不言语，让他找去好了！

这里一切就绪，我又打听到溥仪住的房间——院里靠南端的两间，想去看看布置好没有。到了那里举目四望，真不怎么样：天棚低矮、房间狭窄，当时正在装修，我看见有几个人还往墙上贴缎子呢！这时，进来两名西装革履的人，大约是某报的记者吧？他们手托照相机，要给房间照相。这时，也不知从哪里得来了勇气，我跳过去加以干涉，不准他们拍照。我想，既然是溥仪要住的房间，我有权力管！把这样破烂不堪的模样弄到社会上去，有损于皇上的圣威。这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以标准的北京口音搭话劝我：“你又何必管这些事！他们都是奉命而来，官差！官差！得罪了他们也没有好处呀！”我还以为此人必是与溥仪有关的，遂放下那边的事与他攀谈起来。原来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生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从小说北京话，所以说得好，与溥仪并无干系。

这样忙忙乱乱地过了一两天，因为责任在身，是来为溥仪打前站的，生怕在哪件事上出了漏洞，于是，夜阑人静之际我又一件一件地想过一遍。觉得只有一件事情有缺欠：我们从旅

顺出来时，往闷罐车上装了许多筐苹果、桔子和其他水果，后来我们进入客车车厢，没留人在闷罐车看守，等到长春打开闷罐车门一查，水果筐丢了一半。据说让行李车上的人给偷吃了，他们要尝尝给皇上准备的水果是否会有特殊口味，谁又能奈何呢？其实光吃是吃不了太多的，有人不但敢吃还敢偷拿皇上的圣果，这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件奇闻了。

溥仪就任伪执政前后

1932年3月8日下午4时许，溥仪携婉容还有他的几个妹妹，来到我们已经呆了几天的地方——伪执政府临时驻地。

那天晚上溥仪太忙了，人来人往不断。我本想靠前说说这几天的情况，竟找不到谈话机会。

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晚上溥仪并没有睡在给他预备好的两间居室内，而是住在典礼大厅东边的一套房间里。记得那是3个房间，溥仪在东间，婉容及二格格、三格格在西间，中间屋里立着三面很大的穿衣镜，次日早晨我过去伺候，见二格格和三格格在地下跪坐于自己脚上面对穿衣镜梳头呢！

这天上午，溥仪在典礼大厅举行伪执政就任仪式，现在说说我所看到的情景。

进入大厅时，走在最前面的是侍从武官，第二个人就是溥仪，他身穿后襟长、前襟短的那种西洋大礼服，头戴黑色礼帽。跟在溥仪身后的人中，离他最近的就是祁继忠，他作为贴身随侍参加了典礼全过程。人们进入大厅后，关了门，仪式开始。这时我在大厅外巡视，不时地听见里面一阵嚷嚷、一阵鼓掌，时间不算太长，大厅的各门都打开了，参加仪式的中国人、日本人一起涌出，我看见郑孝胥、罗振玉等老臣都在里边。人们顺走廊往西拐，出门是一个小院，军乐队的人在那里列队等待。这

时有个人从队列中走出，来到一根临时安装的旗杆之下，随着演奏伪满国歌的乐点，把伪满五色旗升上旗杆之顶。后来我才听说，升旗者原来就是曾任奉天市长、颇有声名的赵欣伯。升旗时，站在队列之前的溥仪脱帽敬礼，老臣们也冲着旗杆三鞠躬。至升旗毕，宣告礼成，参加典礼的人们又照纪念相去了。

溥仪在吉长道尹衙门改装的执政府呆了20多天，这期间门禁是很严格的，凭佩戴在身上的出入证通行。出入证长约4公分、宽1.5公分，有两种颜色：高级官员戴黄色的，低级官员戴白色的。不知怎么，给我也发了个黄色的，或许是执政的面子吧！有几次我从执政府那道圆门出来进去，岗哨一见我戴的黄色出入证，便十分严肃地喊出一声口令“举枪”，用以表示对“高级官员”的尊敬，这场面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以后没有要紧事再不出去了。

终于又下来一道命令，执政府从吉长道尹衙门搬迁到当时被人们称作“盐仓”的地方去。所谓盐仓，就是吉黑権运署，有几栋小楼，在当时的长春算好房子。这次搬迁，内务方面由祁继忠负责，我的印象不怎么深刻了。

到新的地方，有了明确的职责分工，我专门侍候溥仪在缉熙楼内的生活起居，也只能在缉熙楼的范围内活动。溥仪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过勤民楼那边办公，起初还认真，往后“办公”时间愈来愈短，有时干脆不再过去。

缉熙楼是一栋二层戴帽的小楼，正门朝南、后门朝北，溥仪上勤民楼去都是出后门，越过中和门，直冲勤民楼的前门。

从正门进缉熙楼，对面便是楼梯，溥仪搬进去就住在二楼西侧靠南边的两个房间里。室内设备颇简单：寝宫内除了床、两开门大衣柜、带几层抽屉的衣箱和一个类似今天的酒柜的家俱外别无它物；会客厅里也只有书橱、花盆台子、双人及单人沙

发、小圆桌等家俱。桌上铺的不过是线织桌布，上面摆一套烟具。二楼西侧顶头是溥仪洗脸用的小屋，后来改为理发室。小屋南边是佛堂，溥仪常在这里接见近臣，佛堂旁边有卫生间。二层东侧归婉容使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逾越的。

笼中天子

溥仪那时的生活实在很枯燥，虽然每天照例上勤民楼“办公”，鬼才知道到底有何公事可办，不到中午12点就“退朝”了，在缉熙楼休息时，与婉容、二格格、三格格一块儿说说话，娱乐一会儿。

有一天，溥仪心血来潮，说要出宫转转，遂命祁继忠备车，携婉容和二格格、三格格去逛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奏事官吴天培也跟着去了。不料，象安装了特制机关，这边刚到公园，那边日本宪兵、警察、特务一起出动，成群结队的汽车一批批从四面八方向公园包抄过来。最先赶上溥仪汽车的宪兵头目，恭恭敬敬地向“执政”行礼报告道：“此地不安全，请执政回府！”溥仪感到势头不对，无心贪恋公园景色，急命司机返程。此事并没有就此完结，又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方面传过话来，说执政的安全要紧，不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要出门也得告诉一声，以便保护。话是这样讲，反正不许溥仪随便行动就是了。

溥仪有散步习惯，既然不许出宫，只好在大墙内遛遛。起初还好，散步时带上几名随侍就行。到后来，只要溥仪走出中和门一步，跟在他屁股后面的人就会愈来愈多，什么侍卫官、侍从武官、日本宪兵……跟了一大帮。溥仪很反感，却又无计可施。我亲耳听他说过：“在院子里走走还拉着大队人马，这太没有意思了。”其实，这正表明日本人对溥仪的监督和限制愈来愈紧。

平日，溥仪散步并不局限于缉熙楼前前后后，时常越出中和门往北，上护军住的院子里去转。不久即有人告诉他，护军那个院子也不保险，最好不过去。接着，又出了这样一件事：有次溥仪在缉熙楼小院里散步，陷入了思考之中。刚走到东西大墙旁边，忽然由墙外飞入一块砖头来。因为四外都有岗哨，一般人不可能接近，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令人生疑。紧跟在溥仪身后的祁继忠和吴天培都害怕了，说是“闹鬼”、“狐仙显圣”，护卫溥仪赶快离开了这里。现在看来，这事与溥仪离津前的“炸弹事件”也大同小异。试想：谁能知道溥仪正在这里散步？谁又敢向“执政府”的院子里抛砖头呢？出这种事的时候又恰恰都有祁继忠在场也是怪事。从此，溥仪散步的范围更小了，因为还必须远离大墙。

溥仪并不傻，他当然知道是谁严格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他不满，也只能忍受，因为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一切都是为了提供“保护”。出于同一考虑，关东军还派出若干日本宪兵长驻勤民楼旁厢房内，监视往来人员，包括溥仪的亲属和近臣。为了能在面子上过得去，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宪兵，不着军装，而改穿一种特制的制服。这些不易识别的人都经过了特殊训练，溥仪的一举一动全在他们的眼神之中。

溥仪终于想到，应该自己保护自己。他曾在天津张园练过几天八极拳，以后到静园、到伪满，连一次都不练，自身那点儿武术瞎了，但武术教师霍殿阁还在，溥仪身边会武艺的人也还不少。于是，溥仪又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在勤民楼天井的空地上各练一回。那天我也在跟前看着，有十多个人分别练把式，真是五花八门、各显其能。霍殿阁压阵最后登场，溥仪及观者都对他寄予厚望，他也露出人前显贵的意思，起架很猛，而且练的并非霍家拳，是一套我不熟悉的把式。不料，因

开始用力过猛，中间缓不下架，到收架时已经站立不稳了，几乎栽倒，惹得哄堂大笑。溥仪问他失脚的原因，他解释说"奴才平时腿绑沙袋，已有二三斤重，今天突然摘去，未能适应，练起功夫来头重脚轻，才站立不稳。"据我所知，真实的原因不在于此，霍殿阁随溥仪到长春后，即被授为三等侍卫官，每年津贴1 800元，乃忘乎所以，吸上了大烟，又娶上了小老婆，习武之人哪里经得住这般自我摧残？体质已在不知不觉中下降，过了几年，一位威武的拳师就出人意料地屈死于烟毒淫乐之中了。

观看武术表演后，溥仪感慨系之，觉得确有组建护军、扩充保镖力量的必要。

"御临幸"见闻

伪满十几年间，溥仪只有两种出宫的机会：一种是赴外省市视察，叫作"巡幸"，伪满最初二年不曾有过；另一种是在长春市内活动，如定期前往孔庙祭礼、前往建国忠灵庙祭祀日本侵略军的亡灵、出席协和会或其他会议的开幕式等等，叫作"御临幸"，这类活动从溥仪当上"执政"起，每年都有若干回。无论"巡幸"或"御临幸"，都由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精心安排。

作为溥仪的亲信随侍，从伪满初年起我就追随溥仪之后，在溥仪"御临幸"活动中广有见闻，仅挑两件有印象的事例说说。

就任"执政"不久的溥仪颇有"政治抱负"，为了表示"体察下情"的"圣衷"，特请关东军安排"到民间看看"。那次，他带着政府部门的一些人，按预定路线，来到南关某老百姓家。那家只有老俩口带一个孩子，溥仪进屋后先接受主人行礼，东看看、西瞅瞅的，还按着孩子的头，说了几句抚慰的话。很明显，全部过程都是排练过的。

还有一次溥仪“御临幸”协和会某年度的年会，我带几名护军随行，以保卫伪执政兼“协和会名誉总裁”溥仪。记得会场设在一个大院里，院内临时搭个很高的大棚，溥仪的“卤簿”一直开进棚中主席台前，下车即登台进入后面的贵宾室。我们几名随行保卫人员即退至棚外，守候在大门口处。呆了不大工夫，忽听棚内“砰”的一响，显然是爆炸的声音，我和同来的护军不由分说拔出腰间短枪，三步并作两步闯进大棚中，直奔主席台。就在这时见有一人被好几个人架着往外走，他一手捂住眼睛，另一只手拿着崩坏的闪光灯。一直跟在溥仪身边的警卫处长佟济煦，知道我们急了，赶紧过来告诉说：“没事！没事！”他又用手指指被架出去的那个人，“这位摄影师把银光粉装多了，闪光灯爆炸，伤了自己的眼睛。”啊，原来是一场虚惊！回去以后我还曾向溥仪询问事情经过，他说也听见砰的一声，当时吓懵了，别的什么都没看见。溥仪那时也是可怜人，出门即有杀身之虞，不得不严加防范。

本来溥仪出门时的保卫工作由关东军方面包揽，但他不放心，希望在各种场合都能有自己亲信的人。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总第26辑）

伪满初期“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的一幕丑剧

胡赓书

我国东北沦陷于日军之手，到了1932年3月初，快半年了。在这半年中，日本关东军日夕图谋建立一个听其摆布的傀儡政

权，以达其侵略野心。经过多时的酝酿，终于和伪满大汉奸张景惠、熙洽、袁金铠、臧式毅等勾结成熟，定于3月上旬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并以居住天津的废帝溥仪，来充当伪组织的所谓“执政”。3月初，溥仪在日本关东军卵翼之下北来长春，定于3月9日在长春举行“执政”就任典礼。在这个典礼的前夕，关东军和一些汉奸们即忙于筹备大典准备所谓“迎銮”。在吉林方面参加迎銮的，除了熙洽率领吉林省各厅长、县长等以次官员先期到长春候迎外，还有由熙洽、荣孟枚（熙是“宗室”，荣是满族）出面组织的所谓“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也先期到长，准备迎銮。我在当时是吉林教育馆馆长，既是满族，又是荣的族弟，受荣的指派，为团中办理庶务，也是团员之一，所以关于这幕丑剧知道的很真切。兹将这个迎銮团的组成经过和具体内容，以及熙洽组织此团的目的和参加人员的思想活动述之如次。

这个迎銮团是由熙洽、荣孟枚发起的，他们一向存有眷念旧主，企图复辟的妄想，所以在溥仪未到长春以前，不但自己先期到长春准备迎銮，还想要利用满洲旧人的民族心理，发动吉林过去的老旗官、世家后代组成一个旧臣迎銮团去长春接驾作为陪衬，希图达到他们自己的一种愿望。所谓“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的组成经过，是先由熙洽、荣孟枚倡之于始，继由钟岳、庆康等附和于后，互相援引，互相串联，居然发动了满族四十多人来参加。在3月4日开出凑成的名单，乃用熙洽、荣孟枚的名义函召单列诸人于3月5日午后，在吉林教育厅会议室集合开会。届时这一班人都出席了，由荣孟枚主持开会（这时他已做了伪吉林教育厅长），他先说明组织这个迎銮团的意义，随之即进行商议，并在会上决定了以下数事：一、迎銮团的名称决定为：“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这个

名称是由荣孟枚提出的，全体通过；二、推选钟岳为团长，庆康为副团长，瑞辅、葛金泰为文书；三、规定出发日期和个人应行准备事项；四、团中用费由“吉林长官公署”支给。团员名单如下：

职别	**姓名**	**出身**
团长	钟岳	前清举人、吏部郎中
副团长	庆康	前清举人、吉林谘议局议长
团员	瑞辅	清吉林将军富顺的族孙
	葛金泰	清末旗官骁骑校
	海珠	清吉林打牲乌拉总管的后代
	海安	清吉林打牲乌拉总管的后代
	春福	清旗官佐领
	白家驹	清旗官佐领
	文鋆	清伊犁将军金顺之侄
	赵德埥	清末旗官骁骑校，辛亥革命后为吉林旗族生计会长
	海宴涛	清末旗官骁骑校
	何毓朴	吉林旗官世家后代
	钟善晋	清末旗官佐领
	王文衡	清末旗官骁骑校
	庆文	清末廪生府经历
	永文	清末旗官骁骑校
	春雅轩	清末旗官世家后代
	庆铎	清末旗官世家后代
	张连山	清盛京将军依克唐阿重孙
	唐宝喜	清末旗官、吉林省长魁升之子
	唐宝卉	清末旗官、吉林省长魁升之子

胡绵书　清末旗官、乾清门侍卫贵珊族孙

除以上22名外，尚有二十多名，因历时过久，记忆不清，故从略。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当时这些人的思想情况。如汉奸熙洽和荣孟枚本是清末的宗社党人，他们是满脑子怀旧思想，尤其对复辟保皇，更是念念不忘的事，遇此机会当然不顾一切地来干。因此他们对建伪国迎旧主是万分地高兴，自己亲身“接驾”犹以为不足，还要组织起来这个迎銮团，用以显示出他们的忠诚。至于所有参加的人，是由于各人的出身不同，思想看法自然不会一样。有的人认为溥仪执政就是清朝复辟了，从此可以官复原职；有的是眷恋旧主，借此表示报恩感激之情；有的穷极无聊，希图攀龙附凤弄个一官半职，可以得点好处；有的富厚世家子弟，仍图保持身家；更有的借此靠近熙、荣，可以找个好差事……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总之都是给人做工具，临时乌合，做为丑剧中的一帮角色而已。

迎銮团的行程计划定后，于3月6日由团长钟岳指派团员白家驹、何毓朴先期赴长踩店、物色餐堂。因为当时到长迎銮的人很多，恐怕临时食宿发生困难。3月7日晨，全团40余人，由团长钟岳率领，搭吉长路早车抵长春头道沟车站，下车后与何、白两人会合，分乘马车直赴旅社，分宿于北平客栈和越香春旅社。从这天起每天早、午、晚在五香居就餐，当日得到伪“执政府”掌礼处的通知，内言：“执政”于8月下午3时许到长，迎銮者可先时到指定场所恭迎。全员于3月8日午后整队出发，步行至指定候迎地点，即在车站广场的右侧。3时许，“执政”专车到站，进站迎銮的有伪满各省军政首脑、日系顾问、关东军、满铁会社代表，驻长日本领事，以及蒙古齐王、张海鹏督办、新京市长金璧东、长春县长赵鹏第、民众代表王荆山等，均在站台内列队迎接。吉林

长官熙洽先期迎至四平街。当溥仪和皇后出现于站台之上时，迎銮的礼节是深鞠躬礼，但我们这个团倒是与众不同了，由团长钟岳、庆康带头行跪迎礼，人所共见，立时矮了半截。而当时情景，团员中有的伏首，有的拱手，钟岳、庆康则是泪流满面。葛金泰和赵德埥两人事先预备好的清朝服、翎顶秋帽，欲在奉迎时着用，因被别人劝阻，未能如愿，还生气不止。这些丑态的表演，直到“吾皇启驾”之后，大家才列队而回。

当日晚饭后，为了准备在10日呈递贺折，即由钟岳、庆康、瑞辅、海珠、葛金泰共同商议如何撰写。当推钟岳执笔，庆康从旁参加意见。经过修改，由葛金泰缮写（贺折本文现找不到，从略）。当天晚间，我出外游览了头道沟及商埠地，看见通衢要道，高搭牌楼，满贴标语，商铺民户张灯结彩，倒很热闹。但是一般人民群众究竟是什么心情？当时象我们这班利禄萦心的人们自然是不能揣测的了。

3月10日，团中推举钟岳团长，庆康副团长外有海珠、瑞辅、白家驹、赵德埥等6人为代表去执政府呈递“贺折”。全团人于3月11日回吉林市，下车后各自散去。可是事后多日，还有些人互相打听“上面颁给什么赏赐没有？”结果是一无所得，还得要各奔前程，自讨生活。

这幕丑剧，虽然演完，但熙洽、荣孟枚、钟岳等仍极热衷于此事。当1935年（伪康德2年）旧历春分日，当伪满皇帝溥仪来吉林市望祭白山时，熙、荣又指示钟岳，仍然用“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的名义，召集了多名团员去车站列队在大马路“日清旅馆”门前跪迎，这是丑剧的再演。这一次我因事未参加。从此以后，这个团即随着时势的推移，自消自灭了。

（摘自《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八

伪满洲国出笼

“一·二八”上海事变是蓄意制造的

李鸿钧

上海事变完全是日本侵略者有计划地策划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自认是上海事变点火人的田中隆吉战后的供词，就是说明上海事变真相的一份重要材料：

“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呀……。

田中：是的。

问：一语道破。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么样的经过呢？

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9月18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11月中旬，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2万日元来。

问：是活动费，是笔大款呀！

田中：折合现在的钱，600万日元。用这笔钱，我总得搞出些事来。说实在的，因为我也是和满洲事变有关系的一个人，希望它务必成功。当时有个和我亲近的女子叫川岛芳子①。

① 川岛芳子是日本在东北的特务头子川岛浪速收养的女特务，化名金壁辉，在抗日胜利后被中国人民处决。

……

田中：就把这2万日元交给她了。上海有一个叫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工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就托她：'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果然就这样干了。

问：干了吗？

田中：一个人被杀，两个人受伤。于是，我想，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青年同志会，就叫刚刚到上海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这个团体，袭击了这个抗日色彩很浓的三友实业公司。我相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果然，以后日华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到了1月28日晚上，陆战队和十九路军发生了冲突。"[1]

田中还供认说，由于他在上海这样一搞，"满洲独立成功了"，"以后，关东军的板垣大佐写来了非常恳挚的感谢信"，"我被称赞了一番。"

板垣在给田中隆吉的电报中所说的"把外国人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上海事变的主要动机；然而不能认为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唯一目的。对于因侵占我国东北的"胜利"而冲昏了头脑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来说，是恨不得一口把整个中国吞掉的。据十九路军当时从各方得到的情报获悉：日本侵略者策动上海事变，"一欲造成上海之纷乱恐怖，以使国联无暇顾及东三省；二欲以武力取缔我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如天津、青岛、福州等处，同样屈服其亡国条件。日本海军则因为要与其在东三省，占领我国领土和屠杀我国民众的陆军争功，特逢长其政府罪恶，更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9—51页。

欲使上海事变扩大，进图占领闸北、引翔、吴淞各区，以作日本的租界地。”

毫无疑问，日本海军在发动上海事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史学者也指出：“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动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了庞大的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使得海军也企图在‘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

（摘自《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被操纵的伪建国运动

王子衡

于臧袁密议建立伪国

关东军因为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都不能回来，现有的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又都不是能够代表统一东北的人物，而东北则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1932年1月中旬，本庄繁于沈阳旅馆特召于冲汉会谈。本庄说：“现在辽吉两省秩序基本上已经恢复，马占山已经投降，黑龙江省的治安也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各省分立，政治无法推行，经济不易恢复，人心不好安定。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才能顺利进行。你看怎样？”于冲汉早已明白本庄的意图，便说：“阁下的意见很对。东北地方长此分立，不仅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无

法改善，贵国援助中国开发满蒙的大计划也无法实现。必须成立一个新政权，才能完成这个使命。”本庄说：“是那样的。那么，就请你研究一下新政权的名称、性质和内容，下次见面请你告诉我。再是新政权的出现以前，需要有一种民意的表示，才合乎要求，我看你的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正好作这一运动的先导者，请你筹划一下详细办法，回头我告诉他们（指自治指导部的日人）办好了。”

于冲汉回家后，先把本庄的话告诉其子于静远（指导部顾问）。于静远说：“我留学瑞士，知道瑞士是个复合民族的国家，人民说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三种语言，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没有军队，只有少数警察维持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倒很幸福。我们东北现有四五个民族，性质有些象瑞士，如果建立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国家倒也不错。”于冲汉又请袁金铠、臧式毅到他家，对他们传达本庄繁的意见。袁金铠说：“这样说来，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可得好好研究研究，不能马马虎虎的。我看尽可能让些权利给日本。经济尽管合作，政治可要独立。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能让日本人乱参与。”臧式毅说：“实行东北联省自治，采用委员会制度，共同推出几个人来各负专责，再举一个总其大成的人来，也是一个办法。”于说：“二位的意见虽好，只是恐怕行不通。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让日本人参与，这是办不到的想法。至于推举一个人总其大成的说法，将推举谁呢？谁是最有力的候补者呢？我们之中哪一位是合乎要求的人物呢？据说，溥仪已到旅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袁臧二人都愕然良久。袁说：“汉卿（张学良别号）既不能回来，我们之中又没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宣统皇帝回主东北，于情于理也说得下去。”（袁原是个保皇党，曾充任清史馆馆长。）于说：“无论联省自治也好，民主共和也好，像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也好，只要能巩

固东北的治安，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就是好政治。至于首领人物，我们选不出来，也没有成见，让关东军给想想。就这样答复本庄吧。”臧式毅被放出后，自己认为可能是将来东北首领人物的候补者，现闻溥仪已到旅顺，当然是将来的东北首领。他眼看大势已去，很不愉快，便说：“好吧，怎样办都可以。”袁的心中却很高兴，认为自己忠实于清朝，很得溥仪赏识，他当皇帝，则国务总理一席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因说：“那使得。”实际上，于、臧、袁三人都有作伪总理的野心。1月底，于冲汉就把他们的意见告诉了本庄繁。

建立伪国运动的酝酿

1932年2月上旬，关东军中校参谋石原莞尔，在沈阳八千代（日本饭馆）设宴招待当时在沈阳的曾留学日本以及在东北的日本各专门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中国人。日军方面出席的还有少校参谋和知、上尉参谋今田四郎等。中国人方面除于冲汉、臧式毅、丁鉴修、赵欣伯等未出席外，其余阮振铎、徐绍卿、王庆璋、曹承宗、王子衡、王秉铎、曲秉善、王席珍、洪公余、张汉仁、王士香、庞奉书等50余人（多半是在辽宁省政府、地方维持委员会、自治指导部各方面服务的汉奸）都出席了。首先由石原莞尔代表致词，大意谓：“今天本庄司令官因为有事不能前来，派我代为招待，请诸位谈谈。我想诸位都是留学日本和日本在东北创办的专门大学读过书的有为青年，对于日本历史可能知道一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是个遭受欧美强国侵略压迫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才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不但日本人享到文明国家的幸福，即东亚首先是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也受到日本很好的影响。如果没有日本这一强国的存在，中国早已被瓜分了。但是中国不但不感谢日本，还

排斥日本。尤其张学良受到日本的支持保护，才有今日，反而采取远交近攻的中国传统方法，亲近欧美，压制日本，直至今日，还没有反省的表示，令人愤慨。回想满蒙地方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流了无数的鲜血，才换来今日的地位，保持今天的繁荣。你们都是有为之士，张学良既不回来，你们应当和日本青年合作，积极起来吸取明治维新时日本青年的精神，进行一个建设新国家运动，促进中日亲善的实现，才能谈到中日共存共荣，进而保障东亚的安全。尽力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事业，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徐绍卿代表大家致词，略谓：“石原参谋所讲的，实在是披肝沥胆的话，我们深受感动。我们都在日本学校念过书，知道日本为何这样富强，同时也知道中国为何这样贫弱的道理。东北是我们的家乡，张学良只顾骄奢淫逸，不爱惜故土，但是我们爱惜它。贵军仗义，除暴安良，我们很感激。援助人民建立新政权，这是当务之急，是人人希望的事情。我们基于善邻友好、互助共存的精神，愿尽棉薄，促进新局面早日见诸事实。”

此后，这些人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气，宣传为了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必须树立一个新政权。同时，于冲汉也将本庄繁叫他制造一个民意运动的话，告诉了于静远和自治指导部的日本顾问等。因此，这些人即以自治指导部为中心，开始伪造民意的活动，如制作传单标语和各种旗帜，筹备召开省市县各界代表大会等等，终日奔走，忙碌不休。

七头会议

2月16日，张景惠（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奉行本庄繁的命令，利用“东北政务会议”（张学良时代的组织）的名义，召集沈阳臧式毅、吉林熙洽、黑龙江马占山和于冲汉、袁金铠、赵

欣伯等，在沈阳大和旅馆举行所谓东北政务会议（外传四头会议，实际是七头会议），出席者除上述七个汉奸头目外，日军方面为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等和驹井德三（关东军嘱托，后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等。会议开始时，本庄繁高踞上座，其余诸人分左右围坐。张景惠说："本会基于本庄司令官的意旨，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请诸位到此商议一下。目前东北各省分立，终非常局，需要有一个统一组织才好。究竟用何形式，请大家研究一下。"臧式毅说："现在南京政府和张汉卿既都放弃东北不管，我看就组织一个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推行一切政治如何？"大家还没有如何表示，赵欣伯便抢着说："我这里倒有一个方案，也是本庄司令官所同意的。"说着就把那个方案拿出念道："东北地方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另组织一个新满蒙国家，名叫满洲国，暂设执政府、参议府、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下分设总务厅、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文教部、实业部、交通部。执政一席，拟请清朝宣统皇帝担任。国务总理由执政推荐任用，各部长除由现任各省首长兼任外，其余各院部长另由别人专任。首都原拟在沈阳或者哈尔滨，但是沈阳偏南，哈尔滨又偏北，都不相宜。长春位于东北的中心，最为适当，并且便于建设，因此首都拟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大家以为如何？"大家沉默了一下，于冲汉才说："我想此案已经过本庄司令官考虑再三，很完善，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吧？"张景惠说："我们就照这方案赶快开始筹备吧。"熙洽说："宣统皇帝回主满洲，名正言顺，可以不称执政，即登上皇帝宝座，亦有何不可。"本庄说："满洲国是新国家，不是满清的继续。溥仪皇帝就任执政，是新国家的元首，不是满清宣统的继续。溥仪皇帝将来如何登极，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还

不能研究。”熙洽不语，他心中以为：总理一席既取决于溥仪，我是皇族，当然有望。袁金铠也以为自己是保皇党、曾任清史馆馆长，很为溥仪皇帝赏识，也有总理的希望。臧式毅本来认为关东军释放他，就是为了让他收拾东北的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东北首领位置是非他莫属的，可是现在听说主座和总理两席人选已定，很觉失望，因而无精打彩地说：“既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就推叙五（张景惠别号）为东北政务会议委员长，负责筹备一切吧。”本庄说：“诸位阁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请签字决定吧。”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都签了字。马占山说：“黑龙江省现在情况还复杂，我想回省同大家说一下后再签字，比较妥当。”本庄明知马占山还有反复的意思，如果马上逼他签字，恐怕这个会议流产，惹起麻烦，好在别人都签字，他一个人不签，也没有多大关系，便说：“马阁下回省商量一下再签字，也可以。大家既推张阁下（张景惠）负责筹备，我很赞成，就那样办吧。但是本月底必须筹备妥善，越快越好。”袁金铠推荐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金毓黻担任伪建国宣言的起草人。臧式毅说：“他还年轻，不大相宜。”熙洽说：“叫荣叔章（荣孟枚别号，当时是吉林省政府的秘书长）干吧。”① 大家又说：“叫叙五的秘书长宋文林和荣叔章共同负责起草吧。”大家都无异议。这一出卖祖国、建立伪国的会议，就此闭幕。

伪造民意举行促进建立伪国运动代表大会

本庄繁指挥七大汉奸举行建立伪国会议成功以后，为了欺骗世界，制造民意，把建立伪国说成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要求，便催促于冲汉快搞一个民众运动，召开民众代表大会以促进伪国

① 据王前订正，荣叔章和荣孟枚是两个人。荣孟枚名叔右，孟枚是他的别号。伪建国宣言是荣孟枚起草的。

的建立。这个运动由留日出身的汉奸和满铁公司的日本社员（主要是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的会员），以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作中心，筹备多日早已妥善。2月20日，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召集辽宁省各县长带领各县的各法团代表以及满铁沿线各组织单位代表和沈阳城各法团共一千多人，举行促进建立伪国运动代表大会。首先由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致词（于冲汉有病，坐在台上，由秘书王子衡代读），大意说：

“慨自辛亥革命，清室退位，民国成立①，二十年以来，中国兵连祸结，迄无宁日。北洋旧军阀混乱火并，恶斗不已。南方新军阀又复穷兵黩武，方兴未艾。胡匪称王，流氓称霸，横征暴敛，奸淫掠夺，未有甚于今日者。以致政治废弛，经济凋敝，民生困穷。我东北人民朴质，土地肥沃，素称富饶之区，地上地下宝藏无穷，一切资源不仅应有尽有，并且他地所未有者我东北却一一具有。似此大好河山，欧美侵略者垂涎于前，赤色威胁者觊觎于后。张作霖统治十余年，敲骨吸髓，榨尽人民的膏血。张学良子承父业，变本加厉，勾结流氓政权于南京，骄奢淫逸于北平，举其罪恶，擢发难数。又复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手段拜倒于西方，竟至背信弃义，反友为仇，不惜开罪于邻国，不幸事件经常发生，侨居东北的友人，感到人人自危。此世人之所愤，群情所不容也。善邻日本，本诸悲天悯人的意志，兴起吊民伐罪的义师，今日恶军阀铲除净尽，旧势力不复留存，建设新邦，化地狱为天堂，安居乐业，拯斯民于水火，此吾人之所志，想亦天下所乐闻也。我等不敏，生居东北，爱护桑梓，不敢后人，本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召开此会，愿听舆情的呼吁，出任艰巨，端赖众擎以共举。凡我邦人君子，盍

① 历史顺序是民国成立在前，清室退位在后。

兴乎来。”

各县各界各单位的代表听到这一套鬼话后，争先发言（事前准备好的），表示拥护建立新国，并由大会作出决议书，向东北政务会议请愿，促进新国早日实现。散会后，一千多人敲锣打鼓，游行示威，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传单，如“打倒张家父子的家天下”、“铲除两张（张学良、张作相）、一万（万福麟）的恶势力”、“建设安居乐业的天堂”、“欢迎吊民伐罪的日本王师”、“实现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理想政治”等等。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三个多小时，才在人民群众的嘲骂声里解散。

溥仪就任伪执政

2月下旬，关东军政治部长驹井德三、满铁参事松木侠等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指挥下，已将伪满洲国政府的临时组织法草拟完毕。各府、院、部单位的日本负责人员，已于3月1日前受到内部任命，前往长春筹备，安排人事，准备庆祝伪国建立典礼等事。

2月下旬，张景惠奉行本庄繁的指示，率领辽宁臧式毅、吉林熙洽和赵欣伯等到旅顺见溥仪请愿，请他出来执掌伪满洲国政权。溥仪欣然允诺。此时张景惠等已知道伪国务总理的人选决定为郑孝胥，大家都为之愕然，无可奈何。同时又知道参议府议长为张景惠，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参议袁金铠，臧式毅兼任民政部长，熙洽兼任财政部长，马占山兼任军政部长，郑孝胥兼任文教部长，冯涵清为司法部长，丁鉴修为交通部长，张燕卿为实业部长，谢介石为外交部长①。他们都在3月1日前后到长春准备一切。3月8日，张景惠又率领所谓辽吉

① 《我的前半生》称各部最高行政长官为总长。

黑三省的军政各界代表50余人把溥仪从旅顺迎到长春。29日，溥仪正式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公布伪政府组织法，任命伪国务总理以下各府院部省的伪官吏，伪满洲国正式成立。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的订正

王　前

读《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有王子衡写的一篇《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一文①，其中有一段谈到撰拟叛国宣言的是荣叔章，荣孟枚是别号，把荣叔章同荣孟枚混为一个人。

我提出的订正意见是，在伪满汉奸群中，有荣叔章也有荣孟枚。荣孟枚是满洲旗人，家住阿城县，他父亲姓胡，当时呼为胡举人。到荣孟枚这一代，姓荣名叔右，别号孟枚，以后又把名号统一了。前清末年的学制，凡高等学堂考取合格的学生，均赐举人出身，荣孟枚考试合格，就高兴的了不得，逢人便说他是洋举人，狂妄骄傲，目空一切。他既不知个人有人格，也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事，更无祖国观念，一时人都指为斯文败类。叛国宣言，确是荣孟枚的手笔，他到处向人大吹大擂，说他是开国元勋，将来宫内的尚书府大臣，一定是非他莫属，得意万分，而不知人人皆笑骂他，痛恨他是卖国奸贼。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

---

① 《被操纵的伪建国运动》即节选该文。

建国是自发的行动吗？

笠木良明

满洲国的建立，是根据人民自主的意愿，还是关东军的创作？就此问题摩根检察官在7月30日的法庭上曾朗读了李顿报告书中以下的一章：

“策划实现独立的主要权力机关，为总部设于奉天的自治指导部。据可靠证人对本委员会的陈述称，自治指导部是由日本人组成。部长虽为中国人，但大部分职员都由日人充当。这个部做为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的所属机关进行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独立运动。在总部的监督指挥下，分别于奉天省各县组成地方自治执行委员会，由总部监督员、指导员、讲师等富有经验的人员中选派部员，分赴各县进行工作，其中多数人是日本人。（中略）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参谋本部最初或至少在以后短期内，即已察觉此一自治运动的利用价值，从而对运动的组织者提供援助，加以指导。从各方面获得的证据证明：该委员会对创建满洲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做出了诸多贡献，其中尤以日本军队之存在及日本文武官员之活动及其由两者之结合等项至关重要，否则不可能建成一个新的国家。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现在的政权决不是由真正的、自发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出来的。”

随后，由证人笠木良明（原所在地、社的同人，满铁社员，自治指导部的有关人员）就自治指导部的状况，以书面供词作证如下：

“自治指导部是对持辽宁省独立论调的各种团体进行启蒙、整顿和指导，以及促使满洲及热河省宣告独立为宗旨，在9月下旬组成的机关，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和指导运动的发展。此团体的首领虽为中国人于冲汉，此外尚有其他中国人若干，但占90%的是日本人，且占据主要领导地位。（中略）我负责向县长及其他政府官员介绍他县的工作情况，并向他们宣传：如他们为增进人民利益而工作，建成一个安定的和有组织的政府，那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好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理想，你们必须争取独立等等。最初没有确定独立的形式，以后才由负责人做出设立统治者或拥戴皇帝以及分别设立各行省的决定。”（中略）

“指挥部的活动经费，想系来自关东军。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和关东军保持密切联系，一切政策和行动均须得到关东军的批准。

当时该部由板垣征四郎主持。石原莞尔大佐担任策划工作，土肥原贤二大佐负责奉天的特务机关。当时举凡有关中国人对我计划所持态度的情报大多来自土肥原大佐的部门。1932年1月初，自治指导部发表声明，明确指出：东北各省正面临在满洲及蒙古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而立即发起大国民运动的时期。同时并呼吁上述各省人民为推翻张学良，参加自治指导部，全心协力为早日建成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新政府而奋斗。1932年2月18日奉天、黑龙江、吉林及承德等地相继发表独立宣言，宣告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断绝关系，成立新政府。

自治指导部，在各省为促成独立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最后终于建立了满洲国，1932年3月9日拥立溥仪为执政。”（下略）

（摘自《土肥原秘录》）

驻外军部网罗傀儡建立的“满洲国”

林久治郎
王也平　译

民政党内阁垮台后，组成了以犬养（毅）老人的首揆的政友会内阁，外相一职当然要由首相的女婿、现任驻法大使芳泽出任，芳泽很快就登上了归国之途。芳泽大使在小才子猖獗一时的现时代中，一向被说成是反应迟钝的人。早从他任驻华公使时起，外务省内就有不少人对他冷言冷语。然而他那执拗的性格和那虽不敏捷但决不脆弱的意志，却使他在翩翩才子中间大放异彩。他在北京同加拉罕之间达成的日苏恢复国交的谈判，可说是他最初建立的功勋。满洲事变爆发后，他出任我国驻国际联盟的代表，由于他缺乏一副漂亮阔气的仪表，各方面对他也有相当的议论，甚至外务省内还有人对他进行刻薄的抨击。然而这些，多数是由于不了解事实真相而导致的判断错误；也有一些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的过错而进行的恶语中伤。

即将就任新外相的芳泽是有一番非同寻常的经历的。在日内瓦，他就尝到了极大的苦头。因此，他对当前的国际关系较为熟悉，对我国今后的前进道路必有一番完整而明确的见地。只因他最近几个月间，身处万里异域，对国内政情的变化，政治中心的转移以及形势的动荡等等，所知一定不多。他取陆路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国，途经满洲，虽同关东军的干部们也曾会晤接触，但若想由此掌握事情的真相，恐非易事。基于这种情况，我感到在他就任新大臣之前，有必要让他对事变真相有充分的

了解，以便下决心处理诸般外务。遂于1月中旬，前赴京都，16日早晨与他同车前往东京。在同车的几小时中与他交谈，将有关事变的事实经过告诉了他，并向他说：今后如不以坚定的意志果断地处理政务，恐无法拯救危难于当前。他对于我的意见似乎已有所了解，并明确表示已有成竹在胸。

芳泽抵京后立即被任命为新外相。此时此刻，首先必须做出决定的重大问题是，不管表面如何，实质上已归入我国掌握之中的满洲，今后究应如何处理。关东军破坏了现状，驱逐了张学良政权，其后似乎订有计划，想要拥立宣统废帝，制造一个“独立国”。宣统废帝毫无任何实力，满洲的3 000万居民亦无独立的想法或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一个独立国，姑不论在国际关系上将会带来何种后果，仅就我国的现状来说也必将成为一个过重的负担，利少弊多，为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倒不如不用独立国的名目，使其在事实上同南京及关内政权绝缘，以实现满洲居民所理想的“保境安民”，在我国的援助下实行自治，才最为有利。然而军人的常习是不论什么事情都要一干到底，他们的思想单纯，以为只要凭借武力镇压，就能使满洲居民完全屈服。然而从统治朝鲜来看，不但在财政上背上了长期的包袱，而且要使民心服贴更是异常困难，此乃有识之士之所共见。满洲土地倍于我国，人口3 000余万，且与中国本土阡陌相连，要想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取得于我国有利之处置，真是谈何容易。至少人心之归趋，实难企望。在这种情况下，遽然制造一个独立国，在国策上极为不利。更何况国际关系将由此愈趋复杂，纷扰必多，困难愈大。

新外相完全同意我的这个意见。只是驻外军部已经网罗了一些中国人为傀儡，正在不顾一切地顽固推行其独立的准备。当前政府最紧要的事情是，尽快树立明确方针，向驻外单位发出

指示，使其停止独立计划，采取自治制度。外相已认识到这需要极大的决心，但仍准备为此而努力。他已多次访问陆相进行劝说，只因政府各部门之间步调颇不一致，没有敢以军部为对手相与抗争的勇气与决心，从而软弱无力，呈现出与前届政党内阁无何差别的虚弱状态。年迈的首相在思想上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倡导日中亲善，对于满洲事变的心情，也不会和我们有多大的不同；然而年老志衰，他作为政友会总裁，不过是凭着资望而被人打出的一块临时性的招牌而已。"骐骥垂老，不如驽骀。"在新内阁中，这位老首相竟然处于动辄就被极欲与军部携手合作的森（恪）内阁书记官长随意愚弄摆布的境地。自去年以来，我曾同这位书记长官会谈过两三次，我曾极力鼓动他与军部斗争，但他是个权力主义的信徒，内政第一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巧于逢迎的机会主义分子，当然不会理睬我的意见。特别是他对新外相的行动，竟然置我的殷殷劝说于不顾，不但不予援助，反而横加侧目，甚或暗加掣肘！

在这样的气氛中，外相要想贯彻自己的意图，那是难于设想的。特别是外相因与首相有亲戚关系，常常受到冷嘲热讽，在心理上锋芒已钝，行动上无法采取断然措施。时光荏苒，进入3月，满洲国终于独立，同月9日，宣统废帝就任了执政。

关于使令满洲独立之失策，我和新外相的看法完全相同，但在外务省内部，多数人是大势顺应主义者，他们认为事已至此，已无可挽回，不如把独立看做既成事实，处理一切，等等。省内尚且如此，在外部，在真正忧国的有识之士中间，也仅是对军部的胡做妄为，暗自悲叹，希望政府奋起斗争；然而敢于公开出面大声疾呼，反对独立的人，竟然没有出现。

从那以后，几乎一切事情都要仰军部之鼻息，犬养首相不幸于5月15日突遭凶变，命丧于青年军人之手。政友会内阁垮

台了。连续十余年间已成定例的政党内阁到此中绝了。后继的是以斋藤（实）子爵为首的所谓“不偏不党”的内阁。那位当年俊秀明敏、朝气蓬勃、斗志昂扬，一向主倡宪政、被尊崇为“宪政之神”的犬养毅氏，老后竟然判若两人，在优柔寡断中牺牲于暴力之下了。如果他能够忠于自己的思想信条，贯彻自己多年的抱负，维护宪政，与军阀坚决斗争，即使最后因暴力而死于非命，也将为国家留下巨大的贡献，而在千百年后名辉史册。思念及此，不禁令人为之深切惋惜遗憾了！

政友会内阁垮台了，组阁的大命降于斋藤子爵，究竟由谁继任外相呢？根据斋藤子爵的性格推测，当然要从外交界有声望的先辈中遴选推荐。当时石井菊次郎（原外相）是枢密顾问官，对此次事变一直持反对态度，当然不会出任此职；内田伯爵又同驻外军部过于沆瀣一气，也未必合适。不论从已退职或现任的大使中拉出什么人来，恐怕都难于善处现在这种困难的局面。因此，我想到，如能请老成持重的前外相芳泽继续留任，倒是顺理成章的。于是，一天夜晚，我在星坡酒楼邀集十多位朋友聚餐，共同商量，大家都表赞成。遂烦请当夜宴筵上的最年长者仓地铁吉（原外务次官）老人向斋藤子爵提出建议，不料竟未被采纳，外相的重任最终还是落到了内田伯爵的肩上。到此，我怀着一种时局将愈偏愈远而愈益难于收拾的忧虑，于6月上旬由神户登轮，踏上了经欧洲前往南美赴任的茫茫之途。

（摘自《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伪满洲国的“诞生”

日本广播协会《昭和记录采访组》

天津编译中心译

通往“满洲建国”之路

建国前夜

我们采访组一行来到中国吉林省省会长春。在这里，以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为中心，聚集了众多的热心于“满洲国”历史的研究人员。最近，研究伪满洲国的人员增多，理由有二：一是在此以前，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方面，东北地方的抗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个是降低了伪满洲国历史的位置。

“然而，要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就不能避开东北的历史不谈。现在对伪满洲国的文化史、教育史、金融史、电影史、满铁史、广播新闻史、开拓史以及人民斗争史等领域的研究已扎实地开展起来。”

上面一席话是同我们会面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青年研究人员吕钦文讲述的。

“的确，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掀起了抵制日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尽管这是日本借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由，但并不是充分的理由。我们应该从各种立场、角度来看待历史。”

这是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伊文成教授阐述的观点。笃

实纯厚的伊教授在两天，总计6小时中，用流利的日语向我们介绍了他近来研究“满洲国”的最新成果。伊教授在小学二年级时，进入了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当他18岁成为满洲国军官学校的学生时，目睹了“满洲国”的崩溃。伊教授目前正在潜心研究他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那段“满洲国”的历史。

“在伪满洲国建立之际，面临着两个重大难题。一是如何处理拥有2万军队并时常骚扰日军的马占山。或歼灭，或诱降，当时无法确定。所以关东军对马占山的措置，是留待2月份解决的。另一个是溥仪的问题。因为溥仪执着地要当皇帝。所以说1932年2月是进行通往伪满洲国的最后角逐时刻。”

伊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满洲国”建国前夜的问题所在。

建设新国家的幕僚会议

1932年2月5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哈尔滨。在设于奉天东拓大楼的临时关东军司令部的三宅光治参谋长的房间里，召开了建设新国家的幕僚会议。以三宅光治参谋长为首，参加会议的有板垣、石原、竹下、和知、片仓等参谋以及关东军顾问驹井德三、松木侠等人。从2月5日到2月11日的7天里，这些人反复研究了新国家的行政、财政、军事等有关国家的组织问题。

关东军顾问驹井德三，早年曾任职于满洲铁路，在12月成为新设的关东军统治部的部长并担任对占领区的行政领导工作。松木侠原是满铁的职员，现在担任参谋部的法律顾问。

根据松木侠的构想而拟订的1931年11月的《满蒙自由国设立大纲》已成为建立“满洲国”的重要指针。驹井德三、松木侠这两位民间出身的顾问对建立“满洲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时，对关东军最大的难题是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的存在。马占山系土匪出身，精通战术，在嫩江、齐齐哈尔战斗

中，使关东军损兵折将，束手无策。最后，颇感棘手的关东军只得以任命马占山当黑龙江省长为条件，换取了马占山于2月7日在哈尔滨归顺日本。

马占山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解决。但是到了2月15日，关于国家的政体以及对溥仪的安排问题仍然没有结果。

2月15日，吉林省省长熙洽带着溥仪的意愿面见了关东军本庄司令官。熙洽此举是为在16日仓促举行的东北四巨头政务委员会召开之前，就复辟帝制问题而探询牵制关东军的。

下面是熙洽与本庄的一段对话：

“拥戴溥仪，国家的政体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可行帝制？”

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他对恢复帝制抱有强烈的愿望。

对此，本庄司令官回答说：“我想溥仪是想当皇帝的，这究竟是要如何打算呢？”

与军司令官的应酬在继续。

2月16日，东北四巨头的政务委员会召开了建国会议。这些积极主张建立“满洲国”的东北实力人物是：臧式毅、熙洽、张景惠、马占山。此次共聚一堂宣布东北独立，同时审议了政体和国号等建国重要事项。关键是此次会议始终是按他们的自由意志进行的。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在加紧策划建立“满洲国”。内部迫于帝国议会的召开和总选举即将来临，外部由于以李顿为首的满洲事变调查团已从欧洲出发，正在来远东的途中。为此必须尽快造成既成事实。所以东北四巨头的建国会议是在说服了举棋不定的马占山之后，于16日仓促召开的。

宣布东北独立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的2月16日一栏中写道：

午后马占山乘飞机来奉天。下午4时，张景惠、马占山、熙洽、臧式毅四人按事先约定，同去关东军司令部拜访军司令官，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可谓是实现东北更生的第一步。

这天夜里，东北四巨头在张景惠的公馆反复讨论至次日凌晨3时。这次会议决定把政务委员会改成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将于两天后的2月18日宣布东北独立，并发表“从此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实现东北完全独立”的声明。

片仓衷对此事在日记中写道：“将声明定于2月18日发表，这对军部来说有着深远意义。”其含意是选定18日恰好是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变后的第5个月。

然而，这次会议究竟商议了什么，日本方面未留下翔实的史料。当我们采访吉林省政治协商会议的温维淳先生时，他讲述了这次会议的有关内幕。

2月初，在东北四巨头举行会谈之前，关东军同满洲的亲日派首脑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主要商讨了新国家的阁僚人选问题。

关东军的本庄司令官、三宅参谋长、板垣参谋、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大佐参加了秘密会谈。中国方面参加秘密会谈的有：臧式毅、熙洽、袁金铠、赵欣伯、于冲汉。王稔五以双方的翻译身分参加了此次会谈。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在吉林省财政处任司处，系熙洽的部下。

围绕国家首脑人选的秘闻，我们直接采访了现任吉林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王稔五，他说：“2月上旬，分别在沈阳的日本妓院、八千代翠庄与大和旅馆进行了四五次会议。这几次会议中所讨论的是，把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担任执政的事。会议还决定以张景惠任参议府议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于冲汉任

监察院院长，赵欣伯任立法院院长，袁金铠任参议府参议。但未能决定内阁各部的总长，只是委托各省推荐人选。于是，各省围绕争夺部长职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结果臧式毅任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熙洽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外交部和实业部[①]的总长人选由吉林省负责推荐，交通部和司法部的总长人选由奉天省负责推荐，文教部的总长人选委托参议府议长张景惠推荐。这样一来，内阁各部总长的人选经各省推荐的结果是：外交部总长由吉林省交际署署长谢介石担任，实业部总长由张燕卿担任，司法部总长由奉天省的冯涵清担任，交通部总长由丁鉴修担任，军政部总长[②]由马占山担任。日本方面推荐驹井德三出任最重要的职位国务院总务厅长官。这一切都是在2月上旬决定了的。"

至此，当"满洲国"建国后，这张名单便全部相继出台了。

"满洲国"诞生

2月23日，关东军板垣参谋来到旅顺与溥仪会见，向溥仪转达了关东军对新国家的政体的意见。

国体为民本政治。国家元首称执政。国号定为满洲国。国旗为新五色旗。年号大同。溥仪立即问这个国家是不是大清帝国？板垣告诉溥仪，新国家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拥戴溥仪出任新国家的元首，称为"执政"。

溥仪听了板垣的转告后，所受到的打击，如同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所描述的一样：

"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200万平方里的土地和3

① 实业部是主管农、工、商业的部。
②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伪满洲国"首任军政部总长是张景惠。

000 万的人民，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

2 月 25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遵循关东军确定的方针，对外宣布了新国家的政体。

3 月 1 日上午 9 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张景惠的公馆公布了“满洲国”建国宣言。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在《日志》中，这样记述了他的感想：“现在仅是迎来执政就任，但新国家的前途将是多灾多难的。”

1932 年（大同元年）3 月 1 日，“满洲国”诞生了。这个傀儡政权经过 13 年半的风雨飘摇，终于在 1945 年随着关东军的毁灭而消亡了。

签署《日满协定书》

汤岗子温泉的密约

1932 年 3 月 6 日，星期天，溥仪在上午 7 时 30 分由旅顺的住地出发来到沙河口车站。上午 9 时 8 分由沙河口车站乘向北行驶的快车，于当天下午 1 时 49 分抵达汤岗子车站后，步行进入对翠阁。

汤岗子温泉的对翠阁是溥仪 1931 年 11 月从天津出逃到东北的第一个栖身之地。时隔 4 个月，他重返对翠阁。那时，溥仪处于半软禁的状态。在关东军的严密监视下，对未来感到惶恐不安。而此次，溥仪滞留对翠阁是为了三天后的 3 月 9 日出席在“满洲国”首都长春举行的“执政就任仪式”。对溥仪来说，就任“执政”虽说不是他的本意，但“满洲国”已开始动作起来了。

根据 1932 年 3 月 5 日，关东军制订的《满洲国执政就任程序书》这份极其秘密的文件，对溥仪 3 月 6 日由旅顺出发，到 3

月8日抵达长春的行动记述如下："此间行动，万分机密，严禁登载。"

不知为什么尚逗留汤岗子温泉的溥仪的行动要如此保密。据《程序书》记载，由旅顺至汤岗子的途中，安排溥仪乘坐普通快车，在配备警卫上"只派便衣宪兵2人，便衣警官1人，警卫2人，随从7人"暗中保护。这次北上行动为了保密，而特意更换便装。

可是3月8日这一天，由汤岗子开往长春的专车上，身穿军服的士兵和警察明显增多了。溥仪从对翠阁出发之际显得热闹非常，并已被新闻电影公诸于世。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在他的3月6日《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写道：

今天板垣参谋来到汤岗子，决定最后的人事安排，并让溥仪同关东军司令官签署有关国防、交通及其它问题的文件。

这一天，溥仪与关东军本庄司令官的代理人板垣大佐签署了一份决定"满洲国"命运的极其重要的文件。片仓大尉所记载的"签署有关国防、交通及其它问题的文件"是指日后成为《日满议定书》中有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秘密内容。这是溥仪以写给关东军司令官的问候信的形式传递的。也是溥仪由旅顺至汤岗子的一段旅程中，必须保持行动诡密的理由所在。

3月8日上午8时，溥仪乘坐的由六节车厢编成的专车上，增加了32名警卫。溥仪一行穿过如同潮水般的欢迎人群，登车驶向长春。

溥仪的秘密书信

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认"满洲国"时所签订的条约被称为《日满议定书》。这项条约是由公开发表的正文和在战前一直保密的、关东军司令官与执政溥仪的往来书信，以及关东军

司令官与国务总理郑孝胥之间交换的协定而构成的。

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之间的往来书信正是半年前溥仪在汤岗子温泉签署的东西。

公开发表的《日满议定书》在序言中，颂扬了日满两国永远亲善，互相尊重其领土权，揭示了以确保东洋和平为目的。然后规定：

①承认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满洲国的既得权益。

②为了日满共同防卫满洲国，承认日本国军队驻扎在满洲国境内。

在议定书的正文中，只有"尊重日本的既得权益"和"共同防卫"两条内容。

此外，溥仪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书信的内容是：

①委托日本军队维持满洲国的治安及国防。

②国防上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运、空运的管理及新建均委托日本承担。

③日本人可充任满洲国参议及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其选任和解任须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

④以上宗旨及规定作为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的基础。

另一个秘密文件是郑孝胥与关东军司令官订立的3项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承认日本享有铁路、港湾、水运、空路的管理和敷设铁路、成立航空公司以及采矿等各项权利。

从《日满协定书》正文，溥仪的秘密书信以及郑孝胥的三项协定看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满洲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国家。特别是溥仪的秘密书信在决定"满洲国"实际情况这一点上很重要。

日期之谜

然而，溥仪的这封秘密书信尚有一个令人难解之谜。

这就是溥仪在汤岗子温泉，签署关东军司令官的代理人板垣参谋带来的这封书信的时间是3月6日，可是为什么成了10日呢？时隔两个月以后的5月12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才对溥仪的书信作出回答。本庄在回函中写道：

3月10日的尊函确已收悉。

我方对此无异议，谨复。

那么，从溥仪签署密信的3月6日到本庄回信的5月12日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大同元年3月10日”是溥仪就任执政的第二天。“大同元年3月6日”溥仪尚在汤岗子，还不是正式的执政。不仅如此，也许是当时关东军的做法使溥仪改变了就任执政的态度。若是这样的话，关东军费尽心机的拥立溥仪工作就会失败，这样一来，不仅是关东军司令官连军中央都必然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因此，在溥仪签署书信前，要全力以赴地做好说服工作，同时为了掩人耳目，对汤岗子的活动，必须严守秘密。

关于这封密信，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着是郑孝胥背着溥仪与板垣之间进行的秘密交易。在签署《日满议定书》之前的8月18日，溥仪严厉地责备了郑孝胥的独断专行后，在无可奈何之下，追认了既成事实，只得签署了这封密信。这就意味着1932年3月6日，溥仪中途逗留汤岗子时，根本就未签署过这封密信。

关东军把日期写成3月10日，是为了使执政溥仪的书信有效性、合法化。

筑波大学的臼井胜美教授认为，未被授予任何权限，仅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承认一国之元首并对其重要国事施加干涉，实属国际间条约谈判中，极其特殊的事例。其结果不得不称之为侵犯了天皇大权的重大越权行为。

然而，此事在日本国内是否成为问题呢？

根据臼井教授的调查，只要一看枢密院正式会议的议事录，完全没有触及此事。可是，在枢密院正式会议前举行的审查委员会却是议论纷纭，会期很长。在审查委员会中到底议论了些什么？由于至今未见有文献记载，而只好进行推测了。从这次会议之特殊，会期之长，可以看出本庄繁的书信很可能存在问题。

溥仪的书信被犬养毅内阁承认的时间是4月15日。同时《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河流的处理方针》的附件报告，连同溥仪的书信一并被顺利地通过了。犬养内阁对如何处理关东军的独断专行颇感棘手，因为溥仪的书信明显违反了《国联盟约》和《九国条约》。如果要十分慎重和极其稳密地处理这一问题，会议就需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经过这次内阁会议承认，给本庄作了答复。

7月12日，日本众议院进行表决，承认“满洲国”，并在8月8日决定，派陆军大将武藤信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关东长官兼任日本驻“满洲国”临时特命全权大使。

米泽一等书记官的记录

这一时期，执政溥仪和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份关于《日满议定书》缔结前后情况的记录。这份记录是当时随同武藤信义大使参加签订《日满议定书》仪式的米泽菊二一等书记官留下来的，其中极少一部分曾经登载在外务省关系会报上。

我们从京王线的上北泽车站步行大约五分钟，来到了居住在鳞次栉比的高级公寓一隅的米泽家。米泽菊二的儿子米泽领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已于1983年11月故去。当我们打听米泽菊

二当年的记录时，米泽领从他亡父的遗物中，给我们找了出来。

这份纪录是在盖有朱红“极密”印章的外务省便笺上，用打字机打印下来的。

这份记录的标题写着：“签订《日满议定书》有关人员的前后焦虑心情——1932年9月17日于长春大和旅馆”。仅看这个标题，就可想见在签订《日满议定书》之前的困难处境。从米泽的记录中，可以进一步清楚地了解到在签订《日满议定书》之前的有关人员的情况。下面让我们根据这一珍贵的记录，再现一下当时的情况。

签订议定书前6天，即1932年9月9日，米泽从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那里听到国务总理郑孝胥突然提出辞职的消息。以下是米泽记录的有关片断：

9日，得知国务总理郑孝胥由于长期不满驹井长官的独断专行，而突然提出辞去国务总理之职，闭居私宅，不理政务的极密通报。为此，关东军煞费苦心以寻求妥善对策，最后决定尽一切可能，全力挽留郑孝胥。并急忙派遣冈村宁次参谋副长前往长春，向郑进行种种解释工作，但郑责难驹井长官的专横跋扈，不肯让步。关东军迫于签订议定书日期临近，更换总理颇为不利，最后约定在签订议定书后，即将驹井调职，这样才使郑孝胥改变辞职之意。

据说郑孝胥提出辞职的理由是，不能容忍国务院的驹井德三总务长官的专横跋扈。小矶参谋长知道郑总理闭居私宅，不理政务的情况后，连忙把冈村宁次参谋副长派往长春，做说服郑孝胥的工作。这时不仅是日本国内，就连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满洲国”，加以签订议定书的日期迫在眉睫，可以想像得出当时有关人员的那种坐立不安的狼狈相。

冈村在9月4日接到密电，带着说服郑孝胥的命令直奔长

春。经过一番努力挽留，使郑孝胥的情绪有了好转。后经冈村反复地耐心说服，到了8日晚，终于以解除驹井总务长官的职务为条件，总算使郑孝胥打消了辞意。

米泽是9日才得知此事原委。当时，小矶参谋长还考虑万一说服工作失败，就让张景惠担任临时国务总理。大概只是由于劝说郑孝胥的工作获得成功，事态好转之后，米泽才耳闻此事。

米泽充分意识到签订《日满议定书》对于日本的命运有着很大的重要性。并预感到发动满洲事变受到国际舆论强烈谴责的日本，由于签订了这项条约，会进一步在世界上遭到孤立。对米泽来说，当听到郑孝胥在签订议定书前提出辞职时，就预感不祥，在签字仪式上是否会发生什么问题？

米泽在记录中写道：

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在于郑国务总理是由于军部的挽留和解除驹井职务的许诺而暂时留任的。其真实用意如果不单单是排斥驹井而是在此以外别有政治动机的话，问题就应另作考虑了。这就是说他顾虑签字后会戴上卖国贼的罪名，恐怕将来被中国四亿民众看作出卖满洲的罪魁祸首。迫于签字日期临近而愈加烦闷不安，很可能为了逃脱责任不得已而提出辞职。

米泽有一种预感，认为郑总理辞职，另有动机：他深恐签订《日满议定书》把中国领土东北四省出卖给日本，落得个卖国骂名，在最后关头拒绝签字。

签约之日

米泽的记录里，叙述了在签字仪式休息室发生的一段事情：

我带着议定书走进举行签字仪式的大厅前，在休息室与民政部总长臧式毅握手寒暄时，感觉到他的手在颤抖。同时也看到国务总理郑孝胥的面部在痉挛，这使我对他们的疑惑更加强烈了。由于我承担着让双方全权代表在议定书上签字的任务，我

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一紧急任务。

米泽的记录又出现了更加紧张的场面。签字仪式开始后，首先由武藤全权大使致词表示日本决定承认满洲国，接下来应该轮到郑孝胥致答词。

郑孝胥总理想快一些致答词，可是说不出话来，他的嘴蠕动了半天，面部表情极度紧张，显出一副要哭的神气。时间5秒、10秒、30秒过去了，可这位总理欲发言而不能出声，我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内心深处一定像波涛起伏，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激情。

郑孝胥紧张得难以启齿，面部痉挛，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米泽惊恐地感到郑孝胥内心发生动播了，难道他还能签字吗？

我万分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讲话快点结束，我打开议定书暂不填写日期，希望尽快签字。然而，当要一份一份地签字时，郑总理恢复了平静。他好像是刚刚抽完羊角风。按惯例是在填好日期后再签字。然而，想尽快完成签订议定书的米泽当机立断，首先请郑孝胥签字。看到郑总理恢复了平静，开始伏案签字时，米泽才意识到这桩重大的签署仪式可算是平安结束了。

与此同时，在缔结《日满议定书》之际，执政溥仪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

在签订议定书前一个月的8月16日，郑孝胥带着已同关东军司令官缔结了的一项协定，要我批准。

因为是《日满议定书》的附属协定，所以郑总理未经溥仪的同意即自作主张地签了字。

勃然大怒的溥仪责问了郑孝胥，但为时已晚。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描述此事说：

我恼的是郑孝胥过于擅自专断，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恼日本人的过分讹诈，“皇帝宝座”没给我，反而要去了这么多的东西。

溥仪自己3月6日在汤岗子温泉签署了给板垣的密约，到了8月将这一责任全部转嫁到郑孝胥身上。郑孝胥苦于受溥仪和关东军的夹板气，这也成为他在正式签订议定书时心神不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米泽最后这样结束他的记录：

因为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事情，大概谁也不知道我心中的奥秘，所以特存此记录，谨供日后的史家参考。

当签署《日满议定书》仪式平安结束后，米泽回到长春的大和旅馆，写下了这份记录。10月4日，通过国务院的机构改革，解除了驹井长官的职务。

《日满议定书》的缔结，标志着日俄战争以后对解决满蒙问题有了一个结果。但同时也驱使日本更加走向孤立化。

小春日和

执政溥仪和武藤元帅

关东军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关东长官武藤信义大将作为首任驻“满洲国”大使，于1932年10月赴“满洲国”首都新京就职。作为关东军司令官，自1927年以来，这是东山再起。虽说把执政溥仪拥戴为“满洲国”元首，但这次的关东军司令官的职务，却是独揽“满洲国”的最高权力，在实质上处于元首的地位。

武藤大使到任后，把每月的1日、11日、21日定为例行会见日，到执政府（溥仪称帝后，改为宫内府）晋见溥仪。

《严密会见录》记载了武藤大使到新京赴任后，从1932年11月21日第一次与执政溥仪会见时起，到1938年4月截止的五年半的时间里，溥仪先后同武藤信义、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四任关东军司令官兼大使的会见经过。此外，林出贤次郎

也记述了关东军司令官与“满洲国”的两任国务总理郑孝胥和张景惠的会见情况以及由林出担任翻译的重要会谈内容。

首任驻“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1868年生于日本佐贺，1932年初次与溥仪会见时，武藤已是64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生的溥仪与武藤见面时才26岁。两人年龄之差可说是祖孙关系了。若翻开《严密会见录》，看一看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对话，便可知道溥仪所会见的四位司令官中，最被他信赖，能推心置腹地交谈的就属首任大使武藤信义了。

后来随着满洲国政权的傀儡化程度日益加深，溥仪逐渐变得谨言慎行了。在同关东军司令官会见时，也只是说一些官场的原则话。而武藤大使在任的1932年10月至1933年7月，溥仪与武藤之间的关系则使人想起小阳春的美好光景。

一天溥仪问武藤说：“听说大使在军中有沉默寡言将军的绰号，是否当真？”

武藤露出一丝微笑说：“所谓沉默寡言是很难做到的，每到夜深人静，当我回顾反省一日之言行时，发现颇多徒劳无益之处。”

武藤这样回答了他的沉默寡言绰号的原委。虽说武藤有沉默寡言将军的绰号，但他同溥仪会见时，却常常超过预定的一小时限制，有时要谈上两三个小时。往往使那些担任警卫的官员们等得焦躁不安。

寡言将军遗留的声音

《严密会见录》记载着1932年12月21日溥仪劝说沉默寡言的武藤将军，在留声机里录音的一段经过。

溥仪兴趣广泛，他喜欢读书、绘画、打网球、骑马、照相、看电影。并且任何一项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个时期使溥仪开始着迷的是刚刚研制出来不久的“录音留声机”，即录音机。

当溥仪得到录音留声机后，就录下自己的声音，然后欣赏一番，爱不释手。当12月21日举行例行会见时，溥仪对来访的武藤大使说："今天我特意准备好了录音留声机，若无不便，我想给大使录上几句话。"

一天，林出贤三突然给我们采访组打来电话说："在家中仓库整理家父遗物时，发现了武藤大使的录音盘。"

溥仪让沉默寡言将军讲话的珍贵的声音，就这样从林出家的仓库中出现了。

为了进一步详细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我们再次来到林出贤三家。林出贤三告诉我们："据家父遗留下来的说明书，武藤大使的录音盘由唱片制作公司复制了120盘。因武藤大使不久突然死去，皇帝陛下就把这盘录音赐予家父留作纪念。"林出贤三从他父亲林出贤次郎的遗物中，搬出已陈旧了的手摇式留声机。打开盖子，在拾音臂顶端的针孔里，插上一根竹针。为了便于削竹针，在旋盘的中央安装有专用削竹针的刀具。这是昔日凡得到这一文明利器的人，都要反复操作的作业。上好留声机的发条，再移动拾音臂，唱盘开始旋转，轻轻地放下竹针，从林出家的客厅里清楚地传出了武藤大使的沉着的声音。

"此次，俄国与中国恢复邦交，俄国似乎颇为欣喜。诚然，我认为中国的共产党势力今后可能会迅猛发展。中国凭借国际联盟的力量企图压制日本的正义行动，但一发现依赖国际联盟不可靠，立即无条件与苏俄缔结邦交。俄国与中国恢复邦交虽然并非坏事，但就现状而言，中国无条件与俄国建立邦交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重大失策。"

1929年，蒋介石与张学良携手合作，以杜绝赤化宣传为由，强行将苏俄管理下的中东铁路收回。致使苏俄于7月18日宣布同中国断交，以后的3年便是中苏关系冻结时期。

苏俄对满洲事变持中立态度，是因为恐惧对日战争，尽量避免刺激日本。当时的苏俄正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全力以赴地发展国内经济。

国民政府十分警惕苏俄对日本的接近，并认为在国际联盟中，无论如何要拉苏俄站到自己的立场上来。再者，也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内战的战略考虑。蒋介石于1932年12月同苏俄恢复了外交关系。

武藤大使对着溥仪推荐的录音机讲道："关于中俄复交，略述所感。"武藤遗留在录音盘里的话，再现了当时国际间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政治风云。武藤大使预测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势力方兴未艾。他按照事先准备的原稿，对着麦克风流畅地说：

"中国共产党今后会日趋壮大，但目前中国内战四起，国家如同一团乱麻……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巩固日满两国的提携与亲善，在期待实现满洲国的真正王道政治的同时，也衷心期待4亿中国民众真正认识日、满、中三国合作重要性的一天早日到来。"

武藤大使的录音一结束，溥仪使劲鼓掌，跑进录音室随即唤来侍从把录音盘放到留声机上，当溥仪清楚地听到留声机里放出的声音时，十分高兴地说："由于录音的情况不同，有时不够清楚，能得到如此清楚的录音确是很大的成功。"

保存在林出家的这盘寡言将军的录音是经溥仪允许复制的120盘录音盘中的一个。通过这一使人出乎意料的线索，可以了解到1932年时，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是如何认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中国情况的。

热河作战报告

大体上控制了内蒙古、东北三省地区的关东军，于1933年2月开始策划侵占热河省。

热河省位于山海关以北，在奉天省与河北省中间，与黑龙江、奉天、吉林省合称为东北四省。由于热河在华北境内，其向背和归属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又因热河出产鸦片，1931年10月，关东军在其制订的《满蒙统治方案》中，甚至把鸦片税与关税、铁路及官办企业税、盐税共同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四大主要来源。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以第6师团、第8师团、第14混成旅团等兵力开始向热河进犯。

《严密会见录》记载了在关东军进犯热河之前的1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同国务总理郑孝胥会见时，开始涉及到的热河问题。

郑：解决热河问题已迫在眉睫了。

武藤：现在正全力进行准备，虽然到了3月以后，冰雪融化，军队的行动就不便了。但只要对方不出来挑战，我们还是应该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

郑：应给河北方面为我们做内应的人一部分军费开支，所以要尽快拨出二三十万元交给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这是取得内应人信赖不可缺少的条件。今年满洲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平定热河、维持地方治安、补助农民的春耕。其中最急需的是用于热河方面的军费……

日本军队开始准备攻占热河的情报，引起国际联盟中各国的严密关注。

1933年2月15日，国联19国委员会采纳了以不承认满洲事变是自卫手段、不承认成立“满洲国”是自发的独立运动为要旨的李顿报告书，并一致表决不承认“满洲国”。

2月20日，日本政府鉴于国际联盟大会采纳了李顿报告书，决定退出国联。同一天，陆军省也发表了以“退出国联，在所不惜”为要旨的声明。

2月24日，由19国委员会向国联总部提交的报告书，以42票对1票压倒多数的优势被通过。只有日本投了反对票，这使得日本在国际上完全陷于孤立。

在此之前，1933年2月21日，执政溥仪在执政府与武藤大使举行了例行会见，下面是两人的谈话记录。

执政：国联方面已向日本发出了劝告，而日本执意要退出国联，这对满洲国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大使：什么影响也没有。无论国联及世界各国说什么，日本决不会改变方针，日满两国的关系也决不会有任何变化。

执政：热河问题进展如何？

大使：双方的第一线部队已交火。刘桂堂部昨天开始向前推进，从明日起日本军的一部也将要开入热河境内。

执政：听说在热河省内，对方有十二三万人？

大使：大致有十三四万人。但张学良自称有20万人马。热河山多路险，行军作战颇为困难。我军一旦发起进攻，就会在很短时间内攻克热河。为此，正在做充分的准备。倘若缓慢进攻，也许我方的牺牲可以少一些，但前线部队的士气正旺，即便多出现一些伤亡也在所难免。尽管热河方面有十几万敌军，一旦我军投入2万人马就能解决热河问题。据可靠情报，张学良已在做逃走的准备。

会见两天以后的1933年2月23日，关东军开始向热河大举进攻。3月4日占领了热河省城承德，继而攻陷喜峰口、古北口等万里长城的沿线关口，3月16日占领界岭口。至此，日军几乎控制了长城沿线，热河作战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集结主力，向日军发起猛烈反攻。日军为扩大战果，趁机于4月突破长城线向关内的华北进攻。

4 月中旬，日本天皇对关东军扩大战线感到忧虑。当时的奈良日记这样写道："4 月 17 日傍晚，木庄武官长来访，圣上传旨进入关内颇须谨慎。"而后，关东军暂时撤到关外，但到了 5 月，再次侵入河北省。在距离北平城24 公里的地方，眼看要占领北平时，接受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停战要求。

5 月 31 日，日本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少将，同中国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中将进行谈判，双方缔结了《塘沽停战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划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从而形成了"满洲国"与中国本土分离的状态。

日本军根据这个事实，企图使中国方面以长城线为国境，间接承认"满洲国"的存在。

福克斯有声电影

退出国际联盟，日本仍在热河作战，侵华战争并未收敛。对此，更加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严密注视。4 月初，美国的新闻电影公司向溥仪提出了采访的申请。《严密会见录》记载了 4 月 1 日执政溥仪与武藤大使就如何接待采访一事的会谈。

执政：这次应美国福克斯有声电影公司的要求，后天要采访我并拍摄影片，不知道讲些什么才好？上次大使被采访时，讲了些什么？是发表一些让满洲国民听的话好呢？还是发表让世界民众听的话好呢？大使讲话时，拿着书稿没有？

大使：应当讲一些呼吁世界民众的话。讲话时什么也没有拿，这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我只是重申了建立"满洲国"的目的，以及我们日本援助"满洲国"使其繁荣昌盛，维护东洋之和平、对世界人类之幸福的重要性。而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今世界各国尚未了解东洋之真相，反对承认"满洲国"之人也大有人在。但是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那些人会理解日本所做

出的正义行动，我也期待着他们醒悟到对东洋认识不足之日早一天到来。

执政：我也这样讲吧。

美国新闻电影公司申请采访溥仪。

执政溥仪与武藤大使4月1日无意中的谈话，把我们的采访组引向了意外的方向。

根据溥仪的谈话，同美国福克斯有声电影公司的会见日是4月3日。溥仪所说的“福克斯有声电影”是指当时的“福克斯电影公司”。“福克斯电影公司”在1935年与“20世纪电影公司”合并而改称为“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在鼎盛时期的1929年。拍摄出了当时美国生产的全部电影片的40%，是好莱坞最大的电影公司。溥仪是接受福克斯公司的新闻电影部、有声新闻电影的采访的。

在纽约百老汇附近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影片资料馆，位于繁华街道的喧嚣声几乎达不到的、行人稀疏的一条僻静街上。这幢建筑就是当年代表风靡全世界的美国电影的著名电影公司。由于年久失修，已显得十分陈旧。如今几乎成了错当成仓库似的一个房间，勉勉强强地守护着过去的光荣的遗产。

一位年轻的男管理员见我们来访，伸开双臂，耸耸肩遗憾地说：“对不起，你们要找的1933年的有声新闻电影片，早已在一次仓库失火时被烧毁了。只是在那次火灾之前，20世纪福克斯公司向南卡罗来纳大学赠送了有关‘满洲国’的影片。你们可以到那里碰碰运气。”

经这位年轻管理员的热情介绍，我们从纽约出发途经亚特兰大，又乘坐两个半小时的飞机来到了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州府哥伦比亚。这是一座阳光灿烂、树木繁茂的亚热带城市。建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州立南卡罗来纳大学迄今仍保存着有

声新闻影片，这是该大学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泛收集的美国战前的新闻记录片。设置在附属于讲授广播、电影、新闻报道等学科的电影资料馆中，确实珍藏着由20世纪福克斯公司赠送的有关“满洲国”的有声电影片。

南卡罗来纳大学保存的是从有声电影、新闻影片中剪裁下的部分镜头。即摄影后，由编辑负责加工完成一部新闻电影时，根据需要被剪裁掉的一部分镜头。

正如年轻的管理员所说，20世纪福克斯公司于1963年将剪裁下来的部分影片，赠给了南卡罗来纳大学。以后，20世纪福克斯公司所保存的影片在火灾中化为灰烬。虽说有声电影、新闻记录的“满洲国”的影像是裁剪剩下的部分镜头，但这些镜头现在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了。

南卡罗来纳大学保存着的有关“满洲国”的影片主要有：

①1934年3月1日，皇帝加冕典礼之日的溥仪

② 4月1日 在阵亡日本兵的追悼会上与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合影

③ 4月5日 满洲国军事阅兵时的溥仪

④ 4月7日 满洲国皇帝与小学生

⑤ 5月7日 溥仪与满洲国童子军

⑥ 1935年4月6日 溥仪访问日本天皇

仅从这六组影片的标题上看，并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但正是这些未曾上映而被剪裁保存下来的影片，使我们看到、听到了从“满洲国”的内幕舞台里传出的扣人心弦的声音。

皇帝登极

黄金台别墅

1933年5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大将晋升为元帅。7月17

日，武藤元帅在辽东半岛的疗养地旅顺黄金台关东长官别墅，约见了国务总理郑孝胥。此时郑孝胥也在大连游览面临黄海的胜地星个浦[①]，吟诗填词，欢度假期。

在疗养地二人举行的会谈从下午2时开始到5时20分，时间长达3小时又20分，异乎寻常。双方推心置腹地谈论有关"满洲国"的人事和国体等问题。"满洲国"实行帝制的说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元帅：满洲国的基础日趋巩固，在明年庆祝建国二周年之际，实行帝制如何？

郑：很好。真是可喜可贺之事。但我觉得现在实行帝制是否操之过急。中国内地一些人说我当上满洲国总理即踌躇满志，却忘了恢复帝制之大业。拥立溥仪复位登极，自感欣慰之至，此乃我之宿愿，我翘首企望溥仪在北京登极称帝之时早日到来。

元帅：当然很好。但是恢复帝制应做充分准备，首先巩固满洲的基础，继而扶植华北的亲日满政权，再扩展到华中南实现真正的日满中提携，以确保东洋之和平。必须按这样的步骤进行。

对溥仪和他的清朝旧臣遗老郑孝胥等人来说，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20余年的今天，仍梦寐以求在北京恢复帝制，重登宝座。溥仪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就是投入关东军提出的在满蒙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委曲求全地担任了执政。

那时，溥仪与关东军之间曾有约定，如果就任执政已一年，关东军仍不允许实行帝制，溥仪可以提出辞职。但时隔一年，双方对此都避而不提。可是到了满洲建国一年零四个月以后，总

① 星个浦：现称大连星海公园。

算由关东军司令官提出了实行帝制的话题。这使溥仪愈加坚定了复辟帝制的信心。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内心世界："现在顶要紧的还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宝，还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溥仪的告天礼

在靠近北京市中心的西城区护国寺街，我们采访了"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这次采访时，我们冒昧地向溥杰提出了关于满洲国的问题。对此他言简义赅地回答说："所谓的'满洲国'对皇帝和清朝的旧臣而言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利用关东军实现清朝复辟，关东军利用我们实现日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满洲国。"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记述了这段经过。日本方面着手做承认"满洲帝国"、皇帝即位的准备。正式通知是在武藤元帅与郑孝胥总理在旅顺黄金台别墅会谈的三个月以后，由7月27日猝然死去的武藤元帅的继任者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通知"满洲国"方面的。

1934年3月1日，20世纪福克斯公司采访时，在当时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郊外的杏花村拍摄下了溥仪的皇帝登极大典情景。溥仪身穿清朝皇帝即位的传统服装——龙袍，出席皇帝即位的"郊祭仪式"。

在皇帝即位时，关东军与溥仪之间对于用何种方式举行大典的想法就已大相径庭。关东军不允许溥仪穿清朝龙袍即位。日本人承认溥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大清国皇帝"。因此，关东军的看法是要溥仪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双方各不相让，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决定3月1日溥仪先穿着龙袍举行登极告天礼，而后按关东军的规定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在"勤民楼"举行即位典礼。

东北初春的3月，仍然寒风凛冽。大风翻弄着溥仪身上的龙袍，在临时用土堆起来的“天坛”上，举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即由溥仪皇帝向天帝禀报自己已即皇帝之位。

3月12日的《严密会见录》记载了溥仪在皇帝书斋中与菱刈隆大使的会谈。

大使：如此盛大的郊祭仪式真可谓壮观无比。用庄严一词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

皇帝：虽因郊外祭典前夜睡眠不足，稍感疲惫，但这次的仪式可说得上是庄严肃穆了。

大使：此次大典若伴有古乐就锦上添花了。日皇陛下在登极时，就演奏古代的帝乐，这些音乐都是很久以前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皇帝：在中国，古乐已被遗忘，今天又有许多失传了，虽有人多少懂得一点古乐，无奈没有乐器，实在可惜。

在《严密会见录》的报告中，从这天开始，取消了“执政”的称呼，成为“皇帝”。执政府也改称为“宫内府”。宫殿被称为“帝宫”。

菱刈关东军司令官第一次口中改称“皇帝”就向溥仪发出了访问日本的邀请。他说：“我们期待着皇帝陛下早日访问日本”。

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记述了他访日时的心理：“使我终于产生最大的错觉，自认为有了极高的权威，是在1935年4月访问日本之后。”菱刈隆提出邀请溥仪赴日本访问的一年后，溥仪于1935年4月2日至27日访问了日本。从此“满洲国”又走上了更大的歧途。

（摘自《皇帝的密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郑孝胥与关东军
订立出卖东北主权的密约

黄富俊

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东北14年，并根据日满议定书和附属协定掌握伪满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实权，垄断东北的农产矿产林业等等地上地下资源，对东北人民推行了极其残暴的屠杀镇压奴役掠夺政策。这个议定书，是在1932年11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代表日本天皇、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代表伪满执政溥仪签订的。但是这个议定书和协定，并不是在伪满成立以后才决定的，而是在溥仪来就任执政由天津到旅顺之时。郑孝胥在关东军威胁利诱下，他贪图伪满国务总理地位，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严苛条件，并在溥仪面前极力主张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署这项出卖东北全部主权的非法密约。日寇手中有了这种密约，事实上已取得东北全部统治权力，以后乃宣布建立伪满洲国，以溥仪任执政，以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兹把我所了解的这段罪恶历史事实叙述如下：

一、郑孝胥代表溥仪与关东军订立出卖东北主权的密约

溥仪于1932年2月到达旅顺后，与关东军接洽，委任郑孝胥为代表，与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等磋商建立政权。郑孝胥委以他儿子郑垂为翻译，关东军以中岛比多吉任翻译。谈判开始，关东军就拿出预定好的计划，即是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以溥仪任执政，以郑孝胥任国务总理，把长

春改为新京，做伪满政权的首都。接着又提出伪满政府成立后，对日满关系，应双方签定一项日满议定书和附属协定。议定书条文，看来很简单，首先列举日本承认满洲国，其次是日满经济一体．日满共同防卫，日满同盟合作。可是在协定的条款中规定的很详细，把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主管的权力和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等经营的权力，完全移让给日本。通过几天的磋商，郑孝胥在关东军的威胁压迫和金钱地位收买下，在他的儿子郑垂怂恿下，贪图个人的名利，接受了日寇提出的条款。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同时要求这项议定书和协定现时应作为一种密约形式，先由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字，郑孝胥亦表示同意。当郑孝胥向溥仪复命时，溥仪看了关东军提出的建国计划和议定书的条款，立刻现出惊慌失措的神色，愤愤地说：我是清朝皇帝，现在让我降格当执政，我对不起清室历代祖先。东北主权完全让给日本人掌管，满洲国仅剩有名无实的空筒政府，我当这样国家的首脑，也对不起东北的老百姓。我绝不能这样做，绝不能接受关东军这种严苛的条件。郑孝胥说，"陛下"意见我完全同意，但是关东军的意见很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最后对"陛下"做皇帝，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说出这样的意见：现在国际间对东北局势很注意，如果即实行帝制，对国际间的冲动较大，不若暂时先建立执政的政权，比较稳当，将来国内国外局势稳定下来，再行晋位皇帝，这是可能的。我（郑孝胥）对这一点认为不成问题，至于主权问题，我的意见认为满洲国好比初生婴儿，提携抚育，当就要仰赖亲生父母照管。将来到了自己能够独立的时候，再把一切权力收回自主，这也是可能做到的事。我的能力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陛下"不同意，我只好离开旅顺不管。这时，郑孝胥的儿子郑垂在旁边看出溥仪无意接受乃父的主张，就插嘴说，"陛

下”应回想过去亡命天津是什么环境，今后当上满洲国执政是什么环境。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曾说过这样坚决的话，议定书和协定列的条款是日本多年既定的国策，满洲国首脑由谁担任可更改，而议定书和条款绝不能改变。日本这次出兵受到很大的牺牲，如果有人认为是给别人打天下，那是大错特错。土肥原在天津说的话是骗局，现在“陛下”到旅顺，已入日本的罗网，来时容易去时难。干则享受荣华富贵，不干则涉及到生命危险，何去何从，请陛下考虑自择。溥仪在他父子二人要挟利诱下，终于按照日寇要求的条件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署了这项出卖东北整个主权的密约。日寇手里有了这个密约，乃敢放胆于1932年2月底，召集所谓东北四巨头（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吉林省长官熙洽、黑龙江省警备司令官兼省长马占山、奉天省长臧式毅）在沈阳开会，由关东军主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假借东北人民的意愿，通电脱离中央，建立伪满洲国，推戴溥仪任伪执政。这个非法政府，同年3月在长春诞生，现在回想这项密约，不仅是出卖东北全部主权，同时也是出卖了溥仪自身，不仅把东北人民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同时也给帮凶的汉奸造成终身不能磨灭的滔天罪行。

二、罗振玉暴露郑孝胥出卖东北主权的密约内情

伪满政府中央最高机关，关东军原来规定为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三院制，以郑孝胥任国务总理，以赵欣伯任立法院院长，以罗振玉任监察院院长。溥仪就任执政后，对三院院长同时发表任命，国务院内部机构组织和人员配备，首先发表成立。而立法院仅发表一个秘书长，监察院发表了监察审计两个部，在国务院内挂牌办公，并未专设办公处所。因此，院长不能就任，这是关东军有意取消这两个院。罗振玉就将恼怒发在

郑孝胥身上，认为受老郑排斥，愤愤辞职，离开东北。罗在旅顺知道郑氏父子的罪恶活动，他临走向熙洽、臧式毅说出郑孝胥这段机密历史，我是听臧式毅说的。

“满洲建国”与驹井德三

上野 巍*

贾玉芹 译

驹井德三是满洲国成立后第一任国务院总务长官，在任只有7个月，加上任参议府参议的时间，也只不过短短的1年零5个月。

他那在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出色活动或许可以说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此之前他却拥有一个很长的、又是独具一格的自我修炼的时期。

青年时曾在北海道大学专攻农政，写出了题为《满洲大豆论》的毕业论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一册罕见的同类书籍而受到重视。

为了撰写这篇论文，他曾到过满洲。毕业后入满铁工作，其足迹几乎遍及全东北。

大正初年（1912年），日本与袁世凯政府达成谅解，首次向蒙古派出了由参谋本部、陆军省、农商务省和满铁共同参加的联合调查团。他作为满铁代表参加调查团，统管铁路、畜产、人文地理和卫生等各部门。此外，还单独负责一般产业调查，从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理事官。

张家口出发，从春到秋，以半年时间巡回调查了内蒙古东部一带。

他在青年时期，经新渡户稻造介绍，曾师事德国人契兹博士，根据他的教导，从联合调查团解散的晚秋开始，经过冬季，直至第2年春天，驹井采取了同前次相反的Z字形线路，对蒙古的四季进行了实际调查。

这次调查的收获是制定了收购白音太来多达11万町步的蒙古土地，修筑铁路，建设日、满、蒙3国人共同的理想之邦的宏伟计划。所幸有满铁当局的支持，在前后长达2年半的时间里，他费尽心机，最后成功地收购了土地。其间，同其对手张作霖经过激烈的交锋，但也从中亲自体验到了奉天官场的内幕以及张家同蒙旗王爷之间的内部关系。从这时起，他同张景惠和于冲汉等人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理想之邦的建设虽然为期尚早，但后来，以这一土地为基础，成立东亚劝业公司，有助于解决在满洲的朝鲜人问题。满洲国成立后，又合并到了满拓会社，完成了上述任务。

大正6年（1917年），轮到他出洋，但他拒绝了。他志愿去中国内地去做一次长途旅行。赴欧美旅行，当时是一般社员羡慕的事，而他却加以拒绝而去中国，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其面容犹跃然纸上。但是，一般出国只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和约8千元旅费，而他的计划却十分庞大，需要2年半时间，7万元经费，还要配备两名助手。一度似乎已无希望，最后以“下不为例”为条件获得批准。

在这两年半时间里，他几乎踏遍了中国的所有省份，详细考察其实际情况的同时，还结交了足以影响其一生的中国朋友，不是通过语言，而是以其心灵切身体验一种类似能使日本涉足中国的实感。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详述，在他的专业领域

内，这也是一次硕果累累的旅行。

对于驹井的未来，满铁曾寄予极大期望。但大正9年秋，由于当时的外相内田伯爵的恳请，驹井在保留满铁社员职务的情况下，去外务省担任指导青年外交官的任务，并充当对华经济问题顾问的角色。可以称之为日华经济合作理想形式的南通棉花货款的实现，以及分类说明复杂的中国币制的巨著《中国金融情况》一书的出版，都是他在霞关（外务省所在地——译者）工作时代的业迹。

后来，他应陆军省之召，参与策划满洲事变，更是如鱼得水，活跃万分。在执政就职前夕，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推荐和新国家诞生前曾与之共同谋划的东北领袖张景惠、臧式毅、于冲汉、熙洽、丁鉴修等人的友谊，尤其是当时已经内定任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的殷切希望，他决心就任总务长官。

在驹井任总务长官时期，他几乎没有遇到关东军的制肘与干涉，相反，关东军处处为他作后盾。他时年47岁，正值壮年。

治安确保、币制统一等，他的心愿已经实现，于是他借日本承认满洲国之机请求辞职，由于各部大臣的挽留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动员，又决定留任参议。

当他在总务长官办公室接待李顿调查团一行时，他坦率而明确地阐述了满洲的特殊性和建国的必然性，这可能是他真实的心情。同时，自青年时期，他曾参与宗社党事件和郭松龄事件等独立运动，直至建立满洲国，他所经历的这一段人生路程，都是以亚洲一角为舞台演出的一幕历史剧，令人感到似乎是一种宿命，而同时，对后人也将予以颇多的启示。

伪满洲国产生的经过

王贤沣

关于伪满洲国产生的经过，我当伪国务院总务厅参事官时，伪国务院总务厅监察官植田贡太郎，曾对我讲述了当时事变的情况和措施办法，现在概略地写出来，以供参考。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侵占奉天省城。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经当过张作霖时代的顾问多年，对于东北的情况非常熟悉。"九·一八"事变后，他决定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1. 利用中国官僚的利禄欲望心，引诱他们，各个击破。

2. 由各地的日本领事、日本顾问、满铁公所长，以旧的友情，怀柔收买中国官僚。

3. 通过亲日的中国人，协助日本分解东北人内部的团结。

4. 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军事行动，先占领都市，然后利用亲日分子，完成整个的占领计划。

5. 武装在东北的日侨、在乡军人，协助军队，在某地即作为某地的占领者。

6. 占据都市后，首先利用亲日分子，组织地方维持机关，宣布独立，脱离中国统治。

7. 利用旧官僚的名誉地位，做暂时的统治者，安定当时的秩序。

8. 决定实行满蒙经营计划，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速战速决。

二

日本关东军认为成立一个满洲独立政权，把分散的地方独立政权，统一起来，必须有一个为首的人物。这个为首的人物，又必须为大家所崇敬和信仰。当然，在东北的这些所谓大官中，每个人都有作领袖人物的愿望，关东军上层人士对有的人已经作了口头允诺，如张景惠、熙洽等。但要实际利用时，关东军认为这些人都不太合适。惟有一个人，关东军认为最合适，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经和关东军、熙洽等方面取得联系的宣统皇帝溥仪。因为满洲是清朝的满洲，如果溥仪到东北来，东北人民和所谓大官们，都能同意。同时，对于国际来说，可以欺骗世界人民，不是日本侵略，是清朝的后人，在满洲重建新国。

日本关东军决定派"中国通"奉天陆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去天津同溥仪接头。溥仪的近臣郑孝胥、罗振玉等人，衷心期待溥仪再起，没有机会都在找机会，找上门的机会，更是求之不得，所以同意到东北来。于是，日本用船由天津把溥仪偷运至旅顺，以郑孝胥父子作保驾官。据植田贡太郎说，这种偷运，是为了溥仪的安全。

三

组织满洲新国家的运动，在日本关东军内部，以及在日本控制下的汉奸们中间，都在酝酿合计着。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等人，得到日本关东军的暗示，首先他们进行了秘密商谈。商谈的结果，四个人意见一致，认为在日本军占领下

及中国政府不管的情况下，三省分立，也不相当，必须有一个总的统一领导三省的机构，不如成立一个满洲独立国家为合适。但是组织一个什么形式的国家呢？四个人没有作出决定。共同认为听听关东军的意见再说。同时，四个人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国家，还要象过去那样，恐怕搞不好，必须由日本来作指导……这就是所谓的“四巨头会议。”

1932年2月16日，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奉天赵欣伯家里，召开一次正式会议，研究一下，满洲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的代表张燕卿、谢介石、马占山代表的赵仲仁、贵福的代表邹麟、袁金铠，于冲汉因病未出席。在会中，大家一致认为需要成立一个新国家，但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需要共同研究一下。有的认为成立帝制，有的认为成立共和制，对这两个意见，引起争论，不能统一。关东军认为成立新国家的问题，既然一致赞同，在成立新国之前，必须由全满洲的人民，发表一个满洲独立的宣言，这就必须研究一下，用一个什么机构，可以代表满洲人民。有人提出，在成立新国之前的过渡时期，可用旧组织机构的名义，就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大家同意，并一致认为张景惠的资格老，就以张景惠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再用委员长的名义，发表满洲独立宣言，正式向中国和全世界声明，东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要实行东北独立。关于国体问题留待下次会议再行讨论研究。散会后即着手起草宣言。这就是所谓的“七巨头会议”，也有人称之为“八巨头会议。”

1932年2月19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也有人称之为“法学研究会。”在会中，研究讨论新国家的国体、国号、国旗、首都所在地等问题。出席会议的人，与上次会议相同。

在谈到新国家国体问题时，仍然是各有主张，最后分成两派，熙洽是爱新觉罗氏、保皇派，贵福、袁金铠是封建脑瓜，坚持要成立帝制国家；臧式毅、张景惠、马占山等人，认为皇帝已经过时，大总统最合时。因此，一方面要溥仪当皇帝，实行帝制；一方面要溥仪当大总统，实行共和制，争论激烈。同时，国务总理人选问题，是张景惠？是臧式毅？是熙洽？喋喋不休。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石原等人，坐在一旁发笑。最后关东军发表意见："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新国家为了应合形势，以立宪共和国较为合适。溥仪是清宣统皇帝，如果当大总统，也不合适，要介乎皇帝、大总统之间，什么合适呢？叫执政怎么样呢？"出席会议的人，有的点头，有的晃脑，结果还是同意了关东军的意见。于是决定了新国家的国体，为立宪共和国，溥仪为执政，制定临时宪法。

关于国务总理人选问题，日本关东军认为，"郑孝胥随溥仪多年，这次也很努力，首任国务总理由郑孝胥担任较为合适，大家有什么意见？"出席会议的人，没有提出异议，这一簇狗打架，才算停止了狂吠。

关于新国家的国名问题，没有分歧意见，一致认为东北是满清发祥之地，本应称满洲，所以满洲国为名最合适。

在谈到国号问题时，决定由溥仪自己决定，以后得到郑孝胥的通知，定名为"大同"。

关于国旗问题又发生了分歧意见。有的主张黄龙旗，有的主张五色旗。日本关东军的意见，认为满洲民族杂居，以共和制来说，代表民族的五色旗较为合适。但不能同过去中国的五色旗一样，可以用黄色旗，在一个角上，分红兰白黑四色。有人附和说，这样好，黄色象征着皇权统治着各民族。这样，国旗也决定了。

在首都问题上又发生争执。有人主张首都设在奉天，因为奉天是交通要衢，四通八达，清始祖曾建都在奉天。也有人主张首都建在吉林，因为吉林有山有水，在东北来说，吉林是一个山水秀丽的地方，可以建都。最后还是由日本关东军决定，首都设在长春。日本是根据其利益决定问题，因为日本经营满洲（侵略满洲）约有20余年，是以租借地关东州为中心根据地，向外发展，偏于南，从南向北进侵，鞭长莫及，很多不利。今后为了达到经营满洲的目的，中心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有了适中的根据地，大陆发展才能不受妨碍。因此，日本选择了长春。从交通上看，从长春直达大连，从长春经罗津直达日本，从长春经哈尔滨、黑龙江直达莫斯科，故决定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

四

1932年2月29日，发表满洲国建国通电，向全世界公布，东北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为大同，首都在长春，政体为立宪共和国，拥戴清宣统皇帝为执政，制定临时宪法。

在此同时，由奉天自治指导部主持，召开了一个“全满建国促进联合大会”，东北三省的农工商各界代表参加，假借东北3 000万民众的愿望，要求脱离中国统治，要成立一个满洲独立政权。这一切伪造民意，成立伪国的所谓“合法手续”办完后，决定以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赵欣伯5个人为代表，到旅顺去，请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由郑孝胥转达了溥仪的意见，“皇上认为责任重大，难以轻诺”为词，拒绝了代表们的恳请。

代表们回到奉天以后，经过这些汉奸们的研究，和日本关

东军的意见，觉得只有5个人代表前去，请一个曾经是当过皇帝的溥仪，有些轻率不郑重。于是决定在五名代表以外，再加上民间各界代表26个人，共30余人，于1932年2月4日，第二次到旅顺去，溥仪才答应出任执政。

据植田贡太郎说，溥仪想当皇上，不愿意当执政，关东军作为保证，将来改为皇帝，说服了溥仪，这才答应了。

1932年3月1日，发表建国宣言，以顺天安民为主。3月9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发表执政宣言，以道德仁爱为本，建设王道乐土。并发表伪满洲国政府的组织机构，和首任各部门的人事名单。

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财政部总长熙洽、军事部总长马占山、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参议袁金铠、贵福、罗振玉、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府中令沈瑞麟、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

这些所谓"建国功臣"，各得其所地登上舞台，也是经过一场争吵，在主子的叱责下，才老老实实地各就各位。因为他们都以"功臣自居"，都想要抢一个称心合意的位置，如罗振玉为溥仪到东北来，始终在奔跑，费了不少的劲，结果只给一个参议，心中大为不满。张海鹏想当军事部总长，未到手，心中不平。张燕卿、谢介石，想当民政部、财政部总长，未遂心愿。熙洽想当国务总理，未实现。冯涵清一个律师，当了司法部总长，赵欣伯平地一声雷，当了立法院长。互不服气，不平不满，大闹意见。但在主子方面，有另一种看法，叫谁干谁就干，都是一样的走狗，还想象日本军侵占东北各地当时的迁就敷衍，现在生米已经做成饭，行不通了。

五

伪满洲国正式产生了以后，伪政府首先决定实行的有所谓“三大政纲”，第一是中央集权制的确立，第二是币制统一，第三是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独立。

1. 日本认为中国所以那样政治紊乱，主要是因为地方分权制的原因。督军、省长，各自树立自己的派系，争权夺利。同时日本又看到中国的海关，以英国人为主，支配业务，虽然中国的政治紊乱，但在海关方面，保持了有条不紊的作风，在世界上有信用。日本根本不想把满洲国完全交给中国人管理，所以日本人大批地参加到伪组织，特别是人事、会计权，一定要由日本人掌握。因此，伪满洲国一定要实行中央集权制，由伪中央统一指挥命令监督。并明文规定了各省长在民政部总长的指导监督下，执行职务。各伪省设警备司令部，掌管军事，由军事部总长指挥统辖。各税务机关，在财政部总长严密监督之下，执行税收业务。其他各部也是这样，地方机关执行职务，中央指导监督。这样，军事、政治等大权，统归中央掌握。

2. 日本认为“在旧东北时代”，滥发纸币，各省也不统一，是多种多样，这一省到那一省，就不通用，困难太多。伪满洲国决定实行币制统一，成立满洲中央银行，发行国币。从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为第一期，发行的国币是银本位，兑换回收旧东北时流通在市面的各种各样的纸币，使币制统一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期通货安定工作。从1934年以后，进入了第二期，所谓管理通货制定阶段，改银本位为金本位，并规定和日本银行发行的金票，等价使用。同时，在关东州租借地内，伪国币也有效使用，这是所谓日满经济一元化，意味着日本掌握了伪满洲国的金融财政。

3. 日本认为早一天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对于日本来说，有很多好处：可以解除部分人认为日本对满洲，将象日本对朝鲜那样的疑惑心，可以解除国际间对日本的误解和看法；可以决定了日本在满洲国内的领导权，获得满洲人对日本人的友好感情等等。

1932年秋，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日本以驻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兼任日本首任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接着武藤信义和郑孝胥，代表日本和满洲国，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从此，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成立，而满洲国也从此正正堂堂地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建国”前后的“满洲国”内幕

古海忠之

编者按：本文对中国人民抗日爱国行动进行了歪曲、污蔑，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但作者所述某些史料对于了解伪满洲国内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有关人事的种种问题

我们到任当时的满洲国，国家组织和行政机构刚刚建立，最高人事也才确定不久，新国家的建设工作尚未付诸实施。

满洲事变后，张学良部下的旧东北军主力部队被关东军击溃，向锦州方面败退，四处逃散的残兵败将化为匪徒，在各地猖獗，国内治安陷于全面混乱状态。与兵匪相呼应，在全国各地掀起暴动的还有满洲共产匪、土匪和宗教匪，其总数多达30

万人以上。于是，关东军不得不利用部分满洲人部队对上述匪团进行讨伐。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占据锦州的张学良部下的旧东北军，其次是黑龙江省主席兼黑龙江省军总指挥马占山。

关东军于昭和6年（1931年）12月末开始进攻锦州，锦州军不战而退。次年1月3日关东军进入锦州城，从而张学良政权被完全逐出满蒙地区。

马占山在满洲事变当时曾任黑河镇守使（步兵第三旅旅长），同年10月，被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省军总指挥。他在张学良的唆使下采取反日态度，曾同张海鹏军作战，后被关东军击败，逃往海伦。其后，经过关东军板垣参谋等人的再三说服，收回叛意，甚至出席了新国家的建国会议，并参与筹划，满洲国建国同时被任命为军政部长（大臣）兼黑龙江省省长。然而，他仍然同张学良保持联系。当国际联盟调查团来满调查时，他为"日本即将屈服让步"的谣言所惑，于4月3日（昭和7年）在黑河发表反满洲国政府的声明，从而背叛了满洲国。其后，在日满军的攻击下，辗转逃窜于北满各地。当我等到任时，他仍在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

同年9月，黑龙江军旅长苏炳文，因相当于自己后辈的韩云阶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而不满，举起叛旗，被关东军击败后越过兴安岭逃往满洲里，无力抵抗关东军的进攻。正值此时，马占山也逃来满洲里，于是二人一同逃往苏联境内，投身苏军。

此外，热河省长汤玉麟，原定任命其为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但他在张学良的牵制下不明确表态，不参加满洲国的建国工作，始终态度暧昧。

在日籍高级官吏之间也出现一些人事纠纷。那就是总务长官驹井德三和笠木良明之间的争执。二者之间的冲突，乃是地方自治中心主义者和现代中央集权主义者之争。

笠木良明原定任命其为资政院院长。笠木的主张是以资政院作为执政的直属机关，在中央设训练所，任用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并在各县设参事官，直属资政院，从而确立地方自治体制，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建设道义国家的核心，该机关将由原自治指导部的大部分成员组成。

上述等于是双重政府的机构，就满洲国的性质和国务院的方针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最后，将资政院改为国务院资政局。但是，笠木始终不改初衷，以县参事官会议为中心向驹井施加压力，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驹井长官去奉天向关东军诉苦。

结果，关东军出面征求政府首脑的意见收拾残局，从全局出发决定支持驹井长官。6月中旬，召集参事官和资政局的有关人员到新京的“增屋”旅馆集会，由板垣征四郎宣布废除资政局，解散参事官会，又进行了一番人事调动，从而解决了这场纠纷。

但是，还有一个如何处理资政局训练所的问题。在此之前，笠木良明曾亲自回到日本国内招募和选拔资政院训练所学员，当时国内各大学的毕业生对满洲新天地的开发事业满怀热情，愿意积极献身，结果决定采用青年学生80余名，现在已集中在南岭训练所。

7月上旬，关东军的板垣参谋、片仓参谋和满洲国政府方面的驹井总务厅长官、阪谷总务厅次长、皆川秘书处长等集会协商，结果决定将资政局训练所改为大同学院，将来作为培养拥有高级官吏资格人才的训练所，使他们掌握满洲国的建国精神，了解满洲国的全面情况，从而作为满洲国的官吏，在日满共同意志和统一的指导精神下，为建设民族协和的理想国家——满洲国而努力奋斗。

上述大同学院的设立在满洲国政界中产生了重大效果。经

过学院培训（6个月）的骨干官吏，不计名利，热心于地方行政，清廉而不拘泥小事，豁达开朗。这一切后来作为大同学院的校风而固定下来，成为向满洲国政界注入清新空气的源泉。

上述有关资政局的人事倾轧和纠纷，在我们到任前夕已获得全面解决。然而，日籍官吏的立场和相互关系尚未稳定，距离合作与协调还相去甚远。

接踵而来的是在满日最高首脑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矛盾。昭和7年10月上旬，由我主持制定的满洲国最初的年度总预算终于完成了，我们渴望能尽快地将总预算方案提交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再经参议府会议批准公布。但是国务院会议迟迟不见召开。经过了解，才得知原来是由于国务总理郑孝胥和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反目和冲突。

实际上，总务长官相当于国务总理的参谋长，协助国务总理推行国务行政，处于辅佐的地位。而驹井长官生性奔放不羁，倚仗对满洲的多年调查研究，极为自信，又深受关东军的信任，因此，一向不将国务总理放在眼中，往往将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国务总理。甚至驹井长官只要来到总务厅，郑总理便立即拂袖而去，决不同他见面。正由于上述情况，国务院会议的不能召开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外界还有传闻说，担任总理秘书的郑垂（郑孝胥的长子）曾劝说郑总理及早返回天津。总之，形势极为紧张。同时，各部总长（大臣）也无人对驹井长官持有好感。

上述事态如不设法及早解决，必将对建国伊始的满洲国、尤其是以民族协和为国家大计的新国家，造成致命的创伤。于是，关东局首脑不得不出面同政府首脑磋商，采取措施收拾残局。

结果决定总务长官驹井德三辞去长官职务，任参议府参议，同时，将总务长官的名称改为总务厅长，使人更易于理解其地位在总理之下；并扩大各部总长的权限，允许在各自的职权范

围内有权签署和决定各种法令及其他重大事项，贯彻各部总长（大臣）的意图。政府任命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为总务厅代理厅长，使事态平息下来。

本来，作为满洲国人事方面的根本原则，从另外的角度而言，出于政治上的深谋远虑，满洲国的政治和行政机关采取了满日高级官吏的双重组织。规定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大臣）由满洲人担任；总务长官（厅长）和各部的总务司长（次长）由日本人担任。各省及其他地方机关也都执行这一原则。至于有关科学技术的特殊机关又当别论。一般行政机关根据满洲国的性质均以当地出身有才能的人为最高首脑，以外来的日籍官吏为助手，担任副职。这一制度如果运用得当，应该说是稳妥的。关键在于日籍官吏的思想和对他民族的认识。驹井德三总务长官引起的这场纠纷，也涉及对民族协和的认识，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

对日籍官吏的统制措施

在以五族协和（后改为民族协和）的王道主义独立国家为标榜而建立起来的满洲国中，日本民族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被任用为官吏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为了在尚未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体制的满洲，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没有富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日本人官吏的指导，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在以民族协和为建国理想，又是在满洲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满洲国，无论就政治而言，或者就民族政策而言，都有必要予以慎重的考虑。为此，在满洲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助产”作用的关东军，当满洲国建立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便开始着手制定日本官吏的统制措施。

满洲国诞生后不久，关东军司令官同满洲国执政和国务总

理之间缔结了《本庄·溥仪协定》(日满秘密条约),其中的第四项规定:"关东军司令官拥有满洲国日本人官吏的推荐权(任免权)",有关日本人官吏的事项,属关东军司令官专管。这并不说明关东军企图排除满洲国政府对日本人官吏的干涉,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使不可靠、不适当的日本人进入满洲国,同时辞退不能胜任工作的日本官吏而采取的方针。

本庄关东军司令官对满洲国的日籍官吏问题尤其予以慎重的考虑,建国当时即确定并执行了日籍官吏仅限于极少量的必要的高级官吏,而且其对象仅限于侨居当地的日本人的方针。

因此,建国当时的日籍官吏,大部分是南满洲铁道会社及其相关会社的职员,官吏出身的只有外交部总务司长大桥忠一(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财政部的阪谷希一总务司长和源田松三税务司长,以及其他数名出身于关东州厅官吏的人,根本未曾想到要从日本各省招聘官吏。

关东军为了统制日籍官吏,规定了两项有关人事的限制和纪律,作为关东军的专管事项。其一是关于日满官吏的比例,即满洲国的一切机关都确定日籍官吏和满籍官吏的比例。其二是日满官吏的定位。即关于满洲国政府各机关科长以上职务,均明确规定了日籍和满籍官吏的定位。

关东军通过掌握日籍官吏的推荐权和上述有关满洲国官吏的日满比例和日满定位,从而对日籍官吏实行统制。

当满洲国的国家组织和行政机关建成,人事安排也基本就绪,即将着手实施新政时,作为满洲国至关紧要的当务之急就是整顿国内治安和确立财政金融体制。政府首先提出治安第一的原则作为重点国策。同时,确保税收,确定预算制度,稳定币值,则一国的建设是难以想象的。

财政部总务司长阪谷希一对此尤为重视,他确信及早发现

人才，确立财政金融体制是至关重要的，并积极向关东军提出建议，关东军也承认其重要性。结果，尽管有建国初期的既定方针，仍然要求大藏省向满洲国输送有专业知识的官吏。

根据上述要求，我等大藏省派遣团一行于7月中旬到达首都新京，当时的满洲国情况，已如上所述。我们立即到达被安排的工作岗位，决定以星野直树为首的7名骨干干部到财政部任职，只有松田令辅一人到总务厅主计处任处长。

对大藏省派遣官吏的上述安排，就其所承担的任务而言决非妥当。因为，我们对满洲国的行政机构几乎一无所知，原以为财政、金融、经济的主管机关就是财政部，而实际上，作为财政核心的预算、决算，以至国家资金的运用，其权限均不属于财政部，而是由总务厅的主计处负责。经过了解，发现总务厅是满洲国的一个独特机构，是为了处理直属于唯一的国务大臣，即国务总理的重要行政，诸如预算、决算、人事、秘书、庶务等而设立的。它是一个由总务长官领导直属国务总理的具有参谋性质的内部机构，是满洲国中央集权主义的核心，这种作法，一般都被称之为“总务厅中心主义”的行为。

根据上述制度，满洲国的财政一分为二，有关支出（预决算）及国家资金的运用事项，财政部没有任何权限。被委以财政、金融重任的大藏省派遣团领导人、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处于不能参与财政核心的地位，这不能不使我们大为困惑。

然而，幸耶，不幸耶？不久，主计处便爆发了问题。

本来，主计处以处长为首全部由来自满铁经理部的青年官吏组成，由于派去松田任处长，原来的主计处长被调往他处，但是以一般会计科科长宇山为首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团结。而且又是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官吏，其中有的人相当粗暴，根本不把大藏官吏放在眼里，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要压倒松田主计处长

的架势。

松田到任后不久，主计处全体人员在一个酒馆里举行新处长欢迎会，事件就爆发在这里。

当晚，松田一回到宿舍，就气急败坏地跑到我的房间，说："喂，古海，你听着！主计处的这群家伙撸胳膊挽袖子，胡说八道，一拥而上，让我吃了苦头。要我在这帮小子的包围下去当处长，绝对办不到！"他泪流满面，愤慨已极。最后他说："没办法，我要求回日本去！"

我暂且将松田安抚下，第二天一早，便向星野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建议应尽快向主计处派一个能维护松田的人。星野也同意我的意见，并立即物色人选。问题是谁也不愿到那种有风险的地方去。星野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说服我，"看来只有你去了，拜托你！"这样，我终于去了主计处。

我辞去了财政部的文书科长职务，来到主计处担任当时正缺额的总务科科长和特别会计科科长。我等于充当了松田处长的啦啦队，去讨伐主计处猛将的角色。其实，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经过多方工作之后，这些人逐渐开始接近我，从此，主计处内再也没有发生任何风浪。于是，我便在主计处着手制定满洲国最初的年度总预算。不久，松田处长因患伤寒住进满铁医院，我立即被任命为代理主计处长，得以顺利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应该说是幸运的。

伪满洲国出笼经过

张 志

一、关于《满洲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

（一）关于《满洲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的出笼及其主要内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部、日本政府以及满铁会社等日本的各种组织，上上下下都在谋划如何对东北进行统治的问题，各种方案纷纷出笼。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又称青年议会）理事长金井章次就曾炮制了一份《东北自由国建设纲领》。于同年的11月份，关东军司令部又炮制了一个《满洲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出自关东军法制顾问松木侠之手），并上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这两个方案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只建立亲日的自治政权，而是主张建立在日本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独立国。只是后者比前者简单，但后者却比前者更赤裸裸的表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割中国领土，霸占东北的狼子野心。这个"方案大纲"上报时间是在日本的"十月事件"和日本内阁改组以后，这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在对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问题的态度上，已趋于一致，对于这个"方案大纲"中提出的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一致同意，遂成为当时日本的国策。

《满洲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对我们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如何炮制伪满洲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所以有作一介

绍的必要。这个大纲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其内容是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应建立什么样的“新政府”以及“新政府采取何种形态”。并说这个问题对日本来说是“事关国家之存亡”的重大问题，它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此问题的极端重视。第二部分的标题为“满蒙独立政权说之谬误”。其内容为极力反对“在满蒙地区不成立独立国家，仅建立独立政权”的主张。第三部分是这个“大纲”的中心部分，即说明日本在东北要建立什么样的“独立国家”和如何建立“独立国家”的问题。第四部分是结束语。在这一部分里它举起了所谓优等民族或国家对于弱小民族或国家，有所谓“应善加引导、保护和监督”，甚至可以“根据情况予以膺惩”的权力的这一帝国主义理论，以此来证明其在东北的侵略活动是“合理”的。以下仅将这个“大纲”的第三部分主要内容作如下介绍：

（1）这一部分在说明为什么要建立“满蒙独立国”时，说建立“满蒙独立国”乃是它的“次善之策”，是一种过渡的办法，“将其合并，使之成为帝国领土之一部”才实属上策，只是怕“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才采取“次善之策”的。这就赤裸裸地道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特再引下文以证之：

“关于不使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独立，而企图建立由帝国任意操纵的政权，即所谓满蒙独立政权之不可取的理由，已如上述。其次的问题则是将满蒙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抑或将其合并，使其成为帝国领土之一部，二者必选其一。

“就理想而言，无论从满蒙三千万民众的利益出发，或就帝国之前途考虑，以至从未来的国际关系，即亚洲和平的见地着眼，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上策，对此任何人都不会持有疑议。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如急于付诸实现，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物议，恐非贤明之举。故目前作为次善之策，建立

满蒙独立国，从中国的行政统治下完全分离出来，从而保持三千万民众之安宁，增进其福利，同时谋求永久确保亚洲和平之道。此乃帝国必须行使的最小限度的国际和道义的义务。”

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满蒙独立国”，是它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暂时的、达到分割中国领土目的一个过渡办法，最终还是要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

（2）在这一部分里，它还规定满蒙独立国的管辖范围是：“满蒙独立国由下述六省区组成：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东省特别区、蒙古自治领。”这就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立“满蒙独立国”的计划，是一个侵吞中国广大北方地区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也就是说1933年日本伪满联合进攻热河省，和“七·七”事变”后日寇进攻察绥地区，建立蒙疆伪政权组织，都是实现其“满蒙独立国”计划而进行的侵略活动的一部分。

（3）在这一部分里还提出了“满蒙独立国采取立宪政权”的主张，但又说“主宪政体是仅就法律意义而言，并非政治意义上的立宪政治”，“立宪政治只是说明三权分立主义而已。”并说这是“因为满蒙民众的政治意识尚未达到这一水平”。所以以后实行的是在日本严密控制下的形式上的君主立宪政体。

（4）关于建立“满蒙独立国”的方法步骤问题，这个“方案大纲”确定“通过联省自治成立中央政府，然后再逐步扩大中央政府权限，特别是军宪、司法及税收必须统一控制，以逐步缩小各省区之权利。”从而达到“实行中央集权主义”的目的。它又说这是因为“作为方法论而言，各省区宣布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目前大部省区已宣布独立，但仍不够彻底），然后由各省区联合建立满蒙的中央政府，从中国本土完全独立出来，这是最为自然而可行的方法。就国际关系而言也无可非议。”伪满

洲国的成立过程正是按照这个程序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借助此一方法，在国际上造成满蒙独立国的成立，完全是满蒙地区内部的自发搞起来的自然演变的假相，以迷惑世界议论。

（5）关于满蒙独立国与帝国之关系，这个“大纲”明确提出了如下几条：第一，“帝国之所以欲在满蒙建立独立国家，……是为了使满蒙同帝国之特殊关系有所保障。”第二，帝国负责满蒙独立国的国防安全，并且“帝国认为属于国防（包括经济意义）的绝对需要，如铁路、航线等，则必须完全纳入帝国的统辖之下。”第三，规定“帝国臣民在满蒙自由国内任何活动均有自由，不设任何区别。”第四，“为对满蒙自由国进行指导与监督，暂时设立由帝国臣民所组成的顾问府，对于重大事项，如缔结条约、公布重要法令等，保留同意权。”由上述几条充分证明了，所谓满蒙独立国（在这个“大纲”中也称“满蒙自由国”），实际上不过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其政府不过是名副其实的傀儡而已。

历史证明，伪满洲国的拼凑经过及其成立的“基本原则”，都是按照这个《满洲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进行的。所以，这个“方案大纲”为我们揭露和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洲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和资料。

（二）“满铁”积极参与炮制伪满洲国活动的一些情况

1932年1月初，日本侵略军攻占了锦州，标志着日本侵占东北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阶段即将完成。这时，即同年的1月13日，板垣征四郎大佐从日本东京带回了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部批准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从而大大加快了拼凑伪满洲国以“使之具有国家形态”的步伐。一方面它加紧收罗汉奸，物色傀儡工具，唆使各省区汉奸宣告独立，成立伪省区政府；另方面关东军又指挥满铁组织班子，加紧进行建立伪满洲国的具

体筹备准备工作，如伪满洲国成立时要发表的《宣言》、《条例》等文稿，大都出自他们之手。他们的准备工作早于1932年1月16日就开始了，这可由满铁人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次集会”的会议记录证明。特将这个记录的主要部分节录如下，以供研究参考：

“第一次集会

1月16日下午6时半开始。

于石川氏住宅。

出席人员：石川、河相、石本、奥村、田中。

在当晚集会中，曾就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其主要讨论事项及其内容如下：

1. 关于新国家建设问题

关于新国家建设问题曾考虑如下诸点：

(1) 国家首脑的确定

(2) 独立宣言

(3) 国家根本机构要纲的确定

2. 独立宣言内容

就独立宣言的内容问题，曾进行相当具体的讨论，关于其内容应包括的事项，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1) 独立的理由

①阐述以往军阀统治之弊政，如作为中国本土之一部而存在时，必将受其内乱之影响，无法在满洲施行德政，因而有独立之必要。

②就历史而言，满洲并非中国之一部。

(2) 国内问题

①以王道为建国精神。

②各民族享受平等待遇，共存共荣。

③维持治安。

④安定国民生活，增进福利。

（3）对外问题

①希望同各国建立亲善关系，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②欢迎各国进行投资和各国国民来往。

③希望各国人进行资源开发。

（4）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3.（以下略）

从这个记录可以清楚的看到，满铁从1932年1月中旬开始，就进行成立伪满洲国《宣言》和“国家根本机构要纲的确定”这样具体的准备工作了。同时这也证明满铁在建立伪满洲国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活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东北各省区成立伪政权组织的经过情况

日寇侵略东北虽然从一开始就注意通过收买利用汉奸来施展其阴谋，但是从1931年11月以后，一直到1932年2月初，关东军则是根据《满洲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中提出的，“通过联省自治成立中央政府”的策略，而开始加速收罗汉奸，成立各省区伪政府，宣言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实行所谓独立自治活动的。这期间先后成立了奉天、吉林、东省特别区、黑龙江等省区伪政权。

二、伪满洲国政府筹备成立经过情况

到1932年2月初，关东军相继攻陷锦州和哈尔滨地区，至此东北各省区主要城市及交通干线均落入日军之手。与此同时，东北各省区的伪政权也已相继建立起来。这时关东军即依照《满洲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之“通过联省自治成立中央政府”之方法，加快了建立伪满洲国政府的步伐。它一方面唆使伪奉

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于1932年2月某日主持召开由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哈尔滨特区派来的一千多人参加的“伪建国促进大会”，发表宣言，制造“脱离中国，建立满洲国”的舆论，以便给其建立伪满洲国的活动蒙上一层“民意”的色彩，用以欺骗人民；另方面，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为主，积极进行国筹备建立伪满洲国政府的一系列活动。

（一）四巨头会议——从东北行政委员会到伪满洲国筹备委员会

1932年2月中旬，关东军为筹备建立伪满洲国及其政府，召开了由东北各省区长官会议。召开这个会议，是由板垣征四郎首先向臧式毅提出，并由板垣征四郎亲赴吉、黑催促两省长到奉开会的。对此臧式毅有如下的供述：“1932年2月，板垣征四郎大佐亲自与我接洽，谈及东三省组织问题。他主张以奉、吉、黑、哈四首长组织行政委员会，以一人为委员长，并未谈及职权任务，只提组织。我是毫无意见，竟同意他的主张。他亲赴吉、黑召集两省首长来奉天会议，（哈尔滨张景惠已先期在奉）并由哈尔滨电达奉天，告以熙洽、马占山来奉日期。板垣征四郎先日空路回奉，熙洽、马占山亦即先后到奉。会议日期约在2月中旬。”据《满洲国主要日志》记载，臧式毅于2月5日即派密使与张景惠、熙洽、马占山，以及蒙古诸王联络“建设新国家的问题”。据此，板垣与臧式毅提出召开四巨头会议的时间，当在2月5日前。

关于四巨头开会的确切日期，只有马占山说的比较清楚确切，他说：“当2月16日，占山为明了日人制造满洲伪政权之真相起见，又因日方邀请，冒险赴辽宁会议。翌日晤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据称东三省大部已被日军占领，仅吉、黑一小部分，谅难抵抗，希与日方合作等语。是［日］晚，又强迫在赵欣伯

宅会议……18日托病返回海伦。"由此可以断定，四巨头第一次会议当在2月17日晚开的，它与《满洲国主要日志》所记日期是一致的。

四巨头会议，据臧式毅供词材料一共开了四次，其大概情况如下：

第一次会议于2月17日晚召开，"地点为奉天省长公署。出席人员为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官熙洽、伪黑龙江省长马占山、伪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日本军方面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及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这次会议内容是："板垣征四郎提议，以四省首长组织行政委员会，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熙洽、马占山、臧式毅为委员。……这个委员会，只这四个人，无机关，无职员。"

第二次会议，是在"翌日（2月18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奉天省公署正式成立，并举行祝宴后，板垣征四郎大佐指定东北行政委员会应以委员长及委员名义通电宣布东三省独立。其电文内容大致为：张学良在东三省的虐政，日本商民亦受其害，日本以同文同种的友谊膺惩张学良，驱逐其势力，为拯救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于水火，并拥护日本之既得权，有建设王道乐土、新政权、新组织的必要。"这是此次集会的主要内容。

第三次会议，依臧式毅的说法是在"第三日晚"，亦即2月19日晚，地点在伪奉天市长赵欣伯宅内。参加者有张景惠、熙洽、马占山（马占山在《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中说他于18日托病回海伦了，但臧式毅等的材料均证明他四次会议都参加了）、臧式毅，赵欣伯亦在场。日本军方有板垣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贤二参加。这次会议内容及经过情况，据臧式毅供认，首由板垣征四郎提议"创立新政权，建设新国家"问题，板垣还说"他的主张方针已定，事在必行。"接着板垣又提出："新国

家以溥仪为元首。”“国都问题，为控制北满对苏联的关系，主张设在长春。”土肥原贤二说“建设独立新国家，日本处于指导援助地位。”臧式毅说这些问题从未向他们提出过，他说“新国家三字，当时在奉天省城已到处宣传，但日方对我们迄未说出，直到各省长到奉天后才说出新国家字样；溥仪早已到旅顺，日方在奉天迄未透露一个字，至今始说出溥仪来。”所以臧式毅又发出“并不问我们的意见如何，我们亦无意见提出，……名为会议，实则听候发表。”的感叹来。

第四次会议，依臧式毅的说法是在“第四日”召开，亦即2月20日，地点在张景惠私宅。参加者仍为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和板垣征四郎大佐。这次会议内容有二：一是由板垣征四郎提出，“会议后各省长赶紧回省，准备一切。在长春为溥仪准备厅舍，并准备新国家中央各机关的厅舍，由吉林熙长官负责办理，奉、黑、哈派员协助。”二是又由板垣征四郎提出，“各省长留派代表在奉天会议建设新国家以下各问题：1. 国名；2. 国体；3. 国号；4. 国都；5. 国旗。”会后当夜各省长即分别回省。

这个各省留派代表的会议，马占山称之为“伪国筹备委员会”，他说“旋据赵仲仁报告，19日日军却竟强迫张景惠成立伪国筹备委员会。”就其任务来看，这个留派代表的会议也确实进行的是成立伪满洲国的具体筹备事宜，马占山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另据臧式毅说：“尔后，各留派的伪代表，即在奉天伪教育会举行了一星期的会议。”据此推断，这个会议当在1932年2月21日至28日之间进行的。

参加这个会议的除张景惠、臧式毅外，据臧式毅提供的各省区留派代表名单如下：

“奉天省伪代表：　伪实业厅长　冯涵清

伪高等检察厅长　　李　棨

伪公署参议　　金毓绂

吉林省伪代表：　伪长官公署秘书［长］

张燕卿

伪外交署长　　谢介石

黑龙江省伪代表：　伪呼伦贝尔道尹　　赵仲仁

哈尔滨伪代表：　伪长官公署谘议　　葆康

日本关东军方面参加的除板垣征四郎大佐外，"每日有关东军军部法务官松木侠、参谋和知［鹰次］到场召集开会，他二人并列席主持提议，""板垣征四郎每提出一问题，则由皮包内拿出他写好的原案，先叫我们讨论，结果还是他的原案通过。所通过各问题如下：

1. 国名：满洲国；2. 国体：君主；3. 国号：大同；4. 国都：长春改为新京；5. 国旗：黄色带五色。"

这个会议完成上述各项后，板垣征四郎大佐命张景惠、臧式毅等派代表赴旅顺请愿溥仪任新国家元首。

（二）溥仪由天津到旅顺的情况

日本利用溥仪侵略中国的企图由来已久了。从1924年溥仪逃离故宫进入日本大使馆始，一直到溥仪于1932年离开天津期间，日本朝野人士，凡路过天津的无不对溥仪进行"拜访"，极力进行引诱拉拢之能事。至于日本驻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领事馆等，对溥仪更以"皇帝"礼仪待之，对溥仪的拢络更是有加无减。

建立伪满洲国的筹备会议，大约于2月28日结束，随之板垣征四郎大佐即命张景惠、臧式毅等"派代表赴旅顺请原溥仪为新国家元首。"所以他们立即于2月29日派出第一批代表去旅顺请愿。关于关东军导演的这个"推载"闹剧的情况，据马

占山说，是“由日方授意溥仪三次推让，代表三次敦请，始完使命。”根据有关材料，日本关东军称这个所谓请愿代表为“推载使”，而且实际上只派了两次“推载使”，一次“迎接使”。这里先将两次推载使所谓“推载”经过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批推载使

有“奉天代表冯涵清、吉林代表张燕卿、黑龙江代表赵仲仁、蒙古代表苏宝麟、呼伦贝尔代表凌升、哈尔滨特区代表葆康等6人，作为恳请出山的特使，皆随员8人，于2月29日晚10时40分从奉天出发，经大连于翌日，即1日下午0时15分抵达旅顺，立即前往溥仪的临时住所，恳请溥仪出山。溥仪以责任重大为理由予以拒绝。6名使节不得已，只好带着溥仪的意图于当日出发返回奉天。”

第二批推载使

关东厅高等警务课的报告记载是：“除前次的6名代表外，又增加了各地教育和工商界代表其32人，其中有奉天代表冯涵清、吉林代表张燕卿、黑龙江省代表赵仲仁、呼伦贝尔代表凌升、齐齐哈尔代表苏宝麟、哈尔滨特区代表葆康。奉天地方法团代表张景弼、谢相森、孙焕章、张其昌、侯显模。吉林地方法团代表林鹤皋、程科甲、江崇德、范泉魁。黑龙江地方法团代表鄂昌勋、李岩源、潘渊龙、许兰坡。哈尔滨地方法国代表杨贯三、许永铭。蒙古地方法团代表色拉哈旺珠尔、乌勒古都摆、倭克吉布、加毅、吴双海、杨树元等。上述32人作为第二批推载使，于3日晚10时40分乘火车从奉天出发，4日上午9时10分抵旅顺，……下午2时，一行拜访了宣统废帝溥仪，向溥奉呈新国家执政推载书，再次代表3 000万民众的意愿，恳请出山。溥仪终于接受请求，同意出山。”

关于派推载使的情况，臧式毅的供述与此大致相同，他说：

"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命派代表赴旅顺，请傀儡溥仪为伪新国家的元首，当时即以会议的各代表前往请愿，傀儡溥仪辞不肯就。更依据日寇板垣征四郎的意旨，带去我等于对君主制度的意见（熙洽的意见是皇帝制；张景惠和我的意见是委员制；马占山赞同委员制），做第二次的请愿，傀儡溥仪允就一年。"很明显，板垣让代表说明对君主制的意见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迫使溥就范而已。

（三）溥仪由旅顺到长春就任伪执政的经过情况

在所谓"推载"溥仪任伪执政的同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以"满洲国政府"的名义，于1932年3月1日宣布所谓"建国宣言"，宣言伪满洲国政府正式成立。3月4日溥仪允就伪执政后，关东军立即将溥仪由旅顺送到长春就任伪执政。其经过情况如下：

3月4日下午1时，关东军司令部、宪兵队、警务局、满铁等有关当局，就在奉天特务机关公馆开会，策划了溥仪由旅顺到长春的时间和路途的所谓"警卫"等事项的安排。

"3月6日上午7时，溥仪由郑孝胥、郑垂（父子）和罗振玉父子，以及日人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甘粕正彦等30人的陪同下"，乘汽车到大连沙河口车站转乘火车，于"当日下午0时43分在汤岗子下车，下榻于对翠阁，在此等候新政府的特使前来迎接。"同日下午1时，溥仪的近身人员佟济煦、宝熙、王季烈、郑泉、林棨、金卓、金贤、胡嗣瑗以及溥仪的随侍人员等，乘火车去长春，准备在长春迎接溥仪。

7日上午10时，作为"迎接使"的张景惠、赵欣伯、凌升、赵仲仁、谢介石、冯涵清、李棨、鲍观澄、张景騧、吴葆民、苏正格、钱稼孙、新井顾问、张秘书等13人，乘火车于下午0时抵达汤岗子，立即赴对翠阁。溥仪对此情况有如下供述："在汤

岗子，张景惠冒充代表东北3 000万人民意志，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和伪奉天市长赵欣伯来对我表示欢迎和拥护我当执政。”

3月8日上午7时，溥仪在日本警宪的严密监视下，向所谓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后离开对翠阁，上午8时由汤岗子乘火车去长春。9日下午3时到达长春，随即到长春市政府（道尹公署）举行所谓“新国家执政就职典礼。”为便于了解“典礼”情况，仅将关东厅高等警务课报告所记之“典礼”程序节录如下：

就职典礼程序：

(1) 奏乐

(2) 列席人员入场

行政委员会委员、蒙古王公、各省文武官员、各省民众代表来宾

(3) 执政就职

(4) 全体起立、行最敬礼

(5) 执政答礼

(6) 捧呈国玺（张景惠）

捧呈执政玺（臧式毅）

(7) 宣读执政宣言（郑孝胥代读）

(8) 来宾敬礼

(9) 执政答礼

(10) 来宾祝词（内田满铁总裁）

(11) 执政答词（宝熙代读）

(12) 闭会

(13) 奏乐

(14) 执政退场

(15) 全体退场

仅将参加伪执政就职典礼人员名单附后，以供参考。

在溥仪举行伪执政典礼之后，关东军对他这个傀儡工具并不放心，和与其他汉奸的作法一样，也要求与溥仪订立一个密约，以作为他当伪“执政”的报偿和条件。溥仪在他的补充认罪书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说：“1932年，日寇成立伪满汉奸政权以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伪总理汉奸郑孝胥通告我，必须签名承认他的要求，就是要签一个密约，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承认我当伪执政，建立伪满的报酬和交换条件。同时郑孝胥更说这是日本既定方针，决没有改变的余地。我承认了日寇这个要求。这就是把东北的矿山、航运、港湾、陆运（铁路管理）都委托日寇经营管理，还有移民、经济同盟和用日本人最高顾问几项。经我签字后，郑孝胥便交予本庄繁。”这个密约同关东军与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订立密约的内容，基本相同，日本帝国主义从这些密约中攫取了东北的一切主权，把东北实际变成了日本直接控制下的殖民地。溥仪说他与关东军签订的这个密约，“在1932年9月15日，在日本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和郑孝胥所签订的，经我承认和发表的‘日满议定书’，便把上述卖国密约给固定下来，成为公开的合法化了。”

（四）伪满洲国政府成立经过情况

据臧式毅供认，关于伪满洲国政府的组织问题，板垣征四郎于1932年3月初“在奉天与我接洽过。”这就是说，与其“接洽”的时间是在筹备会议结束之后，派代表“推戴”溥仪之时，才第一次与他谈伪满洲国政府组织问题的。臧式毅说这次与他“接洽”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总理人选问题，臧式毅说板垣“知道我与熙洽皆不肯就，他遂找郑孝胥任总理。”溥仪也说：“我到长春就任伪执政，首先郑孝胥告诉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让他当国务总理，经我承认，由伪执政名义派郑孝胥当伪满国

务总理。”这是关于总理人选决定的情况；臧式毅说这次与他“接洽”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央政府各部总长人选问题，板垣主张“四个省长均须入阁”。臧式毅说：“我表示地方长官不能兼任中央职务，若必须到中央去，就把省长职务免除，另行派人。接洽结果是奉天、吉林、黑龙江、哈尔滨四个省长全要到中央分任部长，而还要兼任原来的省长”。板垣还对臧式毅说：“由西关将你释放，就为的是这个！”由此看来，关东军早在1931年12月“释放”臧式毅时，就已确定了伪满洲国政府的组织和人选了。

又据臧式毅供述，板垣与其“接洽”上列两项问题之后，板垣随即又邀臧式毅一同赴长春与熙洽会见。根据溥仪去长春的时间推算，他们这次去长春的时间应在3月6日之前。时郑孝胥已先在长春，“到后一同视察溥仪厅舍（已有许多日本人在内修缮），后在铁道警备司令部集会。列席人员郑孝胥、熙洽、臧式毅、荣厚（伪中央银行总裁）、金璧东（伪铁道警备司令）。板垣征四郎宣布，熙洽为财政部总长、臧式毅为民政部总长，其余各部总长，已均由日本军方指定，军司令官认可。[只是]在此并未宣布。”由此可知，这是在伪满洲国政府临近正式成立以前的、关东军与郑孝胥等确定伪满洲国政府主要组成人选的一次重要会议。

3月10日，也即伪执政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召开了伪满洲国第一次国务会议，正式组成伪满洲国政府。臧式毅说到场后才看到，每人面前放一纸袋，内装政府组织表，“该组织表上载明各部各司的组织，凡是中国人当司长的以黑圈标志，日本人当司长的以红圈标志之。”该组织表如下：

“总　　理　　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　　臧式毅　　　　次长葆康

外交部总长	谢介石	未设次长
财政部总长	熙　洽	次长孙其昌
军政部总长	马占山	次长王静修
实业部总长	张燕卿	未设次长
交通部总长	丁鑑修	未设次长
司法部总长	冯涵清	未设次长
教育部总长	郑孝胥（兼）	次长许芬
兴安总局长	齐默特色木丕勒	次长菊竹（忘其名）
总务厅长	驹井德三	次长阪谷希一
立法院院长	赵欣伯	
监察院院长	于冲汉	
最高法院院长	林　棨	
最高检察厅长	李　槃	
参议府议长	张景惠	副议长筑紫熊七”

臧式毅说，他看到政府组织表后，“才知道有日本军部统治部长驹井德三为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拓务省官吏阪谷希一为总务厅次长。”而且“各人一看均甚差[诧]异，事先毫无接洽。”关于这天的国务会议情况，马占山说：“10日，日方现充伪国务院总务厅长之驹井，及伪高等顾问板垣，以军部命令开国务会议，发表伪政府设总务厅掌管各部一切实权，凡政令不经该厅签字盖章，即不能执行。”这就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以伪国务院总务厅来控制伪满洲国政府的，以实施其对东北的统治。日本为了提高总务厅的权威，加强其统治，便在第一次伪国务会议之后，“未出三日，即由日寇军方命令将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改为伪总务长官。”

关于日本人作伪满政府官员问题，臧式毅说“该表上又载明各部用日本人为职员人数的标准是十分之三（最初是这样，后

无标准)。”为此规定在这次会议上驹井曾对熙洽予以严斥。此事的经过是这样的，臧式毅说：“财政部总长熙洽曾当场提出质问：是谁规定的？事先并未接洽，有向执政报告的必要。总务厅长驹井德三站起来，将上身伏在桌上，以凶横的态度，粗暴的声调，公然回答说：‘这是本庄司令官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向执政报告！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时，以10万头颅，多少亿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等语，闻者怒不敢言。”关于此事，马占山在他写的“详报”里也有说明，特引述以证之。他说：“11日，板垣、驹井又在国务会议发表[国务会议似开了两天]，日本军部本拟由日人占充伪政府官吏之半数，及各伪省府官吏十分之四，现经减少，仅加派新政府百数十名。旋经议及日人入籍问题，熙洽曾有审慎之提议，当被驹井、板垣等严词申斥，并谓凡居留东省之日人均由铁血换来，自应隶属新国国籍，无审慎之必要。至于是否脱离[日本]国籍，日人自有权衡，他人不容过问。复又发表辽、吉、黑三省各设总务厅并警务厅，均由日人充任，总揽各省全权。”这个争论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以占领者姿态，要在东北建立他的绝对统治，是对熙洽等想藉日本军事势力而进行复辟企图的一个打击。

3月10日伪满洲国务会议宣布了伪政府总理以下人员的任命。11日，以伪执政的名义公布了伪政府组织法、人权保障法，以及伪参议院、监察院、国务院等官制等。但这些东西臧式毅说“其经何手续产生则不详。”也就是说这些“法”是由关东军炮制并公布的，并未经伪国务会议讨论。

这就是伪满洲国政府成立的大致经过情况

附参加伪执政就职典礼人员名单

①奉天

省长	臧式毅
省长公署参议	王庆璋
省长公署秘书	李　毅
辽西十三县代表	张其昌
奉天中部十五县代表	谢桐森
奉天南部十一县代表	侯显谋
奉天东部十七县代表	孙焕章
驻奉天班禅公务处长	罗崇嘉
奉天附属地商务会长	李玉枢
东三省民报社长	张梦九
沈阳县自治委员会会长	于继昌
奉天省政府代表	陈玉铭
奉天交通委员会会长	丁鉴修
奉天市商会代表会长	方煌恩
奉天省农会代表	刘岩恩
奉天省教育会代表	房向春

②吉林

省长官	熙　洽
省长官公署高等顾问	荣　厚
省长官公署高等顾问	钟　毓
吉林永衡官银号总办	刘焕芳
吉林财政厅长	孙其昌
吉林交涉署长	谢介石

吉林教育厅长　荣孟枚
吉海铁路总办　艾乃芳
吉林全省警务处长　修长余
吉林民政厅长　王　惕
吉林实业厅长　张燕卿
吉林宪兵队长　张祥廉
吉林高等法院院长　富春田
吉林省印花处长　张书翰
穆棱煤矿公司督办　马德恩
长春市长　赵汝梅
吉林交涉署参事官　孙辅忱
长春商会代表　史焕亭
吉林电灯厂厂长　林鹤皋
吉林市政筹备处长　程科甲
吉林工商会长　江宗德
吉林各界代表　关长庆　李英佐　张文楷
王希堂　谢雨琴　程坤元　沈同瑞
吉林省八旗代表　钟　岳
长春附属地商务会代表　左春荣
宽城子商务会代表　李明恩
吉黑榷运局局长　魏宋莲
吉林全省硝矿总局局长　梁廷枢
长春教育局局长　张祖田

③黑龙江

省长官　马占山
省长官公署秘书　韩云阶
省长官公署委员　赵仲仁

黑龙江省民治指导会代表兼全省代表　　潘渊龙　关溥涛

李师汝　鄂昌勋　许兰坡

④哈尔滨特别区

东北行政委员长　　张景惠

哈尔滨江防舰队部参谋长　　范熙申

东省铁路总办　　李绍庚

东省铁路理事　　金荣桂

哈尔滨特别市代表　　许永铭

东省铁路路警处咨议　　刘　颖

滨江市政筹备处处长　　赵伯俊

滨江市商会会长　　张　泮

驻哈尔滨黑龙江交涉总办　　马忠骏

东北特别区高等法院院长　　陈克正

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厅长　　宋文权

滨江地方法院院长　　郭芸林

绅士代表　　姚香龄

⑤蒙古

蒙边督办　　张海鹏

蒙边公署参议　　广　纶

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翼总管辅国公　　巴　巴迪

副都统公署右厅帮办　　苏勒巴阿

副都统公署左厅帮办　　倭克吉布

副都统公署鄂署特总管辅国公　　凌　升

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贝子　　巴拉哈旺珠尔

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札萨克公署交涉长　　乌勒古都摆

哲里木盟盟长　　齐默特色木丕勒

哲里木盟代表　　苏玉书

⑥宣统帝身边旧臣

内务大臣代表	宝　熙
宣统帝弟	溥　佳
京师宪兵司令	德楞额
宣统师傅	郑孝胥　罗振玉

⑦日本方面

本庄关东军司令官
内田满铁总裁
森独立守备队司令官
林关东警务局长
板垣关东军参谋
小林海军少将
石射吉林总领事
川石满铁理事
村田黑龙江顾问
大迫中佐
田代长春领事
金井奉天省政府顾问
三桥吉林省顾问
中野自治指导部顾问
土岐陆军参与官
住友关东军副官
二宫关东宪兵队队长
泷川哈尔滨领事
驹井关东军特务部长
和知、林两参谋

伪满建国的丑剧

王庆丰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得以沿着南满铁路线长驱直入，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辽阳、四平、长春等地。当夜，驻在沈阳北大营王以哲的第七旅官兵被迫挥泪撤走，黄显声领导的公安警察，虽然在皇姑、北市一带拼了一下，怎抵挡得了如狼似虎的关东军大批部队，到了第二天早晨，日本侵略者便完全占据了省政府、兵工厂、东三省官银号等要害部门。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关东军急进主义派，主张吞并中国的东北领土，直接划入日本的版图，后来由于担心引起各方面阻力，遂改变为建立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筹划伪满建国的丑剧，就是在沈阳上演的。

日寇策动汉奸出笼 赵欣伯跳梁得意

暴日侵吞东北的野心，是蓄谋已久的，所以在占领沈阳之后，就把沈阳改称为奉天，于9月20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命日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奉天市市长。第二天，土肥原迫令原市长李德新交出权印，按照日本统治机构的方式，下设总务课、警察课、财政课、卫生课、工程课及技术课，各课的课长和主要负责人完全由日本人充任，并把原来独立的商埠局和大东新市区一并划入市政公署，将各项权利通揽入手中。沦入日军统治下的市街，只有军车在飞驰，岗卡林立，

到处是沙袋堆垒的掩体地堡，日军持枪横列街头，搜查行人，稍有支吾，即被带走，则有生命难测之险。市井萧条，路人稀少，而日军又迫令商号开门营业，可是那些大丝房、绸缎庄门可罗雀，食品店、杂货店顾客寥寥，首饰楼、古玩铺更是无人问津，就是拉洋车、赶马车的也很难找到一两个主顾，许多人处于失业状态。而摇晃在街头巷尾的日本浪人，尤其是早当了几年亡国奴的一些朝鲜人任意指诬为奸，敲诈勒索，否则被捉入日本宪兵队，便有死无活，有些素无正业的泼皮和到处钻营的无赖也是寻风了哨，不自称便衣队，便报号某处侦探，登门串户，趁火打劫，居民百姓终日惴惴不安，怕遭飞来横祸。整个沈阳市，每天都要出现上百起抢劫烧杀案件，而日本军警既背后指使奸贼作乱，又明里组织保安警察，火中取栗。至于四外乡镇各县，特别是沈山路沿线，日人则从中组织或化装土匪制造劫祸，日本关东军则向国际声称："日本绝无侵占领土之野心，为了保护日侨的安全，维护满洲的秩序，日军在扩展警卫和征剿匪徒。"其所说的匪徒，当然指的是中国军队和奋起抗日的队伍。

按照关东军军部的意图，原想把占领后的东北，做为亡韩后的第二个殖民地，旋因顾及国际之非难，环境的不许，遂转变策略搞傀儡政权，极力搜罗亲日汉奸，策动他们脱离中国政府，声明所谓"独立"，拉拢诱惑那些动摇分子，为日寇侵略服务。事变当时正在沈阳的张景惠，当时任东省特别区长官，便勾结日本浪人新井，得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会见于私宅，秘密协议；板垣说明北满因有苏联的关系，一时不便进军，要他速回哈尔滨，负责北满治安，保护日本侨民，将必保荐为东北最高首领。张则当场允诺，愿与日本合作，关东军拨给步枪3千支、子弹数万发，于21日回到哈尔滨，便成立治安维持会和警备队。虽然未敢公开叛变，却当上日本侵略者的别动队，

想借助日军势力恢复清朝的复辟狂熙洽，以张作相居丧锦州，而拱手迎接日军，于9月28日宣布吉林独立，作了公开投降日寇的带头羊。同时，关东军还分别派人策动，以黑龙江地盘为钓饵诱使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叛变，许以高官稳住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又收买寄居在沈阳日东铁路附属地里的汉奸凌印清，成立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使其攻打张学良设在锦州的辽宁省政府，未及施展，就被有民族意识的"老北风"结果在盘山。

而沈阳的情况较为复杂，虽然土肥原带领一帮日本人握据了市政公署，但没有颇具资望的中国人出面维持，那种混乱的局面就难以收拾，而赵欣伯是本庄繁、土肥原的老熟人，日语娴熟，自事变以来，终日奔走于关东军军部和日本浪人之间，上窜下跳，十分活跃。满洲通信社社长藤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上田统则怂恿他出面组织维持会，但他只有个法律研究会会长的虚衔，自知难以号召，遂向冯庸大学校长冯庸说："我们应当脱离中央，另组织政府，你可为主席。"冯庸则大骂其丧心病狂。后来冯庸曾被日人逮捕，据说就是受赵危害。他又按关东军军部旨意，转而拉拢著名士绅袁金铠、失意军阀阚朝玺出台，于9月24日成立起"奉天地方维持会，由袁金铠任委员长，老牌汉奸于冲汉和阚朝玺任副委员长，李友兰、丁鉴修、孙祖昌、张成箕、金梁、佟兆元为委员，办公地点设在小南门里实业厅旧址。次日发出通告，声称该会"专为维持地方秩序，所有金融、商业诸事照常，并设警察自卫担任治安"，其实商业仍然萧条不振，抢劫案件屡屡发生，而其一举一动都得请市长土肥原批准，并按其指示办事。其次，又有以阚朝玺为会长的"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和"东北绅民临时解决方策讨论会"相继出现，前者声称代表商、工、农、学各团体主办救济，而后者却打出要建立所谓"独立政权"的旗号，说什么"确信友邦（指日本）官

民对于此种纯正民意决议必能尊重，而且加以真挚之适当援助也。”这个组织是由赵欣伯主持的，虽然只是个空架子，却明目张胆地喊出投靠日寇，鼓吹独立的主张，为日本侵略者拼凑东北傀儡政权而制造舆论。

此时，日本军部还发出指示：“由关东军直接行使军政大权实为不妥，军方对于地方行政，应以维持治安为限。”遂改变为建立由日本操纵而表面独立的傀儡政权，所以土肥原只干了一个月市长就离去了，而由关东军推荐赵欣伯接任奉天市长。赵欣伯之所以受到日军如此之青睐，是颇有来头的，他是河北宛平县人，早年在天津读书时，他以男扮女妆演茶花女而风流一时，得与前清高官余老翁的小妾余铭盘幽会，随后两人私奔，避居于大连。余改名王碧琰，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由于生活逐渐拮据，便开班教授日本人学习汉语，其中包括本庄繁和土肥原。从此，赵欣伯开始接触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被看中，随后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进入东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此间，王碧琰因病被东京帝大附属医院误诊致死，曾起诉于东京地方法院未果。他抱恨心伸冤，终于写出《刑法过失论》的论文，1925年日本文部省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以示安抚拢络。次年，他来到东北，由此前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本庄繁出面推荐，给予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之衔，他又以研究中国法学为名，发起成立“法学研究会”，混迹于政界，而与土肥原等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交往频繁。事变之前，曾以考察日本法律为名，数次去旅顺和东京通报献策，成为日本豢养下的一条走狗。此时不仅登上市长的宝座，又任命为沈阳高等法院院长、兼政法于一身，更是小丑跳梁，趾高气扬，他自鸣得意地说：“现在国内都说我做官卖国，他们都将官看重了，以为做官就是发财，不知加在我们身上的事务是多么重。至于卖国不卖国，不是在手段与程

度上，我们要看结果。大家在这水深火热中，更须人民由火中提到清凉地方，我的目的是如此，并且我深信可以达到，否则也不来干这事，我也知道北戴河去玩玩好……我的事很多，不只市长一部，样样都得我去，眼下竟患失眠症了。”还说什么，“以前张汉卿不信我话，我去数封信与他，详述不能排日，诚恐一旦激起日方公愤，地方势将糜乱，如果他信我，就没有这事了，知孺子之不可教也。”其骄狂横蛮之态，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假自治伸魔爪　袁金铠推就为娼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得手之后，在其国内则由大阪朝日新闻社发起，接二连三地召开“满蒙时局恳谈会”，大造舆论，引导鼓动；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中，则提出左一个方案，右一个大纲，都是讨论和拟定如何统治满蒙的问题。尽管各种说法不同，思想却是一致的，就是建造满蒙独立政权。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使之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即存彼之名，由我取实，这个决策方针既定，便不遗余力地施展各种阴谋促其变为现实。从关东军军部来看，沈阳冒出来的这几个傀儡组织还算不上是政权机构，于是本庄繁指使赵欣伯，把袁金铠和阚朝玺叫到军部，诱导袁金铠出面组织独立政府，让阚朝玺领衔清乡剿匪，随后拿出一纸开列着让与日本的数项权利、使其签字。究竟事关重大，两人面面相觑达两小时，后来还是借辞推托，本庄繁也没十分相强，容其再行考虑，遂得告退。而维持会中有的委员觉得此种事态越发之不可为，如李友兰、佟兆元则相继离去。本庄繁既没抓出中间首脑，遂改变方法，采用起煎饼的方式转圈撬，首先成立财政、实业两厅，让曾任硝磺局局长的翁恩裕和在财政厅当过科长的高毓衡，先加入地方维持会为委员，然后逼使地

方维持会以该会的名义派充厅长。果然，翁恩裕于10月19日出任财政厅长，并携同日本顾问及咨议到厅就职，当即发出日人拟就的布告，声称："本厅长系受地方维持委员会委托，与旧政权概无关系，所有各县署、各税局嗣后收款，均解本厅，不准私自交于旧政府（指在锦州三省政府），倘有故违，定行严办。"高毓衡派充实业厅长，亦于10月21日到职。其任务就是为日军收钱，充作军费，并便于日寇攫夺矿产实权。

为尽快拼凑成在日本势力下的辽宁省政府，使所属的58县都能听从其威令，只是如此是不行的，关东军军部想到，还得请于冲汉出马，必能助一臂之力。于是派大东医院院长守田福松去辽阳，以探视其病情为由，同时向他说明事变后的沈阳情况，劝导他再立新功。老牌汉奸于冲汉，早年曾在日本士官学校任中文教师，日俄战争时为日军刺探情报，而授予勋章。后来，他仍继续给关东军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效力，曾以他同满铁合办的形式，盗卖鞍山国土，开设"振兴铁矿公司"，又夺取铁矿资源，创办"鞍山制铁所"，即鞍山钢铁厂的前身。他还乘机当上张作霖的谋士，凡与日本的重要交涉，多经其手，而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奉天文治派三巨头之一。现时的于冲汉虽然身患糖尿病，但不愧是以汉奸立业，一经守田的策动，便振衣而起，于11月3日来到沈阳，当即向本庄繁陈述八条卖国主义的"政见"，其中包括要贯彻保境安民与友邦亲善政策，必须与中国政府断绝关系，建成独立的新国家，要实行不养兵主义，委托日本军队负责国防事宜。奴仆的献策洽合主子的心意，当然要给予赞许，本庄繁还特别向他面授了机宜。先前列他为辽宁地方维持会副委员长，那只是个挂名，今番才算是到任视事。次日，于冲汉便偕同袁金铠到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则热情招待，对袁金铠更是恭维备至，称他为满洲之当代元老，名满东瀛，于

亦从旁应和。本庄繁然后说到："今后东北政权、当嘱托有人，并应即日恢复省政府，以利于新政权的行使，惟省长一席，还必须请君任之，绝不得有违帝国军令，致于不便。"袁金铠仍是有所顾虑，未敢即允，遂致不欢而散。

当袁金铠在出任维持会委员长时，曾自声明："不问既往，不管将来，只维持此过渡期间之治安。"后来又有自喻，谓："遭此事变，似少妇守节，忽遇暴汉，虽挣扎不过，亦当作有限度的牺牲，戴花抹粉，犹可委屈一时、惟强迫奸宿，则誓死不从。"一时传为笑柄。可是经不住于冲汉的恐吓和怂恿，终因惜命求生，屈从于暴力，半推半就充当了娼妇。他按照关东军的指示，于11月7日将地方维持会迁入原省政府内，代行省府职权。在向外拟就的布告中，有"与张学良旧政权和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一语，系由关东军强行加进的，袁争辩再三，终是无用，而一字不改的予以公布。同时，关东军军部还派来金井章次为首席顾问，升巴仓吉、甘粕正彦为顾问，从中掌握实权。随后还搞了一番"政权有归"的庆祝。

按照关东军的内外夹攻策略，极力扩展所谓"自治运动"，进而控制和改造各县政权，就在11月10日举行的地方维持会代行省政权的典礼会上，同时上演了一个并头戏，成立起"自治指导部"。这个自治指导部下设总务、社会、调查、指导、监察五部，并附设自治训练所。名义上是由于冲汉担任部长，实为日人顾问中野琥逸、中西敏宪所操纵，一个是大雄峰会成员、一个是满洲青年联盟成员，他俩都是满铁中推行满蒙计划的骨干、在关东军军部任有要职。至于各部人员，除了于冲汉的儿子于静远任训练所长，并代替其老子行事，全部由日人把持。它是由关东军统治部直接管辖，各项活动经费亦由关东军拨给。起初就在省政府内办公，不久即迁至同泽女子中学校址。在其组

织条例的第一条中，就胡说什么“自治指导部根据善政主义，改善各县之县政，确立完全自治之制度为任务。”所谓“善政”就是按照日本的殖民统治办事。所谓“自治之制度”便是废除原来的县政府或治安维持会，由自治指导部在各县设立“县自治指导委员会”和“县自治执行委员会”，前者是县指导监察机关，后者是奉命执行机构，总的说来，就是各县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活动，完全由自治指导部包办。而其自治训练所，则是专门培养到各县充当指导员的日本主子和中国奴才。那些日本学员大多都是满铁社员，有的竟是事变前在安东市街上开澡塘的老板，在四平车站上卖饭盒的小商贩，也摇身一变，穿上西服，耀武扬威地走进县城，坐在县政府里发号施令，而且事无巨细，如未经其签字盖章，不但无效，还要处以以违逆政令。故日人自治指导委员长，就是各县的太上县太爷，后来又改称参事官、副县长，实握县中一切大权。在自治指导部成立半个月之后，首先改组的是沈阳县，以日人永尾龙造任委员长，并举行盛大典礼。本庄繁还特派参谋矢崎代表他到会致训词，又以伪县长谢桐森名义发布公告，大肆宣传，使其他各县效行。其后辽宁各县由日人充任委员长及委员的则有74人之多，故名为自治，实为日人所治，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藉此为攫取地方政权的工具，更作为后来承办伪满建国运动的大本营。

溥伟空演加官戏　溥仪重温复辟梦

日本侵略者为在东北制造出一个名存实亡的独立国家，真是千方百计，煞费心机，什么省区独立、各县自治，都是为拼凑傀儡政权打根基。而这个傀儡政权的出台，更需要大造舆论，伪托民意，拉拢军阀汉奸上台，捧出清朝余孽复辟，能以热闹便是好戏，后台老板自有主意。就在1931年10月24日，有几

个日本人把蛰居在大连的溥伟架弄到沈阳，代替阚朝玺，就任四民维持会会长，施赈放粮，以沽名钓誉，随后大肆活动，迷梦登临帝王宝座，那怕是当个儿皇帝，也算是东山再起。说起溥伟的身世，他是清朝宗室奕䜣的长孙，于光绪二十四年袭承恭亲王爵位。曾经充任正红旗满洲都统，总理禁烟大臣，又以内廷上行走之职，周旋于清宫。辛亥革命后，他与皇族亲贵之良弼、铁良等组织宗社党、反对与民国议和、旋被解散，虽然隐遁在大连，却久欲伺机而动，这次来沈就是企图在日本支持下建立“明光帝国”的。下车以后，便连日奔走于关东军军部，还拜谒了本庄司令，侵略者们则握手言欢。26日，溥伟竟在日本军警的保护下，率领一班宗族旗人、清廷遗臣等，大张旗鼓地前去祭拜北陵。事前日人便通告各市民团体届时参加，并找去喇嘛数百人在陵前诵经，日本军方还赠送了花圈，则隐含有支持复辟之意。又有四民维持会的祖宪廷等人，为了招播惑众，放言恭亲王要给参加者每人发给一套新衣，所以不管是贫民，还是乞丐，到场者总有两千多人，颇为壮观。溥伟身着蓝袍紫褂，戴着瓜皮平顶帽，在众人拥簇下，跪拜致祀，宣读祭文，之后又在陵前朗诵誓词，称：“此际仰仗祖宗威灵及日本正义，推翻蟠踞廿年之仇敌，臣今后当竭其心力，恢复祖宗之基业。”最后高声三呼中日亲善万岁。此时溥伟竟俨然以未来的帝王自居，而那些日本侵略者也微微点头，不知是赞扬还是默许。可是那些前来企图领取一套新衣的人们，只是白白地陪伴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往回走的路上，禁不住发出连声报怨。

溥伟回到商埠地八纬路一号原来王公馆的住地，立刻召集那些混在南、北市场，杂巴地的一群丑类，组织所谓“东北四省纯正民意政府建设研究会”，起草章程草案，得意洋洋，把头一天才挂到门前的“四省独立政府研究会”木板摘掉，改悬出

这新的招牌。隔了一天，则召集随从赴北陵的各团体代表开联席会议，宣布该会正式成立，从94名参事中，又推举出以溥伟为首的执行委员15名，显示着具有强大的阵容。最后，溥伟站出来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只要与日本人合作，必能建立起'明光帝国'。"并鼓励大伙："我有许多日本朋友的支持，你们大家只管努力去做，都会得到应有的好处。现实的机会不能错过。"溥伟忙得马不停蹄，四处奔走，出席各种集会，又是演说，又是许诺，其狂妄的劲头不亚于赵欣伯，但他只是活跃于外圈，实的少，虚的多。

以恭亲王溥伟为中心的复辟派却也有些能量，10月30日又借用大和旅馆（即今辽宁宾馆）召开建国准备会议，除了一般旧日王孙的热衷帝制者参预之外，日本方面则有土肥原等10余人代表出席，好象是关于明光帝国如何建立，政体是采用立宪制？还是君主制？均须于此会上研究决定。在讲到应该拥戴谁做"君主"时，溥伟则暗示自己要亲临尊位，颇不赞成举废帝溥仪上台，而阚朝玺、金梁等则主张"非溥仪出头，不能号召。"争论得相当激烈，最后没能得出结论。没隔几天，地方维持会首席顾问金井章次又假借溥伟名义纠集汉奸，在沈阳南满站公记饭店举行建立新国家的座谈会，日方出席的有金井章次、赤岛领事和一些军警、外事人员，溥伟则临时拉来一些地痞无赖，冒充各团体代表参加会议。溥伟装模作样地又是一番老调重弹，其实他哪里知道，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借此作为制造伪国的宣传材料，只不过推他出台跳一场加官戏。稍后，日人已把溥仪挟出天津，前来东北的消息，使他如迷梦初醒，才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遂赶紧撤掉门前的招牌，收拾行装，于11月15日夹着尾巴溜回大连去了。按照关东军在事变后不久即制定出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便提出了要宣统帝作为傀儡政权的

领班人，只是由于局势未定，缺少基础，许多事尚未安排停当，况且该走过场的还没走，所以并没急于拉来亮相。现在好象是到了火候，11月2日，本庄繁派土肥原偕同金梁秘密赴津，就是完成劝请溥仪出山的任务。为什么要偕金梁呢，因为他是宣统朝太子少保，内务府大臣，与溥仪有旧情。前时他所以能列为地方维持会委员，就是由本庄繁提名的，早就预算好他的用场。而金梁是以他的梅花篆字著称，在非常高兴之下，也能诌出几句古诗来呢，且看其《赠本庄司令官》："英武共钦大将风，雄材自古出关东，故宫惊胄惊奇伟，开国宏规万里同。"又《赠土肥原市长》："沈阳本是古皇都，文德武功识霸图，多谢河山还我旧，市民百万共欢呼。"请为品味。

土肥原见到溥仪极力表示：日本绝没有领土野心，满洲是清朝故乡，你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一切由你作主。溥仪自1925年被赶出清宫，潜入天津日租界，一直是处在日本人卵翼下过活，每天都在作复辟的迷梦。机会来了，可又怕成为韩国第二，因而不敢轻易答应。金梁从旁劝驾，还递上了曾在清廷作官的十几个满人签名的敬请书，好象也没起到多大作用。而随后竟出现向溥仪住宅馈赠的水果筐中藏着两颗炸弹，不用说是含有威吓之意。此时土肥原又别寻蹊径，与金梁前去拜访遗老郑孝胥，叙述复辟计划，赢得郑孝胥及其子郑垂的极力赞同，随后同见溥仪，再行劝诱。溥仪是动心了，而围绕在他身边的几个遗臣则认为大局未定，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溥仪还是踌躇不前。土肥原为了急于把溥仪挟持到东北，遂又施一计，那就是11月8日晚，又出现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开枪而大肆骚扰的"天津事件"，从威吓中把溥仪及郑氏父子架出，用船秘密运送到营口，后到汤岗子温泉区的旅馆。

当时，关东军军部令城内同兴元丝房包做绸面和布面的龙

旗数千面。又令南满站的印刷所日夜赶印纸制小旗，准备不日在沈阳隆重迎接溥仪的莅临。然而日本内阁认为，国际联盟正在开会，且有鉴于辽宁省政府尚存于锦州，吉林省政府另立于宾县，而马占山仍在主黑，率有重兵，声势尤振，实力扩张并未完善，国际环境尚须顾虑，此时树出溥仪傀儡政权，自有诸多不便。于是关东军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对此阴谋暂缓实行，而要加紧扩展军事活动。那么只好将捏在手中的溥仪转送旅顺，再作寓公。

去袁请臧老阚入狱　促建伪国再续闹剧

袁金铠虽然是半推半就地当上了汉奸，但他还是避讳从自己嘴里说出甘心背叛的话，所以在地方维持会代行省政府职权的布告中强加的那句辞，使他很有些懊丧。11月20日日本又将辽宁省改称为奉天省，他也越来越看清事事都得听从日本顾问的，自己却行使不了什么真正的权力，可是手已经插到磨眼里了，不捱也得挨呀，因而对各项事务也就不愿意主动地去过问，而外面的事情由阚朝玺去支应，闲暇时间便写写毛笔字，偶尔也作一两首诗。他所说的“满腔恻隐心犹热，八面维持力已微”，还是有几分心曲的，至于“漫将洪（承畴）李（克用）来相比，砥柱中流誓不违”，那便是自欺欺人，而且欲盖弥彰了。由于他对于树立新政权表现不佳，深为日本侵略者所不满，而赵欣伯最能迎合日人意旨，遂乘机向其主子痛诋地方维持会之懦弱无能，威权不振，并建议解散维持会，成立正式的省政府，可由前主席臧式毅出任省长，如此则借恢复旧观的名义，不惟可以取得奉天人民的欢欣，并可博得国际舆论之好感可谓一箭双雕。这个建议很快被关东军军部所采纳，于是又演出下面的闹剧。

臧式毅，字奉九，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孙烈臣督理黑、吉时，曾随任为督署参谋。1927年前后，任奉军三、四方面军团的宪兵负责人，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他与省长刘尚清以秘不发丧的计议，赢得了东北局势的稳定，也招致日本侵略者的忌恨。杨宇霆死后，接为兵工厂督办，后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被关东军视为张学良的亲信。"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便被日本宪兵队队长三谷清逮捕。一直拘禁在大西关五纬路鲍子仪公馆的楼上，虽然每天的吃喝并不算太坏，也没断大烟的供给，但一押就是3个月，却无人前来过问，很是气闷。从《盛京时报》上看到的都是日军节节胜利，旧日的士绅、僚属则有不少人已与日人合作，握据要津。想到自己，难道就这样白白地葬送了后半生。恰在此时，赵欣伯前来"救驾"。少不了一番怜惜，两番劝解，说什么："日本方面一再声明，对东三省没有任何领土欲望，只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完全自治的新政权，而同日本帝国友好相处。先大元帅活着的时候，东北政局不也是自树一帜；我们也应该处以灵活，为主席自身着想，你犯不上和日本方面作对，而且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与不对请主席考虑。"二次前来又说："本庄司令提及你们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对你的办事干练还加以赞许。你原来就是三省的首府主席，怎么能看着让别人窃据呢？请放心，至于日本方面由我去说。"臧式毅虽然只是默不作声地听着，而心中已是动摇。加上赵欣伯左右捭合的诱惑，终于说出："此事就请你看着办吧。"一天的下午，他便坐进赵欣伯的汽车，一同去拜见关东军高参板垣征四郎和统治部长驹井德三，在其已经拟就的文件上签了字，其中开列的要求大致为五项：要他参加东三省政权组织，充任官吏；日本军队驻在东三省内；国防由日本军队担任；东三省分担日本驻军军费；东三省境内铁道由日本经营、使用。臧式毅

于12月31日释放回家，在他的家中同时增设了常驻的日本宪兵，名之为加强保护。

12月15日，赵欣伯以市长的名义通知奉天市商会，要各分会委员等于下午两点到市商会开会，讨论商税事宜。迨各委员到齐，则由伪市政公署秘书长冯涵清主持开会，却谓：至今地方维持会已失去存在的必要，其对政务设施，尤不能尽量行使，所以今天要诸位前来，则是公推臧前主席出任奉天省长等语。此时，赵欣伯率领自卫警察和保安队200余人到场，随后登台讲话，述说其主张请臧之原由，当即令出席的全体人员签名，旋而结队，直趋省政府。袁金铠骤见赵欣伯带着大队军警和商会人员来到省府院中，不知何事，从赵欣伯那种狐假虎威、盛气凌人的姿态可以猜测，其中必有变故。这时有所谓商民代表王桐轩快步走到面前，将预先备好的请袁辞职及解散维持会请愿书递上，袁氏阅后，点了点头，唔唔两声，遂即答以"愿卸仔肩"。转过身去铺张提笔而大笑，拉长语调而高声说："此事正合吾意呀。"随后将写就的全体退职书当场宣读，然后交给了赵欣伯。其时，在场的地方维持会人员，虽然感到事出突然，但都默默无言，只有阚朝玺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其实赵欣伯头天晚间对他已有关照，说：明天省府可能有所变动，你无须到场亦不必参言。可是阚朝玺却偏要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他毕竟是个军阀出身，又有"阚铡刀"的绰号，对这种场面并不在乎，遂站出来粗声豪气地说："喂呀，带来这么多荷枪实弹的兄弟，好威风啊，敝人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要维持会全体辞职，可惜我老阚无先见之明，实为惭愧。想当初，我们的原意是出来维持市面，为市民谋取安全，后来声明与国府及张副司令脱离关系，已是遭到国人唾骂，今天又弄到这个地步，真是架了一辈子鹰，竟让鹰给啄了眼。"一扬手指着站在台阶上的警

察大队长喊道："常守辰，你今天也露脸啦，来，让兄弟们动手吧！"赵欣伯也流露出一脸怒气，回敬他说："你也不要太放肆了，这也是秉承关东军的旨意。"又嚷了一阵，才算平静下来。这时，袁金铠又将为臧式毅就任省长的恭贺辞写好，与赵欣伯同往臧公馆，作了场面上的敦请。次日，臧式毅随同赵欣伯拜访本庄繁，下午3点钟回到省政府，在日本顾问和宪兵的监视下，简略地举行了个省长就职典礼。日本侵略者为了蛊惑人心，不免又搞了一次庆祝"新政权有归"的集会。没隔几天，阚朝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羁押了43天，终于写下今后决不作有违于日军行事的誓约书，才将放出。

臧式毅就任伪省长不久，日本侵略者则已策划好进犯辽西，使用他省长的名义公布向关东军司令部请求讨伐"辽西兵匪"，并将写出颂扬日军德政、詈骂张学良的传单，用飞机散发辽西各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在此之前，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也亦沦陷，由张景惠任伪省长，于1月1日发表所谓"独立宣言"。而张景惠一直是与日本侵略者合谋，千方百计地诱逼马占山下水。马占山见于处境困难，考虑到保存自我实力，遂采取暂与周旋、待机而动的态度，终于表示与张合作。至此，日本的军事侵略暂时可告一段落，而阴谋策动建立满蒙独立国的活动则又甚嚣尘上。

1932年1月11日晚，由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奉天通信局出面主持，又在大和旅馆召开建设满蒙伪国的谈话会。应邀出席的中国汉奸有于冲汉、丁鉴修、赵欣伯、赵鹏第、吴恩培等，日人有省公署顾问金井章次、财政厅顾问色部、领事森岛、奉天新闻社长石田武亥、关东军新闻班长松井中佐，以及奉天居留民会长、奉天商议会长等，在通信局长武内致辞中，提出关于满蒙之善后处置即新政权或新国家问题，同时，日本在满机关

与之统一也是要讨论的，请诸君发表意见，就先由于大人开始吧。于冲汉干咳了两声，然后表示：建设新国家是最为适当。说到建设，最要紧的是尊重民意。在此种场合，赵欣伯当然不肯落后，说：满蒙非建设独立国家，欲避内乱和虐政，断为不可。今日急务，是尊重民意习惯而建设新国家，其采帝制，或采共和，或采其他体制均无不可，奉吉黑的统一现已就绪，建设满蒙独立国实为一可尊之革命事业。日人石田则说：只要建成独立国，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日、满、蒙、回、鲜各族人民就要协力建造新天地。从前因受中国军阀的压迫，日本人被限制在附属地里边，现在就不该再区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可统通称为满洲人。日本的铁路附属地可以取消，日本的机关尽量缩小，都可以统一在这个新国家里，日本人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呀！日本人要愿意当这个新国家的官，也不必客气，如是于大人当了国家元首，大家尽可以向于大人讨委任状嘛。使得许多日本人哈哈大笑。最后，谈到国家能否得到各国承认问题，松井认为：满洲与中国脱离关系，便不受九国公约之拘束。国家形体完备，并有日本援助，自然可得许多国家赞许。而金井表示：予谓基于民意建设新国家，有如赤子之出生，因国人已认其存在，为其关照，乐其成长，就没什么可顾虑的。这次座谈，表面上是交换意见，实际日人对于伪国的制造，早已胸有成竹，计划确定，现在已是揭开促建伪国的序幕。

“建国会议”唱双簧　葬送东北大出殡

日本侵略者既占领了东北三省，则认为筹建伪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使能赶在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便加紧了进行的步骤。板垣应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之电召，急速飞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了关东军司令官对“满

蒙独立构想”的指示方案，然后，由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在此基础上，又共同炮制出一份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板垣又带着这份‘纲要’回到沈阳，本其意旨，极力物色其中意奴仆，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傀儡人物，为捏掇这个“独立新国家”的胎儿，昨日辗转于大连湾，今夜又密议于哈尔滨，一切都是那么紧张、那么迅速。从1月22日开始，关东军司令部又连续召开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参加者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片仓、竹下，以及土肥原、花谷等，起草和确定所谓“新国家”的“组织法”、“人权保护条例”，并拟制出“新国家建设顺序的纲要”。制造伪国的“傀儡剧目”布署既定，一场双簧戏便敲响锣鼓。前院放火，后屋窃夺，这也是日本侵略者的惯技，日本上海驻军配合关东军的行动，故意寻衅，制造战端，挑起“一·二八”事变，使中国人民无暇遑顾东北，以转移国际舆论的视听，促进伪满建国运动也就在这紧锣密鼓中拉开帷幕。一方面指使由张景惠出面召集三省首脑来沈开会，推出汉奸上台表演；一方面由自治指导部催动各市县，制造伪民意，包办假宣传，内外夹攻，期于速成。

吉林的熙洽携孙其昌、荣孟枚、金璧东等汉奸最先来到沈阳，其次到达的是张景惠，在张景惠引诱下的马占山，接受臧式毅提出的“联省自治”主张，也乘机随后莅临，于2月16日6时当晚在大和旅馆集会，由赵欣伯设宴招待，名为欢迎，实际所谓“建国会议”即行开幕，旋即转至商埠地赵欣伯私宅，举行建立伪国的会议，由于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是四省区的伪首脑，也就是当时称之为的“四巨头会议”，与会的汉奸有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而关东军的三宅、板垣、和知、驹井德三等名为列席，实是亲临监督和控制。会议直至17日晨2时才散。中间经过很大周折，臧式毅、马占山等一再主张“联

省自治”，最后遭到板垣的严词拒绝，遂化为泡影。而关东军预先拟定的伪国方案，则交由赵欣伯、于冲汉当场提出，迫令其接受，并限于3月1日将“新国家”宣布建成。其次，指令荣孟枚、林文林等当即起草“建国宣言”。17日下午于张景惠宅集齐，旋赴省公署继续开会，按照关东军的部署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长”。这是一个打扮为“民族自决”的过渡组织，张景惠被指定为委员长，熙洽、臧式毅、马占山、汤玉麟、呼伦贝尔王爷凌升、哲里木盟齐王（齐墨特色木丕勒）为委员。次日，使用这个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义发表一个所谓“宣言”，主要表明“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实际上，汤玉麟虽然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搭，却没来开会，马占山托病当即回海伦，根本没签字，凌升和齐王都未曾在沈，何来署名，可观其“宣言”也是日人伪造。接着，指名留下一些汉奸继续开会讨论，这些汉奸为表现对“新国家”的热心，虽然一致同意以溥仪为元首，但在枝节问题上也时而发出各种昧调，都不过是傀儡戏中应景的聒噪，不然也就没有戏文，最后都得听命关东军军部的旨意。直至2月25日，日本侵略军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如下决定：（一）国名：满洲国。（二）元首称号：执政。（三）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四）年号：大同。（五）首都：长春，改称“新京”。（六）新国家的政治：民本主义。之后，紧接着便在各地出现各式各样的所谓“请愿代表”，敦请溥仪出台。促进建国运动象猪食锅里的酸泔水，灶下加柴火，锅里便冒沫。

自治指挥部是包办各地“促进建国运动”的指挥部，在此期间，连接不断地向各市县下指示，发简讯，从内部操纵，指令各地汉奸出头露面进行宣传活动，千方百计地伪造“民意”，胡说什么“我们欢呼新国家的诞生”，“感谢友邦日本的提携，让

我们登上王道乐土”，还有什么“五族协和，共存共荣”，不一而足。他们按照关东军军部规定的程序，限令东北各市县开展促进建国活动，自2月15日起，每5天为一期，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先由省城各公共团体发出所谓“建设”新国家，拥戴溥仪为元首的倡议，然后使各县复电，表示赞成；第二期，由各市县城镇组织游行队，持标语小旗游行；第三期，各县推举代表到省城集中，组织全省的游行。然后，各省再用汽车游行。最后由各省区派代表到沈阳聚会，组织所谓联合总游行。

沈阳是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就成了日本侵略者伪造民意，表演“建国”丑剧的中心，遵从关东军军部的指令，由奉天省公署、自治指导部、市政公署、市商会等四个伪机构联合组成一个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在市内的八门八关、省议会、市商会等处贴满了标语和宣传画，并由市政公署印制了6万面伪国旗，迫令各商店和临街住户悬挂。2月27日晨，在南市场召开所谓市民大会，为了能开得热闹，头一天就在街头贴出海报，凡是参加者都能领到一包饼干，并免费看戏半天。所以除了机关团体必须参加之外，有许多无知贫民携儿带女，以及花儿乞丐也前去赶场。在入场的门口设有签名处，如是自己不会写，就由那些自治指导部新招聘的职员，也有的是穿着中国衣装的日本人为之代笔，用来表明“民意”。商埠大舞台是中心会场，四壁贴满了标语，半空扯着象蜘蛛网似的红绿纸旗，场内烟气盎盎，嘈杂呼叫的噪声，站在台上的赵欣伯穿着长袍、戴着金丝边眼镜，闪光的油头不时的晃动，谁知他在说些什么，没人去听。场外另搭个席棚，叫来共益、大观以及庆丰茶园的角色在那里演京戏、唱落子，算是为庆贺“新国家”助兴。许多人手里掐着进门给的那张小票走来晃去，都等着到11点钟才能领取

的一包饼干。这天，省内各县以及吉、黑两省的所谓代表陆续来到沈阳，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一身西服革履，土豪、劣绅、汉奸、洋奴大聚会，总共约有千人，包赁了各大旅馆，在鹿鸣春、新德馨等饭店大开宴席。28日，全省各县代表在自治指导部礼堂开会，由沈阳县伪县长谢桐森主持，教唱促进建国歌，朗读大会宣言和决议，迫令全体通过，然后是各代表发表所谓演说，会后有大连女子手艺学校学生表演歌舞，享受娱乐。

最为集中表演的是29日，这天早晨赵欣伯率市政公署全体人员及所谓市民代表齐赴文庙祭孔，祭告“新国家”便是“王道乐土”，转回来领着那些代表到自治指导部，参加所谓“全满促进建国运动联合大会”，除了仍旧迫令全体通过宣言和决议外，又新添了个“紧急动议”，即选举代表，迎接溥仪。下午2点开始列队游行，游行的队伍，为首由一化成中国装的日人（名叫鹤原义）手执伪国国旗领路，他还留有两撇仁丹小胡，得意洋洋地迈着方步，其次是三个骑马的日人，随后是两辆黑老虎小汽车，乘坐着关东军军部的要人，接着是50余辆“ハヌ”车，车身披着五色布条，两侧贴着黄绿色书写的某省某县代表字样，再后面是载重车和马车，拉着警察和商会人员，跟着走的则是有气无神的商人，还有龙灯、秧歌闹哄在末尾。人妖颠倒，光怪陆离，这就是断送东北的出殡大队。路经城内四平街、出小西门、转三经路，进入日本附属地，迎面的大和旅馆从楼顶披下数条直到地面的红布标语，写有“过去军阀在满洲横征暴敛”，“友邦日本提携建立新国家”等，在二楼平台上站着许多日本绅士和军官，晃动着日本国旗，到底是在庆祝日本殖民胜利，还是检阅这送葬队，大概是两者兼而有之。游行到南满站前解散。

1932年3月1日《盛京时报》等登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

3月9日溥仪在新京（即长春）就任“执政”，而在沈阳则出现了“大日本帝国拓务省”派出机关，一批批的日本“友邦”，他们携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天车站拥出，向着广场对面悬挂的大字标牌“满洲乐园”欢呼。假如你对日本军警的盘问，回答说自己是中国人，轻者挨两个嘴巴，骂一句“巴格牙路”（混蛋），弄不好便带上手拷被拉走。这是伪满建国丑剧的帷幕，也是东北人民14年耻辱生活的开始。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

王子衡

伪满洲国荐任级（等于军人校级）以上的日本人官吏，在其就职时，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给一小本《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日本人奉为法宝，密藏身边或办公桌抽屉里，必要时取出背人暗读，体会机宜。我任伪国务总理秘书时，与日本人秘书松本益雄同室，乘隙窃阅手册2次，内分30条，所有日寇统治东北、压榨欺骗人民的机宜手段备载其中，阴险毒辣使人心惊发指。现将记忆的二十几条写述于下，事虽绝对秘密，可能还有知者，希为补充与指正。

（一）满洲国的建立不是满洲民族的旧业复兴，而是日本王道精神的发展。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

（二）满洲国皇帝不是神的后裔，或化身的“现人神”，象日本天皇那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但为实现日本国策计，日本人对于满洲国皇帝必须保持尊敬的态度。

（三）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虽具有日本与满洲的二重国籍，但不是要使“日本人满洲化”，而是要使“满洲人日本化”。

（四）日本人充任满洲国官吏，不是象外国顾问那样的作客性质，而是主权的行使者。凡事须通过日人的负责官员，尤其关于重要事情须通过关东军的允许或同意，才能决定与施行。但对于满洲人长官上级，要有相当的礼貌，关于重要的政策法令的决定与执行，形式上须经过他们的同意，例如国务院会议通过或其他签名盖章等手续。如果始终得不到他们的同意时，只好由日本人负责官员决定、执行，或请示关东军。

（五）关于重要的政策、法令、方针、计划的策划、制定，事前须绝对保密，即对于日本人委任级（等于军人准尉级）官吏也不例外。

（六）居住满洲国内各民族虽有十几种，但主要的为日本民族、朝鲜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蒙古民族和回民族；各民族都有其特殊不同的风俗习惯，如无碍于日本民族的利益之处，可使保持予以尊重。但日本人既系核心民族，须诱导他族向日本人学习，养成忠直刚毅富有牺牲性的“武士道”精神，以便驱使。但我们日本人也不能不承认有些岛国狭隘性，必须善自修养，成为英明无比、包容大度的完人，才能使其他民族诚心悦服为我所用。

（七）朝鲜民族，窃盗成性，好逸恶劳，好说大话，好谈政治，与汉民族既有血缘又有宿仇，可利用它、怀柔它，化为“皇民”，只可使其与汉族疏远不可与汉族亲密。汉鲜两族人民有冲突时，同等是非，要扬鲜抑汉；朝鲜人理曲时要使朝鲜汉人同其曲直。

（八）满洲民族居住满洲的为数已不多，并且溥仪为皇帝，

满民族当已踌躇满意。但它们多被汉族同化了，民族特点不甚显著。不过汉满之间还存在着历史的仇恨，要促醒满族不要忘记这个仇恨，才能为我利用。

（九）蒙古是一个半开化的民族，性悍野，贪便宜，但有些直爽气，与汉族是世仇，这一点要好好抓住。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100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的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

（十）回民族文化较低，有些强韧性，居住满洲国内人数不多，但散布在中国和亚洲各地约有3亿多人，对于我们大亚细亚政策将起相当的作用。要重视它们的特殊宗教与风俗习惯，要注意他们与满洲国外各地回民族的联系。

（十一）最应当注意的是汉民族。他们人数既多，文化程度亦较高，且拥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科学知识技术能力虽还很低，但脑筋都不坏，得到机会是不甘落后的。并且他们那种强韧性、坚忍性、阴柔性和同化力，令人可怕。过去其他民族进入中国多被同化和弱化，如蒙族、辽族、满族、回族等等是人所共知的。考其被同化的主要原因，不外文化程度低下的关系。我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文明高于他族，现在的科学技术知识远非汉族所能及，当然没有被同化的顾虑。但是汉民族却善于理财，善于行贿，善于以声色货利诱惑他人，这一点不亚于犹太人。并且居住满洲的汉族与广大的中国汉族的联络一时又无法断绝，因此，对于汉族特别提高警惕。如何提高警惕是我们重要的课题。我们日本人是否能够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在于是否能够征服中国，如何把握汉族，对于田中大将的奏章应当三复思之。因此对于汉族的手段方法，在原则上当然是顺我者生、逆

我者死，而在运动上要慎重研究妥善处理。事关兴亚大业，亦关系你们个人的荣辱，也要注意不要陷入汉族淫靡生活的罗网。

（十二）满洲国的政治形式，既不是象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也不是象欧美各国的民主立宪制。因此满洲国政府的组织，不采取责任内阁制，各部大臣都是国务大臣；而是采取责任总理制，各部大臣只是各部的事务长官，只有总务长官才是实际的国务大臣，与国务总理共同对满洲国皇帝和关东军司令官负责。但是日本人要有些政治修养，对于满洲政府各级官长，无论他是哪个民族，都要予以相当的礼貌。

（十三）汉族官吏中有些派别，大致为关里派、沈阳派、辽阳派、吉林派、黑龙江派和金州派。各派之间勾心斗角，暗中摩擦，目的在于抢官夺势。其中有亲日分子，也有反日分子。我们要分别清楚，对于他们向我们反映的各种情况，不要不信，不要轻信。如果贸然不察，倾听一方，受了一方利用，将坏我们的大事。

（十四）满洲系官吏的学历，各有不同，大致分为日本学校、中国学校和欧美学校出身的三种。日本学校出身的亲日的较多，但也有反日的；中国学校和欧美学校出身的，反日的较多，但也有亲日的。无论亲日也好、反日也好，对于他们的言语行动公私生活都要加以注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要忘掉这句话。

（十五）满系官吏和一般满人，持有中国国民党籍者颇不乏人。同时国民党、共产党和张学良派来的间谍（特务）多人，潜伏在军事、行政、经济、交通、学校、工厂各机关里以及社会团体各方面，窃盗情报文件等工作，与宣传反满抗日，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必须彻底纠察，严行逮捕，宁使错杀一千，不使漏网一个，但须不露声色，免致打草惊蛇。

（十六）满洲有些宗教会门，如佛教、道教、耶稣教、天主教、红卍字会、道德会、青帮、洪帮、一贯道、半夜教等，信仰自由法律所许。但这些教门，多与中国方面欧美各国有秘密联系，作些间谍活动。必须详查满人，属于何种教门，作些什么活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能够钻进这些教门窥其秘密，尤为奖励。

（十七）对于赤俄人要一刻不容地提高警惕，不能设想利用他们；对于白俄人既利用，又警惕；对于犹太人少利用，多排挤。

（十八）凡属各种企划机关和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除日人外不许其他民族参加，尤其是汉民族。

（十九）除日本人外，对于其民族的财富，只能使其缩小减少，不能使其增长扩大。尤其对于汉民族和犹太人的财富，如果能使用一种使他们无所怨的方法剥夺其财富，亦无不可。

（二十）绝对禁止日人官吏的贪污行为，即使以假公济私的手段，取得的收获亦应归公——军用。因为日本对于满洲付出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军人的牺牲贡献，因此，某种收获应尽先归军所有。

（二十一）绝对禁止日本人吸食鸦片、海洛英、吗啡等毒品和赌博行为，尤其是日人官吏，违犯者予以免职或其他处分，对于其他民族则放任不问。

（二十二）对于这小册子须绝对严秘保持不得泄露，违犯者予以免职和其他惩罚。遗失时须速报告，并予以警戒，退职时须将其交还关东军。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九

热河沦陷

热河失守与张学良下野

周达夫

（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侵略军继续向热河方面进犯。第二年（1932年）年初，热河形势也日趋紧张。省主席汤玉麟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增援，表示准备抗战。原来蒋介石在举国一致要求抗日的舆论压迫下，不得不装出一副共赴国难的样子，当即派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和驻北平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一同赴承德，了解情况，研究对策，并给汤玉麟打气。这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抗日戏。他的实际行动却是另一个样。

跟随宋子文去承德的，有上海市工商联合会会长黄炎培，和一个有澳大利亚国籍的英人名叫端纳尔（Doner）的蒋介石顾问。黄炎培随行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热河形势，如果打起仗来，上海工商业者应起一些什么作用；端纳尔的目的，是搜集中国抗日真实情况，向外国情报机关作宣传。端纳尔与蒋、宋、张的关系是有历史的，是相当密切的。另外还有朱庆澜——字子桥——将军。他是东北老一辈名宿，在南洋一带华侨中很著声誉，当时在北京，主持辽、吉、黑后援会。随张学良去承德的，还有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副处长周达夫。张、宋诸人赴承德乘坐的是小型载重汽车，在承德的行宫——避暑山庄住了一宿。张学良去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热河驻军的兵力、武器、弹药、粮饷等实际情况，和汤玉麟商谈如何补充和增援的办法。当时热河驻军共有5个师，军火、被服、粮饷十分缺乏，战斗力

尤其差，如战事爆发，迫切需要南京和北平大力补给和增援。

张、宋等一行，从热河经古北口回北平，途中遇大雪，山路崎岖难行，因在古北口停下来，过了一夜。在古北口电告蒋介石，说明热河的现实情况，转达热河方面的急切要求。张、宋回抵北平后，即集合东北军、西北军和蒋系的所谓中央军两个师的指挥官，举行军事会议。会上决定了战斗编组，赋予各军、师战斗命令。

当时各军的战斗位置是，北平至山海关一带，为何柱国指挥的第五十七军，于学忠指挥的第五十一军，王树常指挥的一个军。北平以北昌平、怀柔、张家口地区，是宋哲元部的西北军和商震指挥的一个师。东北军的三个步兵师和蒋派来增援的步兵第二师（师长黄杰）、步兵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位置在北平、古北口间。以上各军的兵力、武器、被服、粮饷，均严重不足，并无开进热河增援抗战的条件。

张、宋将热河及关内驻军情况，向蒋作了汇报后，蒋介石派来军需人员，发给各军士兵每人短裤一条，雨伞一把。这对多雪的北方战地，并没有什么作用，未免太儿戏了；至于军饷就根本没有指望。关于热河的一切要求，南京方面更是一味推托，复电叫热河"相机处理"！战争爆发后，宋子文为支持张学良，自动把财政部的税警总团从连云港开往北平，增援长城线上的战斗。不料竟被蒋介石命令河南省主席刘峙，在郑州把兵车给扣留下来，严令税警总团返回连云港。蒋介石大喊大叫的"抗日"，实质就是这样一回事。

（二）"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却东渡日本，与日阀勾搭去了，开始唱他那个臭名昭著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调头。不久回国，向蒋介石提出参与政事的要求。他们两个竟把国家大权私自平分开来，蒋介石抓党——国民党——权、军

权，汪抓政权。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蒋又从南昌——正在江西剿共——电示张学良，避免与日军冲突，采取不抵抗主义，免贻日方以口实。一切听从政府，由外交途径解决。热河抗战开始，蒋一变其不抵抗说法，大作抗战文章。向在日内瓦开会的“国际联盟”提出控诉，用以欺骗国内外的舆论。东北军也好，西北军也好，中央军也好，和日军一接触，很多都溃不成军。丢掉了热河，退进了长城，战事逼近北平郊区。蒋介石坐不住龙霄殿急忙专程北上，同张学良晤面，乘机迫张交出兵权，以制造对日谈判条件，好保住他那偏安一隅的局面。

1933年2月初，蒋介石不顾在江西“剿共”的军事繁忙，乘专车沿平汉路北上，电邀张学良和他在保定见面，旋改为石家庄会晤。张学良带领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秘书处副处长周达夫，兼程赶赴石家庄。蒋、张会谈的内容很简单，蒋对张说：“目前对敌斗争是紧要的；但现在国内出了问题，就是汪精卫出来了。你、我、汪三人不能同时在台上，必须有一个下去的，你看谁下去好?”张已领会蒋的意思，是叫他下去，慨然对蒋说：“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我下去可以，可以，可以，马上下去，并且出国去。”张学良的表态正中蒋的心怀，就这样决定。张学良返抵北平，立即请章士钊给他拟下野通电。电稿成，送给张学良看。张说“写得很好”，即令周达夫去前门车站见章。并谓：“听说章先生搭这次车赴天津，可告知他，我就要出国了。”还送给章先生天津一家公司2万元的股票，表示敬意和酬谢。

张学良辞职离开后，蒋介石就派两个媚日派来平，一是何应钦来接张学良的事，他先后和日军缔结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二是黄郛到北平成立个华北政务委员会，导演出以殷汝耕、陶尚铭为首的两个冀东专区。

（摘自《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

北票沦陷的经过

王瑞林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不战而退，日本帝国主义却横行无阻，仅用3个月，占领东北三省，并企图吞并侵犯热河，只因热东地势险要和人民抵抗甚烈，未敢贸然进犯。

日军进攻热河必然经过北票。北票是热河东面之重要门户，是热河唯一铁路线的终点站，是热河通向辽西进入华北的交通要冲，是历代军事家必争之地。所以，北票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之重心。

北票还是热河省最大的煤矿，每年产量达50万吨，战前从营口出口，畅销外地，销路以上海及京沪、沪杭两线为最多。北票煤质甚佳，比开滦煤有过之无不及，在经济实业上和军事上都有特殊意义。所以，日本侵略军将领声称：日本军进攻北票和热河本是皇军的责任，何时进攻只是时机的需要，沿铁路线前进是不必说的事了。因此，他们先从掌握锦朝铁路入手控制北票。

1932年1月3日，日军没有遇到东北军的抵抗，兵不血刃占领了锦州。日本侵略军基于侵占热河的需要，于本月7日，嘉村旅团又急于进犯到义县，以义县城作为西进的桥头堡，从此构成对热河东部防线北票的威胁，并逐步逼近，作试探性的进攻。1月21日，日军派出满载武装士兵的"第三装甲列车"从锦县车站出发，越过义县车站向北票方向作试探性的运行。在运行

途中，不断受到义勇军阻击，至下午2时才开到南岭。晚上，探得中国军事虚实之后，又返回锦县车站。这是日军第一次进入北票境内。3月24日，日军派飞机一架侵入北票上空，进行侦察。4月4日，又有飞机一架入侵北票地区，大量散发传单，强硬要求通车。在传单上用中文写道："通车为商起见，决无他意，宜当保护，于4月5日一定通行"。果然，5日午时，有日军铁甲车两列，客车一列，由锦州开往北票，随车共来日军及"旅客"60余人，强行通过南岭防线，直达终点站北票。从此，每日即行通车。是年7月，日本关东军对热河的入侵采取了"渐进主义"。7月3日，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了侵略热河的大本营锦州，与日军师团长的旅团长会商了热河战事问题，决定从此加速侵略热河的步伐。所以，在7月18日，驻义县日军3 000余人，悍然出动大举进攻朝阳寺。当时，驻军在此的汤军（即热河官军）董旅官兵不敢迎战，退守到南岭车站；日军尾追至南岭，并派4架飞机狂轰乱炸。8月20日，日军又派飞机对南岭、口北营子、北票地区进行侦察、并散发传单、投掷炸弹，似乎有大举进攻之势。

然而，由于当时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日本在国际上已陷入孤立处境。为改变处境，时隔不久，日本侵略军停止了对北票的进攻，便利用汤玉麟之盟弟张景惠和张海鹏派入到热河劝降，还派与汤玉麟早就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化装成商人，经北票去找汤玉麟进行诱惑。11月中旬，日军又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玉麟派出公安管理处的处长张舜卿前往赴会。日方代表有武部阶堂，另加关东军参谋长的代表、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根据张学良秘书回忆说，在会上日方向张舜卿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说汤玉麟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

须派亲信负责人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

第二，为了加强满热一体关系，要汤玉麟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

第三．为加强联系，要汤玉麟同意允许日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

当时这三条，由汤玉麟的公安处处长张舜卿，电告汤玉麟和张学良。张学良在北平复电北票，令张舜卿要断然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

张学良的复电精神。反映了当时一些进步团体和爱国军民的意愿。早于“九·一八”事变后，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了坚决反对日寇的宣言；翌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派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各地，发动组织抗日。热辽各地爱国军民顺乎历史潮流，于12月末组织了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指挥部设在北票。总指挥黄显声，他指挥3万多义勇军战斗在辽西地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北票地区的兰天林在田庄台一带也揭竿而起，高举“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大旗，在辽宁各地浴血奋战，后来，与中国共产党热河特支领导的抗日义勇军高体乾合作，转战热东、内蒙一带打击日寇。退役在天津的军人孟昭炎也返回家乡北票，组织东北国民救国军，战斗在热辽地带。特别是李海峰组织的抗日义勇军，于7月17日毅然逮捕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的特派员（大间谍）石本权四郎。石本权四郎带着关东军的特殊使命和汤玉麟直接接触，在返回途中，经北票南岭被捕获，这就是震撼中外的“石本事件”，也称“朝阳寺事件。”石本被捕后的第2天，从大凌河车站开出一列火车，以关东军吉岗参谋为特使带领日军武装直达朝阳寺，企图寻找李海峰谈判。担当这次列车长的日本人杉木喜，在昭和8年

出版的《北票线南岭的战斗》为题，详细地记述了这次战斗经过。本月22日，日军派4架飞机轰炸口北营子和三宝营子，并散发传单相威胁。同时又采取软的手段，由日军委托朝阳寺当家喇嘛马洪志找李海峰调和，但遭到李海峰拒绝。日军对此仍不死心，后又派刚投降日军的汉奸毕占一去找李海峰，利用他们昔日共同反汤抗捐的旧关系劝降李海峰，要他放出石本。李海峰对毕占一这种卖国行径严加痛斥，并绳之于义勇军枪毙在三叉口。日本关东军对此十分恼怒，于10月9日拂晓调动日军500余人，驰抵三宝营子村，三面包围李海峰的义勇军。日军上有飞机投掷重磅炸弹轰炸，下有大炮小枪进行轰击，义勇军抵抗不支撤出阵地。日军攻入村内大肆抢掠烧杀，居民男女苦遭残害。据当时调查报告云："当日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炸毁房屋100余间，焚烧柴草、粮食、财物等项价格难以数计，其三宝营子遭祸至烈，而西周距离村民悉已逃避不归……。"日军采用武力袭击办法没有夺回石本，又动用重金收买。12月3日，日军驻义县宪兵队长矢加部宗太郎，派王洪宾带亲笔信去找李海峰，信言："许以赎价日币57万元换回石本"，并以"不放回石本即攻热"，要挟恫吓李海峰。李海峰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将石本枪决在十家子。李海峰的爱国正义行动哗然长城内外，各地爱国军民坚决支持。而日军却大动肝火，将"朝阳寺事件"作为向热河进攻的借口。

日军进攻热河是蓄谋已久的事，经过1年多的策划，日军已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于是，提出了"在1933年初解决热河问题势在必行"的行动纲领。当时日军少将铃木曾说："进击热河不仅是日、汤之间的重大问题，也是引起国际联盟以至于世界所注目的重大问题。"所以，到1933年1月为进攻热河、突破北票防线开始调兵遣将。调遣的日军有第六、七、八、十二师团，

并纠合伪军共10万人，以茂木、川原、米山部队为前锋，准备三路进攻。北部由通辽侵入开鲁；中路由义县进攻北票；南路由绥中寇取凌南。中路以第八师团为主力；由师团长中将西义一郎指挥。该部所属第四和第十六两个旅团；旅团长为铃木美通和川原侃。日军在进攻之前大造舆论；欺骗威吓群众。第八师团三十一联队大尉加腾次郎，连日在朝阳寺附近各村演讲，并利用纸烟、伪币、毛巾等各种"洋货"诱骗民众。还强迫各村民众进行登记，不许民众外出或迁移，如果执拗不肯则进行屠杀。同时，还派飞机在南岭、朝阳寺、三宝营子等地上空散发传单，让当地民众揭发义勇军。传单上说："若出首举发他们的住处，必有重赏；若能捉到其头目者赏当益重。"最后署名："大日本帝国司令官"。各地日军还强迫各村居民悬挂日本国旗，否则用飞机进行轰炸和扫射。日军还在各村组织警备队，如当时记载："在三宝营子一带组织所谓警备队，令每屯有屯长一人。数屯为一村，每村有村长一人。四个村组织一个警备队，指令队长一人，负责招募队员。在三宝营建一警备队，队长梁凤阁。并有顾问和办事员。此计划推广各村照办。"1933年1月上旬，日军开始在通向北票铁路线上的许家屯、上齐台、七里河驻上日军，修筑工事，对铁路加强警戒，保护军用物资运输。特别对义县日军数量增加，日军对城门把守甚严，城墙上岗哨持枪鹄立，车站工事如临战事，整个处于战备状态。在南岭附近集结日军500余名，附野炮一营，同董福亭旅相持。1月29日，日军茂木骑兵旅集中南岭一带，并从各地征集马车80余辆，由日本人看押集中到朝阳寺，为进犯北票朝阳备用。2月初，日军强制锦铁工人百余名，到周家屯以西路段，赶修被义勇军拆毁的铁路。2月中旬，第八师团步兵700余人、飞机12架、汽车200辆、坦克车8辆、装甲汽车15辆、铁甲车两列、弹药给养等都

陆续运往前沿，随时准备战斗。在战事部署就绪后，日军策动伪满州国于2月18日发表“讨热声明”，委任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为“讨热”总司令，张海鹏为前敌总指挥。“讨热”声明发表后，关东军准备在2月24日发起进攻。但机密泄露，被迫提前行动；由铃木旅团和川原旅团的早川部队、田中部队为先锋，于2月21日发起对热河的总攻击。这天清晨，在南岭一线的千余名日军，用大炮掩护，坦克车开路，骑兵冲杀，并用飞机3架，投弹30余枚，首先攻破董旅防线。至当日11时，日军又控制了口北营子车站，逼进北票。与此同时，早川部队和田中部队在大凌河两岸进攻牡牛营子。由于汤玉麟部队腐败到了极点，只想巧取钱财，不想抗战，所以遇到敌人进攻，便望风而逃。唯独爱国军民组织的义勇军奋起抵抗，但又人单力薄，寡不敌众，在日军飞机、坦克、装甲车和骑兵的凶猛攻击下，抵挡不住，所以北票在2月22日9时被日军早川部队占领。

北票的沦陷，在日军第四旅团长铃木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名扬天下的早川部队的“骷髅队”为先锋队，于20日午后6时从锦州沿北票线出发。他们临出发前拿出这样的决心：“最先登上朝阳快报消息是我军，如没有接到快报，那就可认为我军全灭。”日记中还简述了战斗经过：“21日从朝阳寺向南岭发起进攻，开始遇到200余名中国军队的阻击，日军用飞机投弹轰炸，后趋沉默，留下许多死伤者；剩余溃逃西奔朝阳。”“22日太阳升起时，乘胜占领北票，高奏凯歌入城。”铃木还阴沉沉地说：日军攻击北票，飞机轰炸，敢死队肉搏，不管牺牲如何，而攻克是一件悲切的事情。日军还讥讽汤玉麟说：我军占领北票，汤玉麟通电全中国：“誓与国土共存亡”，但十数日汤“如云如霞，不战而逃”。

以上虽出自敌人之口，但军阀辱国求荣，不战而逃的说法

是不谬的，从整个热战经过看；不及一周南岭、北票、朝阳相继失守，不及旬日全省沦亡，溃败之迅速，实为历史所罕见。

（摘自《北票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本侵略军侵占朝阳纪实

孔繁敏　栾志勇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极力扩张。1932年3月1日建立了伪满洲国，进而不断强化反动统治，清剿抗日力量。在南满、北满治安基本趋于稳定时，便把矛头指向热河。这是日军“恢复全满治安，巩固和确定该国基础的既定目标。”经过充分地准备，终于在1933年3月侵占了全热河。朝阳地处热河东部，是热河的东大门，是日军侵占热河的必经之地与重要地区。当年，朝阳敌我斗争极为激烈复杂。

一、入侵前日军在朝阳的活动

日军侵占热河蓄谋已久，特别是当时担任热河边境外警备的第八师团，一直千方百计地进行着各种侵占热河的准备工作。

从1932年3月开始，日军飞机即不断在朝阳、开鲁、凌南、凌源、宁城、赤峰等地上空侦察，散布传单，制造舆论，诬蔑我抗日武装，并投掷炸弹，恐吓群众。

1932年3月21日，日军派出满载武装士兵的“第三装甲列车”，从锦县车站出发，沿锦州至北票铁路向前做试探性挑衅运行，下午4时至南岭车站遭抗日义勇军的袭击，当晚返回锦县车站。

1932年4月4日午时，日军1架飞机来朝阳城上空散发传单，内载日军司令部通告。通告说，通车（锦州至北票间列车）专为“农工商方便，并不是军事行动意思。凡热河境内军队和一切民众诸君好好保护铁路，为公为私合心共济。”5日午刻，日军铁甲车两辆、客车一列由锦州开往北票，随车日军及旅客共60人余。日军未下站，并声称以后每日通车，而铁甲车不再随来随往。在中国军方的默许下，锦州至北票间的民运列车，开始不定期运行。4月11日，热河步兵第一0七旅二一四团三营，由凌南调朝阳寺驻防（朝阳寺两个连，南岭、口北营子驻一个连）。

5月，日军又武装占领了朝阳寺，三营退守南岭。

6月21日，日军一部从锦西侵入朝阳县境内，行至二车户沟、龙潭沟交界处，遭到了王震与赵清泉领导的义勇军和当地民团的截击，伊藤等23名日军被打死，余者逃窜。当跑到曹杖子后山时，又被王老凿（王文福）派人击毙2人，剩下6人逃回锦西。23日，日军派出一支部队直奔二车户沟企图报复，并有飞机助战，抗日军民与之激战一天，日军无奈退回。

锦州至北票间列车运行后，日军借此进行侦察活动。5、6月间日军少尉石本权四郎两次潜入北票城。7月17日，石本再次来北票，乘车返回至朝阳寺以西、南岭以东破庙子处，在列车上被义勇军李海峰部抓获。日军闻讯乘铁甲车由朝阳寺驶来，与驻军三营张营长部发生枪战，三营退至口北营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石本事件”。18日，日军飞机突临朝阳城上空，绕城半小时飞去。下午1时复来5架飞机扫射，投掷炸弹三四十枚，炸死11人，伤2人，炸死马21匹，毁房10余处。

8月19日下午4时，驻锦日军吉岗参谋通知南岭驻军三营十二连有事联络，即驾铁甲车到南岭一带。十二连连长张澧拒

绝日军武装入境，日军竟置若罔闻，铁甲车5辆向南岭逼进。十二连即在山腰布防，王绍曾副官在铁道上挪红旗要求其停车，铁甲车停车后，王副官上前交涉，质问日军来势这样猛为何？日军竟反问山上部队是否有意挑衅，王副官回答主要是为了防匪别无他意。正说着，铁甲车就向他冲来，王见势不妙，急忙躲闪。同时，日军枪炮齐发，十二连也进行还击，立即破坏了铁路，激战数小时，铁甲车掉轨两辆。日军停战相持一昼夜，退回朝阳寺原地点。

此后，日军企图通过多种办法想要回石本权四郎，均未得逞。10月7日拂晓，日军500余人分三路包围了义勇军李海峰所在地三宝营子村，并动用了飞机、枪炮。李海峰率部押解石本权四郎，撤退到巴图营子。日军进村，焚烧抢掠，居民死伤100余人，烧毁房屋100余间。

日军还加紧赶修了绥中通凌南的公路，9月修到绥凌边境的和尚房子（现属建昌县）。

1933年，日军侵略热河活动越来越嚣张。1月16日午前，日军300余人，自明水塘门至张飞沟，并有飞机1架，带迫击炮2门。经姚家沟地方，自卫军连长刘继周带民众前去防堵。日军首先开枪，双方互攻4小时，日军撤回绥境，并被打死3人、伤1人。17日，1 000余名日军，并有飞机4架、坦克3辆，盘踞在梨树沟门。

1月29日，日军50余人侵入北票下府镇，下午离去，烧毁部分文书帐目，并假惺惺地给贫户白面5袋、煤油2桶、日本国旗4面。

2月7日，日军四五十人潜入凌南边境侦察。9日，日机1架入凌南上空侦察。

二、热军的备战与朝阳驻军

日军入侵热河的挑衅行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许多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备战抗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为大势所迫及各方面的压力，才做出备战姿态，采取一些措施，制定作战计划。以正规军为主，义勇军为辅，同守热河。以鲁北、开鲁、绥中、阜新、朝阳寺为前进警戒阵地线；以开鲁、朝阳寺为主要警戒据点；以乌丹城、赤峰、建平、朝阳为主阵地线，极力构成纵深阵地带。

2月17日，宋子文、张学良视察热河，同汤研究防务计划，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万福麟为第四军团长，指挥丁喜春的独立八旅、缪澂流的独立十六旅、孙德全的独立十九旅、王永盛的独立二十九旅、于兆麟的独立三十旅。张作相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为第五军团长，指挥孙殿英的四十一军、义勇军冯占海部、热军三十六师两个旅和张廷枢的十二旅，担任热河守备。这两个集团军共约10万余人。作战地域线是以朝阳、建昌、凌源、平泉至承德公路为分界线。公路以南为第一集团军作战地，公路以北属第二集团军作战地。

此时，第四军团部和王永盛二十九旅驻平泉县（八沟），其六八四团（团长刘纯积）驻三十家子。三十旅驻凌源城和叶柏寿，并在叶柏寿、朱碌科进行了3个多月构筑工事。四十一军控制围场、赤峰间。陆军第一0七旅（董福停部）由凌源进至朝阳、朝阳寺间。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赵国增部驻建平，另有义勇军李纯华、唐聚伍部在朝阳朱碌科一带协助。

三、日军的进攻计划

1933年1月28日，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武藤大将对进攻热河发出训示："周密准备，严禁轻举妄动，一旦令下，坚决完成任务"。同时，下达了有关作战准备的命令，调整了部分部队的防务，特别充实了第八、十、十四师团的兵力。2月9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攻占热河计划，10日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参谋会公布了这一计划。17日正式发出命令，第六师团从打通铁路出发，经开鲁、绥东、阜新向天山、下洼、朝阳前进，以后向林西、赤峰、多伦发展进攻。同时，以较强一部从朝阳寺附近出发，由北票铁路方面经朝阳、建平向赤峰方向作战，并负责掩护北票至朝阳铺设轻便铁路施工和北票至赤峰的兵站线。令第八师团以一部迅速占领北票，掩护北票铁路修整，并指挥该方面的第六师团部队，另以一部严守山海关及九门口一带，掩护主力侧背安全，以其余主力成二路纵队，分别从北票附近及绥中西北热河省境附近出发，尽快向建昌附近及其以南一线推进，并不失时机以一部确保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重要关口，掩护主力侧翼。尔后以主力占承德及古北口，扫荡全热河。令在锦州、北票、朝阳、建平、赤峰公路及朝阳、大平房、凌源、平泉公路设置两条兵站线。

负责朝阳方向主要作战任务的第八师团，2月13日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16日在锦州师团司令部向各团队长及有关部队做了传达。即师团以步兵第四旅团长铃木少将指挥的部队为先遣队，在占领北票、朝阳的同时，把主力向朝阳、锦州及绥中附近集结，准备尔后的行动。以步兵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少将指挥的部队为挺进队，沿朝阳、凌源、平泉、承德公路快速推进，迅速占领承德。混成第十四旅团长服部少将指挥的部队向绥中、

凌源、平泉公路方向作战。第八师团主力接续挺进队前进，确保古北口、马兰关、罗文峪、喜峰口、冷口及界岭口等长城各关口，尔后协助第六师团扫荡热河。步兵大佐秋川指挥的辽西警备队，在以上作战期间确保山海关、九门口附近安全，掩护师团主力侧背安全。同时，确保饶阳河以西师团原警备地区内的治安和交通线。

四、入侵朝阳的经过

日军根据拟定的作战计划，积极进行部署。18日，日伪发表了讨热声明。当天第八师团下达命令，令先遣队于22日傍晚开始行动，19日午后2时，师团长接到报告，发现南岭隧道方向有轰炸声。日军察觉到行动已被发觉，怕铁路被破坏，经请示关东军司令部，提前在20日晚开始了行动。

2月21日，第八师团先遣队中的早川支队，乘火车由锦州至朝阳寺。22日在飞机、铁甲车的配合下，向南岭发动数次进攻，遭到守军董福亭旅和义勇军耿继周部的抵抗。23日，二一三团团长邵本良被日本人收买，在前线投敌，遂使北票、南岭两地失守，一0七旅主力退至朝阳、大平房一线。早川支队占领北票，铁道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的装甲列车也进入该地。

日军先遣队尾随早川支队向朝阳前进，途中合并了早川支队，于24日傍晚会同步兵第十一旅团主力，一齐到达朝阳以东以北地区。当夜朝阳城内守军大部分撤走，董旅又有一个营叛变，引敌深入。25日拂晓，日军进攻朝阳，未遇多大抵抗，中午进占朝阳城。第八师团主力也随到朝阳集结。因铁路运输后方补充出现问题，师团长把主力从朝阳出发日期推迟到3月1日。27日，第八师团长西义一郎中将从锦州赶到朝阳，第二天又做了新的前进部署，令挺进队突破后尽快向平泉前进，北路

派一支队由建平直攻赤峰与第六师团配合行动。令骑兵大队沿凌河地区协助挺进队在水泉、叶柏寿附近战斗，尔后继续向凌源一带前进。3月1日，挺进队、骑兵队和师团主力开始前进，当天占领喀左。师团主力到达叶柏寿时遭到三十旅的抵抗，日军约5 000人、飞机9架、铁甲车30辆，陆空联合向三十旅阵地发起攻击，激战六七小时，日军攻击不下，主力绕道去了凌源。三十旅经战斗损失很大，军团又将二十九旅六八四团调来增援。3月9日到达后，同三十旅一起坚守到13日。这时三十旅后撤，六八四团突围后撤到了八里罕、甸子一带。与此同时，义勇军李纯华部也积极配合二十九旅、三十旅的作战。

进攻凌源的日军先遣队，于2日到达凌源东侧阵地，与绥中方向前进的混成十四旅团米山先遣队会合，一起攻击。这时独立八旅、独立十六旅、独立十九旅驻防凌源，但无抗日决心，纷纷后退。2日午前凌源失守，日军主力继续向平泉攻击。东北军撤走后，义勇军郭景珊部在牛河梁与日军混战一夜，击毙日伪军百余名，在日军飞机、铁甲车的配合进攻下，义勇军才不得不退出战斗。

在绥中方向进攻的日军混成十四旅团，27日在白石嘴边门集结，当日占凌南。28日攻击沙帽山后，向凌源乘车前进，先后在庙岭、哈巴气遭到了抗日武装的阻击。2日到达凌源外围，协同第八师团挺进队攻占了凌源，又向冷口方向前进。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

日军是怎样占领开鲁的

陈振廷

“九·一八”事变后，开鲁和东北各地一样，沦为了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开鲁为热河省最北部的一个县，地接奉天省的通辽，是吉黑两省西南部的交界线，在军事上具有很重要的战略位置。“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处心积虑地要进攻热河，若想占领热河，必须打开热河北大门——开鲁。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前两年，吉黑两省义勇救国军（吉林的冯占海、李海青部；黑龙江的邓文谭部）和达旗蒙古抗日救国军，入关经过开鲁，并在开鲁驻扎进行整编，日本军未敢轻举妄动。待这些抗日救国军和义勇救国军进入关内时，日军才加紧了对开鲁的进攻。

当时热河在开鲁的驻军是以崔兴武为旅长的第九旅。1932年冬，日本关东军某部，聚集骑兵300余名，拥有装甲车6辆、大炮3门、飞机6架作掩护，从通辽出发，向西逼进，刚进入开鲁边境道德营子附近，被早已在沼地、密林深处埋伏好的九旅官兵打个措手不及。

道德营子一战，日军惨败而回，但其“亡我之心”不死，不久又采取了迂回的战术，绕道舍伯吐、哈拉毛都方向，从东北方向来进攻开鲁。九旅探知消息后，立即部署兵力埋伏于舍伯吐附近。当日军进驻舍伯吐后，第九旅的骑兵立即包围了敌人，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毙了日军的松井司令，日军伤亡惨重，残敌溃逃回通辽。

日军进攻开鲁两次失败后，改变了策略，采取了用重金收买的办法，终于占领了总面积为4 400多平方公里的开鲁大地。

当时开鲁县普孚号的经理、商务会会长姜明远，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汉奸。日本特务通过姜明远于1933年1月，以30万元金票（日币）为代价，收买第九旅。1933年2月中旬崔兴武得到重金后，率第九旅撤离开鲁，退至林西，让路日本人平安进军。1933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日本侵略军没费一枪一炮，由日军茂木支队长率一支骑兵，长驱直入进占了开鲁城。当时邮政局局长袁益三给日本军当翻译；商、农两会的代表，列队把日军迎进城里。同时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撤下，换上了红兰白黑满地黄的伪满洲国的旗帜。

日军进城后，改组了县政府，由日本人寺田茂七任指导官，提拔姜明远为开鲁县长。旧职员全部留用。因寺田是满铁特务，早就在开鲁设立过满铁出张所。还有个叫资原平三郎的日本人，也是个中国通，还会说蒙古话。所以日本人占领开鲁后，很快就按照意图，把开鲁的一切都掌握在手中。

汉奸走狗的下场总是可悲的。日本侵占开鲁后，又进逼林西。日本迫使崔兴武，将第九旅全部交给李守信掌握，并在多伦为李守信组织了蒙古军，任李守信为总司令，与德王联合成立“蒙疆政府”。崔兴武则下野带领三太太及出卖开鲁所得的30万金票（日币），回老家隐居。不久，崔又被日本人“请出”当了新京（长春）赛马会的会长，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10余年。

（摘自《开鲁县文史资料》第2辑）

十

国联调查团与东北人民的控告

东北爱国人士向国联调查团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经过

刘仲明　张韵泠

一、搜集材料的经过

"九·一八"事变以前，沈阳青年会一些朋友们，常常因事接近，来往碰头，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一个友谊小组，以刘仲明为召集人。"九·一八"以后，骨干联络人阎宝航离开东北，由巩天民、刘仲宜协助联系。

"九·一八"事变以后，河山破碎，小组同人对于东北命运，时切殷忧，每次聚会，必各饮苦水一杯，以示卧薪尝胆之意。其时各地抗日救国团体派来沈阳作地下活动的人员，往往为经济所困，时需当地加以援助。为此，小组同人每人按月捐出月薪20%，作为援助经费，并立有分户帐，由巩天民经管。同时，各小组同人对于各团体所进行的地下工作，也代为设法掩护，给以各种方便。某次巩天民因事入关，小组决定上书张学良，催促他痛下决心，联合真正抗日的各方面力量，早日打回老家。信写好后，由小组全体签名，让巩天民面交请愿。据巩回沈报称：张学良阅书后，极为感动，立时郑重表示，决意联合各方面抗日力量，收复失地。

当报纸发表了国联将派遣调查团到东北进行调查的消息以后，小组立即在刘仲明家召集紧急聚会，参加的有巩天民、刘仲宜、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张韵泠和刘仲明，商量如何

利用这时机有所行动。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集中火力，针对日本在国联所捏造的用来掩饰其侵略东北、制造伪满罪行的谎言，以不可辩驳的事实以有力的揭露。

任务和目标既定，我们就拟定了工作方向、搜集材料原则以及分工办法，并决定必须趁着日本特务对于我们还未加强监视和戒备的时候，迅速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拟定的工作方向，是针对日本以下三个欺骗谬论进行揭穿：

1. 日本军队进兵沈阳，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纯属自卫行为；

2. 日本军队占据东北各城市，是由于中国政府不能维持各地秩序，日本驻军为了维持秩序，保护权益，不得不加以占领；

3. 满洲国之建立，完全是由于东北居民自决自愿，日本无权干涉。

关于搜集材料的原则，我们决定以下两点：

1. 针对日本上述三点谬论，注重事实证据（人证或物证），贵精不贵多，虽有事实、但证据未拿到手的，都不在搜集之列；

2. 特别注意寻找日本发行的报纸或敌伪的官方文件所发表的有关材料，用日本之矛攻日本之盾，使其无反驳的余地。

为了避免日本特务注意，我们决定由大家分头搜集有关材料，不再聚会。所有从各方面收到的材料，都交由巩天民转交给刘仲明。材料的整理编写工作，由张查理、毕天民、刘仲明3人担任，并由刘仲明总其成，最后并请于光元作总的审校；编好后，请曲凌汉打印。

我们进行工作的目标和具体办法确定以后，大家就马上行动起来，分头搜集材料，并联系当时各方面的一些爱国人士协助进行。当时联系的，有伪省政府教育厅长金毓黻、教育会长

兼女师校长林日暄，由女师教员薛兰石与小组接头；农会会长阎模楷，银行界、工商界由巩天民负责；医药界由刘仲明负责。

有些材料的搜集，不是没有危险的。如日军直接给伪省政府的命令，是通过伪省府管卷的爱国分子在下晚班时将文卷带出、当夜拍照、次晨携回的办法取得的。又如伪沈阳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赏金千元的原因，是由巩天民冒险夜入商会取出，赶晒成蓝图的。又如日军张贴的告示，我们是白天在僻静街道处寻到一张完整的，记明地点后，于深夜怀藏水瓶子前往润了下来的。再如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布告，贴在财厅门前，有日军站岗，我们选择阳光最好的一天下午，利用太阳西照、阳光刺眼、岗兵不易向西了望的机会，携带照相机由僻处爬上财厅对面一家商号的房顶（财厅在路东，商号在路西），蛇行到这家商号的高门脸后南端，镜头对准布告，等有来往车辆经过，即利用车声掩护，拨动机纽拍摄。以上这些行动，如果稍不小心，一被发觉，即有性命危险。

各方面所搜集得来的材料，均交刘仲明加以归纳整理，斟酌去取，进行编写。全部整理和编写工作，约用了40天，打印用了18天，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一则白天各人都有工作；再则为了保密，也不能在白天搞这个工作。刘仲明和毕天民、张查理都同住在一院，合力进行，也甚为方便。

二、材料的主要内容

我们编就的材料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汇编，把全部证据都贴在一个大相片簿上，每项证据都编有顺序号码，中文证据都译有外文，并由张查理夫人做了一个黑缎子外衣，上面绣有英文“真理”字样。第二部分是说明书，分作三篇，说明各种证据要点，并依证据来揭穿日本欺骗世人的谎言，驳斥

它们的种种荒谬论据。材料内容简述如下：

（一）第一篇主题为：日本在9月18日进军沈阳，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所谓由于自卫，完全是欺世谎言，所列举的证据如下：

1.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所办的英文报《满州日日新闻》（简称M.D.N）所发表的各项有关报道，最主要有以下三件：

（1）关于日本军部对中村事件决定采取“断然处置”的报道；

（2）关于日本军部特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喜多回国就中村事件磋商“断然处置”的具体办法的报道；

（3）关于关东军参谋长衔军部命于沈阳事变前5日回返满洲的报道。

2. 英国人陶牧师（J. Dorward）关于他的友人于9月18日晚9点10分乘满洲里直达快车准时到达沈阳南站，途中并未遇到任何阻碍的签字证明。

3.《满洲日日新闻》9月20日关于日军占领沈阳、营口、公主岭、长春的报道。

4. 日人所办的《盛京时报》所刊载的日军占领沈阳辽宁省财政厅及东三省官银号的照片（该两机关门上均悬有日本旗，且有日本兵看守。）

5.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九·一八”事变后公布的安民大告示（系木刻印制的，高三尺，宽二尺半，于9月19日上午6点即出现在沈阳西关）。

（二）第二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在东北三省到处侵犯中国行政主权，残杀中国人民的事实，所列举的事实如下：

1. 辽宁省教育厅厅长金毓黻关于日军于9月19日侵入沈阳城后将辽宁省长拘禁，使其无法行使职权的证明书。

2. 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于事变后4日就任沈阳市长的布告。

3. 《盛京时报》刊载的日军司令部委派充任东北各项公共事业机关如铁路、邮政、电报、税局、银行以及学校副首长职务的日本人员名单。

4. 由大汉奸袁金铠署名的东北治安维持会告示（内有“奉日本军命令组织本会”字样）。

5. 沈阳城内各街道行人惨遭日兵枪击的伤员名单。

（三）第三篇主题为：满洲伪国的建立是日本关东军一手包办所制造出来的，所列举的证据如下：

1. 《日本新闻画报》所刊登的“四巨头”建国座谈照片（所谓四巨头者，即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熙洽等四人，本庄繁踞座谈会中央）。

2. 《盛京时报》所载“东北地方自治会”人员名单（据《盛京时报》报道，“东北地方自治会”是请愿建立“满洲国”的主要团体）。

3.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办事手册（该手册内规定司令部各科的工作职责，内载第三科专管“建国”事宜）。

4. 《盛京时报》所载土肥原由天津将溥仪接来作“满洲国”的皇帝的照片及报道。

5. 《盛京时报》所载各地庆祝“建国”游行的照片（有锦州、绥中、营口、公主岭等地，游行群众两旁都有很多荷枪的日兵随行）。

6. 辽宁省立女师林日暄校长申诉日籍副校长威逼学生签字请愿“建国”的声明书。

7. 伪沈阳市政府函谢沈阳市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大会并送千元赏金的谢函蓝印图。

三、递交密件的过程

我们把材料整理编写完了之后，对于如何把这份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所搜集来的证据交到国联调查团的手里，颇费一番踌躇。因为我们料到调查团到沈阳的时候，日本一定要布满警特，若由我们亲自交递，人身危险姑且不论，日特见我们带着一大包材料去见国联调查团，他们一定千方百计把它掠夺了去，那岂不是日本侵略罪行不得揭穿，正义永不得申，而我们大家的辛苦将尽付东流。经过多日的考虑，我们最后决定利用那时的英日关系尖锐化的形势，求在沈阳的英国朋友给我们代交，这样较为妥当。当时大家派刘仲明同沈阳的小河沿施医院院长雍大夫（Dr. W. Young）接洽。雍大夫表示很乐意帮助，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例如他提出：“你们交这个材料，必须有一封用真实姓名签名的信，并且应亲自交到调查团团长的手里，团长才能提交给调查团作为正式文件。若只有材料而有没信，那就等于告密，按照国际法庭惯例，是不予置理的。可是这次你们处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亲自交到调查团的手里，而你们签字的真伪，他们也无从辨别，那只有由我们代为证明你们交信人的真实性，才算完成法律手续，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帮忙。但是，交递该项材料，我不合适，因为我不认得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但我可以为你们求倪博士（Dr. Oniel），他与李顿是至亲，容易和他谈话”等等。刘仲明对雍大夫的热情帮助，代表大家向他道谢。刘回家后写就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谨代表大学教授毕天民、银行家巩天民、医师刘仲明、张查理、李宝实、社会教育家张韵泠等人，将此材料送交贵调查团审阅，借这些材

料你们完全可以了解沈阳事变及以后发展的一切真相”，信末签署刘仲明个人的名字。

3月上旬某日（实际的日子记不清了），倪博士亲自来刘仲明家取那份材料。刘仲明把材料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很严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If I die I die for a great cause）。”倪博士家在法库，他觉着不便把这份极重要的文件带到法库去，于是他就送到沈阳英国领事馆保存，锁在领事馆的铁柜内，他自回法库去了。

国联调查团大约是在4月中旬来到沈阳，住在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即现在的辽宁宾馆）。当时该馆的全部人员、汽车司机以至旅馆附近的人力车夫，全换了日本关东军特务充任。调查团人员到沈阳后，被日本特务严密包围，除了看到些日本摆布的假象外，什么也接触不到；当时伴随国联调查团的中国特派员顾维钧等人，行动也失去自由。

调查团到沈后第5日，由倪博士出名邀请李顿和他的秘书到谭文纶（McNaugton）牧师家晚餐，雍大夫作陪。倪博士即席把刘仲明写的信交给了李顿，并由倪博士、谭牧师、雍大夫等人签字证明刘仲明和信上所提到的几个人都是真实姓名。第二天国联调查团全体人员到沈阳英国领事馆审阅我们所搜集的材料，共审阅了一个下午。据当时《盛京时报》载：国联调查团在英国领事馆审阅了一些材料，颇为满意云云。后来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内提到在沈阳接触了一些医生、银行家、教育家等，就是指我们送递材料的这些人。

四、敌伪于事后的大逮捕

《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由于提到曾经在沈阳接触到一些医师、银行家、教育家等这个事实，自然不能不引起敌伪的注

意。调查团在沈阳被他们所布置的警探层层严密包围，风丝不透，一般人是不容易接触到的，但是他们发现沈阳英侨曾宴请过英代表，认为其中必有文章，于是就沿着这线索跟踪探索。1933 年冬，敌伪于获得一些线索之后就严密地布置了逮捕网，于某夜出动了大批日宪伪警，将他们认为可疑的分子一一逮捕。小组同人除了张韵冷、曲凌汉 2 人以外，全遭捕去。巩天民被捕时，他考虑到纳金分户账若被查出，必将牵累多人，于是急中生智，拿出帐本，当面向巩夫人说："我此次离家，不定多少日子，家里这本柴米帐，你接着写吧。"说完交了过去。巩夫人接过，顺手放在格子里。这时宪警嫌他罗嗦耽搁，怕耽误了逮捕其他人犯的时间，也没有闲功夫看他的什么柴米油盐帐，就紧催他走了。他们走后，巩夫人赶紧打开一看，分户姓名尽是眼前朋友，才知道所关重要，马上隐藏起来。天明，捕人消息传出，张韵冷立刻到巩家去，急问巩夫人有本帐拿走否？她悄声说了经过，领他从煤堆子取出，装进提袋，交韵冷由后门带出，当夜作了处置。

更为严重的，是当夜在同仁医院逮捕刘仲宜的时候，从梁上搜出了一台印刷机，又在写字台里搜出共产党抗日宣传品。这一来，刘仲宜马上便被直接送日本宪兵队。巩天民被捕后，伪警厅发觉他曾入过关，即引渡到日宪兵队，接着刘仲明也被提到宪兵队去了。

同时被捕的，施医院除毕天民、张查理 2 人之外，记不准的还有五六位；青年会有黄毅然、刘毓伦；女师有薛兰石；教会有刘国华。沈阳英美烟公司、锦州青年会、吉林青年会也都有人被捕入狱。

敌伪这样无边无岸地大批捕人，一时造成的恐怖世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小组同人漏网在外的，每天都作入狱准备，

得一天自由，就为被捕同人奔走营救，探听消息。

刘仲宜自到宪兵队，即受一连串的酷刑审讯，如疲劳审讯、电流通脑、灌辣子水、滚铁板、卧短凳等，简直把他折腾疯了。所有被捕的人，胸前都挂个“反满抗日犯”的布条子。

案子始终秘密进行，从未宣布。经过了半年以后，被捕的人有的被释放出来了，接着陆续放回，较严重的不到8个月也都出来了。这个案子似乎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案结后，小组同人除少数因业务不能离开沈阳的以外，多数都设法入关，转到后方，参加抗战去了。

巩天民在警务处受审问时，有一个日本特高科特务岩塚对他说：“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罪大恶极，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帮助你们建立新国，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并且向国联告我们，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的丢脸，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事后巩天民谈起这个日本特务所说的这段话，刘仲明说：“这恐怕是特务把我们的行动太夸大了吧，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那我们可真是‘死有余荣’了。”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林耀山冒死进见国联调查团

林瑞联

（**编者按**：林耀山，字日暄，梨树县梨树乡人，192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数学物理部。历任教师、辽宁省立第一中学学监、师范学校校长、辽宁教育会会长、陕西省山阳县、商县县长等职。1945年光复后，曾任梨树县县长、辽宁省

教育厅长、辽北省议长、国大代表，全国解放前夕去台湾。本文是其女儿、河北省政协常委、省侨联副主席、河北财经学院讲师林瑞联所撰。）

我家是梨树县红杏山人（今梨树乡中安堡）。家父林耀山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数学物理部。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时，他正在校读书，是北京高师的学生代表，“五·四”那天游行队伍攻入曹宅，他也正在其中。毕业后在辽宁省教育界做事，直到“九·一八”事变第二年。

这里要记述的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所作的几件事。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这是应该做的。

1931年，家父在沈阳任辽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兼辽宁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长。

9月18日晚11点左右，日军以演习为名炮轰北大营，第二天占领沈阳，随即筹划炮制伪满洲国，劫持了末代皇帝溥仪。1932年春，溥仪粉墨登基，日军把一个伪满洲国强加给东北三省人民，企图割裂中国，然后并吞。

事后，我国政府曾向国联提出控诉。控诉日军武装侵略中国，以武力制造了伪满洲国，并坚决反对满洲国。而日本方面宣称：满洲国的成立是满洲国民的自决。因此，国联派了一个调查团到东北实地调查，这个团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领，即后人称之李顿调查团。

听到这个消息后，家父约了几个爱国及主持正义的好友，集会商议，一定要让调查团听到真正的中国人民呼声，得到日军武装侵略炮制伪满洲国的证据。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搜集资料的领导小组，分头行动，定期聚会，会址设在沈阳盛京施医院一位英国大夫家中。

家父负责搜集省政府和外县的有关资料。因为他有很多学

生帮助，工作进行很顺利。从本庄繁进占沈阳第一号大布告起，到日军侵占各地，残酷镇压百姓，胁迫群众，伪造民意，策划伪满洲国种种罪行，都有确凿的证据资料，每份资料拍了照片，照片下面还有英文说明。搜集资料工作很快完成了，各方面的资料集在一起，装订成册，准备呈送给李顿调查团。

在李顿调查团到沈阳前两周，一切工作都基本就绪，最后一次聚会时商定：这份资料报告书由家父负责签署，因为家父被选为辽宁省教育会会长兼文庙奉祀官，是合法社团和教育界的当然代表。由医院英国大夫把李顿约到家里以聚餐为名，举行会谈，家父事前在那里等候，李顿来时，送交那份准备好的资料报告书并当面陈词。

可是李顿调查团到沈阳后，立即被日军严密控制起来，被安排到南满铁路大和旅馆下榻，不许逾越警卫线。原来的谒见会谈计划全部落空。他们又商议，由英国大夫先持资料报告书送去，会谈陈词一事待接见各界代表时再相机行事。

与此同时，家父还动员学生到各县发动群众给调查团写信达数千封，向调查团表明民众坚决不承认满洲国。这些信，家父设法由邮政总局直接送给了调查团，免遭了日军的检查没收。

过了几天，教育厅通知家父，调查团邀他会见。那天家父先到了省教育厅，厅长和日本顾问坪川告诉他，见到调查团，一定要表达教育界欢迎满洲国成立。坪川交给他一份事先炮制好的陈情书，并严厉训斥：这份陈情书就是教育界的意思，你当面交给调查团！坪川象押解犯人似地送家父到大和旅馆。先到日本随团大使处，审问了一番，又到日本站警察办公室，同样审问了一番，又问他为什么要见李顿调查团，他说呈送陈情书，最后才被领到调查团候客室。家父拿张名片交给一个服务员，请他传达并求见李顿。这个服务员刚进去，坪川就告诉家父，这

个服务员是日本署长化装充当的。少时，出来一人问哪位是林先生，请进去。家父正要进房，坪川立即上前介绍来一个人，说是代家父请的英语翻译，又向调查团的人说林先生不会讲英语，特地带来这位翻译。这位不速之客正要同家父一齐进去的一刹那，被调查团的人拦在门外，说今天同林先生讲中国话，不用翻译，才摆脱了他。进屋后，见到李顿的亲信秘书，说李顿特忙，派他来见，要林先生把要说的话无保留地说出来，他会如实转达李顿，同时一定为林先生保守秘密。家父当时激动万分，一腔热血沸腾，个人安危早已不顾了。先问他见到那份资料报告了没有，回答已经收到了，李顿爵士十分重视，藏在领事馆的保险柜里。家父随即侃侃而谈，主要内容是：一、日军侵占东北出于预谋而不是自卫；二、成立伪满洲国是重施灭亡朝鲜的故伎，先让东北三省脱离祖国，然后侵吞之；三、伪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用武力制造出来的傀儡，完全是日军操纵支配，每一机构都有日本人，名为顾问，实为首脑；四、东三省人民都是中国人，竭诚拥护国民政府，绝对不承认，更不接受伪满洲国；五、前几天农、商代表送来的陈情书都是日本人制造并迫使他们送来的，绝不可信。随即拿出坪川要他递交陈情书说，这也是日本人制作好要我送来，与前面的一样，你们相信吗？刚才日本人说我带来翻译，其实并不是，既无此事，更不识其人，而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七、现在东北各学校都有日本人任教员，把英文课改为日文课，还篡改了中国历史，教育界全体师生坚决反对，更坚决反对伪满洲国；八、恳请李顿爵士主持正义，对日本严加制裁，还我东北！

这是真正中国人的心声！

谈话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家父讲完，李顿秘书高兴地说："你的报告和你今天的陈述，是我们到此地后所直接获得的真实

资料，极为宝贵。”

家父告谢出来后，坪川仍在候客室等候，脸色极为阴沉难看。他先把家父领到警察署办公室，一警官昂然上座，声色俱厉地审问家父：见调查团都说了些什么，调查团问了些什么，答了些什么。家父自觉为民族、为国家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心情很平静，态度从容，并无惧色。他灵机一动，竟照着日人炮制的陈情书内容，足足编了两个钟头的谎话；座上有一人认真记录。这一关过去后，又领他到大使办事处，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复，又是两个钟头，又有人认真记录。出了大和旅馆，家父以为可以回家了。可是坪川竟把他送到了东北日军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这次非同前两次，审问家父时，坪川都是侧立侍候，坐在上首的日本军官仍然追问，向调查团说了些什么，问了些什么。家父又把谎话重复了第三遍。幸好三遍如出一辙，暂时混了过去。日本军官训斥了他一顿，才许回家，到了家里时已是夜间了。

这年5月份，家母生下了我，因为时常替家父担忧，身体虚弱，家父只好深居简出。为了纪念他此次为民请愿、冒死进见国联调查团之举，给我起名叫瑞联，也包含了对国联的莫大的期望。

秋天一日，国联调查团李顿报告书发表，各报均有登载。其中说到在沈阳接见各界代表，有的当面告诉调查团：“东北人民反对满洲国，满洲国是日本人用武力强行制造出来的，强加给东北人民，绝非民意”等等。朋友们劝家父：调查团接见各界代表，只有你一个没有翻译在场监视。日本人肯定认为这些话是你说的，最好离开东北吧。这时家母身体稍微康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1932年秋末（或冬初）我们经营口到了天津。

伪满洲国初筹成立时，曾几次邀请家父出任伪教育厅长，都

遭到拒绝，后来又请他出任伪满洲国负责文教的官员，家父说："我若出任主持文教部，一定会逼我先改历史，消灭民族文化，我将是千古罪人，还有何面目再见我的同胞。"坚辞不允。当时因为等候李顿调查团到沈阳，所以冒险留了下来。待完成他应做的事情以后，才离开故乡到了关内。

这件事离今已多年了，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了。人民从未忘记历史上为民族为国家做过任何好事的任何人。家父虽然离开大陆多年，但家乡父老仍在传说着他进见国联调查团的这段佳话。家父也以他曾为民族为国家做了这些该做的事情而自慰，时常对我们讲起，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寓意勉励我们。

（梨树县政协供稿）

一份反对成立"满洲国"的《递李顿书》

齐大非

我的父亲齐东野，又名齐国昌，"九·一八"事变时，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11月下旬齐齐哈尔沦陷后，我父亲和一批爱国者随马占山撤至海伦一带坚持抗日。

1931年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就地调查研究中、日冲突原因。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成立，由英国代表李顿爵士担任团长，故称李顿调查团。2月初由欧洲出发，于3月14日到达中国。

无论国际联盟是否会主持正义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调查团来东北就地调查中、日冲突原因这件事本身在客观上无

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起了鼓舞和推动作用，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极度的惊恐和不安。当时东北所有的抗日武装都在此时发动了反攻。许多爱国者都采取多种形式和不同渠道表达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反对成立满洲国的意志。我的父亲也于1932年3月间，秘密潜回齐齐哈尔进行发动群众反对成立满洲国的工作。一同发起这一运动的除我父亲外，还有张汉民、赵立功、张聘儒等几个人。他们起草了一份反对成立满洲国的《递李顿书》。内容大意是：9月18日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一个步骤，日本军队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满洲国是日本统治东北的工具；溥仪是日本挟持下的傀儡；东北人民坚决反对成立满洲国。这份《递李顿书》起草后，一共有汉、满、蒙、回、朝鲜、达斡尔、鄂伦春等各族代表50人在上面签名，等待向李顿调查团递交。但是调查团却由于受到日本方面的阻挠迟迟没有到来。原来在调查团访问沈阳、吉林、哈尔滨时，许多中国人曾不避危险的接近调查团陈述他们的愿望。甚至一些满洲国官方组织的请愿团人员，背地里告诉调查团，他们是被日本人强迫这样干的。这使日本人大为震惊和恼怒。而齐齐哈尔则是首先奋起抗日的地区，反日情绪十分高涨。日本侵略者害怕调查团抵达齐齐哈尔会出现更大的麻烦，借口那里发生了传染病，借口铁路沿线有战事无法保证调查团的安全等等，提议调查团免去这次访问。李顿调查团拒绝接受日本的建议，执意要按计划到齐齐哈尔进行调查。但日本人继续制造困难，说调查团一定要去，他们只能照顾少数人，不照顾中国顾问和整个调查团。同时在齐齐哈尔加强戒备，监视调查团的活动；张贴布告，告知人们“凡未得政府之允许者皆不得与调查团会面”；组织伪请愿团，准备递“拥护”满洲国的请愿书。而且还在调查团到达之前特地组织了一次“欢迎仪式”的实地演习，以

观察戒备效果。最后经过调查团多次交涉，拖延了很长时间，直到5月下旬调查团才得以乘飞机抵达齐齐哈尔。

我父亲在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若要会见李顿调查团只得采取秘密的方式，当时是得到一位叫孔罗瑞的美国侨民的热心帮助才得以实现的。这位朋友是约老会教士，曾聘请我父亲做他的汉文教师。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持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父亲的抗日行为是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的。孔罗瑞是以美国侨民的身份去找调查团取得联系的，告诉他们有一位中国人民的代表要求会见，于是我父亲在李顿调查团下榻的龙江饭店受到了接见。接见是秘密进行的，由孔罗瑞当翻译，父亲向调查团当面陈述了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事实；揭露了日本成立满洲国的阴谋；申明了中国各族人民反对成立满洲国傀儡政府的立场。并亲手将有50名各族人民代表签字的《递李顿书》交给了调查团。调查团中、英、美代表当时是倾向中国的，他们很认真地听取了我父亲的陈述。还询问了许多问题。会见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一直到黄昏才结束。大约有两三个小时。李顿调查团能够秘密接见普通中国人，并且详细询问各种问题在当时是鼓舞人心的。

父亲离开龙江饭店时天色已晚，见有一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在走廊和门外盯梢。父亲没有直接回家，设法甩掉了敌人的跟踪。

那天夜里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看到父亲和母亲正在收拾东西，他们嘱咐我说：咱们家改姓祁了，爸爸不叫齐东野叫祁国昌。他们把所有写齐东野字样的书信都销毁了，还将一些书籍或笔记本写上了祁国昌的字样。后来母亲又特意在我的书包上绣上祁恩黎三个字。当时我们是住在永定街南头王百川杂货铺的后院，为了摆脱敌人监视，搬家到市立医院后身的全福胡

同。

尽管做了些隐蔽工作，我们仍然没有摆脱日伪特务的跟踪。当国联调查团于6月9日离开东北后，他们立即采取了镇压行动。一天早晨我们还没有吃早饭，突然闯进一伙便衣特务，一个日本人，三四个中国人。日本人坐在那里不说话，由两个中国特务盘问我父亲，结果没有问出破绽，就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我母亲趁着敌人忙乱的时候暗中叫我快到麦理贤教士那里去送信，请他们设法前来营救。当我陪着麦理贤回到我家时，父亲已经被抓走了，家里翻的乱七八糟，母亲一人正在落泪。父亲究竟被什么衙门来的人抓走了，又押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全然不知。此后虽多方托人打听，仍然杳无音信。大约过了半个多月，一天晚上忽然来了一位工人叔叔，他自我介绍说姓刘，以做木工为生，被叫去在日本宪兵队修理房屋，在一间破房子里他看见躺着一个受刑很重的人，趁敌人不注意他问这位受刑者需要什么帮助，受刑者委托他按照地址送来一个条子，说着从衣缝里掏出一个叠得很小的空烟盒纸，送给了我母亲。当母亲看到是父亲的亲笔字时惊喜异常，读了信才知道父亲被关押在日本宪兵队，逼他承认是齐东野，父亲始终没有承认，嘱咐母亲赶紧设法找铺保证明此人是祁国昌不是齐东野。

原来，父亲那天被抓走后就送到日本宪兵队，关在一间地上有积水的破房子里，天天过堂审讯，我父亲一口咬定叫祁国昌，不是齐东野。于是敌人使用了极其野蛮残酷的刑法，差不多所有的刑具都使用了，结果还达不到目的。便使用了最难以忍受的酷刑，这种酷刑不用刑具，行刑者是会武功的日本彪形大汉，用手攥住受刑者的双手背在身后，然后运足力气把人抡起来使劲向前摔去，不消两三下全身关节就没有不受伤的，五脏六脏也没有不出血的。这是日本人的发明，在中国从未有过

这种刑。父亲不招供，酷刑就这样天天持续着。

很快，我的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的事，在这个城市里传开了。许多亲友都来关照，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也前来慰问，还有以某学校、某商号的名义送来衣物、钱款。营救父亲的活动在多方面进行着。魏司道、麦理贤、孔罗瑞三位美国侨民找日本当局讯问：他们的汉文教师祁国昌突然失踪，下落不明，请当局予以查找；工商界也开展了营救活动，瑞林祥经理秦鹤年联络了几家商号出具铺保，要求允许祁国昌保外就医，听候传讯不误，军政界也行动起来，一位曾在吴俊升部下当过军需的薛鸣皋是慕名前来参加营救活动的，他有一位朋友叫涂全胜在马占山军队当旅长，4月2日马占山从齐齐哈尔拉出队伍通电抗日时，涂全胜适逢有病住院未能随马占山撤走，仍住在市立医院。薛鸣皋说服了涂全胜出面营救我父亲，他直接向日本宪兵队交涉，并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人不是齐东野。

由于敌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由于父亲坚贞不屈；由于各界人民多方营救，日本宪兵队只得把我父亲放了出来。这时已到了深秋时节。父亲出狱后，一身伤残，行动困难。为了避开敌人的监视又从全福胡同偷偷搬到比较偏僻的安寿胡同。在这里养伤治病半年多，才能够下床活动。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的政策，即扩大一步侵略，观望一下中国和各国的反应，然后再推进一步，再观望一下。这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怀有狂妄的侵略野心，但仍惧怕中国人民的反击和各国舆论的谴责。然而蒋介石不许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各国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正是这一姑息养奸的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得逞。1933年日本一方面在国际上反对国联大会的裁决并宣布退出国联，一方面在它占领下的东北加强了对抗日军民的残酷镇压。我父

亲预感到必须尽快离开东北，于是全家逃亡关内。

象我父亲那样敢于冒着危险、冲破阻碍向李顿调查团递交反对“满洲国”的书函、信件、请愿书、申诉贴者为数甚多。全系工人、农民、教员、学生等普通民众自发的反满活动，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李顿调查团仅在东北各地就接到反对成立“满洲国”的书信达1548封。这充分反映了东北人民反对国家分裂的愿望，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我在国联调查团的一段经历

顾维钧

临近1931年底，国联行政院决定派遣委员会调查满洲的情势。1932年1月12日，国联行政院核准任命5个委员，团长是李顿爵士……我被任命为中国代表，正如日本任命吉田为日本代表一样，那时吉田是驻土耳其大使。……

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出发，我们到了吉林。我记得在火车站上，有一大群日本军民代表和所谓满洲国政府的代表。在中国人中间，我注意到沈瑞麟先生，他在北京当过我的次长（他当时是伪满洲国的外交大臣）。

日本代表和所谓满洲国代表迎接了调查团成员，而且给他们准备了汽车。当然也给日本顾问和他的秘书们准备了汽车。于是我问我的一个秘书，我的车在哪里。我发现，调查团的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走了，我和我的秘书们被留在车站外边。有几个中国人看到我难堪的处境，其中一位过来对我说，他以前见过

我．他和他的朋友可给我找一部汽车．把我和我的秘书送到调查团住的旅馆去。我很高兴弄到交通工具，但是我怕日本人会给这些帮我忙的中国人找麻烦。我们被送到驻军司令部的接待大厅，我们刚坐下，一群日本军官身挎军刀走了进来，他们都不搭理我，好象我没在似的。

后来我被安排到调查团及其工作人员住的旅馆．我在那里的整个期间，透过旅馆窗户所看到的情景，使我深为感动。调查团得到通知，早晨某个时候要为他们举行公开欢迎会。我想是在早晨10点钟，我看见成百上千的人，也许有2 000名学生，大部分来自小学和中学，每人手拿一面旗帜——一面日本旗或一面“满洲国”纸旗向调查团住的那条街走过来。在他们的两边，每隔几步，就有一行显然是身穿便衣的日本人。他们看来很象是日本在满洲的秘密情报人员，他们目光逼人，面色严厉，表情很不正常。

队伍停在调查团住的旅馆门前。调查团的人都走出去。有一个中国人“代表中国人民”呈递一份请愿书。沿着欢迎队伍，约有15至20名日本人，队伍旁边的日本人叫：“挥动旗帜！”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男女孩童很不情愿地开始挥动，完全没精打采。然后奉命喊些“满洲国万岁”之类的口号。那是很令人伤感的事，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些年轻人虽然在做别人叫他们做的事，但是完全理解它的意义，他们只是依据日本人的命令行事，被驱使来递送支持“满洲国”的请愿书。这些青年脸上不但表示毫无兴趣，而且表示一种不是悲观就是愤恨的感情。我从旅馆的三楼目睹了这一情景。

午餐时我们受到款待。因为我属于陪同调查团来的人员，也被邀请赴宴，但是没有一个日本人理我。他们都在集中招呼调查团。即使我的同事日本顾问也好象看不见我出席似的。

在吉林停留期间，我的一个仆人在街上从一个中国人手里接到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的是："我们在请愿书上向调查团所说的话是日本人口述的，我们并不同意。我们真实的心情是……（如此这般），你们会在这信中发现我们真正的感情。"调查团所到之处，都重复出现这种事。

我们从吉林到了哈尔滨，计划在那里停留几天。实际上待的时间较长，因为松花江北边已发生战斗，在旅馆里几乎通宵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半夜里我从旅馆的窗户外望，可以看到一长列日本坦克和装甲车开去和马占山、李杜率领的中国军队作战。事实上我们一到达，一个中国军队派来的人就同我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我，中国军队就要向日本人进攻，要同日本人战斗到解放东北为止。他们要调查团知道，东北人民绝对不愿生活在日本傀儡统治之下。战斗推迟了调查团到齐齐哈尔去的日程，也使得日本人对代表团进行了监视，对我的监视更加严格起来。我通过跟随我的4个人继续接到秘密的请愿书和信件。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我和端纳先生及何士先生——一个是澳大利亚人，一个是加拿大人一直在一起。由于是西方人，他们能够有较多的活动自由去接触哈尔滨的一些外国见证人，查明实际情况。他们发现，尽管日本人控制着哈尔滨，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并无信心，因为中国军队集结在松花江的北岸，日本人预计中国军队会渡江进攻哈尔滨。

因为我有每天下午以散步当作运动的习惯，所以我每天去公园走走。有一天清早，我的随从之一（过去在警察局干过事的北京人）向我报告，哈尔滨的一个警官托他告诉我，那天早晨（实际是每天早晨）一个日本军官和中国警官（有时和一些做情报工作的白俄和朝鲜人）开会商量阴谋暗杀我，所以要求我不要到公园去散步，因为他们已发现我的习惯。我很为这个

报告担心，因为我知道日本人密谋下此毒手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我又觉得有几分奇怪，疑心日本人果真敢这么干！我对随从说，如果我由于这个警告改变去公园散步的习惯，日本人会说我这样做是屈服于他们的恫吓。所以那天下午我同比平常更多的人到公园去，除了随从还有两个西方朋友端纳和何士。在公园里没有遇到任何危险，但是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情景。在一定距离之外，当我走这条路时，另一方面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中国人，他们注视着我并试图接近我。我觉得很奇怪。由于这些人是年轻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也许要同我谈话，所以我转到他们的方向，我们走在两条道路上。但在我转到他们走的小路去之前，有四五个日本人从不同方向突然走上来堵住他们的路，后来他们把这些中国人带走了。所以我说："看，我是对的。"很多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他们要接近我，告诉我一些事。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因为我确信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同一天晚上的半夜时分，我正要上床就寝，我的随从张某诉我，有一个从警察局来的中国人要见我，亲自告诉我一些事。我说："你认识他吗？"他说："是的，我在北京时认识他。"

当年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警察力量薄弱，于是从北京征募人员来加以充实。这些人都是在北京由一个名叫曼德的挪威将军训练出来的。那时曼德受中国政府雇用，在北京办了一所用新式方法训练警察的学校。因此，不少城市从北京招募警察去当地工作。即使在上海，也有受过现代化训练的北方警察。曼德在北京十分知名，他是在清政府下面从事工作的。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人，他半夜里来了，要见我，我问他："为什么你来得这么晚？"他说因为到半夜他的同事都回家休息了，他来看我不会引起注意。由于在北京见过我，所以在这里看到我就认出来了。他叫我总理。他说他要来告诉我，那天早

晨日本人原来已经决定行刺，但是公园里碰到三个中国学生要同我接触，日本人的行刺计划受到牵制，因为日本人不愿有中国人作见证。所以他请求我再也不要去公园。我说散步是我经常的习惯。接着我问他："你为什么来?"他说："这是'满洲国'，但是我的心仍然向着中华民国。虽然我在日本管辖下的警察局里当差，我总想着中国。"

所有这些清楚地向我表明这一事实：东北人民除极少数同日本人有特殊利益的人以外，全都反对日本人。我可以说99.9%的东北人民反对日本人。这是经调查团肯定了的看法。调查团自己派人去市里不同地区、甚至乡村会见懂事的农民和商人。调查团人员都深信，日本人说满洲国是中国人倡议创立的，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国际联盟处理
"九·一八"事变前后经过

吴秀峰

我于1928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应国际联盟秘书长聘请到日内瓦国联秘书厅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曾参加过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的调查工作，现将当时情况记述于下：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与国联的关系

国联是根据第一次世界战争后凡尔赛条约而成立的。当时

中国因为抗议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占领的胶州半岛移交日本而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中国虽是国联创始国家之一，中国代表顾维钧也曾参加国联宪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但中国成为国联成员国是根据圣日尔曼对奥地利和约而不是根据凡尔赛对德和约。

从1919至1927年间，中国与国联的关系极为一般，有可记载的只是中国曾几次被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由于中国多年深受鸦片的毒害，所以成为国联禁烟委员会成员之一。又由于中国北洋军阀时代的财政贫乏，应缴国联的会费或延期不交或交而不够，所以名誉很坏。

1927年以后，中国与国联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发生革命，北洋军阀政府被推翻，一度使帝国主义国家惶恐不安。到了1927年，蒋介石组成的亲西方的南京政府，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相继承认。1929年，国联就派遣特使爱文诺正式访问南京政府，借以联络感情。其时我到国联秘书厅工作不久，也奉命随行。此行结果，打通了国联和中国技术合作的道路。后来由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负责促进双方合作的具体工作。拉西曼取得了宋子文的信任，使合作范围扩展到卫生、公路、水利、农业、行政、教育各方面。国联先后派来中国的专家为数不少。其时旧北洋政府积欠国联的会费达到700万瑞士法郎，国联秘书长宣布国联大会将此项欠款用于双方的技术合作，其实不过是为了保存中国体面而用的外交语言罢了。

国联理事会受理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申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这对国联是一个打击，在它历史上是一个衰亡的关键。

日军进攻沈阳的消息于9月19日清晨传到国联秘书厅，国

联情报部长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也立刻转告那时南京政府派往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和王家桢。施、王旋亦收到南京政府训令，于9月21日，根据国联宪章第11条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宪章。中国代表要求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方面密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另方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说政府已将日本侵略东北事件提交国联要求处理，相信国联必能主持正义，制止日本侵略。

国联理事会为此，于9月22日举行会议。施肇基报告理事会说：目前形势比数日前当他提出申诉时更为恶化，战争已从沈阳扩展到其他城市，连较远的长春也遭到日军炮击。他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相应行动，并声明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国联为此作出的任何决议。

日本代表芳泽宣称，日军行动仅是一个局部事件，日本政府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谋求解决。他本人认为如果国联鲁莽从事介入其中，这会激起日本人民的愤怒，使问题更难解决。他最后说，由于尚未收到政府训令，不能正式表示其他意见。因此，他要求理事会暂时休会，等候日本政府训令。

日本代表此举，显然有意拖延时日。理事会无可奈何，只好接受芳泽的提议。它授权主席（Ascala Zamora，前西班牙共和国内阁总理）与中、日代表保持接触，并将理事会讨论经过通知美国政府。

当时美国由于自己是开罗非战公约和1922年华盛顿9国条约的签字国，对于东北事变和国联的受理颇为注意，它表示在处理中日纠纷问题上愿与国联合作。但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涉及具体行动又矛盾百出。这时在日内瓦的各国代表以为救急

办法是由国联派遣一个由各国驻华官员组成的调查团去沈阳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和目前情况。中国代表马上正式提出这样的要求。日本代表立即表示反对。英国代表薛西尔（Lord Robert Cecil）认为如果得到美国同意派员参加，国联可以不顾日本的反对而决定照办。但美国国务卿史迪生（Stimson）认为此举会激怒日本军人，使日本内阁对于军部更难控制，因而表示反对。史迪生要求国联速使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美国政府这种态度，实际上鼓励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因为日本当时最顾虑的是美国与国联密切合作（实际上等于英、法、美合作）对付日本，现在则勿须顾虑了。

3天过后，芳泽向理事会报告他已收到日本政府训令，说日军在9月18日夜的行动完全出于自卫，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并无领土野心，已将大部分部队撤回到南满铁路的范围，并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时，再将其余部队撤回原驻地点。最后说日本政府希望与中国直接谈判，目前国联最好避免干涉。

施肇基答复说，中国方面对于保障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已经完全做到，日方毫无理由不立即撤兵；只有当日军完全撤退之后，中国才能与日本直接谈判，在此以前是不可能的。

熟识日本当时情况的人都知道若槻内阁不能控制军部，答应撤军不过是一句空话。但理事会的大国代表却以为日本政府有此声明，最少对它本身来说是有诚意的，只有希望形势能够如愿地发展。因此理事会于9月31日一致通过（包括中、日代表在内）一项决议，重申日本声明在东北并无领土野心，日本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即将军队撤退。决议呼吁中、日两方尽力避免形势恶化，并决定于两星期后复会。至于派遣调查团一事，由于日本反对遂作罢论。理事会希望各国政府训令各自的驻华武官或其他官员就地调查实际情况，并将

调查所得转由各本国政府报告国联。

接着各国政府也训令驻华官员进行调查，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愿触怒日本，未将收到的调查所得情况转告国联。国联理事会关于中、日问题的首次会议至此告一段落。

国联理事会对
中、日问题的审议和美国的参与

9月31日理事会会议闭幕后，东北情况日益恶化，日军长期占领东北的野心更加明显。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或强迫东北地方中国官吏背叛祖国，积极组织在日军控制下的地方伪行政机构，其目的在于完全消灭张学良地方政权。关东军司令本庄甚至宣布撤销对张学良地方政权的承认。这时张学良已将他的指挥部迁往锦州。10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锦州，并投下传单勒令锦州居民背叛祖国，“否则会受严重的惩罚。”

这时，日本政府的态度矛盾百出：一方面进行所谓竭力设法控制军部的活动，并发表声明说关东军对锦州的行动，事先未得到政府许可，轰炸锦州是错误的；另方面，又通知国联说，撤军条件不限于保障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要中国于日军撤退之前承认若干基本原则。所谓基本原则是指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日两国举行无休止的直接交涉以拖延时日。日本政府还把中国人民抵制日货与日军侵略中国联系起来，胡说抵制日货就是破坏开罗非战公约，因此日本为了自卫，有权采取一切报复行动。

日军轰炸锦州之后，国联理事会于10月13日在巴黎召开会议。适值理事会在职主席（西班牙外交部长）因事不能出国，继任主席轮到法国总理白里安充当。在一些人眼里，白里安是当时欧洲有名的政治家，因此他就任理事会主席，一时对国联

起了打气的作用。同时美国政府也宣布决定派遣代表参加国联理事会会议。10月5日史迪生致书国联秘书长，要求国联尽其职责使中、日纠纷得到解决，并答应给予国联一切襄助。白里安于听取中、日两方代表意见后，向理事会建议正式邀请美国派员参加理事会会议，理由是中、日纠纷既与国联宪章有关，亦与美国签字的开罗公约有关，所以接受美国合作是既有理由也有效用的。

在理事会秘密会议中，日本代表芳泽以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为理由，认为此举违背国联宪章，反对邀请美国参加会议。实际上，日本顾虑的是美国与国联合作，鼓励国联对日采取积极行动。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观点而言，芳泽的反对并非毫无根据。这在当时是一次典型的外交斗争。如果局面不是如此严重，理事会或许会要求海牙国际法庭予以讨论和表示意见。因为除了美国是否有权参加国联会议的问题以外，另一个法律难题是，邀请一个非会员国家参加国联会议是属于手续问题（多数赞成便可通过），抑或属于本质问题（需要全体赞成，即包括日本在内，才能通过），也要由海牙国际法庭加以解释。可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正在进行，时局紧张不能拖延。除德国外，其他理事会成员都不愿让一个复杂繁琐的法律问题，耽误大事，既失美国体面，又使中、日纠纷拖延不决。理事会乃不顾日本的反对，把邀请美国参加作为手续问题进行表决。投票结果：13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终得通过。美国代表基尔伯（Gilbert 美驻日内瓦总领事）遂于10月16日参加理事会会议。一时世界舆论以为国联既得美国支持共同对付日本，又得法国总理白里安主持会议，一定会使日本对于进一步侵略中国有所顾忌，因而国联代表们一时也充满了乐观情绪。

然而这种乐观很快就消失了。原来美国外交最易受到国内

两大政党政治斗争的影响，在传统上，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是最不稳定的，它的诺言的价值是最低的。史迪生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孤立派的攻击，竟然指示基尔伯不得参加国联对日本采取具体行动的讨论。美国这种翻云覆雨的作风，顿使国联十分失望。

理事会根据日本前次诺言，要求它答应在一定时间之内把它占领东北的部队撤回原驻地点，并说明现在撤军的条件。这又遭到芳泽的拒绝。白里安于是在10月24日向理事会提出一个草案，重申9月31日决议原则，但增加两条，即：(一)要求日本马上开始撤兵，并于理事会下次开会以前，即三个星期之内撤毕；(二)在日军完成撤退时，中、日两国应即开始直接交涉，以解决两国纠纷。但日本既无意于撤兵，更不愿等待撤兵之后才开始交涉，芳泽对此草案叫嚣反对。

同时，大国领导集团，尤其是英、法方面，故意制造一种新的法律理论，竟说根据国联宪章第11条规定，理事会一切决议应得理事国家包括当事国在内(事实上指日本)一致通过，才能发生效力。这种论调是违反宪章原来的精神和1925年国联调解保加利亚和希腊冲突的先例的。不过在外交史上对国联公法的解释时常取决于强国实用主义，而不取决于真理。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强国绝对不愿由于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冒与日本作战的危险。它们只能在战争边沿后面，希望通过国联机构来调解中、日的纠纷。实际上美国和英国正过着经济严重危机的日子，法国也面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重大威胁，它们自顾不暇，哪能为中国火中取栗呢?!

中、小国家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看到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国联能够经得起考验，忠于自己的宪章，实行制裁日本。但这是脱离现实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做到。它们于失望愤恨之

余，还得无可奈何地接受大国的摆布。

国联理事会于11月16日在巴黎法国外交部举行会议。其时日军在中国的侵略行动又进了一步。日军在东北继续向北推进，占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准备完成对整个东北三省的占领；又在天津制造事件，与中国发生冲突。日本侵略中国的目标，显然已超越东北而扩展到长城以南。这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权益直接受到威胁。尽管如此，英、法和美国也不愿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

在此情况下，如果根据法理，国联理应按照宪章第15条的明白规定。不需当事国家（主要是日本）同意，迳可采取制止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措施。这是中、小国家所期望的。但是大国仍然认为这样过于冒险。甚至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此也不热心，原因是它恐怕在经济方面制裁日本，将会导致日军更大规模的进犯。

这时，日本代表芳泽先以个人名义向国联建议，派遣一个调查团去东北和整个中国，调查中、日纠纷背景和目前情况。日本此举的目的，显然在于拖延中、日纠纷的解决。但国联本身早已显示懦弱无能，舍此别无其他更好的办法。另一方面，有些代表认为，有了一个重要的调查团去到中国，或可起着阻止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作用。这种意见终于被多数代表所赞同，美国政府也表示拥护。

11月21日，芳泽以日本政府名义，正式提议由国联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调查上述情况。施肇基发表声明说，除非日军完全撤退，否则中、日纠纷不能解决。关于派遣调查团一事，他也同意。这个提议为各方一致赞同，白里安和他的助手随即起草决议，这里大家特别注重关于调查团的任务的规定。由于芳泽讨价还价拖延时日，草案条文经过三周协商后才达成协议。这

时日军侵略中国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以保护日侨为名，积极准备占领锦州和山海关，并沿平沈铁路南下占据天津。由于中国的要求，国联主张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并由各国驻华武官保证它的中立，借以阻止日军的前进。这个主张得到美国支持。嗣后，日本政府命令日军暂停西进。

12月10日，理事会一致通过一个决议，主要内容是派遣"国联远东调查团"（后来被简称为李顿调查团）。根据决议条文，调查团的任务是研究中、日纠纷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但它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两方直接交涉。条文也未具体说明调查团有义务或权力向国联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建议。这是避免在法律上强迫日本接受国联具有解决中、日纠纷的权力。很明显，这是大国对日本有意作出的让步。这就使日本可以毫无顾忌地继续采取违背国联宪章和开罗非战公约的行动。芳泽甚至声明日本有权随时采取措施，来"镇压土匪和其他扰乱秩序分子"，换句话说，就是日本在军事上仍将任意自由行动。

决议通过之后，主席白里安发表声明说：任何国家不管它的理由如何充足，也无权违背宪章，使用非和平方法来解决它与别国之间的争端。当时白里安和其他一些代表以为有理由相信国联调查团到了中国，能起着超过决议条文应起的作用。可是中、小国家对于这个决议虽然勉强接受，但很不满意，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鉴于美国时常干涉中美洲国家的内政，认为理事会不敢正式谴责日本违背宪章，就等于承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他们的代表发表声明说，他们虽然接受决议，但不承认这个决议可以作为将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一个典范。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理事会的决议，尤其是关于派遣调查团的部分。

国联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理中、日纠纷的经过就是这样。

白里安在这次会议中，本来是抱病主持，由于积劳和愤懑，他在1932年1月12日辞去内阁总理职务，旋即病重逝世。

李顿调查团的委任、组织和出发

到1932年1月，国联处理中、日纠纷为时已3个月了。在这3个月中，日本根本不顾国联有什么活动，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推进。这使国联在世界人民面前大失威信。李顿调查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

国联对李顿调查团的处理，看来郑重其事，但调查团本身的实际行动异常迟缓。关于遣派调查团的决议是在1931年12月10日通过的，但它的团员的委任，直至1932年1月14日才得完成，它的5名团员来自5个资本主义大国，即英国的李顿(Lytton，前驻印度总督)，法国的格罗特尔(Claudcl，前驻越南法军司令)，美国的麦考益(Mccoy，前驻菲律宾总督)，意大利的阿尔杜鲁万地(ALdrovandi，外交官吏)，德国的希尼(Schnee，前驻东非洲总督)。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政府委派顾维钧，日本政府委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为调查团陪查员。

关于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国联秘书长指派国联交通部长哈斯(Robert Hass，法国人)为调查团秘书长，另5个职员为秘书长助理，我是其中之一。法国和美国的团员也各有其助理。还有6位来自美国、法国、荷兰和加拿大的人员充当调查团的专门顾问。2月3日，调查团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并推选李顿为团长。

南京政府对于调查团迟迟其行表示不满，尤其是团员们不愿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东行可以早些达到东北，而偏要背道而驰地路经美国和日本。因为正当调查团忙于组织时，远东形势又进一步恶化。1931年12月中旬，日本被认为比较温和的若槻和

币原内阁被迫下野，而让位于政友会的犬养（首相）和荒木(陆相）内阁。政友会领导集团与日本军人素有密切关系，他们对于中国久已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转年日本新内阁成立数周之后，日本就继续进占哈尔滨、锦州和山海关，以致张学良的地方政权竟被完全消灭。2月底，日军不但在东北成立由他们控制下的“地方新政权”，而且强令三省傀儡省长在沈阳举行会议，宣布东北脱离中国而独立。同时日军又在1月28日进攻上海，中国十九路军起而抵抗，形成淞沪的激战。而这时李顿调查团还在美国和日本途中，直到3月14日调查团才到上海，4月20日才到东北。

李顿调查团的旅程和我的见闻

李顿调查团的欧洲成员于1932年2月3日离日内瓦取道美国转赴远东。美国成员则在纽约加入行列。调查团于2月29日到达东京，访问日本当局，3月14日到达上海。其时，我和国联交通部长哈斯早已在沪，并奉国联秘书长命令参与调查团行列。调查团到沪后，即与由外国驻沪领事组成的沪战调查委员会取得联络和参观战场，了解情况。3月26日调查团赴南京访问中国当局。4月1日至7日访问长江岸边城市，重点放在武汉。4月7日回到南京转由平浦路前往北平。4月9日至19日，调查团留在北平与张学良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取得联络筹备出关。4月19日分两路赴沈阳，一路在秦皇岛转车，一路在秦皇岛转船经大连前往。在东北调查的时间是从4月20日到6月4日。其间访问过许多城市，尤其是在长春、吉林、哈尔滨、旅顺、鞍山、抚顺、齐齐哈尔等地。6月5日调查团回到北平，在北京饭店设立临时办事处，从事整理在东北获得的大量材料。在此时期中，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分别从南京北上，与调查

团举行会议。6月28日调查团团员再赴东京与日本当局交换意见。当7月20日调查团团员回到北平时，临时办事处整理材料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随即起草报告书。这个报告书终于在9月4日签字。至此调查团的基本任务就算完成了。以上是李顿调查团的旅程。以下记述我个人重要见闻的片断。

（一）参加调查团行列的人员可分五类：一是来自欧美的调查团团员和他们的助手；二是国联秘书厅派来的职员（我是其中之一）；三是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人员；四是以吉田为首的日本代表团人员；五是中外新闻记者。当从南京乘船赴武汉逆流而上时，中间曾停留九江。在船上的3天，欧美人员总是从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照常办公。团员们白天阅读文件，下午5点茶会漫谈，交换意见。

日本代表团人员极少，除团长之外有一位陆军武官和一位海军武官。3人每天用大部分时间坐在船头，研究带来的长江地图。地图的详尽令人惊异，粗形的房屋和树木都应有尽有。我估计每5个或10个平方公里即有一图。单是这些地图的制出，就可说明日本精心策划侵略中国由来已久了。

中国代表团除极少数外，都在船上不分昼夜地大打麻将。有一次我在船舱上碰到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前驻丹麦公使王广圻，我对他说："我们国家正处在存亡关头，如果我们仍不振作，就会亡国！日本人天天研究侵略中国的计划，我们代表团怎么可以日夜赌博，增加外人对我们国家的轻视呢？"翌日，王广圻告诉我，他们决定白天不再打牌。可是他们从此改为通宵赌博，白天睡觉。原来，国民党取得政权后，自己培养的外交人材很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只好起用北洋政府的外交人员。顾维钧就是在这时又被起用的。顾被任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后，跟他进来的旧日部属不少，其中包括有朱鹤祥、金问泗等。

（二）当调查团在北平筹备出关的时候，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极力制造恐怖气氛，说有人要象1928年炸死张作霖一样地炸毁我们出关的专车。这个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国代表团团员朱鹤祥的妻子写信给她在平的丈夫，劝他不要随顾维钧出关。朱即向顾报告，并声明无论如何决不出关。顾对朱说："危险也可能有，但既然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务，而且又已来到北平，怎能临阵退缩。"朱说南京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不是他们的政府；日本侵略东北是国民党惹来的灾难，与他们无关。朱最后说，如顾一定要他跟随出关，就请顾代向南京政府要求先将20万元以他的名义存在银行，以备万一牺牲时他的家人生活得到保障。顾未接受朱的要挟，朱终于拒绝出关。

金问泗本是顾的亲信之一，中国代表团的副秘书长。他的妻子也从上海来信说她"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如果金要出关，她会忧郁而死。金以妻函示顾，顾也同意金不出关。秘书长王广圻也留在北平，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

（三）在沈阳时，我们下榻大和饭店。在我的房间门口，经常有两个日本侦探不分昼夜地监视我的动静。白天，当我在室内工作时，每隔二三小时，必有一个假扮服务员的日本侦探借故进来窥伺。当我与外边通电话时，我听见的机器声音，表明有人暗作记录。当我出门散步时，侦探必在我背后10米左右跟来，一刻不离。

有一晚，我和中国代表团的刘子楷（出关的秘书长）、萧继荣（副秘书长）同往城里一家餐馆吃饭。8点半的时候，忽有一位日方华籍警察进来干涉。我们对他第一个反应是表示愤怒和蔑视。他严肃地对我们说："我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告诉你们：9点以后必须离去，否则后果由你们负责！"他用背诵的方式把这句话连说3次。我们发现他含着满眶的眼泪，只得忿忿离开，

一时不禁泪如雨下！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简略内容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是由调查团于1932年夏在北京饭店起草，并于9月4日由全体团员签字的。文长272页，约74.4万字。签字之后，即由秘书长派员取道西伯利亚带送日内瓦国联秘书厅。

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东北情况，作了详尽的描写；认为东北地方行政存在许多的缺点；认为日本确有相当理由提出责难和要求；详细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的事实；并根据许多人证、物证，作出自己的论断；特别注意到伪满成立的背景和发展，对于日本在东北和整个中国的经济权益以及中国人民抵制日货的影响，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也予以同样的重视。以上是关于事实的叙述，并附有调查团自己的意见。报告书的要点是提出了解决中、日纠纷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方法。报告书结论是：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不是解决中、日纠纷的适当办法，因为这是不适合现实的；维持和承认满洲国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因为这是违反国联宪章和另一些有关条约的精神，并与远东和平所寄托的中、日谅解是不相容的；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东北地方自治行政制度，并以下列10大原则为基础：

（一）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

（二）兼顾苏联的权益。

（三）符合现存一些条约的规定。

（四）承认日本根据条约在东北的既得利益。

（五）签订一个新型的中、日关系条约。

（六）订立一些能迅速解决未来中、日纠纷的条款。

（七）成立一个东北地方自治的政权。

（八）东北地方治安应由警察负责维持；为避免外来侵略起见，一切武装部队应从东北撤出，并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

（九）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

（十）用国际合作的方法，由各国襄助中国发展经济（例如孙中山建设中国的计划）。

怎样才能具体地实现这些原则呢？调查团建议国联理事会根据上述原则，邀请中、日两国直接谈判来达成一项解决中、日纠纷的协议。如果中、日接受这项建议，两国可以召开一个咨询会议来讨论成立一个东北地方特殊行政制度。这个咨询会议可由中、日双方政府各派一个代表团和由两国政府各自选派一个东北人民代表团，即由四方代表参加会议。中、日两国可以同时举行另一个会议来讨论其他有关问题。最后，调查团建议将上述两种会议达成协议，包括在以下的法律文件之内：

（一）在维持中国在东北主权原则之下，由中国政府发表一个关于成立东北三省地方自治行政制度的宣言。

（二）关于日本在中国权益的中日条约。

（三）中日仲裁和互不侵犯条约。

（四）中日贸易协定。

关于中国中央政府与东北地方自治政府的关系，调查团建议以下权力属于中央政府。

（一）除有特别条款规定者外，一般国际关系监督之权属于中央政府。

（二）海关、邮电、盐税、营业税、印花税、烟酒税的收入和管理属于中央政府。

（三）东北自治区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委任。

（四）中央政府有权对东北自治区行政长官发布命令。

（五）其他由会议规定的权力。

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发表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上层人士认为：调查团曾尽力采取中立和公正态度，报告书的结论使中国在基本问题上得到实际的胜利，特别是报告书指出日军在"九·一八"夜向北大营进攻绝不能认为是自卫行动；满洲国的成立，如果没有日军在场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伪满并未得到东北人民的拥护，所以不能认为它的成立是出于东北人民自发的、真诚的要求。

关于东北非军事化的问题，当时西方人士说，现实是日本已经完全占领东北，中国在东北主权已经完全丧失，因此把东北划为一个非军事区的主要作用是强迫日本从东北撤军，这对于中国也是一个差强人意的解决办法。

然而照我们中国人民看来，报告书最大的偏向是容忍侵略，迁就现实，反对恢复"九·一八"前原状，主张东北自治。而最严重的是将东北划为非军事地区，这就使中国政府失去了在自己领土上驻兵的权利。报告书却反说这是抵抗外来侵略的保障！

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讨论、决议和日本的退盟

国联理事会收到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后，即提交国联大会处理。由于报告书有恢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的词句，日本加以拒绝。日本政府采用拖延手法，要求给予时间准备答复。同时它派遣一位新的代表、日本有名的诡辩家松冈到日内瓦大肆活动。松冈对中国问题素来主张采取不妥协对策。南京政府这时也另派顾维钧任驻国联代表。

松冈于11月21日在大会上开始对中国进行攻击，他诽谤中国有共产主义的危险。他举1927年英、美战舰炮击南京为例，胡说日本今天的行动和过去英、美在中国的行动在原则上毫无差别。他还为满洲国这个傀儡组织百般涂脂抹粉。

顾维钧对松冈的胡说八道进行了驳斥，他把重点放在报告书关于日本破坏宪章的行动和解决中日纠纷的原则和方法上。

由于松冈采用拖延手法，大会讨论的进行非常缓慢。在12月6日至8日第一次讨论过程中，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显著。中、小国家主张国联采取积极行动，并批评大国畏首畏尾、缺乏决心。这种谴责引起了英、法国内统治人物的不快。他们埋怨中、小国家大慷他人之慨，而不考虑到积极行动可能引起更大的战争，战争的破坏只会落在大国头上。他们还说中、小国家缺乏实力，对于经济或军事制裁不能做出有效的贡献，因此没有发言的权利。大国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更引起中、小国家的很大反感。后者说："我们所冒的风险并不小于具有强大陆海空军的大国。"中、小国家代表相继发言，要求国联采取积极行动制裁日本，并表示他们政府对于调查团报告书不但全部接受，而且认为它已证明日军破坏了国联宪章。

在这时候，人们特别注意，英、法代表对于调查团报告书的发言。可是英国外长西门对报告书指出的中国弱点部分复述了一番，对谴责日本部分却一字不提。法国外长保罗彭古尽其咬文嚼字之能事，结论是：法国主张遵守"国联宪章，整个宪章，唯有宪章。"英、法的政策使日本称快，使曾对英法有幻想的中国和中、小国家的人士大失所望。继西门之后发言的是大不列颠帝国成员加拿大的外交部长，他甚至公开为日本的侵略罪行极力辩护。

大会讨论结束后，它的特别委员会用了两个月时间试图说

服日本接受调查团报告书的建议，但遭到拒绝。最后，特别委员会直截了当地向日本提出问题说："你们是否同意在维持中国东北主权的基础上，在东北建立一个地方自治行政制度？"日本的回答是："维持满洲独立是保障远东和平的唯一办法。"至此，特别委员会乃放弃调解工作，并开始为国联大会准备决议。决议草案全部采用调查团报告书关于导致"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情况和"九·一八"后日本占领东北成立满洲国和上海战争经过的材料。它指出国联理事会关于调解中、日纠纷的建议遭到日本的拒绝，"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曾尽力之所能克制自己。它指出：日本所作所为是破坏国联宪章。它主张根据调查团报告书提出的原则和方法，来解决中、日两国的纠纷；主要条件是维持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否认满洲国成立的合法性和出于东北人民的要求。它主张在行将成立的大会远东委员会协助之下，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来解决它们的纠纷。决议草案最后要求国联成员在法律上和实际上一致拒绝承认满洲国和不做任何事情来妨碍大会决议的执行。

1933年2月23日的国联大会，几乎一致地通过了这一纸决议草案。只有泰国放弃表决权利，日本反对并声明拒绝大会的决议。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的决议。当大会通过决议的时候，松岗根据日本政府事先的训令，率领整个代表团戏剧性地退出了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退出国联。

国联大会通过这纸决议后，史迪生发表声明，美国完全接受国联的决议。接着美国民主党的罗斯福上台继任总统，他的国务卿赫尔（CordelHaill）发表声明，继承史迪生既定政策，并接受国联邀请参加远东委员会工作。

国联同时邀请苏联参加远东委员会工作，但遭到拒绝，可

是不久之后苏联就改变了对国联的政策。

国联的这个决议通过以后，直至1937年日本大规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止，远东委员会无所事事。其间，日军完全占领热河，从长城南下威胁平、津，在冀东再搞伪政权……情况如此，蒋记政府却照样与日本保持外交关系，不准抗日，这在国际政治实在是反常的现象。

新任国联秘书长爱文诺深深感到对于解决中、日纠纷无能为力，他找我去谈话，说："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首要的在它自己起来抗战，然后才有希望得到他国的援助。如果它自己不去抗战，象你们的国家一样，而希望别人替你们火中取栗，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中国今后必须自己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才是你们的唯一的出路。希望中国朋友们及早体会这个真理。"

爱文诺对我讲这番话时，我立刻感到他要我把他这个意见转达我国政府。因为作为一个国联秘书长，他不能在中国代表面前劝中国进行战争。但把我作为他的一个部下，就可对我直言不讳。谈话结束后，我马上走告顾维钧。我相信顾也会迅即报告蒋介石，但却有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六辑）